

AGNES SMEDLEY

史沫特莱文集

CHINA'S RED
ARMY MARCHES

DAUGHTER
OF EARTH

2

史沫特莱文集

中国红军在前进

袁文 真树榛 袁岳云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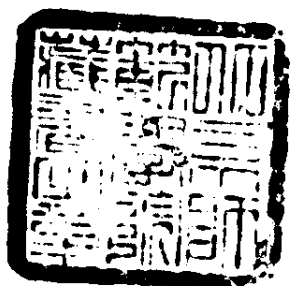
大地的女儿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65326

2



新华出版社

1065326



作者像

出版前言

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自一九二九年作为《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踏上中国国土开始，直到一九五〇年与世长辞，她一直献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中国人民跳动着同一脉搏。史沫特莱在她的《中国的战歌》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我一直忘掉了我并不是一个中国人！”

就是在一九五〇年她缠绵在伦敦病榻的时候，还在深情脉脉地说：“我可能再也看不到中国了，无论如何我已经知道新的中国政府终于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象老样子那样了。……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

一九五〇年五月六日，这位杰出的国际主义新闻战士终因忿忿成疾，贫病交加，溘然与世长辞了。临终前，她要求把骨灰埋在中国。她在给友人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我自有生以来仅有一个挚念，一个信心，那就是为解放那些贫苦和受压迫者而努力工作。在这个努力中，我已看到中国人民革命在这方面的

成就。我将多么愉快地看到中国大使的到来，在我的遗体旁唱中国的国歌——起来！

“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将使我的心灵得到安息。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许多中国革命烈士放在一起。”

史沫特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追求真理和支持被压迫的人民求解放的一生。艾格尼丝于一八九〇年出生在美国西部密苏里州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在她幼年的时候，家贫如洗，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母亲在给人家洗衣服，做杂工；父亲则在科罗拉多州洛克菲勒家族经营的矿上当矿工。这贫困潦倒的一家人，依靠史沫特莱一个当妓女的姨妈的帮助，才免于陷入绝境。

贫困和苦难早就在史沫特莱的心灵里播下了反抗的火种。她如饥似渴地学习，她在茫茫黑夜中追求真理，她向往人的尊严和独立自由，她憧憬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在她十六岁的那年，母亲因劳累过度、营养不良而悲惨地死去，这使艾格尼丝十分伤心。为了摆脱那吞噬了她母亲的青春和生命的厄运，史沫特莱毅然离家出走，开始了长期的半流浪生活，去摸索自己的人生道路。在艰难的岁月里，她当过报童、侍女、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等。她依靠顽强的意志和刻苦的自学，居然在十九岁那年考进一所师范学院，并以优异的写作才能当上了学生刊物的编辑。后来经常为进步报刊撰稿，写了不少抒发正义、揭露黑暗社会、同情劳动人民的富有战斗性的作品。

一九一六年，史沫特莱来到纽约，开始投身于火热的政治生活。她一方面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号角》周刊和女权运动刊物《节育评论》撰稿；一面支持印度流亡者争取民族独立的

斗争。由于她积极参加这些进步的政治活动，一九一八年三月，史沫特莱在纽约被捕。根据“反间谍法案”被指控为企图煽动反抗英国统治的叛乱。直到一九二三年，联邦法庭对史沫特莱的指控才正式撤销。出狱后，根据她亲身的经历，撰写了她的第一部文艺作品《铁窗难友》。这时她获悉，她的一个弟弟已被送往欧洲战场去当炮灰，行前，他曾要求见一见被无理关押的姐姐竟不能如愿；她那当小工的弟弟也在一次工伤事故中死去。史沫特莱义愤填膺，严酷的现实使她的思想更加激进了。因此她出狱不久，就积极投身于支持印度民族革命运动的洪流中。她编辑新闻通讯《印度新闻》，担任“自由印度联谊会”的执行书记，并为该组织筹款、撰稿。后来由于接连受到反动当局的迫害，她才被迫离开美国，前往柏林。

在德国期间，史沫特莱除了继续支持印度的民族革命外，还积极参加了争取男女平等权力的活动。她与美国女权运动的领袖玛格丽特·山额夫人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于一九二七年请山额夫人来德国进行了一次巡回演讲。一九二八年，她在柏林开设了一个节育诊所。此外，史沫特莱还在柏林大学教授有关英美的课程；同时，她又劝说校方同意，作为一名学生攻读印度历史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史沫特莱用德文写了大量文章，其中有许多是写给学术性刊物，并且绝大部分都是关于印度历史和妇女问题的。显而易见，史沫特莱还是二十年代德国知识分子舞台上十分活跃的人物。她同德国著名的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成为好朋友。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德国的《法兰克福日报》在头版连载了她的著名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

一九二九年初，史沫特莱作为《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来到中国。她一到上海，就被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所感动了。中国人民的朋友、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在他的著作中，对史沫特莱作过一段逼真的描述：

“她看到在夏季炎炎烈日之下，一伙码头工人，肩上套着绳子，吃力地拉着装满货物的木板车。突然，一个满脸胡子的大个子印度巡捕出现了。为了给一辆里面坐着一位傲慢的外国官员的闪闪发光的黑色小轿车开路，他竟然殴打工人们汗水淋漓的光脊背。那时，她感到警棍好象打在自己身上一样。看到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如此对待另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她不禁感到耻辱。她自言自语地说：‘凡是有胆识的人，在这块大地上一定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她当时就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坚定地表示了要献身变革这一制度的伟大革命。”

当史沫特莱初到中国时，正值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共产党人和其它进步人士，横遭反动当局的逮捕和杀害。具有崇高国际主义精神的史沫特莱，对旧中国内忧外患、满目疮痍、黑暗腐败的种种状况深为忧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深表同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为了把中国革命真相向全世界传播，她决心长期深入生活，和中外进步作家、新闻记者一起，“搬走这座封锁中国的大山”，打开世界人民的眼界，使他们对战斗的中国寄予同情和希望。

在此期间，史沫特莱尽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迫害，但她毫不畏惧，勇敢战斗。她不仅用自己锋利的笔写了许多充满激情的文章，揭露黑暗，歌颂光明，首次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江西苏区情况传播到国外去，而且还协助宋庆龄成立了“保

卫人权同盟”，利用她的交际才能和记者身份，团结了许多进步的中外朋友，向全世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黑暗暴政。为了支援以鲁迅为首的中国进步作家的斗争，她曾暗暗地保护过许多革命者，并把自己的家作为通信联络点和聚会场所。一九三一年二月，青年作家柔石、李伟森、殷夫、胡也频、冯铿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鲁迅在悲愤之下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一文，要求译成外文送到国外发表，史沫特莱毅然担负起这一工作，终于把这篇战斗的檄文发表在当时美国的进步刊物《新群众》杂志上。

抗日战争前夕，一九三四年底，史沫特莱第二次来到中国，她虽然重病刚愈，却毅然前去中国西北采访。一九三六年，她在西安期间，亲眼目睹了震动世界的“西安事变”。她把张学良将军扣押蒋介石的真实情况用英语向全世界作了广播。一九三七年初，她到了延安，访问了许多革命战士和干部，并同朱德总司令作了频繁接触，要求为他写传，介绍他的生平。史沫特莱认为，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革命者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朱德同志把身世告诉她，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这是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的阶级所最关心的事情。为此，她进行了大量采访，并在战斗中实地观察达一年之久，为日后写朱德传积累了大量的材料。

抗日战争开始后，史沫特莱不顾个人的安危，随军转战各地，写了大量文章，介绍中国的抗战情况。她以道劲感人的通讯促使中外记者和进步人士去延安亲眼见识那里的火热革命斗争。在硝烟滚滚的战场上她不仅用她那锋利的笔锋抒发着她对

浴血奋战中牺牲的战士们的深厚同情，而且还到处奔走呼号，为中国伤员在国外募捐，在国际上赢得了许多进步人士和医药界朋友的巨大援助，并促成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她还动员和组织了包括白求恩、柯棣华在内的一批加拿大和印度医生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工作，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沦陷，她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身份，身着戎装，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华北、华中和华东，写了许多著名的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受到国内外人士的称赞。当敌寇对新四军驻地狂轰滥炸时，叶挺军长劝她离开目标较大的军医院，她坚决要与战士在一起；当斗争形势日益残酷时，朱德总司令也劝她转移到敌后较安全的地方，她执意不去，她说：“为什么和我谈死亡的危险，你们不是也经常面临着死亡吗？让我也跟你们一样生活吧，我不想死，我也尽力做到不死。但是，如果我一定要死，就让我死在这里吧。我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许多城市象污水坑一样，我生活在那里就感到痛苦以至病倒。但是你们的部队却恢复了我的健康。这是因为这支队伍是中国和亚洲的希望。只有在这里，我的心情才平静，我的精神才振奋。”她还说：“你们的人民也是我们的人民，因为我是属于大地的，我们的斗争也就是整个大地的斗争。”史沫特莱就是以这样高尚的情操和伟大的胸襟来看待和参加中国革命斗争的。

究竟什么力量使史沫特莱嫉恶如仇、追求光明和奋不顾身地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呢？她在《大地的女儿》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她为什么不忘自己的阶级出身。她从不忘记她辛酸的童年

以及她难以忍受的逆境。这也是她为什么远离她热爱的祖国和人民，来到陌生的中国，并把她的整个后半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真正原因。当她预感到中国革命的成就，已经是那些贫困的、被压迫的人民的解放事业的中流砥柱时，就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中来。

史沫特莱认为，她在旧中国的一切行动中心，“在于要预告中国革命的发生”；她认为她自己全部历史的任务，在于挖掘和发现“中国社会生活的潜流”，并且观察这一潜流究竟要流向何处？经过十年的观察和深入调查，她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和他们队伍中忠诚的党员，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者到绝大部分的指战员，他们都是全人类中出现的新人，是在旧中国具有全新思想、在当今历史中具有全新风格、高尚情操和坚实理想的新人。史沫特莱十分振奋地写道：“在他们身上，一个全新的成份进入了中国社会。”而且她还坚信，这不仅是中国的希望，而且这是亚洲的希望，全世界被压迫国家的希望。

正是基于这一远见卓识，她以惊人的毅力排除万难，致力于介绍中国。她在积极参加社会进步活动的同时，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的通讯、报告、杂文和短篇小说，数量约达二百万字。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这位伟大的美国人，在专心写出更多更好的革命回忆录和革命传记文学作品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绩，这些作品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一个宝贵的贡献。”史沫特莱对于她的作品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感到莫大的骄傲与欣慰，虽然她受着贫困与疾病的折磨，但她仍把所得到的一切稿费和讲演费拿来救济中国战区和灾区的孤儿。就是晚

年在贫病交加、处境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她仍在致力于介绍中国革命，从事《伟大的道路》一书的写作。

一九四九年二月，在美国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的狂暴里，史沫特莱蒙受了不白之冤，美国陆军当局宣布她是“苏联间谍”。这一罪名使她受到了残酷的虐待和折磨，她几乎没有栖身之地。到处都是关于史沫特莱是共产党或是“卖国贼”的传闻。所有这一切，使她不可能找到工作来维持生计，而且剥夺了她集会、讲演甚至出书的权利。就在这一年的八月，曾经和她签订过《伟大的道路》一书的出版合同的美国一家出版社，突然向史沫特莱提出，说她在书稿中对中国革命的意见是教条的，强迫她进行修改，并加进反共的内容，遭到她的断然拒绝。表现了宁死也不弯腰的革命精神。

但是，就在她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她从广播里听到了她曾经致力于奋斗的新中国诞生的消息，她激动万分。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拒绝给她来中国的护照，史沫特莱决定取道欧洲来华。多么遗憾啊，就在她在伦敦停留期间，病魔夺去了她的生命。对于史沫特莱的逝世，中国人民是十分悲痛的，为了实现她生前的愿望，一九五一年五月六日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她的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墓前竖立着一块大理石墓碑。碑上镌刻着朱德元帅亲笔书写的金色题词：“中国人民之友 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鲁迅说过：“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的死掉了。”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杰出的作家和新闻记者，新华出版社决定出版《史沫特莱文集》。这套文集含有四卷，主要搜集了史沫特莱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其内容是：

第一卷《中国的战歌》(Battle Hymn Of China)。书中详细介绍了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一年她在中国的见闻，真实地记载了她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以及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华北、中南和华东抗日战场的情景，报道了中华儿女的英雄业绩，生动地向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真实情况。此书自一九四三年在美国出版后，连续再版，受到各国读者的热烈欢迎，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优秀的报告文学著作。

第二卷收有《中国红军在前进》(China's Red Army Marches)和《大地的女儿》(Daughter Of Earth)两部著作。

《中国红军在前进》又名《中国红色风暴》，写的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二年间，中国人民为谋求统一团结、和平奋斗救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红军作先锋同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投靠帝国主义、镇压国内进步力量的国民党反动派奋起作战，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五年建军史诗。这部书一九三四年在莫斯科首次出版，以后在西方连续再版。

《大地的女儿》是史沫特莱的自传体小说。书中生动翔实地描述了她幼年和青年时期的苦难经历和父母的悲惨命运。最后她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参加了工人运动，变成了勇敢的革命者。又经过刻苦自学，成为著名的作家和新闻记者。这部书是她来中国的前一年即一九二七年写成的，一九二九年初版，以后连续再版。

第三卷《伟大的道路》(The Great Road—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h)。这本倾注了史沫特莱全部心血的书，不仅记录了中国人民敬爱的朱德同志六十岁以前所走过

的道路，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一幅壮丽多姿的画卷。这本传记著作具有它独特的风格。作者把自己置身于书中，并以她非常生动、细腻和隽永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栩栩如生的形象；逼真地记述了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介绍了英雄的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在缔造新中国的过程中所创造的史诗般的事迹。这本书自从一九五五年以日文译本初版问世以来，世界各地又先后出版了德、俄、法、西班牙、孟加拉、丹麦、意大利等八个语种的译本，在各国进步人士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本书同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成了有关中国革命史的名著。

第四卷收有《中国在反击》(China Fights Back)和《中国人的命运》(Chinese Destinies)。

《中国在反击》是一本日记体、书信体的书，记下了史沫特莱从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到一九三八年抗战初在华北地区的生活和经历，她不畏艰险，深入前线和八路军、游击队在一起，书中主要反映了当时华北地区抗日的政治和军事形势。该书一九三八年由美国先锋出版社出版。

《中国人的命运》主要反映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的动荡社会生活、阶级矛盾和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作者通过对当时社会现状的调查，对各阶层人的接触了解，以一个记者的锐利眼光揭穿了旧中国的社会弊端，并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寄予无限的同情和支持。该书在一九三三年先由美国先锋出版社出版，后又再版过。

《史沫特莱文集》除《大地的女儿》和《伟大的道路》两书在国内出版过外，其他均为首次在国内出版发行。这次出版

时，对《大地的女儿》和《伟大的道路》某些译文又作了润色和校订。

《史沫特莱文集》的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宏伟事业的中国人民，这些记述了中国人民和其它被压迫人民历尽艰辛和英勇斗争的书，既是极好的纪念品，又是激励人民为实现崇高理想而坚决战斗的重大动力。重温她的经历，使我们缅怀过去，展望未来，更加奋发前进；对于中国年轻的一代来说，尤其具有重要的价值。一切有志之士可以更好地学习她不畏艰险、坚持真理的献身精神，学习她热爱人民、深入实际的优良作风，学习她毕生致力于人民的解放事业、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团结互助的高尚理想。为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光和热。

史沫特莱和斯特朗、斯诺一样，他们的许多优秀品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在黑暗的中国点燃起信息的火炬，而这火炬又曾得到广泛的传播。他们真正是国际新闻界中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正如邓颖超同志一九八四年九月致三S研究会的信中所说的：“三S虽然是美国人，但是三S从三十年代起就热爱中国，先后来到中国，他们不避风险，不顾自己的安危，不断地把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和胜利，以及在旧中国各族人民所受的苦难情况，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以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更加兴奋，不知疲劳地为新中国服务，直到他们的生命终止，还留下遗嘱，把骨灰埋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是多么感人，又激励我们热爱中国，发扬国际主义的永恒动力啊！三S为中国各族人民所作的贡献是难能

可贵的，也是难以估量的。我们要向我们三S的老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向他们学习！”

我们愿三S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愿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演奏出更加雄伟更加庄丽的《中国的战歌》！

新华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四月

中国红军在前进

作者前言

本书有关史话，系根据中国革命领导人参与的实际大事写成。史话涉及中国红军的成长。这个军队是今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坚强柱石，共和国政府的首都在江西东南的瑞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捍卫者中国工农红军之所以兴起、发展壮大，是有它同国民党中国作斗争的社会背景的。国民党中国一意孤行，疯狂进行反革命战争，不可避免的引狼入室，招致外国武装干涉，完全瓜分中国的局面，严重地威胁着南京政府。作为世界各国承认的“那个”中国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开诚布公、同赴国难的步骤来停止国家的被瓜分，整个民族的被奴役，反而同日本帝国政府签订一系列条约，把中国的一些省份拱手送给日本人。

一九三二年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告全国民众宣言。它揭露南京政府和执政党国民党，充当外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宣言号召民众起来武装自己，夺取南京部队的枪枝武器，进行

民族革命战争，挽救民族危亡。

红军对国民党军队宣告，它准备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结成统一战线的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中华苏维埃区域的战争；（二）立即保证中国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民主权利；（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抗日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

这个宣告对南京军队士兵起了很大影响，他们听到了这个宣言。但南京政府的独裁者，帝国主义列强扶植的宠儿、“铁腕人物”蒋介石却对宣言的答复是，发表了一个“谁言抗日而不剿匪者立斩无赦”的威胁讲话。他的讲话得到一切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反革命派系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南京政府军队及其军事同盟军队是绝对地用来对付中国革命的民众的。

正当日本皇军在中国东北三省广大土地横行的时候，南京政府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公开支持下，动员了一百万军队，对工农红军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进行第四次军事围剿。这次战争从一九三二年秋冬到一九三三年初夏在鄂赣两省进行。红四方面军艰苦转战进入四川西部。成立了四川省苏维埃政府，好几百万工农起来纷纷参加红军。这个新苏区的建立，使得帝国主义分子惊恐万状，以致英国驻华公使慌忙火急赶到四川省政府，面交四川军阀刘湘一笔两千万英镑贷款，督促他能消灭“赤匪威胁”。刘湘欣然接受这笔贷款并同意英国的傀儡藏军自西藏侵占川藏交接地区西康。

中国工农红军在江西打败了南京政府四十个师军队的围剿，俘敌八万人。一九三三年春，红军夺获美、英、法、德、

捷等国提供南京政府的十四万支步枪，一千三百九十架轻重机枪，二十架军用无线电机，几百架大炮，六架飞机。工农红军用敌人的武器把几万工农红军武装起来了。此外有三万多南京军队的士兵起义投奔到红军方面来。按照俘虏兵的思想意识和社会来源，经过审查批准将近一半人参加了红军。俘虏敌人的三个师长、两个旅长、五个团长，高级军官中有两个师长果断地写了反对民众罪行的供状。

捣乱失败吓昏了国民党中国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分子。蒋介石总司令部里已有五十多名德国法西斯军官，正是这些法西斯军官制订出第四次围剿战争计划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参谋部赛克特将军到达南京控制国民党军队，提出新的围剿军事计划镇压革命群众。而今有七十多名德国参谋部的法西斯军事顾问训练指挥国民党军队。

积极参与对中国人民进行战争的决不只是独此一家的德国法西斯。所有外国资本主义国家都参与这场赌博，都不惜时间和金钱下押赌注，充当南京政府的后台。一九三三年，英国出于打通英占香港与华中围剿工农红军的战略目的，给国民党政府一笔五百万英镑的贷款，赶修贯穿华中腹地的粤汉铁路。一九三二年南京政府根据英国人草拟的停战协定出卖淞沪。把上海交给国际帝国主义共管。一九三三年订立塘沽协定，中国军队撤出，让日本军队占领河北、察哈尔省和北平市。英国驻华公使米勒·兰普逊爵士是安排出卖中国主权领土的外国人。事实上南京政府同日本之间签订的每个出卖中国的协定都得到英、美、德、法等国驻华使节的积极支持和劝告。

随着那些协定的签订，甚至日本政府也给南京政府提供财

政和军事援助来围剿中国工农红军。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共同目的给南京援助武器弹药，南京政府用中国的自然资源作为安全抵押。国民党发言人赤裸裸地宣称它特许鸦片公开出售，每年将有二亿美元流入南京政府金库，鸦片生意的收入将用来同红军作战。国民党统治区域准许鸦片公开交易荼毒人民。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则规定，贩卖鸦片为犯罪处以死刑。

美国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全部瓜分和奴役中国这场赌博中也积极参加，助桀为虐。美国给南京政府五千万，美麦借款即所谓“棉麦借款”，真正意图在于对南京围剿苏区提供财政上支持的讨伐战争。四千万美金借款即所谓航空借款购买美国军用飞机是用来进攻苏区的。南京政府宣称购买八百五十架美国军用飞机。第二天，美国轰炸机即成群盘旋在南京上空。主要飞行员都是美国人。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南京空军部队里就有三百多美国航空驾驶员。这个飞行队和飞行人员是干什么的？难道是防止中国被瓜分吗？完全相反，在华北地区兴修的军用机场，没有一个是用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在江西南昌市蒋介石剿匪总司令部大本营所在地，就修了一个能停放六百架飞机的军用机场。美国飞行员正在积极参与屠杀中国人民的战争，正在狂轰滥炸中国的城镇乡村。

一九三三年夏，赛克特将军一伙法西斯党徒对参加第四次围剿苏区讨伐战争的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军官进行训练。赛克特新战术采用了各个帝国主义殖民强盗们征服非洲和印度的军事策略。那些经过特种训练的国民党军队，于一九三三年秋冬到一九三四年夏天，投入江西苏区同工农红军作战。红军奋起迎

击，同前次反围剿战争一样打败了白军。吓的中外反动派战栗发抖。红军用帝国主义国家慷慨提供南京军队的武器把成千上万工农新战士武装起来了。

一堆莫名其妙的问题总是由外国人提了出来，“中国红军是从哪里得到武器的？不从苏联，又从哪里？一支相当小小的军队能够打败经过外国专家训练，得到外国军事装备还有外国军事顾问指挥的国民党军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中国工农红军并没有从苏联得到一支枪，它的一切枪支都是从围剿国民党军队手里夺来的，都有资本主义各国军火商的图章标记。可是武器只不过是工农红军战胜比它的力量大过十倍的敌人因素之一，其他原因很多。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在共和国首都瑞金回顾了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苏区的形势和变化。中国苏区革命的进展，说明工农红军取得的新成就。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完全实现了，一套完整的财经政策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取得了苏区内部群众甚至身受封建残酷剥削压迫的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的忠心拥护。苏维埃一大通过的法律强有力地改善了所有工农的贫苦状况。

文化方面同样取得了巨大进展。创办了成百上千所学校、夜校、俱乐部、扫盲识字班，还有许多妇女训练班，只师范学校和瑞金中央大学就有男女学生两千人。报纸、墙报、展览馆、剧艺社增加了群众文化的生活内容。瑞金附近的中央军事学院一九三三年就有两班学员毕业，每班学员人数一千五百人。

红军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支铁军。一九三一年底，中央革命

军事委员会成立。它能使各地红军一致行动，一致配合作战。它同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民兵等地方武装群众组织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所有其他武装的群众如联络、运输、侦察、医疗卫生、民运工作等都直接参加到前线和后方的军事工作中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一九三二年发布了一个发展百万红军的号召。因为只有革命战争才能解放全中国，把帝国主义赶出去，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反应很大，成千上万的国民党统治区城市里的工人进入苏区参加红军。成立了包括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在内的模范师。有的模范师全部由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组成。其他师团共产党人数百分比高达百分之六十或七十。

一九三三年初，蒋介石接见日本《中央公社》杂志一个记者发表谈话，手法高明地辩护他为什么不能消灭“共产党”、消灭“赤色威胁”。他对日本记者提出的论据，不但在今天而且在将来都是可供引证的绝妙好词。蒋氏抱怨说，困难在哪里？困难在于苏区附近内外对南京部队打游击战争。

“地方民众，良莠甚难区别。正式赤军外，又有赤卫队即所谓农民游击队。此等游击队之编成，系于共产党占领某地后，即有共产党强制被占地域之居民与强健工农编制为队，应客观实事之需要，群起作游击战争，扰乱我们的论伐军队后方，或袭击讨伐军之输送部队。其他为侦探、谋叛、掩蔽共军之所在，均可尽能，各致所用。平常时期彼辈从事耕作，迨至必要时期，即全付武装为共产党军队尽力。故无论任何良民，政府军队均不能不严格防范。最近政府军队数师覆灭，师长阵亡达

二人者，实因此种游击部队群起与共产军前后呼应，有以使然。

“再则游击队与良民无所辨别。因之军队出动讨伐，辄不禁起草木皆兵之感。即在未加入共产之良民区域军队亦觉非杀良民，无从安心。杀时苟为游击队中人，孰非游击队中人，甚属困难。有此困难，于是讨伐上遂引起困难之结果。即（一）粮秣给养杂役之补给，陷入不可乱之态；（二）匪区附近一带之良民，深恐讨伐军到达，淫渭不分，玉石俱焚，因之良民区域，渐为赤色浸润。”

蒋介石这个谈话，就他所谓他的军队“非杀尽良民，无从安心”，是彻头彻尾的虚伪，是在为他自己和僚属以及整个的中国统治阶级作辩护。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在苏区内确杀尽了千万工农群众。可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并不心甘情愿这样“杀尽良民”，成千上万的士兵挣脱长官的压制，投奔红军。赛克特将军的剿匪新计划中有国民党军队同民众隔离之点，理由是士兵乐意听取老百姓的意见。赛氏新计划其他各点，由特别组成的地主、流氓、还乡团在打下的苏区内部或邻近地区来实行白色恐怖，理由是国民党军队不可信赖。消灭杀光中国老百姓的唯一可靠信得过的是南京政府的官僚、地主、资本家、青红帮和殖民帝国强盗们。

看来，中国统治阶级同帝国主义各国一样，不能从历史上学到什么东西。今天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处境，与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二年苏联和苏军当时的情况极其类似。各国政府出钱出兵武装白匪雇佣军反对俄国革命，成立傀儡政

权，屠杀本国人民。用谎言和歪曲事实的报道塞满世界报纸。然而他们是阻挡不住历史车轮前进的。他们在中国照旧这样而行，但他们也不能阻挡中国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看来，帝国主义国家，他们想要保持今日半封建的腐朽没落的农业中国，使它无能建设发展国家，无能采取任何步骤来提高中国广大群众的生产交换能力即购买能力，但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在控制地区内把封建土地奴役枷锁打破。土地革命完成后下一步要求便是机械化。中华共和国需要工业机械化和农业机械化，需要一个工业国家对它提供援助，一百年多一点它都需要这类机械化的援助。

但是，目光短浅、无知愚蠢的帝国主义国家，却试图把中国人民置于让金银财宝埋藏地下，向农民放高利贷的愚昧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之下。资本主义国家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千真万确是愚蠢无知，反动透顶的。如果他们有远见卓识的话，如果他们有起码常识的话，他们就会停止对南京政府及在华其他傀儡政权的一切援助。至少对中华共和国的进步寄予公正无私的同情。他们现在这样的横行下去，只能引起若干年月无谓的痛苦和流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国红军最后将取得胜利，因为其目的和纲领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的。因为这个，中国工农红军这支钢铁队伍正在前进，任何东西是不能阻挡他们前进的。

二人者，实因此种游击部队群起与共产军前后呼应，有以使然。

“再则游击队与良民无所辨别。因之军队出动讨伐，辄不禁起草木皆兵之感。即在未加入共产之良民区域军队亦觉非杀良民，无从安心。杀时苟为游击队中人，孰非游击队中人，甚属困难。有此困难，于是讨伐上遂引起困难之结果。即（一）粮秣给养杂役之补给，陷入不可能状态；（二）匪区附近一带之良民，深恐讨伐军到达，泾渭不分，玉石俱焚，因之良民区域，渐为赤色浸润。”

蒋介石这个谈话，就他所谓他的军队“非杀尽良民，无从安心”，是彻头彻尾的虚伪，是在为他自己和僚属以及整个的中国统治阶级作辩护。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在苏区内确杀尽了千万工农群众。可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并不心甘情愿这样“杀尽良民”，成千上万的士兵挣脱长官的压制，投奔红军。赛克特将军的剿匪新计划中有国民党军队同民众隔离之点，理由是士兵乐意听取老百姓的意见。赛氏新计划其他各点，由特别组成的地主、流氓、还乡团在打下的苏区内部或邻近地区来实行白色恐怖，理由是国民党军队不可信赖。消灭杀光中国老百姓的唯一可靠信得过的是南京政府的官僚、地主、资本家、青红帮和殖民帝国强盗们。

看来，中国统治阶级同帝国主义各国一样，不能从历史上学到什么东西。今天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处境，与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二年苏联和苏军当时的情况极其类似。各国政府出钱出兵武装白匪雇佣军反对俄国革命，成立傀儡政

权，屠杀本国人民。用谎言和歪曲事实的报道塞满世界报纸。然而他们是阻挡不住历史车轮前进的。他们在中国照旧这样而行，但他们也不能阻挡中国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看来，帝国主义国家，他们想要保持今日半封建的腐朽没落的农业中国，使它无能建设发展国家，无能采取任何步骤来提高中国广大群众的生产交换能力即购买能力，但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在控制地区内把封建土地奴役枷锁打破。土地革命完成后下一步要求便是机械化。中华共和国需要工业机械化和农业机械化，需要一个工业国家对它提供援助，一百年多一点它都需要这类机械化的援助。

但是，目光短浅、无知愚蠢的帝国主义国家，却试图把中国人民置于让金银财宝埋藏地下，向农民放高利贷的愚昧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之下。资本主义国家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千真万确是愚蠢无知，反动透顶的。如果他们有远见卓识的话，如果他们有起码常识的话，他们就会停止对南京政府及在华其他傀儡政权的一切援助。至少对中华共和国的进步寄予公正无私的同情。他们现在这样的横行下去，只能引起若干年月无谓的痛苦和流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国红军最后将取得胜利，因为其目的和纲领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的。因为这个，中国工农红军这支钢铁队伍正在前进，任何东西是不能阻挡他们前进的。

目 录

中国红军在前进

作者前言

- | | | |
|---------|--------------|---------|
| 第 一 章 | 耒阳城头…………… | (1) |
| 第 二 章 | 李贵的死…………… | (18) |
| 第 三 章 | 侦察员…………… | (25) |
| 第 四 章 | 艰苦转战…………… | (33) |
| 第 五 章 | 政治委员作报告…………… | (48) |
| 第 六 章 | 井冈山…………… | (58) |
| 第 七 章 | 七星桥小唱…………… | (73) |
| 第 八 章 | 围困…………… | (90) |
| 第 九 章 | 九死一生…………… | (103) |
| 第 十 章 | 红色堡垒…………… | (115) |
| 第 十 一 章 | 夺取长沙…………… | (126) |
| 第 十 二 章 | 传教士插话…………… | (142) |
| 第 十 三 章 | 俞昆讲战斗…………… | (152) |
| 第 十 四 章 | 崖石寨…………… | (163) |
| 第 十 五 章 | 一天的生活…………… | (171) |

第一章 耒阳城头

湖南省东南耒阳县的城头上红旗飘扬，风展红旗拂拂作响，隐约现出镰刀和斧头的轮廓。有此旗帜一片通红，上面绣着“耒阳地区农民协会”、“耒阳县工会”几个大字。这时，农历正月初一，公历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三日，耒阳县西北水口山铤矿工人暴动胜利的旗帜也在耒阳县群众组织的旗帜中间迎风飘扬。矿工队这面“湖南游击队”旗帜，象一根钢枪插在耒阳县群众旗帜中间，给它们以无穷的力量和坚定的方向。因为那些矿工都是立场坚定、入党多年的共产党员。

耒阳城头上一队队威武雄壮，解放了的工人和农民正在巡逻走动。他们穿着打补丁的旧棉衣，左臂上佩带着一块红布臂章，肩上背着步枪，他们是耒阳县的赤卫队。去年秋收后年关时节，耒阳地区工农暴动，赶跑了地主土豪资本家和贪官污吏一类奴隶主，打跑了地主武装团防局的民团团丁和国民党两个团。

笼罩中国大地上的乌云正在过去，光明已经来到古耒阳的城头。

城头上的赤卫军一双双眼睛焦急地望着城外的崇山峻岭、披谷平原和天空的动静。他们向城东、城南方面瞭望有无敌人国民党军队的出没，他们向城东南方向察看有无即将到来的朱德统帅的红军。

一个赤卫队员不时停下来侧望城头上一面面飘动的红旗出神。一双瞳仁明若秋水，透过红旗内外，一眼好象望穿了饥寒交迫、苦难煎熬的遭遇和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行将发生的巨变。他看到旗子是红色的。红色以往在中国全部历史上总是预告新的一年或新的生活，如过年、办喜事、祝寿等喜事。红旗它象征中国亿万劳苦大众新的生活已经到来。

他记得今年的春节同有生以来哪一年过年都不一样。今年耒阳确是万紫千红，大放光彩。同传统的过年过节满堂红不一样，革命的春节是一片欢乐，红彤彤的景象。今年不是富人寻欢作乐的年头，而是工农群众取而代之的岁月。耒阳县城各处锣鼓喧天，家家户户庆祝春节，有史以来第一次改观。

这个赤卫军战士记得往年春节临近时，年关就是鬼门关。总想在新的一年里从头作起，百事如意，必须把背的一身帐还清。但是不背债的人家很少很少。过年对于穷苦农民、工人和城市贫民总是意味着悲惨不幸。他们为了活命不得不向高利贷主、土豪地主、商人资本家借钱。谁能还得起债？多少年多少代穷苦人每逢年关，心情沉重，难以度岁。他们听着狠心地主逼债的伤人恶语，念着绝卖文书，把最后一点土地卖掉。

“立约人陈应苏世代务农，现将地产永卖与吴汉明地主

家。本人子孙后代承耕吴家土地，空口无凭，立约为据。”

农民在绝卖文书上画押的时候，总是向地主老爷下跪作揖三磕头，饮泣吞声乞求地主老财大发慈悲，期望挽回他们作自由人的身份地位，但是地主却冷言冷语说人为什么穷，不是好吃懒做便是八字^①不好。至于他生庚吉利，富贵天成，生来就是当官做老爷的命，即使本族同家同房近亲，贫富悬殊也六亲不认。

有的农民并不相信自己生不逢时，八字不好，拼命苦干一辈子，但实际生活不如猪狗。春种秋收，迎神赛会，到庙里去烧香拜佛，求神保佑，捐献布帛施告许愿，以为仙佛有灵、有求必应，但一切希望均成泡影。颓然潦倒苦不堪言，他们是世上最不幸的牲畜。他们有的为了保全一点土地，救活一家性命，大年初一领着女儿到官僚地主家里出卖，身价最多不过五十块钱，微乎其微不够清偿旧债。他们的儿子到军阀队伍里去当兵吃粮，一个月薪饷五、六块钱，可是军饷常被尽饱私囊的军阀长官剋扣，当兵的很难得到一个铜板寄回家去。农民看世界，有钱有势的人家，刻薄寡恩，比出没深山老林的虎狼更狠毒凶残。

农民终年受着地主的残酷压迫剥削，除了交付繁重的租税外，逢年过节还要给地主老财送鸡鸭、禽蛋、老婆女儿到地主家帮灶作饭，无偿劳动，本身受地主任意差遣，得不到时刻

注^① 八字。中国旧社会人们迷信的一种，认为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各有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配合。每项用两个字代替，四项就有八个字。据八个字推算一个人的命运。富贵贫贱考吉凶。订婚时男女两家须先交换八字红贴叫庚帖简称八字。推算一个人命运的称八字先生。一原注

安息。

耒阳城头上那些武装的赤卫队员们望着红旗，往事历历，不时涌现心头。他们记得地主老财收租逼债规定的一套狡猾欺诈、盘剥敲索的制度。早春二三月，青黄不接缺粮少吃，谷价腾踊，地主发放青苗债，贷给农民一担谷，秋后要加倍收租。

“谷价一石，大洋十块”。地主说：“秋后要还十块钱的谷”。农民没有选择余地，借谷就画押，不借就挨饿。秋收时节，地主管家就到地里来要十块钱的新谷，而秋后新谷上市谷价一石跌到三四块钱。借据载明农民应还十元谷价钱。这时至少还三担谷；新谷还不清旧欠，就以土地作抵押。

地主老财还有其他各种敲诈的鬼办法。地主老婆冬天给农民送一件破旧棉衣或一顶娃娃戴过的旧帽子，农民光景太穷只得收下。破破烂烂的东西也要折谷算钱。亦官亦商的地主强加给农民身上的债务，象一口死棺材压在老百姓的身上。农民有时停下来看这口棺材，里面有地主儿子戴旧了卖给他儿子的红“虎头帽”，还有十七八年前喜庆生子拉的一笔帐，十七八年后儿子当兵在军阀混战中负伤死亡费用的一笔帐，还有大旱天灾后借的谷种一笔帐，还有那一冬他全家象牲畜一样过活，喝稀汤糊糊熬过饥寒交迫的严冬，……等等一身难清的债。于是土地归了老财，自家只有在那要命的卖据上画押。

在清朝统治下，情况这样；在民国统治下，外甥打灯笼情况照旧。土豪地主的贪婪永无止境。农民老百姓的苦难也永无止境。农民的遭遇这样，工人的遭遇同样。暴动的矿工们不是跟农民讲过他们的悲惨生活吗？不是讲过去年十冬腊月后几个月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使人毛发悚然吗？只因为联合起来搞工人

运动，数以百计的工人不是惨遭屠杀吗？资本家不让人有自由思想。于是，工人们挺身而出，同耒阳地区的农民一起暴动革命了。整个华中一带，工人农民被逼上梁山，拿起锄头斧头菜刀梭标干开了，革命的烈火熊熊在燃烧。

耒阳城头上荷枪的赤卫队员们望着头顶上空飘展的红旗，想起他们一切的遭际，他们能够无动于衷忘记过去吗？赤卫队员们记得一九二六年，来了铁路上的、矿山上的、兵工厂的各色工人，还有知识分子，游学先生，他们走一城又一镇，过一乡又一村，到各地宣讲道理。他们讲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民众组织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国共合作。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北伐军北上进军，国民党许诺农民只要帮助北伐军统一全中国就实行二五减租。共产党宣传鼓动者还讲过二五减租以外一些道理，农民们开始讲要“抗租、抗税、抗债！”

那些宣讲唤起民众帮助北伐赢得胜利的工人、知识分子、共产党员把群众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农会。民众听到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外国，那里的工人农民已经起来革命，赶跑了一切地主资本家、军阀和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有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俄国十月革命的波涛巨浪拍打着中国华中一带的城市乡村。俄国工人和农民的事业成就在人们中间流传。不久打着国民党旗帜的北伐军过来了。但是，北伐军内成份复杂，地主资本家出身的国民党军官极端反对城乡工农群众组织起来的运动。而农会工会如雨后春笋在各地出现，千百万男女参加到农会工会里来。工人们不断离开城市深入农村，组织群众宣传群众，讲解革命道理。

地主老财把能够带的东西席卷一空逃到城里。农民捉到一

些地主交给农会批斗他们压迫剥削农民不劳动的罪行。有的农会开始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他们扬眉吐气作自由人了。但是，国民党军阀，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分子却象疯狗一般狂言咒骂：“共产党出卖民族国家利益！”共产党答复：“谁代表中华民族？千百万工农劳苦大众！”然而，工农在有钱有势的达官贵人地主资本家的眼里根本不是人民，只是为富人生产财富的牲口。他们一口咬定共产党和工农群众是“布尔什维克的雇佣代理人”。

农民和工人却不听他们这一套，继续采取革命的 行动，组织战斗。直到一九二七年春天，官僚地主资本家和军阀一齐动手向他们杀来，在上海“四一二”反革命白色恐怖中动手了，紧接着五月里在湖南也动手血腥镇压革命。成百上千的农民象割稻草一样被砍头杀害。中国开始了白色恐怖时期。打破了过去封建奴隶枷锁的男女，倒在血泊中。华中华南一带山野溪谷，尸体纵横，到处可见。但是，觉醒了的人民是吓不死打不倒的，哪里有山头，哪里有基地，哪里的工人和农民就拿起原始的梭标、大刀、斧头和抢到手的步枪、手枪来保卫自己，在平地 and 山头坚持斗争。土豪地主跟着保镖，国民党军队回乡，农村顿时一片恐怖。那些敢于造反不幸被捕的工人、农民面对刽子手的屠刀，在机关枪狂射下，慷慨就义，引吭高呼：“农民协会万岁！工农革命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接连几个月，地主老财带着国民党士兵驱赶农民下地播种收割，他们对农民说：“二五减租纲领是共产党要的一个阴谋，共产党挂羊头卖狗肉！”但是，谁好谁坏，农民心中是雪亮的。

湘东湘南同江西各地，南到岭南一带崇山峻岭，发出了武装对抗、穷人翻身的呐喊声。去年秋天，工人同革命战士发动了震撼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几天后南下横扫江西并到达广东。这支艰苦转战，同参加广州暴动受到军阀部队和停泊在珠江口的外国军舰联合镇压的广州起义工人们，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北进入江西，开展长期土地革命战争。朱德统帅的中国工农红军一旅人，进入湘南，组织湘东南一带山地农民游击队，发动年关暴动，艰苦奋斗，向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

耒阳地区城乡各处都暴动起来了。每个村庄都有人受伤。新坟垒垒，男女群葬。到处山谷发出“抗租、抗税、抗债”的回声。耒阳暴动负责人是一个青年军官伍仲豪。他们赶跑了地主商人的武装团防局民团，打败了攻城反扑的湘军两个团。败兵逃跑中，如过街老鼠，村村喊打，受到赤卫队梭标的冲打袭击。恨的要死、怕的要命的地主们跟着败军跑了。这些就是耒阳赤卫队队员们望着红旗的回忆，也是耒阳工农群众三千暴动工人一路苦战打到耒阳等待朱德率领的红军到来的往事回忆。人们通过这些遍及全中国的苦难斗争岁月的回忆预见到未来自由的祖国。

而今耒阳城里春节来了，大街小巷代替长袍马褂阔老们的是矿山工人，城乡工人和农民，他们挤在厂房炉边，冶炼打磨大刀梭标，修理破枪武器。裁缝师傅在破旧拥挤的店屋里赶作干粮带。孩子们围在旁边看热闹。他们眉飞色舞，七嘴八舌，道长说短。有的说：“要把我们红军大哥同志们的干粮带装的满满的！”

妇女和姑娘们坐在院子里忙着做针线活计。窗格子上糊着

平整雪白的竹连纸，透过窗纸有时现出随风晃动光秃的桃树枝影。不时一个姑娘抬起头来放下活计喊道：“瞧吧！这双鞋子是两层夹底，红军哥哥好穿到茶陵。”

挑着米箩的四乡农民潮水般地涌进耒阳县城。“永福乡农民协会送给我们红军兄弟的”。他们神气骄傲张口微笑道：“不多一点，真是小意思！”可是每个人都晓得这粮食可真多。时正开春，他们的口粮要支持到秋收以后。连没收地主的粮食一起，存粮食极少，真不宽裕。

红军究竟是什么样的军队？它在哪里？红军不仅一支，到处都有，说来有很多支队伍。在华中洪湖地区有贺龙的红军正在迅速开辟苏区。毛泽东统帅的红军从武汉三镇南下进入湘东湘赣交界的山区组织农民游击队，创建工农革命委员会，开辟苏区。但是耒阳人民盼望的红军则是朱德统帅的打湘赣粤边北上进入湘南的红军。围追堵截它的许克祥、白崇禧等国民党军阀部队都被它打败了。这支红军正在向耒阳前进，同湘南各地农民游击队一起解除地主民团的武装、国民党军队的武装，消灭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发给农民协会枪支弹药。红军快来的消息四乡很快传开。农民秘密开会而地主则动手杀人。

红军快来的消息传到梁家镇的时候，梁姓地主在镇上和附近各村杀了许多老百姓。梁家镇以称霸一方的梁姓大地主所在地得名。座落镇上的梁家大户围墙高筑，堡垒森严。附近村落也都以梁家命名，梁家湾的人户都是梁家大院的佃户和长工。当乡长的梁家大地主闻讯后立即派人去请救兵。梁家人身穿长袍，腰插手枪，婆娘们留在家里，门户紧锁。

梁家地主的大儿子这一天在镇上，腰里别着二把盒子枪。

一群农民聚在街头耳语闲话，见他一来闭口无声，噤若寒蝉。他一过去人们又你说我道议论开来。他回头盯着人群中间有一个叫梁汉的粗鲁汉子，是梁家的一个佃户。地主老爷认为农民只能规规矩矩，而这个梁汉素来就有点别扭与众不同。象他这样的就杀了六个，然而对他丝毫不起杀一儆百的作用。茶馆里面一群人在听梁汉讲话，全神贯注。人群里面梁家大院的佃户长工有不少。

地主老财很难光顾小茶馆，梁家大儿子一反常态走进那家阴暗的茶馆里，在一张面对梁汉的茶桌坐了下来，屋内顿时空气紧张。柜台上的宝蓝箱里摆着廉价香炉、麻花、酥糖一类杂货。站在柜台后面阴暗角落炸油果子的茶馆老板对他的妻子点头示意，快上去招待来客。老板娘子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提起大洋铁壶赶忙上前去沏茶，她巧舌如簧，打破僵局：“世道艰难，穷人的日子可不好过啦，富人拿穷人的东西太多真不应该呀”！

梁家大儿子的声音象破锣一样，接口说道：“世道艰难，在于附近山里土匪出没多如牛毛，在于懒汉二流子欠债不还！”

“附近山里真有土匪吗？”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长工不禁问道。眼光望着窗外远处的山头。

“土匪有的是，大家都清楚他们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奸淫小姐太太！”

“哎哟！”老板娘子天真地叫了一声。

接下来又是沉默。这回地主大儿子打破了尴尬局面：“有一帮土匪快来这里，我们要把他们杀得一个不留！帮我们剿匪

的国军星夜赶来了。谁要帮土匪那就难过了。有体面的绅士先生大人老爷们都帮我们保家清乡，提防我们的庐舍被匪洗劫一空。”

他的眼睛一面盯着梁汉，虎视眈眈，一面象长官一样目光横扫四周。老乡们白眼望着他。角落暗处的茶桌上有一个人说话了：

“哼，我们穷人除了丢掉一身债，还会丢掉什么东西呀！”

身穿长袍马褂的梁家大儿子朝里角里望过去，看不清讲话人是谁。信“邪”的梁汉当着梁家大儿子冷冷地说了一句：

“老虎吃多了人总有一天会掉到坑里的！”

梁家大儿子本能地把手落到二把盒子枪柄上，但他的眼珠子滴溜一转，顺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了两个铜板，把钱放在没有喝过的茶碗旁边，站起身掉回头谁也不看一眼，扬长而去了。茶馆里面有人朝他的背影报以憎恶的嘘声。当天夜里，长工梁汉的茅屋里来了抓他的团丁。他拼命抵抗，但被抓进了梁家大院。从此以后再也未见梁汉出来。梁汉是被抓进梁家大院不见人出的第七个农民领袖。

第三天晚上，梁家大院来了一家地主的几顶轿子。大院里面顿时乱成一团，哭作一堆，梁家大院的人听到了朱德红军打下那个集镇消灭了一连国民党驻军，枪毙了两个地主和一个放高利贷的大商人的消息。那家逃亡地主讲到“猛如虎不怕死”的赤匪时，面无人色，脸青发白，直发抖。天亮以前，梁家地主跟着逃亡地主的马队一起，慌忙地向城里逃命。他们由团防局的团丁们护送，前面赶着背负贵重物品的男女佣人。镇上

一连驻军认为，跟一个打硬仗要人命的军队打仗凶多吉少，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也自告奋勇护送地主逃之夭夭。

第二天红军在老乡们带路下沿着山路开过来了，梁家镇附近一带的老百姓欢天喜地走出迎接。红军战士和农民们在梁家大院里，发现了梁汉的遗体，眼睛被挖掉，耳朵舌头被割掉，尸体剁成几块吊在卫兵室夹道的墙壁上。鞭子上的淤血已经干黑。

人们把遗体整理好，抬起它走过高墙的夹道长廊，穿过八仙桌椅摆设整齐、礼义廉耻匾额高挂的客厅、帷幕低垂供奉观音菩萨的经堂。然后走过假山花园，桃树果园，又过一处高墙夹道长廊，通过枪眼密布森严可畏的大门，人们把梁汉的遗体安放在一块门板上，覆盖着一面红旗。农民和红军战士在旁守灵。农民协会和工人联合会接着成立，召开了群众大会。梁汉的遗体在千百群众送葬中完葬。以梁姓大地主命名的梁家镇改名为梁汉镇。

红军的铁流向前汹涌推进，它一面作战一面组织武装群众。耒阳城头上的赤卫队员们终于一天看到飞跑过来送信的农民们。他们走过村庄一路报讯，走捷路，一气跑进了耒阳城。沿途村民们怀着大旱望云的心情，群集在道路的两旁，等候人民军队的过路。

耒阳城里大街小巷张灯结彩，红旗如海洋、刀枪梭标林立。赤卫队员们早已望眼欲穿！夕阳西下时东面山头上出现了载歌载舞、锣鼓喧天的人群。刺刀梭标长矛在余晖下闪动，长矛红缨和五颜六色的小旗交织生辉。一面大旗映着落日的彩霞火艳通红。红军从耒阳东门进城。他们是久经风雨，身经百

战，遍体负伤，艰苦备尝的铁打的战士。服装破烂，队伍整齐，精神抖擞，里面有很多伤病员。少数重病号躺在担架上。许多战士有的打着赤脚，有的有包脚布，草鞋磨破，脚板腿杆漆黑。

这支红军的人数约有三千多，穿军装的战士将近两千，那些身穿军装的是一年前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南下打到广东的革命战士。多数人身背步枪。其余未穿军服的有的是参加湘南暴动的游击队员，有的是参加广州暴动的工人。里面有广州兵工厂的熟练工人。这些人少数有步枪，个别的有手枪，其余的人背着梭标、长矛、大刀。农民游击队的武器有梭标、斧头、铁杆、鱼叉等。

耒阳县广场参加大会的群众人山人海，房顶、树上和城头附近挤着黑压压的人群，青少年、儿童和妇女站在城墙下高地上。耒阳妇联主任吴玉兰在她们的前面来回走动上下挥手。她是一个身材高大、头发剪短的大脚妇女。红军队伍集合进入广场。耒阳上空响起了国际歌，歌词第一句“起来”象战斗的尖锐呐喊。红军战士们参加合唱，有的矿工也跟着唱，许多农民是头一回听唱这支歌，他们情绪激动，边听边看着别人开合的嘴唇。歌声结束，组织领导耒阳暴动的伍仲豪致词欢迎红军。接着工会和农会的代表讲话。吴姑娘的讲话坚定沉着，丝毫没有害羞的样子，妇女和姑娘们骄傲地听着。矿工领袖宋铁匠洪钟般讲话声震动整个会场。

红军首长朱德接着讲话。他是一个魁伟结实、严肃稳重的人，面容消瘦，留着黑胡子。同战士们一样穿着一身洗得发白、打着补钉的军装，经历了千百次雨雪风霜的折磨，看上去

四十岁出头一点。红军战士们知道朱德的革命简历：四川人，当过多年军官，到德国上过学，在德国加入的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在北伐军里担任军官，传说蒋介石曾给他那一军的军长下令要枪毙朱德，军长摆了个谋害朱德的酒宴。朱在筵席上朗诵了一首上山采蘑菇的古诗。说他是老同盟会会员。延宕军长执行蒋的命令，朱就脱身走了。一九二七年他任南昌公安局长。他参与组织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直到现在，他统率这支军队艰苦奋斗，赤胆忠心干革命。林彪就是他手下的一个低级军官，青年共产党员，现在跟着他在队伍里。

朱德自从他做一个共产党员起，就走过一段极其艰险的战斗生活路程。当他俯首向着一个目标前进的时候，一直向前，决不动摇，从不回头，拼命实干。在党内参加一个党小组，他是一个普通党员。在军内，作为工农红军总司令，在工农武装起来建立革命政权的残酷斗争的岁月中，他的英名传遍了世界。但是中外反动派报刊上却称他是“土匪头子”。

一九二八年二月，这个被诬蔑为“土匪头子”的人，这个为千百万工农所敬爱的人，站在耒阳台上对耒阳大会群众讲话了，战士们倚靠着枪，全神贯注地听着。游击队赤卫队的工农战士们深深地呼吸、平心静气不住点头。他们暴动闹革命，不怕牺牲，冲破险阻，一路行军作战要投奔的就是这个将会统帅他们走向胜利走向光明未来的总司令。

朱德望着台下一张张焦急等待如大海波涛汹涌动人的面孔。他饱经风霜，满怀自信，但他可不是一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演说家。他不用华丽的辞藻，而是以一个深思熟虑、脚踏实地的人出现在人们面前讲话。他开始回顾了国民革命运动，一年

前的北伐大革命和国民党蒋介石的叛变。国民党同封建地主资本家、大小军阀、帝国主义各国联合起来对中国革命的工农进行三位一体、互相勾结的反革命战争。他讲到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纲领和政策。

他讲了八一南昌起义的经过。南昌起义以后，队伍在南昌只住了三天，八月五日三万多人在南昌誓师南下，打回广东去。由于队伍一路转战，伏暑行军，政治上军事上未经整编教育，因而在作战中伤亡很大。三河坝失败，赣粤边界上行军，有些人思想上动摇，组织上涣散，我只好说“要革命的跟我走，不干革命就回家。好在大家都坚决干革命，大部分同志都跟我来了”。接着他坚定有力地说：“我们在坪石、乐昌打了一个好仗，许克祥的军队根本不消一打。他两个团，歼灭一个击溃一个。敌人溃退时，坪石桥上一团糟，挤下河去淹死的不知多少。大家看，现在红军人不少，都是沿途打土豪分田地、暴动起来干革命发展壮大起来的。”

到会的几百万群众听到他激动地讲到广州暴动、成立广州公社的历史创举。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市工人农民和贫民起义，成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五十几个小时。昙花一现为时虽仅三天，厥功甚伟，彪炳史册不可磨灭。朱德讲到广州暴动的战斗口号：土地归农民和士兵，工人管理工厂，劳动八小时。成立工农兵政府，消灭大地主及其一切封建剥削奴隶制残余。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废除地租、债务及一切苛捐杂税，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奴役中国。打倒帝国主义马前卒代理人国民党。

他讲到广州起义被国民党军阀和帝国主义炮舰的联合势力

镇压下去了。现在到耒阳的红军里就有许多参加过广州暴动的战士在内。

朱德讲到全国各地农村的农民起义，大小城市对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白色恐怖，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阵营的力量和中国人民工农群众的力量。他把中国的工农和工农自己的队伍，中国红军当前的形势，同帝国主义各国武装干涉苏联勾结白卫军扼杀苏维埃政权的内战时期作了对比。苏联的工人和农民已经作到了的，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也一定能够作到。

他的讲话不断被场上雷鸣般的掌声所打断。他又讲到红军的许多次胜利和失败的战斗。他说，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除了红军别无保障。每一个红军战士为人民干革命、赴汤蹈火、冲锋陷阵，千万可不能忘记这一点。水有源，树有根，红军来自群众，它永远是一支人民的军队。现在必须联合其他兄弟红军，联合各地赤卫队，一齐打倒军阀国民党。一直打到土地革命完成，一直打到卖国贼国民党及其后台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土地上消灭干净为止。这就是摆在红军面前的任务。这是一个极艰巨的任务。这意味着千万人将要付出生命。但是除此而外，工农别无出路。向国民党屈服就是屈服于封建地主，对新老军阀屈服，就是把中国变为帝国主义侵略的殖民地。干革命就有牺牲，需要赴汤蹈火，英勇作战，为的是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由工农当家作主，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会得到全世界工人的支持。

朱德的讲演结束的时候，听得入神的群众鼓掌，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欢呼声。耒阳城头上守望的赤卫队、城内外巡逻的游击队都听到了空前的雷鸣掌声。

随后几天，红军在耒阳进行休整。矿工游击队编为一个团，起义领袖宋铁匠担任该团团长。另一个暴动组织领导者担任某团团长。耒阳赤卫队和游击队编为一个营，伍仲豪担任营长。很多队员转入地方坚持农村游击战争。红军虽有六千人众，枪支不过两千。步枪多，手枪少，二十挺机关枪，六尊火炮，其余的是从自己家里带来的还有战场上缴来的梭标、大刀等利器。

所有战士都受战斗员训练，随时补充战场上的伤亡。炊食员在每个连里挑运粮食、医药、子弹，伤员的担架员和政治部的男女干部都要学会打枪、鉴别缴到的各种武器的性能。每一粒子弹和每一条枪代价是一条命，每挺机关枪价值至少一百条人命。

在半游击或半正规化的红军建军初创时期，还保留着北伐军队里的很多老习惯。红军的政治工作，宣传鼓动城乡群众，只是政治部的重要工作之一。政治部机构庞大，归共产党领导，权力同司令部相等。朱德是政治部成员之一。其他成员包括从共产党共青团抽调来的非武装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就是这个政治部，在从地主军阀手里解放的城乡召开群众大会，书写墙头标语口号，印发宣传材料。在没有群众组织的城乡，帮助群众成立组织；在有群众组织的城乡，同当地组织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就是这个政治部，同红军的党团组织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它使红军成为军事上政治上的组织力量，坚持革命原则的武装工具。稍后，红军的政治工作有所改变，宣传鼓动群众的工作由各连抽出的民运工作小组来执行。成为战士们

红军政治部下面设有委员会，其中没收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没收地主资本家的财产。军内任何个人不能各取所需，唯有这个委员会有权决定处理剥夺本属穷人血汗的富豪财物，用以进行革命工作。这个委员会里面有红军医务小组的代表。一九二八年初，红军成立部队医务小组时不过六、七个医生。学过西医的外科医生只有一人。这个唯一的外科医生，被刚参军的农民战士奉为神仙医师，因为他能够用麻药在人们的胳膊腿上扎针，取出子弹丝毫不感觉不到痛苦。每当红军打入一个市镇，这个外科医生就带领没收委员会医务小组人员到每个医院药铺去搜查药品。四处搜寻针药麻醉剂，但经常不能够找到，于是伤员们只好咬紧牙关，闭住双眼，握紧拳头，信赖他的技术和怜悯了。

创建初期的红军就是处于这样半游击状态中，一个革命政权在阵痛分娩里。耒阳到处震响着红军战士的操练步伐声，鐮头刀斧在铁钻上的敲打声。红军的伤员们住在寺庙医院里，伤病员装作病愈的样子，生怕红军开走时把他们留在后面。

耒阳一大清早，黎明的太阳还没有从东山升起前，红军司令部吹响了起床号声。耒阳城头上荷枪的赤卫队员们听到起床号来回不停地巡逻走动。眼睛盯着城北、城东、城南四野起伏的山头和蔚蓝的天空，注意有无敌人的动静，有无飞速跑来报告情况的侦察员来到，有无打枪的信号。他们情绪昂扬，精神振奋。轮班值勤，交接班时，互相敬礼。讲起远近农村的战争，不断胜利的和失败的新消息。他们起劲地紧张地交换情况、守卫县城。红旗，他们的希望，在他们的头顶上空迎风飘动。

第二章 李贵的死

战斗结束，红旗低垂，山坡上血迹斑斑，小司号员俞昆呆呆地站在山坡上，向下望着小鬼李贵的尸体。头埋在雪里，那块地方一大摊血凝成紫黑色，裹着包脚布的一双赤脚上的草鞋已经磨破，一双手和笛子的一头被掀起的泥土盖住。

俞昆不住地抽泣。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往远处望去。下面，红军同北面来的白军一个团遭遇的山路上还摆着许多僵直不动的尸体。横陈在敌人尸体中间，手里紧紧握着他们的梭标、大刀和刺刀。有的卜倒在缴到手的枪支上。朱德和司令部一批人正走到死者中间，低头弯腰讲着什么。

镐锄挖坑刨地的铮铮响声传到俞昆的耳朵里。他们就会上来安埋李贵，把他放在墓坑里死去同志们身边。这是，在湖南的一座荒凉的高山大路边，一个身体瘦弱的小红军李贵将永远安息在这里。俞昆喊他作

兄弟，李贵喊他作哥哥。兄弟吗？不，并不同胞生，自幼相交玩在一起。俞昆年纪大两岁，经常领着小李贵，维护他，安慰他。做饭吃饭总在一起，仅有一回他们作戏扮演在矿井里劳动的大人们。一个大孩子演工头，挥舞鞭子劈劈叭叭作响、大喊大叫、吓得小李贵呆在一边伤心大哭，俞昆把那个大孩子撵跑以后再也不演戏了。

小李贵七岁时亲身尝到了工头鞭子的滋味。他那瘦小矮短的身体，软弱无力的双手，发育不全的心灵，在矿山资本家的眼里只不过是一个小奴隶，不分青红皂白要打就打的。

俞昆望着李贵的僵硬面孔，童年的回忆组成一付付惨淡的图画。随着山坡下面镐头起落的声响震动，一张张图片浮现，在脑海里展开。首先他记起了小李贵的手，水口山一天劳动十二小时完了后，他拉着小李贵回到工棚。然后是群众大会，斗争工头、资本家。工人们在白色恐怖下被砍头。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水口山暴动了，俞昆参加了，李贵也跟着干。接着矿工游击队一路苦战，杀开一条血路；直奔耒阳，两个小矿工都当了红军司号员。李贵经常背起军号拿起耒阳一个农民给他的一根笛子吹弄。

俞昆的脑海里又闪现出红军从耒阳打到湘东茶陵县一路上行军打仗的日日夜夜。那一晚深更半夜红军离开了耒阳，月亮高悬，东山一带丛林峡谷，黑森森的一片。紫竹林中，万籁俱寂，流水呜咽，丛竹梢枝摇摇拖到地上。悬岩峭壁、山峦起伏，人们在曲径小路上流动着。

俞昆和李贵在行军中跟着朱德和两个农民侦察连在一起。同朱德在耒阳结了婚的、耒阳妇联主任吴姑娘等政治部的人也

和他们在一起。吴姑娘是红军政治部的一个干部。

俞昆又记起了机关枪的哒哒哒哒的声音。机关枪手们拆开机关枪身，各人扛着枪件和子弹箱低头走着，不说话也不唱歌，因为不准大家说话。几匹灰溜溜的马爬山，象山羊般地拉着部队几门大砲在司令部的人前面跑。每当李贵精疲力尽走不动的时候，朱德就拍拍他把他抱上马。李贵跨坐在大砲身上吹弄他的笛子，吹出悠悠动人的民间乐调。

俞昆还记得耒阳的老百姓。他们勤劳勇敢，豪爽慷慨，对红军充满热爱。缝纫组的妇女和姑娘们，一直洗洗补补忙个不停，直到把最后一套军装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红军服装各式青蓝色补丁，象图案般的整齐美观。还有许多男男女女赶作布鞋，让红军战士穿上，不要打赤脚。这样红军战士们离开耒阳时，都穿着草鞋、捆了双布鞋，一路安逸地行军。

每个战士身后背一顶宽边大斗笠。那是农民老乡们编制送给他们防日晒雨淋的。裁缝师付给每个战士扎了一条粗布干粮袋，农民协会给干粮袋装满五、六斤炒米、两斤食盐和一把干菜。耒阳老百姓亲眼见到每个战士有一条洗脸手巾，当铺盖的背包，一条毛毯式薄被子。有的战士甚至还有茶缸，少数老战士还有稀罕的手电筒。

红军一路作战，山地行军，打到茶陵。国民党士兵迟钝吓人和他们的军官冷酷无情的面孔，历历出现在眼前。猛烈响起了红军神枪手们不断地射击声。他们埋伏在岩石、树林、院墙、坟堆背后，小心准确弹无虚发地射击敌人。地方农民协会的农民们高喊：杀！杀！杀！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国民党军猛扑过去。红军战士大声响亮地对敌喊话：“地主走狗们，军阀帝国

主义走狗们，卑鄙无耻！……我们是受苦的工农，……土地归农民和士兵，抗租！抗税！抗债！……工人劳动实行一天八小时！

敌军士兵们听到这些比子弹厉害百倍的喊话，他们互相问道，这打的是一场什么仗？他们奉令差遣清乡剿“匪”。可是无论城里乡里，他们都跟工人农民在打仗。游击队伍都是工人和农民，他们也是受苦人。这回打仗听到了：“土地归农民和士兵”的喊话声。他们以为奉命剿“匪”清乡战争同历次战争一样。我这边朝天放枪，他那边往远地打炮，心照不宣，喊喊打打互相让路。但是在这里却碰到一支不怕死打硬战的军队，一粒子弹要一个人的命！这样打仗人们从来没听说过。他们的动作迟缓，心绪烦乱，绝对服从长官意志，提心吊胆地盯着每块石头，每片村林，每幢茅舍，每个坟地。炮弹一响，黄金万两，他们为了博得上级长官和地主老爷的赏识，就朝天放枪。哇哇喊叫，有的连人带枪投奔红军，有的反身飞跑逃命，趁机开了小差。俞昆记起了抓到的那些俘虏，带枪过来的士兵，白军运输队过来的民工们的控诉。

“听我石玉堂讲一讲”。一个“运输队”民工说：“我是一个长沙佬……一个作田的老农，那天一个军官带着几个兵到集市上，他们用枪逼迫我们，一根索子把我们几个人捆在一起。他们强迫我们担子弹、挑粮米。……我的一个邻舍逃跑，他们开枪打死了他，尸体摆在大路边。……他想他家里的人，我想我家里的人。把我当犯人，跑了千多里路，……现在给你们挑些子弹来了，我还要帮你们挑，帮你们出力打军阀。”

长沙民夫们的诉苦声消逝。小李贵吹国际歌的清亮笛声又

在俞昆的耳畔响起。那是一个广州来的工人同志教他吹的。李贵吹的国际歌，音阶节拍总带着悠悠扬扬的古老民间调子的味道。

接着茶陵城头红旗招展的景象浮出。茶陵同耒阳一样，但城墙更高更坚固。它安置了红军的伤病员，填满了战士的干粮袋，发了新的草鞋。他们在茶陵打土豪劣绅，筹集白洋，采购农民粮食，扩大红军队伍。红军留下了两连人和几挺机枪加强茶陵农民赤卫队的战斗力量。

俞昆眼前又现出高山积雪，河谷冰封的湖南、江西交界地方山地行军作战的图画。红军一路迂回曲折，走过村庄，翻过大山，天天都要打仗，有时连夜行军，战士们说“今天少说也跑了两百里路”。草鞋烂了，赤脚行军，脚上起了泡，全身浮肿，虱子咬人，头发长的象篷头鬼，干粮袋子扁了、空了。国民党军阀的部队抢光了每个村庄，红军什么也买不到。红军战士夜晚在山上露宿，有的病倒，有的冻僵。小李贵瘦成一把骨头，眼窝深陷下去，他的草鞋烂了，朱德的妻子吴姑娘，把身上背的军毯里带的一件衬衣的边撕成条条、帮他用干草把冻坏了的脚包好。红军打仗露营住宿，小李贵就坐在一块石头上吹起他的笛子。悠扬悲伤的民间小调夹杂着国际歌冲破了战地的沉寂。

就是在这个高山大路边打了一场遭遇战。这是李贵参加的最后一次战斗。国民党一个团从北面开来，山林丛树、悬崖遮住了前面去路。红军和这个团遭遇，双方均感意外。走在前面的红军侦察小组打了三发信号枪。枪声一响，立即冲到敌人的行列里，一直把最后的一粒子弹打完。这时山下墓坑里有两具紧抱

敌人尸体的两个侦察员的尸体安放着。

后面的红军距离侦察员不远。听到信号枪声的红军大队象一道电光猛地一震通过队伍，战士们抬头扬眉耸肩膀，各连向前就地以半卧倒姿式在山坡上散开，寻找地形在石头、峭壁、大树丛林的背后埋伏下来，稳准狠地瞄准敌人，迷惑敌人，搅乱敌人。手拿梭标大刀的战斗，勇猛地扑到敌人队伍里和敌人展开激烈肉搏战。手无寸铁的战士们就地捡起石头爬近敌阵向敌人打过去。

混乱崩溃的白军掉头向北山夺路逃命飞奔。红军猛追瞄准敌人狠射。许多战士跌倒了，仍然抓住夺到手里的枪支不放，徒手的同志们接过他们的枪，当棍棒打敌人。

在这场恶战中，小司号员李贵被敌人一颗流弹不幸打中。

手拿镐头的战士走上来拍拍俞昆的肩膀，然后弯身下去把李贵抱起。顿时俞昆放声大哭，哽咽、抽泣跟着抱尸体的同志们走下山坡。一切回忆，戛然中止。

俞昆发痴的望着同志们把小李贵的尸体放在那些死难烈士的旁边。消瘦紫黑、血跡斑斑的工农战士的遗体摆成一长列安放在墓坑里。向遗体告别的战士们挤满坑道两边，肃立默哀，一个穿军装的红军战士站在坑道的一头紧握红军的军旗，拉开下垂的旗角，上面现出镰刀斧头和红星。

“准备安葬！”一个声音喊道。人们弯腰到地。掀起死者破烂的上衣，盖住死者的面孔。然后铲起黄土，掩埋烈士们。安葬完毕，一声进军号吹响，枪支武器上肩，镐头、工具、机枪等金属的撞击声和着脚板踏着地面的步伐声，人们沉默不语，整队向前进。负伤的同志把武器交给身边的战友，扶着同

志的肩一拐一拐地向前走着。

俞昆最后望了小李贵安息的墓地一眼，泪珠儿直淌，转头向前。东面山头红旗在清风中飘动前进。他耸耸肩，环顾四周，深山幽谷，景物清静。于是，背起军号跑进行列，一步一步的继续向前走。

第三章 侦察员

一个脚穿草鞋，头戴斗笠的农民来到湘东一个小镇。衣服整洁，裤子上有新的补钉。他在一个卖烤红薯的炉灶边停下，买了一个红薯就在街边吃起来。

他同卖红薯的小商贩闲话一阵后穿过街道，走进街尾一家茶馆，拣一张空桌坐下，打量矮小阴暗的茶馆。邻桌上十来个人，有的喝茶，有的谈天，有的嗑瓜子。瓜子皮满地乱抛。人们用怀疑的眼色望着这个陌生来客。他是地主军阀派来的探子吗？不象，肯定不是。那些坐探一类行事装成和尚道士、算命先生，在茶馆里泡磨菇搞消息。现在地主老财不需要这类坐探了，因为国民党军队又占了这个村镇，地主老财跟国民党兵打回乡里了。

一张茶桌上有三个农民，其中一个十分客气地对生客打招呼：“老兄弟今天请过饭没有？”

陌生人回答吃过了。他接受邀请移座到三人的桌

子上交谈开来。“贱姓王，家住茶陵县，到西边山里走亲戚去。家有五亩好地，光景还算过得去。家里人口多，三男一女，谷价是……。”

他很客气地说他们家的事。隔座一个农民插话问道，他有个亲戚名叫周定一，周家就隔他那村子不远，可认识不？

陌生人犹疑一阵说，讲周定一认识的，不过不太熟。“周村隔我们村里还远”他解释道。

在场的人们留神听着、瞧着他。一个青年激动地说：“喂老哥，你真的是从茶陵县来的，确是？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国民党军队又占了茶陵县可真？这一带地主老财们说国民党军队打破了茶陵县把共产党都杀光了。”

陌生人盯着青年农民，冷冷地说道：“白军并没有打进茶陵县城。赤卫队缴了团防局团丁军阀队伍的枪。同强大的工人农民一起把守县城。”

外路客人讲白军赤卫队使得那些老乡们感到惊奇。他们互相眨眼琢磨着。团防局团丁、军阀队伍可是白军呀，赤卫队正是红军啰！

大家对他提出一连串的问题。茶馆里别的人们围了过来。茶馆女老板也走过来听。她青裤子蓝棉袄，矮胖个子，满面红润，一头黑发，脑后一个巴巴头，髻子上撒着一根银簪子，簪头小红花平整地贴在耳边发际。

陌生人小心谨慎地回答提出来的问题。对在场的人边回话边提问。青年农民对他这样的拘谨直截了当地说道：这里没有地主的坐探狗腿子！村子里每个人我们都清楚！”

“白军地主回来前狗腿子可先来过这里！”小妇人点头暗

示道。

“不错”，青年农民答道，“我们脑子笨让他们过去了。一个家伙有枪，快到茶陵时被一个人夺了他的枪！”

“他想探听啥？”陌生人问。

小妇人答：“他想打听本村别村的农民协会情况。还问过赤匪的事。”陌生人抬头问：“什么赤匪？”“他对红军怎么个问法？”人们你看我，我看你。大家挤近了些，一个瘦得骷髅似的老渔翁说道：“他打问过什么？我张柏林告诉你！他问红军住在那里？我告诉他红军躲在西面什么地方。我可知道红军驻在南面。我跟他说红军有好几万，他们都不让地主军阀有好活的。”我接着问他：“你说说，穷人为什么要同军阀打仗？”他装腔作势地讲什么对老板要无限忠心、党国至上、忠勇为爱国之本。

一个农民说：“我们家隔壁的人跟我说，红军在耒阳活捉军阀兵五千。收了他们所有的枪支弹药。红军有大砲能打几十里。还说朱德就是伏魔大帝关云长。那是真话我听到很多人这样讲！前几天一个南边来的人和他跟我讲的话一样。”

老渔翁插话道：“我听说过朱德有一回穿了一件长衫子^①上战场，袖子拖到地上。两军对垒，他摇着一把鹅毛扇，这个样子对准敌人。他不怕死，双目如电发出一道金光，吓得敌人回头就跑，逃回长沙去了。”

一个人插话道：“听说朱德本事大得很，他能呼风唤雨！他跨一步十个人也跟不上，他力能扛鼎，一只手举得起一匹

① 长衫子指中国知识分子先生穿的长袍。

马。我还听说他能眼观六路头不回就能看到身后的东西。”年青农民争论道：“我就不信这个，我们不是生在三国时代，你老是在讲三国故事。朱德不能同时前看又后看，不过他脖子上挂着一架望远镜，通过望远镜看东西他能看到百十里外的敌人……现在你讲他手能举马干吗？那又有什么意思。可他虽不能跨一步十人跟不上，但他勇敢有毅力，万夫莫敌。毛泽东也是这样的。我听说毛泽东写文章、作诗，能打败反动派，真不真说不上，不过他为我们老百姓打仗，他是湘潭人。有一回他在长沙当人力车夫组织了长沙人力车夫工会。毛泽东和朱德在外国念过书。他们能讲几种外国话。他们都是伟大人物和有学问的人，总而言之，他们都为穷人打仗。”

陌生人很感兴趣地听着年青农民讲话。他接着说：“你知道的很多，出过远门吧？”

“我最远到过长沙，不过我还到过衡阳一回，一半对一半远。衡阳人可多得，人们不象我们住在地上，而是这家住在那家的顶上。衡阳还有很多军阀队伍。为非作歹流氓混蛋……他妈的！”

“这镇上有多少兵？”

“一百。北面的镇子大约有五百驻军，他们杀了许多老百姓。”

茶馆女老板关心的不是驻军人数，心里想着别的事，她掉头向陌生人道：“跟我讲讲，你听说过吗？……朱德讨了个姓吴的女学生，她现在跟他一起在军队里，胸前挂一支枪，一双大脚象扫把一样大，打起仗来顶得过任何一个男子汉。”

人们不以为然地笑了起来。但是犟脾气的小堂客却双手插

腰等待回答。出乎人们意料的是，陌生人对她说道：“我也听说过吴姑娘。她跟朱德结了婚，同他在红军里一起打仗。她的一双脚是天足。所以她能行军仗打得好。”

小女人胜利地望着被说服了的人们，抬头又叨叨地说个不停。“祝福她长命百岁！多子多孙！我今天就去庙里给她烧一炷香，给红军烧一炷香。”

年青农民回头对他说：“你那一炷香对吴姑娘对红军顶个屁用，要的是枪……”

“那你为什么不搞枪？……这里的白军有多少枪？”陌生人挑话道。

人们挤在一起细声细语，年青农民把巴掌盖在陌生人的手臂上。大家开始压低声音讲起来。小女人走到门口机灵地瞭望街头街尾。“要是红军……红军能够……红军会……”里面茶桌边发出一阵阵低声细语。

女人回到里面房间。几分钟后他端出三个荷包鸡蛋，一碗米饭放在陌生人前面。客人从褡裢里掏出钱，她无论如何不收，又赶忙在茶碗里倒上滚开水。同样她硬不收钱。

陌生人在年青农民的茅屋里过夜。人们都没有睡觉，来了又走了。国民党驻军就在几条街以外的庙子里。他们被蒙在鼓里，毫无所知。镇上却有许多人讲起，开头说是茶陵县的农民，后来才知是红军的一个侦察员。天亮以前，他同青年农民翻过大山朝他来的方向赶早归队去了。

侦察员们就这样的在红军前面打前站。不带武器，有的单枪匹马，有的三、五个人一组，奔波在山径关卡林间。他们出身于农民，熟悉每个村庄、每条道路。忠实、勇敢、聪明，能

跑长路吃大苦，耐大劳，这是侦察员工作要求他们的本色。他们访贫问苦体验农村生活，从群众中搜集敌人军事情报，工农武装革命斗争消息。

有些侦察员有勇无谋胆子太大。有一回朱德对红军两个侦察连的战士们讲话道：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改进我们的侦察方法。你们有的看人行事，不主动动脑筋，这是危险的。我们牺牲了一些好同志，他们直接走进敌人营里开门见山提问题，引起敌军军官的怀疑。我们有的侦察员在市镇上被杀头枪毙，因为他同敌人士兵讲生意、用鸡蛋换子弹！”

“有的一亮相，站在那里一眼就被看穿。这一定要改变过来。你们走进敌人营房里，一定要装出一副低三下四的下流相。要想一想是怎么走路怎么化装才好。打拱作揖，点头哈腰，不要眼睛朝敌人官兵扫射瞪眼，守口如瓶装哑吧，傻头傻脑一副蠢相。向他们乞讨东西，转弯抹角提出问题……。”

发给红军侦察员们大洋，有的在红军出击前几天出发先行。他们在市镇上买上鸡蛋篮子或杂货用品。个别侦察员化装成剃头的，在士兵中间一面剃头挖耳朵，一面闲谈聊天。这是侦察员们很聪明的一门行道。

还有些侦察员提着鸡蛋篮子、挑起杂货担子，在敌军中间叫卖东西。他们蹲在地上耍钱，傻头傻脑，拉东扯西，问一些古怪离奇的问题。他们拿起敌军的枪支，张口结舌看来看去，一双粗手上下抚摩奇怪的机关枪。“这家伙一秒钟打万多发子弹。”惹得敌人官兵捧腹大笑。然后侦察员离开市镇，挑起箩筐、竹扁担有节奏地、吱哼吱哼着“海哟哎海呵”的苦力调子

到处游转。

一去市镇遇到自己的同志，就停止哼唱，快速翻过山坡跑回部队，把敌人的人数、武器、弹药、营房、驻军等等情况向上级报告。他们还报告敌军如何害怕红军，薪饷服装给养、伙食生活情况，士兵们对长官们的反应，挨打受气、普遍不满的情绪。

有些村子侦察员们在走过时特别谨慎小心，因为村子里的农民老乡对革命，对红军一无所知。革命的波涛还没有来到，他们没有尝到革命的甜头，要嘛他们什么都不说，要不把他们知道的一切对谁都讲。一个生人来了，很希罕又感兴趣。大军一过没有觉醒的村民就往山里逃。不管什么军队，谁家的军队，他们看军队就是大兵，象蝗虫一样吃光一切、烧杀抢劫把壮丁抓走的东西。一个军队保护穷人，帮穷人打仗，为工农谋幸福，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军队买粮买米吃饭付钱，不调戏妇女，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农村老百姓，总是挨饿，总是吃不饱，总是操劳不完，总是邋邋贫困不堪。如果红军对他们讲成立工农苏维埃，鼓动他们起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他们总是回答说，出身太下贱，算得老几，唯有有钱有势的人才能管事。当权者总是刻薄少恩残酷无情。那些农民并不希望交租，完粮，还高利债，苛捐杂税沉重地压在他们头上。可是，侦察员们一说红军要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成立工农政府，他们仅仅问道：“需要钱米的时候向谁支借钱粮啊？”

侦察员有时走过一些村子，那里有的村子，全村一姓，几百户人，同属本家。宗族长、首富，都是地主、富农、兼高利贷主，他们鱼肉乡里，称霸一方，剥削和压迫劳苦家族宗房和

亲属。走投无路，被一套忠孝节义封建教条所束缚，红军来了，地富的穷苦人户不得不支持富有的族长宗亲的统治。留下的本家穷户，对富豪亲属的情况，他们什么都不说。

侦察员里面还有带枪的侦察人员，他们在部队的前面距离不远先头走，遇到情况用手枪打信号。情况紧急就投入战斗。有一回六个侦察员，在红军大队一里多路前面先行，发现山路下面树林里和悬崖下埋伏了敌人一个团。突然遭遇，大吃一惊。一个侦察员向同志们喊道：

“信号！——跟敌人拼！”

一颗信号枪朝敌人方向打过去，六个侦察员发起冲锋，直扑埋伏的敌人，在十字路口同敌人一个团打开了。

红军听到枪响，知道情况紧急，部队赶到时，六个侦察员已壮烈牺牲。六支手枪里的子弹打完，还紧紧地握在烈士们的手中。这六支手枪用来同敌人拼过。

朱德对侦察员们说：“谁愿接替六个侦察员的任务？”

“我……我……我……我！”战士们喊道。充当侦察员都是志愿报名的。随即用抓阄的办法挑出六名侦察员。把烈士的手枪交给了他们。他们擦净了枪把上的血迹，装上子弹。向军首长和同志们礼毕，昂首挺胸，光着脚板，迅速向东面山头前进。

第四章 艰苦转战

天黑了，红军在一个山谷里宿营。早春季节，大地开始解冻，溪水泛滥，河水猛涨。山谷积雪已经消融，一早，红军要从当地农民和红军工兵架起的浮桥和绳索桥上过河到对岸去。

炊事员在掩蔽体里生火做饭，小心盖住火焰不让敌军发现。

侦察员带来情报，一个江西军阀的军队驻在东南一带市镇上。湖南军阀队伍在北面、西面和南面。这一天红军在山边同白军一个团打了一仗，还跟几股白军接过两次仗。一队战士在涨水河边露宿，低声谈论作战情况。小司号员俞昆躺在地上听同志们讲话。

“这里正是春天，气候暖和，军阀同臭虫一样爬出来了。”一个矿工战士声音嘶哑着说：“乌龟王八蛋到处有”！

“今天我们边走边打，跑了两百里路。要是我们

能够一直走上井冈山的话……。”

“四面八方都是乌龟王八蛋，我们怎么一直走！”矿工接着说：“这一带乡村是我们未来的根据地，我们只有把它打扫干净。哎哟！西面到耒阳，东面到井冈山，想想看……等我们同毛泽东会师、队伍整编以后，我们的力量就要比现在大两倍，以后就不会再吃败仗了！”

“吃败仗？我们从来没有被打败过！”一个战士抗议道。

“我们缴不到枪，就是吃了败仗！我们打仗不是要搞枪吗”。

“不能混为一谈，我们打仗为的是发动群众开展革命……”

“除非我们有枪，要不开展不了……”“除非我们的群众工作好些，要不我们都开展不了。现在我们那一个村镇都不能停留，准确的告诉老乡为什么打仗。我们的口号群众总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一个在香港当过排字工的红军战士说：“我们的政治部战斗性不强，我们需要看点报纸……”

小司号员俞昆翻过身说：“我就不会唸，我还做过矿工，农民怎么会唸！”

排字工坚持自己的看法：“每一个村子里总有一两个人会唸的。起码认得几个字。如果我们的口号表达群众的利益，他们会学着唸的……我也认为政治部应该改变一下，鼓动宣传工作不光是政治部的少数人做，我们大家都要学会做。”

一个农民战士的话声，打断他的话头。“我们晓得如何打仗，鼓动宣传却不懂，我没有思想。”

矿工笑道：“废话！你有了革命的思想，所以你现在才会

打仗！你为什么打仗，总可以对老乡们讲的。”

“我试过一回。我说不交租不纳粮不还帐，打倒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可是老乡们问：红军走了我们的遭遇会怎么样？地主军阀可是狠如豺狼。”

嘶哑声音的矿工又说话了：“他们的一切不是被豺狼们啃光了吗？难道不是，豺狼当道哪有他们的舒服日子过！”

“不错，我跟他们也讲到这个。年青的农民可不怕打仗。”

“同志们！”黑夜里走过来一个指导员说：“全军要这样讲下去，敌人很容易会发现我们！”

人们沉默，睡在地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睡。

俞昆起来暗中摸索着爬过头枕梭标，怀抱武器和躺在地上的同志们的身体挤在一起，又摸到司令部的人们身边睡下。头顶旁边几个黑影坐在那里说话。他听到朱德在同宋铁匠商谈什么。间或听得伍仲豪温和地插一两句话。首长们正在研究行军计划。

俞昆望着大地，夜色深沉，万籁俱寂，天黑不见五指，群山起伏，隐约可见，溪涧蜿蜒，淙淙流响，大地清醒着并未鼾睡似的。但寒冷如冰，地上几千人睁着眼睡不着。伤员们呻吟叹息，许多人肺病缠身，咳喘不止。也许那些警卫人员经过一天快速行军的激烈战斗后睡得很好。

在不远的地方，朱德的妻子吴姑娘裹着一条旧棉军毯躺在那里。他记得吴姑娘把衬衣撕成条条包紧小李贵的冻脚的情景。她一双大眼睛，眼窝一天天凹下去。她是耒阳县欢迎水口山游击队的代表，自那以后她在湖南、江西接界的湖南深山老林一带行军作战，同男战士一样瘦成皮包骨头。他经常看到她

唉声叹气、疲惫不堪。他曾经注意到她把手让朱德紧紧握住浑身增添无穷力量似的。记得有一回，当朱德的眼光落在她受过伤、十分消瘦的身材时，朱德的脸上掠过一道威严表情。他又记得有一个晚上，他偶然走到一个山坡上，见到他们两个正睡在地上，是那么安适宁静听不到任何声息。俞昆远远站在那里看他们多么恩爱感到惊喜。

在俞昆半睡眠状态中，脑子里错综交织着吴姑娘和他的母亲的面孔。他叹了一口气，翻过身。宋铁匠的声音、朱德的声音隐约在耳边响着，给他带来安全和自信感，于是他进入了睡乡。

清晨三点，外围岗哨的鸣警枪声惊醒了睡梦中的红军战士。敌人一个大部队正沿山谷集结兵力。来的是装备优良、配有轻重机关枪炮的湖南军阀何键第八师。正在挖战壕、筑围墙、架设机枪。夜色朦胧中依稀见到用力拉机关炮的民伏正在向前沿阵地掩蔽体迂回靠近。

红军战士们翻身起坐、摸着身边的武器，沉着等待，悄悄地传讯短促命令。水口山大队长老吴的声音在说：“工兵连……跟我来……镐头……铁铤……这里挖！”战士们动手挖战壕，筑起一道机枪阵地前沿掩蔽体。

红军各连队战士接过短促命令，拿起步枪、梭标、大刀向山坡一带散开。黑影飞速行动，在坟堆、崖壁、丛林树后面隐伏下来。有的战士爬近白军防线，清楚的听到开火的命令。暗地里看见赶挖胸墙掩体的敌人，搬运机枪子弹箱子的民伏。那些被抓来筑工事、搬运子弹箱的民伏都是山区老百姓，他们干得并不起劲。

参加过广州暴动的广州兵工厂的工人战士，一个连伏卧在地，爬行前进，向挖筑工事的民伕们那边靠近。他们摸到能听到在喊口令，看到晃动手枪指挥村民挖筑工事的敌军军官的地方。兵工厂战士们小心翼翼地找好隐蔽阵地，端起步枪，瞄准目标，他们等待信号枪声一响，便拨动扳机，“叭哒”射击，敌人军官翻身栽倒在地，手枪掉下。他们沉着镇定，望着一队敌人边跑边喊边开枪冲上来了。

兵工厂的工人战士们仔细瞄准上来的人影，每一颗子弹打倒一个敌人。枪声齐射，白军士兵们惨叫倒地。

敌人的机枪猛烈扫射，子弹呼啸，杀声、喊声、呻吟声一时充满山谷。

敌人蜂拥而上，坟地后面的矿工战士用机枪一阵扫射过去。山坡上的红军阻击手发出密集弹雨。敌人退下去了，纷纷在土丘、岩石、树木后面找地方隐蔽。一阵间歇过后，红军战士们在山头喊话：“消灭地主！消灭军阀！消灭地主军阀的走狗！消灭帝国主义！”

白军士兵隐蔽躺下，他们的重机关枪又一阵扫射过来。几队白军从山坡上向红军后翼发起冲锋。手拿梭标、大刀、赤卫队员们，奋起迎战高喊“杀！杀！”向敌人猛扑，激烈搏斗，夺枪支，抓俘虏，把负伤的战士背回自己的阵地。接着步枪、机枪的射击声和喊杀声停顿下来，战场上暂时沉寂。红军战士们又对敌人进行喊话：

“我们是工农子弟兵！穷人不打穷人！你们不要打了，你们不要帮地主老财打仗！土地归农民、士兵！工人八小时工作制！”被俘虏的白军士兵爬进前沿阵地向白军喊话道：“红军是跟我

们一样的受苦人！他们只消灭军阀长官！土地归农民和士兵，他们是干土地革命、为农民士兵打仗的。我们大家要问一问：“为什么我们要为地主老财打仗。”

时间这样拖延，战斗继续，不时有成群的白军士兵，在山坡工事背后对红军战士挥动双手喊道：“我们要过来了，不要打枪！”

他们过来了。红军阵地上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附近村庄的老乡们拿着梭标、锄头、斧头、大刀出现在敌人的后方，攻打辎重运输部队，连民伏带弹药、粮食一并截获过来。

将近中午，宋铁匠对工事里的矿工战士们说，敌人正准备发动总攻。打了一阵，敌人的机关枪象倾盆大雨般猛烈地扫射过来，接着敌人发疯似地大喊大叫向红军阵地冲杀过来，企图采取恐怖战术压倒红军战士。

矿工战士们同敌人展开肉搏拼刺刀，山坡上的农民赤卫队挥舞梭标、冲入敌阵，潜伏的红军阻击手把敌人的队列打得七零八落。

白军开始溃退，丢盔弃甲仓皇逃命。红军战士尾随追击，越过白军工事，收缴夺取到大量的机枪、步枪、武器、弹药。

朱德下令停止追击，战地上一片欢腾。战士们巩固新的阵地，收拾清理敌人的武器弹药。对惊惶逃命的敌人狠狠射击，继续杀伤和撼摇敌军士气。老乡们上来把负伤的战士背到安全地带。

白军士兵稀疏零落、漫无目的的打枪，许多士兵投奔到红军这边来。留下的等待红军赤卫队进攻时便一枪不发举手投

降。

夜幕来临，白军打了一阵枪，作为撤退前的烟幕弹，最后枪声终止。

红军各连队负责人清查自己连队的人数。俞昆来回走着注意听矿工连战士的情况。这个连牺牲惨重，这一仗就死了五十个。他想，还有许多重伤的同志，他们决心跟着部队走。大队长宋铁匠又负伤了，这是他从水口山暴动起义以来第四次负伤。他个高，深眼窝，皮包骨，横眉冷眼，望而生畏，但他照旧走在连队前面。吴副队长伤了手。

红军里面现在有很多从白军方面跑过来的士兵，还有许多被抓来的运输队民伕。朱德对他们说：“兄弟们，你们要回家就回家去吧，我们只能给你们每个人发一块钱和一点米路上食用，因为我们自己养活自己还不够……要是不愿意回家，欢迎你们同我们一起干革命打仗。”

许多士兵说他们愿意留下打仗。眼花缭乱的农民和被抓来的苦力民伕，瞠目结舌望着这支古怪的军队。红军战士们大都没有军装，跟老百姓一样，很多人一口湖南腔，说的是家乡土话。他们的长官不是大阔佬，而是同战士一样的吃苦，还称呼老乡们叫兄弟们！

“我要回家去，我想家。”一个年老的民伕说。另一个民伕提醒道：“到长沙的路远得很，我们还会被军阀抓住。”

有一个民伕说道：“我们走了千多里路，被抓伕当犯人。给我们发枪教我们打仗吧！我们死了算得什么？”

一个汉口来的铁路工人马上接话道：“我们打仗不是要死，而是为了活命，我们要建立一个工农当家作主的政府。来

吧！兄弟们、同志们，要活命的同我们一起作战！”

红军从当地老乡们架设的摇摇晃晃的浮桥上开始过河。没有受伤的战士手拉手攀着桥索摇摇摆摆地过去了，年轻的跟在后面。有些小工人身体太弱走在桥上支持不住掉在河里，被湍急汹涌的激流卷走。人们喊叫，河岸两边的老乡们顺河而下喊救落水者，黑夜里不见踪影，只听见江水滔滔，偶尔传来下游的喊话声。老乡们回头沿河大喊大叫，只有山谷的回声和大地的沉默，告诉他们的命运。

俞昆耳听小鬼们扑通扑通落水微弱的叫喊声，战战兢兢拼命抓住桥索，一手接一手地爬到河对岸安全地方。脚一落地就朝岸边的人堆中跑去，使劲喊叫。红军大队向前走了，他以无限凄凉，束手无策的心情赶上了大队，一步一步在暗中走着。

红军战士们既冷又饿，精疲力尽，在当地老乡们的带领下继续行军。从昨天晚上吃了一点糙米饭，手捧江水喝过一点，一直再没有吃过一点东西。

向东行进中，前面暗处突然出现闪烁微弱的亮光。一个村子里站满大群老乡。大路西旁到处是小油灯、蜡烛、灯笼，还有松脂火把，街边摆满了盛着热气腾腾的米饭蔬菜、坛坛罐罐、饭桶菜盆，开水锅的水蒸气向上直冒。这个村子附近的老乡们作好了菜饭接待红军。老乡们把白天战斗中负伤的红军战士抬到各家安置，由农家妇女担任护理。

红军战士们站在路边两旁吃饭，有的用巴掌当碗，很不好意思的狼吞虎咽，望着一扫而空的饭桶。有的埋头只管吃，有的边吃边回答老乡们提出的问题。农民粗壮的手青筋突出搭在红军战士肩上细声细语，问长问短。妇女们不停地盛饭添

菜。孩子们围在战士身边，摸弄武器。投奔过来的白军士兵喜笑颜开龇牙咧嘴大声说道：“而今作人才算值得，就是死了也值得。”

“为了活命！”红军战士补充道。那些白军士兵从来没有一个亲身体验过农村老百姓欢迎红军的思想感情和同胞情谊。现在他们亲眼看到红军首长们给农民老乡付这顿饭钱，老乡非常客气，一次两次推卸不收，三番四次最后硬是不要。

红军仅停留了一顿饭吃之久，并不住宿，继续摸黑行军。他们连夜赶路。老乡们站在路口默不作声，接受向导的任务。他们走了整整一夜。

红军来到一个大山脚下山坡上的小村庄时，东面群山现出鱼肚白色。地名上河谷。光秃荒凉，草木不生。没有穿的，一半人饿饭，村里存粮仅够村民吃一星期。没有茶叶喝白开水。村民烧好开水让红军战士们休息。他们说：“我们的人守望一切路口，别的一无所有，拿不出什么东西支援红军”。

红军战士们就地睡下，伤员们安置在破破烂烂的茅屋里，有的在屋檐下靠墙躺倒，有的睡在门板上，还有的挤在一起取暖，成排成排的睡着。有的咳嗽，有的呻吟，不能安睡。

近晚，战士们起来，喝够了老乡们送来的开水。吃了昨天战场上缴获敌人粮食做的饭，每个人分到不多几口，只有青少年小鬼和病号吃的多一些。

又翻过大山继续东进。天色发暗，夜幕来临，人们静静的走着一直到天明。曙光来临，他们又睡了，这回是露宿在空旷的山坡上。黄昏时候他们起来，勒紧一下裤带，颗粒不进，又向前走。

“到了绵竹大家就有吃的了，这一带地方村子里的地主老财都住在绵竹。他们在那里供养白军。”“绵竹有多少白军？”有的战士问。

“我们的侦察员报告有千把人。他们是江西的队伍，他们还有机关枪。”

“好呀，到时候我们又会有更多的机关枪了！”

红军翻过一个山头，下山直走到绵竹镇区的时候，快半夜了。月光下市镇静静的，房屋店铺门户紧闭。

街上各处有一条一条的黑影子不动站在那里，等待红军的到来。据了解，他们是穷苦农民和苦力。全部国民党驻军，所有地主商人，还有许多人，几个时辰前都逃走了。他们临走前到处散布谣言说，一股实力强大人数五千在山那边奸淫掳掠烧杀抢劫，把城镇乡村化为灰土的土匪快要打过来了。土匪头子们能够呼风唤雨，唸唸有词，手一指一道白光，把人定住不动。

谣言过后，绵竹街上一阵锣声，人心惶惶，奔走哭号，鸡飞狗叫，好象祸事临门，天要塌下来了。土豪劣绅，地主商人，收拾金银财宝贵重物品，叫雇工、佣人带着全家老小，在国民党驻军的保护下逃避一空。只剩下一些穷光蛋留下躲藏起来，现在他们站在月光下好奇地等着瞧过路的土匪是什么角色。

红军没收委员会请他们指出大商人的店铺、地主豪绅的房屋和药铺。

红军破门而进，在富豪家里的地板底下，墙洞里地窖里起出了银洋。印刷工人们高兴得不得了，在绵竹里发现了一架小油印机。使大家欣喜若狂的是，兵工厂工人们发现了一个大厂房，

是国民党军队和地主团防局在那里办起的一个小兵工厂。

商人店铺和地主院墙门口贴上了红军政治部没收委员会的封条和告示：

“中国工农红军，反对帝国主义，进行土地革命。地主、土豪、富商，压迫剥削群众，所有米盐、银洋，衣物鞋靴本属穷人血汗。本军概予没收，捐献革命！”

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日。”

在不易攀登和难以刷掉的高墙上，红军政治部用石灰刷写了许多口号：“打倒敲诈勒索穷人的地主奸商，土地归农民，工作八小时！”“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农民协会万岁！”“不交租不纳粮不还债！”“工农红军万岁！”

红军战士们在市镇上吃饭，洗脸洗脚。过夜第二天黄昏起来，吃了一顿饭。发烂受伤的脚穿上了新布鞋或草鞋。然后把新的补给物品、油印机和兵工厂机器收拾好，又出发向前走。

两天后红军接近市面繁华的宁冈县城。出城几小时路程便是他们的目的地井冈山。

宁冈人口有好几万，打听红军来了没有，因为过去几年这里闹过农民协会，现在还有几个共产党员留下。很少人知道他们的身份，但红军侦察员已经先到这里，同他们接上了头。

宁冈县的国民党军队和团防局团丁听到红军临近的消息，赶忙敲锣鸣警，狂呼乱叫：“土匪快来了！”四乡农民和城镇手工业者都嗤之以鼻不予理睬。县里的绅士地主想请城里学校两个男教师召集市民守城，可是找不到教师的踪影。

红军进城前夜，县里许多农民和手工业者被召集到一个山

里开秘密会议，主持开会的就是那两个教师！这个秘密会议地主豪绅国民党军队也都听说了。天亮以前逃向宁冈东面的吉安。宁冈县有些人望着地主们走了。

“让他们跑了可如虎添翼……我们把他们抓起来等红军来了送去。”有人建议道。

“谢天谢地，他们跑了，不受拖连就万事大吉了。”有人回答。

“受害可并不浅呀！”人们争论不休。地主资本家都逃走了。红军终于从蜿蜒曲折的山路来到宁冈，人民空城欢迎，连小商贩小业主也夹在欢迎的人群里迎接红军。

这天宁冈县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城里城外许多工人农民都参加了这个大会，比起庙会赶集迎神唱戏的场面还要大，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在井冈山下的附近山区，它诞生了中国革命、实际是农民革命的群众运动组织形式。农民协会、工人联合会、农工联合会、妇女联合会等等群众组织，一律从出席这次大会的男女群众中选出。接连几天新的群众团体协会组织选举县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产生了人民革命的民主政权。革命委员会后来成为苏维埃组织。

宁冈地区有好几千大脚的妇女长工，她们为地主种田干活，除吃饭外，一年工钱四、五块大洋。有的女长工在殷实人家干农活。农田活订有文契，实际上是女仆奴隶。成立农民协会的时候那些长年女工参加了。成立农民赤卫队的时候，那些女长工也参加了。有的昂首挺胸，站出来说道：“瞧！我们的大脚板，从来没有缠过，我们跟男人一样走路干活，我们同男人一样身强力壮，给我们发枪吧！”

宁冈赤卫队就是这样的成为男女混编的武装团体，他们的衣袖上都带着红袖章。

宁冈县还有二百多用老板的简易手摇机打袜子和缝衣服的女纺织工，还有许多纺纱织布工人，其中也有女工。这类工人每天劳动时间十五、六个小时，他们象奴隶般听从厂主使唤。还有许多妇女在家一面绩麻、纺纱、织蓆子、打草鞋，一面上地里参加劳动。

那些妇女们看到雇农工人委员会组织起来的时候，她们也要参加，因为她们认为它是妇女的联合组织。红军到宁冈一星期前，三千多妇女坚持她们有参加妇联的权利。直到县妇联成立才答应了她们的第一步要求，采取改变旧风俗，同旧传统决裂，妇女自身解放的步骤。

另一个新思想席卷宁冈县城。指导群众团体和领导红军队伍的共产党通过一项决议，提出无赏没收一切地主寺庙、宗族的所有土地，分配给劳苦农民的口号。

农民对这个决议的热情非常高，在女长工们的带头下许多农民立即动手没收和分配土地。

但是农民协会正式讨论没收土地时，事情进行的并不顺利。阶级斗争开始出现。因为农民协会里不但有贫农中农而且还有富农在内。富农雇用长工，有时出租土地给雇农。因为许多富农知书识字能写会算，成为群众大会或农民协会的领头人物。在农民协会里他们相互提名当选委员。农奴们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睁开眼睛说那些殷实富农们。“好吧，让他们入农民协会好了，我们又穷又傻，笨头笨脑，八字不识一个！”接着提出了分配土地问题。富农们这时就拍着胸脯说：“革命在求

平等，平等的意思就是每个人都有同样数量土地的权利。现在的意思就是一个家，每一个人，不分老幼，老头也吧！婴儿也吧！都应当分给同样数量的土地。”

贫农长工听着富农的意见，不时发出猛烈的评语：“哎哟！良禽择木而棲，狡猾的家伙真有一手！”

穷人家庭的人口少。因为许多穷人儿女成活很少。儿子大了，离乡背井流浪城市，寻找出路，充当苦力，甚至跑沿海码头，军阀部队里当兵。姑娘早卖给人家当丫头奴婢。一个贫农家庭最多三、四口人。而一个富农家庭的人口就是一大家子。

贫农同富农实际上不能讲平等，分配土地的口号唤起了火热的希望，使他们欣喜若狂，土地怎样分配尚且不管它，总比他们过牛马生活苦日子要好。能分到五亩地，可真够多的了。

但是他们真有苦难。

富农却有二十亩、三十亩甚至五十亩地。其实，富农是小地主，只是由于他们逢迎取巧钻进农民协会才免受地主相同的命运。他们非常狡猾，善于看风使舵，投革命之机。宁冈附近一带农村地主的土地被没收，而且按照人口数字分配了。贫农和雇农长工分地很少，有的分到五亩好地，有的分到六、七亩中等土地。但富农保留原有的一切土地，甚至还分得比原有土地更多的地。

分地过后贫农不平就诉苦了，因为富农照旧雇长工，他们有牲口、农具，不给别人用，说他们自家需要。有的贫农内心充满仇恨，有的说，命里只有三分米，走尽天下不满升。菩萨老爷安排好，人贵要自足。可是农民协会里的富农却摆出一副是他们把土地分给贫农的样子。群众的问题多得很，红军的任务

艰巨，而共产党员的负担又极其沉重。在土地革命最初的日子里土地分配问题并没有解决。

红军在宁冈一直停留到四月上旬。在清明节绵绵细雨中对远处市镇进行出击，赶走白军，夺取枪支弹药，没收富商粮食。政治部在大地主门口贴布告说：“告市民群众！中国革命先锋工农红军本日没收压迫剥削穷人的××大地主家：五百担谷，一百担盐，二十五只火腿，五千块银元，二十匹布，一百五十个带电池的电筒，制造子弹机器，三十六箱药材。工人、贫农、小商所有资财，红军丝毫不取。红军政治部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二日”

四月中旬，侦察员带来毛泽东的红军从北面临近的消息。他们在井冈山山下，等待同朱德的红军会师。

军号响遍宁冈全城。俞昆吹起他的军号，打着使枝头树叶飒飒作响的手势。红军留下一个连在后面加强宁冈赤卫队的力量。全军向井冈山进军，看来外表整洁，休息够了。服装经过宁冈妇女们洗过补过，脚穿新的草鞋。红旗飘飘，军号嘹亮，浩浩荡荡，登上通往井冈山高峰的起伏群山。

第五章 政治委员作报告

红军政治部主任在作报告。他瘦长个，戴一付眼镜，共产党员。他是国立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讲话的时候挥舞着他那打掉三个指头的右手。穿一身本来是青蓝布或黄卡叽布的军装，上身已洗成灰白色被农家妇女补了又补，下身裤脚管缩成套裤样子，他一双赤脚穿着草鞋。到宁冈后他剃了头，头顶光光，象一个西瓜壳盖住他的黑脸。

这是红军还在宁冈的时候。听他作报告的有红军政治部的全体干部，红军司令部的全体参谋人员，红军各连队班排士兵委员会的代表，红军和宁冈县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红军”，他开始讲：“经常流动，总是象流水和行云，但是在这里，在井冈山周围这个地区，我们还势必同行云流水一样活动。因为我们面前有比以往更困难的情况。这是一个土匪地区。”

我们希望在井冈山成立一个兵工厂，一个军事训练学校，一所医院和其他机关组织，作为我们的根据地。毛泽东的红军正从北面开来。要保存我们的力量，建设巩固的根据地。这两省交界地区，山大且险。井冈山有五个险要哨口，每个哨口只要一连人就能把守住。我们能够在井冈山把我军整编，择地休息，以资改造，建立起红军的大本营。

但是井冈山上王佐、袁文才，两个土匪头子，王、袁各有三百喽啰，手下共六百条枪。此外，井冈山周围所有农民老乡都听他们的。农民老乡把王、袁看作是他们的朋友，他们说王佐、袁文才“劫富济贫。”

“我们的侦察员们走遍了井冈山地区各个地方，它是一个土匪地区。那里的地主们规定向土匪头子月月进贡，得到土匪的保护不受侵犯。王、袁带领山区农民到其他地区的城乡抢劫的时候，农民也得到一些赃物。我们必须从内部来征服这个山区。多少天来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怎么办？在执行我们的具体计划以前，我有必要跟大家讲讲这个山区的情况。如果我们要取得胜利，我们必须知道这些情况。”

听报告的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有的人拿出半截铅笔把小本本放在膝盖上开始作笔记，以便回去后向连队作传达时参考。他们听到的报告是这样的：

井冈山地区一切土地差不多逐渐集中在地主的手里。地主是放印子钱的高利贷主，也是税官。同土匪头子王佐、袁文才合作行动。少数农民一无所有。大多数农民是佃户，实际是农奴，许多是家奴和奴隶，许多农民的女儿卖给地主家作家务奴婢。

许多土地栽种鸦片烟，由长工奴仆运往市镇或吉安府以东赣江一带，让在那边当大官和作生意的地主亲戚朋友经营销售。有些地主的子弟，到外边去经商作官，在军阀部队里青云直上，充当大小军阀。

地主们住在四周高墙耸立的深宅大院里。他们把金银财宝埋在地窖或地板下。对还有一点土地或一头水牛作担保的农民发放贷款，重利盘剥。一到年终算帐，农民们失掉了他们所有一点土地。

政治部主任的报告这一部分，听众并没有全部记下来，因为这一切只是看法并没有准确数据，只是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情况说明。但是政治部主任根据侦察员们的情报作报告，他们结论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接着他继续讲道：

地主们会拿出一部分钱买些新的奴仆或小老婆，有一个地主最近花了五千块大洋，买了一个只有十六岁的广州漂亮小老婆。他们还会把窖里藏的财宝，拿出来送儿子到吉安城里的天主堂去当神甫，或到南京、上海进教会学校去念书。地主的儿子学校毕业后回来多数成了基督教徒。他们脱胎换骨洗净了他们个人的罪恶意识，用上帝的刀剑武装自己的头脑再回到家里。从前，他们买一个丫头在房里服侍他们，振振有词地说，这是中国的旧风俗。现在摇身变成基督教徒，他们更进一步大言不惭地说：

“只有我们把他（她）们买下给他们饭吃，不然她们如何活下去？我们岂不是我们兄弟姐妹的看护人吗？”地主子弟有的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在上海有的成了新军阀，有的当了银行家。他们也成为他们兄弟姐妹们的看护人谁要对这提出异义，

神明可不会答应。

政治部主任继续讲道，这个地区的大小沟渠不通，积水池塘杂草丛生，道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农民用锄耙种田，人拉木犁耕地。地主老财嘲笑道：“穷鬼懒汉多如牛毛，买牛耕田白费钱财！”

村里人满身是疮疤，他们小时候一身脓疮，满头疥癣，痢痢头，几根黄毛。冬天穿一身补了又补的棉衣棉裤，穿到天气暖和，脱下后一丝不挂，同刚出娘胎一样赤身露体到处乱跑。

妇女们在死水池塘边淘米洗菜，家里的破衣烂裳，尿尿布、大小便、粪桶、脏物都在同一个池塘里清摆。“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地主老财说。愁眉苦脸，疮痍满目，伤寒、霍乱、赤痢、摆子瘟疫流行。三伏天烈日直照乡村茅屋房舍，黑死病光临这块土地，各家病人躺在茅屋里。村外山边，新坟垒垒，死人长眠的土地跟活人生息的地方差不多。

正当炎热的三夏季节，疫病蔓延夺去穷人的生命。地主们全家搬到清凉山上的寺庙里。他们在山脚下派人防守，不准任何人登上山路。地主豪绅这样解决可怕的疫病问题。

但是地主们却进一步散布谎言蜚语。说什么鸦片可以医治百病。穷人买地主的鸦片，吞云吐雾吸食成瘾，他们死活谁也用不着关心。于是人们求神拜佛。信男信女到庙子里去烧香磕头络绎途道：农村到处钟鼓饶钹，道场法事念经声木鱼声日夜敲打不停。和尚道士、斋公先生跳神、捉鬼、驱邪，赶走挫磨人们的妖魔鬼怪，对每个祷告者总有那一套司命经。

秋凉以后，流行瘟疫消失，地主们回到平地山庄继续过他们那一套腐化堕落的生活。一家之长的老太爷横躺在榻上抽大

烟，丫头婢女左右侍候，烟瘾过足，兽性发作，年将就木，梦想成仙。丫环奴婢于无人处伤心痛哭，但求一死了事。大小老婆争风吃醋，姑嫂妯娌吵架，子女号啼，鸡犬不宁。大些的少爷公子把丫头使女拉到书房里初试云雨情，打发他们的岁月。地主子弟或是忙于催租讨帐，买进卖出，或是书写礼义廉耻修齐治平一类的治家格言，象基督教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须承受地土”一类福音传道教条。经过他们精心选择，恭恭敬敬地写好贴在书房、厅堂、神座上。

人们一面听着政治部主任讲这些事，一面交头接耳纷纷议论：看来他们过去真太老实了。

报告更进一步讲道：身兼本区地方官的地主同井冈山上土匪头子王佐、袁文才共同分享权力。以前地主们有自家的团防局团丁，但是那些兵痞流氓发现，当土匪喽啰打家劫舍，坐地分赃更是发财之道，于是一个一个的连人带枪支弹药投奔山寨，组成以他们为主力的一支六百土匪的武装。

井冈山上八个土匪啸聚的村落，按老百姓取水井取名。主要村落由北井、南井、东井、西井，中井等五井组成，其余村庄有上井、下井、小井。井冈山人口五千也许更多些。村民的生活都要比生活在地主手下的老乡们好些。土匪头大哥王佐同他的大老婆和八个小老婆住在一个村子里；土匪头二哥袁文才有一个老婆和三个小老婆，住在另一个村子里。

如果某个地主对土匪们不按月进贡，就会发现自己倒霉被抓起来逼供拷打交出比例要多两三倍的赎金。如果某一个地主公然同土匪头子对抗不交例贡，或心存幻想以为他可以请省里这个军阀那个亲戚带兵前来剿匪的话，那他很快会发现，他的

长工、奴仆和附近的老乡，向土匪通风告密，井冈山土匪在某个黑夜里下山打进他的家，把这个地主家抢劫一空，并一把大火烧成平地。甚至连让他维护尊严的一条裤子也不给留下。

事后，王、袁的特派使者就会光临附近某个豪绅家里，受到阿谀奉承殷情接待。同全家在豪绅家里避难、体面扫地的地主彼此寒暄客套一番。特派使者声称奉王、袁寨主之命特来解释，这是一场小小的误会，王、袁得悉几个手下，目无尊长，不懂礼节的家伙，冒犯先生虎威，感到甚为不安，专程下山表示歉意。还说王、袁寨主希望大驾回府安居或暂时委屈一下借居人家，忘记小小的私愤云云。于是豪绅请客设宴招待，使者酒醉饭饱就回山去了。杀鸡吓猴，这么一着，其他地主就照例纳贡，并且当王、袁喜庆生日宴会时更加额外送礼。王袁对那些地主并不喜欢，但是只要地主进贡，他们就和平相处。

“现在要问”，作报告的政治部主任问：“王佐是个什么人物，袁文才又是个什么人物？这两个土匪头究竟是什么角色？”

王袁两人都是贫农，他们受尽欺凌，贫无立锥之地，反叛成性，不满世道，此外一无所知。他们唯一的精神粮食不是来自公元前二、三世纪魏蜀吴三国争汉鼎连年战争的三国演义故事，就是来自六百年前宋朝水浒传一百零八将的民间传说。他们在吃娘奶的时候就吸收了那些故事。在庙会赶集的时候他们蹲在阴暗的墙角落里，有时在农民苦力成堆的茶馆里一坐几个钟头，听说书人讲水浒好汉打家劫舍秤金分银的豪侠行径。说唱扮演评讲古代战争两军对垒，英雄豪杰上阵冲杀和出身卑微出生入死粗野豪放的绿林好汉。劫富济贫、重然诺、讲义气、

拜把子、称兄道弟、生死不渝。在中国社会上对过去一套封建道德有多种解释，什么是忠？意思是奴隶对主子要服从，但“贤者择主而事”，则聪明的仆人可以选择开明的主子，强者可以称王；妻子对丈夫要忠，但男子汉却有许多小老婆；一个兵士必须服从长官，但实际上并不拼命去打仗；将军必须忠于皇帝，但如今没有皇帝。人人可以称王称霸。凶猛残狠的军人总是得胜。否则胜利就归于阴险巧诈的对手。

满怀仇恨、精力充沛的青年农民王佐、袁文才，在三国水浒故事的影响下，就制订出他们自己王国的计划。他俩结拜成为兄弟。招兵买马、拉了一支当过团丁的农民组合的小队伍。各自娶妻讨小老婆。他们对朋友讲义气、重然诺，对部属忠信不贰。对冤家仇敌刻薄无情。那个地主破坏诺言，他们就立即报复。思想上一致的地主们也心中有数，知道这一套无非是豺狼当道玩弄的把戏。

王、袁的王国毕竟小得可怜，他们知道在穷困的小山沟以外，比他们势力强大的大小军阀多的是。他们看到除了交朋友找盟军，要统治江西或半个江西是没有希望的。

红军谈判小组提出井冈山作根据地同他们商谈，他们把红军代表同国民党军阀一样看待。谈判小组想用新思想、新观点启发他们的觉悟，引导他们走上新的生活道路。他们认为两个匪头出身贫农年纪很轻，挺而走险逼上梁山，完全是封建制度造成的悲惨命运。

政治部主任报告说，红军在组织群众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以前，至少在一段时期里，可以争取王、袁作为革命的同盟军。

很多听报告的人知道谈判已经完成。王、袁同意他们跟红军联合，答应让井冈山成为红军的根据地。不过他们提出了他们的条件，他们的六百人要编入红军，但仍归他们自己指挥。他们更进一步要求指挥大的部队，要求红军只能通过他们不能直接同农民打交道。

红军最后有条件的同意了这些条件。代表告诉土匪头子，他们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必须受训，必须服从红军司令部的统一领导，接受司令部的组织体制。必须同政治委员共同负责指挥部队。连队成立士兵委员会，士兵都要参加。一切人等都必须受正规政治军事的训练。

王、袁对这些古怪的条件非常怀疑。但是，红军的军代表们和他们恳切谈话，指出他们同红军合作的未来前途，当土匪并无出路。谈判商定，王佐担任团长，袁文才担任营长。

政治部主任报告说，当然红军的意图并不是迁就地主、军阀和土匪三位一体的神圣同盟，来牺牲中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红军的任务是组织群众，解放群众。在王、袁的士兵中间，在附近的农民中间，尽管困难重重阻力很大，但是必须开展工作。必须十分小心，非常谨慎，不然就会出乱子，肯定要付出很多生命代价。要选拔最勇敢最聪明的战士到土匪头子所在的团队里去。

报告到这里为止。还有其他同志有关江西西部交通、河流、地理特征的报告。红军正在制订在群众中开展革命工作和军事作战计划。

一九二八年四月的第二周，朱德统率的参加过南昌起义、广

州暴动、湘南暴动的红军向这个半土匪地区进军。当部队登上一个山嘴，可以望得见大山的时候，天色慢慢黑下来了。朱德停下来拿起他的望远镜对正焦距向侦察员跟他指点的一个黑地方望去，模糊不清的影象在他们的望远镜头里现出清晰明确身穿军服的人们，有的坐着，有的躺在地上，旁边架着枪支，立着一面旗帜。

那边，井冈山下五道哨口，一道哨口下有一支自己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的武装军队驻在那里。它是从山北下的。它的司令员是毛泽东。它的旗帜是一把交叉的镰刀和斧头上面一颗星星的红旗。

朱德统率的红军心花怒放，快速前进。毛泽东走出迎接他们。

去年九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后武汉警备团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南下，一路联合农民赤卫队，铁路工人和矿工，用长矛、大刀、弓箭和石块同地主军阀部队作战。毛泽东的队伍始终同农民赤卫队在一起，这是一支为革命而战斗的处于被围困的小部队。他们的队伍在这场游击战争中损失将近一千人。活动在湘赣两省交界的万山丛中，一边作战一边行军。他们在井冈山下同朱德的红军会师了。朱德军队的矿工、农民和投奔到红军的白军士兵，争先恐后鼓着眼睛望着这个被帝国主义国民党称做“土匪、强盗和小偷”的共产党思想界的先驱农民领袖毛泽东，他们看到一个身材高大、面容憔悴、前额宽阔、模样可怕的人，蓬头长发，赤脚浮肿，穿一身灰布军装破旧不堪。这是一个红军领袖，一个以擅长演说和写作闻名的中国人，一个在外地学习研究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把他的生命献给革命圣坛的

人。这个人后来成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第一任主席。

战士们又瞪眼盯着井冈山土匪头子王佐和袁文才。他们站在另一边一小队武装人员中间，王老大面目狰狞一付凶相。袁老二矮小肥胖粗鄙、狡猾。

王、袁看看这七千人众的红军队伍，他们梦想有朝一日自己拥有这样一支军队发迹起家统治和宰割江西全省。他们望着一面面绣着镰刀、斧头交叉一颗红星的奇怪红旗。在他们的心目中红星的五角意味着有朝一日他们统治天下的五方。据解释说镰刀和斧头象征工农大众，而他们自己又出身农民，他们心领神会怡然自得。他们听到指挥员亲切称呼战士们作“同志”这个陌生的词儿，他们看见队伍里一般战士如同胞骨肉兄弟相见、亲切热诚地欢迎自己的上级首长。

他们当初没有预料到这个。人众面前谁大谁小？谁强谁弱？谁是领导者谁是紧跟者？谁是将军？谁是小鬼呢？事实摆着。

谈判协定已经签订，他们必须遵守。红军会师部队留下一连人，战士把守南面哨口，大军跟着王、袁土匪头子登上夜色降临的山谷。一轮明月高空悬挂，几小时后他们来到一个峡谷坡地开阔的地方。天快亮了。在未来的岁月里，这块地方即将成为他们的根据地。这是走向胜利的舞台，也是伟大悲剧的舞台。他们驻下来，直到红日当空，暖和的太阳把他们唤醒，于是继续向前，走上中国革命下一步新的路程。

第六章 井冈山

阴雨绵绵，乌云笼罩着井冈山群峰，营地坪场红军战士们戴着宽边大斗笠加紧训练和整编。夜里连队摸到一些远处的村镇对白军和团防局进行突然袭击，神出鬼没地消灭敌人，吓得地主土豪到处逃窜。他们在城镇墙壁上张贴革命标语，然后把没收富人的粮食、医药、大洋、军工机器和其他物资带回山上。

井冈山红军派出的侦察员到处活动，冒着生命危险走到白军驻扎的市镇，有人轻蔑地说：“一个红军胜过百个白军！”他们傲然走过国民党重镇赣江吉安城的大街小巷，同驻军混在一起，装扮成菜贩子泰然自若地拐弯抹角寻找共产党秘密据点。有时候他们在当铺钱庄柜台前逗留一阵。铁丝窗口里面，秃顶、肥头大耳的钱庄老板活象一尊胖罗汉，坐在高凳上正埋头拨弄算盘，计算洋钱。街头望着侦察员们有时候想入非非，心想：“要是突然一下说我们是红军，红军

就在城门口，他会怎么样？……他会目瞪口呆、全身发抖，吓得屁滚尿流抓起钱袋胖墩墩的拔腿飞跑。象野鸡一般一头钻到床底下，拉一裤裆稀屎！”想到这里侦察员们乐得哈哈大笑。钱庄老板会抬起头来，什么菜贩子，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他瞪着眼一直望着他们走过街头直到看不见为止。于是他就会大骂学徒们：“小菜贩子居然胆敢在大人先生面前打哈哈！”

侦察员们走过铺着青石板的大街，穿过曲折迷离的小巷。有时候在天主教堂和教会医院前面停留下来。他们知道教会里有两三个教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意大利和法国军队里当过军官，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魔鬼老了，修道成仙。可是这些洋鬼子不光修道，还研究江西省的资源、人口和军队情况，他们把研究的情报送给他们在上海的总领事和武官。现在关于井冈山红军的情报他们当然会送，并且同吉安国民党军阀坐在议事厅里也是一定的。

侦察员们想到这些生气地走过去，终于来到他们要找的住址，对了接头暗号，把报告交给吉安共产党支部。有时拿回一捆国内各地甚至国外寄来的报纸，有时拿到写在细白竹连纸上折叠起来可以放在手里的秘件。他们把它藏在菜担里挑起就走。

不时有一个穿着商人模样的人从吉安到井冈山旅游观光去做生意。有一个说是姓肖的经纪人，瘦猴脸相戴一副眼镜坐着滑竿，来到哨口下了轿子就精神抖擞、神气十足地走到山上朝红军总司令部走去。他一口江西腔，会说英国话、俄国话。以后他在政治部工作，红军战士们听说他到外国留过学，是不远万

里而来干革命的。

各色人等风云聚会井冈山。一批一批的工人从上海从汉口来了，一批一批的大脚剪短头发的妇女同农民赤卫队一起快速行军，还有其他人等数以千计。他们带着长矛、梭标、斧头、锤头、铁杆和一些德国造、法国造、英国造、美国造的步枪和左轮手枪，浩浩荡荡向井冈山进军。

当红军参谋部的人员走出去欢迎他们的时候，游击队长站出来说道：“我们来报到了！人数将近四千，包括两百名伤病员……四挺帝国主义机关枪，八十条步枪和左轮手枪……。”一个妇女站出来插话道：“……十二个妇女身上带了些手榴弹。”她矮小结实，脸上有一块难看的伤疤，左手两个指头被打掉，伤口还在发炎没有医好，一头短发同男人一样。青蓝布裤子灰上衣满身补钉。腰系皮带挂两颗有把炸弹——手榴弹，背一支步枪。

她对亲切望着她的红军首长们说：“我小名滋梅。我是桂东县地主吴老财家的长工。我们仗打得好苦，白匪的枪太多了。”

滋梅两只大大的眼睛，眉头紧皱，薄嘴唇皮，按照西方人的算法她还年青。可是她手下的战士们却说：“她老了……至少二十五岁了！”

别的战士对好奇的红军战士们解释道：“滋梅是一个贫农的老婆，大旱那年她男人把她卖给桂东县地主吴老财，然后到城里找事去了。去年秋收起义，吴老财被打死了。”

有一个战士插话道：“是的，是滋梅打死他的！她身背的枪就是她从吴老财手里夺过来的。她不漂亮，打仗她可是理手。”

我们选她当我们的中队长。”

农民游击队的队员们纷纷投奔到红军的队伍里。新编红二十九团整团人和红三十团一部分人就是赤卫队员编成的。其他的人分编进各团。伤病员安放在过去显赫一时当过大官的祖庙的医院里。

井冈山过去多象是死者的吉祥安息所在。群山巍巍，流水淙淙，钟灵神秀，风水很好。过去有多少地主豪绅达官显要长眠埋葬在这里。他们择地修盖起他们的家庙和祠堂。四大不空的和尚，清静有为的道士，在关心尘世生活，也在山林深处起盖寺院庵堂，同土匪勾结和地主交友。贫瘠的土地给僧道寺院带来财富，秋天朝山进香的香客游人带来大宗收益，他们不耕而获，财富山积。

不过，井冈山上许多庙宇祠堂对红军大有好处。一座大庙成了医院，一座道观成了军事训练学校，一个祠堂成了第一个红军兵工厂。印刷厂设在一个庵堂里。其他的庙子成了红军的营房。大慈大悲的观音娘娘和泥塑木雕的罗汉望着神座上栏杆架上搭着成排睡觉的战士们的衣服。

水口山暴动领导人宋铁匠负责筹备红军第一个兵工厂。他从红军里抽调出广州兵工厂工人和一百四十多名其他熟练冶铁工人修理机械。红军各连队把袭击远近城镇搞到的机器设备带回，分送到兵工厂和印刷厂。冶炼工人们把零碎机件拆卸按装成新的机械。他们整天在厂里工作，修理步枪焊接新的武器。

红军现有人数一万二千多人。整编后名为红四军。它有六个团——红二十八团，红二十九团，红三十团，红三十一团，红三十二团和三十三团。这个军队在中外报纸上有时叫做朱毛

红军。因为朱德是总司令，毛泽东是政治委员。有的报道它是江西红军或简称红军。国民党对海外不明真相盲目相信国民党的人们进行欺骗宣传，挺胸顿足说中国革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乌合之众的土匪。

经过整编，政治部同司令部权力同等，但两个部门之上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国共产党。

红军每个连有士兵委员会，委员会的最高机构是选举产生的士兵执行委员会。战士们通过士兵执行委员会直接出席司令部政治部的会议。

红军是革命的军队。士兵委员会不但享有充分的权利，而且负有沉重的责任。他们的职责是讨论、通过拥护红军的一切纪律规章制度。他们研究、控制经济委员会，特别是财政后勤部门提出的报告，监督检查饭菜干净，营房整洁，驻军各地的卫生工作。他们参加军内的一切政治工作——报告、讨论扫盲班，国内外革命节日的庆祝活动。红军在一个地方停留三天以上就必须坚持每天两小时的政治学习，这已成定律。井冈山会师后就成立了政治学习班。

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分散在红军队伍的各机关连队里。各自召开党团会议，参加并领导士兵委员会的工作和一切活动，那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是贯穿红军的红线，给红军带来革命的形式、知识和方向。

红军遵守同土匪头子王佐、袁文才达成的协定。任命王佐为湖南农民组成的红二十九团团团长，袁文才为该团营长。跟随王、袁的土匪和农民编入该团。这个团还编进了许多产业工人和老革命战士，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负责做政治工作。

王、袁是口蜜腹剑内心狠毒的一类人物。他们疑心生暗鬼。当面说得很好听：“我们只是愚昧无知的人，请教育我们吧！”但是他们事事抵制，搞阴谋，设圈套，背后造谣言。在他们面前政治委员们经常束手无策，在他们的团里政治部不能成立真正的士兵委员会。

土匪兵监视那些编到班排里的产业工人和战士们，敌对态度与日俱增。接着，山下农村各处地主土豪传出红军的政工人员在农民中间鼓动宣传成立农民协会，组织发动农民打土豪斗地主，没收土地分地给农民的消息。地主土豪销声匿迹。农民老乡留神倾听。

于是，王、袁在农民中间散布相反的谣言。说红军的长官千方百计争取农民的信任，没收一切土地，为的是把土地据为己有，恐怕红军不过是另一种军阀部队而已。

然而农民老乡还是继续听取政工人员们的意见。王、袁感到风向对自己不利。他们考虑了很久，如此如此派出自己的代言人到处游说王、袁永远是农民的朋友，是要搞农民协会的，也是要没收土地的，如此云云。他们准许农民占有土地，征收很低地租，五十税一，或者还低的田租。农民会发家致富。王、袁过去劫富济贫同农民交朋友。他们即将控制红军，农民应该拥护他们。谁能说出红军过去是什么军队呀！

农民老乡听着。有的说，对呀！王、袁过去总是解囊相助同他们友好，红军放大炮说大话，它的兵都是些远方来的外路陌生人，跟平素知道信得过的人总归好些。

于是，有一天一个红军的政工人员在某个村子里被神秘地暗杀了。接着一个又一个的被谋害，大家明白谁是凶手，王、

袁有责任。但查无实据。即使可能查证，红军也还不敢断然处理。因为，东起吉安，井冈山周围北东南面各县，井冈山东南一带的国民党军队正慢慢集结兵力。一个月内会有大战。红军不能内外同时作战。王、袁能够带领农民反对红军，并且能够勾结军阀订立秘密同盟。

因此，所有在农村里的政工人员，所有在土匪连队里的工人战士都接到指令，在同王、袁及其跟随者们打交道时，要提高警惕，特别小心。政工人员在农村工作要采取新的方式方法，红军要争取胜利，不但靠口头宣传，而且要言行一致。红军战士要同王、袁的士兵交朋友，和他们同行、同吃、谈心，把他们争取过来。

一天，二十九团有一个矿工出身的战士被暗杀，尸体扔在悬崖上，王佐本人立即去作调查，报告说没有任何线索可以找到凶手。

王佐团的政治部主任说到发生暗杀的背景原因。有一个山下地主没有给王佐照例进贡，被抓起来带到井冈山中井村。王把这个地主关在私设的囚牢竹笼里，逼他坐老虎凳，膝头上压竹杠子，下巴底下顶竹签子。如果地主想要动一下，竹签就会刺进喉咙。坐了一天一夜，地主提出了一笔巨额赎身金，他的兄弟拿了钱来，把他放开准他回家去了。

这件事红军内部都知道，一个矿工出身的战士在王佐团里对农民出身的土匪兵说，这是土匪行径，不是革命的行动。地主回了家照旧占有土地欺压剥削农民，绑票勒索，王佐发横财，谁也没沾一点光。实际上，羊毛出在羊身上。农民的遭遇更坏，地主把赎身钱转嫁到农民身上。那个战士还说，农民

应该把一切剥削者消灭光，土地归农民，耕者有其田，农民要分地种田。

那个战士还更进一步说：“王佐假借我们的力量装满他个人的私囊。为什么他不准二十九团成立真正的士兵委员会？因为士兵委员会控制团首长和军首长的一切财政收支。王佐并不需要这个！他要的是把我们当棍子使，他能拿起棍子打狗，别的他要啥！”

于是，这个战士被暗杀了。但是红军还是忍让。指示这个团里政工人员“要留在强盗手下作好牺牲准备，坚持留在强盗手下工作。唯有我们最勇敢的同志必须留在那里工作。”

同时，红军通过新的纪律和注意事项用它来教育农民的时候到了。

红军最高机关起草的纪律草案发下来给连队士兵委员会进行讨论。最后由群众大会通过。一天，召集全军战士参加，并邀请乡下的农民出席大会。

这是一次盛大的群众大会。纪律一条一条的提出讨论。第一条纪律规定严格遵守红军的纪律和注意事项，任何时候一切行动听指挥。通敌、暗杀、强奸、带枪逃走、战场上不听命令，城市工作中出卖红军秘密，打家抢劫农民、工人、小商小贩和一切穷人者处以死刑。没收地主、资本家、大商人的财物为没收委员会的专有职责。

处分较轻的一切注意事项规定，红军部队每个男女战士尽力保持个人卫生习惯。不许污染城乡，人们要“上厕所用尿桶、马桶，野外挖粪坑离市镇乡村营房至少要在五百米以外，便后埋土。所有红军战士必须归还农民给他们睡铺的柴草”。离开住

宿人家时要打扫整洁。住宿房地保持整洁。过失或无故损坏东西必须向首长报告，同物主义价赔偿。禁止赌博。欠债要还。因为红军的粮食供应极端困难，最大的经济必须人人联系实际，厉行节约，只要能够吃饱就行，不抽烟不喝酒。

当过团防团丁和王佐手下的土匪兵方面提出反对的意见。

“我们拿老百姓的东西你们说要枪毙，那我们为什么打仗？谁也没听说过这样不公平的事！”

“我们是为了革命打仗的……”，一个战士说。

“要是我们打仗我们死了一无所有，这革命那革命又是什么东西？”一个怒气冲冲暴跳如雷的团丁叫喊着把那个战士的话打断了。

王佐团里别的人随声附和地叫起来“好！好！”

话被打断的那个战士坚持要把话说下去，他喊道：

“你们，兄弟们！听我说！红军的目的是干革命才打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赶走一切地主、资本家、军阀和帝国主义分子。我们要把土地分给农民，在我们军队里打仗干革命的士兵也要分到土地……我们要建立一个工农兵政府，这个政府会是我们的。保护一切干革命工作和为革命打仗的人。我倒要问问你们，你们想想看，如果群众知道只是打家劫舍，劫富济贫，我们要是抢他们的东西，他们会拥护我们、同我们一起打仗吗？不会的！如果我们向他们证明我们同他们一起打仗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他们是会同我们一起打仗的！”

“现在我跟你们讲一讲你们大家都知道的事——宁冈又被国民党军队夺过去了，我们的赤卫队员们象猪一样被宰掉。东面的永宁和永新有白匪军队。吉安更数不清，他们正准备向我

们进攻。只要群众拥护我们就能打败他们。如果我们抢劫伤害群众，他们能拥护我们吗？不会的！现在，同志们，我们有一个没收委员会，它的任务就是我们需要的才没收。它只是没收富人的东西，只是没收地主土豪资本家大商人军阀的东西。他们为什么富有，因为他们杀不了穷汉当不了富汉，剥削穷人。我们把他们剥夺的东西夺过来。我们的纪律是，任何红军战士抢夺任何穷人者处以死刑，是一清二楚的。现在谁要不服从这条纪律就离开我们红军，请走吧！”

“好！好！”

山下来的农民老乡中间发出一阵“好！好！”的喝采声。

别的战士们也议论纷纷，发言讲话大意相同。王、袁的人默不作声，静默下来。王、袁两个土匪头子站在那里同样沉默，赞成与否也不说话。

讨论到注意事项的时候，一个农民说话了，

“我是一个傻脑壳，也没有讲话的本事。不过我说，纪律注意事项好得很！我们村子里的老百姓会知道红军保护穷人。如果遵守纪律红军会讨农民喜欢的。”

井冈山脚下的村子里来的一个农民激动地站起来大声说道：

“你们要是归还柴草，走时把我们的屋子收拾干净的话你们可受欢迎！你们要是有什么也不偷，不拐我们的女人，你们……”

说完他感到自己真有点胆大不由得害怕，一下子就蹲在地上了。

游击队女队长滋梅挺身而出，昂首向前说：“我的名字叫滋

梅，我是一个女人！”他对群众大声说道，免得人们会发生误解：“现在我滋梅要说，老百姓受苦遭殃，被抢、被偷、被杀、被奸污受够了。难道红军同白军一样胡作非为、一样的干坏事吗？不，我们是革命的军队，我们有革命纪律，我们遵守纪律。我现在做了一个共产党员了，图的什么？象白军们一样胡作非为吗？决不！象一个共产党员样打仗。老百姓一无依靠，只有红军保护老百姓。现在我要说这个，谁保护群众，红军万岁！大纪律万岁！小纪律万岁！共产党万岁！”

说完她向后转走进队伍里。顿时红军战士们振臂高呼“万岁！”声音都喊哑了。坐在地上的农民老乡纷纷议论，互相点头，惊讶不已。

纪律和注意事项一条一条进行表决。王、袁环顾四周，抬头看红军战士们一次次高高举起的手如海洋一般。两人犹疑一阵，环视举手的红军首长，于是也把自己的手举起来。他们的跟随者团丁们接着也把手举起来。

这次大会以后，红军战士们开始接近王、袁连队农民出身的士兵们，引导他们讨论讲道理。政治部指示“你们必须教育他们，教他们谈心表达他们的思想观点！”

一天，几个政工战士同王、袁团里几个农民出身的士兵躺在地上谈话。一个政工人员问井冈山下来农村来的一个农民战士：“你为什么要参加红军呀？”

“为什么不？”农民应声回答。

“我的意思是，假设村子里有农民问到你这个，你怎么跟他们讲”

“因为我们的王老大哥要我”。他答道：“王老哥是穷人

的朋友。”

看来这个农民也不大满意自己的答复似的。

一个湖南农民插嘴道：“我参加红军打地主……地主老财心狠如狼……，你为什么参加红军呀？”他突然问一个湖南矿工。

“我吗？因为我是一个工人，也是一个共产党员。要为工农的解放而打仗，也要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而战斗。”

“解放是什么东西？”

“它的意思是把那些抢光我们杀害我们的一切地主、资本家、帝国主义分子和军阀都扫除掉。我们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工农兵政府，工农兵自己管理自己的苏维埃。”

“全世界无产阶级是什么东西？”一个当过团丁的打断他的话问。“帝国主义分子是什么东西？”另一个农民问。

矿工继续讲道：“世界无产阶级的意思是，在外国土地上同我们一样打仗的工人和农民们。帝国主义分子是外国的洋阔佬。他们来到中国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一个奴隶国家，要我们大家都为他们做工。他们把枪支大炮送给国民党来屠杀我们。你们看见我们这里那些枪支吗？上面那些稀奇古怪的洋文洋字，那是外国土豪公司洋阔佬的名字，那些家伙都是海外来的。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用洋船运给国民党的。帝国主义分子永远不会把枪炮弹药给我们。他们给国民党一切东西，教国民党对我们发动战争。他们在长江和沿海都有大军舰，他们支持国民党大小军阀、国民党是他们的走狗！”

“那些枪是谁造的？”农民用手指上下摸着步枪上打印的字母问。

“帝国主义分子所有的兵工厂里的外国工人造的。”

“那些外国工人是世界无产阶级？同我们一样？”

“哦哦一样的。”

“那他们为什么造枪炮杀我们？我们并没有害他们呀！”

矿工出身的战士迟疑难解，不知说什么好。“我想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能跟我们多多的讲些，我们去问他吧……不过嘛。也许是这样的，世界无产阶级同我们参加红军作战以前一样是傻哩吧叽的人吧。”

“帝国主义分子么，就是那些自己的掘墓人啰！”小鬼俞昆兴高采烈得意洋洋地重复了他在甚么讨论会上听到的结论，也说了一句。

矿工赶忙补充道：“象这个样子的，老虎吃人太多了就掉在深沟里了……和外国帝国主义分子一样。他们杀中国人太多了，我们就把他们赶下海去。”

世界无产阶级为什么造枪炮来屠杀中国工人和农民，这个问题政治部必须向红军作出回答。

一九二八年“五一节”这天，毛泽东在江西井冈山头上对这个问题作了讲话。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和农民群众，男女老少倾听他讲世界工人的斗争。

毛是一个有演说才华的人。他能把人们的情绪提高上升到顶高度，也能以政工人员难得的求实风度侃侃而谈，让人们捧腹大笑。他也是一个爱挖苦人的讲话人。

在这个历史性的五一节日里毛讲了话。俄国革命的铁流队伍和全世界革命的巨流，好象穿过悠悠飘捲的白云冉冉进军下降到井冈山头。只知本乡本土里事情的农民们，现在听到工人

群众队伍走过俄国的街头，德国、法国、美国的城市，他们游行示威，唱歌喊口号。当毛讲话的时候，人们忘记了他的讲话方式，而出神地想象他讲的一切境界。

“五一节”这天，在井冈山，成千上万的男女心中深深印下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名字——马克思。他的名字被拼成马盖世，列宁的名字听起来象个中国人的名字，被拼成李林。这两个人教导，红军战士们以后的政治学习天天学。他们通过学习，知道了世界无产阶级工人为什么还在制造枪炮来屠杀中国的工农大众。外国的工人们有的觉醒同帝国主义作斗争，有的还不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因此还照旧为帝国主义分子制造枪炮。经过学习也搞清楚了。

井冈山上的工农大众听到了这一切，他们知道了他们并不是孤立无援的被人数多过千万倍的敌人所包围的一支小小队伍了。此外，他们看到海外世界还有跟他们的兄弟姐妹们一样的人们在奋斗不息。俄国工人们作到的事他们也能作到。中国红军也能成为一支钢铁的武装，决不屈服，是战无不胜的军队。人们充满信心，甩开膀子，冷眼横盯着万恶的敌人，盯着长江和沿海一带的帝国主义的装甲军舰，盯着用帝国主义武器武装到牙齿的集中围剿他们的国民党军队。然后他们又掉过头来望着亿万受苦的同胞。

这次群众大会上的红军讲话人的话在城乡各处传播，反响很大。新思潮倾注井冈山过去的土匪地区。农民行动起来成立农民协会，赶走地主。王佐、袁文才发现潮流不可阻挡，聪明的办法是顺革命潮流而下，并以革命领导者的面目出现。

但是，情况还是糟糕。一天，两个青年农民在一个村子里被

一个地主暗杀了。农民们抓住了这个地主父子并把他们送到井冈山上。

王佐把地主父子关押起来，派了三个自己的亲信和两个政工战士看守。

“他为什么挑我们两个看守？”一个政工战士问另一个。

“总归没有好打算……夜里最好不要睡觉……我们做他的人的工作。他晓得了。他们现在是站在我们一边的。”

王佐团里传开要公审两个在押的地主。但在公审大会前地主父子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跑了。两个政工战士倒在血泊中死了，另外还有两个政工人员也被暗杀了。

红军司令部对暗杀进行调查。王佐站出来坦白说是他枪毙了两个人。他说地主贿赂了他们一大笔钱，他们让地主父子们逃跑了。他人赃俱获抓了他们。王佐拿出钱作证，把钱上交给司令部。他没有把政工人员扣起来进行审问，因为他抓他们的时候，他们要杀他，于是他进行自卫，开枪毙了他们。

司令部知道王佐说谎。他们知道是王佐自己受贿放了地主父子，并乘机杀了他那团里两个最积极的政工人员。可是他们还不敢对王采取行动。他还控制山下的农民，能够在农民中间制造麻烦事故，打草惊蛇就会使得红军不胜其防。

红军之所以还不当机立断采取行动，只是因为白军正从四面八方加紧围困井冈山。这时候，红军各连队每天都在同白军部队短兵相接，激烈战斗。军务繁忙。他们把死伤病员带回井冈山上。红军等待着一个晚上穿过漆黑的山谷哨口向宁冈进军，同宁冈的白军作一次最后的战斗。

第七章

七星桥小唱

七星桥小唱，半是故事，半是歌唱。要真实的、正确的讲说它，必须有一个说书人，前面一面三盘鼓，手里一付打莲花落的竹响板。他一边说书，不时敲鼓，演唱红军兵团袭击白军的场面。响板吧哒吧哒有节奏的韵律不停地响着，并且还要有一把军号。

七星桥小唱并不是古代英烈的传说，它是最近的真事。它活生生地流传在赣西各地老百姓的口中。演唱具体时间虽说只一星期，但自那时起人民思想上的巨变，势将影响到未来许多个世纪。

小唱演唱出来的历史事件是这样的：

一九二八年五月第三周，星月暗淡，红军五个团离开井冈山，一个团留守山上，愿意打先锋，不愿守后方的一团人抱怨不平。但是防守山道哨口，看护战场上送回山上的伤病员总得有人才行，一个团必须在后留守。于是五团人走下悬崖陡壁、高岭深谷，他们

四五个人才有一支步枪，机关枪很少，梭标如林，拉着大木炮，像一道铁流向山下进军。

农民战士们对那些木头掏空，亲手制造的大木炮爱如至宝。他们把树干烧焦、砍削、掏空、钻眼，造成炮筒子。最初，有些红军指挥员站在旁边观望，对造那些木炮有什么用处心中是怀疑的，战士们知道这可不是开玩笑，国民党军队一听到隆隆巨响，就吓得如惊弓之鸟。国民党兵打起仗来只有真傻瓜才肯拼命。跟他们打仗发出巨大嘈杂声响，也是很厉害的一着。

解放了的宁冈县被白军一个师攻占了。配备有很多优良武器的白军，对防守宁冈县的一连红军和四百男女赤卫队进行突然袭击，夺取了县城，但遗弃了近千具尸体。而白色恐怖的苦难阴影立即笼罩宁冈县城。

红军是去攻打宁冈这个白军师的。东面永宁县城区集结了两师白军，东北面的永新县还有其他白军。他们的武器新式可怕，他们的弹药无数量计。但是红军胸中有数，深知白军如同夏天的瘟疫，老百姓对他们真可恨透了。他们知道城乡各地农村的青少年收拾好了亮堂堂的梭标、大刀，各家妇女把菜刀、斧头磨得锋快，准备一旦有事好有用场，不拿它切菜劈柴了。

天色未亮，晓雾弥漫山谷。红军如潮水般涌进睡梦中的宁冈市上。迅速摸掉了白军据点的岗哨。望眼欲穿、谛听动静的宁冈市民们坐在自家的屋子里等待红军回来。一听到千百双脚步的轻快小跑步声，一见到千百条黑影各处抢占战略据点，人们立即蜂拥而出，投进战士们的队伍里，并肩行动起来。

宁冈顿时化为一所疯人院，人声鼎沸，枪声大作，呼喊声，射击声震耳不绝。一部分白军激烈抵抗，打了一阵，接着仓皇

撤退。红军猛打猛追。经过一小时的激战，两千白军当了红军的俘虏。其余白军慌忙火急，遗尸载道，向东面的永宁方向逃窜。

红军战士和宁冈群众收集战利物品。这一仗缴获将近两千支步枪，一些新式机枪，两尊大炮，药品，大米，食盐和大洋等物资。红军连队首长们立即把身强力壮的宁冈青年赤卫队员整编入伍，担负起被杀害的同志们留下的任务。政治部宣布，有五百多名俘虏志愿参加革命，名单已经拟订好，他们都是为了吃粮卖命打仗的贫农。其余的俘虏，每人发给两块大洋遣散回家。俘虏的军官们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高谈，如果他们得到释放，留得一条性命回家当老百姓，他们将永远感激红军的恩德，洗手不干，谁也不会忘恩负义，卷土重来，同自己的救命恩人作对打仗的。

白军俘虏兵和那些能说会道、甜言蜜语的军官都得到释放。俘虏兵在宁冈停留了一些时候，军官们马上走了，路上遇到敌对的农民老乡，他们点头哈腰拿出了放行路条。

还不到中午，侦察员带来永宁两个白军师正在向宁冈开来打红军的消息。逃窜的两千败兵投到白军里，那些感恩戴德、能说会道的军官们遇到白军又东山再起、走上指挥岗位。

红军战士们高唱着战歌，喊着口号出发，迎击来犯的敌人。老乡们拿着新磨快的锋利的斧头、大刀、梭标从四面八方赶来，妇女长工拿着各种武器，宁冈县的男女纺织工人拿起桌腿、机头、铁锨和一些夺到手的步枪，走在一起前来参战。

红军战士们在七星桥等待白军的两个师，连队在山坡上拉开，抢占每一个掩护阵地。指挥部成立了，几百个赤脚农民侦察

员同朱德总司令随时保持联系。老乡们负责把弹药从基地运送给各个班组。医疗队指挥男女担架队员作好上火线抢救伤员的准备，然后翻山越岭送到井冈山医院里去。

到处出现了提着饭菜开水的妇女、儿童，三五成群，找今天这一仗参战的红军里自己的亲人。井冈山前土匪地区的农民老乡也夹在这些农民群众的人流里，他们念念不忘唯有红军才是穷人的亲人，他们的保卫者。正是红军给农村的老百姓指出了谁是革命的带路人。

七星桥战斗打响了，红军面临着一万二千久经战场、拥有梦想不到的枪炮的白军。

农民老百姓亲身体会一次真正的战斗，这还是头一回。他们作梦都没有梦见过大炮隆隆震撼天地的吼声，子弹呼啸，刀枪拼杀，杀声震天，耳聋眼花，飞鸟绝迹，一切都听不见了。他们也从来不知道炮弹落地会开花，山摇地动、掀起成吨的泥土会把人们活活埋掉。许多人吓得发抖，跌倒在地，有些人拔腿就跑，没命飞奔。但是，当他们看到红军战士们沉着镇定，两军阵前决定生死关头，像放印子钱的高利贷主数铜钱毫子那样，沉着应战，每一颗子弹打倒一个敌人的时候，他们又纷纷爬回到阵地上，盯着红军梭标队、大刀队的农民战士们，毫不怕死冲锋陷阵。赤脚农民侦察员们在枪林弹雨中像豹子似地掠过火线，飞越山头，如入无人之境，直到射程外为止。他们爬回来看到红军的伤员们不下火线还在作战，有的把火药，铁屑，玻璃渣和石头装进木大炮的膛内，安上引线，轰地一声，炸开一片土，落地开花，呼号怒吼，吓得敌人心惊胆战，仓促逃命。

老乡们眼看这一切。他们转身回来，参加战斗。滋梅带领

他们一些人绕到敌人的后翼，横冲敌人，把敌人从红军阵地上牵引过来，他们接着向敌人的运输队发起进攻，拦截辎重、缴获物资。

无数农民妇女英勇地参加了七星桥战斗。她们顽强勇敢同白军拼命作战。有一个参加医疗队抢救伤员的农家妇女，在敌人炮火射程以内，亲眼看到受伤快死的儿子，嘴唇开合，听到他在喊“妈呀，妈呀！”她不顾一切地朝炮火纷飞的阵地上跑去，忘记了眼前一切危险，弯下腰来抱起儿子拖下阵地到安全地方。当她瞧这孩子的脸时，他并不是他的儿子，而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

这个农民妇女在战火通红的时刻出于对自己儿子的母爱，把红军里作战人的伤员抢救下了火线。她把红军战士都当作自己的儿子看待，他们的外表相貌、讲话姿态、都像她的儿子。从这时起，这个农民妇女成了一个红军战士，红军战士们的命运成了她的命运。

黑夜来临，战斗时断时续。白军渴望休战，但是红军据守七星桥阵地，不让敌人有喘息机会。整个夜晚，红军各连队班排小组战士，轮班守夜，有的出击夜战，有的枕戈深入睡乡。出击夜战的同志们对白军阵地猛扑偷袭，展开肉搏战。白军处于四面楚歌，草木皆兵的境地。

红军阵地上传出革命歌声。

“你听到了没有？”白军士兵彼此问答。

“他们在唱什么？”

“听吧，他们唱什么穷人是饥寒交迫的奴隶，全世界受苦的人！”

“哎哟！谁能说那不是真理！”

“听吧！……他们在喊话了！”

山坡上传来了喊话的声音：

“白军士兵兄弟们！你们为什么要打我们穷苦工农？……兄弟们，穷人为什么要打穷人？……老百姓不打老百姓！……兄弟们，莫当帝国主义军阀的走狗！……土地归农民和士兵！……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白军士兵们沉重地叹息道：“哎哟！我可没有打报告要来这里呀！”

“振作精神，你们见鬼去吧！……立正！……”一个白军军官对士兵大发雷霆。

“他们的旗帜为什么是红的？”白军军官走过后一个士兵问。

“我听得人家说他们的旗帜一色通红，因为红色就是生命和幸福的意思。他们叫我们白军，白色是死人的颜色，死了人办丧事一色皆白。”

一个士兵喃喃说道：“管什么红白！现在要问，穷人究竟为什么要打穷人？”

晨光熹微，战事转趋激烈。白军队伍被打乱，阵线被突破，损失惨重，溃不成军，精疲力尽，垂头丧气。许多白军投奔红军，连人带枪纷纷跑过去了，有的放下武器，就地等待红军来抓俘虏。一个白军将军负了重伤。

太阳当顶，白军开始全线撤退，红军跟踪猛烈追击，缴夺供应物资。终于把七星桥整个地区的敌人彻底打扫干净。

周围几英里的山乡老百姓，情绪激昂，一片欢腾。这里从

从来没有打过这样一次大仗，穷人从来没有获得这样一次大捷。以前，下贱的劳动受苦人，从来不敢对骑在头上作威作福的压迫者挥舞拳头，太岁头上谁敢动一下土！以前他们从来体会不到并肩战斗有移山倒海这样大的气力。“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人们沉醉在胜利的喜悦中。

“红军万岁！”山乡到处响起了欢呼呐喊声：“红军万万岁！”

“两羊翻不过珠峯！”有人一声高呼，接着到处随声呐喊，“两羊翻不过珠峯！”

老乡们欢呼大笑，心花怒放。他们是多么的骄傲得意，有人见景喊出这场恶战维妙维肖的绝好台词！因为，两个军阀姓杨，杨同山羊的羊同声。仗在珠峯山打，珠是珠山高峰。峯是峰顶山头的意思。朱珠毛峯同音，农民老百姓比喻这一仗称呼“两只小山羊翻不过珠山峯”。意即两个姓杨的军阀队伍打不过朱毛统帅的工农红军，再利害也翻不出朱毛的手掌。

七星桥小唱到这次战斗胜利后并没有完，它继续演唱下去，巨变进展超出想像。情节离奇，有如下述。

红军和几万农民、手工业工人，立即向北面的永新县进军。时已午后三、四点钟，半夜前要赶三十多英里路，天亮前要肃清永新县城里的白军，之后，第二天还要向深沟高壑、防备森严的吉安进军！但他们是铁脚板，飞毛腿，同群众联合起来向前进没什么事不能做到！

红军大捷的消息传到永新，红军大部队和好几万工农赤卫军正向北开，他们一路说说唱唱，扛着机枪，拖着江西军阀的

大炮等等，情报接二连三雪片似地传开。

永新县城一片混乱，人们三五成群出奔逃命。那些人口贩子、鸦片经纪、地主豪绅、大商人、资本家、钱庄老板等一类平素号称体面绅士的大人先生们，毫不顾及体面，急忙出走。他们同守城白军、团防总局的团丁一起像丧家之狗，夹着尾巴逃离县城。但是那些靠出卖力气谋生活的人们，不是走出县城迎接红军，就是在家等待红军的到来。他们还成立了一个永新县欢迎红军委员会，并选定城内一座寺庙前面的大空坪，作为群众欢迎大会的地点。

既兴奋又疲乏的红军和农民赤卫军队伍来到永新，群众大会连夜召开，亮闪闪的灯笼火把照得会场如同白昼。

一个永新织布机匠在台阶上讲话。突然传来一阵紧急的军号声，红军部分连队奉命急忙离开会场。老百姓陷入一片怀疑惊恐中。红军首长们站在庙门前面的讲台上说：大家要安定，不是白军打来了，是城里出了点小乱子，马上就会平息的。

人群骚动，男女市民赶忙朝自己家里跑，但旋即跑回，跟在红军连队后面拥进会场。红军战士们端着枪，刺刀晃晃押着前面被解除了武装的五百名自家的同志。

五百名闹事犯走进庙前空地，面向司令部立定站好。这时广场上群情轰动，人声鼎沸，交头接耳，议论开来：“就是这些家伙打家劫舍，抢了我们的家！”

红军司令部和政治部的首长们，以及永新县欢迎红军大会的委员们，看了闹事分子一眼，他们是些什么人，红军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就是过去在王佐、袁文才手下当过土匪的兵痞游子。一路行军在后，黑夜洗劫城市。连他们的连排长在内，一律

下了枪，通通押来了。

红军知道这个晚上关系重大，它意味着红军可能失掉或者将会得到永新人民的拥护。他们决定在日出以前对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于是宣布，立即公审抢抄老百姓家的闹事分子，永新老百姓充当法官参加陪审团。

毛泽东说：“红军纪律主要有一条是不许抢劫！这条纪律是井冈山通过、每个人举了手的。破坏这条纪律，按规定判处死刑。”他面向闹事分子喊口令道：“整队，站好队……把你们偷盗抢劫的一切东西拿出来！”

曾经当过井冈山土匪头的王佐同红军司令员们站在一起，他眯着眼睛，紧皱眉头，他在发火，还是害怕，可很难说。闹事分子排队走过庙前台阶，把钱财东西放在地上走过去，有的说再没有了。

朱德命令红军特务连一连战士们出来：“搜查一切闹事分子，搜查他们的连排长！”

战士们搜查闹事分子，把搜出的钞票、环镯玉簪、金银戒指等首饰摆在各队首长面前。从连排长身上搜出大洋、金环、银镯、耳环、戒指等。

搜查完毕。毛泽东对闹事分子讲道：“为什么要这样干？谁想坦白、到前面来说！”

一阵沉默。接着一个士兵慢慢地走到前面直接对毛讲话。毛说：

“向人民坦白！人民才是你们的法官，人民如何决定，我们照办！”

被告转身面向到会的几万群众高声喊道，他把抄家的东西

都交出来了，还有什么危害？他们把他抄家的东西拿走了，为什么他该枪毙？红军纪律他知道，有关纪律他想得不多。红军通过纪律的时候他没有举手。他想穷丘八打了胜仗，要拿啥就拿啥，不拿东西拿什么养活家里人呀？

一个年青的闹事分子走到前面，抬头大声说道：

“一切行动听指挥，个人的长官带头抢劫，一个当兵的该怎么办才好？我没有趁火打劫的意思，我一直看着我们的长官干，我也跟着干，他们要下命令不干，我就不干！”

“无赖！”一个愤怒的声音大喊。

另一个被告人接着说，过去他紧跟王佐、袁文才，他们一贯打家劫舍，已经打劫成性，他认为这回是明知故犯，又有什么办法！

一个面黄饥瘦、大高个子接上说：“我们干了错事，恶有恶报，该受处罚。我们作错了事，枪毙好了！我们的连长们领着我们干，我们像牲畜一样跟着他们干！”

人们一个接一个出来讲解申辩。集会群众细声细语展开争论。这时一个连长走到前面，怒不可遏地喊道：“你们把我们的东西都抄走了，你们还要干啥！怎么，这个军队是一种什么军队！顶好的军队！”

老百姓发出了愤怒的喊声。

终于没有人站出来坦白了。群众等着有戏看。这时，一个小脚老太婆拉着一个年青姑娘走到庙阶前红军首长们站的地方，姑娘掩面低头抽泣，老太婆直接走到朱德的妻子吴玉兰的面前，尖声尖气地说道：

“人家跟我讲，你是一个帮穷人打仗的堂客！人家说你是

一个革命的妇道人家……你一双大脚板，一头短毛发，你可了不得！你背一杆黑枪可不得了！你纵容你的兵痞流氓，奸污我们贫农家的女儿，叫她丢脸，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你们官官相护，纵容你们的兵干坏事！”

群众中爆发出一阵怒吼，如狂风席卷树林。老乡们望着毛泽东和朱吴氏在讲什么，他们领着老太婆母女走到闹事分子中间。老太婆在一个矮胖子兵面前停下，叫女儿看那家伙的脸，“是他，就是这个家伙！”姑娘说了一句，低下头又咽咽哭了起来。

接着，永新人民讲话，审判闹事分子，一个穿着棉袍、满身油污的矮子，一马当先走到前面，迟疑一阵后讲开了：

“我，罗明玉，一无所有，在太平街开了一家小豆腐店，而今永新城里哪家豆腐店都比不过，要买豆制品数我家的最好。”

“你在说什么，卖臭豆腐的！”一个人高呼，十分愤怒。“是的，卖臭豆腐的，我要说这个！兵大爷来了对我说‘快把收到的铜钱角子交出来！’我把藏在豆腐缸下的八块光洋三十七文铜钱交给他们了。只要大老总把我的八块光洋三十七文铜子还给我的话，兵大爷可以放了……”

矮子在他生平头一回亮相公开讲话后，摇摇晃晃走下台阶。

一个身穿大补丁白色套裤和短棉袄的老人走上台阶，开始讲话：

“小名肖成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大家都认识我织布的肖机匠。年青的时候我当过兵，因为家里穷，要钱养家嘛。当兵的时候我也打抢过老百姓，因为打抢是军阀队伍的作风嘛。现在来了这个军队，他们号称自己是革命的，可是它打劫

人家，跟军阀队伍一样。他们说要把这些抄老百姓家的违法乱纪的分子一律枪毙。我说不，我不同意。他们是犯罪分子。把带队抢劫的连长枪毙就算了，让士兵们立功赎罪，今后帮老百姓作好事就好了。那个奸污贫农妇女的家伙该死该埋，强奸妇女有罪，要按军法治罪，如不处治，姑娘跳井死了也说不清一世羞！”

老人在一片叫好赞成的声音中步履蹒跚地走下台阶。一个身材高大的铁匠接着走上去讲话。

“通通枪毙，流血杀人太多。”他开门见山，从实际出发讲道：“冤冤相报，何得开交，我们老百姓并不要求报复。大兵违反纪律拿老百姓的东西，红军把东西送还给老百姓就算了。让这支军队证明它是一支革命的队伍，证明它的战士是遵守红军纪律的。犯法要办，罪在连长，让士兵立功赎罪吧！”

人们接着讲话，同意机匠铁匠提出的意见。

最后进行表决。凡是同意士兵们可以释放但不同意释放连长的举起手来。闹事分子环顾四周，只见森林般高高举起的手臂，惊心动魄，有的哭了起来。

接着表决同意判处连长死刑的举手。全场举手又一致通过。强奸犯是不是处死？全场再一次把手高高举起，同意处以死刑。

破坏红军纪的六个人抵偿了他们的生命，人民判处了他们死刑。

红军战士们全体肃立，心头如压一块积石，他们恨铁不成钢，如骨梗在喉，表决时大家举了手，红军第一次死刑判决的阴影盖住他们的心头，使得他们没精打采，情绪低沉。这一天

打了一大胜仗，却以一场坏事收场。

大会结束的时候，天色大明。永新县的居民们蜂拥到红军战士们跟前说：“我家房子不宽敞，地板上够五个人住，你们要不嫌弃贫苦人家的话，上我家去住。我家有稻草和一床被子。”“我们的家就是你们的家，我家床铺你们睡吧！”许多人说。红军战士们婉言谢绝道：我们在地上睡惯了…给一些稻草，夜里暖和些……我们不需要被子。

于是，红军在永新人民的家里住宿下来。

七星桥小唱到永新县城公审大会为止，还没有结束。

公审大会两天过后，人们在刚刚成立的县工会、县农会等办公楼房上升起了红旗。这一天，侦察员们回来报告：七星桥溃败的白军和永新城逃出的白军会合了，吉安方面派出的增援部队一万多人前来讨伐。杨池生担任前敌总指挥。

红军总部商讨对策。要不要把驻防永宁县城的一团人调回，要不要把驻防宁冈的二十九团调回？永新现有三个团加上城乡新参军的赤卫队能不能顶住白军的进攻？七星桥小唱说，指战员们谈笑风生，计谋多端，三个臭皮匠顶过诸葛亮，其中一个说法是，群众威力无穷，同赤卫队工农在一起就能旋乾转坤，消灭敌人。但会议最后决定还是派出通讯员到永宁、宁冈通知两地红军和赤卫队，提高警惕，作好准备，磨快武器，派出援军，协助总部打败敌人的进攻。

三团红军总数六千。离开县城在永新城东南二十里地方同永宁、宁冈来的红军赤卫队会齐。一队队农民工人和苦力组成的游击队在他们的队长带领下手拿梭标、扁担、锄头、斧头和

夺到的步枪，雄纠纠气昂昂形成一道道人流赶来了。赤手空拳的农民老乡也赶来参战，他们选择阵地，挖战壕，收拾石头当子弹。入夜，赤卫队员和农民老乡露宿在山林里，坐以待旦，守望着来攻的敌人。

白军星夜赶路，期望拂晓前拿下永新。不出红军侦察员和农民老乡的预料，白军穿过悬崖峭壁、树木丛生的狭长山谷夜里行军，敌人的斥候同一路上遇到的农民一起在前头开路。农民警告白军不要从永新东面平原攻打县城，平原易被发现，地形不利，唯有取通永新南面这条山谷可保无虞。“红军是一些不怕死的危险分子，可是他们正在永新城里狂欢作乐，花天酒地，抢劫城市，用不着胆小怕死。”白军口出狂言。

吃过败仗的白军还是心有余悸，提心吊胆地摸索前进。但是那些吉安增援上来的白军，却磨拳擦掌、唾沫横飞地狂叫“共匪”何足道哉？他们倚仗人数、武器压倒“共匪”的优势，在峡谷中快速前进。猛然一声震撼，每一寸土地象裂开了缝，峭壁上、丛林里、起伏坡地上、四面八方飞来一阵石雨弹子，山谷响起了雷鸣般的喊杀声，农民赤卫队员和老乡们挥动着梭标、大刀、扁担、棍棒冲进白军的队伍里。

滋梅带领她一大队参加过湘南暴动的战士，似虎入狼群，反复冲杀，抢夺枪枝，抓俘虏，救伤员退下阵来。接着又重整队伍，带领战士们冲锋陷阵，勇敢杀敌，毫不怕死。

肉搏拼杀一小时后天亮了，吓破了胆、惊恐万分的白军绝望地挣扎顽抗。面对汹涌卷来震撼天地的怒潮，转身夺路逃走。

帝国主义强盗给国民党的武器转落到中国人民的手里。朱

德曾经说过：“每一条枪搞到不易，必须每个人心甘情愿付出他的生命。”但是这一仗并不如此，许多人献出了生命，夺到枪枝不过数千。

天色大明，白军节节败退，红军乘胜追击。永宁城位于恶战跑道上，败军不敢停留，城里白军早已逃走，红军夺取县城后留下部队协助老百姓组织防守，接着进军，继续追击。

夜色来临，边打边走的白军精疲力尽，胡乱打枪，得不到喘息立足机会，折腾了一夜，天亮时退到三叉路口一条小河边，一面挖壕据守，一面到各村子搜找船只舢板。他们在河边机枪阵地上发疯似地打机关枪，几个小时不停，直到有的机枪爆裂。几千人抢渡过河，船小人多，争抢落水，淹死的，受伤的，打死的，漂没河中，马匹、枪枝、尸体顺赣江向吉安方向流去。

第二天，红军迫近吉安城外四十里地方，指挥员们站在一座山头上用望远镜观察高大的吉安城墙。对压迫者满怀仇恨而又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红军战士和农民老乡们望着吉安城，发出大声喊叫：“拿下吉安！打倒地主军阀！拿下吉安过五卅！”

五卅，是中国历史上血渍斑痕不可磨灭的一页。三年前的这一天帝国主义强盗在上海屠杀中国工人和学生们，中国人民决不容许帝国主义强盗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现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狼狈为奸、互相勾结，围剿工农红军的反革命武装被打败了，乘胜追击的红军战士和老乡们要“拿下吉安过五卅”了！

但是从吉安方面来了红军侦察人员，吉安地下党的代表也来了。他们带来许多白军增援部队已经坐军舰从南昌溯江而上开到吉安的消息。大街小巷到处是兵，城镇戒严，宵禁紧张。

许多工人农民被打死在街头上。老百姓要暴动，但准备不足，时机不成熟。敌人的军舰停泊河中，摆好阵势，等待红军迫近。外国人和传教士拼命帮助白军。数千增援白军的装备有最新式武器，正领头前来“讨伐”红军。红军侦察人员和吉安党代表提出吉安不可强攻，否则要吃败仗的警告。

红军总部举行了军事会议。认为一次败仗会挫伤群众的锐气，代价可能太高。因为白军大部队在平原上打阵地战，隔一条河夺取难攻的大城市，红军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决定退兵撤到山头堡垒里去。

下达撤退命令，对于情绪高涨，仇恨满怀，沉醉在大胜利后的红军战士和几万农民来说，是不得人心、沮丧士气的事。但是决定必须作出，命令必须下达，而且命令也必须服从。

命令向下传达并作了解释。首长们补充说道：红军必须是一个有纪律的军队，下级必须服从选举产生的上级，信任总部首长们的军事决策，撤退是必要的。

农民老百姓非常惊讶，怒不可遏地提出强烈抗议道：“吉安就在眼前，看吧，吉安就在那边！”他们的梭标长矛锄斧大刀直指吉安。

但是，命令还是服从了。红军群众行道迟迟，很不甘心地撤退到他们的根据地永新、永宁、宁冈和井冈山。

白军慢慢向前推进，小心翼翼地夺取红军根据地周围地北东南三面城乡地区。他们就地等待，同时向遥远的湖南长沙和江西南昌发出急电：“速派增援部队！……大炮……会剿赤匪！”

红旗在红色根据地城乡上空飘扬，群众组织起来了。农民在分得的土地上种田，他们在田间地头，山沟屋边架起刀枪，谛听报警的号声锣声，监视上山下乡形迹可疑的陌生人。白天劳动生产，晚上坐夜守望斥候的烽火。

共产主义在湘东赣西各地人民的心中深深扎下了根。红军战士在共产主义的理想下高举它的旗帜，整顿和扩大红军的队伍，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枕戈待旦，准备随时歼灭入侵之敌。

七星桥小唱到这里结束。

第八章 围 困

五卅这个日子给中国的脸上抹了黑。三年后的这一天，国民党同屠杀中国工人学生的上海外国警察当局，隔着桃花心木长桌对坐，秘密协商屠杀镇压中国人民纪念五卅国耻的活动。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统治区的大小城市颁布了戒严法，垒筑障碍物架设电网，惟恐老百姓上街游行示威到惨案发生地点去。全体披挂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流氓地痞军警特宪，白俄警察，红头阿三以及英、美、日、法等国的巡捕在上海大马路上横冲直闯。其他城市也军警林立如临大敌。外国商人、资本家、携带武器作好准备，等待警铃声响的车辆在巷口集中，随时出动。“五卅烈士万岁！”的口号声一喊，警铃大作，架着机枪的警备车穿过上海马路，向暴动分子冲去。机枪后面站着英国警察，准备扫射任何敢在这一天喊叫纪念五卅的瘦削的工人和穿蓝布棉衣的文弱学生。监狱里塞满受尽折磨拷打的囚

徒。可是，男男女女青少年们却视死如归，高歌猛进。

但是，镰斧红旗在湖南、江西交界的七县高高飘扬，成千上万的男女同红军战士一起游行纪念这个日子。点燃起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火炬的工人和学生们，在国际歌的悲壮旋律声中，充满青春活力，朝气蓬勃地前进。

宁冈和井冈山是工农政府新苏区的中心，西面红军割据湖南的茶陵，酃县，莲花三县地区，东面割据江西的宁冈大小五井，永新，遂川，万安四县和无数乡村。结果，红旗打到哪里，五卅精神就在哪里开花结果。

国民党对帝国主义强盗伸出奴才巴结讨好的手，对中国的人民大众亮出刽子手和鲜血淋漓的剑，它集结好几万大军从湘东赣西对新苏区进行围剿，同红军二十八团在南面永新激战，同红三十一团在永新激战。尽管它被打得一败涂地，但红军伤病员的人流一路向井冈山红军医院走去。国民党调了两整师人，围剿湖南农民组成的红二十九团，宁冈赤卫队为了加强这个团，成立了独立第四团。飞机对西面的茶陵狂轰滥炸，把县城化为一片焦土。但是群众同守县城的红军连队并肩战斗，他们甚至走出苏区深入敌占区攻打来犯的军阀队伍。

边界城镇乡村由于白军集结兵力，敌我双方争夺激烈，反复易手。红军各个连队满怀信心，对白军据点发动突击，给敌人沉重的打击，嘲笑敌人的武器飞机大炮。但是，死伤数字比例可怕，优秀战士成批阵亡。红军总部鉴于损失沉重，立即改变战术，发动苏区全民投入斗争。

边界地区的农民一面种田，一面拿起枪矛，紧握手中枪，参加大小会，总结错误教训，探求新的打法。

白军包围整个苏区，实行粮食封锁，禁止柴米油盐和药品进入苏区。时到七月，封锁开始侵蚀人民的生活。群众开始播种快熟作物，粮食严格按定量分配。他们继续作战。七月，红军割据的永新县城和湖南一个市镇失守了。白军两个师占据宁冈一星期，在群众不断攻打下撤退。接着江西一个县又沦入敌手，红军三个团浴血苦战，打跑了进攻永新之敌。

白军也采取了新的战术，他们调来不懂南方老乡方言的北方军队进攻苏区，北兵不懂群众的宣传，像外国侵略军一样，以征服者自居，强抢掳掠，奸淫烧杀，洗劫村庄，无恶不作。

江西军阀想收买红军领袖们，在苏区和红军内部制造分裂，采用军阀对付敌手的惯技。他们派出两个上海某大学毕业替军阀辩护的专家，打着停战旗帜，充作使者。这两个西装革履、佩带国民党党徽的年青绅士象暴发财主似的大摇大摆、神态傲慢地被带到朱德、毛泽东那里进行秘密商谈。他们满怀自信，以为红军两巨头会把他们待为上宾，接受条件。但是没有这回事。一天，两位和谈先生被带到宁冈一个群众大会上。在那里他们听了毛泽东讲话，汗珠在他们的脸上直淌，自信傲态一扫而光。

“同志们！”毛泽东说：“白军先生们派了两个代理人来收买朱德和我本人。他们提出给我们一大笔钱，他们对朱德和几个首长提出在军阀队伍里当大官的头衔。他们对我几个政工干部提出在南京上海搞政治工作的肥缺。”

“这些条件对我们和革命意味着什么？他们的意思是我们少数几个人可以升官发财，帮帝国主义国民党掠夺，屠杀工农民众。要我们成蒋介石的走狗，我们有些人会穿上西装

洋服，摇头晃脑，在大节日里同帝国主义分子洋太太们一起跳舞，喝咖啡，打桥牌。我们还会去同上海的帝国主义外交官一起去参加跑狗赛，我们可以买很多小老婆，抽鸦片，同上海流氓头子应酬宴会！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会成为反革命的密探，追捕我们干革命的同志。”

“看吧，同志们，条件向我们提出来了。可是，我们指挥红军的都是革命的公仆，我们战斗为的是解放工农。现在请大家讲讲，告诉我们该如何回答白军先生们？”

会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愤怒鼓噪声。安静下来后一个农民手端步枪跳到前面说：“杀掉两个狗崽子的头，装在筐子里给他们的老板送回去。要我们回答的就是这个！”

“枪毙乌龟王八蛋！”到会老百姓中的一个人大喊：“浪费一粒子弹干吗？跟他们放个屁也得冲死他们了！”

一个腰里插着盒子炮的广州铁路工人站出来说道：“不用，我们用不着枪毙这两个家伙，也不要杀他们的头。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过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小走狗罢了。我们既然让他们作代表进来了，那我们也该让他们滚回去。我们正是在同整个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制度作战。一旦我们把这些制度收拾干净，这些小走狗就会夹着尾巴逃到外国军舰上去讨吃的。我们对白军先生们的答复是：打！打！打！对敌人搞宣传的人必须讲清楚我们为什么打的道理！为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而战！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这个就是我们的回答！可不要让这类上海歌舞厅的小猪崽子再敢到我们的苏区来摇头摆尾！”

毛泽东于是对两个汗流成注面如死灰的代表冷冷地说道：“现在我们送你们到边界，过边界以后你们可要自己当心，如

果苏区外面的农民把你们打死，那可可怜啰！”

战事重开，愈益猛烈。红二十九团提出申请该团回湘南去，发动农民打游击，引开敌人部分兵力，缓和苏区内部的粮食困难。他们得到批准后，于七月中旬南下，一路扫荡、快速行军，到达湘南时已疲惫不堪。第八天拿下了资兴，然后猛扑郴州，占领了县城一天，在白军援军赶到前，第二天撤出到宜章，化为小队，在四乡游击。后来被白军四面围剿，损失严重。就在这个时候，过去当过井冈山土匪头二大王的袁文才对这场内战感到厌烦了。他在红二十九团担任第二营营长，带领一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向国民党统治地区去。头一天宿营时，他手下的人在一个山坡上要求停止前进，说明行军意图。

“你给我们下了一道命令，现在我们希望知道一下，我们开到哪里去？为什么？”

“这里谁指挥？是你们还是我？”袁文才大发雷霆。

“我们前面有白军，后面有白军。”一个农民回答：“你的主意是要投奔白军吗？你以为能把我们变成土匪吗？”

满脸杀气，眼露凶光，剃着光头的矮胖子袁文才站了起来。一个晒得漆黑象黑炭团似的瘦汉子农民战士一步跨到了袁的跟前，说道：“我们跟着你打过多少次仗，因为你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一个好长官。”农民说：“现在你打算干什么？答复我们！”

袁的手落到他的毛瑟枪上。“红军第一条纪律是行动听指挥！我下了同白军作战的前进命令！”

“两个连同一个师作战吗？你是打算投奔白军去！”他愤怒地端起枪开了火。

袁就地倒下。

两个连举行会议，派了一个通讯员回到二十九团部，然后掉头连夜急行军回到井冈山上。后来，他们在苏区同过去井冈山山寨主王佐冒进湘南，与损失惨重的红二十九团余部会合了。但王佐闭口不提他的桃园结义兄弟袁被打死的事。

过了七月进入八月，苏区人民把他们的腰带勒得更紧。这时，苏区缩小到永新北面的莲花，中央苏区的宁冈，以及井冈山一带地区。红军靠定量的南瓜、山芋、树皮等生活。有的得了奇怪的病。战士们相互鼓励坚持斗争，大家说：

“敌人打不垮我们，因为我们是革命的！”

“我们从来就没有打垮过！”人们回答。

八月下旬秋老虎来了，土地焦裂，万物枯萎，要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窒闷死。地主、军阀和霍乱瘟疫这对孪生姊妹同革命作生死搏斗。这时军阀部队集中兵力对宁冈中央苏区发动进攻。他们从东西两面收拢包围圈。白军五个团兵力从南面活动爬上黄洋界山区。

宁冈的赤卫队和红军，打退了东西两面的敌人。据守黄洋界南坡的两连红军同来犯的五团白军展开了激战。

两连红军对付人数那样多的敌人，事先没有准备，他们集合起来作出最后决定。这次紧急会议上没有一个人讲到撤退，甚至连吃败仗的可能性都不谈。他们知道国民党兵同他们一样都是穷人，但没有他们那样的阶级觉悟，被迫打仗，没有打仗的坚强意志。然而他们熟悉这一带的荒山野谷，悬崖峭壁，羊肠小道。他们磨拳擦掌进入阵地，防守哨口，阻挡进攻的敌人。火热的太阳把岩石峭壁烧得滚烫。两连勇士在长日酷暑炎

热的煎熬下，在敌人的炮火扫射下，战斗继续了一整天。只是快到天黑时，宁冈的红军增援部队赶来了，白军才掉头连夜撤走。宁冈上来的红军到井冈山上两个主要哨口阵地上，他们见到景物悲壮，尸体纵横，弹洞累累。勇士们活着的还有四十五个，其中重伤的十五个而十五个重伤同志都一直打到底。其他被战友们安置转移到灌木丛中的烈士，是被敌人的枪炮打在山坡子上的土石弹片掩埋烧焦粉身碎骨的。

守卫哨口的两连红军勇士，同敌人浴血苦战，在阵地上，他们时而一阵密集的射击，时而一阵卵石飞雨，忽东忽西，时前时后，筑成一个不只两百而是几千人的阵势。有的咬紧牙关，把破衣撕成条条绑紧伤口，拼到最后，爬到丝树下，倒在滚烫的石头上，在半昏迷状态中喊着要喝水，有的声音细弱，唱着国际歌奄奄一息死去。在那辽阔荒凉的江西山头上，勇士们临终前的歌声流露出他们万古长存、为真理而奋斗的坚强信念。

当天夜里，一百五十五个烈士的遗体被埋葬在黄洋界的山头上。深挖浅埋长长的丘堆群葬墓地上，竖着一面五角星上有斧子和镰刀的红旗。这座烈士墓坐落在黄洋界上。夏天，赤日当空，热气蒸腾；冬天，冰雪交加，风雨侵蚀。日晒雨淋，始终磨灭不掉烈士的墓地，唯有山间的清风，脉脉细语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永远不能忘记黄洋界上长长的黄土垄中、长眠着为了自由献出生命的英烈。

这就是一九二八年八月三十一日保卫黄洋界哨口的战斗。但是，黄洋界保卫战后一星期，宁冈县陷落到白军手里了。国民党五个团的兵力又开到黄洋界哨口的时候，没有遇到抵抗。只见黄土长垄上招展的镰斧红旗，被一个军官扯下，把它卷起

放在皮包里，作为他后来勇敢夺旗、建功邀赏的证据。

宁冈陷落了。红军赤卫队带着家属和老乡们撤到井冈山上。土豪地主跟着白军军官返回宁冈地区，对老百姓施行血腥的白色恐怖，他们要回土地，抓回造他们反的奴仆佣人。格杀打扑、砍头示众的，村村有，镇镇有，只是由于种田需要男女劳动力大屠杀才住手。土豪劣绅和地主们把两个小学教师和许多背后议论白军的工人、农民送到宁冈县白军司令部，马上砍了头，并把人头挂在竹竿上示众。并吓唬老百姓，窝藏通匪者会得到同样的下场。

宁冈赤卫队的家属和撤退到井冈山上的老乡们，带着他们一切值钱的东西铺盖被褥，提着坛坛罐罐，公鸡母鸡，赶着猪羊，儿哭女号，饥寒发抖。身强力壮的儿子，背着他们的白发老母亲，有的在儿子背上哭哭啼啼：“你带来的好下场！可不比在老财手下更遭殃。死在外边，落不了屋呀！”

怀抱婴儿的堂客对丈夫发火道：“看吧，奶水干了，伢子快死了，这是你作孽搞的好下场。看吧，伢子哭得都没有气了，跟红军闹革命带给我们的好下场！”

人们在妻儿母女的号哭怨言下，背着他们的沉重负担，一路跌跌撞撞，沿着山路攀登，不时传出男人愤怒的回答：“你想回老财家去你就回去！不去，就闭住你的嘴！”其他的人默不作声，低头向着井冈山走去。

八月下旬，一个白军军官兵变暴动、脱离国民党、参加共产党的特大消息在艰苦转战的工人和农民的队伍里传开了。他姓彭名叫德怀。他带领五百人上了井冈山，为人民干革命，献身共产主义事业。

这个消息引起了红军队伍的激动，有很多红军战士在井冈山上亲眼见过他，并且听过彭德怀作报告。他是一个年青人，不过三十岁，个子矮，挺结实，剃着光头。他走路、说话、举止果断，生气勃勃。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妻子在长江某城市搞地下工作，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在山上住了几天，就被总部派往山北莲花地区，开展游击战去了。

正当红军在封锁挨饿、围困防守、处境极端困难的时候，彭德怀参加了革命的队伍。自那以后若干年月里，他始终是威震中外、艰苦奋斗，硕果幸存的、最有权威的中国工农红军司令员之一。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事家，一个共产党员，他的英名后来传遍世界。他同红军其他领袖人物一样，成为受苦受难被压迫者的英雄。他同红军其他领袖人物一样，被各国资产阶级报纸污蔑为“土匪”强盗和国贼。

浴血奋战的秋天过去，冬天来了。井冈山上大雪纷纷，冰冻岩谷。红军没有冬衣，人们穿一身破棉衣，冷得发抖。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饥寒交迫，样子越来越瘦。他们同饥饿作斗争，也同虱子作斗争。人们疲劳，有的死去，有的患肺病吐血，病魔缠身，但直到咽最后一口气，仍奋战不息。有的住在病院里，痛苦挣扎，难以忍受，不愿吃活命的粮，拖着病躯爬到无人处，自寻绝路。

红军战士们的家属，活像一具骷髅，慢慢地各处移动，有的悲伤，低头不语，她们以无限的同情和忍耐，照看伤病员。但是，也有怀抱死娃娃的女人，站在男人跟前抱怨不休。

尽管如此，住在井冈山下城镇乡村的白军却对井冈山上的红军怕得要死，惶惶不可终日。一到夜里，好象树底下，角落

里，黑地方，都藏有吓死人的魔鬼，使他们恐怖异常。夜里，一身破烂骨瘦如柴的人们轻轻翻下井冈山，发动袭击，杀死敌人，夺走枪支、粮食和医药；回山时背走自己的伤员和死者。突围中常把敌人的伤俘带走，安置在井冈山上的病院里，治好后放他们回到所在连队去讲红军为什么打仗。

共产党边区特委、红军参谋部、士兵委员会和赤卫队的代表们，在饥饿交迫阴暗的年终将近的时候，举行会议，面对失败投降还是打开生路，要作出选择。

决不屈服，投降问题根本没有讨论。会议代表制订了一项打破围困、发展革命、向赣南进军、扩大根据地的计划。朱德、毛泽东率领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和一个特别大队冲破封锁，引开敌军，向南急进，开展游击战争。彭德怀乘敌军被引开尾追之际，下山攻打宁冈夺取宁冈。

军事会议后井冈山红军主动出击，接应从北面哨口打过来的彭德怀。新的作战计划开始，立即着手行动。彭德怀带的一千人和医院里百名伤病员留在山上。水口山暴动队长宋铁匠留守山上负责红军兵工厂，但跟他上山的许多冶铁工人战士，则随朱、毛队伍下山作战。面容憔悴、枪不离身的朱德夫人吴姑娘也下山去。小司号员俞昆也在冲破封锁的先锋队伍里。

朱毛统帅的二十八团、三十一团最后作好一切准备，把几个月来从敌人手里缴获到的手榴弹，轻重机枪，炸药包等，都按山上留守和下山开路的人数分配。子弹也给每个战士照数分发。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下午，朱毛率领他们的一支先锋队，

取道白军以为人迹不至、飞鸟难越，只有野兽出没、没有设防的悬崖翻下井冈山，他们如狼似虎般机灵警惕、小心谨慎，寂静无声地翻越羊肠小道，入夜到山脚下。避开敌人据点，然后急速穿过地理情况瞭如指掌的每个山头、每道小溪，向一个乡村前进。

他们计划在天亮前赶到永新县城。但在一个村落被发觉了，土豪、地主鸣枪叫喊，惊破了黑夜长空。地主庄院墙上出现了熊熊火把，远处呼应烽火的烟尘点燃了。驻扎在地主院子里的白军士兵不敢出来，吓得发抖。来不及穿袍子的地主老财们，冲到院子里叫喊推拉那些士兵，恶狠狠地咒骂他们胆小怕死。

地主和地主婆子们大喊乱叫：“快！上墙去！快出去，打呀！”

匪兵们三五一堆站立不动，回答道：“要我们出去打红军，好，你们前面带路！”

外面红军加快步伐向前走，在烽火警报还没有来得及传播很远以前，他们已经来到永新城下。

早已作好准备迎接红军到来的永新工人和农民开了城门，带领红军直扑睡梦正酣、驻有白军的寺庙住房。

红军的炸弹、手榴弹从窗子洞上扔进去，顿时里面爆炸声响，板壁飞裂，白军乱作一团，暗中对打。红军接着冲向军械库房。工人农民帮助他们砸开门户，迅速把武器弹药枪支拿到了手。每个角落出现了成群结队、担挑箩筐装满大米的工农群众。当红军肃清残余白匪的时候，那些工人农民们推着粮食、弹药跟着队伍快速行动一起走。等到附近的白军闻警赶来尾随追击

时，封锁已经被粉碎了。

留守井冈山上的彭德怀率领他的队伍攻打宁冈。城乡老百姓纷纷响应参加，他们同国民党军队浴血大战，红军又占领了宁冈。

攻占宁冈为时不长。一星期后，三路军阀每路三个团的人马打回来了。红军、赤卫队和几百农民又撤退到井冈山上。

白军朝井冈山哨口活动，三架军用飞机从吉安飞来帮助他们攻山。

彭德怀据守通向井冈山的哨卡，浴血苦战打了四天四夜。但是，敌机狂轰滥炸阵地，工事受到破坏，于是决定王佐守山，彭德怀下山引走白军打破围困。

彭德怀率五百人翻下一个小山口，勇猛冲锋陷阵，打开了一条血路，向一个村庄发动猛攻，然后向南疾走。白军被调开拖走的不多，大部分人仍继续攻山。

于是，井冈山红军留守，王佐二十九团三百人转移到北面一个山头上，据险扼守。白军没有追上去，却向山上大小村落和红军基地猛烈袭击。

两天之后，当据险扼守的红军摸清敌人，对井冈山搞了一次突袭，已经撤下山的时候，下来回到旧日的根据地，他们心情沉重，忧心忡忡地往回走。他们清楚军阀部队洗劫了他们旧日的根据地，但见大小五井，八个村落化为灰烬，尸骨纵横，余烬未熄。

红军兵工厂被砸烂了，守卫机器的工人们倒在毁坏的机器旁边。军事训练学校被炸平了，弹坑遍地，瓦砾成堆，战士们快到有六百多伤病员的红军医院和传染病院的时候，加快了步

伐。他们站在医院的前面，大院一堵墙被推倒了，伤病员的尸体被压在下面，其他病房里病员们倒扑，头颅被敲碎，肚皮被挑破，口张睛出，断手缺脚，男女护理人员东倒西扑、被捅死在死者中间。

妇女队长滋梅，赤身露体，乳房被割掉了。同她生前一样双目晶莹，嘴唇紧闭。宋铁匠扑倒在地，头被砸碎了，身边倒着三个宁冈农民的尸体。旧衣破裤露出他们一双双手脚，同他们生前使用的梭标、长矛一样细长。在冬天的严寒中，冻僵的烈士们的铁青瘦削面孔，呈现出冷峻威严、宁死不屈的神色。

红军战士们在他们被害的同志们的遗体面前默不作声，静静地走着，他们的牙关紧咬，同死者一样僵硬发紫。朔风凛冽，一阵阵寒风吹过井冈山头，掠过瓦砾废墟，刮过医院病房，揭开死者的衣裳。天在震，地在动，呼啸怒号的寒风，吹不尽永世长存没完没了的哀思和遗恨。

第九章 九死一生

山雨欲来风满楼，巨变前后都有朕兆。红军来到江西南安府，接着到广东南雄县，那里出现了光明和黑暗。光明和黑暗交织投射到整个赣南地区，从井冈山斗争到大柏地战斗，从中国传遍世界。

暗影首先落在南安府的商人们的头上。

朱德、毛泽东统率的红军部队于农历腊月中旬即一九二九年一月进入南安府。有一个到南安作茶生意的富商在红军进城前几天梦见了地震，后来他说，南安作客惊梦地震，惴惴不安就去同他的密友经营鸦片生意的头号老板县商会会长说梦。但这位绅士也作了一个恶梦，他梦见他花了四千五百块大洋买的小老婆跟一个警察跑了。

事情更糟糕的是，他们还听说城外一座山崩了一边，地裂了一个大穴。还有一个地主土豪家里谷仓场上有母鸡打鸣，一个化作白胡子老头的狐狸精放火烧堂

屋等等怪事。

红军进城打跑了国民党驻军，在国民党援军到来前退出县城。南安县的绅士先生们回想起这些世道反常的怪事。红军进城后给商会会长一项命令，要他们负责对革命作出捐献，交出粮食、药品和贰拾万大洋。

“对革命作出捐献！”他们如此说。

商人们对这样的问题决定既不讨价还价也不拖延时间，只是鞠躬作揖遮掩他们浑身打战的丑态满口答应：“不要客气，你们要啥就请动手！”

红军没收委员会在这种招待气氛下就不客气自己动手了。商会会长直到临终咽气时也忘不了：红军发现了他的鸦片藏库，搬走那些宝贝储藏，放在露天底下当众烧掉了！成千上万的市民们甚至参加露天大会为红军讲话人欢呼喝采。红军走时城里有些青年游民跟着走了。

商人资本家奔走相告，说什么这类可恶的事件只不过是中國彻底毁灭的朕兆。难道这类事件不是过去改朝换代的前兆么？当“一文不值”的工农贫苦大众津津乐道商人资本家的损失，把他们对红军说“不要客气”作为笑谈的时候，难道不是黑暗已到尽头光明开端了么？当被嘲弄的傻瓜游街示众杀一儆百的时候，就能天下太平伸张大义么？难道白军官兵洗劫城市抄查教师的家、没收有关共产主义的红皮书就完全在理么？学校教师走投无路逼上梁山，否则他们不也会成为杀一儆百的样板么！

这支红军在工人和某些白军士兵的帮助下接着进了广东南雄县城！阴影又投射到南雄县城富豪绅士们的头上！

假如南安府的商人们在红军未到以前作过恶梦的话，那么广州香港的各国外交官们后来也有过他们的恶梦。因为当拿下南雄的消息传出的时候，那些外国绅士们议论纷纷，事情一团糟，“赤匪”敲打华南城市的南大门了！

“这个国家需要什么？二十万美国警察！”一个美国领事馆的小职员激动地说。嘴上的红毛胡须颤动着。

一个很有仪表体面的英国外交官纠正他的说法，冷冷地挖苦道：

“这个国家需要什么：二十万外国军队！南京政府搬二十万外国救兵来恢复法律和秩序——南京政府负担军费，当然啰！”

两个绅士先生在桥牌桌上彼此冷嘲热讽，但话头一转到中国的大小军阀，两人就满有意思地质问广州国民党当局：

“赤匪还没有剿清，这究竟是怎么搞的？你们的一切许诺是什么？保护外侨的生命财产怎么样了？我们在南雄的不在南雄的传教士会怎么样？”

当外国干涉作为问题提出来辩论的时候，传教士总是在适当的场合出现。

广东军阀赶忙派出增援部队到南雄去炫耀兵力，军队里的国民党政客们暴跳如雷道：

“我们的军队没有屁用！南雄我军比共军多两倍，可是一败涂地，逃之夭夭！有的居然把他们的枪支弹药卖给共军，卖给南雄的工人！有的中下级军官什么都不干，只是站在一旁袖手旁观！现在成百上千的工人跟土匪跑了！”

军阀又占据了南雄县，许多白军士兵和一批中下级军官被

逮捕枪毙，罪名是帮助共军，工人和知识分子被当作嫌疑分子在大街上砍头示众，南雄县像发生了瘟疫。甚至在遥远的华南广州市，农民躲避得远远的。警察出动搜捕工会和学生会，抓走男女青年学生，从此下落不明了。

“青年一代彻头彻尾被共产主义思想毒化了！”国民党政客们痛心疾首地喊叫！

军阀们派出西装革履，会说英语美国口音重的秘书到外国领事馆那里去再三解说：“赤匪大败，溃不成军，残余股匪正在围歼消灭中。”可是外国领事先生们对这类陈词并不入耳信以为真。

外国报纸通讯记者不管国民党这类保证如何，却整版继续报道“赤匪”屠杀工人和农民，某次战斗在打死的共匪中发现有苏联军事顾问的尸体等消息。中外报纸一再追问共军的枪支弹药不是从苏联又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打仗不是某某白种人充当指挥又是谁带兵打仗？他们的“亚洲赤祸”一类文章刊登在第一版上，救世良方莫过于一古脑消灭苏联。

这就是中国工农大众起来奋斗英勇作战的时候笼罩中国和整个世界的一些阴暗面。黑暗，对谁来说？光明，对谁而言？

但是朱德、毛泽东统帅的红军，这时正在赣南一带猛烈苦斗，浴血转战。国民党军阀装备优良，不断增援并且经常增援新的国民党军阀部队，从四面八方围追堵截这支红军队伍。

红军连队的弹药差不多消耗光了，许多枪支损坏了，人员伤亡增多了。他们横扫赣南边界一带。那里丛山起伏，峰峦层叠，山大沟深，涧谷纵横，茅屋人家与世隔绝，鸡鸣犬吠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那些村子里老百姓对外界一无所知。红军

连队从他们那里很难得到白军活动的消息，也没有时间在他们中间开展革命工作。

红军部队穿过赣南山区，急速行军翻过积雪皑皑的山谷，他们走过村庄，那里老百姓的房屋用石头堆垒，茅草搭棚，没有窗户，门洞低矮。茅屋里面，一堆稻草当床，几块烂布当被，臭虫跳蚤滋生，瓦罐炉锅撑上三块石头作饭。漆黑的屋角落里，摆着一把旧锄头，一把砍柴刀，间或有一把镰刀，一条竹扁担。屋里有一盏小玻璃罩鸦片烟灯和一根鸦片枪。这一带乡村出产鸦片烟，所有山地都种鸦片，统归住在附近城镇的地主所有，地主老财通过经纪人收租收鸦片。农民的个子矮，骨瘦如柴，没有穿的，一身补丁加补丁的破衣，蜷缩在屋角里，季节暖和方能出外。有的村子全村人户如过山老鼠见兵就逃。红军战士们有时住在那些悲惨的茅屋里晚上谈论：“瞧吧，那些剥削者，吸血鬼对我们老百姓造了多少孽！除非我们打到底，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家，不然全中国都像这个样子……，孩子们那副可怜相，你看见吗？我们说的话老乡们有的竟听不懂。”

一路行军中连队的伤病员不断增加。重病号骑在攻打城镇从白军手里夺过来的小牲口身上。整个连队变成了虱子、邋遢军，有的战士通身搔痒，遍身血斑。天天行军，一天行军至少九十里路，走过艰难困苦可怕的村庄，盼望能到人口稠密的乡村，开展群众工作，得到老百姓的支助。荒山野谷，冰地霜天，沐雨迎风。一到晚上战士们饥寒困乏，痛苦难当。人们病倒，靴鞋破旧，草鞋扔掉，有的光着脚板走路，有的用布条拿草包住脚。他们的脚变黑了，由于日晒雨淋，长途行军瘦得像鸡爪子。

小司号员俞昆在新丰县同白军一次小仗中脚受了伤，得到一匹小马骑。朱德夫人吴姑娘面容憔悴，看样子她再坚持行军就会垮了。可是她不说什么，只是背起她的背包，同男同志一样行军，老是警惕着，白军靠近时就开枪打。毛泽东身材高大颧骨深陷，一双眼睛熬出血丝，咳嗽不止，鞋子跟别人的一样破烂扔了，光着脚板走，腿脚都磨破了。

一个伤兵骑在马上，天天愁眉苦脸地盯着毛泽东。这个伤兵是一个贫农，以前井冈山王佐部队的一个老兵。毛泽东这个书生在他眼里几乎是一个超人。有一天行军，毛泽东挨近他的马时，他说：

“毛同志，我不过是一个笨蛋，死在路上算不了啥，可是我骑马你走路。看你也有病，你来骑吧，我们需要你帮我们思考问题。”

毛望着这个战士，说：“不！你不会死在路上的。我们活着一起战斗，也要一起思考问题，我们在一起就使我们成为同志和共产党人。”

还是这个农民战士骑马，每到一个地方休息下来，他就要费劲地为毛泽东的脚找些什么东西，收拾干草，向农民乞讨要些破布烂片或草鞋。然后把东西拿到毛的跟前硬要他穿上。

红军就是这样的艰苦转战，走走打打，熬过赣南地区整整三十个日日夜夜。遇到白军打得赢就打小仗，避开强大敌人，有时把敌人诱到山头进行袭击。走过一座山头又一个村庄，遭遇敌人就拼，成千的人牺牲。剩下几粒子弹战斗不止，跌倒在地，毫无怨言，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有气无力地还在唱国际歌，以安慰自己的心灵。在整整三十个日夜强行军战斗中，没

有一个开小差、当逃兵的，没有一个当叛徒的。战士们的嘴里流露出刺耳难听、感人肺腑的简单语言，胸怀着惊人的坚强信念，恨透了国民党、地主和军阀的凶残，超出了毫不怕死的范围以外的深仇大恨。这种深仇大恨，气吞山河，浩浩荡荡一路横扫千军，吓得地主资本家发抖，望风逃窜，使得国民党部队谈虎变色，怕的要死。一提到这支部队就说“红军是不知道怕死的野人。”

二月中旬，红军进入一个地区，那里的工农群众十分惊奇，万分热情早已等待他们的到来。这个地区有一个名叫大柏地^①的地方，他们遇到了国民党一个师，战斗不能避免，红军进行了赣南人民心中永世难忘的有名的大柏地战斗。这一仗发动了这个地区的群众，积极投入反对国民党地主军阀的游击战斗。

战斗于头一天下午三点左右开始，到次日近午结束。数以百计的农民工人拿起梭标、锄头、斧头和一切能够弄到手的东西纷纷参加红军连队。第一天战斗结束前，农民妇女和儿童给红军担送热菜热饭。

战地菜饭的味道是那么香甜，红军战士们从来没有尝过，勤劳妇女的双手端起冒着热气的饭碗是那么动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生命诚可贵，革命一定胜利，以往他们从没有这样的体会！

注^①大柏地小镇名，位于江西瑞金以北约五十里地方，1929年2月9日，朱德、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红军到达大柏地，2月10日与国民党激战一天，歼灭了敌军两个团，俘虏敌团长肖致平、钟桓等八百余人，并缴获很多枪支弹药，取得了进军赣南闽西的首战胜利。

红军部队有数的子弹很快耗尽了——白军知道这个。但是红军战士们和老乡们发出革命的怒吼向敌人猛扑，指战员，担架员，能够拿起石头的每个伤病员以及战场上的农民老乡们发出革命的怒吼向敌人猛打猛冲，投入战斗。他们用枪托，用棍棒，用投石、梭标、大刀同敌人顽强作战，朱德夫人吴玉兰打完她最后的四粒子弹，接着就同敌人拼刺刀。一颗子弹不幸打中了她，她摇摇晃晃倒下，接着她又站起来打，当另一颗子弹又打中她时她倒在地上，她把手里的枪赶紧交给身边的一个同志，那个同志赶紧接过枪去。因为红军纪律不许可把武器落到敌人手里。人们上来把吴姑娘背下阵地。

战斗猛烈进行，一直打到天黑。夜幕来临，黑暗对红军有利，在夜幕掩护下突围，收捡枪支弹药，向白军士兵喊话，高呼革命口号。

第二天太阳升上高山的时候，近八百条敌人的枪支子弹和许多白军俘虏落入红军手里。多少里地以外的农民拿着一切能够打仗用的家伙来了。

红军部队正准备发起最后总攻击时，使他们惊讶莫名，更使白军惊恐万分，一座山头上喊声大起，出现了几百面红旗。几百面红旗迎风飘展，越来越近，象是红军正从敌人后翼上来了，红旗来的方向同时还有黑压压的一群人，持枪端械，摇旗呐喊，敲锣吹号，鼓噪前进，直逼白军阵地。

红军各连队立即发动进攻，敌人迅速撤退，数百面红旗在阳光下招展，敌人吓得屁滚尿流四处奔窜。白军二、四两个团拒不撤退，携带枪支弹药投奔到红军这边来了。战斗于正午时分结束。获得胜利的红军连队，两团新军和俘虏兵以及农工

群众在欢乐声中走下战场。几百面红旗手走下山头来到胜利者中间。这支红军主力并不是什么红军。旗手们都是妇女和儿童！原来附近村庄的妇女和儿童知道红军处境险恶，于是设法为红军出力，妇女和儿童撕开各种红布红被面连夜赶制了几百面红旗，又搜集了一切能够发出震响的铁器、棍棒、煤油桶当作武器。十万火急地爬上山头挥动红旗，浩浩荡荡，鼓动前进，造成一支红军增援大军上来攻打敌人后方的错觉。她们想方设法帮助红军的计谋成功了，对白军的溃败她们帮了大忙。

对红军战士们说来，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也是一次悲壮的胜利。因为，大柏地战斗后红军各连队首长们清点了他们的人数。当他们打破井冈山围困下山向赣南闽西进军的时候还是四千多人，又在南安府和南雄县扩大了五百多名参军的新战士。但是，经过三十天急行军和一路转战，在大柏地一场恶战后，部队原来的战士仅有两千过一点了。连队多一半人不是在作战中牺牲就是在途中伤亡了。

大柏地战斗后敌我双方成百上千阵亡将士的掩埋安葬，成为一次激动人心震撼山岳鼓动工农伟大的群众示威。

挖了长长的墓坑群葬死者，并排摆放着烈士的遗体。红军总司令朱德夫人吴姑娘安眠在这里。她的身边摆放着骨瘦如柴眼睛凹陷的贫苦农民、挑夫苦力，面容憔悴的北方路工，紫黑铁青的湘东矿工，广州兵工厂的工人，广州香港的海员，来自长江一带的文弱书生。这里庄严肃穆，静静地安埋了红军战士，中国人民英雄的优秀儿女。

在黄土掩埋死者以前，红军战士们讲到烈士们的战斗事迹，讲演者肃立，他们的伤口裹着血迹斑斑的破布，刻划出一

副中国人民奋斗不息的场面。他们讲到群众的苦难，国民党地主资本家和军阀对他们的残暴剥削和奴役。他们讲到共产主义，讲到为了建立一个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一个劳苦大众自由政府。而牺牲的这些死者和这个女同志，他们为了人类最崇高的事业而死，为了解放祖国亿万劳苦大众和他们自己而奋斗。英雄们死了，知道群众会挑起他们遗留的重担继续斗争的。

讲演人讲话完了，他们号召工农成立他们自己的组织，开始革命斗争。白军俘虏们和红军新连队战士们撕掉服装上的国民党臂章符号，军帽上的国民党蓝白条带。从农民妇女那里要来红布撕成条条系在左臂上。农民老乡和孩子们在长袖或脖子上用红布条系着当领带或臂章。纷纷议论要求成立赤卫队，搞到枪枝武器。

数千男女长长的行列走过空旷墓坑，望着死者的面孔。消瘦枯槁的伤员蹒跚走过，停下来和他们的亲密战友、同志、兄弟告别。有的如对亲人好象死者有知听他的倾诉：

“韩新！”一个头上绑着绷带、一只受伤了的手插在口袋里的湖南矿工哭喊道：“韩新，我在这里，韩力夫在跟你讲话呀，你记不记得我们在水口山头一次罢工战斗？那次斗争，人家杀了你的儿子，也杀了我的儿子，我们打仗，我们在这里！我来看你呀！你看看我吧！我们一直要打到底，明天我们再打，后天……”人们把他架走，不让他再见他的死去的战友韩新和其他战友们的面孔。人们鱼贯而过，有的高喊：“打倒国民党！……枪毙杀人犯！烈士们永垂不朽！……”

朱德、毛泽东和参谋部人员检察了死者，朱德在吴姑娘的遗体前肃立默哀，他面容消瘦，衣着褴褛，眼窝深陷，一双赤

脚还流着血。投奔过来的白军士兵们，盯着这个革命军队的总司令，把他同穿着讲究、肥头大耳的白军军官作对比，他们看到朱总欲言不语，俯首伤悲。也看到他站在他夫人的遗体前，瞑目皱眉，攥拳顿足，然后见他鞠躬到地，捧起一把黄土，把它洒在吴姑娘遗体上，接着他把黄土洒在她旁边的同志们遗体上。

行进中几千人的行列不时停下来手捧黄土洒在死者身上。他们用他们的一双手掩埋了自己的战友。黄土堆垒，大柏地一道长长的丘陵供后来者凭吊英烈。

举着红旗的红军战士站在墓地的两头，红军各连队唱起了国际歌，司号员们紧靠墓地集合吹起军歌，首先似乎是在对死难的烈士，然后好象是对在场的数千活着的老百姓和红军战士在吹，奏战友安息起来的安魂曲。人们生平第一次感到听国际无产阶级国际苏维埃就一定要实现这首战歌，踏着先烈们战斗、安息的土地，背负起烈士们未完成的遗愿，共产主义的理想武装起来的奴隶们一定要把它实现。

大柏地战斗和一切有关这场恶战的消息在群众中迅速广泛传开，到处说唱。农民妇女和儿童打败白军参加红军，农民青少年成立赤卫队，谁有刀枪长矛就能赶跑一切白军等等的传说故事广泛传播。他们赶走了地主土豪，大家谈论工农少先队，青年团和苏维埃。他们谈论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要站起来！

四面八方的农民和工人都在听着。当红军和共产党的宣传员到来时，他们迫切要求知道组织起来进行战斗的方式方法。

红军部队从大柏地开始，满怀信心向着兴国东固山城堡垒

进军。那些山城一带群众已经起来解除了团防局团丁和一个白军团的武装，组织起他们自己的赤卫队。他们在一个高山地区建立起革命委员会，控制了整个兴国地区，甚至周围一带城镇。红军得到传闻消息：一个混杂有地主商人的儿子在内的知识分子小组参加了暴动。

红军迫切需要一个治疗伤员、整编部队的休整地方。人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地走向山地堡垒，他们在白天里行军，红旗迎风招展。大柏地战斗后，所有小股白军、民团、大小地主在红军的面前作鸟兽散奔，农村老百姓如大旱望云渴待迎接红军的来临。

第十章 红色堡垒

在东固和兴国地区的西面和东面，北到吉安城下，穷苦的农民老乡们抬头望着屏障东固兴国地区的崇山峻岭说：

“山那边就是东固。”“兴国就在那边。”

人人心领神会，因为山区那边的农民和工人发生了暴动，把国民党驻军、土豪商人资本家挨户的武装解除了，武装了自己。并且他们穿起了那些先生们的长袍马褂，撕下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升起了斧镰的红旗，扯下了国民党制服上的蓝白徽章，戴上了印有镰刀、斧头的红袖章。

两个山区革命了，赤化了，共产了。四个新的工农红军团队守卫着通往山区堡垒的每个险要山口。一九二八年过去，一九二九年二、三月间，山区共产党积极开展工作，这一带地区东到龙岗的工农兵群众纷纷起来打跑了白军和民团，游击战争的烈火到处熊熊

燃烧，工人农民拿起大刀、梭标和缴获的枪枝英勇战斗。沿赣江大河以西直到吉安城的整个地区，农民和国民党军队之间不停的在打仗，这个地区赣水迢迢，群山神秀，出了一个雇农出身的游击队女领袖，名叫康克清。这个名字遐迩传遍，也是万千贫苦农民的战斗呐喊。她是当地优秀的游击队领袖之一。

一九二九年二月下旬，朱德、毛泽东统帅的红军紧接大柏地战斗胜利后向东固兴国地区进军，这时国民党军队盘据地区的农民开始行动，秘密开会。

红军快来时，他们攻打白军；红军来到时，城乡都在工农和少数知识分子手里。幸存下来的胜利者是凶狠粗暴、沾满血跡，总是毫无心情庆祝胜利的。

他们要的是武器和武器，武器就是一切！他们知道红军同他们一起的时间不可能长，他们必须作好准备对付敢于打回来的白军。

红军可以把他们节省下来的枪支给当地工农群众，留下不多几支枪支并传授使用方法，然后向东固和兴国地区前进。

于是，红白斗争的故事又会重演。村子里的武装赤卫队同白军打仗，新的伤亡成堆，妇女儿童遭劫，农民赤卫队退到山上。白军占据城乡。农民晚上回到自己的家乡，狠狠准地打击敌人。战斗在进行下去，城镇乡村相互易手。

龙岗镇离东固不远，仍在群众手里，有一个工农兵团固守。过去国民党县太爷的衙门口，飘着一面红旗，城里家家户户门口挂一面小红旗。

二月下旬，红军到了龙岗，工农夹道欢迎。群众大会上，旗帜如海，矛枪如林，人声鼎沸，一片欢腾。农民妇女也拿着

梭标在欢迎红军的露天戏台上登台讲话了。

拂晓前，红军向六十里地以外的东固前进，围绕东固四周的高山峻岭，峰峦层叠，宛如锅釜覆盖万山洞岩。走大道上东固要翻一座大山四十里高名叫九层岭。当地老百姓有一句话形容它：九曲十八弯弯到东固山。九层岭山上直走东固，九层岭山下村名龙丰。兴国东固地区的红军队长卢绍舟带领的欢迎红军代表团男女代表早在村边等候。卢是一个年青能干的人，黄埔军校学生，大革命初期在广州受过军事训练，是一个共产党员。

卢为红军带路，翻九层岭，在每层岭上停留休息一下。山路弯曲陡隘，悬崖峭壁，树木参天，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除非内部接应通敌，一夫当关，敌人难破这道山口。

卢讲到通往东固山城堡的其他山口。北面偏西一个山口面对赣江上的白军把守的吉安城，大路好走，但东固兴国赤卫队在山脚下挖了宽二十英尺、深二十英尺的四条弯曲的壕沟，沟底钉满楠竹桩，上端尖、下头浸过桐油可以防腐，上面铺盖一层薄薄的树枝杂草。让军阀们进来吧！有一连人把守这个关口，十万强敌也插翅难过。

龙岗镇有五六百户人家，镇后一座大山，前面是一条两丈多宽的小河，河对岸是一座坡度不大的小山。它的西南数十里是兴国。

大山西面有一个小山口，羊肠小道，艰险难走，可通山路。下走赣江西岸整个游击地区，国民党还在那一带地方发号施令、为非作歹，但赤卫队暴动风起云涌到处游击。康克清带领她的贫雇农赤卫队就在那一带打游击。领导者不仅她一个，

还有贫雇农长工。城市下来深入赣西山区、宣传鼓动、组织武装作战的共产党员。他们脚穿钉掌竹根草鞋，走羊肠小道、翻山越岭，国民党军队始终攀登不上那些悬崖绝壁去跟踪追击他们。

东固南面山口石门坳是东固镇山区的铁门坎。翻山过去，路隘林深，下到岩底极其险陡，它远走兴国城。人们只有穿钉掌的竹根草鞋才能上下这条绝路。

在卢队长的带领下，红军翻了将近六个小时才到达九层岭东南的山顶。战士们俯瞰四周，龙蛇起伏，峰峦重叠，周围百十里地如覆盖一口大铁锅，这就是形势天险的东谷盆地。锅底中央便是东固镇，村落棋布，人烟稠密。有五六百户人家。镇后一座大山，前面是一条两丈宽的小河，河对岸是一座坡度不大的小山。景物如画，镇上一排新房，上面飘着镰斧红旗。

不过，这时革命地区的核心在东固南面数十里的兴国一带。兴国县城座落在一个广阔的高山盆地，环城三四十里外都是大山，赤卫队武装战士防守森严。佛教寺庙和道教观堂，以及地富官宦人家的宅院祠堂都在兴国山上和东谷接界的森林地带。生活在东固镇区的五六百户人家主要是贫苦农民，也有一些地主，但是兴国地区比东固人口多数倍。东固在暴动前没有学校，起义后战事方酣，群众顾不上办学。但在兴国却有许多学堂，一批知识分子创办了一所有名的兴国中学，这所中学曾是组织暴动起义的中心，卢队长便是组织暴动的领导人之一。

兴国地区固若金汤，群众中蕴藏着革命力量，坚如磐石。红军很快发现这里地利人和。可是并不百事如意。红军领袖们问到相互之间的隔阂磨擦时，人们坦率承认原因在于地主。暴

动后本地区还有许多地主，有些地主的儿子和亲戚参加了暴动，在农民协会里、在兴国东固红军中担任了领导职务。许多中小地主装作一副贫农的样子，自称是富裕中农。土地分得不适当，地主的财产原封不动。确切原因在哪里群众讲不出。暴动以后如何分土地？有的说该按人口分土地，每个人生来平等平均分配是原则。没有人能搞清楚。大地主同意这个，因为他们家大业大、人多势众，照旧可以保留产业，中小地主甚至可以分进土地。这种分法虽不完善，曾经试过，但在农会和兴国东固赤卫队中的地主当权派却从中阻止，不许没收和分配他们的土地。有的只准把山上坏地分出，良田留给自己。为什么田园寥落，土地荒芜？因为过去耕种那些土地的佃农长工现在拒不种田，他们要有土地，分不了地他们就到暴动队伍里去。

现在怎么办才好呢？老乡们问。陈铭传和李文林这类人物权势可大得很。他们一对宝贝都是大地主的儿子，可是他们唱高调，说大话，空谈革命。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但都偏袒地主；陈是东固赤卫军团的一个团长，李是兴国赤卫军团的一个团长。暴动中都打过仗，大会上都讲过话。贫农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可是他们分到的土地很少，照旧无立锥之地。

陈铭传是一个大块头，养尊处优，生活富裕，三十不到，一脸大麻子，能说会道，同狗一样汪汪叫，写文章又长又臭，狗屁不通，作报告，说东说西不知所云。喜欢引证外国作家的辞句，为他的思想观点作辩护。群众站在这样一个博学先生面前目瞪口呆，感到望而生畏，敬而远之。听陈说国际大事，世界各国革命的道路。然而他们相信他，因为白纸黑字如此写着，那样云云。可是他家的土地却原封不动，人们也只好听之任

之。陈在上海一个教会学校读过书，反革命开始后他参加了共产党。

“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期间做一个共产党是赶时髦、出风头的”，他话带讽刺地讲道：“但是在反革命开始以后参加共产党的人们是有觉悟的共产党人！坚定信仰的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

老百姓记得陈是在反革命开始以后入党的，当然他肯定是一个勇敢的人，有坚定信仰的人！

李文林可也有他自己的一套高论。他是地主少爷，大革命时期在汉口当学生时参加了共产党。不错，那时候当个共产党是时髦，可是反革命开始后他并没有脱党，甚至回到兴国东固地区参加了暴动。他有一段光荣的革命记录：他把他家近一半土地拿出来分了。然而，他家为什么要继续占有良田美地，象庙里的菩萨坐吃闲饭一事不做呢？贫雇农和工人们一谈起李家：“他们同木菩萨一样好吃懒作，跟冥顽不灵的神道一样傻得可怜！”

红军到东固后不几天，即召开兴国会议，主要解决土地问题，红军司令部和一连前往兴国，东固镇附近地区，所有群众代表随同前往，还有一个医院伤病员代表团和万安县农民代表团也出席这次会议。妇女队长康克清就在万安代表团里。她背一支步枪从不离身，同男人一样行动敏捷，作事果断，二十来岁，中等身材，短头发，穿一身农民妇女的青布衣裤。但是人们承认她一对大大的黑眼睛漂亮，两眼闪耀出智慧的火花和光辉，当她笑的时候红润的脸蛋露出两个酒窝和整齐雪白的牙齿。

她确实没有文化，因为她是一个地主的女奴隶，从小被卖给地主家当丫头，长年下地干活。虽然大字不识几个，但人非常聪明，提到她的人这样说：“她的思想同机关枪打出的子弹一样，清楚鲜明，直接了当”。康后来成为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对朱德说道：

“我们夺到了白匪三挺机关枪，我们不会用，教教我们！”

他答道：“我们懂得的都教你们……不过你要告诉我，万安那边象你一样的姑娘多不多？”

“多得很！”她骄傲地回答。“白匪现在不敢侮辱我们妇女了，我们抓住坏蛋兵痞就杀！”

她的声音清脆。这个女战士后来当了红军妇女志愿队队长，一年以后成为朱德的夫人。

兴国会议召开后，代表们到自己的村子去贯彻执行这次大会的决议。设在东固镇附近各寺庙伤兵医院的代表团回去传达会议精神。

他们报告称，中央革命委员会已经在兴国组成，它作出决定对整个革命地区的群众组织加强指导，选出了一个新的执行委员会，有二十七名执行委员，两百名工作委员。所有委员都经群众大会选举产生。大多数委员是贫雇农和工人，也有少数知识分子、红军战士和富农。会议虽然决定地主或地主亲戚不能担任职务，但在公开选举中他们相互提名有的当选了。有的富农也是地主的亲戚。

新的执行委员会成立六个部：军事、土地、财政、经济、劳动和妇女等。教育宣传方面当前人人最关心的是分土地问题，会上着重进行了讨论。土地究竟如何分配？根据什么原

则分？兴国会议上讨论激烈。新土地部作了研究，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地主或地主亲戚不得任命为贫协委员或土地部委员。但是，地主一类分子他们还在里面！

富农和地主亲戚在土地委员会里讲话了：

“是的，根据家庭人口分土地是错了的，因为育婴儿童不能耕种土地，老人也不能耕种。现在应该按照人们的耕种能力劳动力来分配土地。”

“好！好！”贫雇农委员也同意，会议如此作出了决定。

但是，贫雇农发现“耕种土地能力要依靠个人所有的牲口和农具数字。他们仅有一把锄头，一张木犁，也许还有一把竹扒。而地主富农却拥有牲口和农具。贫雇农又发现他们自己分到的土地比过去多不了一点。

地富们说“我们差不多拥有我们所有土地的耕种能力。”

贫雇农占农村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横眉冷对狡猾成性的地富乡邻。那些富贵高邻革命不离口，道理一大堆，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贫雇农对新的土地分配办法不满意。地富们就让他们读四月兴国土地法上规定的白纸黑字。的确！白纸黑字他们能看，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也说不出口！他们没有文化，不识字，低人一头，一双双黑眼睛充满仇恨的神色。土地法摆在那里他们又是赞成过的。

“土地委员会就是坏，红军就是好！”他们彼此说。

他们向红军领导人提出控诉，但红军准备启程去迎接一次新的战斗。

“把地主开除出会！”红军共产党书记毛泽东跟他们说。

我们不晓得怎样开除？如何开除，我们没有办法啊！”

“你们想办法清除他们，非开除不可！”

可是他们一筹莫展，执行委员会里有李文林、陈铭传一类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当权，他们说了算。红军正面临着一场大的战斗，指挥员们不能停留下来答应农民的要求。土地问题是搁下来得不到解决。

农民只好更坚定地握紧手中的枪矛，等待问题的最后解决。

这时国民党军阀正在苏区以外的长江和南方数省混战，共产党和红军总部赶快利用国民党军队撤出赣南的机会，发展革命，开展群众运动，宣传组织武装群众，扩大游击战争。

五千多东固、兴国地区的群众参加红军，积极投入这场新的战斗。朱德、毛泽东和总部人员负责统帅老红军战士和新志愿军去攻打地主军阀顽固堡垒吉安县城，然后向西南福建进军，横扫赣南地区，赶走残余白军，武装民众。

红军正准备离开兴国的时候，留守井冈山的彭德怀带八百战士从东固镇北面山口上来了。两天以后井冈山王佐指挥的红军余部也来了。

王佐是作为他一团的囚犯押解来的，他们到的当天就在他的团队和全体红军面前进行公审，他自己的部属对他提出的控诉是：

井冈山根据地被白军突袭破坏以后，王佐部队的战士们希望打下山去夺路去找朱毛红军。但是王佐断然拒绝，他下令部队留在井冈山上，打算重整旧业，干土匪生涯。他们枪毙了两个愤怒反对他的战士，带领余部烧杀抢掠了某个市镇。战士们攻下某镇的时候拒绝服从他的命令了，于是把他捆了起来，选出了一个新的指挥员，朝东固一路打来。在赣江某镇王佐脱逃投

奔白军，但在逃跑中被抓住，作为叛徒带到这里公审。

王佐默不作声，垂头丧气，他不进行辩护，对他的判决很快一致通过。红军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枪决。王佐的处决，宣告井冈山老土匪头子的终结。

红军司令员彭德怀奉命率领所属部队回井冈山地区，把井冈山重建为革命的根据地。

朱毛红军翻过北面山卡去开创新的长期游击战争。这支强大的红军，这时拥有一万五千人众，将近四千条步枪，一些机枪和数千长矛红缨枪。

以后若干年月，外国传教士，地主商人资本家和国民党军阀部队一提到朱毛红军，特别是红军的“赤卫队，”无不谈虎色变，吓得要死。中外各大城市，国民党的报纸通讯记者天天发出不怕死的“赤卫队神枪手”的惊人报道。奇谈怪论，荒诞古怪。报道说他们是农民，然而他们是被迫参加“屠杀千万农民和手烙镰斧标志”的农民，“赤匪把城市化为废墟，是屠杀民众的魔鬼”。

可是，岁月奔流，报道“化为灰烬”、“破坏无遗”的城市不时出现，建筑完好。红军确实在成长壮大，夺取城市。千万人倒下去了，队伍却越来越大，枪支越来越多，正是工农群众组成的这支红军被说成是屠杀“千万民众”的队伍。

一九二九年初春，东固兴国整个苏区群众和附近山区来的男女群众在东固坪地集合，热烈欢送红军去投入新的战斗，去打垮骑在人民头上的压迫者。

缝作几千套粗蓝棉军装的裁缝师傅们骄傲地望着他们的手工成品，他们在想，红军在成长象一支军队了。农民妇女和姑

娘们骄傲地望着每个战士穿着他们打的草鞋，背包上还捆着一双草鞋。

正在这个时候，东固群众中唱出了一支革命新歌，这是一支妇女们和姑娘们唱的歌，有的泪眼晶莹，边哭边唱道：

我送我的情哥去打仗，

劝声哥哥看清革命的路，

劝声哥哥要扫除国民党，誓把那压迫穷人的军阀土豪消灭光！

这支歌在山谷中回旋激荡，红军从北坡走下。歌声嘹亮，响彻云霄。它在战士们的心中回响着。

战士们在包围吉安城的时候，在唤起农民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时候，在向西挺进直指广昌的时候，这歌声在战士们的心中回响共鸣。经过几小时的激战，他们从云梯上登上城墙夺取了广昌，解除了白军的武装，把群众组织起来了。然后集中一切力量进入闽西山区，一路横扫城镇乡村，夺取较大的山城汀州。

第十一章 夺取长沙

年复一年，中国人民变得更加穷困。新旧军阀互相勾心斗角，翻云覆雨，为了统治中国不断发动战争。统治中国当中国的皇帝、甚至做一个角落的土皇帝这是历代王朝的传统精神！当一个大区的土皇帝，一个小人物穿上大礼服，唯我独尊，横征暴敛，把别人都踩在脚下，唯有他伟大，无止境地收税，成百倍地放债。做中国的主人，即使当一个角落的土皇帝，也想取得那些迫使整个亚洲倒在他们脚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中国的军阀政客能得到那些强大帝国的赏识是不可一世的。帝国主义的赏识带来甜蜜的大炮、汽油和军火巨额利润的香味。为了博得帝国主义主子的宠爱，军阀和政客奉上了鱼肉中国的厚礼：田园寥落，骨肉流离，赤地千里，尸骨山积，饿殍载道，工农妇女儿童甚至身强力壮的人们眼泪成河。军阀们把中华民族这个国家按倒在帝国主义主子们的脚下。

老百姓的年景是一片阴暗。一九三〇年春，甚至华中的谷仓鱼米之乡湖南也闹饥荒。那里有过天灾吗？没有。头年丰收，粮食堆成山。可是地主土豪资本家、军阀、政客一类统购谷米，把粮食通通收光了。

湖南省省会铁门城长沙，象一个被统治集团互相争夺的足球。湖南省主席国民党何键同各帮派集团相互勾结，坐收渔人之利，维持他的统治。长沙表面繁荣，实际生活，日子并不好过。它是湖南大地主、资本家政客、商业资本家的坚强堡垒。一个军阀夺取了省城，省商会就奉他一笔巨款，以求平安无事，照常开业。

付给争夺地盘的军阀的每一笔巨捐款都出在穷苦人身上，他们一成不变的给国民党湖南长沙省政府纳税交粮。每送一笔钱，工人收入下降，劳动时间延长。农民一年到头辛苦，一担谷仅值一两块，历史上罕见的。但地主商人一转手，一担谷价就提到十六到二十块钱。谷价猛增，同时物价飞涨。

长沙当局同其他省份一样，巧立名目，预征田赋，巧立各种名目，预征田赋捐，民国十九年就预征二十年新税了。婴儿出生要收税，死人棺材要收税，一个农民家里盘个灶收烟囱税，地里打口井要交水井税。有富人子弟能够上学，穷人子弟无法读书，但要出“教育税”。有何键及其心腹走狗的姨太太要汽车、要法国香水的“建设税”。还有达官贵人坐汽车兜风、逛窑子妓院修马路的“修路税”。

何键统治湖南，在军阀混战中骑墙中立，看风使舵，按照军阀派系送他的大洋数目表示对国民党南京统治集团“效忠”或采取敌对态度。他瘦猴脸，铁青寡白，“公子出身”。喜欢品

好茶，抽大烟，欣赏女人臀部的曲线美。他心如蛇蝎，能够亲身下手，敲骨吸髓，眼睁睁看别人痛苦挣扎开口闭口读经尊孔，不时到教会学校讲演，要学生弄通耶稣的谦卑教义。他禁止学生阅读社会和文学作品，谁反抗他的命令就拉出学校枪毙。他宣布《阿丽丝漫游奇境记》和《小红色骑士》一类书籍为禁书，不准流传，他在禁令中说：“苟人懂兽语，则人畜无别矣。”

正如一滴水反应整个世界，同样，何键其人也反映一切中国军阀。他把他的亲戚朋友塞进长沙省府机关和各县市衙门里，湖南军队里的长官不是他的亲戚就是他的故旧。那些大人先生他一律算作可敬的国民党同志，谁能枪杀一个批评他造他反的人，谁就是拥护他何键的可敬的同志。

一九三〇年早春几个月，大群饥饿的农民走进长沙跪在省政府衙门口要饭吃。但是各地农村的农民却不沿门乞讨而是起来斗争。他们打土豪斗地主，把地主扫地出门赶出乡里。他们把当地国民党衙门捣成平地，他们鞭打收税官吏，成立了无数的农民游击队。接连几个月各县市也发生了抢米风潮，城市饥民在鞭子刺刀镇压下被驱散、打死。

仲夏时节，遍地风潮开始威胁长沙省城。长沙东面有一条直通醴陵萍乡矿区的铁路，它的终点站在江西萍乡。萍醴地区的铁路和煤矿工人刮起了这场风暴。那里成立了一个苏维埃政府，虽然受到两次清剿破坏，但它的力量更加强大。彭德怀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一万七千人，其中一万人有武器装备正在这个地区集中。同时路工、矿工和贫农带领的赤卫队，农民游击队小组五万多人汇成一道川流聚集在三方面军的旗帜之下。

七月中旬，这支革命军队开始向长沙移动。一路象滚雪球一样进军，队伍越来越大，因为沿途总是有拿起斧头、梭标和一切他们能够找到的东西的农民纷纷投入到队伍里来，有的铁路工人驾驶送红军供应物资的列车同他们一起慢慢向西开动。同他们一起前进的还有那些在这个地区活动多年的共产党员、几千路工和矿工党的领导同志。

彭德怀率红军攻打长沙的消息，有如晴天霹雳吓昏了何键。这时何键坐在他富丽堂皇的公馆里，身上坐着一个长沙窑子里的美丽妓女，一面口述要求速拨军费、武器、军火、部队的请电长稿。请电主要内容是要钱，要军费。

接着他发表了一通告“中国民众书”和另一通告“长沙民众书”。声称“赤匪铁蹄”迫近长沙，华夏文明濒于浩劫，士兵半年欠饷，如能筹足补发，即可守住长沙。至于何键本人一介武夫，素不爱钱，不惜牺牲身家，誓与长沙共存亡云云。

富商大贾读了何键的告民众书，仔细盘算筹款的数目，他们能够掏出多少！同时，唉声叹气对他们的老婆太太们说：“收拾东西去汉口，我看何键要放弃长沙城了。”

不过，何键倒真的在长沙城四周架设了电网工事，派出了四个团的兵力去干他所谓的“消灭赤匪”勾当。

七月中旬四个团遇到了“赤匪”，三天后，只有掉队的两个团部分人马败回长沙，红军在城外四十里地方驻营。

何键发表了另一道文词典雅的告长沙市民书，增派四个团，骑着高头大马走在前面，真的出了城门朝红军集结准备攻城的龙里矶镇方面进军，博得了商人地主们的喝采。何键等一批军官迟迟其行，走到长沙城头隐约可见的地方便龟缩不进，

他们就落在后面了。在接近龙里矶数里路处同红军一个团遭遇，他的一个团整团人还没有接火就投降了红军，其他几个团土崩瓦解跟着逃跑。何健同剿匪司令部一行转身逃回长沙。他们的速度差不多同红军进军一样的快。

长沙在沸腾，三五成群挑着担子、背着包卷的人们涌进长沙城里，他们说是农村老百姓、兵慌马乱进城投亲靠友逃难的。但是一到城里他们就直奔地下联络站，放下包袱，把里面的武器收拾藏好。然后四处活动，同市民和士兵讲话没完没了，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各色工人市民群众，街谈巷议，人心在动。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八日这一天，中国红军和六万赤卫队、农民游击队，包围了长沙。八十年前太平天国军队的战士们攻打过铁门森严、城高壕深的长沙，没有打破它。但是身蒙棉被、手拿大刀的红军战士们斩断铁丝网，杀开无数条血路猛扑长沙城。

夜色降临，城内一片混乱，统治当局惊恐万状。据说省政府警卫森严，大楼前面，何健军队一旅亲兵架起机关枪向大楼开火，大楼着火，烟雾冲天。其他角落忽然出现了赤膊上阵的人群，据说是逃难老百姓的农民老乡们，工人小队同农民一起猛攻省市机关接管衙门。国民党官员把军队集合起来，士兵们大喊大叫道：“要打你们自己去打吧！”一哄而散。国民党官僚政客和许多商人认为，骚乱一阵，风刮过即息，等增援部队来到就会打跑红军。他们脱下袍褂，穿上穷人衣服坐观变化。但是其他数以千计的地主、商人、官吏、军官乔装打扮成普通老百姓的样子，席卷所有财物逃跑了。

风云突变，人心惶惶，长沙商会的头面人物，这时正围挤在何键周围督促他履行诺言去打仗，他要他们支付六个月十万块钱的欠饷。人们一走何键就脱下军装扮作穷人带着十万块钱逃走了。

何键军中一个团打开城门欢迎红军进城。彭德怀统帅的一万正规红军枪上刺刀，步伐整齐，浩浩荡荡快速走过长沙大街小巷。红旗漫卷象一片红色海洋，高建筑墙壁和城墙等处神话般地贴满了红军的标语口号。

红军占领了所有政府机关的房屋建筑，头天晚上红军同长沙市工会、农会、教育界代表彻夜研究，拟订接管方案计划。长沙划分为五个区，各区成立区委员会。全市成立一个工人民兵团和一个农民赤卫队，臂缠红袖章，领系红领带进行接管。他们成立了特别搜查小组，挨家挨户搜查地主资本家和官僚政客。

红军战士们在这天晚上放火烧了三座建筑物，这是红军进驻长沙期间经过再三研究唯一火烧的三座建筑。一处是监狱，一处是罪犯档案堆集如山的公安局，一处是藏有土地契证文书档案的民政大楼。

红军一个连队奉命去打开监狱。他们很快站在沉重的铁门前，围墙矗立，墙头布满防止人犯越狱的玻璃碎片和铁钉蒺藜。警卫狱卒看守打着灯笼火把领着红军战士走过潮湿阴森、不见天日的古老监狱囚室。

牢房地上躺着死后才打开镣铐的人犯。他们的衣服破烂不堪，满头满身虱子，瘦的只有几根骨头象饥饿可怕的野兽，入狱不久的囚犯，遍体鳞伤，辗转在地，痛苦不堪言状。

囚徒们关押久了，许多人的两只腿已经失灵动弹不了。他们抱着红军战士号啕痛哭，连声诉苦。给他们洗澡、理发、换上新衣，他们对监狱的恐怖生活一再讲个不完。

长沙监狱有五百人犯。其中政治犯三百多，他们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者。一切人犯得到释放后，红军战士和囚徒们一起在墙下埋置炸药，一把火把监狱化为平地。

七月二十九日清晨，锣鼓号声响遍大街小巷，人们通知市民去开群众大会。长沙市民早已停立街头，打着红旗等待开会了。

大会地点有三处，一个在省教育会坪列宁广场，一个在城外的飞机场，一个在城边的大草坪上。中国共产党，长沙工会和红军政治部的代表组成的长沙市革命委员会对大会群众宣读了一项告贫农书。宣称红军和长沙革命群众占领了长沙，其目的在于建立劳工政权。要成立一个湖南、湖北、江西苏维埃政府。一切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团体诸如工会、农会、妇联、青联等组织都要重新组织起来。已经改组的团体要积极活动。执行委员会将由群众大会选举产生。

宣言声称一切银行，交通工具，公司社团，外国机构以及一切地主军阀的所有财产将由长沙苏维埃统一没收。

第二天，人民团体选举产生的代表成立湖南省长沙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委员五百人。彭德怀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临时主席，任期直至全省苏维埃大会能够召开以前。

占领长沙第一个晚上印刷工人就接收了国民党的报社印刷厂，改组的印刷工会出版了唯一的一期创刊号，长沙《红军日报》。上面发表了长沙苏维埃十大纲领。

一、打破帝国主义枷锁；一切外国军队撤出中国领土领水，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收回一切外国在华租界和租借地。

二、一切外国银行和工业收归国有。

三、统一中国和承认国内各少数民族享有自决权。

四、彻底打倒依赖外国帝国主义生存的国民党政权。

五、成立中华苏维埃政府。

六、普遍施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人委员会管理工厂，社会保险，国家救济失业。

七、没收地主所有土地，分配给劳苦农民和士兵。

八、改善士兵条件。

九、废除国民党和军阀的一切苛捐杂税，施行收入累进税率。

十、巩固世界无产阶级的团结和苏联的团结。十大纲领最后说：“苏维埃宣告一切权力集中于工农兵苏维埃手里。”

五万工人在三天之内组织在长沙手工业联合会里，工人民兵师和工人赤卫队用国民党军阀军火库的枪支武装起来了，富丽堂皇的何键公馆改为工农俱乐部。

苏维埃成立了一个革命法庭，总部设在手工业联合会的大楼里，工作人员从工会执行委员会农民协会和红军里抽调。被工人民兵队和赤卫队捉到的三百个反革命分子送到革命法庭审讯。处决了三十五个有现行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其中一个是何键的弟弟，一个是地主商人的“和平维持会”会长，一个是官僚子弟学校的校长，一个是南京内务部湖南分局的局长。枪毙了一个在苏维埃粮食法令颁布后把粮食储存转移亲戚

家囤积居奇的富商。五个兼高利贷主的国民党党阀捉到后枪毙了，因为他们在七月二十九日纵火烧了一排小商人的店铺，意图嫁祸共产党，煽动小商小贩反共。一个地主被枪毙，因为他化装成穷人到处造谣惑众，说：“戴眼镜，留胡子，穿长袍的人都要枪毙！”长沙市商会有几个理事被革命法庭传讯，他们吓得要死。革命法庭主席是一个铁路工人，他指着他们说：“反革命先生们！几十年来你们靠中国的工人农民的劳动过活，发财致富，大革命三年来，到现在你们还支持反革命。现在应该改变一下了，长沙苏维埃政府命令你们对革命作出贡献，为什么拒不付款，你们讲清楚！”

商会的绅士们看着房子里警卫拿枪的红军战士。看来他们很讲义气，朝革命法庭庭长点头哈腰，鞠躬作揖，一再解释道：这完全出于误会。由于时间仓促，照顾不周，未能对革命作出贡献，不过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内心深处对长沙革命政府是情同手足的。如果革命大法庭接受商会捐赠给中国革命红军四十万块现洋一笔小小数目，则深以为荣。并且穷人的光景太坏，急需粮食度日，他们还有点积谷存粮，不知革命大法庭可笑纳不？

革命法庭的“主席同志”接受了商会先生们给红军的捐献，说道：“钱和粮由工人民兵师和红军单位派人随同先生们去取。完了以后诸位先生回来在临时新监狱里蹲下。”

一个赤卫队员在商会先生们走后，神采奕奕地环顾四周欠身向靠着法庭上的一个印刷工人说道：“老韩，你听说了没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印刷工人哈哈大笑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嘛！”

长沙苏维埃立即对谷米、油、盐三宗主食大减价一半，

每户每日定量采购。所有店铺都贴有营业条令，工人纠察队给所有店铺贴上营业证，巡逻街道，命令大商家开门营业。小商店老板们已经开门照常做生意。许多大商人鞠躬到地答应他们马上开店。可是奸商巨贾不但不开门，反而囤积居奇，把所有粮食暗中转移。商店的伙计向工人纠察队检举揭发，革命法庭办了几个大奸商，没收了他们的粮食。

长沙在翻腾。女工参加了妇联，强壮妇女参加了红军，青少年参加了青年组织，许多青年武装起来了，红军把夺到军阀队伍的枪支发给长沙郊区农村的赤卫队，并且把赤卫队组织起来。数以千计的农民四乡奔走，用大小船只装运米谷，沿湘江而下涌进长沙卖给红军。农民们混在市民中间，大讲特讲他们从来不讲的事。群众会上他们发言，闲着没事就在街头练把式耍拳术，博得群众和红军战士的喝采。

红军夺取了长沙，国民党和帝国主义顿时惊恐莫名，一片混乱，沿海沿江岸宣布了戒严法。汉口、上海、广州、天津的国民党和外国警宪动手大肆逮捕“嫌疑犯”。武汉三镇大街上成了杀人的刑场。每天从工厂、大学、商店抓到的人成批在汉口市上被枪决杀头。那些讲过要成立工会的工人在车间里被拖到工厂外边附近的山岗下枪毙了。进出旅馆客栈的客人一律受到搜查和盯梢。每隔半小时每家就有持枪的警察到里面盘查。穿着寒酸的旅客都要被搜身。跑堂的茶房走到一般穷学生或苦力桌子前面悄悄地打招呼说道：“你有什么东西，赶快给我。警察来了要搜身的，大家可要当心点！”

武汉三镇四面被革命的红军部队层层包围着。

外国的铁甲钢壳军舰这时正沿扬子江上行驶，吃水深的大

型军舰在江心抛锚下碇，把攻城重炮对准城市。从上海运来的英国军队准备登陆打退革命军队。外国的炮舰准备在国民党军队溃退时炮轰三镇，把武汉化为平地。如广州前例，武汉三镇在毁灭的阴影中，中国民众面临着一场屠杀的威胁。

各大城市的中外报纸，疯狂攻击大肆造谣，说什么红军大烧长沙，把一切外国教会、洋行所有居民房屋都烧光了。红军屠杀了几十万老百姓。长沙已无处女！红军奸污掳掠洗劫长沙，赤匪破坏中国文明，毁灭中国文化！

上海英国《字林西报》暴跳如雷地煽动报道说：“早在头面人物撤出长沙以前，下层阶级已同情红军矣，政府军队弃城而走，长沙红旗如海，传单纷飞，暴徒疾呼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开战！

如是得出这样的结论，唯有外国武装干涉才能拯救中国！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也处于混乱当中。这时党的主要领导人李立三命令武汉组织暴动，红军夺取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迅速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

在党内斗争中，其他党员不同意李立三的意见，认为全国武装起义和夺取武汉三镇将会导致历史上的极其可怕的一次屠杀，革命高潮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因为帝国主义军舰不但会从江中炮轰三镇，而且会在各地登陆来维护国民党的统治。李立三的主张被否决，共产党决定等待时机。

共产党作出这个决定以前，美国、英国、意大利、法国、日本等国的兵船就顺湘江而下长沙。它们驶过岳州向北开时，受到江岸农民和工人的攻打，步枪子弹打中舰身钢板，但不能命中要害。兵舰回炮乱轰，土地开裂，房屋震毁。

红军政治部发表告长沙市民众书中说，中国人民正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毁腐败无能万恶的国民党，全靠帝国主义支持的傀儡政府，骑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帝国主义分子公开援助中国人民的统治者和剥削者，他们狼狈为奸，互相勾结。苏维埃革命现在正面对着赤裸裸地镇压中国人民大众的帝国主义。长沙民众必须走上战场，同帝国主义作战。

长沙地区湘江两岸的民众妇女儿童纷纷响应红军的号召，积极行动起来，沿江布阵，巡逻防守。红军战士在长沙城下湘江岸边，挖筑战壕，修建防卫工事，架设大炮和机关枪。数以千计的老百姓把石头推入湘江，以为推石塞流可以拦阻外国军舰开到长沙城下。

七月三十日下午，以美国军舰“巴洛斯”号为首的各国军舰在长沙城下摆开，开炮轰打长沙。房屋建筑，沦为废墟，全市起火。

红军工人纠察队、赤卫队和农民游击队从铁路网障碍物和防卫工事里，从长沙城墙上，从河边开阔地方，坚决抵抗，英勇战斗。许多战士从来没有见过军舰是什么样子，他们的手枪步枪打到军舰上丝毫不起作用。而舰上的机关枪向岸上扫射，队伍死亡甚多。红军希望天黑以后派出敢死队泅水到江中去打军舰。用他们的血和肉去拼掉帝国主义强盗的钢和铁。

晚上，志愿泅水攻打军舰的敢死队员们趁军舰上的探照灯光间隔一阵的时间，以腹贴地爬到江边悄悄下到黑暗的江水里。他们手拿刀枪，要打倒帝国主义！当探照灯射到水面，发现了游泳的人们时，机枪扫射过来，江水里面飘浮着战士们的尸体。

五天过去了。差别悬殊的战斗继续进行着。红军坚守阵地，伤亡近万。江中五艘外国军舰，这时又增加了两艘中国小军舰。这两艘小军舰在难兄难弟外国军舰的掩护下，遵照主子号令，炮轰长沙城的老百姓。

国民党军阀何键带了配备有重武器，外国大炮的三个师向长沙逼近，南京国民党另外三个师兼程驰援长沙。

八月三日晚上，何键企图偷渡湘江失败。外国军舰逼近红军阵地，大炮不断轰击。市内建筑中弹起火。何键军队在外国军舰炮轰掩护下，渡过湘江夺取省城。

这时红军带着几万伤病员和狱中释放的政治犯人，连同载重物资武器弹药撤出了长沙。

纠察队赤卫队的工人农民猛烈抗击何键攻城部队，直到红军全部撤出为止。工事里面尸体成堆，他们壮烈牺牲了，但是他们掩护了撤退。

何键派出两师人追击和用飞机轰炸撤退的红军，同时着手采取他所谓的肃清长沙共产主义的步骤。首先要求省商会拿出一百万块钱。他如愿以偿。接着他就动手杀人，每天晚上半夜三更里，他派出警察、士兵、资本家和地主挨户进行搜查，把共产党或嫌疑分子拉出去枪毙。军警宪兵在工人住宅区横冲直闯，把徒手搏斗的工人从工棚茅屋拖出来，凡是胳膊上有点红道的人抓住就枪决，宁可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共产党人。长沙城三周内刽子手屠刀霍霍，枪声不断，商界歇业，店铺关门，数以千计的工人逃亡，躲藏起来了。在三周白色恐怖时间里五千市民、男女青少年付出了生命。牺牲者并不全是共产党员。何键一派趁机消除异己，许多私仇对手，现在被当作“赤匪”枪

决失踪了。教授、学生、实业家、持不同政见者，均被一网打尽。接着何键翻印国民党政客的小册子，施行旧中国封建社会保甲制度，五户一甲，五甲联保，如果一户发现共产党或共产党嫌疑分子，株连五家满门灭绝。数以百计的妇女和姑娘们之所以被枪决，何键后来虚伪地狡辩说，杀以止乱，因为她们帮助过红军，而且不少妇女跟红军走了。杀一儆百，实属必要。

中国新闻记者和摄影人员在大屠杀中行动起来了。他们拍摄红军守城阵亡战士的照片。把何键及其死党杀害的千百群众照了像，把外国军舰炮轰长沙烧毁破坏的房屋建筑照了像，向全世界宣传报道，那些照片上注明着：

“赤匪烧毁长沙办公楼房遗址”、“赤匪占领长沙期间屠杀劳苦百姓尸如山积”。

他们把华北国民党军阀混战中烧毁的一座桥梁图片歪曲报道为：“被共军破坏的长沙近郊铁桥。”

外国人和国民党为长沙大屠杀喝采叫好。有一个驻上海的长沙大百货公司经理向南京政府打报告，要求何键立即停止对长沙百姓的屠杀。

“长沙实业界人士为什么会大发慈悲？”百姓惊奇地问，究竟为什么？因为长沙工厂的机器轮子不转动了。工厂徒工和几千家商店的小伙计都躲藏起来了。何键大杀共产党只不过是对于那些苦力、劳工开刀，而他们才是统治阶级权力和财富的依靠支柱。

八月中旬，红军总司令朱德统帅的红军一个连队前来同撤出长沙的红三军团会合会师。这时国民党派出几个增援白军师追赶主动撤退的红军部队，全省人民得知长沙大屠杀的消息，无

不愤慨。

红军停下来等候追军。白军几个师受到歼灭性的打击后逃回长沙。红军跟踪尾追直抵城下，又在白军堡垒铁门城前扎营。

何键这回采纳了外国顾问的意见，他在城周围安装了电网并通电流。城上架起了外国油亮发光的新式大炮，白军援军躲在城头安全地带固守。

红军攻城，一个星期无法突破电网工事，再次夺取长沙的企图无法实现，乃于九月六日撤到葵塘镇，希望吸引白军出城，在运动战中予以歼灭。

但是即使有飞机和洋枪洋炮作保护的白军也害怕挨打，不愿意同革命军队接仗。

九月十日红军二次包围长沙城，这回用农民耕田的几百条水牛在前面打头阵。农民们把浸过煤油的布条，桠枝缠在牛尾巴上点着后向电网工事赶去，发疯的火牛朝工事横冲直撞。

这个效法古代水牛阵的策略并没有打破现代化工事，经过两天激战后，红军主动自长沙撤退，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离开了封建帝国主义盘据、白色恐怖笼罩的长沙。沿途攻取了醴陵、攸县、安仁、茶陵和江西萍乡、吉安等县，向赣南进军。

长沙成为以后若干年月中，国民党在全国强化反动机器施行白色恐怖的口实。但是，长沙苏维埃政府发布的战斗口号，同广州公社的口号一样，在中国各地工人和农民心中引起了共鸣。南京国民党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装腔作势，一切伪装暴露无遗。这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一面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联军，一面是人民革命的武装。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革命

浪潮高涨的时候，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各地，格杀打捕无法无天。沿江沿海各大城市报纸报道帝国主义的警察同国民党党棍、帮派头目举行联席会议。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尸体乱摆在街头。

在华的外国人横行霸道，不可一世。他们在上海庆祝长沙大捷。一家美国杂志非常骄傲地为“巴洛斯号”炮轰长沙、夺回长沙评功摆好，大言不惭地夸口说：“从此我们不再听到南京当局提外国干涉中国的抗议了。”

其他外国人对美国人这种狂妄感到愤慨，难道他们的军舰没有参加屠杀革命的中国劳动群众么？好象打着美国这面旗帜，只有美国佬一家独吞中国这块肥肉似的！

但是，中国劳苦大众却亲身领教了帝国主义是什么东西。城市工人早就知道。穷乡僻壤、边远落后的农村老百姓也不再问“帝国主义是什么”东西了。现在他们知道帝国主义，说到底也就是国民党，国民党说到底就是地主、资本家、高利贷主。国民党、帝国主义挤在一起就是来奴役中国的劳苦大众，变中国为封建殖民地国家。

第十二章 传教士插话

上海天主教堂里有五个法国天主教神甫和四个修女坐在一起谈话。时间：一九三一年一月中旬。他们从江西省而来。去年十月五日到十一月底他们在江西当过中国工农红军的俘虏。

十月五日红军夺取军事重镇吉安，这几个传教士被抓起来了。他们当中的梯尔里神甫同一个朋友是第一天被吉安农民协会抓走的。他一想到吉安事变就非常激动。

他说，他和他的吉安天主教会的同事们非常不幸，十月里未能坐上国民党江西省主席鲁涤平坐的军舰逃离吉安。以前红军五次围城他们坐船跑了五次。他们以为这次围城不过是一场虚惊。前几次围城中有一回红军爬上了城头，在吉安市上缴了国民党一团人的械，带上枪支弹药撤退了。

谁能梦想到红军能够打破赣江边上城墙那样高，

而且河中停有军舰的大城市呢？即使他们驻军吉安城外五座山头上，如果城里没有内应，也是攻打不了那座城池的。鲁涤平不是发表过多少堂而皇之的文告，向地主资本家发誓，保证他要血战到底与吉安共存亡么？他在那些公文上签字盖章之后，便溜下赣江的私人座舰，夸下自己能够兑现他所谓的据坐军舰上炮打赤匪军的海口。

十月四日梯尔里神甫和另一个神甫到吉安市商业中心外，靠城墙边的一片稻田地方散步。城里的老百姓全是贫民连鲁涤平的士兵都心向红军，盼望解放他们，对整个统治阶级和所有传教士无不恨之入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而天父天主并不显灵，告知两个神甫，他们对民愤是毫无所知的。突然，一群农民把他们抓住，带到一间屋子里，那里居然是吉安农民协会地下总部。

“好呀，来了两个洋鬼子，外国鬼神甫，帝国主义特务！”一个农民盯着他们两个镇静地说：“你们诈骗穷人的钱太多了，现在你们出五万块钱赎金，我们就把你们放了！”

两个传教士在江西生活多年，一口江西腔，中国话说得很好。他们究竟如何回答，只有天知道。不过置身在远东殖民地中心上海天主教堂里，安全无虞，算得好汉。好汉不提当年勇，他们大谈特谈当时情况表现非凡，极其勇敢。然而毕竟心有余悸，谈话中间心情激动，有点发抖。他们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农民前来抓。一提农民就谈虎色变，世上只有农民最可怕，“农民恨富人，恨白匪，恨洋人，恨传教士，他们恨一切帝国主义分子！”他们解释道。

神甫大人们说“白匪”，“帝国主义分子”一类术语用不

着解释，因为在中国一切事情红黑分明，不难理解其中内幕。白匪就是南京政府及其一切代理人的同盟者和同情者的意思，帝国主义分子就是侵略霸道的洋鬼子的意思。因为全中国分为红与白两大阵营，作为白匪，中间缓冲的中间团体是没有的，传教士很清楚他们是站在那一个阵营，他们也是白匪，他们之所以被红军捉拿，原因就是这里。

农民这样说：“给我们五万块钱赎金，我们就放你自由”。

神甫们自我辩护他们是贫穷的虔诚的天主教徒。“我们为天主服务”，他们解释道。

农民们对梯尔里神甫的朋友说道：“你呀，我们听说过了，在欧洲大战里做过大官，那你就是一个大阔佬，你杀了许多老百姓，你赚了很多钱”。

传教士们还是极力申辩他们没有一文钱，他们的教会也无一个铜板。

农民象赶集卖菜一样漫天要价讨价，他们把赎金减到一万五千块，磨了几个小时，便说“不交一万三千块赎金就不放你们走”。

他们听着神甫先生的争辩，末了说：“你们今晚就睡在这地板上，好好想一想，要是你们今天夜里不给我们交钱，明天一大早我们就把你们转送给红缨枪队！”

神甫先生们一听这话害怕极了。因为他们说的“红缨枪队”就是大多数背着梭标的农民游击队，他们是穷苦农民。正是那些逃亡吉安、拥挤街头的大地主的家奴、佃户和长工。红缨枪梭标队总是在红军前面开路，人类历史上比他们更痛恨地主和压迫者手段厉害的人再没有了。“他们杀富人和传教士！”

神甫先生们解释道。

两个神甫在农民小屋的硬地上过了一夜，都没有睡着，折磨拷打呜呼哀哉的景像在脑海里跑马。早晨他们又同抓人的讨价还价，赎金减到一万块，他们还是交不出钱。

“你们教会里有多少钱？”下午一个农民问他们。“没有！”神甫回答。

“你们撒谎！”我们在你们教堂里找到了三千三百二十二块现洋。在耶稣像像龛子后面收藏着！

这消息如同霹雷霹顶，言外之意农民协会抄了教堂，发现了钱。

几分钟后，他们听到部队行军的整齐步伐声。他们抬头看到小屋门口站着几个身穿中国工农红军服装的战士。

我的上帝，万军之主！吉安已被红军打破了！原来，城内白军兵变开了城门。地主、资本家和国民党官僚吓得鸡飞狗跳，四处躲藏，仓惶逃命。吉安市农会工会等群众团体以及白军士兵打着红旗，高呼口号欢迎红军。整个下午召开庆祝胜利大会。晚上又开提灯庆祝大会。吉安城头飘着一颗大五星上有镰刀斧头的红旗。

梯尔里神甫一提到那些日子不禁喟然长叹。一个修女说：“红军枪毙了几百富人！”她讲出这个数字时犹豫了一阵，因为她来到上海半个月了，听过中外权威人士的讲话，说有关情况应该怎么说。接着她改正她原来的说法道：“红军枪毙了一万多富人”。“红军在吉安枪毙富人二十万！”梯尔里神甫宣称。他把修女说的数字提高了二十倍。接着他低下头来想了一阵，又把自己宣布的数字增加十万：“红军枪毙富人三十万！”

他扫了在场听他说话的人们一眼。急忙补充了一句道：“不过，我认为这个数字包括附近地区被杀的人数在内。”

吉安附近地区一年前已经成为苏区，红军为什么突然枪毙苏区老百姓？梯尔里神甫没有说明。他又回到抬头看到红军站在农民茅棚门口时的话题：

“那些人是红军政治部的来人。一个会讲法语。红军是一支受过教育、训练有素、非常有纪律的军队，这一点我必须说明。关于那些红缨枪梭标，人嘛，哎哟！我的全能上帝！他们恨死我们了。我们同红军在一起的时候，总感到放心，安全有保障。可是，一同农民在一起时就提心吊胆，惴惴不安。他们就是不背我们的行李，除非他们的上级说了话才背。”

政治部来人把天主教神甫从农会手里带回教会里。他们发现没有跑掉的七个教士都成了阶下囚俘虏，难友一共九人。

第二天，几个红军指挥员出现在他们面前说：“我们听说你们是医生、护士，真的吗？”“是真的。”俘虏们回答。“很好，派你们到中国医疗队去。赶快把你们要带的东西捆好！马上动身到我们的石洞医院去！”

修女和神甫们把最紧要的衣服打好包，红军战士帮忙带走。他们穿过红旗如林、锣鼓喧天、一片口号声的吉安大街，到城外二十里的石洞镇，那里有八百多名红军伤病员躺在医院里。

他们走进医院时，赤卫队警卫战士向他们举手敬礼，把他们当作红军首长对待。传教士们成了红军医院的军官，礼节周到，他们必须举手回礼！虽说并不乐意，但恐慌心理没有了。

“因为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由受过教育的人领导

的军队呀”。

“我们的待遇同共产党人一样。”梯尔里坦率地讲道。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解释道：“我们的待遇同红军其他的人都一个样。生活一样艰苦，大家苦是苦，但我们并不比别人更苦得了不得。我们一个月三块钱收入，供给制，有吃有穿，同红军所有首长和战士们都是一个样。同他们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生活条件都一样。打扫医院擦洗地板的清洁工的收入同我们一样。我们稍微好一些的就是红军战士帮我们背行李。”

梯尔里神甫说：“开头红军战士们不大乐意背传教士的行李，说行李该自己背嘛。”但是他们的首长命令他们背，于是他们就背了！命令服从，那些穷人还是听话的！上帝的仆人眉飞色舞，津津乐道这件事。不过他补充道：“那边人人平等，我们不能抱怨待遇，我们待遇很好。”

十月中旬，整个医院在一支队伍护送下从石洞逐步迁入苏区。传教士随医院内迁，因为他们是俘虏，而且他们是懂得西医的俘虏。

“十二月初，他们在黍龙镇，西药用光了。传教士们不懂中医、不会开处方。看来红军用不着我们了，把我们送到东固山后的一个村子里交给农民们，他们要赎金，我们成了人质。住在山后农民家里，使我们又感到祸福莫测、非常恐惧。”梯尔里说。

村子里所有身强力壮的男子和妇女都跟红军一起打仗去了。梯尔里神甫讲道：“白军派出一军人，到处打仗。上海法国总领事到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派一军人来救我们。因此村子

里的人都上了前线，留下来看守我们的只是些白发老人和黄口娃娃。我们住在一间小屋子里，可以到外面走动买吃的东西。是的，我们用苏维埃钞票，——这儿一张纸票子就是江西农民银行发行的一元钞票。你瞧，一面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像。列宁的像活像一个中国人”。

一个修女谈到这一段生活，她说：“红军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制度。他们有学校，学生坐在板凳上，身边放着竹刀、木枪、棍棒，从儿童时期起就对孩子们进行军国主义教育一套东西，真是太可怕了！他们还有教科书和印刷所，他们有各种妇女训练学校。我们被捉以前，他们经常进出吉安到我们的教会里，动员我们的中国妹妹修女们离开我们，到他那边去接受他们那套训练！他们到处搞破坏活动，真是无孔不入！”

“你说的这套制度如何解释？”有人问这个修女。

“这是苏维埃的政府制度。红军是讲平等，人人一样，待遇相同。他们强迫农民参军，硬叫农民相信平等，他们没收富人的土地，给农民分田分地。他们宣传反对宗教迷信，反对帝国主义和富人。他们无法无天，完全是野蛮人”。

“农民分到一块土地完全是出于强迫吗？”有人又问这个修女。

“不！不！”她回答：“对农民开头似乎很好，而且农民也似乎喜欢，但是农民太愚蠢，看不出他们一套制度的后果。”

“后果将如何？”

“后果，请看苏联吧，每个人穷死了，悲惨不幸！再无富人救助老百姓了！”

“富人救助老百姓吗？”

“富人对我们很好。”

“我听说有些基督教徒也讲平等”。

“那是不同的！”

这个修女一再讲红军可怕、可怕、真可怕。“他们恨富人！……他们恨宗教……他们恨帝国主义……他们恨官！……他们相信平等！……他们是无法无天的野蛮人！”

梯尔里神甫讲十二月间两个白军师打到东固那一天的情况。起初，他和另一个教士看见远处山头有两个小黑影子在活动。他们听到军号声，问老军人：“他们是红军还是白军？”

村里的老人和儿童在一起听了一会，观望一阵，接着哭了起来：“他们是白匪军，我们都完了！”

梯尔里说他和其他传教士走到屋子里跪下来祷告上帝。看来他们并不过分相信上帝的启示，于是他们做了一面白旗子，上面贴了一个红十字。一个传教士走上一座山头把白旗插在军队能见到的地方。

“来的要是红军的话，”传教士解释道：“我们就说我们插旗正是告诉村子里没有白军。来的要是白军的话，我们就说感谢上帝我们插旗子是盼望救兵来临。”

“白军队伍过来了，他们是白军第十八师张辉瓒的兵。”

修女提醒道：“上帝听到了我们的祷告，感谢我主全能上帝，我们才得救了！”

神甫和修女们被带到白军军官面前。他们如获至宝：“白军既惊讶又喜出望外，他们知道他们有功，可邀重赏了”。

那个修女也讲到白军营救脱险的事，她耸耸肩膀、结束讲话道：

“可是谁能料想到正是搭救我们的那个师全军覆没了，大部投到红军那边去了！”

梯尔里神甫讲到他和难友们回吉安的情况，沿途乡村十室九空，有的村镇，瓦砾成堆，一片荒凉，不见人影。

“吉安一带的老百姓，对于共产主义的热情非常高”。他说：“他们完全彻底赤化了。每当红军占领一个村落或市镇，他们就召开盛大的群众大会宣讲他们的政策和一套制度。他们把大商店字号充公，同时把一切工人的工资提高。白军打过来，他们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他们撤走以前，召开各种会议，说谁出卖革命背叛红军，他们回来就镇压谁。他们强迫老百姓跟他们一起走。”

“你参加过红军召开的那种群众大会吗？”有人问梯尔里神甫。

他有点局促不安，说道：“没有。不过大会情况我听说过，红军什么东西也不让我们看！”

“老百姓愿意留在敌后帮助红军也不行吗？他们躲藏不住吗？”

可敬的神甫承认：“是的，他们心向红军。他们是一些愚昧无知的野蛮人。”

梯尔里接着忠告道：“我相信蒋介石会亲自指挥白军围剿红军的。朱德、毛泽东从前只有五百多人很少几条枪。今天他们有十万人，军队半数人有枪。我们知道他们的枪是哪里来的，白军士兵把枪交给他们的，他们的枪都是从白军那里捞到的。打仗前，白军士兵们把政府的计划通通告诉红军。打仗中，他们朝天放枪，实际上投奔过去了。我们十二月到了吉安，鲁涤

平跟我们说吉安不安全，赶快动身到上海去。他这样劝告是为了不丢他的脸。其实我们知道，红军已经打败了白军，白军一仗中就损失了七千人！白军其他几个师部队兵变投到那边去了！我们后来听说龙安以北有点‘小麻烦’，事实是红军部队在那边也打败了白军。到处打的热火朝天，白军处处吃败仗。所以我们逃到南昌跑到上海这里来了。”

后来，一个红军战士讲红军进军吉安的插曲：

“我没有参加攻打吉安的战斗，因为我躺在石洞军医院里，走时正打摆子病得很厉害。进城后我军吸收了几个当西医的帝国主义传教士到医疗队，他们都穿一身乌黑长袍，说一口漂亮江西话。他们的长头发象猴子一样遮盖住他们的脸孔。我们不跟他们讲话，他们也不跟我们讲话，除了必要他们问‘今天您好？’我们说‘比你们要好！’他们是传教士，我们知道传教士就是白军的特务。我们什么都不跟他们讲，因为他们会跟白军报告的”。

传教士插话到此结束。

第十三章 俞昆讲战斗

你以为我当一个红军战士年纪太小了吗？不小！因为我是一个工人，刚七岁时就下井当了矿工，我们工人是没有童年的。我们在童年时期就肩负着大人的责任。

我年青，但我参加过许多次战斗。在所有战斗中，最大的战斗是我十六岁时红军打败围剿我军的十五万国民党军队那一场恶战。决战时间在一九三〇年元旦前夕，我说的是阳历。敌人几个师集结，前来围剿我军，在东固兴国地区集中。毛泽东和朱德指挥我们作战，彭德怀从西面来参加会战。

白匪军用飞机轰炸东固，造成很大的破坏。要不是内部出了意外事件，我们是不会被迫后退的。几个星期前，白军一个旅包括军官在内举行兵变投奔红军，这个旅扼守进入东固地区的北山口。在军官们的策划下该旅又发生兵变，接应白军两个师，第十八师和五十

师通过东固北面山口。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些军官是奉反革命组织A、B团，也就是反布尔什维克团命令，伪装兵变投奔红军；等待时机，里应外合，企图从内部搞垮我们的反革命分子。地主、资本家组织的A、B团分子就暗藏在我军内部。这回他们串通一气，通谋投敌，把东固出卖给敌人了。

我们的红军这时在东固。有三万人，加上农民赤卫队，康克清的五百妇女大队，康是万安县妇女游击队队长，长工出身。东固兴国有我们坚强的苏维埃政府，白匪军的来意在于破坏苏区，消灭我们。

一因为内部叛乱，二因为飞机轰炸，我们被迫撤出东固。撤退以前，我们守住了北山口、平定了叛乱。他们把参加叛乱的军官通通枪毙了，我们把许多跟他们逃跑投敌的士兵也都干掉了。于是我们从南山口撤退，诱敌深入苏维埃腹地。那里群众基础很好，我们可以同群众并肩作战，消灭来犯之敌。

我们向龙岗镇方面撤退，龙岗那边有一个苏维埃政府。一切乡村远近各地都成立了苏维埃。东固的老百姓跟我们一起撤退，我们一大群移动的老百姓，三万红军加上赤卫队、妇女大队以及好几万农民工人。老百姓把他们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带上，我们帮助他们。我们把他们的被子衣服坛坛罐罐，六畜五谷，印刷机，缝纫机，修械厂零件，以及苏维埃政府的文书档案等等通通运走。我们赶着牛羊猪狗大搬家。我们坚壁清野，不给敌军一件东西，我们知道他们靠抢老百姓过日子。他们带的粮食并不多。

我们到九层岭山脚下的时候，同我们红军一起撤退到苏区国土腹地的各村镇的老乡们至少有十万人之多。

敌十八师和五十师从东固北山口到东固盆地进行疯狂破坏。他们见屋放火，把小学校舍，苏维埃政府和群众组织的办事机构都烧光了。只有山里的寺庙原封不动，因为白军讲迷信，害怕神道报应。

土豪、劣绅和地主为白匪军带路当向导。他们中间有些逃亡在外，并不熟悉山间小路，有些人在一年前钻进我们红军和群众组织里，这些地主的子弟、亲戚为虎作伥，引狼入室，带路还乡，我们后来也把他们收拾干净了。

两师白军火烧东固即下九层岭追赶我军，我军在龙岗附近停下来。敌十八师住在镇上离我们不过两里路停止追赶，准备过年。敌人的军官们打算在旧历年三十晚上庆祝他们的胜利。敌五十师在我军西面二、三十里一带活动。第五十师师长是谭道源，第十八师师长是张辉瓒。另外拥有帝国主义装备新式大炮的三整师白军从西南面包围我们；第二十八师驻在我军西北面，第二十四师在西南面，第七十七师在南面。白军一个师约有一万人，第十八师特别强，号称嫡系王牌军师，它装备有我们作梦也没有梦见过的大炮。最糟糕的是他们还有飞机助战。

当地的老乡们如潮水般的纷纷跑来向我军报告：十八师军官正筹办酒席准备庆功大宴。时间很晚了，满天大雾，敌人的飞机无法出动轰炸，我们知道飞机晚上不能丢炸弹。于是我们作好消灭第十八师的一切准备工作。

我们把不能参加打仗的妇女、儿童留在安全地带。然后我们的一切武装部队和能找到武器的农民结成一条牢固的战线去同敌军作战。东固的赤卫队不但有梭标、大刀，有带着大树掏空制造的木炮。五百妇女大队，都背着步枪。我们红军有步枪

机枪，但大部分人只有梭标大刀。我们缴获的武器很不够，不能人人都有枪。

天黑以前，我们对十八师发起猛攻，战斗持续仅仅打了两个小时。枪从四面八方扫射。我们的农民赤卫队、梭标队直扑敌人的机枪阵地，勇敢冲杀，决不后退，直到把枪夺到手里。妇女队长康克清指挥的妇女大队，冲锋陷阵，毫不畏惧，打得勇猛顽强，真是气壮山河。她们的表现赛过我军最优秀的男战士。组织起来的农民妇女一组一组地接近敌人阵地，对白军齐声喊话。他们一面对白军喊话，告诉白军我们都是工农，是为了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利益而战的。

敌人的阵脚开始动摇。部分原因由于我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猛打猛冲、打垮了他们。同时还由于地理和天时，我们熟悉地理，每个角落我们都清楚。山雾掩护着我们的各路纵队，掩护了我们的妇女宣传队员。白军士兵兄弟们投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亲眼看见敌人一整连人跑过来了，有些白军士兵就地等待我们去抓俘虏。

我在这一仗里负了伤。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大腿，我跌倒在地又打了一阵，然后我把枪交给一个同志，我不能让敌人拿到枪。一个农民同志爬上来把我抱起来背上走了。我人事不省。醒来时我发现躺在龙岗一家老乡的屋子里，后来老乡们又把我背到东固坪山上红军医院所在地的一个庙里。

医院里住着我们许多同志，大多数是同第十八师作战中负伤的。我受伤以后的一切情况他们都告诉了我。

第十八师整师人带着武器向我们投降了。师长张辉瓒也在俘虏中间，我们进攻时他正在举行盛大宴会。我们还俘虏了旅

长代岳和许多军官。缴获了全师所有物资装备辎重。其中有军用电报收发报机，几百箱药品，腊肉、粮食、驮子和许多弹药。我们搞到了一些漂亮的新式大炮。我们还得到了整箱整封的大洋和七只驮运武器的骆驼。

就在那天晚上，我军摸黑连夜进军去攻打西面的敌军第五十师，它位于白军包围圈中心，天色未明，我军猛扑敌军，一直打到正午。同志们告诉我这一仗战果辉煌，打得非常漂亮，太阳当顶我军连人带枪俘虏两千。战场上敌人死伤遍地。敌人许多军官包括师长在内逃掉了。当然他们总是那样拚命先逃的。

我们打败了第五十师，解除了敌人的武装，告诉他们愿意干革命的就参加红军，不愿意的就遣散回家，我们发给他们足够的路费。他们大多数愿意参加我军，说他们出身贫苦，因为养活不了家口才吃粮当兵为军阀卖命。他们说他们并不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我们告诉他们在战争中学，在政治课里学，在群众组织中学，很快就会学懂弄通的。因为我们红军的组织健全，政治训练很好。

我们的部队休息了一下午，当天夜里又向西南急行军去打第二十四师，但是听到第十八师和第五十师覆没的消息，敌二十四师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我们找不到它。我们再向南去打第七十七师，它也跑了。我们再调头横扫西北面的第二十八师，也不见踪影。于是我们进行剿匪、清理内部的工作。两周时间完成了消灭苏区内部反革命武装的任务，苏区国土又回到了人民手中。老乡们庆祝胜利，各地男女老少唱着革命的新歌·《十愿》有情哥，“有情哥，小妹十愿唱一唱：对付白鬼子上战场，工人农民手牵手，我拿刀哟你用枪”……

就在我军打败敌人，剿匪清乡这个时候，老百姓回到东固。他们把我们伤病员安置在寺庙医院里。投奔过来的白军士兵押着那些充当向导的地主土豪和张辉瓒、代岳等四个旅长，四个团长等战犯回到东固。

回到东固的老百姓一齐动手重建家园。我们红军战士和白军士兵帮助群众盖房子。白军士兵对重建家园赞扬备至，齐声说好。我们说最好不过的是，现在我们都是同志一家人了。他们干活非常卖力，因为老百姓的房子是他们烧的。修建起来的第一幢房子是儿童游戏的幼儿园，东固很快恢复正常，我们的小兵工厂和印刷厂开工生产，我们的苏维埃机关、群众组织同以前一样，处理日常工作。大约在十天以后召开群众大会，公审敌军军官和土豪地主。头一个被审讯的是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只能由十八师的士兵公审他。老百姓集合参加旁听。我们红军里有几个同志被选进了革命法庭。他们对十八师士兵提出张辉瓒是好人还是坏人，拖不拖欠军饷，打不打士兵问题。每个士兵都能回答，但是必须先要张辉瓒自己回答。

“好”，张的士兵说：“听他那个肥猪大王八胡说八道吧”。首先张辉瓒作了一通辞藻华丽、自以为一贯非常革命的，又长又臭的演说。他说现在我们必须革命，为群众艰苦作战！这时，他底下的士兵们哄堂大笑，嗤之以鼻。这使得他非常紧张。接着他说过去他是一个恶人，同人民为敌，罪该万死。对待士兵弟兄们不好，拖欠军饷，情况属实。他有罪，今后改恶从善，立功赎罪，从头作人。

他的话讲完，几个亲信士兵走到前面。他们开门见山，简

单明白，既不讲非常革命也不讲罪该万死。他们直接了当地说，张辉瓒是狼心狗肺的狗崽子，走遍中国没碰见过的最坏的坏蛋，他有成箱成驮的大洋，可是他克扣军饷，士兵的饷几个月不发，关饷也只发一两块钱不够买日用品。他们的草鞋军装都要算钱，并且高过市价。他给大家吃七块钱一个月的伙食费，实际不过是三块钱的猪狗食。他鸡蛋里挑骨头敲榨一切，士兵一双草鞋钱市价一角他要扣三、四角钱。他没有钱发饷，但是每到一个市镇却嫖赌逍遥、大吃大喝。至于体罚，许多士兵身上的背花伤痕就是鞭打的证据。

“红军里面没有一个指挥员敢动一下战斗员！”一个士兵说：“我们帮军阀打仗卖命，我们的命猪狗不如。对我们的士兵体罚是家常便饭，动不动就鞭子抽，拳打脚踢，把士兵不当人待，而对军官不管犯多大的罪，都不军法从事。”

其它白军士兵控诉，他们到军阀部队里吃粮当兵，为的是挣钱养家，但给家里很难寄回一文钱，他们打仗一无所得。军官总是讲“军人的天职是战死在沙场”。

张辉瓒垂头丧气地听着他手下的士兵倾诉自己一切心里话。末了他站起来说道：“以往都是我缺德丧尽天良，今后我要为民众而打仗。”

一个士兵站起来说道：“你也害怕了！你的心术不正，以后也不会变好的！”

士兵们要说的话都说完了，最后，主持大会的同志说：“大家控诉张辉瓒有罪，认为有罪的请举右手，别人不要举手，只是十八师的人举手！”

他的人都举起右手。

“不同意的也请举手，不要害怕。人民面前可以自由讲话”。

无人举手，没有一个人人为张辩护。

“该判什么刑？”法庭上十八师的审判员问。

“死刑！枪毙他！”许多声音喊。

于是表决，人人举手赞成。我们的同志一再提出谁不同意死刑的可以讲话。没有人吭声。

“张辉瓒的死刑如何执行？”

这时，兴国兵工厂一个工人要求发言，他上台说道：

“十八师的同志们！大家想一下我们许多革命同志在国民党城市是怎样被杀害的。他们被严刑拷打，然后绑赴刑场砍头示众。国民党发动战争，屠杀老百姓。张辉瓒是一个为国民党出力拚命发动战争并且只要可能就卷土重来的家伙。他可以左拥歌女，右抱美人，一边饮酒作乐，一边眼看我们的千百同志人头落地……。大家必须记住，白匪军洗劫村庄杀了我们多少同胞，多少同志，张辉瓒一师人把老百姓当牲畜一样奸污、掳掠，必须记住，张辉瓒是如何命令你们火烧东固民房的。鸡犬不留，黄口小儿都不得活，这些事都要记住在心！”

兵工厂工人说罢，十八师一个士兵说：“忘不了，执行张辉瓒死刑，要象城里国民党杀革命烈士一样，砍头示众！”

十八师士兵人人举手赞成这个意见。我们的同志们一再提出谁反对判处砍头示众死刑的可以讲话，始终没人反对。

张辉瓒看到听到这一切，恐惧发抖。我们参加审判的同志告诉他，想活命可以发言，恳求自己的士兵宽大。然而他不向士兵低头。相反，他要求去见彭德怀。这个要求得到同意。他的

卫兵送他到彭老总那里。

接着革命法庭公审其他罪犯，东固人民担任法官审问地主。不过五分钟，他们表决把地主砍头示众。之后公审十八师其他军官，表决结果，除了代岳旅长，通通枪毙。

当问到代岳这个人如何时，许多白军士兵回答代旅长并不是一个作恶多端的坏人，在条件许可下他尽力地做好事。待人接物通情达理，他是十八师最好的一个军官。他们赞成释放他。我们参加法庭的同志说同意释放，他愿意留下我们欢迎，如不愿留可以回白区去。他选择了后者。东固苏维埃政府给他一张通过苏区的路条，他安全地回去了。发给他们路费，百姓给他们自由吃住。过了很久以后我们听说他在国民党报纸上发表文章谈到十八师的失败和张辉瓒的下场。他不胡说八道，但毕竟是一个白军军官，对白军一类我们不过分要求。

押送张辉瓒的警卫班带他去见彭德怀。张希望见彭，因为彭过去在白军里当过军官，同张有过交往，以为白军军官皆有同胞之谊。

他的卫兵站在他身边，有趣的听他同彭讲话。他请彭救他的命，说他们过去是朋友。声称“与朋友交，生死不渝”。

彭德怀回答他说：“不然，我们红军干革命事大，六亲不认，遑论朋友。我们是为劳苦大众而奋斗，为工人阶级而战。不错，我当过白军的军官，但我始终是一个共产党员，时机一到，我就站在革命群众一边了。现在你要我救你命，可是整个红军全军无论那个首长都没有权力办到这个。你自己的士兵兄弟判处了你的死刑。他们判错了，你自己要能够说服他们你就能够得救。”

张辉瓒强调他下了决心为民众作战，但是彭德怀跟他说，向自己的士兵兄弟去作说服工作吧！

张十分丧气，他不相信一个司令长官居然没有权力改变群众的意志，于是他要求去同毛泽东谈话。他想毛泽东是一个大而有权的将军，会救他的命的。

他的卫兵问毛泽东在哪里？人们领他们到一个农民家里。在那里找到了毛泽东。毛正睡在一个床上。因为他不是一个结实的人，而且咳嗽很厉害。卫兵把张带进去的时候，靠近毛的头边一张小桌子上放着一个空饭碗和一杯冒着热气的茶。几个农民在他身边正说着话。

张辉瓒一看躺在农民茅屋里、穿一身普普通通红军战士衣服、同一屋子贫苦农民正在谈话的毛泽东，他想是他的勤务兵恶作剧跟他开玩笑。此人决不是大而有权势的毛泽东大将军，红军中最有威信的人物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书记。但是毛泽东起来说道：

“我就是毛泽东，你来有什么事！”

张辉瓒看见屋子里的农民和警卫都很严肃，在他面前的这人也是一副庄严相。他害怕极了，他这时见到的毛泽东并不是一员大将而同一个普通群众一样的人，一个共产党员。张于是不再提为民众服务，只是祈求：

“救我一命，我不想死！”

毛泽东坚定地回答：“我不是一个白军军官，具有改变群众决定的权力。就是我要救你，我并没有权力。你是身在苏维埃国土，唯有你自己的士兵们能够救你。向他们提出请求吧！”

张辉瓒呆若木鸡站在那里望着毛泽东。也许他知道他不会

活命了。我们红军经常想到革命，经常想到我们的同志们在国民党城市里象狗一样抓起来被严刑拷打砍头枪毙。而现在这里这个人就是杀害他们的刽子手中的一个。

张辉瓒的士兵们如何答复他的请求，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们砍了他的头。红军里面禁止逼供拷打，所以他们对他也沒有那样作。他们火化了他的尸体，但是把他的头用红布包好钉在一块木板上。上面写着：

“人民公敌白匪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的头”。

他们把张辉瓒的头丢到赣江里漂到吉安。后来我们从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上看到人头被捞起送往南昌，蒋介石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葬礼，国民党大小军阀、政客、地主、资本家参加了葬礼，帝国主义鬼子洋人也参加了。对人头致祭，国民党军阀和政客作了长篇讲话。说什么，张辉瓒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的牺牲，对中国对全世界都是一个损失。什么什么的狗屁。

我们看到报上送葬的图片，那些穿着长袍马褂大腹便便的国民党的政客、地主、资本家们站在那里好象每个人怀抱着一个大西瓜，肥头大耳活象猪八戒，使我们大笑不止。大礼服马褂上佩戴国民党的徽章，我们把这张图片钉在东固的墙壁上以便群众能够看到那些人民公敌的形象。

“唉哟哟，这些都是张辉瓒的狐群狗党酒肉朋友呀！”人们看到相片哈哈大笑。

第十四章 崖石寨

赣南的宁都，雩都，兴国三县交界地区是一个峡谷纵横，犬牙交错，长五十里，宽十多里的狭长山谷。寿塘镇位于山谷中央处，山路崎岖，林深幽静，峰峦层叠，景物秀丽。凡是林园胜地在中国多为寺院占有，这一带同样名刹古寺很多，香火旺盛，游客如云。每逢三月清明，八月中秋，远地香客朝山拜佛，络绎途中数以千计。赤膊短裤，骨瘦如柴的轿夫苦力抬着豪华的阔佬在山路上奔走不停。

许多释道寺观金顶飞檐，雕梁画栋矗立在山林谷涧中。大庙占地广阔，庭台楼阁，殿宇宏伟。进香期间，寺庙僧道房舍招待香客住宿，供应素食茶饭，出售香烛果品，珠紫竹手杖，引导香客四处游览。

许多寺庙的围墙坚固，象欧洲中世纪的堡垒。土豪地主的花园墙壁六七公尺厚，有如城堡，座落在山边林中。里面楼台庭院，层次栉比，住着一大家人，几

代同堂，男女奴仆成群奔走。四周围墙和宅院的中间有池塘草地桔树园。大地主庄园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仓库储备数年的粮食，场上饲养成群的鸡鸭猪羊。这一带特产鸦片烟土行销赣南各地，为僧俗、大地主的主要财源之一。

和尚、尼姑、道士等许多出家人多半是地主世家的亲戚兄弟，他们中间有着千丝万缕密切相连的血缘关系。出家子弟有法定继承权利，他们是身穿袈裟道袍。口唸弥陀天尊，应酬往来交际，关心现世俗务，最讲实际的出家地主。寺庙土地财产同在家地主一样分布山冲各处，许多村子里的穷苦农民都充当寺庙的佃户差役。寺庙土地山林出产大米、茶、麻、木子桐树、楠竹，以鸦片为主要出产。种鸦片，赚大钱，烟土多了，可以运到城里卖给军阀资本家作为他们生财之道的资本。

在枪眼密布的庄园高墙里面有团防局的团丁守卫着，民团团丁不是地主子弟，就是流氓地痞，有的是洗手不干的绿林好汉。他们一个月的薪饷五块钱，背一根枪，站在老板的宅院墙上来回巡逻，无事就在村子里游荡。

一九三一年这个地区的山脚下有一个姓廖的地主，他家的土地分布附近山区，有钱有势，称霸一方，这一族是大烟土世家。三连团丁有步枪保护廖家庄院。

但更有钱有势的是崖石寨的李家地主，崖石寨孤山巍峙，四面陡绝，峰顶平坦，位于宁都、兴国、雩都三县交界处。这年头，兵慌马乱，到处闹红军，扰乱大人先生们的清梦，李家堡垒里藏有囤困数年可保无虞的粮食，驻有五百团丁，最近还从清塘国民党驻军那里买了一批新式机关枪，他们有恃无恐，极其嚣张。对待崖石寨李家湾一带的穷苦老百姓，机关枪是他们的

命根子。

崖石寨是一个土匪窝，要清乡剿匪李氏家族贼喊捉贼，道义上是没有发言权的。寨主三兄弟为李氏族中首富，称霸一方，占有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他家一个将近百岁的太爷，被族人奉若神明，就住在崖石寨山上。

李家祖庙在青塘，李氏宗祠里面有李氏族谱和功德石碑。傍山建筑，四周高墙，祠内两廊厢房和后院至少可住五百人众。清明，端午，中秋和春节期间，全族人在祠堂里摆酒开宴，议事唱戏。全族公推当寨主的族长吃饭坐首席，看戏坐前排。

一九三一年初，红军向这个山区进军，驻青塘的国民党军队闻风而逃，一些地主也跟着跑了。他们大言不惭地说他们去请救兵，很快会回来的。廖家祠堂和崖石寨的土豪地主下定决心负隅顽抗。许多中小地主，和尚道士带着徒众齐奔廖家庄崖石寨避难。

红军来了，红旗一路招展与山间皑皑积雪相映生辉。刚刚打跑了国民党江西军阀五个师对苏区的进攻，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清除了队伍内部的暗藏敌人而力量更壮大的红军，挑选这个封建地主势力雄厚的山区作为休整练兵的场地。几千农民，小手工业工人纷纷参加红军，亟需训练和武器。红军现有两万条新式步枪，许多新机关枪和上次战斗中缴获的重炮，以及大量子弹装备物资，但是每尊大炮不过十多枚炮弹。每连仅有六、七条步枪，要训练一支革命的武装，只有从敌人的手里夺取武器，帝国主义军阀正在南昌和南京准备发动新的讨伐战争。加紧训练，装备红军是革命发展的需要。

红军用不着说一句“请求许可”，就把司令部设在崖石寨李寨主的祖庙李氏宗祠里。一营人在祠堂东西两廊房间里住宿，总部机关和警卫人员住在大门前戏台看台上，其余部队住在附近僧道逃避一空的寺庙里。

红军在青塘的三个月时间里，附近山区发生巨变，出现了激烈战斗的火红场面。所有贫农、中农、手工业工人、挑夫苦力、纷纷为红军带路，报告敌情，或志愿参军打土豪斗地主，干土地革命。所有僧道徒众、地主土豪、护院团丁啸聚在戒备森严的寺庙庄园里，拚命抵抗，一个个都被抓了起来。反动僧道、恶霸大地主和土豪经过群众公判大会审讯后就地枪决了。恐怖笼罩着寺庙和庄园，日子一天天过去，看来很清楚，国民党到处挨打，不会回来了。残余的僧道、土豪、地主、官僚、政客带着民团团丁举家投奔廖家庄或崖石寨藏身避难。

红军派出分遣支队去进攻这两个顽固堡垒，但是由于敌人堡垒森严，防守坚强，一时很难打破。廖家庄位于山谷南坡，堡垒坚固，四周环绕一条护庄河。一千多红军战士和农民，一部分围攻这个堡垒，从山腰向庄院里射击。一部分砍伐树木搬运石头稻草，填塞濠河，捆扎云梯攀登院墙，但均被院内机关枪猛烈打退。

于是他们开始从堑壕底下挖一条地道，阵地上面战士们虚张声势，不断射击，掩盖下挖声响。地道作业挖得不深被水冲没淹死了几个人。事故发生时，司令部查出一个参谋是附近山区某个地主的儿子，对廖家地主透露挖地道计划，经过公审处决了这个内奸，又从较远的农民房子后面挖一条新地道。新地道比旧地道又深又宽，红军对地主大院继续打枪，地主团丁用沙包

粮袋堵塞大门，缺口和屋顶，彻夜燃点煤油松脂、火把，听到动静，见到黑影就打一阵枪，阻止红军晚上爬墙。

费时一个多月深挖的地道终于完成了，它穿过庄壕高墙，直通庄院里面。红军战士和农民把几个月前从白军手里缴到的炸药运进地道，山区老百姓非常激动，帮助搬运炸药，因为堡垒里面就是他们的宿敌。

地道引火线点燃激动人心的时候终于来到。红军战士们和老乡们在远处盯着，一连串爆炸，震天巨响，院内房屋倒塌，土木直冲云霄，烟雾弥漫，山谷通红。爆炸过后，红军战士从树木搭成的浮桥上跨过堑河，登上云梯，爬到高墙上，把那些站立墙头，丧魂失魄，打着白旗呆若木鸡的残余团丁僧道收拾干净。然后翻下墙头，打开庄门，放下吊桥，让大队和老乡蜂拥而进。里面，只见颓垣败壁，瓦砾成堆，将近两千具尸体血肉狼藉，鸡犬猪马牛羊等横陈满地。他们从后院仓库里面清出大量储藏的谷米、黄豆、火腿、腊肉、熏鱼，震毁的金银财宝散落各处。几百担鸦片烟土在墙窖下存放，挖出来一把火烧掉了。

经过两个多月的攻打，只余一个崖石寨没有拿下。它矗立山巅，不可能从上面投炸药包到寨子里，也不可能挖地道攻破堡垒。对空射击只是浪费子弹，一再架设云梯攀登墙垣也难奏效。寨内团防团丁守备甚严，晚上松枝火把照耀如同白昼。

红军围困崖石寨达三个月之久，一度撤围又继续围攻。他们采取断绝粮道，消耗弹药的办法发动农民参加战斗，同时加紧战地训练新兵，夜里召开群众大会，组织农民手工业工人，成立革命委员会，没收地主土地，按照农民劳动力分配土地。

但是，对崖石寨的包围没有什么进展。这个顽石堡垒里面

有数千地主官僚和尚道士，军阀团丁以及他们的家属在内，他们如丧家之犬齐奔崖石寨作困犹斗。红军估计寨内地主武装民团至少有一千二百之多。

围攻崖石寨将近三个月了，一天，远处出现了国民党部队，就是说，国民党对红军又发动了新的围剿。一天，北方天空出现了一架飞机，在附近山区和崖石寨上空盘旋，寨外树林中有许多面红军的旗帜。飞机盘旋了一圈投下了一枚炸弹，接着来回盘旋扔下第二枚、第三枚炸弹。显然，飞行员把崖石寨当成红军司令部，不惜狂轰滥炸。这时人们的情绪非常激动。飞机在山区上空又旋了一圈，然后向北方飞去。大家知道，它会再来轰炸的。

接下去两天两夜，红军战士和老乡们爬上崖石寨周围的大树上把红旗绑在高树枝梢顶。地主团丁用步枪机枪扫射，很多人不幸牺牲。但是战士们前仆后继，不怕牺牲，把红旗扎在长竹竿上然后捆在高枝上。晚上尽管寨内火把通明，机枪猛射，却阻挡不住把红旗插遍树林成为一片红色海洋的战斗。

第二天，土豪地主想收买红军战士，他们在山寨墙头上摆弄大块腊肉、火腿、烧鸡鸭鹅、大米袋，摇晃钱包，向红军战士和老乡们乱掷金钱。他们还从墙头上吊下一个佣人同红军谈判，提出如果能把树上的红旗从树上取下，即可得到梦想不到的食物和取用不完的大洋。如能网开一面放被围者自由，红军战士和农民即可发大财回老家去。来人送上沉重的一袋银元表示谈判诚意。战士和老乡们莫名其妙地望着银元袋子，又望着墙头上招手作势，吐沫横气，摆弄着烧鸡火腿一类东西的家伙，围攻的战士哈哈大笑，有的端起枪朝摆弄食物的人瞄准，连人带火

腿打下墙头。

第四天，北方天空出现四个黑点子，它们越来越大，四架机翼下涂有国民党党徽的军用轰炸机飞来了。

“他们不是国民党飞行员”，红军指挥员们仔细观察后说道：“国民党飞行员不能这样驾驶飞机，他们是外国人。”

满山遍谷都是红旗，一片红色海洋耀眼夺目，唯有崖石寨独立山巅，傲视天空。藏身在岩石下大路边和树林里的红军战士和老乡们欢喜若狂，有的在地上打滚。他们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这样的喜剧，只要一息尚存他们就会把这个喜剧告诉他们的儿孙。

红军战士们乐呵呵地道：“有戏看，帝国主义国民党对我们要下手了！”

飞机在崖石寨上空盘旋，接着不断地扔炸弹，然后又盘旋一阵，致命的铁蛋扔个不停。它们辛苦工作近一小时，北方的蓝天又飞来五架轰炸机助威，它们立即在崖石寨上空盘旋投弹，恨不得一下把山寨炸平。林中老乡们望着寨内爆炸浓烟大火，十分惊奇国民党真有一手，他们称心极了。

国民党飞机在青山幽谷的高空耀武扬威，飞来飞去，它们向小河中投了一颗炸弹，显示手段高强，这一下激起了红军战士们新的欢乐。之后，九架飞机开足马力掠过上空，朝北方飞去，逐渐消失在群山云雾中。

当红军和老乡们从倒塌的缺口处走近崖石寨的时候，但见满山烟尘，遍地弹坑，没有一幢完好的房屋，不见一个活人。甚至所有枪支毁损无遗。几千具尸体同家禽家畜的残骸遍地纵横。这里埋葬了李氏家族和廖家地主的残余，几百个为土地和

鸦片而战的僧道师众。这里还埋葬了江西军阀，鱼肉乡里、割据一方的地主武装。

红军战士们漫步废墟，不住叫好：“好，好，好！真了不得！”

几千具尸体火化了事，一连几天战士们打扫废墟，石板下发掘出深藏地下的大铁柜里藏有将近百万银洋和黄金贵重宝物。在一个密封紧闭的墙窖下发现了烟土仓库，烧掉那些鸦片烟，香味冲天，经月不息。战士和老乡们兴高采烈地把白洋、黄金送到红军司令部。“单单这个山区的金银财宝，我们就够成立一个工农银行了。”人们说。

开辟新苏区成立工农银行是大事，在福建的长汀有一个中央银行，江西兴国还有一个。各地农村设有分行，给农民、工人、小手工业者信用贷款，给合作社财政上支持，人民群众骄傲地认为银行是苏维埃强大的支柱之一。

自那以后很长时期，老乡们一谈到他们和红军攻打崖石寨喜剧时，无不哈哈大笑，“帝国主义国民党总归有它们的用场。不过，他们还是太坏，把崖石寨房子都炸平了。不然我们可以利用寨房作红军医院，学校，工农银行的新地址哩！”

第十五章 一天的生活

少年先锋队的队员们冲破了黎明，他们前进在东山上。他们的歌声顺高山而下，回旋激荡：

“走上前去，曙光在前，努力奋斗。
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
开出自己的路，
勇敢迈开脚步，
高举着革命的旗帜，
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青塘李氏宗祠里面，红军司令部警卫营的战士们正在睡觉，一个小战士半睁开眼，躺在砖石地上迷迷糊糊的，睡意未醒，歌声传入他的耳鼓：

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他知道这支歌子是在老家的时候，他同少先队员

们边行军边唱的一支歌曲。不错，睡在自家茅屋的泥土地上时也唱过。而今他在哪里？头顶上一根大梁椽木印入他半开半闭的眼里。飞檐屋脊耀眼夺目，一株山桃树光秃秃的枝桠伸向天空。

雕刻花纹的梁木，弯曲起伏的飞檐，摇晃娉娉的桃枝，使他应接不暇，他欠身用一只手臂撑着身子望着透过瓦缝穿射室内的晨光，他的脑子从睡梦中清醒过来，意识到他身在青塘红军司令部。

他已是一个红军战士，这时睡在李氏宗祠戏台上，台上，地板上，板凳支撑的门板上还睡着别的人，他看到一个大胡子正在伸腿直腰打呵欠，那是朱德。两年来他跟着这个朱老总走过万里路。

他听到很远的地方少年先锋队在唱歌。一个穿着粗蓝布棉衣工人服装的战士一步一步走下楼梯，步子沉重，一只手扶着在肩上扛着的武器，肯定是一挺机关枪，这个人的步子象心脏跳动有规律地走着。他朝下一眼看到一个裹着军毯蓬头乱发的战士，便走过去揪住小鬼的头发，把小鬼的头按到胯下，两人撕打了一阵。这时又传来少年先锋队的歌声。

“人家都走了，飞奔崖石寨！你这个二流子还在睡大觉！”警卫员说道。

台上睡觉的人被两人吵闹醒了。一个司号员从地板上坐起，瞎摸了一阵，吵醒了身边两个司号员。那两个人也乱摸了一阵，说起话来。

于是他们拿起军号走到台前。三把军号震破长空，远处山崖峭壁发出回响。

上下山谷其他起床军号接着吹响了。时间清早五点半，红军一天的生活开始了。

就在这同时，台下院子里闹哄哄的满是人，大家走到盛水的水缸边去洗脸。十分钟后，三个司号员又站在台前吹响了第二次号。

住在祠堂里的战斗员，炊事员，通信员，传令员，司号员，马夫，饲养员等，全体人员到外面集合，整队听连长、指导员讲话，然后开始早操演习。

这时候各连队的指导员，通信员，政工干部，医务人员流水般地来到司令部机关所在的祠堂里。一个农民的代表团来找毛泽东。传送文件、电报、电讯稿。指挥员们前来汇报包围崖石寨的情况。下达命令，阅读报纸，准备开会等等一大堆事务亟待处理。大家忙着参加开会。朱德带着司令部几个参谋和一个警卫员急急忙忙向崖石寨方向的山路走去。

外面整个小山坡地上，红军连队正在进行军事训练。班排连长们尖声叫喊口令的声音在早晨的寒风中震荡。班排战士们向左向右向前向后，齐步，正步，跑步，卧倒反复操练。有的背枪，有的拿一根木棍。有的穿工人服装，有的穿农民棉袄。

过来了一群农民，又过来了一队少年先锋队和赤卫队，押着一批和尚道士，地主，土豪。场面平常，那些家伙在农民群众大会上不会有好下场。红军战士没有一个放下操练去看热闹的。

六点半第三次号声响了，出操的人回到自己的住地后解散。

李氏宗祠里炊事员们把大铁锅粥抬出伙房，放在院子里，一班一盆咸菜。六点四十分第四次号声响了，开早饭，部队整队把粥盛到碗里，一班一桌，用公共筷子拣菜。李家祠堂开饭

实际同上下山谷其它寺庙一样，热气腾腾，议论纷纷，争论不休。苏区边界外面国民党军阀极其嚣张。守卫边界的红军战士正在打仗。大家争先恐后看着墙报上贴出的最新电讯稿。还有头天晚上打崖石寨土围子、附近山区其他地主土围子的情况。训练即将结束，部队快要开动了，增援部队已经派到边界某地去了，等等。

在司令部吃饭桌上，人们议论着即将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原订于五月三十日举行，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发动新的围剿正在地平线上出现，因而推迟了。在国民党地区城市工作的共产党首脑机关纷纷来电同意推迟到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节举行。那时打破了国民党的围剿就可集中全力召开大会。

早饭很快完毕。接着是政治部统一安排的两小时政治学习时间。各团政治部和党支部都有俱乐部，负责全团战士的政治、文化、娱乐活动。俱乐部下设体育、文化、墙报、俱乐等四个委员。

全军战士参加体育锻炼的各种竞赛活动，室内游戏人们最喜欢下棋，他们用木板作成黑白棋子找对手下象棋，大群人围观，叫将喊杀，非常热闹。

全军战士还投入文化学习，文化委员发动了一场军内区内热烈扫盲运动。每个连有初级识字班，规定每人每天识五到十个字。中级班学员也被吸收在墙报组里。红军采用的新课本是一年前上海地下组织左翼社会科学同盟编订的新教材，也是苏区内新学校里通用课本。

墙报每周一期，墙报委员在早饭后两小时活动时间里碰

头，还吸收能写文章的人参加。每个大队有自己的墙报，一期墙报篇幅通常有五、六十页纸，贴在祠堂走廊的墙上。任何人有话要说，任何批评建议都可以写在纸上，贴在墙上。但由墙报委员负责编排组织稿件。它包括一些严肃的政论文章，有工会问题的争论漫画，国民党地区罢工消息等等，三月第一周墙报上有一篇论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文章和一篇纪念巴黎公社的文章。

墙报上有一篇特约的文章引起全军各连战士的注意。文章谈到预防雇佣兵反革命分子混进红军的几种新措施。为此，对白军起义兵变投奔过来红军一律欢迎。但是血的教训，特别是东固惨痛的经验证明，许多白军士兵看风使舵，哪边得胜就投奔胜利了的哪边。他们唯利是图，哪个部队能发洋财，就往哪里钻。最近投奔过来的一万五千名白军士兵中，合格编入红军的不过几千人。党的组织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进行审查，吸收贫农、中农和出身好的士兵参加红军，还有工人可以吸收，至于富农和老兵油子则应遣散。实践证明，他们在军阀队伍里当兵纯粹是鬼混，是见钱眼开的亡命之徒。谁给他们钱就为谁打仗。这些人对革命对红军对共产党毫无认识，也没有事业心。

今后，文章说，为了使工农红军始终保持为一支产业工人、贫民、雇农和中农的有纪律听指挥革命的铁队伍，一切积极报名参军的人员都要受同样的审查。

一般墙报后面有各种通知，三月初这一期墙报上的通知，一个是兴国到青塘筹建医院的某女医生将作有关保健卫生报告。另一个通知说，苏联五年计划图片实物展览在苏区巡回展出，将于下周到达青塘。

还有一个通告说，周末特别晚会即将演出话剧《上海兵工厂里的冲突》。并说，为大众喜爱的周末特别晚会，已经受到数千工农观众欢迎，所有祠堂院子无法容纳红军与老乡们，现已择定一处回音良好的高崖山腰地作为露天剧场。今后演出节目将在该剧场演出云云。

通知戏剧组成员排演节目的地点。务请“红色短外套”小组注意演出时间。据悉，上海新来某知识分子同志将参加这个小组。

早饭后红军内部各单位的会议多得很。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开会听报告。有时候需要苏区全区和红军特别讨论的问题，全军全区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就召开联席会议。

九点二十分号声又响了。部队到野外进行实弹演习。十一点差几分检查各种枪支大炮，号声吹响时，他们列队去听政治理论课，文化委员组织座谈讨论。

毛泽东经常到学习班讲课，朱德有时候也去讲课，有时候政治部主任，连指导员，大队支部书记也去上课。

十二点号响，学习班下课。吃午饭，大米饭，青菜，有时特别会餐有肉有鱼。有时战士们因特殊贡献得到一两块钱奖金，他们就用这钱买一只鸡或一只鹅全班人打牙祭会餐，遇到这种嘉庆场合，他们就请客，请朱德或毛泽东或司令部的人作为特别客人共餐。一般都请朱德，一说请朱德他们就说。

“真作孽！他当总司令，啥子奖赏都捞不上，让我们请他的客！”

看来他们很难得有这样一次机会请他作客，而往往在邀请他以前他好象神差鬼使似地就来了，战士们一见他就哈哈大笑

道：“欢迎光临！伙夫头鼻子真灵！十里外早就闻到了鹅肉香了！”

朱德坦然作色道：“啥子小吃鬼胆敢另吃！”

大家叫朱德作伙夫头，并不是因为他真能五、十里外闻到鹅肉香，而是因为他有一回在战斗中被白军抓住过又被白军放了；因为他们说他是一个可怜的伙夫，红军抓来的伙夫。他抖着肮脏破旧的围裙作证。天知道，是哪里弄到缠在身上的！他的胡子剃了，一身油渍，白军士兵气呼呼地踢了他一脚，看他笨手笨脚地放他走了。于是伙夫头成了他老人家的绰号。

但是，一到值勤指挥打仗，朱德是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生命誓死保卫的红军总司令。

午饭过后几分钟军号响了，又有两个小时的学习时间。有的下一回棋，然后回到住处看书写东西。大多数人去战术学习班。两点，号声召唤他们进行射击训练，到四点号声吹响结束。四点到五点半为自由活动时间。有的散步，走访住院的伤病号同志，有的读书学习或游泳，或访问农民家庭。五点半晚饭，饭后两小时半各班开生活会，学习讨论，这时吸收新参军的农民同志参加，启发教育他们在会上发言，表达申辩自己的思想观点。

红军战士和城乡老百姓每周晚上有一次大型集会。通常由戏剧组负责演出话剧，许多戏是戏剧组自己编写的，有的戏是知识分子从上海带来的。《红色短大衣》以速写镜头演出革命历史故事或苏区各方面实际问题。歌舞小组如雨后春笋到处成立，有的在苏区为老百姓巡回演出，宣传社会革命的新思想。

从战场上缴到的国民党军队的放映机和影片，由戏剧组负

责处理，放映的时候由到过外国的人对观众作讲解。外国电影里面有奇装异服和男女调情的镜头。有些接吻镜头使农村妇女含羞低头起身走了，男子们有的开玩笑，有的莽汉乐呵呵地笑得直不起腰来。红军讲解员同志帮忙讲解，要观众明白这些电影并不表现外国人生活，而只是浪费工人财富的资产阶级的一套生活方式。

除一周一次特别晚会外，八点军号声一响，红军一天的生活活动结束。

但是红军司令部一天的生活并没有终止。参谋部人员在蜡烛光下埋头阅读文件，查看地图，一直工作到深夜。朱德的脸，他那方正的下巴宽阔的前额角在蜡烛光下晃动。毛泽东和同志们在一起阅读文件，他的前额广阔颧骨突出，经常静坐沉默深思。司令部的人穿着粗蓝布衣，同普通战士穿着一样。他们不佩戴官阶徽章，同普通老百姓唯一区别只是红领章和红臂章罢了。

红军作息时间因时因地有时改变，早春时节帮助农民种田。这是红军的一个问题，因为工农红军同群众心连着心，收成好坏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一个好收成意味着苏区经济生活基础稳固，保卫苏区群众人人都有饭吃。

这时正是早春季节，红军同苏区各村老百姓在一起开备耕生产大会。随后各连队同农民一起下田犁地，开渠修沟，积肥送粪，播种插秧，锄草车水。秋收时节部队在那里就帮助割禾打谷。即使作战期间，红军战士一有闲暇，就帮助农民收割。

即使生活这样忙，红军的劳动并没有个完。老百姓需求多，政治部的活动量大。它组织男女特别小组宣传群众，鼓动群

众。它给妇女单独上课。帮助工人农民组织起来，培训农民游击队，少年先锋队和赤卫队。成立男女特别情报小组，教给情报人员搜集传送有关国民党军阀情报。情报人员学习各种枪械制造性能，如何估计敌军人数，如何识别白军部队各色旗帜徽章。他们组成一个密布江西、深入国民党统治区和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红军和共产党秘密交通情报网。

由政治部帮助组织起来的农民游击队，红军发给武器并进行军事训练。大部分游击队员是成年人和青少年，也有妇女。他们参加军事训练开展游击战争。配合红军扰乱敌人的后方，阻击敌人，截获敌人的粮秣军需供应物资，牵制敌人的侧翼。游击队员一面生产种田，一面随时准备打游击，他们是不脱产的农民。

赤卫队男女都受训练有武器枪支。他们守卫苏区一切城乡的道路。最初他们仅有步枪，多数人背带梭标长矛。他们还砍倒大树掏空树干，制造木炮。

少年先锋队的队员们年龄从十四岁到十八九岁。有时队伍里也有身强力壮，头发剪短，面带微笑，脸色红润的姑娘们。红军武装他们，训练他们，他们接受红军的政治训练。他们和农民游击队并肩作战，红军打仗他们也上战场，据守危险性较少的阵地。他们都是满怀热情的青年，雄赳赳气昂昂的歌声和明晃晃亮闪闪的武器，宣告他们是共产主义的先锋，他们的歌声沿着山间道路到处飞扬。

我们的队伍葵花朵朵向太阳，

哟！

我们的队伍葵花朵朵向太阳，

哟，

我们是革命的少年先锋！

当红军第一次来到青塘的时候，雨雪霏霏，红旗漫卷，山区成立了第一个革命委员会。红军战士同山区老百姓开群众大会时，人山人海，大地沸腾。革命委员会成员由到会群众自由选出。一个月后各种群众组织雨后春笋般成立，工作进展顺利，代表会议决定成立苏维埃政府并提出了候选人。年满十八岁的男女参加选举都投了票。成立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和乡政权组织。青塘苏维埃同江西省南部中部东北地区的苏维埃，和闽西湘东以及红军正在作战的其他省区的苏维埃联成一片了。

这一类事务活动频繁，此外还有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需要政治部处理。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农民代表团去找书记毛泽东或政治部主任说：我们没文化知识，脑子笨，现在把我们的问题向首长们提出，开动一下我们这愚蠢无知的脑壳……我们翻来覆去想过了，可是七嘴八舌，吵得不亦乐乎。有的说如果白军打到青塘，我们应该收拾一切值钱的东西跟你们撤退……。有的说留下我们老的小的在后面好侦察敌人的行动，可以同前线保持联系……我们的意见纷纷，争持不下。我姓陈，青塘的老农，我说我们老的小的应该留在后面。白军决不会怀疑他们的，他们可以安逸探听消息，我们是来找你开导开导的。

毛泽东或政治部主任把去年其他苏区的经验告诉他们：现在国民党军阀知道江西省的每一个男女甚至每一个老人和小孩都决心保卫苏维埃，都是红军的耳目，都下定决心，准备拼命，拿起家伙，同军阀干。过去白军不杀留下来的老年人和小

孩子，但从去年起，他们开始洗劫苏区，鸡犬不留，老小都杀，凡是房屋、学校、医院通通推倒烧光，连伤病员都斩尽杀绝。粮食抢光，不能吃的毁掉。家禽家畜通通抢光。

“所以”，毛泽东和政治部主任告诉他们“一切东西能埋掉就埋掉，需要撤退时你们就带上东西跟着走，直到我们发动反攻打垮敌人为止”。

农民代表们接着谈下去，询问许多细节问题。毛同政治部主任耐心地听着，同时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然后他们走了，打定主意采取江西省人尽皆知有名的战略战术。全区老百姓同红军撤退苏区。人数那么多好象整个民族大迁移一样。他们一直撤到红军下令停止为止。于是，老弱病残、小脚妇女被安顿在后方，身强力壮的青少年、妇女、姑娘们留下来等待红军指挥他们力所能及地投入战斗。红军一旦反攻，他们人山人海地奋勇上阵，打击入侵的敌人。他们不怕牺牲，同红军并肩作战。

“为什么？”“怎么搞的？”国民党军阀不知所措，惊奇地问。“因为红军强迫老百姓打仗！”国民党向世界这样宣传。

但是江西人民并不关心这一类问题，也不在乎国民党政客们的狂吠。

究竟是怎么搞的？红军可清楚，因为它是同群众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老百姓的队伍。黎明的军号，惊醒群众。白天他们同劳动，齐斗争；晚上他们站岗，群众安息。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于是国民党政客和帝国主义分子们对未来无限恐惧，相互瞪眼，总是在问“怎么搞的？”唯有红军，意志坚强的红军才能回答它：“因为我们是人民！因为我们是觉醒了的群众，因为我们是共产主义大军！”

第十六章 白军暴行

从东固东南下九层岭的路上，有一个农家姑娘和一个赤脚农民孩子一路走着。姑娘手里提着一个蓝布包袱，里面有几件衣裳。孩子手里提着一篮子鸡蛋。姑娘长得俊美，不过二十一、二岁，穿一件青布衣衫，高领，衣边长到臀部，裤脚齐踝。前额宽阔，梳着留海，满头黑发朝后梳一个长髻拖到脑后脖子上。髻子上贯插一根紫竹簪子，钗头刻有花纹，一端光滑尖秃，一头圆平。她长眉掩鬓、韶颜殊丽，体态适中，行动庄重。从近处看她，可以觉察到她双颊红润，两只明亮亮、水汪汪的大眼睛，含笑带愁，腹中婴儿已经成形。还可以看出她全神贯注关心的并不在体内未出世的孩子而总在担忧着什么，因为穿过黑压压一片森林的崖边小路，不时这里那里发出一声怪响。一有响动，她立即仰起头来侧听，东张西望，非常机警，无意识地触一下髻上的竹簪，好象里面有什么不可让人

知道的东西在内。

只有三个人知道她头髻竹簪的秘密。一个是她自己，一个是东固红军交通站的一个同志，一个是她的农民出身在红军里当连长的丈夫。簪子里藏有无色透明写字油和一支精巧的写字笔。衣包里有一封信。姑娘上吉安，只有他们三人知道底细。

那封信是她穿过东固周围白军防线的护身符。封皮上写着她亲戚的地址。信上是以吉安城内大绸缎铺师爷给她男人写信的口气：“见字速离共区，到柏塘乡外婆家一转即来吉安。匪区甚危速来”云云。

“你能完成任务么？”她的丈夫和红军交通站的同志问她。

“我不是工作两年了么？风险经验总有一点吧？”姑娘骄傲地说道：“特别是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人家不会胡乱缠我！”

他们了解她说话的意思。她怀了孕快作妈妈了。这便于她见机行事。

姑娘走下九层岭，想着交待的任务，一边走着一边同身边的男孩子说着话。她瞧着这孩子又瘦又黑，一双赤脚随着她一路小跑，短褂前襟敞开、肋骨突出象个小猴子。看来不过十三、四岁年纪的农家孩子，下身灰布裤子卷到膝头上，补丁加补丁，破烂不堪，腰缠宽布条紧身带。紧身带里也许藏有一枝小铅笔头一卷薄竹连纸。真的吗？她不知道。他是一个机伶的孩子，在红军学校里读书学文化，他为红军搜集情报，化装卖鸡蛋的，工作四个月了。

他也边说边抬头望着同行的姑娘，他那瘦猴式冷冰冰的一张脸，有时显得老成持重，嘴唇皮露开带着孩子气，额角突出，一双聪明的大眼睛，笑咪咪地盯着她。

“小老弟，你人小胆大也不害怕？”姑娘问。

“怕什么！”我就从来不怕鬼不信邪！一回，在青塘附近被他们抓住了，逼问时拳打脚踢，我说：“我是个孤儿，红军毁了我的家，杀了我的爹妈。我，我单身一个，没吃没穿，卖几个鸡蛋换点米。鸡蛋价钱高因为我穷得很嘛…老总爷们买鸡蛋不？”

我总是说这个，末了他们相信了我的话。我就在他们中间穿来穿去卖鸡蛋。不过我晓得白军各部队的旗子，有些枪炮的标记。现在我识得很多字，把我看到的東西记下来，免得忘掉了。我长大了会知道更多的事。象毛泽东同志一样，沉默寡言，冷静观察，头脑总在思考想问题，打主意。你说对吗？”

孩子认真严肃地说着，瞧了姑娘一眼。两人的目光相遇，闪耀着青春热情的光芒。

“你不怕吧？”孩子问姑娘。

“有的时候，遇到白军军官的时候，遇到老兵油子的时候，他们跟牲畜一样的”。

“我们可要战斗！”

“是的，我们要战斗！”

孩子突然在路上停下来说道：“我要绕道山脚下，上北边去，大姐姐同志，再见了”。

“小老弟，再见吧！”她站着，在那里瞧着，直到看不见人影，然后顺山口一直向下走去。

到达山脚底下，远处龙丰村河上浮桥和茅屋人家在望。她知道龙丰村里的老百姓已经坚壁清野，男女老少不是上了山，就是搬到东固龙岗住去了。村子里只有守桥的白军盘据。

桥上有十来个白军盯着临近的姑娘。两个哨兵背着枪，别的兵徒手盘腿在地耍钱赌博。她忧心忡忡，气息喘喘，望着那些一哄而起站起来的大兵，她感到全身一震，毛发悚立，那些家伙是毫无人性，坏事作绝的兵痞子，哨兵一只手上带着三个金戒指。

“什么人？打那里来的？”一个哨兵粗暴地问。

“我名叫兰英，从东固跑出来上吉安找我男人去的。我男人怕共匪，这里有他的来信”。

她拿出一个长式信封，哨兵接过去并不看信，别的人围拢上来把信翻来复去地照看，一个兵抽出信封里面的信，八字不识一个，装模作样地看着信。

“山里有共匪吗？”一个哨兵问。

“我不晓得，可能有些，我男人才叫我上吉安去。”

一个兵假装他能读信，别的士兵龇牙咧嘴扮作鬼脸儿，他用肮脏污秽、下流无耻的语言读着。语调声浪，越来越不堪入耳，姑娘双手捂住脸，满面通红。

“呀！我的信里没有这些鬼话！”她喊道：“把信还给我！”

一个兵上前抓她的手，她挣脱了。

“你的裤腰带为什么这样紧！”那个兵伸开胳膊紧紧把她抱住，猛地在她嘴上亲了一下。人们一阵哈哈大笑，兰英挣脱身子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

“你，你装什么洋蒜，不是在那边干活的，哼！”那家伙怒吼道。“跟我来”哨兵朝她眨了一眼说道：“跟我到帐篷里读信去”。他抓住她的手，拖着她向山后面一个小帐篷走，别的人跟在后面笑声浪语地叫她，喊她不要犟了。一个兵伸手把她半推半抱地弄到帐篷里。

兵痞子们一进帐篷就争吵起来该谁同她先来。接着用掷铜钱的办法决定。一个兵朝她走过来，她愤怒已极，拚命撕打，那家伙把她按住，把她的衣服剥光，旁边的人嘻嘻哈哈。看着她赤裸雪白的身体。她拳打脚踢，口咬手抓，感到双手被扭到背后，腹部一阵剧痛，全身痉挛，下身麻木，两眼发黑。她感到有人在拨动发髻，她本能地一手把宝贵的竹簪抓紧，随后感到一团漆黑。

白匪军一个一个轮奸她。泥土地上姑娘四脚朝天，一只胳膊扭断，赤身露体，头发蓬乱，嘴角流血。一个兵盯着她那赤裸的身体，苍白的面庞，眼睛突出，腹部隆起，气息全无，呈露愤怒与痛苦挣扎的神色。哨兵用脚踩着姑娘的身体，看她死了没有。另一个匪兵用脚踢弄她的肋骨腰盘。不幸的姑娘躺在泥土地上四肢僵硬，下身一滩紫血。

“不能把死尸留在这里！”一个兵说。

他们给她套上衣服，戏弄地把紫竹簪插在髻子里，一个兵把她拖到河边丢在地上，推到河里。卜通一声，浪花飞溅，尸沉水中不见了。接着尸身在水面上两次出现，长长的黑发浮在水面上随波逐流而去。

白匪兵在桥上望着淙淙流水，很长一阵，待到尸身再不露出水面时，便一哄而散。两个哨兵在老地方继续站岗，其余的

坐在地上又掷钱赌博。白军插曲，白匪暴行，这样结束。

小老弟从向北走的山路那边出现，沿路而上，刚走几步，听到山顶上一个声音喊道：“站住！”

他仰望山上，一个白军军官带着五个兵来到跟前。“你是谁？”军官大发雷霆问道。

“小名叫南禹，我到施恩坡卖鸡蛋去！”

“你是东固下来的！”

“我到东固去买鸡蛋，那边有鸡蛋。”

“东固有多少共军？”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红军。”

“跟我走，你这个小共军崽子！你从东固来，一星期这是第二回了！”

勤务兵围住孩子。他不慌不忙大大方方走着。扬眉望眼，机警不怕。匪兵们把他带到一片凄凉没有老百姓只有白匪军的村子里，走下肮脏的小巷，进入一家院落，里面有几个白匪兵坐在青石板上，他被推进旁边的耳房里。

值星官对两个正在吸烟的白军军官说话，靠近窗边有四个军官正坐在一张小方桌边打麻将。每人跟前一小堆花边角子。

两个白军军官开始盘问孩子，麻将桌上的人听着，叼着纸烟，随地吐痰，抛掷烟头。南禹一再讲他卖鸡蛋的事。东固红军一点都不知道，他结束他的话道。

“共匪不同意你怎么能够上下进出东固卡子？”一个军官大发雷霆，冲出房子一把抓住孩子提鸡蛋篮子的手。

“我只是卖鸡蛋！”孩子回答。

一个兵上前满身搜查，孩子的腰带被撕开，紧身腰带，露

出一支小毛笔和一小卷竹连纸。军官知道普通农民的孩子不读书不写字，只有“共匪”儿童才藏带这些东西！

一个军官板着脸咆哮道：“你是共匪的探子”！劈头盖脸朝孩子脸上打了一拳。南禹踉跄后退了几步，站好后神态自然，默不作声。院子里的士兵围到门口看着这一幕戏。

“把这个小王八蛋枪毙算了”！麻将桌上角落里一个军官说了一句，他随手打出一张牌，悠闲得很！

南禹睁眼怒视白匪军官，目光落到门口围观的士兵身上。他认得出那些贫农出身投奔过红军释放回家懂得为什么打仗的士兵。他转身朝军官们喊道：

“你们才是土匪！你们是穷人的死对头！你们杀死我们的父母，烧了我们的房屋，割了我们的谷子，你们是帝国主义走狗！”

“闭口！”一个军官咬牙切齿恶狠狠地打了孩子一巴掌，孩子感到金星直冒，眼前一阵昏黑，嘴角鲜血直滴。耳里听到命令枪毙声，身上被五花大绑，带出大门，走过小巷，说时迟那时快，他发现自己站在村外围墙下的乱葬堆内，前面白军一班人正抬起枪朝他瞄准。更前面隐约现出东固的青翠山岩，那边有工农红军，有他在红军里指挥作战的父亲。

“红军万岁！”孩子发出赤子的声音。瘦小的身体应声跌倒在地，鲜红的血从他体内流出，渗入不毛的黄土草地。

一班士兵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一个兵掉头望了身边的人一眼，泪珠儿象沾住了眼睛似的。另一个兵盯着孩子的尸体，喉头梗塞，浑身抖擞，痴痴地仰天发楞。

接着，士兵们立正，向后转走过小巷跨进指挥所大院。解

散后坐在地上，望着脚底下青石板，生怕同别人的眼睛接触，低头不语。最后他们中间有一个人细声说道：“狗婆养的龟儿子！”很清楚他指的不是红军。“你听见了吗，伢子喊啥？”另一个兵问。“他们都那么的！”“他毫不怕死。”“他们都那么的！”其他士兵屏住呼吸静静地听着。“干吗红军不怕死？就是他们的孩子也不怕死。”“因为嘛！因为，是的，你听他说了，我们是畜牲，地主，帝国主义的走狗”。

一个军官听到低声谈话，走到门口站在那里扫了室外士兵一眼，板着面孔，没有吭气。说话的士兵起立拍了一下屁股，示威性的一扭身朝军官丢了一眼，离开了院子。另一个也接着站起显得匆忙有事的樣子，跟在后面走了。军官无声地望着人们走出的背影，斜着眼瞥着其余士兵好几分钟之久，然后气悻悻地到房子里同什么人谈起话来。

里面窗下，四个国民党军官继续在打麻将。眼皮下堆着洋钱，他们抽着烟，满地乱扔烟头。

第十七章 粉碎围剿

革命在敲打反革命的门。吉安已成为苏维埃汪洋大海中一个小小的白色孤岛。它南面的赣州同吉安一样摇摇欲坠，只不过凭借大河、城墙、军舰、重炮的防守才不致沉没。它北面的南昌江西省城在中外反动派的军舰保护下苟延残喘。南昌市上同吉安赣州一样，在国民党党旗下，那些逃亡地主、鸦片捐客、土豪劣绅、游手好闲一类社会残渣余孽，到处活动。他们同国民党官僚们共同发表“告中国民众书”，血泪控诉“令人发指的共匪暴行”。他们的统计数字大到使人怀疑。如说：

“共匪屠杀江西农民五百万，破坏财产价值一亿元！”他们的文告宣言、通讯报道，连篇累牍声嘶力竭地大声疾呼，历史已到最后关头。

“共匪不除，国无宁日，江西社会贤达正人君子势将沦为白俄第二！”

经过训练和整编，苏区红军派出游击队小分队，深入国民党统治区，发动群众，赶走那些自称社会贤达正人君子一类害人虫。那些游击队由三、五十到四百人组成，有的正在成长壮大成为红军支队。其中孔鹤忠绰号“黑脸同志”领导的“千人铁军支队”是较大的一支红军游击队。

“黑脸同志”是从红军队伍中间选拔出身强力壮、没有疾病、行军赛跑最快的健将，受过红军技术学校的政治训练，能够饿着肚子还能坚持作战的一千个铁人，组成“千人铁军支队”。

“黑脸同志”孔鹤忠瘦长黧黑，高大个子，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参加过广州暴动，受过革命洗礼，指挥过湖北红八军一个团。在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区打过三年仗，赶走庐山避暑胜地的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富豪。在长江边打过帝国主义军舰。勇敢沉着，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九三一年春天，红军派他领导“千人铁军支队”到湘赣边界打游击，后来他这个支队扩大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六军。

整个江西成为一片火海，游击战争在到处打响。赣南各地苏维埃坚如磐石，东面福建边界地区的苏维埃日益壮大，边界以外的白区城市，国民党军阀部队调兵遣将各军云集，准备对苏维埃地区发动围剿。工农红军和游击队在苏区腹地以内积极备战，准备打破白军新的围剿。几个月来红军战士经过整训，利用闲时帮助农民春耕播种。主力部队从青塘进至红色堡垒东固，在等待决战时机，拟定反围剿战争和扩大苏区的计划。

红军战士同农民一起劳动，他们组成突击队，下地生产插

秧种田。

总司令朱德也是插秧突击队队长。他那个突击队同别的突击队挑战竞赛。其他连队守望东固各山口的时候，各游击队的挑战竞赛达到了高潮。

五一节苏区举行盛大庆祝活动，各地苏维埃代表到东固观礼，参加红军检阅仪式。工农代表们同总参谋部人员一起，站在东固东岗一座寺庙的台阶上检阅红军队伍游行走过，他们高唱战歌，欢呼致敬。多数战士穿着苏区土布裁剪的蓝布衣服，帽子上有一颗红星，已经成为服装整齐的部队了。林彪指挥的红一方面军，红三军、红四军、红六军走过去了；彭德怀指挥的第三方面军，红五军、红八军、红二十军走过去了。两个新成立还没有枪枝的农民游击师，红三十四师、红五十六师喊着口号走过去了。矿山铁路工人工程大队，通信兵大队骄傲地欢呼远地来的工农代表们。朱德夫人康克清指挥的妇女大队高唱战歌走过去了。她们身强力壮，勇敢无畏，五百名妇女战士都背着枪！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英才辈出，红军里许多杰出的司令员应运而生。许多其他省份来的红军建军领导人，站在朱德旁边参加检阅，其中有川鄂第四方面军司令员关其生。他的名字后来千百次出现。红军游行队伍里有矿工、海员、工厂工人、贫农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各级指挥员。

参加检阅的红军战士将近十万，半数有枪，地区群众走在后面。大会讲话人回顾了华中各地群众一起作战的工农红军战士，他们在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一天不能象东固群众一样开会庆祝游行，但是他们心中记得五一。国民党统治区城市中的老百姓

姓也不能集会庆祝，只有关门座谈纪念这个节日。当世界无产阶级集会争取未来胜利显示自己力量的时候，人们走上街头高呼觉醒口号，唤起民众起来战斗。

东固地区群众大会上红旗如海，成千上万的男女儿童肃立默哀，悼念过去四年中全国各地英勇斗争中倒下去的千万革命烈士，怀念在国民党监牢中不见天日的难友。大会讲话还讲到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在苏区四周集结准备发动新的“围剿”战争。

“我们用敌人的枪枝武装自己！”他们说“我们用敌人的大炮保卫苏维埃，我们用敌人的武器打败敌人。如果他们坚持同我们长期作战，我们要成立一支百万工农大军，我们要剥夺敌人最后一条枪，一粒子弹”。

日子一天天过去，红军同群众在田庄、工厂一起劳动，建设他们新的经济生活，每逢革命节日也开短会庆祝。

国民党第二次围剿的乌云又笼罩苏区的头顶，白军部队步步围拢提心吊胆地进攻苏区，北面和西面一带城镇乡村有四个人数众多的师，包括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一个师，从后面进攻赤都瑞金。同时天上出动飞机对它狂轰滥炸。

红军诱敌深入苏维埃腹地，等待时机，歼灭入侵之敌。兴国老百姓坚壁清野逃到大山里。苏维埃政府自兴国迁到东固。

敌人十六个师随即包围东固坳大山，它的西面有十九路军另两个师，北面六个师面对九层岭，东面有五个师。

红军封锁了通往兴国两道山梁南面的石营山口，它封锁了怪石嵯峨，悬崖绝壁的西面山口和北面山口，填塞了隔断东固与其他苏区北山麓老百姓挖的壕沟。东南面的九层岭没有设

防，仅留少数红军佯守。

兴国城内和城南、城北、城西三面一带村庄，还有许多老百姓，以城市贫民苦力、小商、小贩和贫苦农民的身份留下来，他们对打过来的白军说，大多数老百姓都走光了，国军来了，他们欢迎。共军真是坏，不过他们留下来因是天高皇帝远，管它谁来都纳粮。只要能够发家致富安居乐业就成。他们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走遍天下钱好。”他们嘀嘀咕咕说个不停，白军官兵多方盘诘，一边听着也不住点头。

敌人的军官对兴国附近农村的一些老百姓疑心甚多，因为那些村民十分机灵，进出兴国门道熟习。他们常在城门口受到盘查。把他们箩筐里的白菜切开以后，有的白菜里面藏着文件，五分钟后这样的农民便被干掉了。因为文件透露出大批共产党组织仍在兴国，并熟习白军的一切动静。

但是，不能把农村老百姓和城市贫民杀光，大多数人一付蠢相，手脚迟钝的样子。他们向白军的士兵出售水果、鸡蛋，蹲在一起耍钱赌博。农民押鸡蛋，士兵押铜钱。

士兵和老乡们赌博，农民的嘴舌多，喋喋不休地讲共产党的人，苏维埃故事，不怕死的红军。他们讲的红军勇猛顽强的事迹，使得白军士兵毛发悚然，胆战心惊，吓得要命。风吹草动就疑神疑鬼甚至白军军官也感到害怕，前后左右没有森严警卫不敢单独出外活动。

九层岭对面东乡一带许多村庄的农民疏散一空，还有些农民挑着担子路上叫卖青菜、鸡蛋、杂货。

“卖鲜鸡蛋！上好青菜！”他们提高嗓子大声叫卖，有的敲着小小的铜锣。不久，他们也蹲下来同白军士兵谈天说地，

耍钱赌博，讲苏维埃情况。每个老百姓和每个红军战士分了多少地？“你们开过来一路上见到每块地里的木牌吗？”他们问士兵们：“那就是每个农民每个战士分得的土地……好坏记不清，说不定糟得很，因为以往给地主交租交慢了，收获时节看到金黄灿烂的谷子都是自家的可真不惯似的！一亩地打五石谷，现在我们给苏维埃政府交一石，不过五分之一。以往给地主老财主交一半甚至五分之二租的租谷。如果生产三石谷就什么都不交。我们多半没有地，而今我们都有地了，看来不象话！可是老百姓说他们要为苏维埃为红军拚命！”

“红军士兵都分得土地吗？”白军士兵问。“当然”。老乡们望着山头答道“可不当真大家都分到了地，就是这么的！红军说一个人打仗干革命就有权分土地！”

他们不断地摇头好象是非难说，接着他们又赌起钱来，用鸡蛋、水果打赌输赢。

有的农民向白军军官卖鸡蛋，他们说，九层岭上，有些红军，为数不多，哨口没有重兵防守。国军打到东固坳时他们好从那里逃。听说东固的红军并不太多、两师人吧！国军开来时，他们大多数夹着尾巴逃跑了。他们也都是怕死鬼！哎哟，帮国军带路嘛，可不是好差事，因为，谁愿挨枪子打！土生土长这一带的老农了，有妻室儿女，想挣几个钱养家，替国军帮忙带路？哎哟，只要肯出大价钱！行嘛，多挣一点算一点。谁要考虑生命危险，早就逃之夭夭、躲起来了！”

他们同白军官兵如是交易往来。敌人五个师开始向东固坳九层岭慢慢移动，同红军部队打了几个小仗，爬了一层岭又一层岭，红军一触即退，似乎不敢接仗。敌人拉着大炮又爬上一道山

坡。朱德看到有关敌人还有牲口和骆驼的敌情报告时，拍案叫道：“好得很，牲口和骆驼正是我们需要的！”

五月十八日下午，白军几师人马进到东山岭上，站在山头俯瞰东固川，禾苗青青，他们观山玩景，不知末日即将来临。猛然山谷一声震响，石破天惊，山崩地裂，四面山头，崖石峭壁，丛林土丘到处打响了，森林里边尽是红军战士。

朱德亲自指挥红四军作为红军主攻的先头部队。彭德怀指挥第三军团，从左右进攻。两个新编等待用敌人的武器进行装备的农民赤卫师从南面进攻，他们摩拳擦掌急切地说：“我们就要用敌人的枪炮武装起来了！”

战斗打了一整宵，持续到次日上午十时。九层岭上数以千计的白军士兵，还有敌人五个师的师部挤塞道途，夺路逃命。他们一路上遭到树林里面的伏击包围，从东固到整个东山坡，遗弃成千上万具尸体，五师敌人全军覆没，活下来的几乎都投降了，许多士兵甚至连打都不想打，只等着当俘虏，“个人有什么办法啊！”有的晕头转向地说。有的拍拍屁股，扭头对自己的长官说：“有你们这些东西，我们真够了！”那些长官脸色苍白，跟着拔腿逃命。

两师没有装备的红军农民师用缴获到的枪支武装起来了，还多余一万五千支步枪，待分配给其他没有装备好的战士。大炮，马匹和骆驼也接收过来了，机关枪多到不可以数计，药品足够红军伤员每人用一个时候，还有面粉、大米、火腿、猪肉等等吃的东西！

红军留下一个党小组审查俘虏，主力向东固地面哨口肃清白军的残余。北山哨口白军师团从化装亡命飞逃的军官们那里

听到东固全军覆没的消息，就掉头向吉安方面跑了。

东固附近所有苏区成千上万的农民游击队，少年先锋队，赤卫队，妇联，儿童团纷纷拿起锄头、斧头、梭标、大刀，收拾那些经东固石营山口下走兴国的残兵败将。

企图包围石营山口的白军师，在红军四面八方袭击下，如惊弓之鸟，会合十九路军一个师，连同东固西面十九路军另两个师一起，仓皇向兴国逃窜。

红军掉头从东固下九层岭向东北横扫白军孙良诚一个旅。这个旅不放一枪就放下了武器。紧接着红军又向孙良诚亲自指挥的另两个整师发起进攻，经过两小时激战，击溃了那两个师。

国民党讨伐军队拖着他们罕有的洋枪、大炮到处奔逃。有些白军师团驻在苏区孤立无援，农民老乡们在他们中间散布红军神出鬼没好象猛虎下山扑入羊群、这里那里把白军消灭得一干二净的风言风语。红军以超绝人寰，也真的说到作到的飞行军速度对一个城市进行闪电袭击，接着又在几十里外另一个城市出现，甚至白军军官还来不及从当地婊子的被褥里爬起来战斗就结束了。

可是国民党的政客却在沿江沿海大中城市不断传播出白军大捷，红军屡战屡败的消息。然而农民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的队员们在苏区经常出现在高高的山头上密密的树林里，走过收复的村庄，斗志昂扬，高唱着胜利的战歌：

同志们扛起枪！

同志们拉起炮！

万众一心，
努力杀敌，
同志们为自由而战！
为苏维埃而战！
要打倒反革命！
要打倒国民党！

红军打到东固并没有止步，而是扩大战果打扫苏区，进入国民党地区，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战斗，他们掉头向东，占领广昌，粉碎国民党机构，枪毙地主政客。留下武装部队协助撤到山地的苏维埃政府守城。然后向东进入福建，向闽南一路扫荡，苏区疆土四面扩大，老百姓武装起来了。

接着红军向西直指长汀（又名汀州）。国民党军队在福建省这个大城附近集结兵力组织反攻。但红军打垮了他们，解除了数千人的武装。

各大城市中报纸逐渐透露出一点真相。上海、广州、汉口、香港各地舆论大哗。地主资本家和外国人星夜奔走京沪国民党权贵门庭，请求大独裁者反革命头子蒋介石立即前往江西亲自对苏区发动围剿。许多城市发出各界联名请愿的代邮代电。

“蒋介石不剿匪，后果不堪设想！”他们悲观绝望地说：“请看白俄之命运，想想国民党之下场。赤匪屠杀千万民众，烧毁二千万家住屋，洗劫数百城乡！”

各国政府的外交代表给南京军政最高当局打电话，拍着桌子问蒋介石何时上前方，走了没有？

外国报纸长篇累牍的社论说，国民党浮报胜利的谎言可以

休矣，剿灭赤匪刻不容缓，务须见诸实际行动。

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分子在上海等大城市颁布了戒严法令。各行各业许多人等被当作赤色分子逮捕关押，杀头枪毙。

蒋介石召开了一个官僚政客、教授名流、社会贤达、流氓头子的会议。庄严宣称，为了维护大学正常讲学秩序，四民安居乐业，攘外必先安内，务须剿灭赤匪。蒋把上海青帮大流氓头子杜月笙召到南京秘密商谈。杜返沪后重新召募五百名亡命之徒，命令他们“搜捕共产党”，“凡是共产党和共产党同情分子格杀勿论！”

如何消灭江西赤党的建议报告，雪片似地飞向南京。外国人向南京政府建议，使用毒气把两千万江西老百姓剿尽杀光。有些口蜜腹剑的政治扒手说，施放毒气徒劳无功，不如把江西人全部迁到西北大戈壁滩，强迫他们劳动，让他们重新作人。把西北农民迁入江西，公元二、三世纪三国以来到今，西北农民保守落后无社会改革思想。

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但是里面有着赤化的危险，中国的大西北地接苏联，移民如同布尔什维克挂钩，那又怎么办？

蒋介石发展了一套新的反共战略。蒋氏招募了几十名在镇压德国工人农民起义中自夸有丰富经验的德国陆军军官和法西斯党徒。大家认为即使法西斯军官制订出很好的剿匪计划，指导和训练南京部队虽卓有成效，但对蒋氏如同杯水车薪仍无济于事。因为，谁能阻挡江西穷苦老百姓同派出讨伐穷人的白军士兵弟兄们蹲在一起耍钱赌博闲话红军呢？

于是蒋介石转向上帝解决这个棘手问题。他前往上海加入南卫理公会教会，然后返回南京以手贴心，仰望天空，声泪俱

下地宣告，他立即动身到江西去。信誓旦旦不把江西红军和华中共匪消灭干净决不生还！这是他最后的声明和遗嘱云云。

城市口岸的土豪、地主、资本家、基督教徒们闻讯刮起了一阵狂风，欢呼万岁！富商大贾，工厂老板，青红帮客以及毒品贩子们眉开眼笑，喜气洋洋地雇用成千上万的儿童参加南卫理公会。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召集所有会众祈祷，宣讲大快人心的消息，基督教青年会的外国干事们伏倒在地祷告上帝中国有救了。

一个由各国基督教派和虔诚中国基督教徒组成的大型代表团，赶坐第三趟列车前往南京，代表们坐在一等车厢里大谈这个震撼世界的事件。到南京后他们列队前往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同蒋一起跪在地上作祷告，祈求我主全能上帝导引蒋介石消灭共产党，拯救新中国。教徒们俯首祷告，蒋介石的长统马靴铮铮作响。

全体起立，北方的浸礼教徒同南方的卫理公会教徒互相拥抱。一个传教士望了兄弟蒋介石一眼，嘘气流涕激动不止。外面马棚里，一匹军骡发出似马非驴的长鸣。

第十八章 生死关头

闽西汀州苏维埃政府派出许多通讯员沿江北上奔向红军驻地。夏日炎炎，汗流浹背，一路小跑的农民们穿过闽赣交界山区的崇山峻岭、大小村庄奔到红军总部。还有人涉过赣粤边界的激流溪谷、翻越羊肠小道飞奔疾走。

时间一九三一年七月上旬，国民党对苏区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已经开始。国民党军队的铁蹄由赣北起，扫荡苏区的城市乡村。讨伐军里有许多北方军队是这次围剿特别选派来的，原因是，国民党认为北方军队不懂江西土话，从而江西民众工农老百姓对他们的宣传仗就不起影响。

几师北方军队由赣江吉安向东固、兴国苏区步步进逼，另外几师人由赣州向东迂回兴国从南包围苏区。两师白军从闽赣粤边移动攻占了苏区城市惠昌。

广昌很快落到国民党军阀胡祖玉指挥的两师白军

手里。接着位于苏区中心的宁都受到轰炸，相继被孙连仲指挥的第二十六路军攻陷。

国民党雇佣军一浪接一浪地向苏区推进，肆意烧杀破坏。国民党飞机不断出动侦查轰炸。

红军一些小部队，农民游击队和少年先锋队，步步抵抗节节后退。城乡所有老百姓扶老携幼跟着他们撤退，人数由百到千，由千到万，最后数十万百姓卷入到一次民族的大迁移运动中。老百姓坚壁清野，烧掉所有能够资敌的物资，挑着担子背着包袱赶着牲口或乘舟坐船涉江过河疏散移动。

终于到了伤病员和老弱病残继续向山林深处隐蔽活动、成年男女和青少年纷纷投入战斗的时候。局势紧张，江西省山地平谷到处可见死人的尸骨。

白军重兵围剿的消息雪片似地传到汀州的时候，红军部队军号声响遍了群山。对半数有枪的十多万战士发出了敌人入侵的警报。红军战士们摩拳擦掌，严阵以待。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南昌行营对一切讨伐军队颁布了“兴国三百里内一切烧光剿灭赤匪无遗”的命令。人们听到这个，异口同声向总部提出一个问题。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这时候近两百名男女代表从全国各地到这里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跋山涉水穿过敌人的占领地，历时数月秘密进入苏区。他们并不知道五月三十日开始的大会已经延期，当他们好不容易跨过苏区边界哨所，多年来头一回感到安全时，正赶上国民党第二次围剿已经打破，第三次围剿的乌云正当头顶。苏维埃大会延期了。代表们从国民党统治区死

亡的阴影下活过来现在又要面临生死关头，他们昂首迎接战争，走上战场进行公开的生死决战。比起城市里地下活动残酷无情的斗争来，公开作战自由自在得多。大会延期前他们拿起武器，同红军战士们一起同敌人作战。

工农红军和党组织对付这次反革命围剿的第一个措施是，把一切会说北方话的男女同志从宣传队调出来，加上出席苏维埃大会的北方代表立即派往白军占领的城乡地区去工作。共产党员不但用枪杆子，而且用言语和思想打退敌人的进攻。同遍布苏区内外的城乡宣传网的同志们并肩作战。那些宣传队员们准确地对北方军队官兵讲清红军是什么军队，为什么一再打败白军讨伐军队的道理。

红军大部队向西穿过苏区朝东固兴国急速进军，那里几师白军正在合围。红军进军的消息在苏区迅速传开。无数老乡在小道边大路旁山林野地里等待着红军的来到，有的老乡走几十里路箪食壶浆迎接工农子弟兵。战士们需要几双草鞋走路，需要大斗笠遮风雨，吃饭时有点坛子的腌菜。在靠近红军过路的地方，群众不分昼夜供应茶饭。大人孩子走上前去接过红军战士的重担。挑在肩上送过一村又一村，不肯放下。天一亮他们穿过森林走上小路。累了就地休息。凭借森林隐蔽，不让敌机发现。他们睡觉的时候，老乡们就近为他们站岗放哨担任警戒。

七月下旬红军进入兴国苏区，路逢成千上万的逃难的城乡老百姓。老乡们露宿在森林原野、山洞涧谷。沐雨栉风，到处搭起临时的住处。妇女和姑娘们看护着病人，老头老太婆对啼哭不止的小娃娃们吓唬道：

“莫哭莫哭，再不住口，白狗子来了可就把你抓走了！再不

住口，国民党来了把你给他去！”成年男女和青少年潜伏在南面和西山一带峭壁崖洞和丛林深处，等候着即将来临的敌人，他们拿着步枪、梭标、大刀，堆垒圆木、滚石，一见到敌人就突然出击猛扑过去，抢夺蒋介石“运输大队”的武器辎重。然后神出鬼没无影无踪，飘忽无常不知去向。“运输队”的苦力脚夫和贫苦农民挑着沉重的粮食弹药，红军抓他们并不抵抗。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白军军官的枪杆子逼迫下被抓当伕的。

红军立即动手摸清楚各路白军活动的确切情况。南面上来的白军三个师，大部分士兵是北方人。相距不过四十里，正沿着崎岖的山路缓慢推进，目的在于包围兴国。本区地主土豪充当向导，他们从赣州坐着轿子由民伕抬着随白军衣锦还乡。

兴国城北通东固的大路已被广东军切断了。蔡廷楷、蒋光鼐指挥的粤军第十九路军三个整师加上另外的三个白军师，正在城北一带乡镇展开活动。国民党飞机对东固狂轰滥炸，经过猛烈激战反复争夺白军已经攻占东固。除农村宣传队，军事情报组个别青年男女潜伏下来外，整个东固地区的老百姓都隐蔽在附近森林里。兴国地区农民游击队在雇农出身的朱观华领导下到处围困敌人，特别在晚上对敌人发动突然袭击，夺取敌人的军粮和武器。

侦察员和老乡们带来各白军师的番号，师长姓名，以及难以对付的军事装备等详细情报，向东固兴国一带地区活动围剿的白军达二十一个师，配备有帝国主义各国供应的最新最好的武器。倾巢出动围剿苏区的白军总数达三十五万，枪支武器军火弹药比红军多过千百倍。飞机满天飞，到处侦察红军和游击队的动静，搜索苏维埃首脑机关。在兴国上空低空飞行，老百

姓在大轰炸前大都疏散到山上。游击队员们带回三架打落的敌机残骸。他们组织了打敌机的高射特等神枪班。

白军所过地方一片凄凉，庐舍成墟，死尸载道。他们在哪里驻军，抢割成熟作物，糟蹋青苗庄稼，想迫使百姓饿肚皮低头屈服。他们把东固兴国周围集镇村庄通通烧光，把砖石建筑炸平。苏区各地普遍成立起来的农村新学堂和教科书都被烧掉。东固又逢浩劫，田园荒芜，作物毁坏无遗。苏维埃办公楼，幼儿园，俱乐部，学校，粮站，仓库等等，沦为一片废墟。

在白军占领地区里，有些老乡妇女小孩在田间地头干活，他们放下锄头站在地里打量路过的讨伐军队。面黄肌瘦形如骷髅，双眼皮子深不可测。

白军军官对他们咆哮道：“你们为什么不把墙上的标语口号冲洗掉？”

农民们望着那些标语茫然道：“我们大字不识上面写些啥？”

每个村庄土墙房壁刷贴着各色标语：

“白军兄弟们，你们为谁打仗？打什么仗？”“你们六个月没有发饷了，长官把饷塞进了腰包！”

“做帝国主义的走狗可耻！穷人不打穷人！拥护工农兵苏维埃革命政府！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

白军军官们神色紧张毛骨悚然地念着那些标语，北方队伍官兵尽管不会江西土话但总有人识几个字。军官大发雷霆下令把墙壁推倒，凡是私藏识字课本的一律枪毙。

“共匪在那里？”白军军官们对老乡们大喊大叫。“天老

爷知道！一下在这里，一下在那里！”老乡们回答。

“你们一派谎言！给我们带路指点他们现在在哪里，你们要骗我们就把你们宰了，剁成肉酱！”

于是有的农民被迫充当白军的带路人，有的被迫在军营里当差，有的甚至充当挑夫代替那些苦病交加、倒在路边为白军当差的民夫。跟白军挑运东西的民夫们同士兵兄弟混在一起要钱赌博，闲话聊天。讲到工农红军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讲到所有农民和士兵分得土地，“苏区士兵都分到了地，”他们说：“分田分地是好是坏，老天爹才知道！”农民出身的白军士兵们津津有味地听着。

被迫充当带路响导的农民领着白军部队到一些陌生古怪地方，爬上草木不生滴水全无的悬崖，或是进入迂回曲折进退维谷的绝地。游击队埋伏在那里等待，他们一到就象猛虎一样扑过来把他们吃掉。白军军官不止一次地咬牙切齿骂带路向导：

“你是一个匪探！”带路老乡大声应道：“不错，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你们是人民的死敌，老子天不怕地不怕，杀了我一个，起来千千万，有朝一日总会把你们消灭光！”

白军军官把他砍成七八块扔在路边，士兵们极为震动，心神不安。互相解嘲说：我可没有打杀老百姓！

老乡们在东固看见了两个身穿国民党军官制服、佩戴许多勋章的外国人。

“哪里来的高鼻子洋人？”挑东西的老乡问洋人的勤务兵。

勤务兵骄傲十足地答道：“麦国！”

“洋老爷们尊姓大名？”

“他们取了中国的名字，他们的外国姓名可不知道。”

“他们这回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是从南昌来的，他们帮我们参谋制定作战计划，指挥作战，因为他们参加过世界大战，是军事专家”。

挑夫们了解，说“麦国”即美国的外国军官，这个情报很快即为红军掌握。

七月二十三日晚，红军沿着兴国周围的崇山峻岭，小心翼翼地向通往东固北面的两道山梁移动。星月无光，夜色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山路崎岖危险难走。过去翻过这一带山路的人不多，附近森林里面的老百姓自告奋勇为红军带路，帮助他们冲破这条新路的险阻。

快到半夜的时候，人们见到山脚下有磷磷闪闪稀疏微弱的灯光，高兴圩位于双峰环抱谷口处，敌十九路军军部设在那里。敌军一个师驻在一个山谷中，另外两个师驻在邻近的另一山谷里。北面某地驻有敌人三个师。

清晨四点，东方天空呈现出鱼肚白。红军部队来到东固坳南面石营山口几里路的地方。他们避开山路田头穿过丛林进入森林隐蔽地带。到处遇到东固逃出来的人。

红军从农民游击队那里知道，东固各个山口均有重兵把守封锁森严。东固坳有白军四十八师，五十师，五十二师三个师。山谷东面东兴村有敌人五十四师和五十七师两师多人。敌军装备齐全都有大炮。

红军总司令部重新修改了收复东固的作战计划。各个山口封锁严密，敌人武器如此强大，人员牺牲势必沉重。并且这些师团并不是敌军精锐部队，这次围剿的王牌精锐是第十九路军。

粉碎最顽强最精锐的王牌军的进攻就等于打破了敌人的围剿，可以肯定其他师团会一齐上来增援十九路军的，但是必须对它给以狠狠的打击。

白天红军睡觉休息。近晚老乡和侦察员们从南面跑来报告，兴国城里一片大火，白军飞机轰炸兴国城内已无完好的建筑。市民早已疏散，白军还没有摸清情况，他们对城外大小村庄扫射枪击，几师白军从南面打上来在十多里路外宿营。一个通讯员报告红军宣传队里的北方同志，已经同白军部队发生联系并在白军中间开始工作。

红军同躲在森林里的东固老百姓野营露宿一直到七月二十六日夜里。然后又摸黑向南移动。拂晓部队分开。林彪指挥的红四军红十二军进入阵地对付第十九路军一个师。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进入阵地对付另外两个师。红三军作后卫打游击战。红军总部直接指挥的两个特别教导师作预备队。他们是贫农雇农组成的精锐部队，政治上具有高度觉悟，军事上训练有素的模范师。

游击队长朱观华指挥兴国东固地区农民游击队参加这次战斗。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员们同他们在一起。

红军总司令部设在蜈蚣山南麓大森林里，俯瞰山下高兴圩东南两面的十九路军司令部。红军总部背后哨口由朱德夫人康克清的妇女大队把守。留在总部指挥作战的有总司令朱德，政委毛泽东，军委书记项英，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参谋部、侦察队、警卫员、司号员、通讯员，以及各部门首长等一百多人和一些女战士。交通队就有五十多名男女交通，侦察员同他紧密联系。这个农民组成白军称为“共军谍报组”的五十人谍报网

分成若干小组，各组有组长向总部传送报告。

七月二十七日，红军战士们进入攻打敌人的阵地。农民游击队在几十里路地区，特别在敌军侧翼和后方拉长了战线。

敌人也在磨刀擦枪从事战斗准备，他们得到了红军出现的消息。双方侦察部队有过一些小的接触。有的侦察队派出后不见回营。起初，他们以为是被农民游击队干掉了。随后，他们的侦察队赶回报告，他们同戴五星军帽、佩带红袖章、穿工人服装的红军战士产生了冲突。

白军部队开始移动上来增援十九路军，几个师南下，几个师从东固北下。

在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生死存亡关头的时刻，整个兴国东固苏区的群众义愤填膺，情绪激昂，严阵以待。大家仿佛屏住了呼吸似的，老弱病残隐蔽在大山林中深处，成百上千的妇女参加了游击队，担架队，在工事里，到火线上送茶水菜饭，救护伤兵。十至十四岁的少先队，儿童团员男女孩子们英勇地奔上战场，帮助自己的亲人杀敌制胜，他们的英勇事迹确是史无前例的。

二十七日午后，指挥红四军红十二军的林彪派出的通讯员向总部送上有关十九路军的布置动态和武器装备的报告。结尾称敌军枪毙了一批农民宣传队员，敌军军官见到任何同士兵接近的陌生人就杀。林彪请求指示。

朱德下达了军委作战命令：“随时准备打，但不得先开枪。白军装备优良而你部处境较差。等待三军团发起攻势，一听到三军团枪响即刻出击。”

时间过去了，通讯员来了又去了，侦察员走了又来了，白

军的一切行动都被严密监视着。每座山头的悬崖峭壁上，每座森林的大树高枝上，都长着眼睛。

总部里面人们焦急地等待着。朱德不住地走到山坡上用望远镜观察山谷的动静。下午四点，炊事员送些吃的东西，天亮前喝过稀粥现在第一回开饭。

又一个时辰过去了。太阳慢慢隐没在西方天空堆叠的云层里，突然传来了三军团全线密集的枪炮声，彭德怀发起了攻势。敌人阵地上也发起了震天的炮火声。

总部人员动起来了。有的跑到山边，沉着观战。这时山间小路上一个农民骑马疾驰来到总部向朱德呈上一个报告，并汇报道：“我是三军来的。三军打后卫，阵地在二十里到六十里外一带地方。今天早晨七点钟我军两个师与敌人第九师遭遇，天正下大雨，浓雾满天，咫尺不见人影。敌我双方突然遭遇，均出意外，随即展开肉搏战。现向上级报告，我军战士死三百伤四百人。我七师参谋长和三个团长负伤。我八师师长和一名团长十名连长不幸牺牲”。

朱德和在场的人们神色震惊，面带愤怒，通讯员继续报告：

“但我军俘虏了敌第九师全部人马，仅少数逃掉。抓了敌人两个旅长、三个团长、五个营长。初步估计敌人伤亡超过我军两倍。我军缴获敌人大量枪枝、机关枪、大炮和其他供应物资。我们请求指示，”朱德命令：“把缴获的枪枝物资集中起来等待换防命令。立即在白军士兵中间开展宣传教育，审查他们的出身，政治觉悟，志愿留下的编入红军队伍。老兵游子和富农出身的职业兵遣散，发给路费回家，军官拘留待后处

置。”

通讯员飞驰而去。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朱德根据军事委员会的决定发出总攻命令，为了预防命令出错或中途失误，派出了一连串传令员。命令说盟军十二军和三军团集中兵力进攻高兴圩十九路军军部所在地。红军各连队必须猛准狠地打击敌人，全歼敌人。今晚夜战，天黑时展开肉搏。赤膊露臂便于暗中识别。各军用松枝火把照明保持部队联系，三军团用三道火炬，四军用四道火炬，十二军一道火炬，朱观华游击队如有必要可用五道火炬。

农民侦察员小组，川流不息地进出总司令部，他们非常活跃，特别注意红军后翼方面敌军的活动。

黑夜降临，山谷幽静，远处火炬飞舞，隐约可见到三道火光，接着四道火光，十二军阵地上闪动着一道火光，遥远地方偶尔可以见到零星点点五道火光。

天亮前，彭德怀和林彪派出的通讯员跑进总部报告。部队已经插入高兴圩十九路军军部。夜战激烈，双方死伤惨重，敌军军部已后撤，我军连人带枪俘敌一千，弹药装备无数。夜战中间敌人被割成零星块块，我军也被切断，尽管有火炬赤膊作记号，但各连队仍失去联系不能在一起。

通讯员一起一起的接踵而至，报告敌军增援部队上来了，重新集结兵力开始进行反扑。我军被迫后撤，正带着俘虏枪支物资等朝蜈蚣山麓总部所在地撤退中。

总部注视战斗的火炬时明时灭，山谷在撤退和战斗中，时间静止不动了。两小时过去了。猛然有一颗炮弹落在总部帐篷后的树林里发出巨大的爆炸声。人们一跃而起纷纷跑出，三个

通讯员中弹不幸牺牲了。

蜈蚣山下晓雾朦胧，距离很近，战火燃烧到山脚下，冲杀声震撼山谷。对白军士兵的喊话声，子弹的呼啸声，机关枪大炮的嘈杂轰隆声，夹杂着尖锐的叫喊汇成一片。这时，人们注视着山下的火炬已经熄灭，天色大明了。

三军团的交通员报告，缴获敌人八百条枪，由于战斗非常猛烈，枪不能带走把板机都下了。另一个交通员报告红四军俘虏了敌军一个整旅。

朱观华的游击师和少共师送来一个报告，缴获到敌人无数军需供应物资和药箱，九部电台其中一部已坏，手榴弹、炸弹、大米、子弹、电池、十五挺机关枪、步枪、大洋、帐篷、电线、发电机、二十八辆军用机车、一些长橡皮带的汽筒等等。朱观华还报告战斗中牺牲了七十名游击队员和赤卫队员，四十名少年先锋队员，五十六名妇女。数百名受伤人员已住进林中临时接待站。妇女所以伤亡那么多，因为她们打起仗来拚命向前不听约束，经验不多，一心要杀白匪，奋不顾身冒着枪林弹雨扑向敌人的缘故。

红军从俘虏兵口中得知，十九路军长官下过命令，说敢死队员突破红军防线每人奖赏十五块大洋，缴获一挺手提机关枪奖赏两千元。

毛泽东上了前线，组织号召对付白军攻势的反冲锋志愿军。全军有一千四百挺手提机关枪，由从四军选出四百名，三军团选出一千名志愿枪手组织冲锋力量。他们得到的通知是：“你们的奖赏不是大洋而是荣誉，唯一的荣誉就是你们勇猛作战、保卫革命。”志愿军战士们骄傲地点着头，等待命令行动。有

牺牲，后备队作好准备接上去。

前线各处展开恶战，凶猛异常，震动山谷。红军战士在敌人的猛攻中成十上百地倒下去，但显然敌人的伤亡损失也极其严重。后备队很快上去接替倒下去的手提机关枪冲锋队战士。白军的大炮声隆隆作响，机关枪哒哒不断。

红军领导人在总部一连两晚一天没有休息过，有时昏昏沉沉刚合上眼侦察员来了，随即惊醒，报告没完没了，五十人受伤了，十多个阵亡了，五个农民游击队员被敌人抓住枪毙了，白军不留俘虏……五名女护士和一个红军被俘，下落不明……。俘虏了二十八名白军和手提机关枪，枪正交给红军志愿队等等。

战争接下去打了一整天，夕阳西下时，战斗停止。农民妇女和少先队员，给红军战士送上茶水热饭，一些人阵亡，一些人还在打，红军战士疲乏已极，子弹所剩无几，部队损失很重。

朱德命令在后方打游击战的第三军上来加强前线，晚八时暮色降临，林彪、彭德怀、毛泽东等送来报告称，每个战士仅有三、四十发子弹，部队精疲力尽，前线急需弹药。如有可能，即送弹药。如弹药无法补充他们建议全军撤退。

军事委员会作出全军撤退的决定。朱德对第三军的前令收回。命令第三军扼守赣江以西到仍在红军手里的江口以南一带山区，红军各部在该区休整。

总撤退的命令于午夜三时开始。司令部两个直属教导师上前线接防并掩护部队撤退。凭借黑夜作为掩护开始后撤，这时敌人阵地上猛烈打了一阵枪之后，零落消沉。晚上，不敢动弹的白军这时也委顿不堪。农民交通员涌进红军总部报告白军全

线在撤退中，有的向南退奔赣州，有的往东翻过东固向九层岭方向退，敌人有些部队虚张声势为了掩护撤退乱打了一阵枪，看来很清楚，敌人并不知道红军撤退的消息。

红军分成四路向西南撤退，男女老少成群结队跟着部队抬着重伤号，数千轻伤员忍着疲劳伤痛和战士们一起撤离阵地。太阳当顶，他们到达赣江边的山城江口镇，赣州在它南面四十里。

红军在江口镇进行休整，布置准备停留了五天。老乡们不断向总部报告敌人全部从兴国地区撤走的消息。困乏的白军伤员仍留在东固，东北两面苏区仍在敌人手里。

红军勒紧皮带第五天向兴国东固地区进军。

第十九章 重建家园

从国民党驻军要塞赣州，沿赣江上溯吉安深入东固一带地区的农民在乡里放出风声说：“红军向西面跑了，他们搭浮桥跨赣江向西退到湖南、江西边界的深山老林里去了”。

白军部队进行侦察，发现江上漂流的木排竹筏。赣江边上的渔民、船夫、苦力们回答白军提出的问题，不住地摇头道：“真的跑了，红军过了河正朝湖南那边，向万洋大山朝西跑了。”三三五五的渔民还讲红军过江的细节并且气呼呼地说，红军抓了他们的差，强迫他们用鱼船把人马渡过赣江。大家愤愤不平地说：“我们出力得不到一文钱。”一个挑夫插嘴补充渔民们的抱怨道：“红军抓走了我家的老二，强迫他当夫子跟他们走了。”

红军派出几个精锐师团急忙西开。一路上遇到这样那样零零落落的工农老乡们，他们说，他们亲眼看

到红军大部队刚过去了，象后边有追兵似的向西飞奔，他们避开大城市只是在夜里行军。有一个农民还见到了朱德，看见朱的大胡子，就知道是他。

风声四起白军西开。八月五日，红军离开江口急速向东固进军。夜晚到兴国即分兵前进。三军四军和十二军向东固，彭德怀的三军团向东固东北五十里外的东县进军。

早晨四点，红军四军十二军到达通往东固地区石营山口，南面大山坡地。森林里的老乡们报告东固白军三个师的伤病员很多，但装备都很齐全。但有撤走的迹象。这是因为农民游击队夺取了他们的大量粮食供应物资，所有盐巴，大部分医药物品的缘故。不过石营关将有一场恶战。

红军设立起指挥部，朱德对参加战斗的部队作了布署。发动攻势的信号是响三声枪。

信号枪终于响了，进攻开始。石营关和东固附近山地激烈的战斗声传到了总司令部，朱德派出了许多通讯员来回报告。时间过去，没有消息，只听得猛烈的枪声。朱德把指挥部向火线移动，等候通讯员们回来报告，但仍不见人来。

朱德看着他的手表，九点钟还得不到报告，他同几个警卫员爬到一座山头的陡壁上，石营关笼罩在一片烟雾里，大森林遮住了一切。司令部好象被隔离了。

远方隐约传来战斗嘈嚷声，喊杀声一阵阵大起，接着又消沉下去，然后，一切平静，寂然无声。一个小时又过去了。

终于雪片似地报告传到司令部。石营关和整个东固地区已经全部拿下。集结在东固地区的白军五个师通通败北，三个师投降了。九层岭东南一路密密麻麻黑压压的一群败兵试图夺路

逃奔东县同那里的白军两个师取得联系。红军战士们正在追歼中，九层岭一路山林里布满了农民游击队。溃败的敌人是到不了东县的，因为通讯员来到总部报告说三军团战胜了两个白军师。一师白军在三军团快到时已经撤了。一师白军受到包围后解除了武装，溃退的敌人正在向北奔逃。

总部移到东固。红军望着山下那些凄凉贫瘠的田园，荒芜破坏的土地，昔日老百姓的家园已成一片废墟。尸骨遍地，到处可见扑倒在白军尸体上的红军战士遗体，一幅战士们冲进敌群刺杀到死方休的血战图画。老乡们从山林深处返回自己的家，他们仇恨满腔，无比愤怒。他们拿起手中家伙，直向俘虏们奔去，轰斗乱打。正是那些万恶的匪帮烧了他们的房屋，杀了他们的骨肉，使得他们家破人亡，无家可归。红军战士不得不围住俘虏拦开群众并对那些军官严加保护，以免群众当场把他们打死。

白军五十二师师长在战斗中被打死，第四十八师师长自杀，五个营长被俘。红军得到两万条新枪，军火药品，大炮，几百匹骡马，无线电台，手提机关枪，自动手枪，帐篷等等。

审查敌俘的工作立即进行，只要不是老兵游子和地富家庭出身，而又志愿参加红军的俘虏立即批准参加。其余遣散发给路费回家。白军军官在他们所在连队进行公审。

一个班抬了两个身穿国民党军官服装的洋人尸体来到红军总部。

“我们包围了阳福村”，一个战士说道：“那边打得猛烈，白军败退时简直是亡命飞奔。两个帝国主义分子跟他们一起逃命，我们包围了他们和他们的勤务兵。我们喊话道：“帝

国主义分子缴枪不杀”，洋鬼子开枪射击拒绝投降，我们自卫还击，把他们两个都报销了。我们不知道两个帝国主义分子是谁，死尸抬来了，老乡们都说他们是美国佬。

等等这些，就是两个外国人出力参与围剿中国人民战争的事实，此外红军对他们一无所知。这件事，大快人心，老乡们和红军战士非常激动。无数说不完的事和他相比黯然失色，淹没无闻。

这次大捷后，红军在东固地区停留了三天。人民群众离开森林回到故居，在红军的帮助下重建自己毁坏的家园。东固兴国地区以及东面收复的地区，归来的老百姓、红军战士和新参军的白军士兵，人山人海来来往往修盖民房、伤兵医院、学校和幼儿园。粮食支持不到今年的收获季节。他们开始翻地播种早熟作物，红军编成突击工作队，紧张地施工修建，帮助老乡劳动。

他们为了节省粮食给老百姓吃。其他红军部队打到了吉安城下。

第四天晚上军号吹响，全部红军整装待发准备投入新的战斗。他们走下九层岭，向东南转北，然后浩浩荡荡向仍在敌人手里的广昌县城进军，走过这个地区的市镇和乡村，都是一片荒凉，土地荒芜，颗粒无收红军过去，百姓从山上陆续回家，眼望过去的房舍，无限凄凉，疮痍满目。走过那些荒凉的土地，红军战士们满腔愤怒，一见到白军就猛扑过去，不把敌人全部歼灭，决不甘心。总司令部要不出面阻止，敌人会全部杀光，老百姓现在把白军部队分成军官阶级和贫苦士兵阶级，不管怎样，同糠玉石：谁是敌人？军阀走狗军官。谁是朋友？穷苦士兵兄弟。他们都是一再杀人放火使老百姓受苦挨饿的敌

人，不共戴天的人民死敌。特别是拖儿带女的农民妇女，见到白军不分青红皂白就打，拚死拚活地要把他们杀光才放手。

八月底，红军来到广昌城外不远的乡村。野营露宿在劫后凋残的乡村，总部设在一个没有被敌人烧掉的地主祠堂里。

广昌还没有受到破坏，江西军阀胡祖玉两师白军在城里据守。苏维埃政府迁到山上办公。城里居民很多，凡是进出城门的人都受到搜查，许多人被当作“匪谍”、造谣惑众份子杀灭枪毙。城门口竹竿上挂着砍头示众的人头。

广昌城许多老百姓通过一定渠道清楚地知道红军快到广昌，而白军官兵被蒙在鼓里。早在敌人得到消息前，老百姓就知道红军的行踪，他们用这样那样的借口混出广昌城门，返回的不多。敌人的军官注意到，后来围城中间就有许多是混出城去的形迹可疑分子。

广昌各个城门口堆满粮袋沙包设置的障碍物，白军士兵在城楼上昼夜防守，城壕水深难越。红军已兵临城下。

老百姓在红军来时从山上砍伐楠竹帮助工兵部队造攻城云梯。一架梯子达不到城头于是把两架云梯绑在一起，几小时工夫就作了一百张云梯，并架好浮桥，战士们作好攻城准备。

攻城前部队挑选两千先锋队，身带着手枪、大刀和轻机枪，天黑时他们同几个农民一起乘木头竹排渡过城壕，把云梯搭上桥头开始爬城。

城头上的白军士兵对攻城的人群，扫过一阵弹雨，爬城的人流前仆后继攀登云梯。有的爬上城头，但被城上白军的大刀队砍翻。

头一晚攻城失败，第二天晚上几千先锋战士又作好了准

备。这时白军在城头上燃点火把灯火，照亮一切通路。机关枪密集如雨。红军懂得了游击队上次战斗中夺得的软木塞橡皮管的用处，把他们安放在壕沟里向城头射击一股大水，冲熄了敌人的灯火，机关枪和炮手们也被淋透。

城内白军开始混乱，军心动摇，士气低落，军官们疑神疑鬼，以为秘密活动正在士兵中间展开。于是命令不值勤的士兵一律留在营房，不准同周围老百姓接触谈论战事。但是军营里面流言盛行，军官们大喊大叫也不能强迫士兵们“振作士气”。天亮以前士气不仅没有振作，西城守门的一连士兵平心静气地望着围城的红军爬上城墙翻下街道占据要地。守城的士兵甚至帮助红军扫除城门口的障碍物，打开城门放下吊桥，让红军和农民游击队涌进广昌。

白军师长胡祖玉听到报告即开枪自杀。一些军官脱掉军装换上普通老百姓的便衣混在蜂拥逃难的人群里逃跑。两整师白军，一弹不发向红军投降了。

上月潜入广昌城里据说当过红军的俘虏重新从戎的北方人从白军队伍里出来，红军指战员们欢迎这些朋友和同志，大家兴高采烈地庆祝胜利。他们中间有两个天津工厂的工人。一个是历尽千辛万苦进入苏区出席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另一名天津工人和一名北平知识分子被白军砍了头，他们的首级悬在城门口。还有一些农民也被杀害。红军这回增加了两师人的装备，为死难的同志们报仇雪恨。

广昌苏维埃县政府从山上迁回。市民和红军召开了一个盛大的群众大会纪念和追悼攻城中死难的烈士。

白军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规模盛大庄严隆重的纪念大会，也

永远难以忘记。覆盖镰刀斧头红旗的战士遗体一排排安放在苏维埃大楼前面。工农红军战士、游击队员、渔民、城市贫民日夜轮流守灵。白军士兵第一次看到了女兵，少先队员。听到他们的革命歌声。他们还看见了手拿红旗，站岗守灵，追悼死者的白军一连士兵兄弟。

这一天，对白军士兵兄弟们说来真是感慨万千。队伍里一个兄弟死了，全城的人，不，是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来追悼，生平从来没有见过。而白军，当兵的在军官的眼里不过是军阀打内战的一堆肉，队伍里死了一个人只有相好的几个朋友记得他，他们没有作人的权利，贫穷下贱，被社会遗弃。而在广昌他们目睹同他们一样出身的贫农，长工，工人，苦力安息在那里。万千红军战士和无数老百姓结队走过死者的身边。有的悲号饮泣放声大哭，有的奉上成簇鲜花，抬着兰白花圈，沉默不语，国际歌声唱起的时候，肃穆悲壮，血在沸腾。晚上，人们举着松枝火把静静的鱼贯走过。最后，白军士兵弟兄们参加了哀悼的行列，一步一步的从死者身边走过，瞻仰了那些被他们打死的烈士遗容。

拿下广昌，宣告帝国主义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围剿以失败终结。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即制订打一场扩大苏区，肃清苏维埃国土内部反革命分子战争的计划。游击队长朱观华奉命返回兴国去执行保卫兴国建设兴国的任务。

红三军、四军和十二军奉命前往苏区中部和南部去消灭地主和白军的残余，彭德怀指挥的第三军团奉命前往赣粤边界扫荡惠昌城的白军和肃清闽西一切围剿部队。

广昌南面的宁都城仍在孙连仲指挥的二十六路军手里，该军内部早有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从事活动。中共宁都县委发出

报告称敌二十六路军兵暴起义参加红军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

苏区发出了号召，重建城镇乡村，播种早熟作物，扩大苏区，彻底干净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准备十一月七日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代表准备各条战线上的胜利报告，在废墟上重建家园，开始新的生活。

这个号召引起了国民党地区的工农知识分子的共鸣，他们积极响应，秘密工作，开展运动，准备派出代表。苏区全体群众和国统区革命群众掀起声势浩大的革命浪潮。

九月下旬，红军总部和参谋部向瑞金移动，一个警卫师护送前往，沿途两次停下来肃清山区乡村地区的民团团丁。他们穿过苏区中央地区同红军连队打掉地主帮凶走狗们割据称霸的土围子。上坡、麻安则、周坡、沙梁、柴坡几天之内一一被攻破。

直到十一月底才传来彭德怀的第三军团攻下惠昌的消息。这以前不久盘据宁都城的二十六路军士兵暴动起义，投奔到红军这边来了。起义时该路军总指挥孙连仲正在南昌向蒋介石请授机宜。但是不管他们如何的决定，丝毫影响不了二十六路军掌握自己的命运，经过四个月时间的思想酝酿，时机成熟他们就按决定起义了。

二十六路军暴动时，正当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期间，起义部队派出了两师人参加大会表示庆祝。

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大会代表见到二十六路军士兵代表进入礼堂问道，“你们为什么要参加红军呀”？士兵代表们回答：

“我们在宁都县城四个月，成天同工人、农民和一切人等往来。他们都是共产党，大家无不恨我们，等到我们进一步了

解，他们说的不错，红军是穷人的军队，劳苦大众的军队，工农的军队。而我们是地主、军阀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队。一路上老百姓把我们当瘟神吓得飞跑。可是他们不怕红军。我们在宁都的兄弟们处境狼狈十分可怜，霍乱流行，上千人死得真惨！老百姓欢天喜地，恨不得我们全都死光。

“共产党来了，跟我们谈话，我们的长官抓了他们杀了几个，他们死得极其英烈勇敢，这就使我们深思，终于我们下定决心参加红军。我们准备为工农兵苏维埃打仗，干革命到底，全国各地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二十六路军的士兵誓愿在革命斗争中作为同志同你们战斗在一起！”

二十六路军整编成为红五军团，同正规红军一样成立了革命士兵委员会和其他组织。

一九三一年如此过去，江西苏区又重回到人民的手里。新的庄稼由青变黄，田野里一片歌声，金黄色的谷穗迎风拂拂摇头微笑。人们重建他们的家园，房屋、学校、医院、俱乐部、谷仓和苏维埃。在开阔的山林坡地，练兵、操演、打靶、射击。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消息不断传来，人们清楚，国民党决不会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进行抵抗，相反却对人民进行反革命武装围剿。因为外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狼狈为奸，是一丘之貉。谁统治镇压剥削中国的老百姓，他们一时小吵大闹，但一旦中国人民决定自己掌握自己祖国的命运时，事实证明他们就携手一致围剿革命人民。

苏区人民加紧备战，加强训练，应付即将来临的一切。少年先锋队的队员举起拳头互相致意：“向前冲吧！准备好了没有？”同志们的回答是：“随时准备战斗！”

第二十章 革命法庭

白沙村即将演出另一幕场面伟大的中国历史剧。那里，东固大山里即将召开一个群众公审大会，审理四千多人在苏区内部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行。

人们从四面八方汇合到白沙村，传说四千人里有三千是头脑简单的国民党的战士，可以肯定他们会得到宽大处理无罪释放的。因为，他们唯命是从听五个头头的指示行动。但是对五个头头的公审他们必须参加，然后还要参加替五人卖命的其余千多人的公审。这千多人中土豪地主及其狗崽子们才是死心踏地的反革命分子。至于这些家伙和五个主要头头，让他们见鬼去吧，谁该偿命，老百姓深信时候一到，一切都要报的。

时间，一九三一年夏末，红军还在各条战线上进行战斗打退白军第三次围剿。在这场反围剿战争里红军战士阵亡六千人众。现在到白沙村开会去的许多父

老群众，想着自己战死在沙场儿子的尸体，也想到遭受白军蹂躏化为灰烬的无数村镇和惨遭屠杀的二十多万男女老少妇女儿童。

参加白沙村审判四千反革命罪犯的群众，不会忘记这些事。红军伤员们也会记得和碰到那些从背后用刺刀捅过他们的家伙。

罪犯是A·B团^①即反布尔什维克分子或A·B团追随者。他们为主子效劳的历史记录时间很长，而且双手沾满鲜血，罪行累累。在苏区活动四年多后受到人民的审判。……

那是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中国人民大众从地上爬起来挺身而出同封建压迫者战斗的时候，国民党反动份子段世明组织了A·B团。其目的是从堡垒内部颠覆革命。其团员打进共产党团群众组织，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深入每个工农暴动地区，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参加起义队伍同群众一起作战，取得革命运动的领导权，把各色反革命势力组织到他们的周围进行侦察，抵制，分裂活动，无中生有，造谣惑众，搅乱人心，等待时机成熟就发动反革命暴乱。

A·B团的团员是从地主、资本家、军阀和土豪劣绅一类人中吸收的，后来有些团员是拥有大量土地和当过小地主和富农的反动家伙。

岁月奔流，A·B团同所有反共分子积极结成同盟。他们的队伍里面有所谓自称“社会民主党”的国民党左派，稍后出现

注① A·B团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潜伏在红色区域的反革命特务组织。A·B是英文 Anti--Bolshevik 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

一个敌对的社会民主党集团。A·B团分子通过社会民主党人同共产党开除的叛徒或脱党分子结成联盟。后一部分人即所谓“反对派”、“共产党左派”和“改组主义派”。

A·B团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里拥有它的席位，而上海的外国人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警宪特务也成立了一个反共联盟，帝国主义匪帮联盟同A·B团分子秘密开会，指导帮助后者的活动。帝国主义分子在殖民地租界反动据点堡垒里象一条章鱼似的把它的触角伸向中国内地。看来正因为反共目的一致，A·B团一开始就有大量取用不尽的金钱随意挥霍活动。

后来苏区的领导和群众才知道A·B团分子及其活动方式。起初他们仅知道困难重重，问题棘手，经常遇到各种干扰和阻力。首先在没收和分配土地的问题上，看来总有人在反对这个那个的，总有人为地主说话，说分田分地应该让许多地主拥有全部或部分最好的土地。

还有，这里那里出现一个红军首长、司令长官，他是地主的儿子。但他干革命带兵打仗，农民老乡们难道能忘恩负义把他们封建地主家庭扫地出门吗？他不总是当众大讲“人人平等”和“个个自由”以及革命人民通情达理办事公道吗？开初，苏维埃选举也非常难办。有高度觉悟，非常勇敢的工人农民参军上前线打仗去了，而留在后面的地主、豪绅及其亲属，当选成为苏维埃的候选人。被奴役的奴隶们第一次举手选举表决时说谁好选谁。各地农民对他们旧日的统治权贵和老板主子、家族长老总是心慈手软，听任他们一如既往生活一起鱼龙混杂，发号施令，为所欲为。

农民并不知道哪些地主是A·B团的成员，A·B团分子各个

方面特别机灵。在一个大多数没文化、不识字、靠口头宣传、互通情报的地方，奇谈怪论象嗡嗡成群的疟蚊子一样满天飞广泛流传。

“真糟糕！”有人说：“南京政府现在可真强大呀！它真够强，居然使得帝国主义列强承认它，够强了。哎呀，真糟糕，国民党军阀内战停止不打了！哎呀，现在他们倾巢出动大军云集开来围剿我们的红军了。向苏区进攻了。我们大家玉石俱焚，可一齐完蛋了！我们快要无处安身连头顶半间茅房都不会有了！白军来了鸡犬不留，连树都要过三刀，我们的黄毛小子会被斩尽杀绝呀！”

谣言不脛而走，小广播说：“北面红军吃了败仗，不得了。东面红军又吃了败仗，了不得。西面红军也吃了败仗！一切反常糟糕透顶，大家都要完了。纲常败坏，人心不古，还是复旧的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国军来了应付一下，欢迎一下也是对头的吆？”

妇女们把娃娃抱得紧紧的，互相传说不得了……。

晚上人们在家里，白天人们在地头，细声、细语、谈论是非。人心彷徨，这也是那也是，各有千秋，可怕死人了。远方来人不时带来红军新的胜利消息，人们的恐惧又一扫而空，谣言不攻自破。“记得黑心肠的地主放了多少毒，造了多少谣”！

于是，又有些人说：“国民党军队确实回来了，入了治安会的人。身家有了保障。”

更有甚者，A·B团分子还在许多地方树起大旗，旗下写着他们号称的“精城团结会”、“恋爱自由社”、“革命研究会”、“大食者同盟”，他们说共产主义的意思就是共产共

妻，妇女、姑娘国有化，就是人我不分，一切吃光。这些社团满脑子损人利己鄙贱工农的思想，这些古怪的社团发起人宣称“我们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这就是共产主义！”

A·B团分子还招兵买马，成立“人民保卫军”，把那些至死不愿分出半分地的人们招募到这个队伍里，并征集群众的武器归这支新军掌握。

A·B团地方活动分子还在苏维埃政府里出面说：“我们现在正准备夺取帝国主义盘据的港口大城市，全中国都要苏维埃化了。”

不过有人不同意反驳道：“港口大都市都有国民党军队驻防，还有帝国主义军舰停泊，它们保卫国民党城市。红军力量还不够强大到足以夺取沿江沿海的大城市嘛！”

A·B团分子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要夺取大城市！”外国军舰确是停靠在大城市岸边，也随时准备把任何打开城门迎接红军的城市沦为废墟。甚至位于小小河流湘江岸边的长沙直到红军撤出以前是被外国军舰炮轰过的。沿海沿江口岸各大城市又将如何？

“夺取大城市可是我党李立三的政策！”暗藏的A·B团分子坚持道。

论战进行下去，A·B团分子在“夺取大城市”的路线占居上峰时火上加油地说，农民游击队和赤卫队应该交出手中武器由红军集中起来。不但农民游击队应该解除武装，并且每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必须强迫参加红军。

信口开河，扰乱视听，新的谣言到处散播。“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我说出我的心里话，朱德、毛泽东说枪杆子里

面出政权，我看是不对的……朱德是又一个蒋介石！……毛泽东想当党皇帝！”

新的指责随着满天飞：“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说出我的心里话：红军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金钱和武器是不对的！……日本人财政上大力支持红军干什么！”

这种过甚其辞的指责激起了人们的愤慨，有血气的人们怒斥道：“南京政府的要人们正在大城市里同日本人亲善，宴会往来杯酒言欢，日本人和国民党正在携手反共围剿我们的红军，“难道瞎了眼看不到！”

红军堡垒东固和白军堡垒吉安之间有一个富田镇是这类谣言天天散播的中心。有一天，一个苏维埃委员站起来说：“如果这个地方的人们胆子小害怕参加红军，就必须强迫他们参军去当兵。如果他们还是不愿意参军那就采取抽签的办法，抽到谁去就谁该去当兵。”

其他苏维埃委员争辩道：“我们知道我们的政策，我们人人到红军服兵役一个时期的日子会来的。不过现在只是自愿参军的人去当兵。我们需要人种田，不种田老百姓没吃的会饿死。”

这一天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直到坚持主张必须强迫一切人参军的人引起了其他同志们的怀疑才告休止。有一天他们尾随这个人见他到一个地主家里，然后又跟踪他从地主家出来到吉安白军司令部。当地苏维埃抄了那个地主的家，才发现这个地主家原来是一个号称A·B团组织的中心。

！ A·B团分子在许多地区并未赢得领导权。农民没有文化，但是他们并非下愚，他们是聪明的人，对富人的一言一行都心

有怀疑。也有些地区的苏维埃派出许多代表团去找红军。

“我们那边的苏维埃坏透了！红军好得很！”他们说：“战士兄弟们快到我们区上去推翻打倒那个苏维埃！”

红军也确实对地方苏维埃进行审查加以改组，清除地主，枪毙首恶。但是到处都需要红军，问题成堆应付不暇。对那些代表只好回答说：“把这些武器拿回去，枪不要交给任何人……回去开一个你们的群众组织大会选举新的苏维埃，不准选一个地主的亲戚。审判他……枪毙他，没收土地，分配土地。”

一九三〇年秋天，红军夺取了白军盘据的大城市吉安。他们烧毁敌人的档案前，对材料作了仔细检查。在国民党市党部和白匪军司令部里发现了苏区和红军内部A·B团头头们打的许多报告。有些是红军指战员们送的，虽然用的是化名假名，但姓名密码都找到了。

于是党内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花了整整一个晚上，研究了那些文件。

据文件查明A·B团江西五人领导小组成员的名单是：陈明春，红军指挥员，富田区苏维埃主席，东固地主。

李文林，红军指挥员，兴国地主的儿子，兴国县委书记。

陈栋楚，社会民主党党员，汪精卫信徒，富田红军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

岳明，江西省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

王惠，五县苏维埃区党委指导委员会委员。

他们互相勾结，串通一气。此外，还有他们许多削尖脑袋钻进苏维埃里的、他们的官僚土豪亲戚一类小爬虫。档案材料还指出，南京方面用大量金钱通过兴国李文林家分发给A·B团

分子。

也许正是这一天，作为保卫革命的战斗组织、国家肃反保密局在吉安宣告成立了。

A·B团头头没有一个被抓起来的。相反，红军肃反工作人员被派到各地同A·B团分子一起工作，日夜跟随，往来相处，成为他们的同志，联系人和知心朋友。

对于暗藏的A·B团分子跟踪到底，一网打尽的计划制订出来时，正赶上国民党开始对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

红军诱敌深入，向苏区内部撤退，这时据守进入东固苏区北面山口的一团人叛变投敌。这个团本来就是投奔过来的白军，当时红军还来不及查清情况，该团兵变时，最高负责人A·B团头头陈明春在富田北区负责。他借口部众哗变，自己无能为力，阻挡不住蜂拥入侵之敌，以致丢失了山口。

红军主力部队带领东固全区百姓继续向苏区腹地撤退，首先平息了这个团的叛乱，处决了所有军官和跟着叛乱的分子。大年初一这一天拂晓时同白军遭遇，并彻底打败了白军两个师。

在反第一次围剿胜利声中，传出三个A·B团头头在去吉安富田交界地区发动反革命暴乱的报告。红军军事学院的学员在应战中半数被解除武装和囚禁，许多学员被枪杀。

但是富田区A·B团头头们仍然不敢公开他们的真正面目。他们清楚革命的力量，只有打着苏维埃红旗上台表演他们的反革命勾当。他们高喊各种左得出奇搅乱人心的口号作为烟幕弹，着手解散和改组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组织。他们另立自己的共产党江西省委，他们逮捕囚禁和杀害无数不跟他们走的男

女同志，他们召开群众大会宣称他们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宣称毛泽东是党皇帝，朱德是大独裁者。

红军还没有来得及对他们采取行动，第二次反围剿战争打响了。红军奋起迎战向东疾扫汀州，击溃了白军两个师，取得了一连串胜利，接着又向发生暴乱的两个苏区进军。粉碎了叛乱，抓住了首恶，抄了叛乱总部和首要分子的家，发现许多新的反革命文件。

在富田区发现了两个主要文件。一个是A·B团与社会民主党签订的十条协定纲要。第十条规定A·B团负责对社会民主党提供基金。

第二个文件是社会民主党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协定。托洛茨基分子可以容许保留自己的纲领，而由社会民主党给他们提供金钱。社会民主党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在闽西一带发动反苏维埃政府的叛乱。这时帝国主义国民党对苏区又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兵力三十万，红军被迫再奋起迎战，把叛乱分子交给汀州苏维埃政府处理，召开群众大会对他们进行公审。

当红军动员江西苏区群众同国民党军队激战方酣的时候，汀州公审A·B团头头反革命暴乱案件开始进行。

汀州选出了一个革命法庭，几万工农群众参加了公审大会。革命法庭庭长是一个烟草工人。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公审记录后来在中华苏维埃报纸发表了。这个反革命分子名叫蒋泽华。法庭庭长问：

“成万的人坐在这里听你发言，现在你有一个难得的机会来为你们的党进行辩护了。你为什么要加入社会民主党，又为什么要搞这场叛乱呢？你说吧！”

蒋泽华说，共产党的政策经常是错误的，他相信博爱、平等、自由，一个农民联合政府，但不相信苏维埃政府制度。他认为土地不应该没收和分配，只相信二五减租，发放农贷和减租减息的土地大纲。他宣称老百姓是拥护这个纲领的。

革命法庭审判长在最后判决时答复他说：“象你们这样的纲领，只适合地主富农的胃口，至于贫农和雇农，他们并不希望交什么租，也不愿意借什么债，即使借债，只能还本，不付利息。”

“你们说共产党犯过错误，不错，犯过许多，我们知道这个，人谁无错？我们犯过很多错误，并力求改正错误，而你们却利用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极力渲染夸大，作为口实，大搞反革命破坏活动。”

“你们提出了反对苏维埃的论点，苏维埃是什么，人人都知道苏维埃是工农兵和城市贫民组织起来的政权。人民大众为了保卫这个政权，进行了多年的流血战争。因为这个政权存在，反动派同我们不共戴天，一次又一次发动血腥的围剿战争。你说你不过是思想认识问题，犯了思想上的错误，事实并不和你说的不一样。你们出卖了人民的利益，出卖了土地革命，出卖了苏维埃。你们拚命组织一切反革命团体同我们做对，你们从A·B团领取活动经费。A·B团是什么东西？它是帝国主义国民党派出侦察搞阴谋暗杀的秘密团体”。

蒋泽华是有罪的，对他宽大还是依法判刑？提交到会群众表决。群众起立高呼“苏维埃万岁！判处蒋犯死刑立即枪决！”并高呼“苏维埃万岁！”。

审判长对一个搞反革命暴乱的托洛茨基份子说道：“你到

处放毒散布了很多谣言，你在这里百般抵赖拒不认账，你在各家嘀嘀咕咕说过共产党同蒋介石结成了同盟，出卖了革命。你说过红军是半土匪军队乌合之众。你说过我们的苏维埃不是苏维埃而是反动势力的玩艺儿。孙中山先生主张的国共合作三大政策被蒋介石背弃践踏无遗，你用这把久已生锈的刀子从背后捅我们。这是你们同社会民主党签订的协定！看吧很早看过的东西。社会民主党同A·B团签订了协定，A·B团又同帝国主义分子签订了协定。他们都是反革命锁链上的连环套子。”

这个托洛茨基分子的案件最后提交群众表决时，全场起立一致举手通过判他死刑，并再次高呼“苏维埃万岁！”。

在汀州公审大会进行中间，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第三次围剿。正在这时，红军派出一个代表团到达白军盘据的吉安市附近的富田区，开始同A·B团主要头目提出谈判。

“国民党军队现在打败了”。代表团对A·B团团头们说：“苏维埃地区扩大了，红军比以前更强大。不久我们即将夺取整个华中地区。我们南方有一个省委而你们在这里却另立一个临时省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么？我们建议在雩都开一次党的会议，在会议上我们可以讨论分歧，制定一个新的纲领。”

“这是一个好的建议”。站在A·B团一边同意这个建议的人们议论道，A·B团分子们开会讨论，有许多人希望开会协商解决。他们说：

最好是跟他们合作，不然我们就会彻底完蛋。红军打败了国民党第三次围剿。红军一旦肃清了白军就会横扫过来把我们扫地出门！如果我们希望扩建我们的组织，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于是一九三一年夏末，A·B团五个头头在一个团三千人的保卫下进抵鄂都城，在一家大旅社见到了毛泽东和一群人。还没有寒暄问候，红军战士就上前包围扣押了A·B团头头及其随从。他们的一团人也被红军部队包围并缴了械。

“死不要脸的军阀才搞这一套阴谋诡计！”A·B团分子们大喊道。

“A·B团反革命才死不要脸！”毛泽东泰然自若镇定地回答。

人们面面相觑。吓得发抖。

与此同时，江西苏区各地对A·B团分子进行逮捕。一场揭露A·B团分子及其头头的战争打响了。共产党发出摧毁一切封建半封建因素，强化土地革命和消灭地主阶级的号召。“法办地主！”“扫地出门”的呼声响彻云霄。没收一切土地再分配。哪里分得不好就按男女劳动力重新分地。苏维埃改组。镇压A·B团一切活动及其团体如“人民保卫军”，“自由亲爱社”，“大食者同盟”等等组织中心。所有红军指挥员，政工人员，共产党员均需通过一次“清洗”。废除事后认可谁愿参加红军就可参加红军的政策。吸收兵变过来或起义的白军士兵参加红军前应按其社会成份进行审查。红军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贫农雇农的铁军。随着共产党书记李立三被解除职务，苏区内部进行广泛改革。放弃了条件不具备红军夺取帝国主义盘据的大城市政策。苏区要扩大，革命要向纵深发展，准备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临时中央苏维埃政府。

所有这些错综复杂风云幻变的重大事件，形成白沙村群众

大会公审A·B团五个头目四千人众的背景。所有这些惊心动魄、人情鬼蜮的重大事件是无数老百姓满山遍野走向白沙村的原因。

公审时间在夏末，地点在村头野外山地一个露天广场里上，十万人席地而坐，挤满山谷，广场上不见空隙。革命法庭选出红军政治委员兼前委总书记毛泽东为审判长。

公审大会持续一周，首先审讯A·B团五个头头。陈明春第一个受审，审完了他其余接着受审。

A·B团分子虽然曾有过怀疑，但不知道也并不相信红军在吉安缴获清查到了文件，因为几个月前夺取吉安把所有档案材料全部烧毁了。他们什么风声都没有听到。

陈明春万般抵赖对他提出的罪状，并尽情极力渲染他对革命的贡献。他言词犀利，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承认他是东固一个地主家庭出身、也承认他是富田“共产党”暴动的领导人，这是一面情况属实。另一方面，他奔走活动致力于革命多年了，他为人民干革命出生入死打仗，他不是一个人久经考验可以信得过的红军司令员吗？如果他犯了错误，他愿意认错，有错必改，改正过来就是。

陈明春是一个能说会道吹牛皮的人。有的农民说他口蜜腹剑，笑里藏刀，指手画脚，言天说地，同恶狗一样乱咬狂咬。但是，有的农民相信他的花言巧语，对他唉声叹气寄予同情。

他的话讲完以后，革命法庭提出几个问题，要他答复，然后毛泽东从一堆文件里抽出几张薄竹连纸，上面从头到尾写着密密麻麻蝇头小楷，看来写字人是尽量利用纸张空白处书法极其纤细工整。

毛泽东手捧那些从吉安缴获到的文件，开始大声宣读，以便全场的人都可以听到里面说些什么。他的声音抑扬顿挫，高低起伏，继续下去。人们开始知道了红军高级干部中间有些人向白军遥送情报和出卖红军，暴露苏区一些弱点和“**A·B团同志们**”如何巧妙地利用人民的困难，人们一边听着朗读声音，全神贯注。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他们情绪激动，异常愤怒。

陈明春的面孔毫无表情，象一张黄腊纸。材料读完，他矢口否认揭发材料说的一切，说他一无所知。材料上面的签名显然不是他本人的签字。

毛泽东又抽出另一份有陈明春秘密化名的文件朗读起来，似乎不足为据，于是，便叫证人上台作证讲话。陈一见那几个日前同他一起在富田工作的人时，就站起来破口大骂他们是一伙出卖朋友的骗子，卑鄙无耻的小人，投机取巧的坏蛋。

毛泽东提出一连串问题象打中敌人钢板上的机关枪子弹一样击中陈的要害，最后他问道：

“陈明春，你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

陈暴跳如雷地答道：“为了尽一个反布尔什维克团团员的职责，同企图毁灭中国文明的土匪作战！”

革命法庭上一个农民吃惊地问道：“那你在红军里那样艰苦作战又为的是什么？”“为了当一个有名的革命领袖，保护我们全家的生命财产不受愚昧无知好吃懒做的痞子们的剥夺！”。

场上大哗，愤怒的群众发出一片喊打声，许多人跳了起来。

“狗婆娘养的王八蛋，走狗！……骗子手！……叛徒……”

内奸！”

法庭上要大家肃静，遵守秩序，毛泽东又手捧其他材料宣读起来，读毕，他转向参与暴乱的A·B团士兵们说道：

“这些人就是你们盲目跟从的头头，这些人就是你们绝对信任的领袖。就是他们在我们中间阴谋活动，假冒伪善，打扮成共产党员，一到他们羽翼丰满，力量强大就背叛革命！他们蛊惑人心，挑弄是非，用革命的辞句麻醉欺骗你们，可是他们好比半夜三更在后山林子里装人叫的金钱豹，嗷嗷啾啾呼呼呜呜，叫人出门，永不落屋”。

对陈明春的处分进行表决，大会群众全体起立，举起拳头喊道：“判处陈明春死刑！”陈明春颓然坐下，双手捂住脸。

下一个轮到李文林，他垂头丧气，全身发抖，面无人色，失神地望着那一堆材料。他大喊直叫救命。他讲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在汉口怎样成为一个干革命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的，回家以后他被拉进了A·B团。那是他家里劝他逼他，因为要活命保全身家财产走了这条路的，此外没有别的路走。

“作为一个儿子孝顺父母是我的天职。为双亲分愁解忧，我就参加了”。

革命法庭上一个工人审判员插话道：“你们一家也可以跟别人的家庭一样劳动过日子嘛！同群众一起战斗生活的人大家是一视同仁尊重对待的，你知道嘛！”

李文林回答道：“我父亲老了。我们家的妇女都是名门闺秀从来没有下地劳动过。我们家是世代书香人家，受人尊敬，我不能眼见我的母亲和姊妹去当婊子”。

工人们愤怒的大吼道：谁要你们家的妇女母亲姐妹去当婊

子？谁要别人家的堂客去当婊子的？“婊子是个阶级问题，剥削社会的制度。工人农民受苦人的妇女总是被你们地主阶级逼得走投无路，卖身当婊子。但是我们并不以牙还牙对你们报复。我们抗战到底废除这个制度；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这点都还不明白，那你屁也不懂。我们看你们地主阶级的妇女最好不要当婊子，还是劳动自食其力好”。

李文林作出百感交集不知所措的样子。听着工人们的发言，接着他说他犯了错误，当了A·B团的一个领导。他请求宽大他的罪行，表示他要终身悔改鞠躬尽瘁干革命。

一个农民从人丛中站起来说道“他又是林子里装人叫的金钱豹！”他坐下来，群众议论纷纷。材料继续摊开。于是，大会进行表决，群众也判处李文林死刑，没有一个人表示饶他一命。接下去A·B团头目王惠和岳明的命运同样是判处死刑。

然后是公审红军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反革命分子陈栋楚。陈是湖北省宜昌人，地主家庭出身，广州黄埔军校毕业生。他自称是国民党左派社会民主党，汪精卫的信徒。

“坦白讲讲你的思想观点吧！”法庭提醒他。他讲道，共产党错了，全中国人民必须先打倒帝国主义，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推迟到以后进行。现在的政策应该是二五减租，低息贷款。首先把外国人赶出中国。苏维埃是俄国制度，没收土地分配土地也是俄国人的思想。

毛泽东问他：“你真的是急于要先打倒帝国主义吗？为何深入江西腹地来干什么？南京、上海帝国主义堡垒多的是，为什么你不在那边干下去？”

“我们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必须首先消灭共产主义！”他

说。

革命法庭一个妇女审判员打断他的话道：“难道帝国主义不正是我们的死对头吗？他们反共，对我们并不对国民党动刀兵。他们武装国民党部队围剿红军，他们把我们的红军赶出长沙，利用军阀当走狗。帝国主义分子只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消灭红军。他们说我们是他们的唯一死敌。对的。”

陈栋楚答道：“汪精卫可不一样！我们不象南京的国民党，我们是真正的国民党。”

对这个所谓的真正的国民党，毛泽东读了一段报纸有关国民党左派领导汪精卫当时在广州的报道。广州军阀政府依靠英属香港苟延残喘。他说凡是帝国主义分子无不帮助广州军阀，镇压广州起义，广州政府屠杀广州市民工农群众和南京国民政府所作所为一模一样。汪精卫同帝国主义分子一起吃喝，同南京国民党一样对中国的老百姓讨伐围剿。国民党左派和国民党右派在谁该统治中国剥削压迫中国老百姓的问题上，是争权对手，难兄难弟，如果双方对剥削压迫人民能够达成妥协，那么左派右派就会联合携起手来。

毛泽东对大会的群众发问道：“同志们！你们要那一派剥夺压迫你们，国民党左派好还是国民党右派好？”

会场上发出了雷鸣般地一阵喊声：“都不好！都不要！我们要自己当家作主自己管理自己的政府……苏维埃万岁！”

毛泽东再次问大家：“你们认为苏维埃和没收土地分配土地是外国的、俄国的思想吗？”

一个身材高大块头结实熊腰虎背的中年农民站起来喊道：“我来回答！”

他肩扛一枝枪，走到前面，转身对着群众开始讲道：“要说苏维埃和没收土地分配土地是俄国的外国的思想，人家一定是一个了不得很聪明的人，同中国人一样的聪明了不得！因为我们农民老早就思想这个！”

“好得很！对对的！……”人群中高兴叫好。那个农民继续讲道：“以前我们没有干，只是因为以前我们不明白道理。后来来了城里的人，告诉我们如何组织起来，怎么搞到枪杆子，我们跟他们联合起来，也搞到了枪，找到了我们的苏维埃。这才是一个顶呱呱的中国人的思想哩。”

他掉头对着陈栋楚，愤怒地说道：

“你听着，陈栋楚！中国的老百姓不愿意做亡国奴，不愿作牛马，不交租，不交税，不交息！陈栋楚，象你这样一类地主先生开口闭口提什么二五减租，低息还债，为什么？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将要失掉一切！因为我们恨你们的一切想法作法！想不到一起，干不到一路！……苏维埃是我们的！我们决不回头！……社会民主党也象金钱豹！它们的喊声比南京国民党虎狼的叫声低一些，因为他们吃老百姓的肉喝老百姓的血还没有撑破肚皮。”

“同志们”，他对无数群众喊道：“你们大家乐意让名叫蒋介石的金钱豹吃掉还是让名叫汪精卫的金钱豹吃掉？”

一阵愤怒的喊声回答了他，于是他回到自己坐的地方坐下来。

关于陈栋楚的材料越念越多，人们起立反对他的人也越来越。有几个参加叛乱的士兵到前面控诉他是怎样在军事学院组织叛乱、怎样枪杀一些人、关押一些人、解除学员武装的，

他是怎样用共产党的词句欺骗他们的。

这一切等等，陈栋楚并不否认，因为许多执行过他命令的人就坐在他的面前，否认无济于事。当表决判处他死刑的时候，连一个持异议的人都没有。

公判大会天天如此进行。一星期过去了。差不多所有参加叛乱的士兵都得到解放，但在归队回到红军部队前，他们必须经过个别审查通过。

叛乱骨干分子中有两百多名送去劳动改造，将近四百名被处决，其中有一名妇女，她参加革命前在零都做过人贩子，后来当上A·B团的骨干，她是被处决的唯一妇女。

A·B团主要头目在处决前被带到许多市镇的群众大会上，报告人宣讲白沙村公判大会的实况和白沙村大会上各种思想交锋。五个主要A·B团头头中有两个愿意把他们所知道的A·B团一切老实交待，因而得到宽大处理，没有被处决。

公判大会结束后，出席白沙村大会的男女群众和苏维埃代表团员们，到苏区各地宣讲白沙村大会各色反革命的各种鬼蜮伎俩。这以后，不分男女老少，每个人都关心注意听取人们的一切思想了。每个城镇和乡村成立“肃反委员会”。人们分析每个苏维埃成员，调查每个公共组织，甚至老年人也说：“还是赶快学文化长知识好些。学好文化我们就能看苏维埃报纸知道日本侵略中国的兴亡大事，懂得道理，免得我们糊涂无知，不明真相，受人愚弄。谁愿意受金钱豹的欺骗呀？”

第二十一章 将军和叛逆

正当红三军团围攻赣南惠昌县城的时候，李明瑞对整个事业感到厌倦，他是红七军的军长，奉命增援第三军团。当一个红军军长有什么好处呢？他一想到这就越来越感到无利可图。几年前他是国民党广西部队里一个将军，生活舒适，薪俸优厚，枪枝弹药军械物资等一般收益油水不少，还有一般将军都能捞到的大宗鸦片外快收入，以及地富土豪不时的孝敬。过着花天酒地、牌赌逍遥、寻欢作乐的生活等等。在风云时变，干戈纷扰军阀混战中间，他可以骑墙观望，看谁得势就投靠谁。谁出钱多就倒戈相向。大洋不可数计。还可效法别人在香港经营房地产，在证券交易所作投机生意。国民党部队里面一般士兵只是绝对服从，二话不说，有见解头脑的极其个别，少见得很。南方农民暴动以前直到现在情况就是这样的。

广西省南部爆发了一次农民起义，李明瑞奉命率

所部一万三千人前往镇压。他一军人都是两广一带的贫苦农民和长年苦力。有的是铁路工人、工厂工人出身，少数当过海员。大多数为了活命离乡背井，当兵吃粮谋生活。一九二七年前大革命期间，年青人和普通老百姓都讲共产主义，人云亦云，风行一时；因为在那些日子里，中国的年青一代和普通老百姓都说共产主义就是好。他也年青，向往倾倒过共产主义。矛头所指，如其枪口对外，一致反对帝国主义那就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但矛头要指向地主资本家，那就离经背道不合国情。完全是两回事。他这样看可不是吗？国民党当权以后宣布了共产主义非法不合国情。于是，李明瑞在他的一军里也宣布共产主义不合法。他无理地经常想着他的军队里面有共产主义小组活动分子的存在，至于人员名单他可无法知道。他甚至疑心过他手下两个下级军官就是共产党员，因为他们有时同他谈话，劝告他不要胡猜疑，而他们是他的好部下也是知心朋友！

于是他被派到桂南来镇压白色农民暴动。他唯命是从。但是当他下令部队扫荡乡村实行三光政策的时候，怎么搞的？大祸临头。一军人却举起了红旗，竟敢太岁头上动土！目无军长，公然当面骂他什么东西！居然命令他们去扫荡农村老百姓！全军兵变了！下级军官，甚至他的老同学范团长也同那些闹事部众一鼻孔出气。全军不但不去勘乱平叛镇压农民老百姓，反而着手成立了士兵革命委员会，宣布他们是红军！不久，江西红军代表们来了，他这一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

军队兵变的同时，作为一个职业军人的李明瑞。权衡利害也不得不为自己的未来考虑。他盘算着当一个红军军长，他可以待价而沽同窃据广州统治两广的桂系军阀进行交易，如果顺利

立即投奔过去即可取得高位。兵变时如果被自己的部属赶走或杀害，一切将化为乌有，何利可图？怎么办？

两种力量对比，谁战谁胜的思想，在他的脑海里一闪掠过。一面站着一个人年青有为飞黄腾达人人皆知的共产主义者李明瑞，另一面站着一个人顽固保守秉性难移、国人皆曰可杀的军阀独裁者李明瑞。

最后他作出了决定，实际上，他也难得有选择的余地，他当着一军人面前发表了一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慷慨激昂的漂亮讲话。

讲话时他对自己讲的一套东西似乎也深信不疑，因为他能撕掉封建军阀和江湖市侩的堂皇外衣，站起来从今从头作起，作一个革命者，一个红军总指挥员。口舌生花激昂陈词是值得称道的。

他以指挥善战、擅长军事闻名部队，相信有些人是相信他的。半数以上的共产党员可对他讲的一套并不相信，因为军阀的嘴里吐不出象牙。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军阀就是军阀。有些人对他存有幻想，相信他说的一套是出于迷信崇拜天真纯朴的感情。他们看到站在他们前面的是一个三十多岁，身体结实，精力充沛，一小撮胡子，大谈其共产主义的人。他常是一个很能打仗的指挥官，当桂系军阀部队即来讨伐围剿，部队面临危险局势而情况急需这样一个善战指挥的司令官时，可以听其言姑妄称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至于他是还是不是，来日方长，可以证实。同时他们成立了一个经过考验具有威信的共产党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都是下级军官、革命士兵委员会的代表，他们大家共同负责，集体领导，分担指挥权。

李明瑞几乎成了他自己一军人的囚徒。在北上桂湘粤三省交界地方，一路上，与其说是他统率全军毋宁说是他们统率他同军阀部队地主武装打了许多回仗。过去士兵们打仗是真真假假要打不打的兵游子，对阵骂仗，逢场作戏似的；现在打起仗来却象下山猛虎，冲锋拚杀，异常狠猛。敌人望风披靡，感到他们不可抵挡。一九三一年夏末，他们进入江西参加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他们协助友军作战围攻惠昌。

这一切，李明瑞事前没有料想到。当一个共产党的军长，每月津贴拿三、四块钱，同手下的士兵一样待遇，真他妈的不是滋味，难受死了！同他们一样穿，一样吃。他个人日常生活琐事如何处理，还要一个军事委员会一个政治委员会来管教他应该怎么办！说来这还不够，一个人睡在山坡上茅屋里冷冷清清孤零零的。在这个穷乡僻壤的鬼地方，要找一个女人消磨一个长夜，还必须装作你爱她，即使有机会她还不同意。钱不钱并不在乎，即使你搞到手，要是闯进一个人被抓住了背后就会插上一刀子。猪狗日的生活！一到晚上就寝，他就想入非非，广州有的是供国民党将军们寻欢作乐的舞女、色妓。茶馆，卖唱歌女，无限欢欣等等。醒来时化成一场春梦。

他知道部队同志中间还有一批人和他同病相怜、心息相通、不甘心这种生活的。于是他走去找他的朋友，一三七团的方团长。说来他们是老交情，谊如手足，比起共产主义一套空谈，他们倍加可亲，无话不谈。他认为，他姓李的在桂系军队当团长时姓方的当营长，他晋升为师长时他一手提拔方当团长，他们是老交情过从很密的老朋友了。

方静静地听着李倾诉他的不满，脸色苍白，最后他问道：“看来你清楚革命对我们一无好处，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李答道：“我们给广州的陈济棠送一封信去，他如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我们就把七军里面许多愿意跟我们走的人拉到广州去。队伍里部分人可能不同意干，但有的会跟我们走。我知道我下命令有一批军官会听我的话照办的。比如小王就是一个，我把他从马弁提拔当了连长。他是一个普通苦力，他现在升官是我一手把他栽培的。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叫他干他会干的，会感恩回报我的。”

“我们如果敢动一下，红三军团会把我们吃掉的！”方不同意。

“不要紧。门路多得很。如果我们搞兵变，惠昌城内的国军里应外合出击红三军团，帮我们解围……要不，我们要求到粤北梅县地区去打游击，我们一到那边就可以投奔粤军了！”

方听着李的计划，然后他说，必须经过反复考虑，才能作出决定。

李可是等不得了。开始找他信任可靠的人谈话，其中一个就是小王连长。李提出让王当营长，假如计划成功的话，还决定派王给广东国民党军阀陈济棠去送信。他想，趁王当选为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工农兵代表到瑞金参加大会的大好机会，拿到通行证后不去瑞金，脱身穿过苏区走广州去。

三天过去了，李起了疑心，仿佛日夜有人在监视他。一天到晚他提心吊胆，害怕死了，走到哪里都有五个警卫员跟着他。彭德怀还跟他谈话说是因为围攻惠昌期间地区复杂情况特殊，军首长必须配备特别警卫员保卫安全。他们都带武器，样子是

民兵赤卫队。

谈话以后他有两个晚上没有睡好，他开始怀疑他的老朋友老同学方团长和老部下小王连长等同胞兄弟来。他想，王去瑞金身带他给陈济棠的密信，这年头出卖朋友的人有的是，他要忘恩负义告密可不堪设想，太可怕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败坏，纲纪荡然，这意味着国将不国，中国会亡，人之云亡，邦国殄瘁！

李明瑞辗转反侧，通宵失眠，他听着帐篷外边警卫员们来回巡逻的脚步声。好象三个警卫员睡觉了，两个还在站岗放哨，最后只有一个人在踱来踱去，四个人睡着了。他想时候已经来到了，在无人可信的时候，他必须只身出走穿过警卫员和红军的岗哨出走到广州才是出路。

第二天夜里，李又躺着听外面的动静。时间在来回沉重步伐声中挨过。几个警卫员睡着了。天快亮了，他小心翼翼地观察，好一阵发现五个人都深入睡乡，有两个警卫员直靠着树躺坐在那里。

李离开了他的帐篷，在警卫员身边走了一圈，然后疾步向黑暗中走去。

“站住！”突然他听到了一声喊话。

他抖了一下，亮了一下手电筒，看见两个岗哨站在他面前不远的地方。尖声对答了一阵，李愤怒地告诉岗哨他是红七军军长有紧急任务。

“口令！”岗哨问。

李不知道这天夜里通行的口令。他傲慢的答称他是军长执行任务用不着什么口令！但是岗哨冷冷地报告，他必须原地等

待有了口令就可移动。

李并不等待，直向岗哨走过去了，一边愤斥岗哨。

一个岗哨又喊了一声“站住！”李泰然自若地直往前走，接着他听到一声枪响，身子一震摇晃了几下跌倒在地。

李在临死前很长时间的昏迷状态中醒转过来时，环顾四周，他躺在红军医院里，木板床附近站着两名面孔严峻的岗哨，一个身穿白衣服的医生和一名女护士站在他的床边。他两只眼睛绝望地来回望着两个板着面孔的警卫员。他痛苦难言，呜呼哀哉寿终歪寝！到死他还是一个囚徒！眼前昏黑，升起一片暗森森的迷雾，自此后他再也没有醒转。

无数想从红军内部搞阴谋破坏的企图这就是一个。阴谋之所以一再破产乃是由于人民群众和红军战士懂得，除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一类封建道德之外，还有其他人民的德性。

第二十二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兴起来了

人们敲着大铜锣，穿过苏区市镇的大街小巷喊道：

今天晚上“太阳落山后在彭湃广场^①开群众大会，大家都到！”

今天晚上，“太阳落山后在彭湃广场开大会，都到！”红军司号员在苏区各地高处山坡上吹起叫人都去参加大会的号声。

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就地参加群众大会，男女代表上台讲话：兄弟姐妹们，我们的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现在推迟三次了。我们不得不打仗，一次反围剿接着又一次反围剿。白军知道我们开大会的计

^①彭湃，中国农民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一九二七年在粤北成立第一个农民协会。其后建立苏维埃政府。一九二九年在上海被法国警察逮捕后，移交国民党后被枪杀。为了纪念他，在苏维埃共和国有一个县和许多街道、广场，以他的名字命名。

划，这是对腐败的无能的、贪污的卖国的、迫使中国民众沦为奴隶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挑战。

白军知道我们的大会是唤醒南北东西全国各地各族人民的号角。白军知道我们的大会会引起各族人民的注意，我国千百万劳苦大众已经采用一种新的制度，我们有了这个新的制度就能争取自由进步，发展经济和文化生活。

帝国主义国民党第三次围剿我们苏区的战争现在已经结束，他们失败了。我们到处胜利了。白匪军烧毁我成百村庄，杀害我二十万同胞。在这次反围剿战争中，我工农红军钢铁子弟兵战士不幸牺牲了六千人。但是我们胜利了。我们正在建设我们荒芜的土地，我们即将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将于十一月七日在瑞金召开，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一切群众组织人民团体，工会、农会、妇联、青年团，一定要作好准备，开好这个大会。你们都要选出代表到期前往瑞金去开会。

准备开大会，意义重大。我们不但在战场上一定能胜利，而且我们在苏区内重建家园、改善生活、加速苏区经济建设也一定能成功。几周之内我们还要研究讨论一切决议草案规章法令，我们的报纸刊物将发表土地法、劳动法，宪法、财政金融经济法规草案，每个苏维埃和每个单位必须公布这些决议法令草案。你们都要参加开会，听草案报告，研究讨论。大会召开的时候，你们的代表必须报告每个苏区的情况和问题。还要详细汇报你们对决议法令草案的内容修改补充意见。

苏区各地群众在集会后掀起了宣传热潮，墙报和大小报刊

上登满了有关大会的消息和建议。时日推移一周复一周过去了，群众参加大小会议和学习班。

大会在中国普通老百姓生活中可是史无前例的特大事件。它是千百万人多少岁月、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社会发展的历史里程碑。据研究中国社会革命历史的学者们说，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派施行白色恐怖以来到一九三一年为止，被血腥镇压屠杀的男女人数达一百万之多。在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分子盘据的城市里，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惨遭屠杀，令人发指；在农村，洗劫村庄杀害农民是司空见惯的常事。成千上万的人被关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监牢里。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千真万确的是在白骨成山的烈士尸体上站起来的，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则是怀念死难烈士们的纪念碑。

召开苏维埃大会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事。早在一九三〇年五月三十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们在上海秘密举行过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会议，提出了第一个苏维埃法令草案。代表们来自全国各地，苏区和红军派出的代表决定十二月十一日广州起义四周年为苏维埃一大开会时间。会后他们返回各地继续做准备工作，由留在上海的筹备委员会负责完成会务安排事项。

但是一九三〇年冬，帝国主义国民党对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战争开始，红军作战一冬，大会只得推迟到次年上海五卅惨案纪念日召开。

从此苏区的战争频繁，持续不断。正如白匪军勾结帝国主义国家绞杀俄国革命一样，中国统治阶级也同帝国主义联合

勾结，共同反对中国革命。他们对历史一无所知，尽管中华苏维埃大会三次延期，工农红军的力量却在日益壮大，每次战斗带回各种打着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钢铁大王烙印的武器。每一次白匪军围剿失败，成千上万革命工农迅速武装起来，反动势力阻挡不住革命力量的前进。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地区暗无天日灾难重重，地下工作者每天面临死亡的威胁。一九三一年一月，上海苏维埃筹委会二十四个工作人员被穷凶极恶日夜巡逻的英国警务人员逮捕，移交给国民党后全部被杀害。

二十四人的命运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悲剧。这个悲剧透露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是一丘之貉的反动本性。

受难者只有死亡站在毫无人性的上海特种军事法庭上拒绝招供，忠于主义，忠于党，为革命献身。国民党军事法官命令上海特务帮徒们，开动机器让囚徒“清醒头脑。”于是，女囚犯的乳房被挖掉，男囚犯的睾丸被割掉，指甲剥光，膝肘关节打断，遍体鳞伤，骨肉肢解。然而酷刑并没有使志士们屈服，他们是革命的硬骨头，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

拷打前，一名囚徒与其他难友隔离，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很有学问和才华。他被押上飞机，解到南京同蒋介石见面。蒋氏向他提出投降条件，许诺随意挑选要职机会，他概然拒绝。金钱、美女、高官厚禄，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一切恩赐，对他视若粪土，他一心向往梦寐以求的是中国人民的未来，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于是他被解回上海同其他同志们一起遭受严刑拷打。

二月中旬的一个冬天的晚上，二十四名囚徒被押出监外处死，同牢的难友同志们听到国际歌声和沉重的铁镣声，他们知

道这是英勇的战士们慷慨就义的前奏。囚徒们在黑暗中带镣走着，被迫自挖墓坑，他们边挖边唱，国际壮歌鼓舞着普天下的穷人面对死亡起来斗争的勇气。墓坑挖毕，五个烈士被活埋，其余被枪毙。二十四烈士的追求真理，战斗不息，为人民献身视死如归的凄绝悲壮的歌声，使得国民党行刑刽子手们心惊胆寒，士兵们深受感动。

对二十四名共产党员英烈以及多少这样的无名英雄的镇压，并没有阻挡住人民革命的洪流，工农红军反围剿从胜利走向胜利，工农知识分子如百川归海踊跃参加红军。他们赤手空拳，夺取敌人的武器，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

这是一九三一年灿烂的秋天，锣声号角催促群众开会，苏区边界的各处红军各连队，还在打仗，这时红军总司令部带一个警卫师穿过赣中苏区向首都瑞金前进，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首都瑞金举行。

筹备会在瑞金工作几个月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几个月前进入苏区，有的在红军里作战，有的到瑞金参加大会筹备工作。

大会地址瑞金，过去是封建地主城堡。房屋建筑寺庙医院没有破坏，现在是学校、医院俱乐部、政府机关、群众团体办公的地方。南关外有市场，是四郊农民同小商小贩城市居民家属主妇进行交易的场所。他们通用江西工农银行的钞票，工农银行的货币甚至在国民党交界地区内流通使用，它比国民党政府不值钱的纸钞票更有信用更值钱，因为工农银行有黄金白银储存，那些金银财宝都是从地主，官僚的家里挖掘出来的，本是人民血汗积累的财富”。

红军总部和警卫师在瑞金城北十里外的叶坪村驻下来，由于白匪军知道开大会有可能派出飞机轰炸瑞金，所以筹委员选择叶坪作为防空疏散开会地点。

叶坪作为大会地址是大会筹委会经过多次演习后才最后决定下来的，村名叶坪，因为全村居民都姓叶。田地山场都归叶姓所有。族长是一个富农，叶姓贫雇农都成了赤卫队员，但同富农们住在一起生活，那些富农拥有大量土地雇用长工种田，发放高利贷，实际上都是些小地主。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地址，叶姓贫农和赤卫队员愿意在叶氏宗祠里召开，但富农们对苏维埃一切措施暗地里从中作梗。富农们奔走串连，互相抱怨苏维埃不但分了他们一点土地给穷人，现在还要占用叶家祠堂，搞得叶家先人在天之灵不得安息。他们信口雌黄，各家鼓动。说到分地没有人理，他们也就闭口不提。说到先人在天之灵，人们听着他们唠叨不止，真的惊动了叶氏祖先在天之灵，罚谴立至，真有大难临头之感。

筹委会召集叶姓族人开会说：“叶氏宗祠既大又宽，能作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场的大庙又没有，我们丝毫没有中伤叶姓人感情的意思，如果你们答应把祠堂借给我们开会用，我们将另盖一座新屋安放你们祖先的神牌、匾额，我们会小心谨慎把牌位移到新屋里不会有丝毫损伤的。

叶姓人对这个建议感到并无不妥之处，个别富农还在鼓簧弄舌，但新屋盖好了。

叶家祠堂里面的大厅厢房和两廊很多小房间可供各委员会办公开会用，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祠堂里召开，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祠堂诞生。

祠堂周围大草坪很开阔的，一直延伸到树林参天的山边大森林一带。警卫师把部分草地进行平整，赶忙在一头修盖机场棚地停放打落的白军飞机。他们在祠堂附近搭了一座巨大宽敞的凉席棚，作苏维埃代表们的食堂。棚顶下面摆着饭桌成五星形，足够一千人就餐。

筹委会下设登记处和招待处两个委员会，交际委员会负责安排代表们的生活事务，他们在离叶坪三里外的扬溪接管了三座大屋两个祠堂作为宿舍，他们在瑞金指导作衣服，每个代表一套衣服，一顶帽子，两双袜子，一双布鞋。代表服装象红军军装蓝棉布裤，上衣翻领钉有领扣，草绿色工人帽，帽子上一颗红五星，一条红带上绣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字样，衣袖左臂上有一颗红星，胸前一条三角形丝带上印有登记号码。

十一月五、六日两天，全体代表穿着接待制服到接待委员会提交委托书。这些代表来自全国十八个省市，苏区各县和红军各军军团。几个主要方面军的红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亲自出席了大会。代表中不但有从国民党帝国主义占领的大城市，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党，共产党青年团的代表，还有国际红色援助反帝同盟，左翼作家协会，艺术家，戏剧家，教授以及抗日团体等组织的代表，一个台湾代表团。还有一个朝鲜派出的代表团。

群众团体代表人数有六百多人，加上红军各连队代表，总数近一千人。他们差不多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工农知识分子老中青都有，大多数代表年青，在三十岁以下。年纪最小的十

五岁，是一个少年先锋队队员。年纪最大的是一个农民老太太年近六十，她步行六个星期才到叶坪。

大会代表里有五十名妇女代表，其中最能干的一位是上海纱厂来的女工。还有其他白区工厂来的女工代表，一个是上海纺织厂的女工，一个是广州织布工人，还有一个华北来的女医生。

这是遍及全国各条战线上的男女和青少年组成的一个身经百战，遍身创伤，艰苦备尝的革命军团。有的拿武器同白军作过战，有的在大城市工厂的秘密小组里，很多人被追捕负过伤，更多的人坐过牢。一个上海来的代表带来一首上海囚徒歌，这首歌后来发表在上海一家报纸上。大会开幕第一天这个代表唱了这首囚徒歌。

在这阴森的囚牢里，我们的革命诚可怜。
饥饿寒冷不名一文钱，
我们的人数那么多，无处吐诉不准回一言。
剥夺身体和自由，不见太阳和青天。
沙子饭，小菜无油盐。
长夜漫漫，臭虫虱子乱咬不能眠。
父母常思望，妻儿战友难相见。
遭遇待遇真难堪。
干吗不相联，
全体难友，快快去同暴君作战，一致要闹监，
相联就能并肩战。
万众一心烧毁森严的高监，

联合起来恢复自由权。
酷刑，世人不知道。
包打听抓人，私刑逼供信：
 加给我们身上的
 老虎凳三上吊，电刑真难熬，
野鸭子凫水，手脚全绑牢，
鼻孔冰水浇，身上皮鞭子敲，
三番四复，死去活来，真是无人道。
皮鞭加竹杠
在这地狱里真惨无人道！
狗党们鞭打吧！
决不招供，意志要坚决。
肉体受痛苦，
精神坚贞不屈永不挠，
我们知道时候会来到。
我们复仇的时候一切都要报！
团结起来，齐心战斗，
团结是力量，烧毁这地牢。
团结一致恢复自由权！

这首歌唱出以前，叶坪还发生了一些事。镰斧红旗在大会屋顶上高高升起。工人们在礼堂内安装电灯电线，把接头联接在吉安缴获的吉安发电机上，一切就绪。老乡们围在旁边疑神疑鬼地说：红军本事真大，千真万确什么都能干，我们老百姓在苏维埃政府号召下联合起来，也能干很多事。人们还能造古怪的

机器，转动机器，但是深更半夜一片漆黑，能发光的人可没见过。群众围观，议论纷纷，挤满了好奇的农民，一个电工走上去推上开关接头，大会堂几百盏电灯顿时大放光明。

大会堂的电灯电线装好后，又用松柏树枝装饰布置，壁上满挂群众团体送的锦旗，庭柱上高悬苏维埃巨幅标语口号，过去安放灵牌神座的壁龛，现在搭起一座宽大的主席台，供报告人、军乐队上面坐。台边放着一部从白区大城市搞到手的收音机扩音器，苏维埃能从空中收听消息了！台前一条红布横幅两头绣着耀眼的红星，中间现出“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几个方块大字。

大会堂有四个进口处，祠堂每边都有门。主要进口在前门。门外进口处高挂绣有斧头镰刀的大红绸旗，一面苏维埃国旗，一面共产党旗。广场到大门口装饰着松柏常青绿树，菊花丛中嵌着两个巨大的银星，苏区白银丰富，五星用白银铸成。

食堂里也用常青树枝和红条长幅装饰，上面有标语口号，飞机棚里陈列打落的敌机。上面飘着红旗。

十一月七日清晨，月儿弯弯隐没在西山峰头，叶坪动起来了，红军总部一片沸腾。指战员筹委会工作人员忙进忙出。六点开饭，人们顾不上也不想吃。红军战士们精神焕发，神采奕奕骄傲地排成双行，队伍从大路一直站到大会礼堂进口处。大会堂里面警卫员们已站好岗，司号员和军乐队在台上就位。男同志们急忙检查会场四周扭动开关看电灯亮不亮，女同志们检查桌位，标语横幅悬挂位置是否合适，对“勇敢，勇敢，再勇敢！”一联作了改正。把“学习、学习、再学习！”一联移挂到另一根柱子上，留下空白地方悬挂上海制造厂工人送的一面

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侵略中国的锦旗。

六点，司号员们吹起黎明的号角，节日正式开始。号声冲破山谷。号音未落，叶坪周围群山峰顶到处发出了回音。十多万露宿山林坡地来自苏区各地庆祝大会开幕的工人和农民，一听到号声就把准备好的鞭炮点响齐放。群众早在几小时前就起来捆好被包，吃过早饭，饮过早茶。他们里面有剧团戏班子，在苏区各地巡回演出革命文明戏、唱京剧的艺人。据说有十四个新旧巡回革命剧团来到瑞金，为到会代表和群众演出节目，庆祝大会的召开。

军号在吹，鞭炮在响，苏维埃代表们两人一排，从扬溪顺大路齐步走下山坡，大家穿一色新制服，五星帽徽红领章闪闪发光。代表们步伐整齐走到叶坪，红军警卫师部队举枪敬礼，朝天鸣枪，一再致敬。山头涧谷，大路两边跟着发出一阵阵雷鸣般地欢呼声象飓风掠过松林呼啸号叫。

代表们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地走过大会进口处警卫队伍中间。当他们步进祠堂时，台上的军乐队开始奏起国际歌。代表跟着唱：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的罪人！

.....

这歌声把叶氏祠堂里残余的祖先崇拜气氛一扫而光。

代表们各就各位坐下来，眼见到共青团和少先队组成的军乐队据坐台前，紧张严肃精神抖擞仿佛他们正巍然屹立在中国历史的大门口。他们唱起了少年先锋队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之

歌。他们的队伍成队走出会场门口时，一队红军从走廊走到台前，齐声唱出最流行的红军进行曲：

同志们，你拖枪，我拉炮，

一齐向前扫，

阶级敌人真万恶，

努力去征讨！

同志们，争民主，向自由，

保我苏维埃。

帝国主义反革命，

打倒国民党！

同志们，快向前，快冲锋，

快打国民党匪军！

帝国主义的死走狗，

屠杀我工农，

帝国主义的死走狗，

屠杀我工农，

同志们，快觉悟，快看清，

哪些是我们的敌人！

帝国主义国民党，

地主和豪绅，

帝国主义国民党，

地主和豪绅。

同志们，你拖枪，我拉炮，

一齐向前扫，

阶级敌人万分恶，

努力去征讨。
阶级敌人万分恶，
努力去征讨。
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
向着光明走。
你看黑暗已过去，
曙光在前头。
你看黑暗已过去，
曙光在前头！

接着又唱起了扩大红军之歌：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
官长士兵相亲近，没有人来压迫人。
当兵就要当红军，我为工农争生存。
人民胜利齐欢笑，不怕苦来不怕穷。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闹革命。
会做工的有工做，会耕田的有田耕。

唱毕，军乐队指挥宣布，他们现在唱由红军战士作曲谱成的一首过去没有唱过的新歌。歌调是这样的：

当兵就要当红军，
处处工农来欢迎，
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
配合工农打敌人，买办豪绅和地主，坚决打倒不留情。

退伍下来不愁贫，会做工的有工做，会耕田的有田耕。
冲锋陷阵杀敌人，消灭反动派国民党，民权革命快完成。

红 军 歌

同志们快起来拿起枪，我们是工农的武装，
要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要创造人民的新世界，
敌人在发抖了，奋勇向前冲，
我们是无敌的红军，
拚热血头颅把革命完成，这是我们神圣的战争。

还有一首歌词是这样的：

我们工人们，
斗争开始了，
拿起我们的铁锤，
勇敢向前战，
拥护苏维埃！

我们农友们，
斗争开始了，
拿起我们的锄头，
勇敢向前战！

我们士兵们，
进军开始了，

上起我们的刺刀，
勇敢向前战！

乐队向代表们致敬后，退出会场投入集合在山坡草地上的群众里面，用他们新的战歌教导老百姓歌唱，欢乐歌舞，团结战斗的气氛充满原野。

红军军乐队退场后，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走到主席台前宣布：

“我宣布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接着，中国红军总司令朱德以中国工农红军的名义向到会的代表们致欢迎词。接着中国共产党军委总书记毛泽东讲话，然后中央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项英讲话。项英是上海印刷厂工人出身，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在江西负责苏维埃中央临时中央政府常务工作。

大会上午发言的还有共产党和红军部队其他领导人。他们向大会代表致欢迎词。十二点，大会休息，午餐。一点代表们回到会场选举主席团成员。议程完毕，王稼祥宣读主席团三十七人的名单和事迹。第一个是总部设在上海的“红色工联”中华全国劳工组合主席。接着是一个铁路工人，一个湖南矿工，两名印刷工人，一名福建造纸厂工人，一名天津卷烟厂工人，几名红军和党的领导人，有三个妇女，一个农民，一个雇农兼女游击队长，一个上海棉纺厂女工，其他是产业工人和知识分子，许多人在红军里打过仗。

五点大会休会吃晚饭，六点代表们回到会场看一个革命剧团演戏。演出结束，一个人讲话宣布收听广播，听各地各国人民

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节、和中国革命今天这个历史性节日的实况。

打开了收音机，场内清楚的响出一个乐队正在演奏一首沉闷的黄色歌声。

“这是莫斯科演出的庆祝节目吗？”一个妇女张口结舌的问道：“是马尼拉的”！在收音机前调整开关的人答道。接着是上海广播电台播送的一个爵士乐团的辛辣刺耳的音乐，充满歌手们喧哗吵闹世界末日来临的噪声。

收音机旁工作人员，把调正器拨到北平电台，只听得这时一个北京京剧旦角尖声尖气地在唱着凄凄惨惨，嗯嗯切切的深闺怨腔调。

工作人员把调节器拨到东京电台，一个日本政客正在演讲“太平洋危机”，说日本皇军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对日侨生命财产实属必要，更重要的是在于筑起一座防止亚洲“赤色威胁”的堡垒。

代表中间有懂日语的，他们边听边翻译。听众听着非常愤慨。

然后收音机发出了一个人用俄语讲话的声音。一个红军指挥员开始速记。苏维埃大会听到西伯利亚哈尔伯路甫斯克的苏联红军远东司令部，关于俄国十月革命节和五年计划的讲话。

听众安静下来，听广播也有人翻译。讲话完毕播出俄国革命歌曲，最后是国际歌，听众也随声附和，好象歌声就在大会场里绕梁不绝。代表们起立，歌毕，第一天会议结束。

大会第二天，代表们报告经济情况和国内各地革命斗争现状。报告整整进行了一个星期。一个闽西农民代表作了长达一小时的报告，他说：

“一九二九年我区农民起来暴动，烧了地主所有一切地契、文书、债券。怎么办？大家都不知道……过了三个月以后我们才动手分土地……因为中小地主和富农当权操纵农民协会，他们削尖脑袋钻进苏维埃政府机关，因此引起了强烈的武装斗争……。

“今年我们根据共产党颁布的土地法规定解决土地问题，按照农民的劳动力结合人口需要分配田地。可是这更加激起了无休止的武装斗争。大家知道，社会民主党和他们的走狗今春发动了反苏维埃的武装叛乱……幸亏我们的红军帮忙，我们才把他们清除干净了，你们已经看到我们在打汀州附近召开的群众公判大会材料。现在我向各位代表更详细的谈一谈……。

“我们把A·B团首恶都枪毙了，把苏维埃重新掌握在人民的手里……。

“可是反革命分子是决不罢休轻易放弃他们的既得利益的！他们如今采取类似共产党的方法，宣传鼓动成立什么农民苏维埃和另搞一个农民党，他们以此来分裂农民和工人的团结。他们恬不知耻地说什么土地可以归农民，不必还给地主了。”

报告继续进行，代表们讲话摆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有的问题解决了，有的问题悬而未决。

大会每天活动七小时，晚上各个代表或委员会碰头，起草苏维埃国家新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和教育、经济、财政等法规，以及加强红军训练和照顾红军家属的决议等。

宪法最后准备好了。它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任务，在于保证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这个民主专政的目的是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华的势

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发展国有经济。

“全部苏维埃权力是属于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所有劳苦民众都有权选举代表掌握管理政权。”

宪法规定的范围很广泛，它剥夺一切剥削人的反革命分子的政治权利，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给予中外革命战士避难庇护的权利。最后一条即第十七条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张同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站在一条革命战线上，结成同盟，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苏联是它的巩固的同盟者。”

土地法规定，第一次苏维埃大会承认，没收和分配一切土地是消灭农村奴隶制封建关系唯一可靠的方法。法律上承认分地是合法的，没收封建地主、军阀、豪绅、寺庙、宗族的一切土地和财产。对于耕种，老人、孤儿寡妇、残废红军战士和家属的土地还作出有关规定。

劳动法规定，一切成年工人普遍施行一天八小时制，矿山工人危险工种工人除外，一天规定六小时或七小时。十四岁以下儿童禁止作工。十四岁至十八岁的青年工人一天工作四小时。这个劳动法的规定非常详细，范围广泛，它采用工厂工人管理委员会，社会保险，休假、病假照付工资，妇女产前产后产假各四周，工资全付。

关于工农红军的决议中宣称：红军在土地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显示，它本身是决定胜负最有威力的武装。它激起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资产阶级、封建地主、农奴主、官僚主义、警察、刽子手、传教士、特务、白匪军等等一切革命的敌人的最大敌视和仇视。这些敌人动员了一切反革

命力量和一切军阀部队，向工农红军一再进攻……这一切，证明工农红军是土地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革命斗争的武装力量。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军队是同群众相脱离，制造分裂，压迫工农，奴役殖民地人民的反革命武装。红军是工农民众翻身求解放向反动派作战的军队。红军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有高度觉悟的革命战士组成。红军中每个战士都知道他作战是为了自己切身的阶级利益，他是在为人民群众服务，是不会用来压迫劳苦大众的。

红军决议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苏维埃政府最高军事机构。朱德当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国一切工农红军部队的总司令。红军还成立军事院校、医院和疗养院。

代表们一有时间就参加群众大会，出席作报告。有关大会日程在报纸上每天发表，在群众大会上宣读，每个人都知道大会实况，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不断从苏区各地涌到瑞金和叶坪。

江湖艺人戏班子搭起临时戏台在群众中唱革命戏。农民武把式不时在场地上打拳、舞剑、耍刀弄枪招徕大群的人们观看热闹。

十一月十一日晚上开提灯庆祝会，大会全体代表和红军战士同群众一起参加盛会。人们成群结队走过会场前面的大草坪和飞机场，向大会代表们致敬。他们挥着红旗锦旗彩旗，提着五颜六色大小各式彩灯，上面写着“拥护苏维埃！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土地归农民和士兵！……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消灭地主资本家”，等等口号。

游行的队伍，喊着革命口号，敲锣打鼓，人山人海，载歌载舞。江湖艺人穿着奇奇怪怪的戏装，扮演生旦、小丑及各种角

色。一群扮作肥地主，脖子上系一根绳子，由一个红军战士牵着的人们走过去了！又过来一群身穿西服的洋鬼子，头戴高帽子，嘴上挂着红胡子，帽子上写着英帝国主义字样。他们前面走着几个戴着脚镣手铐，背上写着“印度”、“爱尔兰”、“埃及”、“阿拉伯”字样的囚徒。一个红胡子法国帝国主义拉着囚徒，越南在背后走，一个美国洋鬼子一手拖着菲律宾，一手拖着尼加拉瓜。一个又矮又跛的日本东洋鬼子，拿着一根鞭子，头顶上噼啪噼啪挥舞着“台湾”、“朝鲜”、“东三省”的牌子。

一个帝国主义，一手牵着一群化装成满地跑的屎狗过来时人们一见哈哈大笑。他一手牵着脖子上系着绳子，化装成狗，背上写着蒋介石，陈济棠，阎锡山，汪精卫等人。这些“帝国主义走狗”，有时互相打架嗥嗥狂吠，你咬我打，那个帝国主义不时回头鞭赶大喝“不要自家咬架了！……咬红军去！”他们那群走狗汪汪狺狺摇头晃脑乖乖地听话跟着走。

没有尽头的游行队伍提着明亮闪耀的灯笼走过乡村，穿过瑞金的大街小巷，走过一个村庄又过一个村庄，然后又翻过弯曲迷离的山路。老年人带着孩子留在家门口应接不暇。如果一个人站在苏维埃大会场前的大草坪上，就可以看见万盏灯火，在万山丛中时明时暗。提灯庆祝晚会热闹了一整宵，直到天明人们才回去休息。

几天以后又举行了一次盛大庆祝会。这一次是检阅工农红军。

守卫苏维埃边界上的工农红军各个连队，每个连选出三名战士前往瑞金参加这次检阅。十一月十五日清晨五点，大会代

表和无数群众，集合在草坪周围的山坡上和飞机棚边，观看纪律严明的钢铁子弟兵工农红军的队伍走过。

大会进行期间，各地红军胜利战报雪片似地飞来。这里又攻破了一座城，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那里又打垮了白军一个师，缴获了全部枪枝。大会闭幕时传来了国民党军阀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宁都兵暴全军起义的消息。三万人参加了红军。这次宁都兵暴起义的一个师正开到瑞金向大会致敬。

十一月二十三日大会最后一天。男女工作人员在黎明前赶到大会会场检查一切是否正常。这一天贴上了新的标语口号，因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新的标语口号必须到处张贴。每个代表座位前面放着一个油印本本，大会一切提案议事记录都打印出来了，每个座位上放着一大包礼物，每个代表给一套普通新衣服，两双袜子，一双布鞋，饼干和果品等。

最后一天的气氛比以往更有战斗性。国际歌的旋律绕梁不绝，代表们起立举手通过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委员会，中央委员名单一直等到读毕才坐下来。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革命军事委员会都是最有作为、最有经验的中国革命领导人。仅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有四十七名委员。他们是产业工人、贫雇农、红军、共产党、工会和苏维埃领袖们，共产党书记毛泽东当选为这个委员会主席，印刷工人项英和张国焘当选为副主席。毛、项、张为新工人阶级国家的政治首脑。举世无双的军事领袖朱德当选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全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

政府委员全体名单和大事记读完后，毛泽东走到台前开始

作报告，总结大会的成就和目的。他阐述革命的主要任务和摆在代表们面前的艰巨使命。许多代表在回到自己的地区以前，将到苏区各地视察工作。苏区代表们检查新的法令生效执行情况。帝国主义国民党地区的代表们回到白区在法西斯恐怖下进行斗争。他们的任务不但要组织群众，而且要把大会的情况及其成就在群众中宣传鼓动。每个人坚守自己的岗位作战，维护铁的革命战线，忠心耿耿地坚持共产党的政策。

毛泽东报告后，一个代表宣读告全中国人民书。这个声明讲到只有革命才能解放中国。帝国主义的仆从国民党扮演绞杀革命的角色。它最后号召向日本帝国主义宣战，中国人民成立义勇军，夺取中国军阀反革命的武器武装自己，对帝国主义及其仆从主要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开始民族革命战争。

接着还有一个加强同苏联的团结，告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政府的宣言。它通知各国政府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目的在于消灭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把一切外国军队赶出中国，收回一切失地和外国租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确认外国同中国南京政府或任何军阀政府签订的一切贷款和条约义务。声明呼吁世界工人阶级支持中国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共同奋斗。

下午，许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领导人讲话。晚上，其他代表们宣誓，终身奋斗干革命。快到半夜时际，最后一次唱国际歌。歌声终止，大会闭幕，一个代表起立高呼：

“武装保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与会代表一千多人齐声高呼：“武装保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此，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结束，年青的中华工农共和国掉转她历史的面孔向着世纪的未来。

《中国的红色风暴》序言

罗伯特·摩尔斯·洛维特

一九一九年冬天，我听到一个没有得到美国政府承认的外国代表印度青年以发表演说的罪名受到缺席审判，因拒付一万美元保释金被关在纽约汤姆坟监狱的案件。在为这个案件奔走呼吁中，我第一次见到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她对东方被压迫的民族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斗争寄予深刻同情。通过她的奔走努力，那个印度青年得到免刑释放。这个案子不过是这个国家在英国授意下迫害印度流亡者的无数案例中的一宗。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被捕的印籍人士和装运武器前往印度定为有罪刑满释放的人们，经过多方交涉遣还印度。为了保障那些印度友人的政治避难权利，我们以社团名义作掩护，成立了一个“争取印度自由之友”社(Friends Of Freedom For Indie)。史沫特莱女士担任了这个友社的秘书。美国公民和政界惟英国当局马首是瞻，真令人作呕。我们在每一个问题上同那些具有强大影响的英国代表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史沫特莱女士在她的《大地的女儿》一书中提到了印度友人的事。她成为推动我们

友社工作的核心力量，不屈不挠，随机应变。她以惊人的敏智和勇气带动大家去应付各种艰难险阻。英国政府极其粗暴地对待争取印度自由之友社。我们执行委员中一个执委被驱逐出英国，对另一执委詹姆士·毛雷尔拒绝发给签证，第三个执委罗格尔·鲍德温只准假释一周去访问一个英国议员。但是英国当局却把全部私愤发泄在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身上。

一九二〇年史沫特莱女士离美前往德国，在一艘轮船上当服务员。她到苏联一个研究会工作半年，后在德国直到一九二八年。她参加印度革命运动，同亚洲各族人民的杰出人士朝鲜人、日本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埃及人、阿拉伯人，特别是中国人往来密切。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一日，她以《法兰克福报》驻中国特派记者身份到达中国东北。一到哈尔滨她就发现英国当局在找她的麻烦。在哈尔滨得悉英国秘密警察违反事实，控诉她是大英帝国的臣民，有吊销她的美国护照的危险。她避开美国领事馆，旅行到华北，了解到国民党镇压革命罄竹难书的万恶罪行，她在一封私人信中说：“有个时候我想，我真麻木不仁、神智不清了。因为，不但在战场上抓到的工人和农民象牲口一样在大街上被砍头示众，就是在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从大学学府、家中被窝里拖到街上拷打杀头。我的朋友有几个就这样被杀害了”。在她的《中国人的命运》一书中的有关章节，对种种惨痛经历作了权威性的报道。

到上海后，她发现她发表在《法兰克福日报》上的文章引起了南京政府及其外国伙伴的注意。他们以劳工部顾问的官爵来收买她。德国总领事要她撰写一些有利于促进德国出口的报告。她到镇江、无锡一带好几个星期调查研究土地问题。一九

三〇年春夏间，她为调查国民党统治区的广东省丝绸凋蔽原因到广州去写她的调查报告。就是在那里她被逮捕的。又是英国秘密警察，对她起诉胡说她不是美国公民，而是共产国际的代表，持假护照旅游。我还记得当时收到史沫特莱女士拍给我们她处境危险的电报。幸亏当时任国务院助理秘书的约瑟夫·柯尔顿先生挺身而出、果断处理了这件事。“德国和美国总领事救了我的命”。史沫特莱女士后来写道：“然而我必须说，美国总领事在履行应尽的职责时好象很生气似的。他是一个殖民地老官员，认为我对亚洲国家所持独立的观点是大逆不道的。”

同时在上海的德国商人想方设法要《法兰克福日报》解除史沫特莱女士的记者职务。英国驻法兰克福领事一再提出类似的要求。英国驻华记者对她发动臭名远扬的人身攻击，说史沫特莱女士寄居上海法租界的公寓附近有几家白俄开设的商店是地痞流氓、特务匪帮活动的中心。史沫特莱女士写道：“多少星期我决不单独走进那些商店或离开我的住处。”她的信件是拆开了的，许多信件被没收。对她跟踪钉梢，从一九三五年马来爵士到中国提出类似的抗议中得到骇人听闻的证据。邮局局长回答马来道：“没有的事，马来爵士，我们不没收阁下的航空信件。外国人的信件我们只没收一个人的，那就是史沫特莱的信件。”

《法兰克福日报》这时根据德国外交部的指示解除了史沫特莱女士的记者职务。她在中国停留了一个时候，同孙中山夫人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抗议非法监禁，杀害政治犯的秘密法庭而斗争。国民党镇压这个团体，威胁同盟领导人不放弃“共产主义原则”斗争者

处死。中国电讯报道同盟总干事知名的经济学家、中央研究院理事会副主席杨铨先生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被暗杀。孙中山夫人躲藏起来了。史沫特莱女士的健康在这以前已不能支持，因此她不得不赴高加索疗养院去治疗心脏病。在那里她动手写作这本书。

近年来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即中国国内有个苏维埃国家。自从国共合作破裂以来，仰赖西方列强的国民党政府致力于反革命的讨伐战争，镇压民众以图自存。美国公众读过我们的通讯记者笔下描写的连年“剿匪”情况不实的报道。史沫特莱女士的《中国红军在前进》，对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的中国内战作了栩栩如生、确实可信的说明。她的报道取材于亲身参加者提供的材料，从中以第一流战地记者的技巧对素材小心谨慎地作了处理，共产党红军领导人朱德、毛泽东、彭德怀等天才的军事家，非常逼真的人物活跃地出现在书中。记载了斗志昂扬、士气振奋的红军战士们赤手空拳、每一支枪换一条命、从讨伐他们的敌人军队手里夺取武器弹药装备自己、露天宿营、野地行军和饥寒交迫的情形，使人记起华盛顿在富革河谷冬天的艰险处境。神出鬼没、惊心动魄的游击战争，使人想起科中摩罗逊和苏特的英勇战绩。群威群胆，可歌可泣，奋起参战的妇女和儿童，与古往今来世界一切历史上的英雄气概比美相映生辉。关于苏区执行的土地制度，从地主残酷剥夺下得到解放的农民，以及真正文化革命的觉悟等等报道，特别值得重视。看来很清楚，共产主义如果在中国要获得胜利，它必须立即满足人民的直接要求才能取得成功。同样也很清楚，共产主义的成功决不能诉诸武力，只能出于说服教育。红军政治部的活动

为农村老百姓乐见喜闻而拥护接受，它是红军最主要的特征。而白军的致命弱点就在于它总不听群众的呼声，反而镇压自己的同胞。由此可见，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是具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的。正因为这样，知识分子，如同印度爱国人士在美国，遭到外国警察的秘密追捕，本国独裁政府的迫害。由此结论：苏区是全中国统治管理最好的地方，相反的论证是很难成立的。

就美国人这个名词的历史涵义来说，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一个美国人。真正的美国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在我读她的书《大地的女儿》以前我并不理解。《大地的女儿》这本小说是否是她的自传我不得而知，但书中题材，美国西部生活的冒险生涯和传奇结局，肯定说来是逼真可信的。它好象是从美国文明的边疆对印度的政治运动、俄国的社会改革实验以及中国的革命，发出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远方呐喊。但是同那些驾着蒋介石的轰炸机，表现美国革命传统的世界主义作用的美国青年相比，史沫特莱女士更为杰出地保持了美国革命传统的观点。她严格要求自己，作为一个美国公民的权利；她还极力维护和现身说法，阐明她的清教徒先辈们对那些反抗强暴掠夺和外来统治、争取自由的民族寄予同情和热情赞助的淳朴美德。面对漠不关心、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同胞，冷对狡诈阴险、其心狠毒、势不两立的敌人，她坚持了信念，讲出了真理。一个妇女同一个帝国作战，在这场斗争中她没有政府公职、后台地位、而鼓舞她奋战不息的力量又是什么？令人鼓舞、值得骄傲的力量即她是我们美国妇女的同胞姐妹。我们可以把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同某些报道荒唐的记者、剥削成性的商人、趾高

气扬的外交官、远洋舰队司令官、军火飞机制造大王、志愿飞行人员等等，所有同国民党往来的美国人士相对比，她站在这些美国人士的对立面，以身作则、奋发有为。表现了美国人革命的传统性格。当然，一个人单枪匹马、要打败一个世界敌人而孤军奋战能取得成功，是希望渺茫、难以设想的。然而，她这些关于远东社会力量，中国社会制度的真实报道，可以唤起美国社会的公论。对远东的社会势力，作出新的评价，并对深恶痛绝的中国社会制度作出新的评价。



大地的女儿

我面前是一片汪洋的丹麦海。冷清清，灰沉沉，广阔无垠，海洋和灰黯的天空融成一片。一只飞鸟，张开两翼，在海上翱翔。

我在这里寄居几个月了，凝望着海——提笔写这一篇人生的故事。我写下的不是一件供人在闲暇时鉴赏的精致的作品，也不是一支能够使人心旷神怡，忘却世间烦恼的乐曲。这不过是在绝望和痛苦中所写的一篇生活的故事罢了。

我描写地球——就是我们全人类由于某种奇遇偶然生存在它上面的那个地球。我描写贫贱的人们的快乐和悲哀，写他们的孤独，写他们的痛苦，也写他们的爱情。

这些日子，我面前的天空，正和我的心情一样黯淡，渺茫无涯——也正和我的生活一样。我活了三十年，这几十年里，我尝遍了苦涩之泉，我曾经恋爱

过，在那短短的时间里，痛苦算是离开了我，可是有时候爱情本身就是痛苦的。

我现在正站在一种生活的尽头，快要踏进另一种生活的门槛。我正在沉思，正在估量。我的四周是过去生活的断壁颓垣。如今，认识和毅力代替了盲目的信仰，经验给了我知识，我不再是懵懵懂懂的了，我有了工作，它的范围与意义都是无穷无尽的。这些还不足以抵得过爱情吗？

我注视着水面遐想。我曾经一度这样想：还不如到海底里去寻找我的前途哩。但是现在，我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我记得母亲有一条百衲花被，是她拿鲜艳夺目的碎布镶成的。她还缝过一条暗蓝色的被。那蓝被，我看一会儿就够了，那百衲花被，我却恋恋不舍地看了又看。对于我，这是一种奇遇。

我将把我这些生活的断片收集起来，缀成那样一条百衲花被，或者刻成一件花样有趣参差有致的镶嵌工艺品——这也会是一种奇遇吧。

死，也会是美的。但我不是那种为美而死的人。我属于为了其他原因而死的一类人——为贫困所折磨，为财富与权威所欺凌，为了伟大的目的而奋斗的人。我们中间也有少数人的死是由于经历了爱情的痛苦或幻灭而感到绝望，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说来，“地震反而开辟了新的泉源。”因为我们是属于大地的，我们的斗争也就是整个大地的斗争。

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件记忆，是一种异样的爱情与神秘的感觉。我那时还实在太小，所以只能回想起当时的一些感觉——

此外什么也不记得了。我记得父亲在睡梦中紧紧抱着我贴在他庞大的身躯上。这究竟是记忆的开始呢……还是一种梦境？

那时候，我顶多不过一岁——因为这时比九十年代中期，我和姊姊安尼在日光和煦的草地上一株枝叶扶疏的胡桃树下玩耍的童年时期，还要早得多。父亲在山顶上干草田里干活，我可以听见他说话——声音低沉而柔和。母亲手里提着两桶水，沿着幽长的小径，朝山上我家的小木屋走来。她赤着脚，风卷起那宽大的洋布衣裳，紧紧裹在她苗条的身体上。

你若是从井边再往前走两步，就会来到一条阴郁的，长满了密密的丛林和高高的榆树的沟渠边。沟对岸的远处，一簇簇浓密的小树丛下面，开着一片鲜花，又丰腴又娇嫩，经不起一线阳光的照射。它们一株株独自开放，花枝柔和地摆动着。这些都是花朵的娇柔玄妙的思维啊。在我童年的心灵里，它们都是有生命的；我和它们谈话，我也和草地上胡桃树梢的风谈话。

我们很穷。但是我并不知道。因为全世界好像都跟我家一样——至少密苏里州北部绵延二百英里内的这个世界都和我们一样。一片岗峦起伏、出产菲薄的石田瘠地一直伸出地平线外，接上了太阳落山处的天空。在我们看来，这世界的疆域一边是县城，另一边是密苏里河。北面边界上有一座数百居民的市镇。至于南面边界上——在我父亲的想像中，密苏里河上有一座叫做圣约瑟的神秘城市。然而他是一个充满漂泊者的心情和幻想的人物。人们听他讲那些有声有色的冒险故事，并不一定相信。因为他跟他们不同，实在的，他几乎可说是一个外国人。在我们的世界里谁也不知道他的家世。他们这一家人不是农民，有人说他们不稳定，不可靠——是一群游手好闲的浪人；

他们的血管里有印第安人的血液……而外国人或印第安人，你是永远不能信任他们的。

后来，我们这世界的范围扩展到堪萨斯城。这是由于我的一个年轻表兄弟的离家出走，震动了全村。三个月以后，他回来了——变成了一个有教育的人。他已经是个理发匠了……还穿着公司里买的衣裳。

我坐在这里，模糊地想起了爱情……想起了火……想起了红颜色。是那只棲息在我们樱桃树上的红鸟吗？……是那件我小时候穿过的红外套吗？……哦！我想起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我正在烧火——一堆可爱的火。我的炉子是石块砌成的，炉壁就是我家那两间木房的板墙。离我烧火的这面墙不远的地方，有两棵高大的柏树，中间挂着一个秋千架。火焰辉煌艳丽地燃烧着；假如不是给我母亲发现了，拿她的钢顶针敲我的头，这火必定会燃烧得更加艳丽。她常常用绷硬的钢顶针敲我，敲得我恼怒不堪。我的艳丽的火，光荣的火，她只要一发现，就要将它扑灭……同时也好象扑灭了我心中的什么东西……火焰闪烁的时候，多么温暖，多么可亲啊！现在我懂得了火与爱的本能之间的精神联系。我母亲却不懂这些，她在学校里只上到六年级。我父亲也不懂——他只读完三年级，他说，这对于一个男子已经够了。只有花花公子和妇女才需要教育哩。

我记得母亲的钢顶针的敲击，也记得那打在身上像小刀一样锋利的树枝。她为什么要时常鞭打我，我不知道，我怀疑她自己是不是知道。她说我玩火，说我撒谎。我看不出这与她有

什么相干。她那不愉快的结婚生活一年一年过去，儿女愈来愈多，她鞭打我的次数也愈来愈多了。我原先不知道有时可以还击那些无缘无故打我的人；但是我逐渐明白了，只因为她身材比我高大，她才敢随意摆弄我。我于是急切地盼望长大起来。

她更想出了新的鞭打人的方法：她手里握着树枝站在那儿，命令我走上前去。我哀求，我哭喊，我想逃走，但是最后，我还是不得不走过去。她并不用手抓住我，却逼我自己挑选一个地方站定，任她没头没脑地鞭打。事后，我要是跟一般小孩一样呜咽不止，她就勒令我停住，不然，就要“把我踩到泥里去”。我记得有一回我没有马上停住，她就像老鹰一样扑到我身上乱打——头上、背上、裸着的腿上，一直到我带着创痛和恐惧哭喊着逃出去找寻我的父亲。然而我能向父亲说什么呢？——我还小，说不明白。而且他也不会相信。

我的母亲屡次说我撒谎。其实我并不知道什么叫撒谎。我从来就弄不清楚。我分别不出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幻想。我以为，树梢的微风确实带来了许多故事；棲息在樱桃树上的红鸟确实在向我低语；树林中丰腴柔嫩的鲜花对我笑，我也用笑回答它们；田里的小牛跟我长久地谈话。

后来，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撒谎；为要哄我母亲住手，我就撒谎——我说，是的，我撒了谎，请饶恕我，于是她又怪我早不承认，继续鞭打我。不多时以后，为了避免挨打，我学会了只把我认为她要听的事情说给她听。

“我这几个孩子当中，只有玛丽不听话，而且还撒谎。”她常常对客人或邻居这样说。起初，我还因为羞愧而掉泪；慢慢的也就不在乎了，再往后，我竟承认这是事实，连否认也不

想去否认了。

学会说真话，这可算是我平生最艰苦的奋斗之一了。凡事不全说真话，差不多成了我的天性。我如今要用痛苦和眼泪来洗涤母亲的鞭挞在我天真的童心上所留下的一切痕迹。她纵然打我，我依旧需要她的爱，只要她对我稍稍和气一点，我便以爱来回报她，因此，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不再期望她爱我。我现在明白了：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以及我们的环境，都妨碍着我的爱和生活得到正常的发展。他们要我相信自己是个坏家伙……我也就承认自己是个坏家伙，正如我承认自己撒谎一样，因为他们好像总是不会错的。然而我也曾流过一些永远忘怀不了的眼泪……据说是毫无意义的童年的眼泪，据说是很容易忘记的童年的创伤。哦！我不愿意再回想这些眼泪和痛苦了。

西方涌起了一堆深蓝色的浓云，朝我们这个方向随风飘来。接着云堆变成了阴沉的黑色，一道不祥的黄光从云间穿出，愈来愈大，顺风向前奔驰。我们——六岁的姊姊安妮、才学步的妹妹碧儿崔丽斯和我——惊惶地瞧着这道黄光，因为这黄光是危险的象征。龙卷风刮来了。

父亲和母亲都不在家。安妮喊住我的时候，我正在屋后面玩火。她想拉我们穿过一大片玉米田到远处的一个农舍里去，可是她忽然停住了脚，尖声欢呼起来。我们都抬头张望：在远远的那边，父亲和母亲转了一个弯，正在那条长长的白色的小径上飞奔。他们骑着那两匹父亲常常向人夸耀的雪白的马，跑在即将到来的风暴前面；马蹄嘚嘚地在灰白坚硬的路上奔跑。声音愈来愈响，他们像闪电一般冲进院子，一直冲到屋门前，母亲

从马鞍上一跃而下，父亲一步也不停地把马赶进了马房。

我们立刻全都钻进了地窖，父亲抱着床垫、鸭绒被褥和毯子走在最后，手里还拿着一柄斧头，母亲尖声叫他把新缝纫机和自鸣钟——她最宝贵的两件财产——带进来，并且把屋门闩好。大风暴的前锋已经来到我们这里。父亲急急跑下台阶，把地窖门拉下来紧贴平地，把插销闩牢。我们静静地等待着。

地窖里只点了一个灯笼。四周围潮润的空气里，散发着各种各样的气味：泥土的气味，蜜饯水果的气味，甜瓜和苹果的气味，新鲜黄油的气味，陶罐里盛着的厚厚的奶油的气味。在这样的龙卷风当中，躺在这样柔软温暖的鸭绒被褥上闻着，听着，看着，感觉着一切，多么像在野餐啊！

忽然传来了一阵狂风暴雨般的吼啸，同时好像有什么东西落在地窖的门上。

“别动！”我父亲对母亲说。“就算我们给埋起来了，我还带着斧头哩！”

“要是什么东西把通风孔堵住了呢？”母亲抬头望着顶棚中间的木头的小通风孔。

“我告诉你，我能给咱们劈开一条出路的。还没有发生什么了不得的事情，用不着你那样慌张。”

我听着他的声音，心里想：有了他，地球上任何龙卷风都不可怕了。

吼啸声还在继续。我父亲的声音从台阶上面通往地窖口的甬道传来。“这并不是龙卷风，”他拨开门闩，从门缝里向外窥探。“屋子并没有被刮走，柏树挡住了风。”长时间的静默。然后，“风势小一点了。没有危险了。”

“谁也说不定。”

“我可知道。我听说过圣佐地方遭到的一次龙卷风。风把那里的牛呀、马呀、人呀、房屋呀、篱笆呀都吹了起来，扔到好几英里以外的地方。风在田野上一口气扫过了六十英里，人们想用炸药把它轰散。你在几英里以外就能看见它远远刮来，好像一个又长又黑的烟囱。……有一个地方的一所熏肉房给风吹了起来，恰恰落在十英尺以外的地方！在那次龙卷风当中失踪的足有一百人。”

我记得很久以后我曾对一个女朋友说起，有一次龙卷风把我们的熏肉房，连马带牛一起刮走了，不过我们的屋子刚好被抛在十英尺远的地方，明明白白地落在那里！在那次龙卷风当中失踪的足有一百人。我这样对她讲，并且还给她描述那些屋子、篱笆、人、马怎样从天空中落下来，掉在我们四周的情况。

我真不愧是我父亲的女儿！

一群陌生人牵着一匹高大的黑雄马从山那边来到我们农场上。妇女们都不跟男子一块到放马的草地上去，小孩子只准在房子后面玩耍。这样一来，我们偏偏更不肯到房子后面去玩了。我父亲走到母亲这里，拿了几块钱，又回到草地上去。后来，陌生人就牵着雄马走了。一切都那么神秘，一种没有人肯谈论的神秘。

几天以前，一头母牛生了小牛。我亲眼看见了这件奇异的事，并且向我父亲报告了这个消息；但是父亲和母亲却命令我不准再到几分钟以前我还在那里玩过的、那母牛和小牛所在的

田场上去。为了怕吃“耳光”，对于我所看见的事情，我再也不敢谈论，不敢问了。

我渐渐知道了性的羞耻和秘密。同时我还知道一些别的事情——雄畜比雌畜值钱，似乎还更宝贵；牡禽比牝禽值钱，人们挑选时也更仔细！当我的小弟弟快要诞生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子都被赶快送到另一间农舍里去，一切东西都像是盖上了一块又湿又粘的秘密和羞耻的破布。太阳快要落下去的时候，一位妇人带着勉强的欢悦用一种神秘的音调问我们可想要一个小弟弟？好像说是一只鸛鸟送来的。但是这夫人的一个十岁的小姑娘，却很懂人事，她把我们带到鸡舍后面，解释那鸛鸟的故事，讲的时候还夹杂着一些惊人的细节和大量的幻想。

第二天，我父亲从镇上买了一盒雪茄烟分敬给那些贺客，他们从各地赶来，好像庆贺他成就了什么非常的事业一般。他们把威士忌酒瓶传来传去。生了一个儿子！我觉得自己被冷淡了；我跑到父亲跟前，双手抱住他那柱子似的腿，他摆开我，叫我到别处去。仿佛我有了什么过错……这件事对我刺激太深，使我哭都哭不出来。

“为什么呢？”我再三追问，但是得不到一点答复。

我们的木屋只有两间房间。一间里面铺着我们的两张床；另外一间是厨房和吃饭的地方，又是缝纫室和工作室。一张床是我父亲、母亲和小弟弟睡的，另外一张，是我的两个姊妹和我睡的。

一天晚上，我被一种声音吵醒了，翻来复去总也睡不着。声音又响起来。我提心吊胆地躺在床上，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

恐惧，我虽然紧闭着眼睛，仍然害怕得不住地打战。人生最原始的一种本能以最粗暴的姿态呈现在我面前，在我的心灵上刻下了一幅恐怖而噁心的图画，使我的青春年代蒙受了毒害。从那一顷刻起，我再也看不见那十全十美的母亲了，自此以后她在我眼中变成了另外一个女人。一种又是爱恋又是厌恶的复杂的感情在我内心激斗；现在当她的鞭子打在我身上的时候，只能激起我本能的憎恨。仅仅过了一忽儿，我就听见她讲些不真实的话；我以前在她身上看到的善与美——虽则残忍——顷刻间都消失了。此后一连许多年，她和我总像隔着一条仇恨的鸿沟，互相敌视。她逐渐知道她的命令或要求对我起不了作用，于是她就用父亲来恫吓我。但这样也没有用，因为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而且我知道他永远不会来打我。母亲有时会犯错误，父亲却永远不会。他只要一开口——我就会服从。我平生唯一的愿望，就是学他的样，把马车赶得和他一样，把草堆聚得和他一样，使我自己像新生的小弟弟乔治一样成为他的骄傲。

有一天，我们坐着运货的马车在高低不平的路上颠簸，小乔治端坐在车床板上，肥胖的腮颊随车子的震荡而不停的颤动。我母亲望着他不住地笑，他看见母亲笑他，泪水就扑簌簌地顺着面颊淌了下来。

“老是朝着孩子傻笑！”我父亲厉声叫道。

我心里觉得一阵难过，就爬到我小弟弟身边，用手臂环抱着他。他蜷伏在我怀里，不再伤心了。父亲看看我们，没有再说什么，母亲也就止住了笑。从那一刻起，我对弟弟乔治的爱超过了一切。

我的外祖母是一个高大结实的妇人，一头稀朗朗的灰发飘散在她的脸上，眼睛黑得像没有月亮的夜晚。她赤着脚走路，抽烟的时候用一根玉米心子做的烟斗，身上穿着一件宽大的长衫。我的外祖父得了肺癆病卧床不起，她便一手来管理他们的农场，同时还管理着五个成年的儿子和八个成年的女儿。她这是第二次结婚，带来了前夫的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其余的子女都是我外祖父的前妻生的。和我同年的一个女儿弥儿德理是他们二人这次结婚的果实。

说来奇怪，我这个外祖母，同时也是我的姑母，因为她是反父亲的姊姊。我的外祖父常常抱怨她家世卑贱，尤其反对我的父亲。外祖父似乎本来并没有意思要和外祖母结婚。他们的结合只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我的母亲遇见了我的父亲，差不多是一见钟情；虽然母亲那时不过十七岁，他们却私奔到一个很远的镇上去结了婚。外祖父怒气冲冲地追赶他们，他决不肯听任自己的女儿委身给这样一个人，更不用说这个人还是个半印第安人！他一直追到这个妇人的家里才把他们找到。这妇人是个寡妇，带领着一群儿女，生活极为困苦。我外祖父不幸是个鳏夫，又是个温顺随和的人，于是这个强悍的妇人就把他拖到神坛跟前，迅速稳当地嫁给了他，就像我父亲娶我母亲一样。这样，她也就自然而然成了我的外祖母，这两个家族也就无可奈何地混乱起来了。我一直捉摸不定到底应该叫她外祖母，还是姑母，叫她的儿女表兄弟表姊妹，还是舅父和姨母。我最后决定叫她做马利姑母。

她是个具有男子的体魄和气概的妇人，婚礼一过，就控制了她的新丈夫以及他所拥有的一切。要是她用话不能说服自己

的儿女或者他的儿女，她就动手。她的手又粗又大，每天早晚两次挤牛奶的时候，动作和男子一般有力。她提着几桶撇过奶油的牛奶，泼在猪身上；她揉面烘面包的时候，两条胳膊舞动得像蒸汽活塞，湿面在她手掌下发出噗哧噗哧的声音。天蒙蒙亮她便把男人们叫醒，夜里不到她规定的时候不准上楼去睡觉。她指挥众人摘果子——苹果，梨子，桃子，各种各样的浆果，然后指点女孩子们把这些果子装罐头的装罐头、腌渍的腌渍、晒干的晒干，准备过冬。秋天里，她指挥众人宰猪杀牛，然后把肉放到熏肉房里去熏。夏天里，甘蔗熟了，她监督大家把甘蔗割下来，然后在山脚下一个长而矮的糖坊里熬糖。

她把自己经营管理的才能也施展到女儿们的恋爱问题上。她的儿子到别的农场上去求爱的时候，她可惜不能跟了去。女儿们可就不同了。每逢她们的情人来访，她必定亲自检查客厅是否整齐，风琴有没有事前打开，好让那少年知道这是一个不可小看的家庭。她还私下给女儿们许多指示；可怜虫来了的时候，她便亲自锁上客厅门，把我们这些小孩子赶到后院里去。等那少年来拜访过多次，她估量着任何人都应该下决心的时候，她便亲自走进客厅去，问他到底打算怎么办。不管什么人，看了她的那种目光，除了光明磊落地说出自己的意图外，不敢转别的歪念头。

她简直像是一支驻在外国的侵略军。和一切侵略者一样，她也是个专制魔王。星期日我们照例都在她的家里——每一个人都认为这是她的家——吃饭。她坐在长桌的这一头，我那唠唠叨叨的外祖父坐在那一头。他们两人远远地相对喊叫；因为桌子的一边坐着八个男人和女人，另一边也坐着同样多的人，中间

还挤进了不少小孩。我坐在母亲身边，小心翼翼循规蹈矩地吃着。有一天，外祖母给我切了一块果酱饼放在碟子里，我在饼里发现了一只苍蝇，便把它推在一边。她转过黑眼珠来瞪着我，向我宣布了一条使我终身难忘的戒条：

“煮熟的苍蝇是吃不死人的！”桌上的人立刻都肃静下来；谁也不敢说话。大家都望着我，活像我犯了什么罪一样。我想了一想，于是把苍蝇和果酱一块儿吞了下去。

只有两个孩子没有挨过马利姑母的打。一个是弥儿德理，她第二次结婚生的女儿，一个被宠坏了的调皮鬼。她若是看中了我的或别个孩子的什么东西，我们就得给她。她的头发长得又长又密；我的头发却稀稀朗朗地编成一条细细的发辫垂在脑后——很像马利姑母的头发。但是马利姑母总要把我们两人站在一块来嘲笑我。

“我将来长大了，也会有长头发的。”我只好这样说。但是她的嘲笑却留下了难医治的创痕。每星期日她总要问我，头发长长了没有。

弥儿德理刚长到摸得着琴键的时候，她就教她弹风琴。音乐唤醒了我内心深处的感情，我常常一个人偷进客厅里去弹琴，弹得很轻，怕给旁人听见。但是这个妇人总会跑到门口来，命令我不准乱弹，否则她就要给我“一巴掌”。

我外祖母从来不碰的另一个女孩子，是她的继女海伦，一个十五岁上下的姑娘，她长着一头古铜色的头发，这里那里还闪着火焰一般的金光。她继母大发雷霆的时候，她却可以不动声色地走来走去，她谁也不怕，向谁都敢公开挑衅。她用一种古怪而又文雅的玩笑来嘲弄我，我掉泪时她还拍手大笑。她的办

法是背熟几个长长的生字，然后把这些字用到我身上：“你是一个‘叛逆’”“你是一个‘盗贼’，”或者“你是一个‘不事修饰雀斑满面的小鬼’！”给胡乱起上这些绰号，谁听了能不伤心痛哭呢！

海伦想离家出外去做工。她遍访了邻近的农人，问他们要不要雇女工。她要赚许多的钱，然后拿这些钱来买衣裳。不久，她居然找到了一个位置，跟她父亲闹了几场以后，到底到很远的一个农家去当女佣人了。三块钱一个月——还有增加工资的希望。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从那以后，我却看到她对于美的要求，对于生活的热爱，一步步和丑恶以及一切残害生命的事情走上了同一的道路。我要问，为什么性质相反的东西会手牵手走在一起？为什么那些使海伦显得高人一等的东西反而会把她引到毁灭的境地呢？

今天，一个妇人从我面前走过，她的笑容活像我的一个叔祖母。我有一个姑母笑起来也跟她一样。

有一天，我们围坐在叔祖母饭桌旁。她已经四十多岁了，可是还很漂亮。在她身边坐着一个面孔瘦削的男人；他是一个牧师，请到这样一位贵宾，大家都认为是一种荣幸。他说话的时候，大家都一声不吭恭恭敬敬地听着。他这种制服旁人的力量，使我十分钦佩。我们正要开始吃饭，他却把头朝菜盘低下去，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别人也跟着他一样做。他嘴里叽哩咕噜不知念些什么，大家也都闭紧眼睛静听。

“妈妈！”我尖声叫起来，“他在做什么？”

“嘘——”她抓住我的肩膀用力摇了一下。

我羞愧得一声也不敢响，只顾吃饭，一面痴痴地望着那个牧师，他吃了又吃，人们仍旧恭恭敬敬地劝他再吃一些。吃完以后，他把椅子往后一靠，张大嘴打了个呵欠，伸了一个大懒腰。其余的男人也陪着他伸起懒腰来，但是如果女人也这样做的话，那就是没有好教养了。

我就这样第一次认识了基督教，也就这样第一次接触了祷告。

这位牧师所以到我叔祖母家来，是因为自从她丈夫犯了杀人罪入狱以后，她在这一带乡村里就出了名。无论什么人经过这所傍山修筑的白色农舍，都想借故进来歇一歇；他们或是来讨一杯水，或是来探问作物的情形，或者干脆就是跑来消磨一段辰光。他们走出去以后便散布些流言蜚语，说她神色如何，又说她讲了些什么话。他们不厌其烦地把她的事情千百遍地传述。

叔祖母和我的叔祖共同生活了好多年，生了七个儿女，也算是一个贤妻良母。我曾经听见母亲和旁的妇人们谈论，说叔祖母怎样常常偷出去会她的情人——他也是个有妻室儿女的人，名叫伍尔夫。他们相好已有多年，一向在小山谷里一片麦田尽头的一间破旧的小茅屋里幽会。她有一对双生子，今年十三岁了，虽然还姓她丈夫的姓，却实在是伍尔夫的孩子。人们都说，谁还看不出来呀！这个家族里就从来不曾有过黄头发。他们一天天把这个故事说得更加详细，更加活神活现，而我就在一旁——偷偷地——听着。我看见一大片金黄色的麦田，麦

田尽头有一间小茅屋，茅屋前的麦子全都折断了倒在地上，仿佛有许多野兽曾经不断地在那里滚来滚去。随着故事的发展，那块滚平的地方也愈来愈大。

我叔祖不知用什么方法探听出了那幽会的地点。于是他一连等了好几天——一面等，一面观望。末了，伍尔夫终于来了，赶着车子往镇上去。我叔祖远远看见他走上山坡，便取出事前装好子弹的散弹枪走到路上去迎他。有的人说他曾对伍尔夫说明他为什么要打死他，有的人说，他并没有，只是走上前去，扳动弹机，开了一枪。

他被判终身劳役监禁，宣判的那天，周围许多英里内的农民都赶到县里去旁听。他们去的时候都准备向我叔祖母说一说他们对她是怎么个看法；但是事情适得其反，他们发现她和她的丈夫真可说是患难相共，使他们这些人和整个世界的人都无从插嘴。宣判之后，她平心静气地安慰他；人们听见她对他说，她要为他求赦免，即使耗尽他们历年来的全部积蓄，也在所不惜。

从此以后，她和平常一样，恬静平安地过日子；人们对她献殷勤，她多少有点感到宠幸，同时也多少有点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令人羡慕。她的儿子们对她总是十分尊重，在田里干起活来，也勤勤恳恳。人们走进门来，总想偷眼看一下她的双生子。她直率地、骄傲地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她正在设法使丈夫获得赦免，而他呢，在监狱里学会了一门手艺。他给她写了许多长信，她也给他写了回信。他的皮靴做得真好，她很有些替他骄傲，说话的语气好像他就在遥远的城镇一家华美的鞋店里做工。男人赞美她，妇女羡慕她。那位以前从来不踏进她家

门的牧师，现在没有一个礼拜日不在她家里吃饭；他一面吃，一面和她的成年的儿子谈论农事，满意地倾听着她叙述丈夫制靴手艺的进步。而且，他还用一双色迷迷的眼睛瞅她。

她总是笑嘻嘻的；有人说，不，这不是笑，这不过是一种表情罢了。

收获节的舞会和聚餐一天近似一天了；今年，这个盛会在我们家里举行，几星期以来，周围几英里以内那些雇不起短工的贫农，组成了一年一度的互助组，轮流到各人的农场上去收割。我家是最后的一户。

东方的天空刚刚显出清冷阴暗的灰色，人们就带着妻子赶着车来到我们农场上。他们在这里和另外一群农人和他们的女眷会合；虽然寒气未散，青草还带着又冷又湿的露水，他们的声音却已经充满了快活的期待。

这儿真是妇女的天堂！这些妇女独自跟丈夫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唠唠叨叨、毕恭毕敬、傻头傻脑的，男人们也很少说话，偶尔开口，也总是为了维护历代相传的男性的特权。但这时在一大群人面前！你看罢，妇女们把男子支使得团团转！男子们走来走去，叫每一个人看到他们是在受妇女们的折磨！他们一群群站在一张长长的松板台子周围，喝着黑咖啡，吃着松脆的炸腌肉、煎鸡蛋和油炸面卷。接着，妇女们就把他们轰到田里或山林里去，好像她们不下命令男人便不会想到动身似的。

男子们整天在田里做工，在山上伐木。轻微的丁丁冬冬的斧子声飘过日光灿烂的宽阔的林间空地。山林冷清清，土地香喷喷，树叶已经开始变黄。马车把伐下的木料装得高高地拖走；

一堆一堆卸在我们房子的北面以及马车道旁边。这是我们冬天的柴料，同时也是抵御凄厉的北风的屏障。

妇女们整天都在削水果、切片、装罐头。中午的时候，斜斜的屋顶上铺满了一层白色的苹果片，晒在太阳里；等到下午，厨房桌子上就摆满了一长排一长排果酱和蜜饯罐头。你看看这些罐头，就觉得自己真的做了不少工作，而不是仅仅散了一天心。因为你若是一连几星期独自住在一个小农场上，除了几个偶然经过你面前，只来得及跟你打个招呼的邻居外，没有一个人可以谈心，那你当然有许多事要告诉别人。各种新发生的风流韵事啦，新的食谱啦，新的服装式样啦，以及谁向谁求婚那种永远新鲜有趣的故事。偶尔讲起一件惨事，大家就能议论一上午。我叔祖母的故事就曾被再三传述。有人说起海伦和她主人家的大儿子山姆·华尔克来往很密。又有人提起另外一件事，那家庭荣誉的保护者——散弹枪——曾经拿到山上一个青年人那里去；但是他后来娶了这位姑娘。有时这群人里有谁谈到一桩稀有的丑事，这厨房里就会笼罩上一阵静默。逢到这种时候，我总被支使到屋外去。有一次，我故意在近处走来走去，于是听到我母亲大声喊道：

“强迫她！这话可不能这样说！我不相信！”

饭餐的时候到了，男人们又回来吃饭。饭菜都摆在屋外高大的柏树下用锯木架撑着的几块长板子上。男男女女的血液似乎都奔腾起来。所有权的束缚被遗忘了或者受到了公开的嘲弄。男人和别人的妻子胡调。妇女们昂首阔步挽着别人的丈夫共进晚餐；男人们更当众宣布他们私奔的念头。戏谑，喧笑，混作一团，嫉妒被认为是一种恶劣的破坏礼节的行为。在家里的时

候，男人可以恶声恶气折磨自己的妻子，可是在这里，他们却不敢流露半点不情愿。人人都仿佛在重温那一去不复返的氏族社会的旧梦。

接着，又是工作，继续工作，有时候一天，有时候两天，有时候三天。这种时候，虽然工作很辛苦，却充满愉快和欢乐。尤其是当男男女女在一起的时候，更是兴高采烈。最后，那热闹的晚会来到了。在我们屋外，男人们搭起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大跳舞台，台上撒着蜡烛屑，光滑得像玻璃一样。

这真是个盛大的跳舞会——了不起的跳舞会！乐队是一把六弦琴和一把提琴。我因为有了这样的双亲而自豪——我的母亲窈窕文雅，我的父亲穿着长袖衬衫站在舞台中央多么漂亮，他叫道：

“喂，朋友们，挑选你们的伙伴，跳一个回旋舞！”

我的父亲是多么神气啊！提琴随着他的号令开始演奏，我的父亲和母亲也随即领着大家跳起舞来。他们转来转去跳着旧式的旋转舞，我母亲的身子稍为往后仰，她那镶花边的裙子临风飘荡，我父亲轻松自如地带着她转圈。我异常兴奋，在跳舞的人群里没头没脑穿来穿去。无论我走到哪里，总能在跳舞台上那一群摆动的人们之上看见我父亲的头。他摘掉了那顶飘飘然的大帽子，这顶帽子他常常戴得很低，遮住一只眼睛，很有几分文雅风流的气概，为他取得了一个对于妇女是危险人物的名声。这天夜里，月光如水，音乐声响彻青云。父亲在晚上和在白天一样，保持着领导的地位。就是他的衣饰，也使他显得出众：他束着一条五颜六色的宽皮带，配上真银的钮扣。他说这是从圣佐买来的。随便哪一个穿上这样鲜艳的服装都会觉

得很不自然。但是我父亲是个很俏皮的人，他敢做人家所不敢做的事。

他一边跳舞，一边唱歌，他一开始唱的时候，跳舞的男男女女就任凭自己随着节奏摇摆起来。他的歌生动地道出了他们的心愿。凡是听过的歌，他都能唱，假如他把曲调忘记了，临时也编得出来。

音乐停止了。接着是一片静寂，这种静寂的原因，常常是由于人们受到了比理性更为深刻的感情的激动。霎时间，我父亲又站在台上了。

“跳四方舞的伙伴站出来！”他叫道，因为入夜不久，跳舞刚刚开始。我看见他走到我那古铜色头发的漂亮的海伦姨母面前，鞠了一个躬。那天晚上，她和她主人的儿子山姆·华尔克从十二英里外赶了马车来参加舞会。据别人说，她“经常和他同出同进”。在这个集体中，一个自己能赚钱的女佣，是很受到别人的尊敬的，说话也起作用。在场跳舞的人都知道她每个月赚三块钱；这从她那高傲的举止以及她对待新情郎的那种无拘无束的态度上，也看得出来。她是可以发号施令的！我父亲选中这样一个重要的女人作第二次舞的舞伴，真是再好没有了。

“对你的舞伴一鞠躬，”我父亲高声喊起来。

舞伴们相对深深一鞠躬。他的声音不时盖过急促的音乐，叫着：“大家手挽手儿转起来！”“太太们在中央，先生们站周围！”“卷一个葡萄藤！”提琴尖声拉出“火鸡在草堆里”的调子，有人开始狂叫。

啊，啊，啊！一个猴儿草堆里藏，
假装看不见他的丈母娘！

其他的人接着合唱：

火鸡钻在草堆里，哈！哈！哈！
火鸡钻在草堆里，哈！哈！哈！
把草堆扒开，把火鸡抓来，
不管怎样，
先唱起一节调子，就叫火鸡钻草堆！

跳舞的人分成两行，我父亲和海伦在两行人中间跳过去，他们的脚步腾空飞舞，海伦的头发映着树枝上摇曳的灯光闪烁。他们在台中央相遇，相对一鞠躬，然后又跳回去；再一次——跳到台中央；再一次——右手边；左手边，绕了一个圈；最后，又回到台中央，他们的脚步轻巧得如同天上的浮云。父亲用双手扶着海伦，海伦像临风招展的鲜花一样不停地旋转。观众中爆发出柔和的掌声，伴着他们跳舞的节奏。

“把你们的舞伴转起来，”喊声又起来了。在下一节舞蹈中，一个赶着一对漂亮的红褐色马来的人，一下子把他的舞伴扔到半空中，高过自己的头，用一只手臂托着她，她把双手撑在他肩膀上，他团团转地跳，她在他身旁临空飞舞，脸上的表情很庄严，为了他的力气而感到得意。暂时在一旁休息的舞伴们都用赞美的眼光注视着。另一个跳舞者忽然扔开他的舞伴弯下腰跳起“木鞋舞”来，跳得那样好，简直从来没有看见过。

他知道怎么跳才能跳得最响。他碰脚跟时“踢踢踹踢踹”“踢踢踹踢踹”的声音几乎把音乐都淹没了。

我在兴奋之中爬到台上，刚巧站在提琴师高高举起的手臂下面。在我前面涌起了海一样一片摇动的腿和舞裙。跳舞停止了……接着是一阵静默……我感觉母亲在背后用力拉我，要我下来回去睡觉。她赶我穿过了那拥挤的人群。到了卧室里，我好容易才爬过一大堆婴孩坐车，跌跌踉踉地跨过地板上草席上一排排熟睡的小孩。我爬到床上在我的两个姊妹身旁躺下，但是母亲一走开，我就又坐起来，侧耳倾听外面传来的低哑的喧哗声、尖利的提琴声、跳四方舞人们的脚步声和指挥舞蹈的喊声。接着，是很长时间的静寂……然后……他们吃夜宵了！子鸡、巧克力饼、肉包子、冰淇淋、世界上一切好东西！一直要继续到东方发白哩。我哭了。连我的父亲也把我丢在脑后了……啊，我是这么小，这么小哟！

冬天，降雪了，盖满了起伏的山丘，沉重地压在草地外边的树林上，宰猪杀牛和熏肉的工作都已完毕，熏肉房里摆着一桶桶咸菜、干玉米和碎肉。盛碎肉的那一个桶刚巧很低，我一伸手就摸得到铺在浮面的葡萄干。地窖里摆满了一行行水果罐头；黄澄澄的南瓜塞满一个墙角。熏肉房和地窖之间有两个松松的土堆，和妇人的胸脯一般；你如果铲掉一个土堆上的积雪，挖开雪底下松动的泥土，就能找到用金黄的麦秆隔开的一层层红苹果。如果你想要包心菜或马铃薯，就可以到另一个土堆里去掘。谷仓里的粮槽中装满了小麦，用手一抓，就像一阵金黄色的雨一样从手指缝里漏下来。上面干草架上，芳香

扑鼻、细碎松软的干草一直塞到齐屋顶。那上面终年都像薄暮般的温柔，使人不免要做些奇异不可捉摸的幻梦。

在几个月漫长的冬日里，有许多编织工作可做，我母亲现在有了一架织毡毯的大织机。下午天气如果晴朗，邻近农场的妇女就赶来帮忙缝布条。她们聚集在我家厨房里，找出所有的干净的旧花布和碎布，把它们撕破，剪成狭长的条子，比着原来的颜色，一端连一端缝接起来，缠成几个大球。以后，当我母亲做完旁的工作有工夫织毡子的时候，我就替她把这些布球绕在梭子上。妇女们缝布条的当儿，男人们就在一旁剥玉米，准备冬季的饲料。有时候还举行缝纫互助会，妇女们聚集在几家人家帮忙缝织冬天必须的衣着。男人的工作是将砍伐下来的树木劈成柴料，要是天气晴朗，就去修补篱笆。

拉糖盛会快要来到了，你在几个星期以前就能感觉到。凡是年龄够大能参加跳舞会的青年男女都在作准备。日子一到，人们就把一辆大橇车套上一对或者两对牲口，在车榻里塞满干草，中间放上几块烧热了暖脚用的砖头或石块，再把棉被一直盖到下巴上。橇车在皎洁的月光下滑驶，四处去邀集一对对青年男女。路上遇见别的橇车或雪橇，便高声欢呼，你叫我，我喊你，一同继续前进。大家齐声欢唱，车铃丁丁当当合成一种没有曲调的音乐。最后这批人都拥进某人家的清洁的大厨房，厨房里点着四五盏耀眼的灯，装饰着柏枝和红莓，壁炉中燃着熊熊的木柴，炉灶上热气腾腾，一切都已就绪。

炒玉米花的器具也已经取了出来——一些带长柄的铁丝笼。男男女女都站在壁炉前排成一行，在铁丝笼里扔进一把玉米粒，扣上笼盖，然后把笼子在煤火上前后摇动，直到玉米粒

爆裂开来变成雪白的一片。另外一些女人在灶上熬浓糖浆。现在，大家都可以尽情的吃玉米花，爱怎么吃就怎么吃：浇上熔化的奶油蘸盐吃也好；用热糖浆揉成又圆又白的雪球也好。

最后，糖浆熬好了，也尝过了，倒在深口的盆子里凉着。男人女人都去穿上一件又长又大的围裙，样子十分可笑，于是大家一面尖着喉咙狂笑，一面互相帮着把背后的钮扣扣上。然后，在手掌心上涂上奶油，各人挑选一个对手，拿起凉糖浆来放在手心里搓。两个人面对面拉着柔软糖块，糖块愈凉愈韧，人也愈离愈远，交换着把糖块的两头扔过来扔过去。人们拉着，笑着，又闲谈，又调情。等糖块冷得差不多了，便拿去摊在涂了奶油的盘子或者涂了油刷得雪白的厨桌上，做成各种各样的花式——弯曲的棍子、麻花卷、动物或人、宝塔、数目字或者中箭流血的心。

然后，他们便准备跳舞。舞乐休止的时候，就有人高声喊，要我父亲唱歌。有一次他唱了一首“亲爱的玛丽”。这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的名字不是叫玛丽吗？

我心中有一个秘密，亲爱的玛丽，
爱人呀，我有个故事愿意告诉你，
幽谷里的每一朵雏菊，
都晓得我的秘密，
都熟知我的秘密，
然而我却不敢告诉
亲爱的玛丽。

到我这里来吧！亲爱的玛丽；
亲爱的玛丽，到我这里来！
爱人呀，不是为了
你容貌美丽，
而是为了你可爱纯洁，
我才感到无限的幸福，
我才倾倒在你的裙下，
亲爱的玛丽。

说来奇怪，我竟还记得他的声音，他的表情，和唱歌时候从他嘴唇上吐出来的每一个音节。我记得每一个音符，也记得他的声音如何在每一段的最后一个字上缭绕不绝；我还记得我当时感到忸怩不安。

唱完歌之后，又继续跳舞。半夜的时候以及两三点钟的光景，跳舞都暂时停止，让大家喝咖啡，吃点心。星儿散了，月儿淡了，可是人们仍在跳舞。直到东方渐渐发白，方才停止。于是大家又把马套好，取出橇车里的砖头石块，重新烤热了塞在车上，赶着长途回家。橇车在压平了的雪地上悄然溜过，橇车的铃儿寂寞地丁丁冬冬的响。东方已是白色朦胧，跳舞的人们也都熟睡了。

父亲和母亲正在吵架。他们吵得这样凶，我心里害怕极了。父亲咒骂，母亲哭泣。这是在我童年生活中投进一片阴影的许多次可怕的吵架的开端。

我父亲想要弄钱，他说——弄大笔的钱——只要我们离开

这个地方，他马上就能够弄到钱。他要离开这个永远不会有大大出息的田庄。我们在那里的生活诚然很苦，但是我现在知道了，那还是正常的固定在土地上的生活。终年辛辛苦苦，到年底能余下几个钱，我母亲也就满足了；但是在我父亲，这样的生跟死也差不了多少，他已经忍受够了。一年到头，只有三四个节日；其余的日子，他就得跟在孤单单的犁杖后面，去耕种那年年歉收的石岩田，光着脚在泥块上跌跌踉踉。他要一年四季都有鞋子穿，我母亲却这样想：既然她能够光着她的脚从一英里路以外的井里一次挑两桶水回来，既然她能够——用她自己的话——像“狗一样地工作”，那么，他也就不应该有什么怨言了。不！他回答说。他不姓加斐尔德，不像她的族人那样都是些满足现状的小气鬼，他姓的是罗泽士！是的！我母亲回答说，他诚然是个姓罗泽士的——他一点一滴都是罗泽士，而她父亲所指出的一切也都是对的——随便什么事情都不能安心做上一年！永远想换口味，永远发牢骚，永远胡说八道，不爱作工只顾唱歌；并且还以为那些辛辛苦苦工作的人们看不透他！

这样一来，可把我父亲激怒了。他说他要离开她，永远不再回来。“到我这里来，玛丽！”他命令道，“到我这里来，乔治！”

他打算带着乔治和我一块儿走！

母亲倒在厨房里一把椅子上放声痛哭。父亲又命令我到她面前去，他还骂我母亲，说她把我和乔治当作狗一般对待！但是那天晚上母亲身上却有一种不知什么力量使我不听从父亲的话。我跑到母亲跟前，把手放在她膝盖上，她的眼泪滴在我手上。

我父亲并没有走，我以为这是因为我不肯跟他去的缘故。但是最后还是他得到胜利，我们全家都迁移了。从此以后我们的根便从土地中拔了出来，我们开始过着流浪的生活，四处寻求那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成功、幸福与财富，从那以后我才听到了那句古话：“我所不在的地方，那里才有幸福哩。”

我们坐着篷车一连走了好几天，走过了很长一段路程。篷车里面放着两个床垫和一个烧饭炉子，还有几只盛衣裳和装粮食的箱子。两个床垫是叠在一起的，晚上把其中一个床垫从车里取出来，铺在篷车底下，父亲和母亲就在那里睡觉。我们这些孩子都睡在篷车里面。我们到了一个有森林的地方，就停了下来，不再前进；张起帐篷，支起床架，还用白松木做了一张桌子。我父亲替山上白房子里住的一个人伐木。这位先生有时候也到我们帐篷里来；我母亲称他“老爷”，请他无论如何坐一会儿，等她去给他煮一杯咖啡。他走了之后，她又哭哭啼啼和我父亲吵闹。

这林子里有着千百种的香味。白天，我从早到晚都在寂寥肃穆的树荫底下游戏，脚底下的泥土又松又软，像棉花一般。晚上，我们就用从树林里拣来的松枝生起一堆篝火。我们的帐篷支在一片旷野上，我们吃饭的时候，头上就是蓝色的天空，所以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千变万化、奥妙无穷的景象；我们常常谈起遥远的地方；山上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就仿佛一直通到渺茫不可思议的处所。我有时站立在十字路口，凝望着那条像白色的绸带子一般引向世界另一端的大道。有一位美丽的少妇经常骑着黑马从此地路过。她的头发和眼睛都是黑黝黝的，穿着一套黑色的骑装。黑帽子下面露出一张秀丽文雅的面庞。我

母亲后来逐渐认识了一些伐木工人的妻子，从她们那里听说了关于这位美丽的少妇的事。她们说：她很有钱，但是曾经被流氓在河上的桥旁边糟蹋过。这事发生在好几年以前；她现在已经二十二岁，可是还没有人愿意娶她，也就是这个缘故！

我听到这情形以后，就时常特地去等候这个少妇过来。真奇怪！没有人愿意娶她，却丝毫看不出她有一点忧愁的样子！她那可爱的面庞显得十分庄严恬静，比我母亲的面孔更加恬静。

第一场雪下过以后，我们就离开这幽静的山林，回到了那土质灰硬的小农场上。父亲和母亲彼此很少说话，母亲常常哭泣。不久，父亲又离开我们出门去，一连几个月没有回家。我们家里冷冷清清，十分寂寞，母亲的眼睛总是哭得红红的。外祖父不时给我们送来一口袋粮食，他总站在厨房里和我母亲谈话。他的瘦削的面孔十分苍白，带着一种男子少有的秀气。他长着黑色的髭鬚；戴着一顶宽边的黑帽子。谈话的时候，眼睛里——多么像我母亲的眼睛——含着责备和怜悯。母亲站在那儿，身上穿着一件宽大的褪了色的印花布罩衫，两手握在胸前，低着头，轻轻地哭泣。

她的眼泪，……是我生命中的阴影！

这一年冬季我进了学校。那单间的、没有粉刷的木板校舍，站立在一个黄泥泞滑的山岗上，离我家很远。教室的一头有一块黑板，我学会了：当我面对黑板坐的时候，正面是北方，背面是南方，而东方在我右边，西方在我左边。现在时隔二十五年，我还总以为北方在我前面，南方在我背后，如果我想弄清

楚，就必须转过身子来，让自己觉得又回到了那小小的校舍里面才行。数目字也是些很奇怪的小家伙。“一”字站在一架高高的扶梯的底层；“一百”却端坐在高耸入云的顶上。如果逼我把一个大数目去加一个小数目，我就得一直爬到扶梯顶上，找到那个大数目，把它带下来，坐在小数目的一旁。这种工作又无聊又耽误工夫，而我的先生还骂我笨。

我从一本黄颜色的拼音教科书上学生字，那本书充满了生命，闻起来又是多么新鲜！我夜里总带着它一块儿睡觉。这已经是很多年前了，然而就是现在，那些卷曲的书页还仿佛不受年代的阻隔而散发着香味。

那年冬天，我又懂得了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当我跌交折断了手臂，一些大同学把我送回家以后，母亲看护了我好几个星期；我躺在床上，她温柔地和我谈心，人们也来问候我的病体怎样。可是手养好之后，人们却不再理我了，这使我很失望，很不快活。所以伤好了许久之后，我仍旧喊臂痛。我因此明白了，要是你生了病或受了伤，人们倒会爱你，一旦病好了，人们反而不爱你了。我的心里还产生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印象——那就是，必须经过痛苦才能得到爱。在我童年时代里，一直被认为是个多病的孩子。

一天傍晚，太阳刚要落山，我正站在那里眺望那坚硬、灰白、幽暗的小径，从转弯的地方驶来了一辆马车。两匹雪一般的白马拖着车子稳稳当当地疾驰，车里隐约坐着两个人。他们来得有如梦幻一般毫无声息，晚霞斑斓的天空衬托着那两匹马昂起的头。嗒嗒的蹄声愈来愈清晰了，最后，马车隆隆地冲进

了我家大门，父亲跨过车轮跳了下来。另一个白发苍苍的人慢吞吞地小心翼翼地跟在后头走了下来。他和我父亲两人都穿着从服装店买来的衣裳。我父亲把宽边呢帽遮住左眼，还结着一条随风飘荡的黑领带。他转身的时候，我又看见他那五颜六色的腰带上闪闪发光的钮扣。

我父亲在外面漂流了七个多月之后，就这样又回到了家里。他回来时发现家里又添了一个男孩——丹尼。他带着几匹马到了圣约瑟，不知用什么方法在一个眼科医生那里找到了一个差使。他是医生的车夫，又说他自己也在学做医生。当时中西部的医生往往不是经过大学训练，而是从实际工作中培养出来的。

父亲给母亲带回来一段黑绸衣料，她穿着那套宽大的印花布罩衫、赤着脚站在那里，交叉着手，忧愁地看着这块绸衣料。

“这一下你可不能说我没为你做过什么了！”他对她说。

她没有回答，于是他愤愤地接着说：“难道你连一句好话都不会说吗？”

“这料子好看极了，”她回答道，泪珠滴落在发亮的绸子上。

他转身跨进厨房，和白发医生并肩坐下。他们两人把威士忌酒瓶递来递去。

第二天，我听见厨房里有怒骂和哭泣的声音。我战战兢兢地溜到门边，被一种我知道会使我痛苦的事情吸引着。父亲正站在门旁边责骂母亲不该跟医生一块儿喝威士忌酒。他还说了一些别的不可思议的事情，骂她不该那样做。……母亲起初很

生气，随后就哭了。父亲还不断地喊叫什么她“和野男人勾勾搭搭”。虽然我年纪还小，我却从他吞吞吐吐的态度里直觉地看出他不仅在信口胡说，便是他自己也知道是信口胡说。他还装腔作势，竭力做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我，十分羞愧……好象是我自己犯了什么过错似的。

母亲说他不该无故冤枉好人。父亲回答道，她居然敢骂他撒谎，得好好给她点教训！于是他回身走到马厩里；几分钟之后，牵着两匹马回来，套在马车上。医生这时正从那小径上走过来，我父亲便走上前去迎接他。接着，他又回到厨房里。

“出去和医生握手道别罢！我的妻子真懂得对待宾客！”

母亲往地上一跪，禁不住放声痛哭起来：“不要走，约翰！不要走罢！想一想这几个小孩，想一想我罢！”

父亲掉头不顾，一迳走出了家门。母亲僵直地躺在地板上，哭得非常凄苦，喉咙都哑了。我赶忙跑到大门口。马车已经疾驰在坚硬灰白的小径上了，两匹雪白的马稳健矫捷地奔跑着，不时把马头昂起自负地朝向天空。

第二年秋天，外祖父把我们一家从农场搬到了一个小镇上，住在这小镇边上一所荒凉的破旧不堪的双间木屋里。屋里墙壁上没有抹灰泥，也没有天花板。站在房子里，能够一直看见屋顶，屋顶上还有许多裂缝，透进一线线亮光来。这很合我的意。房子外面的泥土硬得象烘过的一样，没有草，没有树，也没有花木。这我也喜欢，因为很别致。

母亲现在和我谈起话来，好象对一个朋友谈话一样。父亲不在面前的时候，她一向都是这样。我们一同把她的织机装好，

她就着手编织地毯和毯子。镇上的人们不但给她工作做，并且还送给我们好几捆报纸，我们就用这些报纸来裱糊屋子。我们先用面粉和水调了几大盆浆糊；我把报纸摊在地板上，母亲把浆糊涂在上面。然后我们再一起把这些报纸一层一层糊在墙上，这样可以防御冬天的寒冷。我们一边糊墙，一边谈起抹墙的灰泥。我的思想常常会超出现实的范围，现在更集中在灰泥的问题上。我常作梦，梦到母亲出门回来，发现我已经把两间屋子都抹上了可爱的灰泥！她站在前面那间窗户开在墙角上的屋子中央高声喊道：

“啊呀！真了不起！这屋子是谁粉的呀？”

于是我望着她苗条的身躯和美丽的眼睛得意地回答说：“我粉的呀！”

梦就这样醒了——我的梦和现实的距离从来没有超越这一步。就是现在——我有时候也还弄不清楚究竟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幻想；就是现在，我有时候还会想：也许我会忽然醒来，发现过去的这些年月不过是一场噩梦罢了；因为我们是很难知道哪些东西是永久不变的呀！

母亲和我糊完房子之后——我简直记不得有我的兄弟姊妹在场——我们就设法去把房子周围的坚硬泥土锄开，打算春天时在那里种些甜豌豆。但是这儿的土壤实在太硬太贫瘠了。我母亲渴望地说：要有粪肥就好了。于是我就提着一个粪筐拿着一柄铁铲，沿路去拾粪，心里一面梦想着芬芳的花圃。

现在我们是镇上的居民了，这是很值得骄傲的事；不见得人人都能住在镇上。我们的镇上有一条大街，大街的一边铺着一条木板的人行道。星期日，少女们都在这人行道上走来走去，

和那些斜倚在商店门口墙上的男人谈情说爱。另外还有一所我去上学的小学校以及一所母亲称为基督教堂的小礼拜堂。母亲认为我们现在既然住在镇上，就不应该还“粗手粗脚象个野人”。因此，有一天星期日，她就让我们把脚洗干净，跟着她穿过空场到基督教堂去。教堂里的一位妇人送给我们每人一张小画片，上面画着一个穿红袍子的人在对一个小姑娘讲话。这就是耶稣，但是耶稣是什么人，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我只是一味注意那妇人手里握的一包彩色画片，期待她偶尔把画片放下来，遗忘在哪里。我在幻想里看见我们的屋子糊满了画片——一长排一长排鲜艳的红色的画片。但是这个梦也没有实现，因为那妇人始终把画片紧紧握在手里！

几天之后，父亲又回到我们这里来了。他沿着铁道步行，向别人打听到了我们的住所。这一次他没有提起要做医生，要很快地弄许多钱，或者要叫我母亲穿绸着缎的这些梦想。相反地，他的神气十分懊丧。他的漂亮衣裳换成了一件污秽的汗衫和一套藏青的工人服。他那两匹跑得飞快的白马也不见了——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他不肯说。但是在我心目中，他还跟从前一样。他可以忘掉做医生的梦想——但是我不能忘掉。即使在我成年以后，好几次当别人偶尔问起我父亲的职业的时候，我还不由自主地回答说“他是一个医生”。当我突然想起他并不是医生的时候，心头就会掠过一阵奇怪的疑虑——他到底是医生呢，还是不是医生呢；我莫非是作了一场梦至今还没有醒透？我又弄不清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梦想了。

父亲回家不到几分钟，他就鬼鬼祟祟地告诉我母亲说他杀了人，一定得离开这个地方，不然被人捉住就要“受绞刑”或

者送进监牢去住一辈子。我又看出了他那种吞吞吐吐的神情，感到很肉麻，替他羞愧。我母亲这一回却很坚强很冷静，并没有哭泣。他于是动气了，骂她居然连自己丈夫说的话都不相信！她背过身去，只顾观看门外那片长满丑陋粗韧的曼陀罗花的空地。

“你真不害臊！当着孩子的面讲这样的事情，”她简短地说了一句，隔了一会儿，她又气呼呼地说：“如果你还打算跟上次那样丢下我们不顾，你尽管去，不必找些什么不相干的理由来做借口！”

母亲一句话揭穿了他的把戏，父亲不禁张皇失措。他站在她背后说道，他到西部去可以赚许多钱，然后再来接她跟孩子们！她霍地转过身来，把目光固定在他的嘴唇上。他望着她站立的身影，穿着破旧的印花布罩衫，瞅着她那曾经是那么娇嫩，现在却满是皱纹的面庞。但是皱纹也掩盖不了她的诚意和渴望，那双眼睛依然是那么年轻，那么美丽的蔚蓝色，眼眶上长着长长的丝绒般的睫毛，她的头发又黑又亮又滑润，犹如乌鸦的羽翼。她立在他面前显得多么柔弱啊！

父亲把嘴唇抿得紧紧的、薄薄的，下颚的轮廓十分鲜明——我还没有来得及看仔细，母亲已经倒在父亲的怀里，哭得好象心都碎成了一片片，她那被眼泪沾湿了的脸孔埋在他脖子下面衬衫敞口的地方。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们两人之间的爱情的流露。我跑到后院里，躺在鸡舍后边忍不住哭了起来。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很羞愧，怕有人看见会笑我。眼泪止住以后，我就想法编一个故事，万一有人看见我的红眼睛，我就说刚才在路上跌

痛了腿！或者说麻症又发了！但是连这样偶然的事我也希望能避免，于是我站起来，借着鸡舍的掩护不让厨房里的人看到，溜到那片空地上的曼陀罗花中间。我在地上平躺了很久，我头上飘摇着曼陀罗花和向日葵，透过花丛看到一片蓝色的晴空，和一朵朵轻轻移动的浮云，那吹着云彩的风背上带有许多的故事。当然，风儿背上是有许多故事的……要是有机会的话，谁不愿意在风儿背上坐一坐呢。

……第二天，父亲又丢下我们走了。他坐在一辆铁路上的摇车里，车沿上还坐着许多人。我们大家站在铁路上眺望，母亲的面孔显出很深沉的忧愁。父亲不时还朝我们招手。等到走远了，就挥舞他的帽子。我们还在望，直等到他变成了远处的一个黑点子。这时候，我们仍旧竭力睁大眼睛企图看他最后的一眼！是的，他还在那里……霎时间，什么也看不见了……不，还有一个黑点……最后，他终于去了。两条闪闪的铁轨伸向天边，成了一条直线，翻过大地的尽头……父亲到那里去了……到幸福所在的远方去了。

二

今天，海是灰沉沉的，黯然无色，太阳藏在北国的冷雾背后。从那时起以后这些悠长的年代里，我的生活也是如此：灰沉沉，黯然无色，暗中摸索，一事无成。许多事情都只有开头没有结局；即或有了结局，也只是失败。只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贫穷和漂泊。

我们在靠近柏格托里河岸的地方支起了一个帐篷，帐篷和底下坚硬的地面一样是土灰色的。父亲把帐篷扎在上面的这一块低地，位置在特立尼达镇的郊外，低地的一边是一排两开间或三开间的小房子的后院，另外一边是一条筑在用矿渣、石板和石块砌成的路基上的铁道。每天，碧儿崔丽斯和我带领两个小弟弟拖着几个麻袋沿铁道去拾取机车上落下来的煤块。每当火车轰隆隆地驶过来的时候，我们便冲到铁道旁边，朝那一闪一闪的车窗里面的漂亮人挥手打招

呼。

你若是把眼光越过那一排小房子，往河对面看去，就可以见到一连串灰紫色的小山岗拱卫着远处一个高高的山峰。这些小山岗都是落矶山的余脉。父亲得意洋洋地对我们说，那个山峰叫做菲喜峰，有一英里半多高，那神情简直好象是在说：

“看，这山是我的，是我替你们找到的哩。”

“到秋天，”他接着说，“我带你们到山里去露营，我会射鹿，大家都有鹿肉吃。”

我们眼前的东西，件件都是又新鲜又稀奇。我们的帐篷里面，一半边整整齐齐挤着三张床，另外一半边摆着我母亲带出来的宝贵的缝纫机和自鸣钟，并且还有一张摇椅，几乎等于一间客厅。一张摇椅，一座自鸣钟，一架缝纫机，一座高山，还有鹿肉……我一样样数着我们的财宝，得意极了。

父亲在门前搭了一个板棚，作为厨房，他每天出去做工赚三块钱一天的时候，母亲就在这板棚里作事。父亲自己有两匹马一辆货车，能够从河里拉泥沙运到别处去，有时候他也拉砖头。我时常站在那横跨柏格托里河的桥上，看他驾着车子出去，黄昏的时候，我也时常跑去迎接他。他于是便抱我坐在他的一匹马上面，我骑着马得意洋洋地回家，希望所有的邻居都能看见。

我母亲经常处在一种默默的、被遏制住的激动之中；在我父亲面前，她变得十分谦逊恭顺。因为他的确是在挣大笔的钱。他说起话来，口气也比先前大得多。他快要变成真正的财主了。我母亲于是又恢复了原来的沉默。

隔了一些时，我母亲几次去信息切邀请海伦姨母来和我们

住在一起了。她生气勃勃、容光焕发，长得更加美丽了；她的皮肤比玫瑰花瓣还要细腻。哪一位皇后也不如她这样自信！还有她的笑！每逢她笑的时候，别人也都会跟着笑起来，虽然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要笑。尽管她的美丽足以引起那些长得既不漂亮，行动又不大方的姑娘的妒嫉，她们却常常站在屋后篱笆外面和她闲谈，她有时象风一般地从她们的后门跑进去，这时候，她们的眼睛里就露出又是羡慕又是盼望的表情。她帮她们调制润肤的香水，她用鸡蛋给她们把头发洗得柔软光润，她替她们裁衣裳，逢到星期日晚上她们有约会的时候，她就帮她们把头发梳得蓬蓬松松，有时她还借给她们一条裙子或一件罩衫。她完全有余力对别人慷慨，因为她自己实在过于漂亮了。

她考虑应该做什么工作才合乎自己的身份——因为她明白自己的价值。邻居的姑娘们都赞成到洗衣店去。她还犹豫不定：那里的报酬怎样？她们应该记得她前几年做女佣的时候，除了供膳宿外，每月还拿六块钱薪水哩！而且，东家的长子还是她的情郎，现在和她还订有婚约——说到这里她的两颊微微泛红。

我的母亲和父亲都劝她仍然出去做女佣，因为女孩子到了洗衣店里会“变坏”的。她脸红了。她并不畏惧繁重的工作，她随便到哪里都能照顾自己！他们应该想到，洗衣店里的工钱比较多，并且每天只工作十小时，不象在私人家里，要从太阳出山做起，一直做到太阳落山甚至半夜才止。海伦和她们辩论了许久，又征求了邻近所有的人的意见，最后，她决定到洗衣店里去做工，现在先管理挤压衣服的机器，挣七块钱一个星期，将来希望能管理浆衣服的机器，挣到十一块钱一个星期。

她从一开始就把每星期的工钱全部交给我的母亲，经过几次三番的推让，她才肯自己留下两块钱。

“我已经有许多好东西了，爱丽，你和孩子们都还没有。你们不能老是过漂泊者一般的生活。等你们也有了好东西以后，我就愿意多留一些了。”

她最喜欢鲜艳美丽的东西；所以她这样的慷慨，对于自己是多么大的牺牲，我们谁也无从知道。然而多少年来我们却靠着她的钱——这样或那样挣来的钱——才能够有了这些美丽的好衣裳。自从海伦每星期有了固定的工钱以后，她在我们家里就取得了和我父亲平等的地位。她和他一样的可贵，一样的受到尊敬。他们彼此平等地谈话，平等地开玩笑或相骂。母亲总是在一旁津津有味地倾听，两手交叉在胸前，要是哪一个孩子出来打岔的话，她就会骂道：

“不看见你父亲和海伦姨母正在谈话吗？”

遇到父亲和母亲相骂的时候，海伦一定会插进来干涉。因为她疼爱她的姊姊。她昂起头，把头发摇得蓬蓬松松的，十分激动，声音提得很高。

“你不能对我讲这样的话，约翰·罗泽士！你也不能象管束爱丽一样的来管束我，因为我在你这里是自己出房钱出饭钱的！”

这是真的！她是付了房钱饭钱的，随便哪一个男人也没有权利“管束她”。我的母亲就不同了，她再也不能昂然地抬起头来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这里是付了自己的生活费的！”

每逢海伦动气的时候，我父亲就不知道应该如何对付她。因为在她的美丽之下隐藏着一种野性难驯的气质，她从来不曾

象人们所说的驯服的妻子那样“被套上笼头”。她常常恫嚇说要“把他的眼珠挖出来”，而她是说得到做得到的。纵然他的身材比她大两倍，她也有办法跟他打架。有时她的怒火太盛，语言都无法表达；在这种时候她就变得和她平常斯文的行为完全不同，索性使出一种原始的、野蛮的、差不多象是发自本能的手段。她会突然暴跳起来，冲到房门口，双手一挥把她的后裙一直掀到腰上。我父亲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对于这样一种侮辱简直是无法回答的！

我们现在是城里人了。特立尼达实际上只有五千居民，却号称一万。城里有一所小学校，还有一所中学的校舍巍然高耸在河对岸山上的丛林里；那里住的都是有钱的人家。中学与财富似乎是分不开的。至少，我们这些住在铁道外边的人们都知道，我们再也不必梦想去进中学。

小学校的校舍在市镇另一头的一座小山上，面对着古老的、历史上有名的圣大非大道；最初是印第安人，其次是西班牙人，最后是白种的拓荒者都曾经从这一条大道逐渐移殖到西南部去。这条路盘绕在一个峻峭的山峰的山脚下，山峰顶上长眠着一位早期的西部拓荒者。这所学校是我生平所见的第一个小学校。我每天牵着小弟弟乔治的手领他到那里去；我们都知道在我们脚底下的是一块神圣的地方，因为我母亲总是这样讲的。教员们都很整洁，好象熨斗熨过似的，身上穿着定制的外衣和雪白的坎肩，她们讲的语言，最初我简直听不懂。母亲第一天就向一位教员解释过，说我快到十岁了，在从前的学校里已经读过“第三册课本”。那位教员把我母亲上下打量了半天，她

把目光从花洋布罩衫上逐渐移到那一双粗糙的、露着一条条血管几乎是黑颜色的手上，最后又移到那副劳神深思却又闪耀着一对美丽的深蓝色的眼睛的面庞上，这一双眼睛还很年轻——但那一双手却象是一个五十岁的擦地板的老妇人的手。

“是的，”那位教员最后说道，“我明白了。”

她是一个慈祥的青年教师。当我在她面前哆哆嗦嗦地朗读的时候，她看出我竭力想把书念好，想不把那一屋子衣衫华丽的男女儿童放在心上，她于是对我微微一笑，表示勉励。接着，她又叫我到黑板面前去默写数字。怕降级的心情驱策我走上去。然而我是多么胆战心惊啊！数字一向是我的对头。我胡乱写下了几个数目字……一种本能的机智帮助了我——我知道她会以为我不过是算错了。结果正是这样。

“你怎么连这个都会算错呢！”她责备我。我呆呆地望着她，也不回答。她便拿起粉笔画算那个简单的数目。我聚精会神地看着她的手，直到将近二十年以后的现在，我还清清楚楚看见她所写的数字和她那细长白皙，中指上带着一个金戒指的手。

一连几个星期，她都用这个方法。她说的和写的我都记下了，但是完全不能理解。一排数字摆在我眼前，就象是一排兵士站在我面前，只等军官发令“射击”就要放枪。这种感觉至今还是如此。

我在那个学校里，觉得很惭愧，很受人轻视。坐在靠外面一行前排座位上的，是一个小姑娘。她的皮肤白净，浓密的头发，差不多也是银白的，她的衣裳、鞋子和袜子也常常是洁白的。教员问起她的父亲的时候，她回答说：“我的父亲是一个

医生！”我便痴痴地瞅着她。她直挺挺地坐在座位上；教员常常拿她的笔记簿举起来给班上的同学们看。书法的端正洁净正和她本人一样；两旁空的边又宽又匀；一点错误都没有。有一天放学之后，我迷迷惘惘地跟在她后面回家去。她住在一幢砖砌的，低而大的平房里面，四周围是一片花木繁茂的草地。青草修理得和窗户上的玻璃一样平滑，一切东西都井井有条、幽美而安静。就是竹篱和圆门也都油漆得雪白。

“母亲节”的那一天，白姑娘的妈妈来了，坐在教员身旁，不跟别的妇人周旋。我母亲换上了一件新洋布衫，还束着一条腰带；我得意地挨在她身旁一同走进学校去。她避开那些穿着考究的妇女们，远远地站在教室的一角，睁大了惊惶的眼睛望着她们彼此从容娴雅地在攀谈。从那次以后，她再也不到学校里去了。然而在她看来，学校仍然是一块神圣的地方，送她的子女到那里去读书是一种光荣。

有一天，我们的教员自己站在一边，让另外一位教员拿着一本讲“礼节”的书念给我们听。这本书里告诉我怎样用叉吃东西，咀嚼的时候应该把嘴闭起来。接着，她又念到关于洗牙齿的事情，但是我除了有时看见母亲在手指上涂些黄肥皂擦擦牙齿以外，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回事。我真不好意思去求她替我买一把刷子专门用来洗牙齿！这位教员又念到每天洗一次澡。我更无从想象这事怎么办得到。因为我母亲只在星期一才洗衣裳，而我们这许多孩子就只能在那漂衣裳的最后一道水里面洗澡；大的先洗，最小的最后洗。

这位教员接着又念了一章，讲的是失眠。一个人假如睡不着觉，就应该起来散散步；或是在房里备下两张床，以便由这

我到了那个小姑娘家里，看见别的孩子送了许多礼物，书籍、银器、手帕和其他可爱的东西，都是我平生从来没有看见过的。童话里曾说起过这些东西，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东西。这些礼物都陈列在一张铺着一方金线绣的台布的桌子上。我不得不当着众人走到这些礼物前面，放下我的三支香蕉，偷偷地摸了一下那金线绣的台布。然后，我走到靠墙的一张椅子上坐下，竭力把我的脚藏起来，心里想我真不该来。

别的女孩子和男孩子都显得很自在——他们以前都参加过茶会。他们敢随便地说笑；别人向他们问话的时候，他们的嗓子也不会发紧或者变哑。我呢，每一秒钟的过去都愈来愈觉得苦恼。在我自己的天地里，我是能够回答的，甚至还能领导，在铁道外边，哪个孩子也不敢碰我或者我的弟弟乔治。假如谁真敢碰一碰我的话，我就会拿起曼陀罗花的枝干当武器来对付他。但是我这时遭遇到的却是另外一种伤害。在学校里我在这个白小姑娘面前并没有这样的感觉；我在学校得出了一个宝贵的经验——她固然又整齐又清洁，但是我却能做她所不能做的事情，学会她所学不会的东西。因为这样，同时也因为教员爱护我的缘故，她才不好意思不邀请我来参加她的生日茶会。

“自然，假如你没有工夫不能来的话，请你不要因为我请了你，便觉得不能不来，”她曾经这样说。她虽然不过十岁光景，却已经很老练了。我当时也多少觉得有些不对劲，可是我还很感激地望着她，回答说：

“我一定来。反正我没有事情做！”

现在，在这个华美的盛会上，我成了个不受欢迎的客人。

我作了很大的牺牲才带来三支香蕉，结果却发现无论哪个孩子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样寒伧的礼物。我离家的时候，我的衣裳看来是很华丽的，到了这里却显得褴褛不堪，使人十分羞惭。正在我独自坐着没人理睬的当儿，一群妈妈走来叫我们到另一间屋里去，在一张铺着白台布的长桌子旁坐下来；那些丰盛的糕饼和水果拿来和我的三支香蕉比较，真使我的心更往下一沉。我所以没有乘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溜出门跑回家去，只是为了回去时好把这一切情况说给我母亲听，以及为了要想知道世界上的各种事情，即使是那些使我伤心的事情。我给安置在一个小男孩的旁边。

“你住在哪条街上？”他问我，想要开始一段有礼貌的谈话。

“铁道外边。”

他惊讶地望着我。“铁道外边！只有野孩子才住在那里呢！”

我瞪着他，想说些什么话来回答，但是说不出来。他又想出了别的话题。

“我的父亲是一个律师——你的父亲呢？”

“运砖头。”

他又瞪着我。逼得我简直想要把他弄到铁道外边去——连带他那一副眼镜，和身上穿的那一套服装店里买的衣裳！我们对于这样没出息的东西是用小弹弓来对付的。他自以为了不得，他就是这样的！但我却看不出他凭什么这样自以为了不起。

“我的父亲不运砖头”他向我宣布，好象要故意刺激我似

的。我虽然看不出他在哪一点上侮辱我，可是我知道他是在有意侮辱我。所以我就报复他。

“我敢发誓我的父亲一定能够打赢你的父亲！”我向他宣布，这时恰好有一个和葛文雅的妈妈在我们背后弯下腰来，手里捧着一大盘黄色的冰淇淋。

“喂，克来伦士，你们在谈些什么呀？”她柔声地问。

“她的父亲运砖头，她家住在铁道外边，她还说她的父亲能够打赢我的父亲！”克来伦士回答说。

“那没有什么关系，宝贝，那没有什么关系！喂，喂，吃冰淇淋罢！”但是我看见她的眼光很不以为然地落在我身上，我知道这并不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克来伦士把匙子插进冰淇淋里面，再也不理睬我了。我也拿起匙子，却把盘子碰得当当响。一个娇滴滴的、发辫上扎着亮闪闪的白丝带的蓝衣服的小姑娘，正颜厉色地望了我一眼。我再也不敢去摸那匙子，只好垂着手坐在那里，看别人毫无声息地泰然地吃着。我知道我决不能象那样地吃，如果我试着把冰淇淋嚥下去，那么整个桌子上的人都会听见。那个妈妈又回来，劝我吃一点，我说我不爱吃冰淇淋也不爱吃糕饼，她便拿些水果来劝我，我接受了，心里想可以带回家里去吃。但是等到这些孩子们离开桌子的时候，我看他们没有哪个带水果走的。我也就把我的水果留在宝贵的冰淇淋和糕饼旁边。

在隔壁一间屋子里，小男孩和小姑娘们都在挑选伙伴玩游戏。那位白小姑娘居然坐在钢琴面前准备弹奏。我把眼睛盯住她——心里想，能够弹钢琴是多么好啊！除了我之外，人人都被挑选去玩游戏，可是没有哪个男孩子来对我鞠躬，问我：

“请问你愿意做我的伙伴吗？”我看出他们有意躲避我……而这些孩子中有的在学校里都是愚笨透顶的！

我的小女主人的母亲装出一副好意：

“你身体不舒服吗，玛丽？”她问，“你想回家去吗？”

“是的，太太。”我的声音是沙哑的，低弱的。

她把我带到门边慈祥地笑着说，她希望我刚才玩得好。

“是的，太太。”我用沙哑的声音回答说。

我出来后，门就关上了。里面的游戏正在开始，传出孩子们嘻笑喧闹的声音。我怕有人把头伸出窗子外探望，以为我会不在乎、会难过，于是我掉转头来冷冷地盯着街对面的房子，加快脚步走开去。

春天来了，最初降临到平原上和山脚下，接着又来到盖着白雪的山头上。特立尼达城里的白杨树透出了毛茸茸的绿芽，柏格托里河的河水由于山雪融化一天天涨高。我们每天站在河岸上，望着河水渐渐地接近我们帐篷前面的那排小房子。河水冲击着钢筋水泥的铁路桥墩，人们惶恐地回想起十年前的一次春泛曾经冲倒了这个庞大的钢质建筑，横穿市镇开辟了一条新河道。我们每天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耳朵里充满了河水奔腾咆哮的声音，通夜都有人不断起来察听；人们不安地在河岸旁走来走去，低声议论。

一天清晨，东方才发白，我们都被母亲张惶的声音惊醒了。父亲还固执地说来得及把衣裳穿好，但是当他再向外面看了一眼后，声音里便充满了恐惧。

“赶快拿着你们的衣裳跟来。”他喊道。我们冻得直发抖，跟着他走出了帐篷，沿着两个沟渠之间的田埂向铁道走

去。河水已经溢出河岸，灌满了沟渠和低洼的地方，带着一种可怖的声音，冲过芦苇和杨柳树。这真是一种恐怖的声音……疯狂的洪水在泛滥，上涨……自然的威力带着一种不容抗辩的声音在发言。

在这朦朦胧胧之中，我们听见小屋子里逃出来的男男女女的哀号呼唤的声音。我们走到一个地方，和铁路只隔一条沟渠。沟渠里已经涨满了水……我们给困住了。

“水还不深，爱丽，”我听见父亲说，“不要害怕。”

他弯下腰来，一手一个，把乔治和丹抱起来，跨进水里。我放声大哭……他怎么能够把乔治抱走而把我留在这里呢……乔治不能一个人在那边呀！我们看见他那朦胧的身影挣扎着到达了对岸，爬上了矿渣铺的路基。他回转来把安尼抱了过去；然后又回转来，每渡过一次，水就离他的腰更近一点。他抱着我和碧儿崔丽斯涉水过去的时候，我感觉到他用脚在摸索，用大腿抵御那汹涌的水流。我奔到乔治那里，紧紧地握着他的小手。

声音从壕沟那边传过来。

“你先走，海伦。”我母亲在说，接着海伦回答道：

“不，爱丽，你先走，把我留下；我很愿意留在这里哩！……”

好象她们是在商量星期日午后的散步而不是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涨上来把她冲走的大水！

父亲大声吼道：“不要争论！”

他用双臂把我母亲举起，抱着她蹒跚地跨过了大水。海伦现在成了水对面一小片干地上站着的一个细长隐约的影子了。可是隔不一会儿，她也站在我们旁边的铁轨上了，只是我

父亲腰部以下全都浸湿了。

沿铁道向前，在一块高地上，竖立着分段长的家，一所高大的住宅，房子里灯光通明；人们都已经爬起来；人人都在听着洪水的声音。我们急急忙忙向有灯光的地方走去。是的，站长说，我们可以歇在前面阳台上。他的夫人走出来，叫我们放心，不必惊慌，虽然水还在往上涨，可是分段长的住宅建筑在一片高地上，大水是淹不到的。即使给洪水围住了，它也经得起。她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直都在祈祷，她相信上帝一定能挡住凶猛的洪水。她不断地微笑，就象一个人夜里走在黑暗的峡谷里有时要吹口哨一样。她建议我们也来祈祷；在这样的时候，人们不应该再迟疑了。我母亲不禁一怔；她本性对天主教就有反感，就象对外国人有反感一样。我父亲没有回答；他虽然不信上帝，可是在这种动人的情景下——温暖的房间，点燃的蜡烛，辉煌的神龛，再燃上几支香，心里怀着对奔腾叫嚣的洪水的畏惧——要不是我母亲用严厉而冷峻的态度拦阻了他的话，他是很容易被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境界吸引去的。

这位虔诚的妇人微微笑着，她走路的时候，懒散无力，就象一个吃得太饱的动物一样。她不时走出来对我们说几句话，然后又回到她的卧室里去祈祷。她的整个神情都表示出：上帝虽然允许河水把铁道这边所有其他的房子困住，但是对于段长的这所住宅，“他”是会保佑的。

我母亲和海伦对这个妇人的态度很看不顺眼；阳台上的夜气很冷；我父亲从腰往下都是湿的，我们也通通没有穿足衣裳。可是这妇人却不邀我们到那间温暖的屋子里去。她要我们

祈祷——但是我母亲并不是一个在别人强迫之下就肯祈祷的人；那是她诚实的品质所不能允许的。

天渐渐亮了，水继续在涨，我母亲和海伦站在阳台的一头眺望我们的帐篷，那模糊的轮廓已经有一半淹没在水里。

“缝纫机是毁了，还有那些鸭绒被褥！”她们俩带着无限凄凉的声音在交谈。

“约翰，约翰，要给冲走了！要给冲走了！”

我们都拥到阳台边上。透过汹涌翻腾的大水，隐约可以看见帐篷的轮廓，摇摇晃晃一上一下地随波激荡，接着，它旋了半个圈，慢慢地漂动起来。帐篷因为是钉牢在木柱和地板上的，所以还保持着直立的姿势。它撞在一棵柳树上停留了一会儿，再继续往前漂；又停了一次，然后侧转过来，顺水而下，连影儿都不见了。我母亲满面愁容地了望着，直到大楼的屋角遮住了她的视线才把头转过来。

“我们在这世界上的全部财产都漂走了……我的鸭绒被褥、缝纫机、自鸣钟、海伦的衣裳……我们除了身上的衣裳以外，什么都没有了！”

我父亲用胳膊搂着她的肩膀。“不必这样伤心，爱丽！柳树会把帐篷挂住的，明天早上我们就可以把它找到。”但是他说话的声音里也带着沉重凄凉的失望。母亲懒洋洋地靠在他身上，没有流泪，她早已失去了哭泣的能力。

天已经大亮了。虔诚的妇人从房子里走出来，朝着在阳台上发抖的我们微笑，仿佛叫我们放心。她宣布说洪水正在很快地退走。上帝的慈悲和祈祷的力量都得到了证明——上帝保全了分段长的这幢房子。

今天是星期日，我的脑海中又浮现了我那些骨肉之亲的人们，我一幕幕地重温我们生活中的小场面，贫贱的人们的小场面。

我父亲和母亲尽了一切力量来抵抗那残酷的现实，经过了多少次的尝试，受到了多少次的挫败。他们都是诚实的老百姓，相信劳苦工作之后，就会有收获；相信工作最辛苦的，报酬也会最丰厚。

我记得一处地方，那里有过一次挫败，是在一种无比瑰丽的环境中产生的。我们的帐篷给大水冲走之后，父亲就和一个煤矿主人签订了运煤的合同。煤矿在深山里；必须把煤装在货车上从一个黑暗的峡谷中运出来，我坐在父亲旁边，他给我讲故事。峡谷里有个石头砌成的大石墩，他说这是一群印第安人的坟墓，他们曾在这里作过一场猛烈的战斗。

“他们从峡谷底下上来，有的光着身子，有的披着毡子和兽皮，有的伏在马背上，一手揪着马鬃，一手扶着马腿。他们在这里相遇，打，打，打，打到末了，所有的人都死光了，一个人也没有留，连讲述这个故事的人也没有剩下来。”

假如连讲述这个故事的人也没有剩下来，那么，他又怎么会听到这个故事呢，他也没法解释。可是，这并没有关系——对于他，对于我也一样，幻想就跟树枝与石块一样的真实。在这峡谷里做工的那些寄住在我们家里的外国矿工，在他看起来都是些浪漫的人物；他们那些古怪的语言就富有色彩，充满了传奇的情调。远处山岭上黑压压的森林对他发出神秘的呼唤——山里的狮子和野猫呼啸咆哮着，大地也洋溢着荒野的气味。我们的土砖房和一般墨西哥人与印第安人的房子一样，墙

壁有三尺厚；这不仅仅是一幢房子，简直就是一个堡垒，可以抵抗敌人的进击和防御那些晚上出来步伐轻软的野兽。

可是在我母亲看来，峡谷上面的石墩不过是响尾蛇的洞穴；她固然也不知道是谁把那些石块砌成了那么一个大石墩——但是她从来不去胡思乱想。在她看来，外国矿工不过是些生虱子的人，她于是不得不在我们每人脖子上挂一小袋阿魏，因为阿魏能治虱子。至于天上懒懒的云朵……不过是……不，她痛恨一切懒惰的事物！远处阴森森的树林，只能说明我们住得远离市镇，我们这些孩子早就应该在那里上学的市镇。然而……我很诧异……她的眼睛总象是若有所思。也许她不敢去观看天空的浮云和黑压压的森林或者山麓上正在成熟的莓子……劳动的人是一时一刻也不能让眼睛离开大地的。

她生活的唯一目标仿佛就是等待矿主从城里来给我们“结算”清楚，那时候我们就有足够的钱回特立尼达去了。

矿主直到十一月才来。他是个矮小的人，一抹黑胡鬚，戴了一顶圆顶的硬毡帽。我母亲又烧菜又烘饼，非常的兴奋。几年以来她都没有烧过这样好的东西。

“窦纳先生，请坐吧，随使用一点！”她得意洋洋地向他说。窦纳先生摘掉了他那圆顶的硬毡帽坐下来。他独自一个人吃着，我们大家都望着他。我父亲坐在桌子的一端，慎重其事地和他谈话，就和男人们彼此谈话的时候一样，我母亲在桌子旁边招呼，劝他多吃一些。我们这些孩子贴墙坐着，望着他一口又一口地吃：好的食物吃得差不多了。他走以后我们又只好吃咸肉和豆角……永远吃不完的咸肉和豆角啊。

我在外面玩耍了半天，傍晚时候回家来，刚走到门口就站

住了，我听见父亲在大喊大叫：

“我的妻子辛辛苦苦像狗一样地工作，我们现在所有的钱还不够替她买一件衬衫！”

塞纳先生很客气地回答说：“请看看合同吧，罗泽士先生，请看合同罢！”

又是我父亲的声音：“天呀，老板，我从五月起做到现在，用我自己的马、自己的车子，我天一亮就起来，天黑了才回家。”

那个一本正经的小个子冷冰冰地说道：“看来你们这里还吃得不坏……你们并没有饿着呀！”

“我们从来吃不起这样好的东西，老爷，这些只是做给你吃的呀，”我母亲哭着说。

塞纳先生一生不知见过多少愤怒的男人和哭泣的妇女……他们都是一点也不了解合同上的法律条文，就在上面签了字的；他在山脚背后还有好几个小煤窑。我母亲在他看来就象是一块木头，他对她回答道：

“我只是按照合同办事，罗泽士太太……这是你丈夫的签字。”

字签得歪歪扭扭的，因为我父亲几乎不会写字。他看了看自己用铅笔写的那些弯弯曲曲的符号，这些符号就象在嘲笑他的愚昧和无可奈何的处境，这时候，他的心仿佛被什么东西刺痛了。“你这个该死的！……所以我们就应该这样做苦工，好让你给老婆买绸衣裳，送儿女去上中学！我也有一个老婆和五个儿女。你看看我的老婆吧……她还不过三十岁，看起来倒象五十岁了。想一想吧，你这该死的人！你却到这里来，凭着一纸文书

……我相信了你说的话……在我们那里，人说了话就算数，根本不要什么文书……我没想到你竟是个从人家妇人孩子嘴里抢面包的该死的贼……你……”

他伸出手一把抓住窦纳的脖子，把他一阵乱摇，就象一只哈叭狗摇着一只老鼠一样。这个矮小的人尖声呼嚎：“约翰·罗泽士，如果你再不放手，我一定要叫人把你抓起来！放开我！放开我！”

我母亲上前去拉开我父亲，一面叫道：“不要这样，约翰，不要这样……当心坐牢呀！”

于是这个矮小的家伙死里逃生似地跑走了。我们的屋子里一片静悄悄，空气很沉重。母亲倒在床上，一声不响。父亲走出门去，帽子也没有戴，夜深以后才从山上回来。他和衣躺在床上，一句话也不说。第二天，我们收拾起仅有的少数几件家庭用物，装在货车上，出发下山赶着长途转回特立尼达。我们在这世界上所有的财产，就只是我母亲从那些房客身上节省下来的很少一点点钱了。

希望和失望，再一次形影不离地携手同行。现在我们又住在邻近学校的地区了。母亲感到有了希望因而十分愉快。父亲在一个很远的煤矿镇上找到了工作，她便租下了铁道外边的丁康膳宿处。这个膳宿处以及海伦给我做的那套新柳条布衣裳使我觉得十分得意。在学校里，我的教员问起我住在哪里，我就神气十足地高声应道：

“丁康膳宿处！”

“那是什么地方？”她问道，把眼睛稍微睁得更大一点。

这还用问吗？谁还能不知道这所华丽的“丁康膳宿处”，这幢远远望去就象是砖头砌的两层楼的房子！我得意地回答说：

“在铁道外边！”

我把自己的来历介绍给大家之后，就开始补做那些因为入学晚而缺的功课。现在坐在那光荣的座位上的是一个男孩子……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到那时他就不会继续坐在那里了！现在家里没有人吵架了，母亲把我推到“客厅间”——我们这时有了一间“客厅间”——里去温习功课，而她自己，却忙忙碌碌地上上下下满屋子照应。

两个月过去了……我渐渐赶上了那坐在光荣座位上的男孩。这一点，他也知道。我偶尔向他那个方向望过去，常常发现他也正抬起眼睛看我——于是我们马上又埋头读我们的课本。

不久，家里的光景开始恶化。我母亲的买卖赔了钱。房客们拖欠房租，而且要求过分，她应付都应付不过来，更不用说赚钱了。我父亲又回到家里，母亲和海伦把这恼人败兴的事告诉了他。第二天早上他就去坐在早餐桌旁边，守候这些贪得无厌满口怨言的房客。一个胖女人领着她的丈夫先走进来，她懒洋洋地叹了一口气，在椅子上坐下。另外一个老头儿愁眉苦脸地朝桌子上望着。

“你们只管吃罢，朋友，”我父亲厉声说，“因为这是你们在这间屋里的最后一顿饭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老头儿叫起来。

“就是这个意思！”我父亲高声说。

“这个星期还没有完哩，”胖女人煞有介事地指出。

“你们乖乖的把这些日子的饭房钱付清，然后给我滚出去！”

早餐后，他上楼去挨间敲房门要账！我从他的声音和态度上看出这是他平生最紧张的时刻之一。他曾经梦想过这样的事情——他自己掌握了权柄，大刀阔斧干一场。这还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战场，但是慢慢会变得象一个战场的。他回到矿上去的时候，一定会把这回事编成一个动听的故事。

这我是知道的，因为我曾经听见他添枝加叶地编造一个故事，最后完全失去了原来的面目。这故事很简单：几个月以前，就在冲走我们的帐篷的那一次大水里，溺死了一个人，一群人找寻了几天之后，发现了他的尸体。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全部始末。

我父亲在酒馆里听到这个故事，回到家来，就讲说他怎样和一群人沿着柏格托里河寻找那失踪的人。他把发现尸体的经过，加上一些恐怖的细节，叙述得很详细。大约一个月之后，我听见他对一群人讲同一个故事，这次却说只有他和另外一个人一块发现了那个尸体，他们把它从沙里挖出来，抬到验尸所。

过了许久，我又听见他把这个故事讲给两个煤矿工人听。他有声有色地开始：大水退了以后，听说有人溺死了，他认为应该去察看察看，于是便沿着柏格托里河两岸走去，他走了好几英里路，前前后后翻动了许多木料，因为有些木料看起来活象是个死尸。他在这些细节上绕了半天圈子。然后……那边是什么东西呀？凸出在泥沙上面的又是一块木料吗！不是的，天

呀！他走近一步，原来是一条胳膊——笔直地伸在空中，活像这个死人在对他打招呼：“我在这里哩，约翰·罗泽士！”

他用双手挖，挖出了一个肩膀、半边身躯、一条腿，最后才挖出了整个身子！天呀！他把尸体放在柏格托里河里洗干净，说不定这还是他的一个朋友哩——奇怪，真有点像他的一个朋友！他仔细观察那浮肿的脸孔，——听故事的人都吓得喘不出气。他把尸体抱起来——他，只是他一个人——送到验尸所；说实话，那个该死的死尸给水泡得真是怪重的哩。——说到这里，他的听众就有一半站起来，到马厩里去了！剩下的一半一直听到死人入殓落葬以后才离开。

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候的样子。

楼上，那个胖女人正在和我父亲争论房租的事。昨天早上的鸡蛋连狗都不要吃！

“女士，不管你叫什么名字罢，你是个女的；但是你一定要把钱付清，否则我让你男人身上不留一块干净的地方！”

她丈夫到底把钱付清了。

海伦站在扶梯下，很满意地听着，忍不住要笑。她也赔了钱，但是她没有出嫁，还经得起一点损失，我母亲坐在厨房里，愁容满面，心情沉重。她曾经再一次不辞劳苦地贡献了她微弱的体力，——然而终归失败了。

我的心灵里充满一种说不出的孤寂。我感不到一点温暖——甚至连生存的兴趣都失去了。我在学校附近一家人家当“厨工”。放学后就去洗碗碟照料婴孩。我无精打采地摇着，婴孩尖声哭闹。

膳宿处的买卖失败以后，我母亲就跑到这里来和这个妇人商量。她们在时间和报酬的问题上争论了很久；这个妇人——一个铁路上烧火工人的老婆——站得直挺挺地，摆出一副懂得怎样对待女佣人的神气，简短冷酷地数说着我的职务。最后就把我交给了她。给我的饭菜都放在一个盘子里，我就坐在厨房里一张临后院的旧桌子旁吃。这个妇人好像把我也当作厨房里的一件家具。我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雇用的“佣人”，在我们地位的差别上，她不允许有一点错误。我还记得我曾经想对她表示一点爱，而她的反应却十分冷淡。要懂得我已经不是个小孩，而只是个“女佣人”，真是不容易哟。

乔治、丹和碧儿崔丽斯在学校里每天都和我在一道，但是他们似乎也都不再属于我了。安尼已经出去做工，在洗衣店里当一个管挤压机的女工。海伦终于升任管浆衣机器的工作，靠了她的力量才把安尼安插进去。放学后乔治常常把他的小手拉着我的手，一同走到我们分路的街头，他回家去，我去作工。

学校里的功课现在成了一种负担。我那夺取光荣座位的梦想也烟消云散了。那个白小姑娘还是和从前一样的完美，似乎已经忘记了我的存在。新来的教员看见我也不感兴趣。我对着那些要洗的碗碟，和那个尖声哭闹的婴孩，不知掉过多少眼泪。不久我就生起病来了。这妇人问我什么地方不舒服……我不知道。我告诉她我的手臂曾经跌断过，现在又痛起来了！于是这个妇人向我母亲抱怨，把我辞退了。我的病随着我的被辞退也就好了。

我们家里也有了許多变化。我们现在住在一座小小的四间房间的木屋里。海伦和安尼两人占用其中一间，因为她们都在

做工，在这里住宿吃饭都是付钱的。安虑处处以大人自居；她拒绝做家里的杂事，也不尊重我父亲和母亲的意见，海伦学会了城市姑娘的言语举止。她不说“ain't”而说“have”或“have not”^①。她象一张敏感的照相底片一样吸收着这些时新气派。她买了被单，穿着薄薄的寝衣睡觉，不再象我们那样穿着内衣睡觉。我母亲极端崇拜她，海伦的一言一行似乎都合我母亲的意；看来她自己生活中所不能享受的一切，都通过海伦享受到了。逢到星期六晚上，我常常听见她们两个人争论：

“你最好收了它，爱丽，我现在有不少好东西了，你还没（ain't）——没有（haven't）呢。”

我母亲带着温柔的抗议回答说：“我不好意思把你的工钱通通拿了，海伦。你自己一点也不留。”

“你就把钱收下罢，爱丽！不要多说了！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约翰没有带钱回家来。海伦费了很长的时间才学会把‘g's’加在语尾上。”

于是我母亲就把眼睛顺着地板上的一条裂缝看，海伦就站起来走出屋去，留下了一个星期的工钱。

每天放学之后，以及星期六和假日，我都帮助邻近的妇女洗碗碟、洗衣服、送东西、搬木柴或送煤。她们把我的工钱付给我母亲。我总要到晚上才回家。我在一处地方，帮一个新结婚的妇人做工。她过去也是洗衣店里的女工，和海伦一块儿做工挣钱；但是结婚以后，她的丈夫就说他的妻子没有再去作工的

^① “have not'”和 ain't 都是“没有”的意思，前者合乎文法，后者不合文法，一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常用“ain't”而不用“have. not”。

道理。他逼迫她放弃积极独立的生活，让她住进一幢三间房间
的房子里，大部分事情都等我放学以后去做。她整天躺在床上，
常常到下午才起来梳洗。

“要让我结了婚，跟格莱迪斯那样整天躺着，你看我干不干！”
海伦有一次扬着头，很自负地说。

格莱迪斯度过了最初几个星期的结婚生活以后，就开始和她丈夫吵起嘴来。左右隔壁的妇女都放下窗帘躲在后面偷听。当她按照轨道外边妇女们的习惯去向她们诉苦的时候，她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妇女应该“服从”丈夫。我内心对这一点很起反感，我痛恨而且鄙视她们这一班人。

“看在耶稣的分上，你闹来闹去到底想怎么样呢？”她丈夫有一天忍不住了。

“我要回去做工。你整天在外面，我坐在家里无聊得很。”

“什么！去做工，好让人家说我连个老婆都养不活！我不明白你要怎么样！你又不缺穿，甚至不必让你的手沾一滴水。”

“我想回去做工。”

“好到街上去游荡，把你挣的臭钱来侮辱我吗？假如你要去做工，就请滚出我的家！”

因此格莱迪斯没有回去做工。几个月过去了，邻人都开始窃笑……据说她现在“有喜了”。然而她还继续和丈夫争吵。他们两人之间的一段对话至今还深深刻在我的记忆中，就象有一把刀狠狠地在那里戳了一下似的。

“把我给你买的衣服还我！”有一天他对她嚷道。

“天呀，好人，你知道我是爱你的呀！”她眼泪汪汪地哀求——现在即使她想回去做工也办不到了。

隔壁院子里有两个妇人在窗外听到了这些话，她们都笑了。她们说她再不能那样盛气凌人了。我没有笑。这些话里包含着一种使人十分伤心的道理！我回到家里也没有心肠把这些话对人再讲一遍！在我一生中后来的日子里，我只有一次重复了这几句话；那是因为我要探索为什么我会这样憎恨婚姻，这样厌恶那些做妻子的妇女。这两句对话在我心灵里总结了婚姻关系中丈夫和妻子的真正地位。

“有的人应该再给他一些，没有的人应该再从他那里拿走一些！”牧师正在宣讲。他说的那些话，我都早已懂得。我们属于那种什么都没有而什么都还要被人剥削的阶级。

教堂巍然高耸，阳光透过彩绘的窗户照射进来。牧师说话的声音又严厉又冷酷。我想起新买的绿柳条布衣裳。我梦想再买一顶翠绿的帽子、一双绿袜子、一双绿鞋子和一副绿手套，就和我现在的女主人一样了。她是多么美丽啊！她走过的时候，人人都停步观看。

牧师的说话叫我念念难忘。对于那些富有的人，上帝可以给予，对于那些没有的人，上帝反而要拿走一些。上帝似乎就是冥冥中一个不公平的敌人。我们铁道外边的人斗架的时候，总是公开而且公平的。有一次我和铁道外边最调皮的一个男孩斗架，父亲把我们拉开，抱着鲜血淋淋昏迷不醒的我回家去。在教堂里，他们将上帝的概念来教诲我，我却不能理解。我曾经到主日学校和教堂去过三次，他们一再告诉我要爱上帝，并且畏惧上帝。这怎么可能呢——就说我父亲罢，假如我畏惧他，我又怎么能够同时爱他呢。再说，我还应该畏惧魔鬼。上

帝和魔鬼在我心中搅成一团。而人家教导我对于二者所应有的畏惧，又都是一样的。这全部事情都是愚蠢的。

教堂真使我大失所望。然而事情的开始却是多么美丽！三个复兴会的牧师，从加拿大来劝化美国人信奉基督教。我是美国人之一，他们就把我劝化了——至少有三星期。他们都长得颀长、年轻而漂亮。他们站在我们学校的走廊上，唱着“枫树叶长青”的歌；我也仿佛看见那些黄色的赤金般的枫树叶在日光下颤动；微风吹过树梢，带来了许多故事。牧师后来又到教堂里去，我也跟他们到了那里。他们又唱了几首歌，以后，其中一位就用极柔和的声音询问听众道：

“有哪一位愿意象羔羊一样来归顺耶稣？”

这种说法有点可笑，但是我还是站起来，从会堂中的通道走过去，站在他和全体会众的面前。我忽然感到有点胆怯，怕会众里面有认识我的人会讥笑我，我慌乱了一忽儿，但还是继续往前走。假如哪一个铁道外边的孩子胆敢嘲笑我，我们以后可以细细算账！

“你愿意永远当耶稣的羔羊吗！”这人问我。他的眼睛蓝极了，他的头发是金黄的。

“是的，先生！”我眼泪汪汪地回答他，因为他的声音很低沉，他的眼睛十分美丽。

就这样，我成了一个基督徒。现在我来到教堂里，尽力坚持下去。但是每星期日我内心都隐隐地感觉到，我不会长远做一个基督徒。自从那个蓝眼睛的牧师走了之后，做基督徒这事情真是太乏味了。

教堂所在的商务街是这城里主要的通衢大道，象一条蛇一

样曲曲折折地穿过城的中心。这也是从前的圣大非大道的一部分。教堂和酒店同是商务街上的两个路标。从教堂出来跨过马路，走上一个小小的山坡就是酒店。只要父亲不在做工，随时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他。这是一幢小小的、一层楼的房子，装着两扇活动门，人们到这里来赌钱、喝酒、“谈天”。酒店隔壁有一家雪茄烟店，店门前终日有人在逛荡、抽烟、吐痰，交换一些淫秽猥亵的故事和粗鲁邪恶的言语。

从商务街尽头跨过一道桥，在全城人引以为荣的火车站旁边，有一家膳宿代办处，我现在就在那里做工。我放学以后，就直接到这里来。膳宿代办处的主人韩溥栋太太是一位年轻寡妇，既美丽又会做菜，因此她能够索取很高的、只有铁路工程师和烧火工人才出得起的房租和膳费。她有一间客厅，里面放着一架风琴。她的卧室就在客厅隔壁，是一间宽敞向阳的房间，她是一个十分讲究的奢华的太太。

一天晚上，我正躺在客厅里的长沙发上，忽然听见她房里有说话的声音。我静静听着——确实提到了我的名字，是的……她……她正和那个工程师在谈话。她说：

“我相信每日早上我起来之前，她就把牛奶喝掉了一些。”

“那你为什么不辞退她呢？”工程师的口气又象是命令，又象是责怪，有如一个丈夫在对妻子说话。

“是呀！……但是她做的工作真不少——赶得上一个正式雇用的女工。”

“……但她到底手脚不干净啊！”

我再没有听见别的话。我躺在床上——一连好几个钟头无法入睡。这种责备并不冤枉，——我每日早上从后门口台阶上把牛

奶瓶拿进来的时候，的确总要喝掉一口。我常常得挨饿，因为我得到的食物就只有包饭客人剩下的一点点东西。韩溥栋太太是一位体面的妇女，她自己坐在桌子的一头陪那些包饭的客人一块吃饭。她是一位慈祥的妇人，我在她家里并不觉着寂寞，不过她并不经常留心剩下来的东西到底够不够我吃的。她没有工夫跟女人打交道。我在厨房里吃完了剩下来的随便什么东西以后，还要把碗碟收拾起来刷洗干净。

第二天早上，为了洗清我的罪过，我起得特别早，把水烧开，把抹布、手巾和枕套都洗得干干净净。等她起来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已经挂在外面，牛奶瓶也已经摆在桌子上，和原有的分量一样满。到了傍晚，我从厨房里偷偷提着一个小水桶，朝铁路外边走去。因为我母亲这一阵开始给人洗衣裳，从海伦那里又得到一点帮助，已经省下足够的钱买了一头母牛。虽然她是要把牛奶卖钱的，但是我可以把实情告诉她，求她给我一桶牛奶去偿还韩溥栋太太。然后我就去恳求韩溥栋太太饶恕我——我的罪过就可以洗清了。我甚至还想到要回教堂去作为对自己的惩罚。

我带着轻松的良心往家里走。走到大门口就站住了。我看见父亲一边在咒骂，一边揪着姊姊安尼的头发把她往屋里拖。安尼直着嗓子喊叫，拚命的挣扎。

“就算你有二十五岁，长得象堵墙那么大，我也要把你揍个半死扔出去！”父亲叫道。

母亲的声音带着无限的焦虑：“啊，安尼，告诉我，你昨天夜里到底是不是在外面开旅馆？”

安尼是又泼辣又粗野。“难道要我跟你说一百遍？我去参

加跳舞会，在米丽家过的夜！去问她的妈好了，看我是不是住在她家的？”

“你撒谎！”——可是我父亲的气渐渐消了。

“我撒谎，是吗？那么，你干嘛问我呢？”

“好，我饶你这一回，要是下回我再听见你到这种下流的跳舞场去，和那些忘八羔子鬼混，通夜不回家的话，我一定把你揍个半死扔出去！”

“你还是自己留点神，爸，我自己会照顾自己的！你一天到晚待在酒店里……还有什么资格来说我……我现在是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安尼这时十五岁，已经是个踏入社会的妇人了。按我们这个世界的标准，一个妇女自己能挣钱就是个自由的妇女。唯有出嫁了的妇女才需要听从别人的指挥。父亲居然敢碰安尼，这已经违反了铁道外边公认的约法。他还对安尼不停的嚷嚷，声音大得左右的邻居都能听见：

“是呀！你自己能够挣钱了，这于我们有什么好处呢。海伦都把她的工钱交给你母亲，而你呢，却尽用来做些花衣裳穿着到外面街上去招蜂引蝶！”

“你为什么不把你的钱交给妈呢？为什么偏偏去送给酒店老板呢？我倒想知道。”

“不准回嘴，贱丫头，你照我的话办，别管我是怎么办的，不然你就是长到二十五岁，我也要把你揍个半死扔出去……”

后门猛然砰的一下关上了……安尼满不在乎地回答了一句，还不等他把他的威胁讲完，迳自走了出去。

我手里提着一个小水桶站在大门外。我听着屋里吵闹的声音，一种复杂的感情在心里翻腾，——憎恨，痛心。记忆激发了意识，构成一幅令人恶心的朦胧模糊的图面。“安尼在旅馆里过夜。”……就是说性的关系。我父亲和母亲因此就要打她。……他们有什么权利呢……他们自己都是骗人的伪君子！我听说过他们在半夜里……现在他们倒大惊小怪起来！成年人都是这样会撒谎，都是这样不老实！至于安尼……长大了……乳房肥肥的，臀部高高的，而且还以此自负！多么叫人恶心啊，我不高兴靠近她……我差一点要呕吐了。长大了，干那成年人干的勾当——沉溺于性的冲动！

这一面是我的童话世界，“枫树叶长青”的歌声，童话里那些爱护各种动物的善良的小姑娘，五颜六色，有歌有舞的故事；哪怕眼前不免受些折磨，但是终有幸福的归宿。在另一面是——一座矮小的房子，碎了的玻璃窗上盖着一块破布，一株寂寞的牵牛花藤挣扎在廊前干裂的土地上，安尼披头散发地给拖进屋去，我父亲曾经是那么魁伟那么俊秀，现在却躬着背，嘴角上流着烟草汁。

我连院子外面那扇破旧的门都没有推开就掉转身循原路走回去，沿着柏格托里河岸，越过铁道、跨过流入河里的小溪涧，经过机车库回到韩溥栋太太家里。我爬进厨房，把提桶放回架上，然后躺在床上静静地等待。

韩溥栋太太对我说：

“玛丽，我想，从现在起，这些事我自己一个人就都能做了。我用不着再雇你了。”

我从后门望出去，洗好的衣裳还在院子里随风飘舞。我就这样被辞退了，只因为偷饮了一口牛奶。我以为她早忘记了。这几天来我一直辛辛苦苦的工作，希望能把事情挽回。这样处理不会是她自己的主意……不，这一定是那工程师叫她这样办的；她快要嫁给他了。他要依照基督教的规矩，把她变成一个“体面的”有夫之妇。于是她不得不服从他。

“我再给您白做一个月好吗？你不必付给我工钱。”我的胸口紧张得如同鼓面上张着的一块皮。

她想了一想。“不用了，我自己能做！”她的声音里含着歉意，但是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

一路上我挨挨蹭蹭走了好几个钟头才到家。我先在机车库旁的白杨树下坐了一阵，后来天渐渐黑下来，又去坐在小溪涧旁一株垂柳底下。我知道得编造一个故事来瞒过我母亲，不然一定又要挨她的打。她会尖声厉呼：如果再发现我偷窃，一定要“把我踩到泥里去”。说不定她会把我打得“血流满背”。我需要时间来盘算，卸下我心头的重担。也许最好还是跳到河里去淹死罢，那么韩溥栋太太和我母亲就会懊悔不已。河水无情地奔流，黑暗浑浊的河水扑打在对面闪闪发光的灰色的沙岸上。流水在自言自语……那声音是多么奇怪……就象洪水向我们冲过来的那一天晚上。这样的东西你没有办法使它爱你，它比野兽还要凶。这种声音……恐惧使我退缩……我不能把自己托付给这样一种没有感情的东西。

夜深了，天色漆黑……我离开韩溥栋太太家已有好几个钟头……现在一定将近半夜了。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回走，我走到厨房外面，把门推开。现在撒谎不撒谎都无所谓了。

可是又出了什么事了？海伦和安尼并肩站在房间里最暗的一个角落里。母亲坐在椅子上，双手捧着头，抽抽噎噎地哭。父亲站在门旁边，象是一条预备出击的野牛。我走进来的时候，他们都抬起头来看。父亲看见我把眼光凝聚在母亲身上，他也许想起了我是最不忍看见她哭泣的。他也许觉得自己理亏，仿佛他是这场痛苦的制造者似的，于是他对我喊道：

“看，玛丽，看看你的……你的海伦姨母……跟西班牙姘头在廊沿角上睡觉，让我抓住了！赚了钱买别针，买漂亮的衣裳！……这就是她做的丑事！”

“约翰……天呀，你这是什么意思，跟一个小孩讲这些事！”我母亲吓得连气都喘不过来。

“她也应该知道她母亲的妹妹是个什么样的丑货……就是这个意思！”

一阵沉默。似乎有一把刷子在我的脑子里扫了一下……我能够听见这把刷子转弯的声音。我们都站着一动不动。海伦苍白的脸上现出辛辣的表情。

“约翰·罗泽士，你不配说这样的话！你对待爱丽象一条狗！你自己把所有的钱都花在酒店里，还有什么脸来说我！”

“该死！……你这个娼妇，还……”

海伦猛喊一声，朝他一头撞过去。一只手象闪电一般打在他面颊上，留下一个血红的印子。他捉住她的两只手臂，死劲把她高高吊在空中。她虽然瘦弱，挣扎起来却很凶悍，她用脚踢他的肚子，想用牙齿咬他。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才把她架开。母亲站起来惊惶失措的走上前去；用胳膊搂住海伦躬着的身子，紧紧抱住她，替她把头发理顺，“放手，约翰！海伦……海伦

……小妹妹……到我这里来！”

她把两人拉开，拉着面色苍白气喘吁吁的海伦走到这间屋子的另一头。

“你居然帮一个娼妇来反抗自己的丈夫！”

海伦还要冲过去，但是我母亲两臂搂着她，用自己身体的重量，把她拖住了。“爱丽，”——海伦气咻咻地象一只小野兽——“放手！放手，爱丽！”她跟我母亲摇来摇去地挣扎，但是我母亲抱得很紧。海伦转过头来，把白生生面孔对着我父亲。

“假如你再那样叫我……你这下流的狗东西……我要用这双手把你掐死，爱丽也挡不住我！”我母亲用哆哆嗦嗦的声音尽力安慰她，摸着她那可爱的古铜色的头发和白白的面颊。但是海伦还在说话，声音不大，但是很激动。

“就算我是个娼妇，那么约翰·罗泽士，我倒想知道是谁把我逼成娼妇的！是你，约翰·罗泽士，是你呀！爱丽跟这些孩子吃不上饭穿不上衣裳。每次发钱那天，我都把工钱交给她。是的，这你也知道！假如没有我的钱，她早就饿死了。而你在酒店里……星期六晚上回来一个钱也不剩，还要撒谎耍赖；如果她有半句怨言，你还来吓唬她。你知道她是怎么活的吗？……洗衣服吗？……你这该死的！你不过是个下流的狗东西！你配骂我吗？你哟！你以为我买花衣裳的钱是从哪儿来的？……我不能穿得象个穷婆子……我不想嫁人，让一个男人把我管得死死的，打我，叫我挨饿！我也有权利享受好东西。就算我是个娼妇……那也是你逼出来的，就是你，约翰·罗泽士，你……你……你！”

“收拾起你的东西给我滚蛋！你敢再到我门口来现眼！”
我父亲气得面色铁青。海伦的话打中了他的痛处。“马上滚出去，……滚到你那个西班牙饼头那里去！你还不配做一只狗呢！”

“你倒很配！还好意思说这是你的家呢！……房租都不是你付的。你没有拿过一个小钱回来！”

“离开我的家，不然我把你扔出去！”

母亲还是用两只胳膊抱住海伦。“假如你要她今天晚上离开这里，约翰，那我就跟她一块儿走。”

“嘿，居然想跟这么一个女人一块走到街上去，真是个贤慧的老婆！你放开她，到我这里来！”

我母亲站得直僵僵地，显得弱不禁风，面色灰白，就象我许久以前看见的一个受伤的煤矿工人在临死几秒钟以前的面孔一样。她的深蓝的眼珠闪烁着光芒……我象在哪里看见过这样可怕的眼睛？……我记起了……当然……好久以前……我一定不过才四岁……我杀死了一只小猫。……用泥块把它砸死在大路上，因为它的样子很古怪，我认为它一定是非常危险的……在它濒死的痛楚中它的眼睛看起来就象我母亲现在那双眼睛一样。

“到这里来！”我父亲对我母亲嚷。

但是她仍然把手臂抱住海伦站着不动。

“你到这里来！要不，我就把这该死的屋子里的家具一齐打烂！”

我母亲仍旧冷冰冰地站着，一声不响，目光炯炯。我父亲嘴里嘟哝了一声从后门冲了出去，我们听见他在黑暗中摸索，

不知在找寻什么东西。海伦带着悲愤交集的音调，急促地说：

“我一个人走，爱丽。我现在就走。约翰会把你的东西一齐打烂的……说不定他还会来杀你。”

“要走让他走……你不要走。”

“他不会走的……他会先把我们杀了。”

“那么让他把东西一齐都打烂罢。横竖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

“不要这样，爱丽。我走好了。我会给你寄钱、给孩子寄东西来的。不！你留在这儿。让我一个人走。我要你留在这儿，可怜可怜孩子们罢！没有你，他们怎么办呢！等我挣的钱够维持我们大家的生活，那时候再说……好好等着！”

海伦把我母亲从她身边推开，倒退着走进她和安尼睡觉的房间。安尼也偷偷地跟在她后面走进去，把门锁住。只听见屋里面有窸窸窣窣的声音、急促的脚步声和断断续续的低语。母亲软瘫在地下，面孔贴在地板上，双手抱着头，呼呼地喘着气。后门打开了，父亲手里提着一柄斧头踏进来，朝地板上躺着的母亲看了一眼。他站着侧身细听……卧室门内有匆忙的脚步声在走动。他把斧头放在地板上，等着……等着。

我们听见一扇通外面的门开启和关闭的声音……脚步声先在外面的廊沿上走了两步，然后一步踏在下面硬梆梆的泥土上，接着又走了三步，到了街上。院子里那扇只剩一副绞簧的破门发出一阵凄凉枯朽的尖叫，仿佛有一个鬼魂从那里溜了出去。破窗户上盖的烂布给一阵向峡谷袭来的秋风吹得鼓鼓的。父亲喘吁吁的，一言不发转身走出去，把厨房门使劲地在背后带上。他的脚步声嗒嗒嗒地跨过小沟朝着铁道走去……那铁道

穿过全城离酒店只有几步路。厨房里一片静寂，只有母亲呜咽凄楚的哭泣声；这种声音好象以前一向就有，以后也永远不会消失！

一星期一星期过去，事情终于发生。父亲实践了他一再重复的威胁要离开我们。他知道母亲身体太弱，维持不了一家人的生活。海伦那里一个字的消息都没有。

自从我母亲为着海伦的事反抗了他，而且一天一天表示出她对人生毫无留恋以后，他就变得愈来愈粗暴。晚上从他们锁着的卧室房门后面，常常传出凄惨沉痛的哭声。随处都呈现着一种不稳定的恐怖感。

那一年，我们州里的妇女获得了选举权。我母亲只是把头稍微抬高了一点，依旧不声不响。她并不是一个喜欢多说话的女人。

“你打算怎样选举呢？”我父亲问她。

母亲没有回答。于是就吵起来了。……是父亲一个人在吵。她的手里毕竟有了一件武器。至少她觉得是这样。他威吓她，但是她仍然不回答。选举日的那一天，他威胁地说，假如她再不告诉他，他就要离家出走。母亲毫不理会，径直走出屋门外去了，好象根本没有他这个人似的。那天晚上他用命令的口吻问道：

“你打算不打算告诉我你是怎样选举的？”

“我不打算告诉你！”

第二天早上，母亲站在厨房外的廊子上，父亲坐在门外马车上，手里握着缰绳，准备就要动身。我心里很沉重，很难过。父亲又问了一次，母亲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交叉着双手，并

不回答。他于是便走了。母亲不得不重新振作起孱弱的身体。她算计到人家家里去洗衣裳比把衣裳拿回来洗要强些，因为在别人家里可以喝到一杯咖啡，吃到一顿晚饭；这就可以节省自己家里的饭了。每天早上，她越过柏格托里河走到那条齐整的街道上，街道两边都是精美舒适的住宅，中学校的校舍也耸立在其间。她挨次敲着一家家的后门告诉那些太太们，她最擅长洗熨衣裳。这样她就变成一个正式的洗衣妇了。她每天早上七点钟离家，晚上八点钟才回来。她的工价是一块三角钱一天。是的，她对她们说，她看来很瘦弱，但是她洗的东西却很白净——人们只要让她试一次就知道了、太太们望着她的眼睛和她诚恳的面庞都摇摇头；但是，她们接着又看见了她那双做惯各种粗活、又黑又大、露着一条条筋脉的手。这一下她们才相信了。

那一年整个冬天她都在洗衣服。到了晚上她自己也说“累得象条狗”，但是她从来没有因为累而不跟我们详细讲述她晚饭时吃的食物的种类和质量。人们把晚饭放在一个盘子里送到洗衣房来给她。她有时候也能得到一点肉。她依恋地回忆着，非常感激别人待她这样好，常常自愿为人家格外多洗一些东西或多做半个钟头。唯一苦恼的事是她面部和头部的神经痛，折磨得她实在难以忍受。

安尼仍旧每天到洗衣店去，不肯留在家里帮忙——她是在“做工”。我每天的任务是帮忙把家里收拾干净，再把我的兄弟和碧儿崔丽斯穿戴好准备去上学。然后我们把门锁上，蹒跚地踏着雪走去。

我母亲有时候也在家里洗衣裳。天刚一亮她就动手，厨房

里水气弥漫，到处是肥皂沫。到了下午她已经倦容满面，腰酸背痛。我把衣裳拧干晾起来，再从门外水龙那里提几桶水回来。她和我现在成了朋友和同志，我们一边洗着，一边算计着要买一部洗衣机。我们的定价是三角钱一打，连洗带熨，那些太太总把顶大件的东西送来给我们洗——被单、台布、工作服、衬衫等等。她们还时常把十三件当作一打算。十三是个不吉利的数字，但是对于洗衣妇却据说是很吉利的——至少她们都是这样想。

我们的屋里到处都是一堆堆热气腾腾的被单、内衣和衬衫，要想从这间房间走到那间房间去，就不得不在地板上爬行。除了一间卧室，其他的房间里都拉着一行行的绳子，只有厨房的灶眼里生着一炉火。碧儿崔丽斯和我每天一面搓着手取暖，一面沿着铁路拾取机车经过时落下来的煤块，天黑之后，我们又到附近一个木料场上去偷木柴，拿得动多少就偷多少。晚上，我和母亲一同烧晚饭，总是马铃薯和一盘用面粉加水或者加牛奶调成的羹汤。我们仍旧养着那头母牛，不过牛奶都是拿出去卖钱的。我们围在厨桌旁默默地吃，空气里弥漫着肥皂水的臭气。我们从来没有放弃我们的梦想，希望能买一部洗衣机来减轻我母亲的背痛。但是我们总还要买鞋子买教科书，无论如何也存不下钱来，因此我们决定我还是出去做工，她就只好一个人洗衣服了。

我在一家小小的雪茄烟厂里找到了工作，厂主是一个矮小个儿黑脸的犹太人。我放学后就一直去工厂，工作到晚上八点钟才回家。我和另外三四个女孩子一同坐在一间暗洞洞的屋里，细心地剥掉那些又大又嫩的棕黄色的烟叶中间的筋脉。我

们把这些剥好的烟叶堆在一边，送到隔壁一间屋子里去，一群男工坐在这房间里的一张长桌子前面，将烟叶卷成雪茄烟。他们的屋子又豁亮又干净，我们的屋子却到处是烟草屑。男工们可以高声说笑，我们却不许。五点钟的时候，铃声一响，他们都马上站起来，扯下身上的围裙回家去。星期六下午，他们只工作到一点钟。我听说他们都是工会会员，所以才敢这样。我们的厂主很照顾他们，但是并不照顾坐在后面屋子里的我们。我不懂，他们都是身强力壮的人，不需要照顾，反而受到照顾；而我们这些需要照顾的，反而受不到照顾。基督教也是这样，富有的人反而要给他一些；没有的人，反而要从他那里拿走一些。这种报复性的宗教和社会多么奇怪啊！

卷雪茄烟的男工当中有一个年纪很轻的长得出奇的漂亮。我一面剥着烟叶，一面盯着外屋里阳光下他那棕黄色的头发……我梦想他有一天会看见我坐在这里，象童话里的皇子一样来向我求婚！我在心中描绘着自己坐在他身旁卷纸烟的情景。有一天，我故意把一个装满剥过的烟叶的箱子挡在路上。他出门的时候，不得不停一停脚；他倒是看见了我！他问我发了什么疯把东西挡住别人的路！

我对着烟叶子掉眼泪。八点钟好象再也不会来到。这个地方找不到爱情。……看来我不过是块木头。厂主一再走到我这里，责备我工作太慢。

“你总是发楞，”他起初很和蔼地说，“你必须醒过来，快一点剥；看——要象这样。”当他坐在我旁边温和地对我说话的时候，我就剥得很快；他一走开，房里又变得又黑又冷，飞满了烟屑。

“你晚上回到家里，做些什么事呀？”有一次他在我身边坐下来问道。我以为他关心我，微微笑了一笑。他来到我面前使我感到温暖和亲切！

“我看图书馆借来的书。”

“什么书呀？”

“各种各样的书。”

“你不应该看书；这就是你所以不做工而发楞的缘故了。我警告你，玛丽……假如你不好好工作，我要开除你了。”

我觉得又是惭愧又是痛苦。那天晚上我哭了，我把毯子塞在嘴里，免得被人听见。他们会嘲笑我的——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人们不应该让自己的热情或痛苦流露出来，除了弱者和妇女。

有一天，厂主把一星期的工钱——一块半钱付给我，对我说道：

“你不必再到这里来了。”

我一言不发走了出来，走到铁道外边那个木料场的时候，我停住脚站在两堆木料中间轻轻地哭起来。回到家里以后，我又去站在洗衣盆边的老位子上，母亲迷迷糊糊的，仿佛顾不上来注意我为什么会回来。她现在感觉非常迟钝。在学校里，我感到说不出的难过，我变成了班上最糟糕的学生之一。我回答问题的时候，自信答得很正确，先生却认为我答得完全不对，这种情形屡屡发生。在操场上，我和那些铁道外边的“野女孩”混在一块，听她们谈论在家里举行的接吻会，或者躲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彼此交换一些有关人生之谜的密语。晚上我有时候也能去参加她们那个一切游戏都以接吻为奖惩的聚会。

于是我成了“铁道外边的野孩子”的一个头儿。在学校里谁也不敢得罪我——教员不敢申斥我，也没有人敢怒目看我或者对我冷言冷语的讽刺。赌咒对于我向来是件很自然很容易的事，因为我父亲是个很好的教师。他甚至把一个字拆开来插进一句赌咒的话：他惯常说“这个想——该死的——法！”我在铁道外边的胡同里和孩子们打架，有男孩也有女孩，我的弟弟们在我羽翼保护之下洋洋得意地蹦来蹦去。

每逢母亲叫我到商店里去买一团线、一包盐或一块肥皂的时候，我就尽量利用这个机会。店员一转过身去取东西，我就使出敏捷的手法，窃取我家里所需要的东西，藏在袋里或大衣底下。有时候是一盒通心面，有时候是一罐豌豆，随便什么时候，只要有水果近在手边，我都拿。待到店员回过头来，我的面上总是很天真很镇静。铁道外边许多男孩和女孩都偷窃，我可说是这些小偷里面最成功的一个。说不定我生来就比他们狡黠……我故意到城镇去买肥皂。到那些大店家去买东西的，都是住在我母亲去洗衣服的那些大房子里的有钱人，因此不会有人来怀疑你。我背着毫无戒心的店员，把身上装得满满的。我对于任何东西，都从一种有无偷窃可能的角度上来观察；怎样偷，怎样带出店门，到家里又怎样说。我现在很少空手回家。起初我还对母亲撒谎，说是别人送给我的东西，或者说是拾来的。

我母亲现在非常糊涂，她虽然也骂我，但是却带着一种勉强而姑息的神气。我从她嘴角上的表情中看出她也很高兴得到这些食品；因为冬天很冷，我们又都挨着饿。自从我明白了这种情形以后，我就变得更加胆大，偷的东西也愈加多起来了，我

从学校里一出来就直接跑到市镇上，这里拿一罐豌豆，那里拿一瓶炼乳，再到别的地方拿一些蜂蜜。只有鸡蛋我不拿，因为万一被人发觉，需要奔跑。有时候我拿回来的东西，比我母亲买回来的东西还要多。我们吃的丰富了，除了土豆和面粉与水调的汤以外，现在有各种罐头和真正的黄油以及一切能够藏在大衣袋里或者夹在袖管里带走的東西。只有一件东西是我花钱买的，——那就是母亲的洗衣肥皂；但是买两三块肥皂总要花掉我两三个钟头的工夫，因为我要来来去去从这家铺子穿到那家铺子。

乔治和丹现在有时候能穿到暖和的毛袜子——袜子也是能够藏在大衣袋里带走的。冬天快要过去以前，我在一家正在举行大减价的店铺里找到了工作，因此能够供给他们很多衣裳。这家店铺给我的薪水非常少，我却工作得像一个奴隶一样。有一次我给弟弟们带回了几件温暖的法兰绒衬衫，母亲严厉地看了我一眼。我说这都是我用工钱买来的。她听了也就不再多说。她没有工夫、也从来不想到市镇上去追究我所说的是不是真话。即使她去了，人家也只会告诉她说我是那个减价的铺子里一个服从而又可靠的店员。

三

春天给山林带来了希望，紫黑色的远山不知不觉变成了浅浅的灰绿色。但是对于我们这些铁道外边的人们，春天只是带来了挫折。

冬天里，父亲曾两三次赶着车来到我家厨房门前，坐在车上问母亲是不是打算告诉他她怎样选举的。母亲站在那儿，满是肥皂泡的胳膊和手上冒着热气，回答道：“我没有甚么要说。”说这话的时候，她挺起胸脯，眉宇之间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我不由自主走到她身边，把头微微昂起。每一回我都觉得父亲会举起鞭子朝她的脸上抽过来。不知为什么我总感到，要不是我站在母亲旁边，他一定会打下来的。有一回，她用很镇静的声调告诉他说，她“在考虑离婚”。这一下把他激怒了。

“要和自己的丈夫离婚——一个结了婚的体面妇人居然说出这样漂亮的话来。”

“我晓得你跟路得志的那个女厨子住在一块，你不用再来说什么！”她回答道。

“该死！这真是无风三尺浪！”他大声咒骂。我母亲回身走进厨房，把门紧紧地关牢。

春天到了。铁道外边的青年都转着一些迷惘的荡漾不定的心事；月明如镜的夜晚，他们满怀心事地在河岸上徘徊，有的三五成群站成一堆，有的聚坐在矮树丛中，夜幕里传出柔和的笑语，低微的声音扰扰攘攘，和风拂过青春的面颊和颈项。但是母亲从来没有放下过她的洗濯，晚上，她走进又小又暗的卧室，筋疲力竭地倒在床上。春天生活更加困难了，因为许多在冬天几个月里把衣裳拿出来给人家洗的太太，现在都可以在家里自己洗了。我母亲把价钱减低到一块钱一打，另外还免费多洗一件小东西，最后更减到九角钱。

“请你洗衣不合算了，罗泽士嫂嫂，现在我们只要随便请人帮点忙就可以在家里自己洗了。”有的太太对她这样说。我母亲的脸上瘦得不像人样，她自己说她的脊背“简直撑不住了”。她的牙齿痛得很厉害，不得不一个个拔掉。这是最便宜的办法，她有一边牙床上现在只剩下一个牙齿了。

一天早上，她想在床上“多躺一会儿”，我便没有去上学，留在家动手洗衣服。她隔不多久就起来了，但是脑袋又痛又昏，不得不再回到床上去。她一连病了好几日。医生是替有钱人服务的，我们谁也没有想过要请什么医生。我们总是等待病痛自己过去。那几天里，我从早到晚烘砖头，拿去垫在她背后和头旁边。每天我要煮一大锅马铃薯，再拿面粉调一盆汤，给大家当饭吃。

父亲又一次赶着车来到我们厨房门前。这一回他没有再走。以后，当他再在我母亲面前提起妇女选举权的时候，母亲总只是把眼睛前前后后顺着地板缝瞅，默默不发一言。她的沉默里带有深沉的苦痛。

我母亲的健康好转了，我们即将离开这个城市到德拉圭矿区去，父亲在那里跟人订了运煤和采矿的合同。母亲可以给人管理膳宿，我可以料理开饭。孩子们又都不上学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们挨饿已经挨够了。安尼不同我们一道去。春天已经挑动了她。她虽然还只十六岁，却快要出嫁了。

当安尼向大家宣布她的打算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模糊的厌恶的感觉。她不是我的朋友，她又肥又自私。我望着她，脑子里浮起各种各样的回忆；这些回忆都是丑恶的！有一次半夜里，她把身体挤着我，把我惊醒了；另一次是当我听从那些复兴会教士的劝告信奉了基督教做起祷告来的时候；一天晚上，别人都熟睡了，我从床上爬起来，跪在地下，向我敬畏的上帝祈祷，求他饶恕我的一切罪过。我正跪在地上等着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安尼突然翻过身来，喊道：

“哎哟，你以为我没有听见吗！我明天就给你宣扬出去。”她可没有宣扬出去，但是一连几个月来她都把这件事作为把柄来威胁我。

现在她快要结婚了。她一谈起这件事就收不住口。环绕着她的结婚有一个神秘的谜，这个谜几乎完全盖过了我对于她的厌恶。和她订婚的是家乡的一个男人，就是海伦以前在那里做女佣每月赚六块钱的人家的长子；当初他是海伦的未婚夫，他

给海伦一连写了许多封信，始终没有得到回音，于是便亲自跑来找她。

母亲把我赶到屋外去。当我后来回到屋里的时候，母亲的衣兜里摆满了海伦的信。山姆哭得泪流满面，母亲尽力在安慰他；后来他就走了——据母亲说是去找海伦去了。过了两个月，他又回来了——仍旧是一个人；又过了不到一个月，他就和安尼订了婚，这件事使安尼更加趾高气扬。

他们的婚礼是在我们全家出发到德拉圭去的前几天举行的。山姆在结婚仪式完毕之后，跑来和我母亲握手，说他会始终做安尼的一个好丈夫。这似乎是两个伤心人之间的一种信誓，此后多年，山姆一直坚守着他对我母亲的信誓。也许我们对于一个自己并不爱的人的过错，是比较容易原谅的，而对于一个自己寄托着人生最高尚最美好的期望的人，却很难原谅他的过错。海伦如果有了同样的过错，他不见得能原谅她。

海伦离开山姆，度过了痛苦的十年以后，我又见到了她。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两人与我姊姊之间的谜依然使我困惑不解。

“我不能嫁给他，”接着，她急急忙忙地说了一大串，不让我再问下去，“自然，我是了解他的——你以为我是个瞎子吗？我为什么不嫁给他呢？我究竟为什么要嫁给他呢？……这都跟你毫不相干……也许最初还好，但是等到一个女人结了婚，自己不能谋生的时候，男人就要开始追究她的过去了。”

我还逼着追问，要想解开这个谜。她一面否认一面又承认。

“自然，这就是我所以不愿和他结婚的缘故。最初是汤尼，

后来他又带来了别人，……我不能生孩子了。……你真腻死人了，玛丽！……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不能再生孩子，因为我已经动过两次手术，……我每年都要到温泉去养病。天呀，这一来，你满意了吧！”

当时，我还有点茫然，我以为温泉是有钱人避暑的地方。那时候海伦也的确打扮得象阔太太一样。后来我才明白她为什么要到温泉去，她在那里养的是什麼病。我很惭愧，我居然知道这么多了……假如常常用酸素去灌溉一株柔嫩的树苗的话，这树苗一定不可能长得挺拔秀丽的。

山姆和安尼在俄克拉荷马州西部安了家，盖了一所房子，开垦那一望无际寂寞荒凉的土地。安尼是一块能够捏成贤妻的材料，一头没有思想的牲口；她也许会跟丈夫狠狠地闹一场，但临了还是屈服在威权之下。这种女人随丈夫过上一辈子，到死也不会为什麼思想和原则而操心。她十分没有头脑，思想和原则，跟她毫无关系。山姆让她离开了自己的女朋友，离开了市街和舞场，离开了她打扮得和别的姑娘一般花枝招展地，去参加的热闹的舞会。他给她穿上宽大的洋布衫，让她光足走路，把头发卷成一个小髻垂在脑后，变成了一个垦荒的妇女。她在这种生活下忍受了两年，于是随着早先所有的垦荒妇女一起沉默了。她临死的时候还表示很遗憾，因为我仿佛一直在恨她。我母亲把安尼的话对我说了又说，用眼睛恳切地看着我，想在我脸上找出一丝柔情的微光。可是她没有能找到。我是一头倔强的野兽，我的心里深藏着创伤和愤懑。对也罢，错也罢，事实是这样，就是这样。我在生命的道路上没有学到柔情。

我的姊姊就这样去到了黑暗的世界。而我仍然留在所谓光明的世界里。

山姆和安尼离开特立尼达建立他们自己的家业去的时候，我们仍旧留在城里，等待科罗拉多燃料与冶铁公司矿区里早期的一次罢工的结果。州政府的武装在特立尼达市镇上驻扎了三个星期，“维持治安”。他们的营房在我家门前柏格托里河对岸的山坡上，这些兵士酗酒肇事，动不动就开枪，流弹横飞，使河岸这边的母亲们人人担惊受怕。孩子们只得在后院里玩耍。太阳一下山，父亲就开始盼望自己的女儿。若是谁家的女孩在洗衣店里做工——而铁道外边的人家很多都有女孩子在那里工作——就得有人去接她回来。有一次一个父亲发现自己的女儿在铁道旁和兵士谈话，回来把她打了个半死。这消息象野火一样地传开了！据说那士兵还格格地笑，大模大样走开去——他身上穿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军服，没有一个父亲敢碰他一下。又过了几天，离我们两家远的一个人没有去接他的女儿，女儿没有按时回来，他只好自己出去找。他找到木料场上，看见两个兵士拖着她躲藏在木料堆中。其中一个兵士站在那儿望风，看见他跑来，就喊住另一个兵士，两人一块儿逃走了，这父亲虽然大嚷大叫，却没能把他们捉住。木料场的地点原很偏僻，但是即便有人听见了，也不敢上来碰一碰穿“美利坚合众国军服的人”！

消息在铁道外边传播起来就跟刮风一样的迅速。这女孩跟她父亲在街上还没有走过十来家人家，男男女女就都涌到门口，一群群站着看。这两个人一声不响地走着，低着头，不敢抬眼

看人，女孩的上衣撕破了，眼睛哭得又红又肿。她父亲垂头丧气地往前走，恨得把手指乱抓，然后又紧紧地捏成一个拳头。如果这时候有谁杀了一个兵士，要从铁道外的人里面挑选陪审员的话，没有一个做父亲的会因此被判罪，也没有一个男人或女人肯出庭作证去控告他。最后“治安”终于正常了，矿工们被迫回到矿井里去，这些穿蓝制服的法律保护人也撤走了，铁道外边的居民才松了一口气。

我们到达德拉圭煤矿镇的时候，那里的空气还弥漫着敌意。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矿区，座落在三四个峡谷交接的地方，乱石丛生，寸草不长。峡谷里到处是黑洞洞的矿口，塞满了一堆堆层层叠叠的矿渣。一排矿工住的屋子后面，有一长排矮矮的炼焦炉，在夜间喷出暗暗的红光。纵横交错的窄轨道把这块地方和矿井连接在一起。

这些煤矿以及周围好几英里的地方都是公司的产业，我们住的房子是向公司租来的——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房子。我们买食品衣物的唯一的商店是公司开的——没有别的商店能在这儿开业。公司定的价钱比外面高，我们必须照价付钱，否则就什么也别买。学校的校舍也是属于公司的，教员是公司的职员选聘的。酒店是工人们聚会和花钱的地方，这也是由公司租给一个“合格可靠”的经理去经营的。每月到市镇上来一趟的牧师，只宣讲上帝和天堂，从来不谈人间。到市镇去的火车路也是公司的。这万能的势力还发行自己的货币——工券——矿工和其他工人领到的都是这种工券而不是美国政府的纸币；特立尼达的银行兑付这种工券时是要打九折的。老板对工人说：你的工钱是两块钱一天，但是只能拿到工券。如果他嫌公司商店里的食

品价钱贵，人家便会告诉他说：这是必须如此的，因为他拿去买东西的是工券，而工券在城里是要打折扣的。

在这几排弯弯曲曲的两间或三间房间一座的矿工住宅前面站着一簇簇肩膀挺宽的男人。他们会集在酒店的前廊上和公司商店的门前；说着各种不同的语言——无论是波兰语，捷克斯洛伐克语，还是德意志语里面，全都夹杂着一些英语，空气里凝聚着不满和愤恨的气氛，充满了对于管磅秤的工头、对于过长的工时和过低的工钱以及对于矿下危险情形的诅咒。我听说这些矿工都在很深的漆黑的地道中工作。他们把掘出来的煤装在拖车里让骡子拖到矿口，在那里交给公司的职员过磅。矿工们由于多年的经验能够知道自己挖了多少煤；但是帐上记的总比他们实在挖的要少。每一车扣掉几磅，星期六晚上他们领到的工资袋里便要缺一大块。现在正是月尾，罢工已经失败；他们欠公司商店的帐数目大得惊人。他们欠的帐常常比他们赚的工钱还要多，店里的人讨起帐来太狠心——常常随便加上一条他们并没有买过的毯子，或者各种他们看都没有看见过的东西。然后告诉他们，这些都是他们买过的，必须付钱；不然，他们就不能再欠帐。他们不得不还清这些冤枉帐，不然就要失业。

市镇上的官员称他们是“愚昧下贱的外国佬”，其他的人听见他们说一种自己不懂的语言的时候，把他们叫做“危险的顾客”。因为对于美国人说来，凡是他们所不懂的东西，都是危险的。

“付钱或者滚蛋！”这是公司商店的守则。矿工们只得把钱付了。离开这个市镇是需要钱的。到别处去吗？也会遇到同

样的情形；如果他们真的离开这里到别的市镇上去，他们会发现自己的名字上了黑名单，找不到工作。他们的手和脚都被束缚住了。四面八方都是这个公司的市镇和土地，北面的市镇虽然属于别的公司，情形也没有两样。

我心神不安地走在那条曲曲折折龌龊不堪的街道上，偷眼观看矿工们的住家。四壁光光的小房子里，摆着一张桌子、一两把椅子、几口烹釜和平底锅——还有件把乐器，有时候还有几本书。黄昏时候，他们常常坐在家门口，弹着那种凄楚悱恻的民间曲调，当我走过去的时候，他们用外国话很客气地招呼我；因为我不是那些官员的家眷，虽然我们一家也是土著的美国人。也有的时候矿里死了人，人们抬着死者的尸体走在大街上，威胁着要进行暴动，这时候，女人们都不敢上街去。人们用木板抬着那些伤者或死者从我家门前经过，在他们后面，聚集了一大群人。我一再听说：矿里的支柱不够；矿工额上的矿灯引起了煤气爆炸。

当一个人拿着铲子和铁镐走进黑洞洞的矿井去的时候，无论他自己或他的家人都拿不准他是死了出来呢，还是活着出来。美国土著工人都怕下矿井。当我父亲说母亲待他不好，要用死来恐吓她的时候，他就说要去当矿工。他并且让我们大家知道如果我母亲以沉默来回答，只会更把他逼到矿里去。这样，我也渐渐害怕起矿井来了，所有的美国工人都怕有一天自己会沦落到这样悲惨的境地，不得不戴上一顶帽子，额上挂上一盏矿灯，坐到那把矿工们拖进黑暗去的车子里。

父亲手下的工人都是美国人，因为他的工作是在地面上的。他现在拥有八套到十套车马。他这些财产是怎样得来的，

对我们是一个谜。他雇了二十个工人做着爆炸和剷土的工作，为公司作建筑新房屋的准备。吃饭的时候他们一窝蜂地拥进我们家里，母亲和我一天到晚忙得没有片刻休息的功夫。上一顿的碗碟刚洗干净，又要开始准备第二顿饭。我母亲现在又感到满怀希望，漫无节制地使用她孱弱的体力。她的年龄不算很大，可是身体和精神都已经衰老，牙齿几乎掉光了。在她的青春没有消逝以前，她多半也曾经希望自己能过得舒适一点，可是她现在却为我做着各种的梦——我应当去学钢琴；我不是曾经学着玩我的手所能碰到的每一种乐器吗？钢琴对于她就是“教育”，她要我得到这种教育。她怂恿我去求父亲给买一架钢琴；她说，他有钱，因为他给马买了非常漂亮的鞍子，还买了许多外面工作上需要的东西。但是当我去求父亲的时候，他只是笑我痴心妄想。他不但不答应，反而派给我一个他所谓的“任务”。他现在在赚钱，所以要开始“记帐”。他要留神这回不能再让别人“像那娼妇的儿子窦纳一样”来欺骗他。……他要把一切全都写在帐簿上，一旦发生任何争论，他就可以把“数字”指给他们看。按他平日对于教育那样蔑视，现在竟然这样相信“数字”和“帐簿”，不能不叫人惊讶。有一天，他带了一本总帐簿和一册流水帐簿回来，放在我面前的一张厨桌上。

“你是受过教育的，现在请你把帐簿打开来！”他命令道。

我膘了他一眼，走过去把帐簿打开来放在他面前。

他冷言冷语地又说道：“你读到八年级了，可是你爸爸比你知道的恐怕还要多些哩，叫你打开帐簿，就是叫你在上面写字！坐在这儿，把那支铅笔拿起来。”

他一笔一笔地念，我在帐簿的一边记下了长长的一排数字。

“现在，把这些数目加起来！”

我加了又加……但是每一次都得出一个不同的总数。他站在那里微笑着低头看我……我是受过教育的，可是连加法都做不对！为了进一步羞辱我，他竟自己拿起帐簿和铅笔来开始计算。他得出了另一个不同的总数；他又加第二次，蠕动着嘴唇念念有词，一面在纸上画着点子——但结果又得出一个不同的总数！他很不高兴我这样站在一边旁观，但是他为要保持自己的体面，不敢叫我走开；我为着保持我的体面，我也就不走。

“爱丽，”他向厨房里喊道，“到这里来，把这笔帐加一加。你看看你这个上学上到八年级的女儿，连一笔数目都加不对。”他现在把我叫着“她的”女儿！可是每逢我做了什么使他高兴的事情，他总是叫我“老爸爸的女儿”。

这一下，可轮到母亲得意的时候了！她赶快把手在围裙上揩干坐下来。她一面加，一面大声念，使我们都能够听清：“二加五是七，七加八是十五，十五加八是二十三，二十三加九是三十二。”最后得到了一个总数。我父亲微微弯着身子站在她身旁，睁大眼睛听着，目光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充满了无限的敬慕和信任。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精神生活便操纵在我母亲的手里了。我在别人的眼睛里也曾见过同样的神情——我的弟弟乔治常常这样看我；爱着我并且也为我所爱的那个人也常用这样的眼光望着我，于是我便知道“他心目中总以为我是错不了的。”这是一种可怕的神情；因为它说明不论这个人自己愿意不愿意，他都失去了自己的个性，湮没在别人的个性里面了。

我母亲把这一行数目算清楚以后，她就站起身来望着我父亲。父亲显得很谦恭。

“我希望你每天晚上都来帮我记帐，爱丽。我要这样做，假如再有窠纳那种狗家伙来捣麻烦，我就可以把数字拿出来给他看。”

从此以后，每天晚天他们两个人都坐在桌子旁边，父亲报着各种项目和数字，母亲写着。他总是从衣袋里取出一个小本子，里面写着一排排拙劣的除了他自己没有别人认得的数字。这是他的日用开支和他的估计——他用“估计”这个词，说的時候朝我看了一眼，却没有解释这个字的意思。他这种估计是如何得来的，这个秘密只有天晓得。他要跟人订立工作合同之前，常常盯着地上的一方土，盘算着，嘴里喃喃地念叨着，抓抓耳朵，在本子上胡乱涂上几笔。然后他就走到公司驻在镇上的职员那里，把他承包这个工程的价钱提出来跟其他承包人竞争。别人有的用打字的信件提出申请，我父亲却穿着衬衫跟高统靴，用口头提出申请。他很瞧不起那些离开纸张和打字机就不能办事的人。他承包的多半是挖土方的工程或者铺建士敏土和石板的地基，工人、车马和工具都要自备。他提出一个整数分两期付清，一期在开工的时候，另一期在完工的时候。

公司的职员上下打量着这个站在一边没有穿上衣，索价比其他承包者便宜的人。末了，他们常常把工程包给他做。这很可能是由于他的个性以及他说话的姿态博得了他们的信任，他有他的一套方法，他的言词和态度都很能打动人。他只会写几个字，在他的一生中我从没有看见他拿起一册印刷品来读过一行。书里没有他的世界，他的世界在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一切里

面。书籍对他没有什么帮助；但是，即便是地面上一个小洞，在他看来也充满了各种美景。他的眼光不仰望天空里的星星，只俯视大地，他属于大地，大地也属于他。他在大地上挖掘，拥抱着大地，他的脑子中只有大地。

我常常站在地沟的边沿上透过蓬蓬的灰尘看他。他什么也听不见，专心致志地工作；即使我走到他面前，他也不会看见我。他的心思正在广大的范围内翱翔——我知道在他脑海的深处，他的思维横扫过生活四周的地平线，飞向远方，……他不是在地上挖一个洞而已，他是在发掘神奇瑰丽的东西，一切深藏在大地里的东西。这我知道，因为我了解他，我是他的女儿。

他是一个瘦长的牧人，二十八岁。他为了有机会到外面来见见世面，因而离开了自己在新墨西哥州的牧场到我父亲手下作工。他跟别的许多替父亲做工的人一样，不愿意老呆在一个地方或做同一种工作，因而常常迁居。他们这些人照例都随身带着自己在这世界上所有的全部家业：一两支枪、一条漂亮的腰带、一对讲究的带着踢马刺的皮靴，也许再加上一条非常好的帽带、一支墨西哥式短柄长皮索的马鞭和一副手套。他们几乎都有一匹马和一副异乎寻常的马鞍，有时还配上一副马勒和缰轡，这些都表示他们是有特别风趣的人。他们都来自分水岭那边的牧场上。他们都是沉默寡言、禀性倔强、贪酒好色的人。勇敢仁慈，信实可靠——可是出言猥亵。他们领到工钱的时候，就连夜去到特立尼达，在那妇女出卖自己来满足男人的欲望的“山上”花个一干二净。他们若是娶妻——那真是稀有的

——他们只娶处女。妇女没有别的东西，只有拿贞节去换取一生的食住。父亲们保护女儿的贞节，如同人们保护银行存款一样；腰里系一支枪，眼睛里闪着警戒的光芒。现在我渐渐长大了，我父亲警告所有的人不准和我随随便便。

然而我跟所有这些人都是朋友。我崇敬他们，羡慕他们。他们中间许多人跟我们在一起住了好多年，可是到末了我对他们的私生活的了解，一点也不比他们当初来的时候多。他们彼此之间可能也并不了解。凡是能使人的感情起波动的事件，他们从来不提。他们到底有没有母亲姊妹，这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曾否恋爱过，那是锁在他们自己心坎里的一个秘密。倘若高山的肃穆和满天繁星的静夜使他们感到寂寞，使他们面对着无穷的宇宙感到灵魂的渺小，这个秘密他们也从来不告诉别人。

这个替我父亲做工的瘦长的牧人，正是这些人里面的一个。他的名字叫吉姆，跟别的人一样，他也没有说出自己的姓。但是有一天，他却向父亲说他的姓叫华生。这就是表示有意更亲近一点，其他的人都彼此递眼色。吃饭时总坐在桌子一头的大个子柏克看了看吉姆又看了看我，他那双向来调皮的眼睛里闪烁着会心的欣喜。

“请把油炸面团递给‘华生先生’，玛丽，”大个子柏克说，引得全桌的人都笑得喘不过气来。在西部，即使在那些年代里，妇女也还是很稀少，要想娶一个妻子简直很不容易。吉姆·华生有一个牧场，牧场不能没有女人。而我就是一个女人。

吉姆紧接着送了我一副金项链，这项链如果戴得太久，脖

子上就会发黑；他跟我骑着马一块儿去参加跳舞会，我暗中把项链取下，放在衣袋里，等到了跳舞场的时候，才又戴起来。大个子柏克的年龄几乎比我大二倍，身材也有我三个大，他常常在一旁暗自发笑。有一天他送我一支自动手枪——并且说不定那天会有用。他不是那种送给人家小巧的项链一类东西的人。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借了大个子柏克的小马骑到峡谷里去捉松鼠。吉姆喊住我，要同我一道去。大个子柏克伏在篱笆后面，用手臂托着面孔，轻轻地笑。吉姆很打扮了一番，穿着一件白衬衫，腰间系了一条镶银的宽腰带，灰色的大帽子上配了一条和腰带一样漂亮的帽边。他并不英俊，但是很文雅，而且并不是人人都穿得起白衬衫的。他懒洋洋的骑在马上让马儿信步奔跑，好像随便它怎么样走，往哪一条路上走去，他都不在意。我们穿过一片遍地生着黄金花的山谷，白杨和青松临风摇曳。吉姆把一条长长的腿跷起来搁在鞍头上，向我讲述他在新墨西哥州的牧场，一边卷着纸烟。

“你觉得怎么样？”他最后问我。

“听起来好极了。”

“你觉得跟我结婚怎么样……那么这些东西也就是你的了；我现在骑着的这匹马也是你的，我还可以给你一支0.45口径的手枪，把你现在挂在腰上的那个小玩具换了。”

哎哟！这就算是求婚呀！自然这跟书本上不一样，但的确是求婚呀。结婚……那是奇怪而遥远的事情；但是订婚呢……一支手枪……一匹自己的小马……一个牧场！

吉姆还在问：“喂，你对于结婚有什么说的吗？”

“好的！”我回答说。

“当真吗？”

“好的！”

他决定要——照他的说法——“当场把这项买卖敲定”。

“现在，这匹小马就归你了，待会儿一到镇上，我就给你买一支合式的0.45口径的手枪、一副手套和一根马鞭。你就可以把柏克送你的那支枪退还给他了。

“我才不还给他哩！这支枪有什么不好？”

“因为这支枪是别的男人给你的，而现在你要和我结婚了……”

“你真是自说傻话！这支枪有什么不好啊！”

他感到自己处境不妙，于是笑了一笑。

“我刚才只是开玩笑，”他说，“试试你，看你会怎么办！我再送你一支枪，你就有两支了……你瞧，不是每个女孩都有两支枪呀。”

我只说了一声“谢谢你”，没有说别的话，眼睛望着下面峡谷里渐渐暗下来的一片黄黄绿绿的大地。可惜这样订婚一点都不动人，不像书上所讲的。

“你不和我亲个嘴吗？”吉姆把他的马靠近我的马，低声说。

我仍旧看着下面的峡谷。只要望他一眼就会把事情完全弄糟。他看来未免太老了，还留了满嘴胡鬚……书中的英雄不是这样的。他紧紧挨着我，从马鞍上把身子凑过来。他的嘴唇碰在我的嘴唇上，我勉强不去注意那股子烟草味和汗臭……也许跟男人在一起，就得干这种勾当……要是对方是个真心爱我的人，也许不致这样恶劣。这种念头一直滞留在我的血管里，

犹如一个钩子挂在流水里的树桩上。

我们骑马往回走。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结婚和一般人的结婚会是一样，……庸俗的结婚想起来都叫人噁心。我们到家以后，吉姆就走进厨房去，我马上担起心来……他一定会拚命吹牛……这个长手长脚的蠢货……他就不能把脸往哪儿藏一藏吗？

我正在布置晚餐桌子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出现在门口，“玛丽！”我父亲说，我又羞又怕，恨不得一下钻到地里去。“玛丽，”他又喊一声，“吉姆告诉我们说，你答应跟他结婚……你年纪太轻，结婚还太早吧？”

“是还太早，玛丽，”这话是我母亲说的，她愁眉苦脸地站着，双手握在胸前。

“我快十五岁了，安尼是十六岁结婚的。”

“那也太早……而且安尼还比你长得像大人。你到十八岁才算成年哩。而且，”他有点难为情，嗯嗯唧唧地接着说下去，“并且你不知道结婚以后还有许多问题……还有责任啊……”

“责任！”我气呼呼地惊叫。“我不愿意担负什么责任，”我看了一看站在那里的父亲和母亲，羞愧和懊恨像一阵浪潮一样向我扑过来。“该死的责任！”我涨红了脸，“该死的责任！该死的责任！这些事真无聊，这些事使我噁心！……该死的——！”我痛恨一切……痛恨站在那里的两个人……也恨那长脚、瘦脸、长胡鬚的笨驴吉姆·华生！我转身从屋里逃了出去。

那天晚上我没有照料晚餐。不但如此，我还找出吉姆送给

我的金项链，把碧儿崔丽斯唤来，叫她替我还给他，并且嘱咐她：

“告诉他说，我不要他的什么枪和马！”

吉姆第二天就离开了这市镇。人们都站在篱笆前面，微笑地看他走过。

我们又回来住在特立尼达的铁道外边。母亲很难过。她说，这一年又是白费。我们赚来的钱全赔光了，只剩下两匹马。我们家里争吵的声音终日不断。但是她再也不肯离开这个市镇了。

“难道再叫孩子们离开这个规规矩矩的学校吗？当我父亲要她再跟他到别的矿区去替他的工人烧饭时，她这样责问我父亲。

一天，后院里又传出了争吵的声音。我赶快跑到厨房门口。母亲站在那儿，双手泡在浸衣裳的桶里，脸上的颜色灰白得和海伦出走那天晚上一样。她仿佛连把手从水里拿出来的气力都没有似的。我父亲站得离她很近，手里拿着一根短短的双股的绳子。他们听见我出来，都抬起头看。

“玛丽，他要拿这根绳子来打我！”母亲奄奄一息地说。

她好像求我帮她去反抗他，我朝父亲看了一眼，他站在那里，肩膀宽宽的，身材比她大一倍，嘴角上淌着烟草汁。他要想打老婆……不久以前，他谈起那些打老婆的人时曾经表示很钦佩。可是他虽然心里想打，却还没有真动手。他下不了手，他非得先罚咒、先骂人才能把火气煽起来。当我站得稳稳地注视他的时候，我觉得我完全清楚他做过什么事情以及他还要做什么事情——他和我彼此都很清楚对方的心思。我恨极了他。——恨他居然无耻到欺侮一个比自己弱小的人，……恨他居然想

打一个女人，只因为这女人是他的妻子而法律给予了他打妻子的权利……我真恨他，我恨极了他，恨不得杀了他……我为什么没有从箱子里把手枪拿出来呢！

我母亲仍然盯着我看。

“玛丽……他要是打我，我就活不成了！”

“你敢！……”我向父亲喊。

这时已经来不及去拿手枪了……但是我不要手枪也行！我冲到母亲身边站定，面对着我父亲，把母亲推在我背后。

“你打，只要你敢，你！只要你敢！”

我感到母亲软弱无力的身躯靠在我背上。父亲的眼光炯炯逼人，嘴里喷出一股酒味。我心想他也许要打我了，不禁有些惊惶失措……要是他真动起手来，那我就……对，我就扑上去咬他的喉咙！……

我们两个人站定在那儿怒目相视，在彼此的心目中都成了敌人。最后，抓绳子的手松开了，绳子落下来掉在他的脚边，像蛇一样缩成一团。他一言不发地转过身去，踏着沉重的步子从通小巷的门走了出去。宽大的肩膀已经躬起来了……躬得多么厉害……他的衬衫又破又脏……他顺着铁道踉踉跄跄地走去。天啊，为什么要把我生到世界上来呢！

许久许久，他才消失在转弯的地方，等看不见他了，我这才发现母亲软弱无力地横躺在床上。我站在床边，望着那褪色的蓝粉墙。要我去抚慰她，这是办不到的。或许当我还是一个婴孩的时候，我曾经热情地抚慰过她。但是那是多年以前了，我已经忘记了。现在我不能够。我默默地转过身，回到院子里。等她再走出来的时候，我差不多把东西都洗完了，天也已

经黑下来了。

“你不必来，我就要洗完了……剩下的不多，”当她走近的时候，我分辩道。

我们二人之间终于有了一种联系，这种联系是在患难痛苦中结成的，是永远不会断的。

我认识一个男人……但这不是恋爱。他的名字叫勃伯，是个理发匠，二十一岁。一天晚上，我从家里溜出来到公共跳舞场去，在那里遇见了他，他的举止文雅，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我母亲听我说起他的时候，怯生生地表示不同意，她说他是个两手娇嫩的城里人，白白净净，花言巧语，滑头滑脑。我反驳说：他是个上等人，不像替我父亲做工的那些又粗又笨的工人。她回答说，宁可他是那样的人，因为替我父亲做工的都是勤劳诚实的人，他们肯保护女孩子，不会欺负她。

“保护！”我嚷起来。“我不需要任何人的保护！我能保护自己！”

那天傍晚，我故意出去和勃伯会面，我母亲因为总是受别人呵斥，遇事不敢坚持自己的主张。那天晚上月色很好，勃伯驾着一辆四轮马车停在桥边等我。

在皓月当空的夏夜，溜在一片银白的马路上，是多么的美妙兴奋而又温柔！马儿奔腾疾驰如同急流的河水。勃伯暗中把胳膊抱住我，我浑身感到一种安慰。马儿奔驰前进……走下了一个长长的斜坡，爬上另一个斜坡，再走下一个斜坡……跟着缓缓地绕了个弯走到一座黑洞洞的桥下。勃伯把缰绳一扯，让马儿站住。勃伯的另一个胳膊抱住我，我感觉着他用火热的嘴唇在找我的嘴唇，他的手轻轻地慢慢地摸到我的胸前。我真

愚蠢，怎么会跟他一道出来呢！

“别这样，……请你！”

“我不会伤害你。来吧！”

“滚开，听我说！”我挣扎着摆开他的胳膊。他的嘴唇……是的……银色的月光，我的血液里渗入了某种软弱的因素，使我要屈服了。他的手紧紧抓住我，抽搐着。——于是我想起了我的父亲和母亲、海伦和安尼……还有那个妇人的哀求，“该死的，好人，你知道我是爱你的呀！”这一切回忆！……

我没头没脑地乱抓。他的手很娇嫩，我的手却并不娇嫩。我感到一种本能的恐惧，拚命地挣扎……我的牙齿触到滚烫的肌肉，流出一种暖暖的叫作呕的东西。

“该死的！你——！”我感到他的手搁在我胸口上，一阵扭打，我翻下了马车，赶紧扶着车轮。

我躺在柔软的泥地上，害怕得头昏目眩。勃伯从车里爬出来站在我身旁的马路上。他嘴角上染着殷红的血迹。我们彼此面对面地看着，就像在暗夜里相遇的两头猛兽。

“上来！我可以送你到桥边，一步也不能再往前！”他说。

“我自己走回去！”

“别人看见你会怎么说呢？”

“这不干你的事！我自己走回去！”

“那你就走罢，该死的！我永远不要再看你这丑恶的面孔！”

我开始慢慢地踏着这条凄凉的灰色的道路向市镇走去。现在月亮显得冷酷无情，像冬天刮风时湖上的冰凌一样。孤单痛

苦和眼泪交织成了一片。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寂寞荒凉的地方。我们的小木屋架在峡谷的峭壁上，活像立刻要蹦出去一样，满山满谷尽是白杨、青松和幽雅的紫红色的科罗拉多州的稷斗菜。峡谷上面往西有很多张着口喷出煤气的废煤窑，这里曾经发生过一次爆炸，死了近一百人，煤矿也自燃尽了。从这些矿口再向前走，就是密林深山的原始旷野。夜间野兽吼啸，手臂一般粗的响尾蛇盘在锯齿形的怪石上，有时又直挺挺地躺在向阳的山坡上。

你若是骑马走下峡谷，就要经过那些往日曾经是市镇的空屋子。出峡谷去是一片宽阔平坦的原野——我们把它叫做“平地”——在秋天是一片金黄色，长了一层短短的毛茸茸的野草。东边远远地横着一排低矮的山岭，山外又是别的山峰。西北角上这块平原一直铺到山脚下——这是落矶山的支脉，无论春夏秋冬永远覆盖着闪闪的白雪。人们称这山为耶稣的血。这或许是因为每当太阳落了山、峡谷里和平原上都变成了一片漆黑以后许久，山顶上的雪还像温暖的血一样柔和地闪光。

当月亮照耀着这片静寂苍白的“平地”的时候，我们能够听到成群结队的豺狼在黑暗的峡谷外咆哮呼啸，它们离开了藏身的洞穴，走到平地上来聚会。它们仿佛总是成千上万，每逢空气里回荡着它们尖利刺耳的嗥叫的时候，我们的狗就爬到屋里，躲在墙角里打颤。

你若是骑马穿过这块平原往东南角走去，就要经过一大片土拨鼠的巢穴。这些胖胖的小动物蹲在成千累万个小土堆的尖峰上，俯瞰着下面阳光绚烂的世界。再往前去又是一片连绵不

断的山岗，这些山岗后边就是人的世界：最先出现的，是一个土砖砌的天主教堂，墨西哥人每月在这里聚会一次，一个神父——我父亲称他为于人无害的“搜巡罪恶的老猎狗”，——定期到这里来拯救人们的灵魂。再往前，开着一家酒店——说明洛克菲勒文化就在近处。这是我父亲出峡谷时中途休息的地方。从酒店再过去，邻近科罗拉多燃料与冶铁公司的另一个矿区台奇奥的边界上，有一所学校。

台奇奥的气氛也和德拉圭一样，——正在酝酿着不满和愤恨。这里也同样是对管秤的工头，过长的工时，过低的工钱的抱怨，对于支柱和其他防止坍塌的器材不充分的抱怨，对于公司商店的高昂价格和欺骗行为的抱怨，以及对于发工钱时用工券而不用美国货币的抱怨。矿工们每天早上拖着疲倦的身子走到山坡上的洞口，晚上又拖着涂满了煤渣的疲倦的身子回到家里。他们的孩子——十岁以上的男孩子——就在煤矿周围打些零工，等他们长得够强壮的时候，也就变成煤矿工人。生活对于这些煤矿工人就和我们一样，除了做工、睡觉，就是生儿育女，至于吃什么，在什么时候吃，就要碰各人的运气了。娱乐方面，男人有酒店，女人什么也没有。一本书是一件珍品；我们家里有一本，书名叫“议长”；报纸是罕物；读书是富人们的消遣。矿工的孩子也有少数居然在国民学校毕了业，但大多数都没有。公司里高级职员的孩子都出外去进中学校，后来还进大学哩。

接着发生的一次罢工，包括了公司的各个矿区，那时我们都不敢到台奇奥去。谣言传播得象烧山的野火一样。警官就是这小小的矿区的统治者；他是美国人，腰里系着一支柯尔特式的

0.45口径的手枪，他要叫每一个矿工都知道人家出钱雇他是要他尽职，而他也会的确会尽职的。

“随便给我几文钱，我就能把一个该死的外国佬打得浑身透明窟窿，”他说。他并且随时准备叫他们哪一个“去见耶稣”。

怨恨和饥饿在每一个矿区里都是并肩的旅伴。除了公司的商店以外，别处哪里也没有粮食，而商店又不肯赊账。学校关门了，街上看不见人。州的武装又开来驻扎在特立尼达以及沿峡谷的各个较大的矿区里。破坏罢工的人也成群结队地来了，在军队保护下在矿井上踱来踱去。

经过几个星期艰苦的斗争和饥饿，罢工结束了。絮絮叨叨的妇女和哀号哭泣的儿童，帮着把男人们送回矿上去。罢工失败了。

罢工期间，我母亲从矿区里听到了所有的消息。她不多说话，当着我父亲的面或当他手下的工人在场的时候尤其不多说。我记得她对于矿工有一种本能的、毫不迟疑的同情。她痛恨有钱有势的人们或团体。几年来的经历已经使她从一个贫苦的农家妇女慢慢转变成为一个无产阶级了。但是我父亲的脑子却没有这样清楚。因为他自己是生长在美国的，又希望当老板，所以和这些矿区的警吏职员站在一起来压迫参加罢工的外国工人。他始终很糊涂；他虽然雇人替他做工，自己本身也还是一个没有知识的工人，无论他怎样艰苦地工作，也还是一样穷困。他十分糊涂，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如此，为什么会如此。但是他和我母亲一样，终久慢慢地明白那些工作得最多的并不能挣到最多的钱。看起来像是有钱人的罪过，但是

究竟怎么会这样，他还是不懂。他用酒来排解自己的糊涂和失望；借扑克来消除他的忿怒。

那些替我父亲做工的人也并不比他清楚。他们似乎不十分在乎，这样也行，那样也行，因为他们都没有结婚，没有一大群儿女要他们抚养。他们诚然不快活，喝酒也都喝得很厉害。罢工时期，他们似乎都是一百二十分地对矿工表同情，但是他们不懂得这种斗争的意义。黄昏时候，在我们厨房门外进行的一切争议和辩论里面，我记不起有任何足以使我明白究竟罢工是怎么一回事的概念。责任似乎应该由那些远地来的人们来负——公司里的职员，他们一年要来视察一两次。视察的时候，工人们常常希望他们会枪毙某一个大工头——可是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人人都是满腔怨愤，但是我们低着头静候罢工的过去，结果还是我们服从那些给我们工钱、使我们获得生存的权利的人。我们说“是的，先生”和“谢谢你，先生”，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必要的。

自从那时到现在，许多许多年月消逝了，我个人在生活上也经过了太多的巨风大浪，要我完全记得我们当年无知到如何程度是不可能的。多年以后我每每听见男人和妇女说“我们是命该如此”，我就又常常回想到我们在峡谷里的那几年的生活。“命该如此”这句话，是掠夺者用来对付那些被他们掠夺的人的一种武器。生活在无知无识的黑暗中——除非亲身体会过，谁能了解这种生活的意义呢！那些自认“命该如此”的人们是其中最愚昧无知的人。智识的世界离我们太遥远了，我们在峡谷里的人，只有逆来顺受，不能主动思考。

至于我的母亲，她变得愈来愈缄默了。自从父亲企图打

她，跟着又强迫她让儿女离开学校，来到这峡谷里之后，她比先前更加憔悴了。她的生活很孤独，因为周围几英里之内，只有我们一家是说英语的。她从来不对儿女们诉说自己的不幸，而我父亲又对她不好。父亲替公司里做工，母亲跟我就替他手下的十来个工人洗衣烧饭。我们吃的食物是粗糙的。买一双新鞋子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有时海伦给我们送来一包衣裳，我母亲和我就把这些衣裳拿来改做。可是她从来没有为自己做过衣裳。她说：

“我不要。我不到什么地方去，也不去看什么人。”

每逢这种包裹偶尔来到的时候，我父亲就提起她妹妹所过的生活，想引她开口。她仿佛脸上挨了一巴掌，但是顶多皱皱眉头，背过身去，一言不发，继续烧她的饭。

“天啊，这倒不错啊？”他骂了一声，气呼呼地跑出门去。

有时候，星期日，周围几英里的墨西哥人都会集在山岗上，那些山岗环绕着峡谷脚下的“平地”。参加比赛的人们只穿一件衬衫，赛着“球戏”。我们和他们一块儿坐在像一个大圆形剧场的山坡上观看。

也有天气晴和黄昏的时候，工人们吃完晚饭，坐在我们的厨房门外不走，谈笑歌唱，我急忙把碗碟收拾好赶去参加。一个人先领头唱，其他的人就跟着唱起来：这些歌都是一些多年没有人唱的西部的歌，每首都有好几十段，用同样低缓悲苦的调子叙述着各种冒险的故事，牧人的快乐与忧愁，垂死的牧童，不幸的遭遇，还有牧歌和恋歌。

有时候也会有人取出“法国竖琴”来玩。这时，另外一个

人就站出来跳舞。有一次站出来的是一个颀长的青年，我正在爱着他——但是偷偷的，除了我自己之外，再没有别人知道。他的蓝衬衫领子敞着。他躬着背跳舞，摇动着身躯和胳膊；他固定在一个地方跳，跳到后来鞋后跟碰在坚硬的地上的响声有如连击的手枪。他身材魁梧挺拔，双手搁在腰上，仰望着天空的月亮，月光照在他黑色的靴筒上。上上下下映出一条条光辉的小河。

最后，音乐停止了。万籁俱静，唯有微风沙沙地拂过树梢，冲破了这片沉寂。跳舞的人拿出一块红色的大手巾拭拭额角，又从另一个口袋里取出腰带。大个子柏克把靴子伸在月光下，脑袋却躲在房屋的阴影里，他开始叙述在得克萨斯州彭汉德尔看见的另一位舞蹈家……也许是在里约·格兰德罢？这个舞蹈家惯常在牧场的火堆旁跳舞……他说那该是十五年以前了……不，说起来快二十年了……

四

要不是我的血液里有一种游荡的欲望——这是我父亲传给我的——要不是我继承了父亲那种拒绝接受上帝所赐予的命运的精神，我说不定也会一辈子住在煤矿镇上，嫁一个工人，替他生下十来个孩子，让他们在大地上四处漂流，而我自己也许一过三十岁就进了坟墓。这是我周围的妇女共同的命运。但是一切固定的事情都是我的仇敌，很快就失去了它们新奇的色彩。未知的事物永远在召唤着我。

我们搬到台奇奥不到一年，我就当上了教员——我这个小学还没有毕业连两笔数目都加不对，一条文法规则都记不清的人，却在穷乡僻壤的新墨西哥州里一片又紫又绿又红的台地顶上，教育起一群六岁的儿童以及和我差不多大的小伙子来。新墨西哥州有无数这种出其不意地从一片平原或高原上冒出来的台地，我所在的这一片台地，又宽阔又平坦，海拔高得树木也无法生长，四面都是笔直的峭壁，狂风暴雨扫过群山的时候，反射着闪电。

我独自住在台地尽头临近峭壁的一个两间房间的校舍里，外间是课堂，里间是我的卧室，睡觉、烧饭、改课卷都在这里。我来到时是五月，但是夜里刮风的时候还飞着雪片，风拍打着校钟上一端叩在房子边上的绳索，发出一种阴森可怕的声音，鬼哭神号的风声和上面丁丁当当的钟声混成一团。

小男孩和小女孩都走过那广阔平坦的台地来上学；从下面峡谷深处来的，是墨西哥人和混种印第安人，骑着看牛的小驹，从南边视力所及的遥远的平原上来的，是牧场上的几个男孩和女孩。是的，我也很无知，但是跟周围的人比起来，我算是博学的了。我还有一种天赋的伶俐劲。逢到一个小一点的孩子解不开算术习题，而我知道自己也做不出的时候，我就叫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出来，要他在全班面前显露他的知识。他很得意地把习题解了，于是我们大家都学得了一些东西。

我是“教员”，牧场人家能请到我去做客，认为是一种光荣。孩子们带着食物来给我送礼，还牵了一匹马来供我长期使用，我骑着马驰骋在一片粗野但是友好的土地上——我很安全，和别的妇女一样安全，因为在这地方不仅居住着强壮的男人，这儿的妇女也是很强壮的；即便不是这样，她们身边挂的枪也能够应付。现在我回想起了我幼年及青年时跟遥远的西部人们生活在一起的那些年代，他们都是不识字的、粗野的、早就尝过了生活中的苦味的工人，然而除了一个例外——那个小镇上的理发匠——我从来没有受到过凌辱，没有一个人曾经无礼地碰过我。这或许是因为我太年轻、太无知罢。有许许多多人来向我求婚，因为那地方妇女很少。但是我比周围的女孩子要聪明。我的智识虽然浅薄，但是比我的感情要有主张。所有

的女孩子都结婚，我不知道怎样能逃得了，但是我决定要逃避。我记得我母亲虽然不开口，但总是支持我的主张。

在新墨西哥州，我跟男人们一块儿骑着马到处跑，有时一个人，有时许多人，有时在白天，到跳舞场去或从跳舞场回来大都在晚上。在黑暗的峡谷里或者平原上的牧人家里我跟他们一块跳舞。他们都是正直可靠的人，我跟他们在一块，比修道院里的女孩子还要安全——安全得多。我完全没有想到性的问题，这不只因为我还差不多仍旧是个小孩子，同时也因为我太忙。要想的事情太多了，而且我也不打算结婚。

我现在回想起那些诚恳粗野、胸膛上长着毛、不刮胡子的男人时，心里总是很愉快。我又想起矿区里那些更粗野的不幸的男人以及他们沉默寡言的不幸的老婆。现在想起他们来，我心里总带着一种悲戚依恋的感情。但是在那些年代里，我却一心追求着我以为更完美更高尚的东西，抛弃了这一切，抛弃了我的乡亲和我的家人。我忘记了他们所唱的歌——这些歌现在很少再有人唱了，我从自己的语言中清除了他们的土语，我以他们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为可耻，但是现在——是的，我热爱他们，他们是我的血液的一部分；他们的全部美德和弱点，对于我的人生观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极偶然的机会有，我在台奇奥遇见了矿区学校的教员，一个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最初，因为她是个受过教育的女人，我对她抱着怀疑，不愿意接近她。后来，我们却变成了朋友。我们从矿区上借了两匹马，一同骑着在小山上驰骋逐猎。她鼓励我跟她一块学习，去参加本县的教师测验，好做个正式的教员。学年快结束时，她借给我一件外套和一条裙子，让我骑着

马越过分水岭到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市镇上去参加教师测验。

“你就说十八岁，”她预先教我，“撒谎——对谁也没有害处。”

“我并不怕说谎，”我回答说。

后来我把这事告诉了大个子柏克，“撒谎！”他大叫起来。“啊呀，你撒起谎来比兔子跳起来还快得多哩！”

我战战兢兢地坐在一群年龄比我大、受的教育比我多的妇女中间参加测验。两天以后，本县的督学把我叫了去。他是个瘦高个黑眼睛的墨西哥人，极其聪明和蔼。

“你的算术、文法、校规以及其他一些课目的分数都很低，”他向我宣布，“但是如果你会说一点墨西哥话的话，这里倒有一所学校。地方很荒凉。气候十分寒冷，只在夏天开课。很苦，离市镇很远。你必须自己烧饭，自己洗衣服。生活也很粗野——都是牧人。”

我没有理解他的话，但是我觉得应当放聪明点，于是我听着，并且装出听懂了的神情，世界上竟有人不自己烧饭，这对我简直是新闻；我想除了有钱人之外，人人都要自己洗衣裳。至于说“粗野的人们”……他这是什么意思？我很奇怪……他一定是说那些在酒店里留连忘返的人们罢……然而这也不可能，因为他说过那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我只好等着看罢；我一点也没有想到像我自己这样的人就正是他所谓的粗野的人们。

就这样，我变成了一个教员。我不怕寂寞寒冷，也不怕野兽……至于粗野……好罢，我就等着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罢。可是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大家的行为都和我一样。有一次在台地顶上，一个霹雳打在离我住宅不远的峭壁上，把我震得不省

人事，在门口躺了好几个钟头，即使这样，我也从来没有感到害怕或是想离开这个学校。我只是挣扎着回到房里，爬到床上静静地躺着休息了一阵。学校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地方。我每月能挣四十块钱，其中的一部分寄去给了我母亲。我那可怜的妈妈便高高兴兴地做些衬衫和裙子送来给我这个当教员的女儿！她一向相信我会成为一个有“教育”的人。现在当她在台奇奥遇见矿区督察员的太太时，她不再把她那双筋粗皮老的手藏在背后，从一边悄悄地溜过去了；她得意地昂起头来说：

“您好，理查士太太——今天天气很好，不是吗？”

当我住在台地顶上的时候，我读到了一册廉价的家庭妇女月刊，这里面登载着一些长篇的爱情故事，衣裳式样、烹调方法、美容秘诀和各种各样的玩意。上面还有一页愿意与人交换风景照片的男女的姓名和通讯处，我在这张表上选中了一个男人的名字——那要算是其中最漂亮的名字了——罗柏德·韩溥栋，他的通讯处是俄亥俄州的哥伦巴斯。那是远在东部的一个城市，我对于城市的文化、学问和壮丽，一向是一心向往的。我送了他一张画片。他给了我一封回信，夏天慢慢地过去，起初一个信封里只装一张画片，后来变成两张，终于多到四张了。他来信说他快要在中学毕业了——在我眼里他简直是一个学者！他开始把他的旧书寄给我读——历史、文学、植物学——我细心地读着，连干燥无味的东西也不放过。然后我又把这些书转送给我母亲，因为我想叫她也读一读。秋天，学校放了假，我回到家里，发现母亲正在厨房里的窗户边耐心地读着一本书。她读了好几个星期，还没有读完一半。这对于她是非常新鲜非常困难的，然而她和我一样，觉得这些都是必需知道

的东西。

我可算是“衣锦还乡”了……我这个十六岁就凯旋归来的女儿！现在我也是我们家庭里一个主要的经济收入者了。父亲在很远的牧场上做工。母亲住在台奇奥，我在家的時候，可巧父亲也回来了。我还记得他来时的景象：母亲坐在窗户旁边，我正在把我上课的情形以及冬天将要聘我去教书的新学校讲给她听，她面上露出很兴奋的表情。我把罗柏德·韩溥栋，还有他曾经送给我一张照片的事也告诉了她，——他长得漂亮，又有学问，就跟书本里的人物一样。她没有说什么；也许她认为我能爱上一个远方的英雄，那要比一个近边的现实人物好得多。我们一面谈着，她无意中朝对面山脚下望去，忽然间，我看见她的脸上布满了愁云。我这才发觉她已经有了那么多白发，虽然她还不到四十岁。我顺着她的眼光望去，从公司的商店那边走来了我的父亲；他走得很慢，宽大的肩膀驼着，垂着脑袋，两只手不断舞动，仿佛在对一个看不见的人说话。

我差不多立刻就到那所新学校去了。这学校在离开科罗拉多燃料与冶铁公司的另一个矿区布里莫罗还有不少路的峡谷里。我在那里待了约有四个月，除了在学校里，听不见一句英语，学生们跟我谈话也是用墨西哥话。我在一所墨西哥人的土砖房子里有一间房间，晚上，我就回到那里去。房主是墨西哥人，也是这学校的一位董事。他觉得自己是个男人，又是学校的董事，就有权利跟全区最有知识的女人作长时间的谈话，而我就是那个女人！他的妻子是个身体结实天性善良的墨西哥人，没有思想，也没有什么非分的打算。他平常总和我一块儿

吃晚饭，让他的妻子在一边照应，她就在这间又是食堂又是客厅，同时又是我的卧室的房间与厨房之间穿进穿出。我们吃完后，她才和儿女一起在厨房里吃晚饭。她丈夫说的是一口非常奇怪的方言，一半墨西哥话一半英语，可是他却使她相信他说的完全是流利的英语。他非常瞧不起她，总是让我知道，他这样有地位有才智的人和这样一个女人结了婚，真是太委屈了！我不好对这个女人表示同情……这对于这个男人将是一种致命的侮辱，我或许会因此失掉我的位置。

我讨厌他的谈话。但是他认为女子应该经常听男人讲话，增进自己的知识……女人就是不如男人知道得多；不管她是谁，是什么样人。我盼望能在安静中舒舒服服地读罗柏德·韩溥栋从东部寄来的新书和信件，这些信件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写信人的书法异常优美。我到学校去的时候，这个墨西哥人常常未征得我的同意就把信拿来看，然后又来问我里面的内容。他看不懂，但是他看得出这种书法无比的好，我有这样博学的朋友，于是他更加尊重我了。晚上我把这些信堆在面前，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努力学习他的书法，直到今天我的书法还跟他有些相像。我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能学会写那样漂亮的字，我的教育就算完成了。

远方的笔友变成了指导我生活的理想人物。他坐在那里读着这些从落矶山的一个偏僻的峡谷中寄出去的谦卑的、字迹潦草、语无伦次的信，必定觉得自己好比上帝一样。我把他的照像立在小桌上，桌上还摆着他的旧书；假如我对邻近的某一个黝黑俊秀的墨西哥和印第安混种男孩发生了感情——这是常有的事，因为我的感情对于任何事情都是飘忽不定的——我就和

自己的感情斗争，晚上回到家来，自己都觉得很难为情。这并不是很容易的。学校里的一个和我同年的印第安孩子，总用爱慕的眼光凝视着我，不敢来接近我这样一个有学问的人。他把别的孩子都管教得规规矩矩的，以表示对我的尊敬——只要哪一个孩子闪动一下睫毛，透露一点反对我的意思，他就会在放学以后，一直把他们护送到树林边上！

有一天我正站在讲桌前面，尽量诱导我的学生跟我用英语谈话——这是我的主要任务——门忽然打开了，我的墨西哥房主人出现在门口。从山背后的台奇奥来了一个电话，我母亲病了，要我一定回家去。我站在那儿注视着他，仿佛他是一个报丧的人。他又把这消息重说了一遍。我一言不发地掉过身来，取下挂在屋角里的帽子和外套，离开了学校。我完全忘了应当向学生们宣布散学。我只知道我的母亲快要死了……我不是前夜就梦见了吗？

我刚回到家，他也赶回来了。他答应明天用马车送我过山去，因为现在他的马车正在森林里为矿上拖木头支柱。每天只有一班火车从特立尼达开进峡谷里来，在每一个矿区停几分钟。火车到达布里莫罗的时刻是下午两点钟，再走一个钟头就可以到台奇奥。这时候是上午十一点钟。我说我可以步行到布里莫罗去。不行，他不同意，峡谷里雪很深，天气冷得可以冻死人……这太危险。我根本不理睬他的话，我走进自己的房间，把手枪紧紧绑在腰带上，再把外套盖好，准备立即动身。他和他的妻子站在大门洞里，惊愕地望着我走上峡谷里的大路，我转过弯去打算绕小路越过分水岭。雪下得很大，幸好刚有一群山羊从这条路上走过，把积雪踏平了。我到处攀扶着牢牢地附在

冻硬了的土地上的粗壮的矮橡树枝，爬上滑溜溜的山坡。只要我能够到达分水岭的顶上，其余就好办了，我可以从那里走上大路。寒冷，遭遇猛兽的可能，滑倒和跌断腿不能前进的危险——都不在我心里，我只知道要到山顶上去。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感觉，什么都不看见，我只是爬。

我终于爬到了山顶。一阵猛烈的风已经把山头上的积雪扫得干干净净，路上纵横的车辙都冻得结结实实的。我把头缩在外套领子底下待了一会儿，以便温一温我的肺。然后，我把步子放慢，轻轻地稳健地前进，这样才能走长途而不致筋疲力竭。我的心照顾着我的身体，仿佛心和身体是分开的两个个体一样。我的身体粗健有力——壮得和山上的橡树一样。我心里知道，若是我的身体疲惫到了几乎不能再向前进的地步，一种新的精力就会从心里奔放出来——就会有“第二阵风”。我的心就是我，就是这个走在漫长的冻僵了的道路上给狂风拍打着背脊的我，——我的身体却是另外一件不相干的东西。我——我的心——和冬天的空气一样明晰，我只有一个意念——在下午两点钟以前赶到矿区；我的身体就是那不相干的东西，需要被哄着去执行这项任务。我再三对自己说，最主要的事情是使这双脚站得稳稳的，静待第二阵风的到来。有一阵，我的脚战抖得很厉害，软绵绵地摇晃。我转了一个弯，在前方远远的下面，看见了布里莫罗的炊烟。我抬起头——一种新的兴奋的热力在我的血液里周流。我掉过身子，踏着缓慢、稳重的脚步，从斜坡上跑下去，我把嘴埋在外套领子里，使吸进肺里去的空气有一点暖意，万一跌交，也能用空着的双手赶快撑住。

我跑到布里莫罗镇的边上，跑过公司的商店门前，走上那条

被煤灰染黑了的通往车站的道路。但是我并不是唯一在奔跑的人——许多别的人，脸上带着张惶失措的样子，也正在街上横冲直撞，我看见公司商店的窗户被人打得粉碎……街对面其他房屋的窗户也打碎了。一个头上蒙着格子花呢披巾的女人跌跌踉踉地走过去，因为恐惧过度而哭泣，用一种外国话在喊叫。

我一步也没有停顿，从商店的角上拐过去，跑过了车站前面小山上的那个矿口。路上挤满了人。两个工人相遇，一同朝矿口跑去，其中一个对另外一个嚷道：

“他们正打算把通风井关上，该死的……”

矿口犹如一头古代神话中的护宝巨神，在喷发着黑烟。一群男人拉着绳索站在矿渣堆底下，想把那些围拥上来的妇女挡回去，她们却象野兽一样拚命向前冲。她们的丈夫儿子都被封在矿井下，听见有人说……为了抢救煤矿，要关通风井……这样，矿工们就会被烟熏死。这就是她们哭喊的原因。煤是值钱的……人命却一钱不值！

我继续奔跑，踉踉跄跄地走进车站的站台，踏上火车的阶梯，根本没有想到要买车票。我倒身伏在坐席上。肺里感到又紧又冷。在那一边……多少英里外的远处……熙熙攘攘的人声中间……传来一个女人惨叫的声音。

我在母亲床边守了三日三夜。任何一点细小的举动就能把我的瞌睡惊醒。她那慈祥的深蓝的眼睛跟着我转来转去。每礼拜轮流到各矿区来看病的医生早就不耐烦了……他认为我母亲什么病也没有。是的——胃有点痛，自然……那是由于吃的东西太坏太少……他说，要是她老是光吃马铃薯和面粉稀汤，那你还能希望什么呢？她应该有更好的食物……她营养不良。我

很惊诧，知道我不懂什么叫做“营养不良”。他回答我的问题，就是她想要的话，也不能再给她小苏打片来止痛了。

最初两天她还和我谈话。安尼在两星期前死了……她曾经给我写过信。她还到她那儿去过，安尼和山姆在俄克拉荷马州西部荒原上他们的农场里，工作得象畜生一样。安尼丢下了一个小婴孩……小东西就躺在隔壁房间里。我拿温热的牛乳去喂他，他用渴望的蓝眼睛盯着我，真奇怪，他的出生竟会是我姊姊死亡的原因。

我坐在母亲旁边的時候，她很快活。我想她自己也知道离死不远了，因为她对我说了些奇怪的事情——一些触动感情的事情，若不是快要死了，她决不敢说这些事，因为我们这种人从来不肯表示父母儿女之间的亲爱。她还叫我“我的女儿”——她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叫过。

“要是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还能活到现在，”她有一次这样说，好象这些话是从她的心里掏出来似的。

又有一次，她在半夜里把我叫醒，对我说：“你答应我，一定继续去受点更好的教育。”她用力地把手紧握住我的手，好象要求我给她一句诺言。一种奇异的情感象波浪一样激动着我。我紧紧握住她的手。

第二天医生来了，我说：“请你给她点药罢……她快要死了。”他很不乐意……他说，他事情很忙，我凭什么不断打电话去把他从这么远的地方叫到这里来，我母亲除了暂时需要好一点的营养之外，又没有什么毛病。

我把医生送走，回来站在我母亲的床边，我知道我们只有等着送她的终了……我毫无办法。她求我给她几片医生禁止服用

的小苏打片。我不肯。但她再三再四地求我，眼睛里的神情很是怕人。于是我糊里糊涂地把药片给了她。我把药给她之后，马上回身跑进通向学校去的小巷，一直冲到教室里，不假思索地对着碧儿崔丽斯、乔治和丹大喊。

我们回到她床边的时候，我父亲也在那里，他是那天早上回来的。他双膝跪在地上，把面孔埋在被窝里。我母亲睁大眼睛，目光炯炯，她转过来看着我，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恳求。我弯下身去，生平第一次把她抱在怀里，紧紧挨着我发抖的身体。“玛丽！”我的名字是她弥留之际最后说出的一个字。

眼睑渐渐合下来，盖住了亮晶晶的眼珠。身体逐渐软了。我把被子揭开，扑在她那平坦消瘦干瘪的胸前静听。心脏跳动了两下，停止了……又跳动了一下。我继续听，好象经过了一段无穷无尽的时间……殷切地等待着……但是再没有声音了。我父亲拉我站起来，我勉强站稳了。我并没有流泪。我只知道自己站在一个女人的尸体旁边，她曾把生命给予了我。除了这件我无法明白的事以外，我什么都不明白。我心里只看见一圈圈灿烂的光，慢慢地凝聚起来，最后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消失在一片空白之中，而那一片空白却又在忐忑地跳动，犹如大海里的浪涛拍打在悬崖峭壁上。

我母亲躺在一副白色的松木棺材里。海伦来了，她和我父亲在停灵的房间轻轻地拉了拉手。她的头发依然象是擦亮了的黄铜，闪耀着暗暗的金光。她面颊上和嘴唇上都抹着脂粉。穿着一件鲜艳夺目的外套。她满屋子扫了一眼——看了一下那冷清清光秃秃的地板、那屋角里东倒西歪的旧衣柜、铁锈斑斑的小炉子以及窗户上廉价的白窗帘。然后她又把我母亲身上盖

的单子揭开，看着那干枯皱缩、象生前一样在默然沉思的面庞；那双交握在干瘪的胸前的由于操劳过度而变得又黑又粗、暴露青筋的手；看着我母亲年纪还轻却差不多花白了的头发。她转身走开，把脸背着我们，走进旁边的一间卧室里去，脱下她的外套，站在那儿望着那躺在床上踢闹的小婴孩——那是山姆的孩子，而山姆是她生平第一个，也许是唯一的情人。

我们原已决定把母亲的遗体运到俄克拉荷马州去葬在安尼旁边，只等海伦一来就动身。这天下午我们把松木棺材装上行李车，开始了我们的移灵行程。

我们在俄克拉荷马州西部平原上的一个车站下车，山姆驾着一辆笨重的货车来迎接我们。他一看见海伦，马上掉头跑开了，但是后来他又回转来和她握手，并且望了望睡在她怀里的他的婴孩。

这时是一月；地面上依然又硬又冷；狂风刮过平原，把地面扫得干干净净。荒凉的树木这里一丛那里一丛。但是除此以外，就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凛冽而又萧条，一条车辙纵横、弯弯曲曲的小路穿过这荒芜的旷野。我们走了很久，才来到一幢外貌狰狞的板屋，安尼曾经和山姆一起在这里住过，现在是山姆一个人住在里面。棺材就停在空洞洞的外间。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棺材前面摆了几条粗板凳和几把椅子，邀请附近农舍里的男男女女来参加葬礼，另外还请了一个无知无识的牧师来讲道。这牧师现在站在我母亲的棺材后面，对我们大家说话。他是个文盲，比我们还要粗野。他所说的那番话，跟躺在那里的母亲以及杀害了她的贫穷与忧郁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穿着皮外套坐在他面前的海伦

……他又看了看垂头丧气地坐在那儿的父亲，父亲嘴里嚼着烟叶，肩膀驼得快变成圆形了。牧师用责备的眼色一个一个地打量我们，虽然没有提我们每人的名字，却是在对我们讲话。他说我们都不是基督徒，竟然胆敢抚弄我母亲的棺材！他警告我们说，我们都走在罪孽的路上，有些人还犯着卖淫的罪孽。说到这里，他的眼睛好象老鹰抓小鸡一样一下就找到了海伦；上帝为了惩罚我们所以使我们失去了母亲，但是“他”还要再惩罚我们哩！

我父亲站起来走到牧师面前跪下，他弯下身子去的时候，上衣外面就显出屁股袋里一个酒瓶的印子。牧师弯下腰来，很虔诚地把手放在他头上——这一个灵魂算是得救了！他又转过身来把脸向着海伦，预备张嘴演说。谁知海伦又恨又气地哼了一声，从容而威严地站起来，从门里走了出去。我也跟在她后面走了出来，吊丧的来宾和牧师都张口结舌地瞪着我们。

这个不成体统、一点也不感动人的葬礼总算完毕了，海伦和我走回来参加到那一小群送殡的人中间，这个举动又使得在场的人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们赶车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到达那个坟场，这坟场周围零乱地插着许多弯弯扭扭的柱子，柱子上面孤零零地绕了一道铁丝，算是篱笆。坟场里总共约莫有十二个土堆，靠头的一头都竖着一块大木牌，靠脚的一头都插着一块小木牌。这些木牌上面原先都写着死者的姓名，但是几经风霜雨雪之后，早就看不清楚了。我姊姊的名字还可以认得出来，因为要安葬我的母亲，又在她旁边掘了一个新坑。我们站在这些坟堆中间，又一次听着牧师祈祷上帝为我母亲降福，警告着那些不敬畏上帝的人们。

接着，我们都被唤去和我母亲作最后的一次道别。我没有哭。海伦也没有哭……当她俯视着她曾经如此热烈地爱恋过的姊姊的时候，满脸都是苍白和辛酸……她曾经为了她心爱的姊姊而出卖自己的身体，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的爱比她更伟大了。

几个月以来，我都在走着我自己选定的道路。现在，我决心要来照管我的兄弟姊妹和亡姊的婴孩。我于是辞去了教职，回到台奇奥来烧饭、洗衣、烫衣服、缝衣服。我的父亲也回家来了。我想法把家里弄得象个家——我以为，要是母亲早这样做的话，父亲也许不致于一天到晚喝得这样昏天黑地的。我买了一床地毯、几块新窗帘、一张棕色的圆桌、几张挂在墙头的图画——画里都是长着天使翅膀的儿童——我还买了些白被单铺在床上。

但是日常的家务以及我们小家庭里的烦恼，沉重地压在我肩上，我不由得常常想念起我的母亲来。我和父亲的关系，并不比以前她和他的关系有什么改进。这样年复一年的象她过去那样生活下去，真是不堪设想。我和父亲的冲突愈来愈频繁，我要离开的想法也愈来愈厉害，使我非常痛苦。这种不稳定的气氛本来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现在竟成为我的一部分了，我感到心中不安，极度的不愉快，十分烦躁。

有一天，我父亲喝得醉醺醺的回家来。丹不知怎么触犯了他，我父亲顺手抓起一根长长的马鞭来，把这孩子吓得直楞楞地瞪着他。他伸手想去抓住丹，丹急忙跑过来躲在我背后，双手抱住我的腰，把我挡在他和父亲之间。我握着他那紧紧地抱着我的小手……我父亲咒骂着命令他走到屋子中间来，他要

好好地“教训他一顿”。我父亲猛一下冲过来，但是我把他们隔开了。他又想钻到我背后去，我用全力把他推了回去。我们谁也没有说一个字……我感到他抓住了我的肩膀想要推开我，我不假思索地一下扑到他身上，握紧拳头，一拳一拳地乱捶。

于是，他站住了，一动也不动。他和我面对面站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回身过去拾起地板上的马鞭。我象是一只野兽一样防备着，随时准备扑过去，我决不准他用鞭子！他看了一眼马鞭，回转身子慢慢地从门里走出去，马鞭拖在他背后的地板上。

五

在但维尔城，海伦和我坐在我的房间里。山姆的孩子靠在她怀里睡着了。他好象一只偶尔落在那里的蜜蜂一样纠缠在她那件绸衬衫的绉褶里。一只肥肥的小手插在衬衫领口里，一只小脚完全不见了。刚才不一会儿，海伦还象跟大人说话似地跟他说话，他那一板正经的神气引得海伦把眼泪都笑了出来。我望着她，不由得想起了山姆，山姆曾经跟踪着她和汤尼到但维尔来，但是始终没有能劝服海伦离开汤尼嫁给他，其中的原因是——海伦曾经说过——当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结了婚，自己不能再谋生的时候，男人便要开始追究她的过去了。

我虽然年轻，可是海伦很需要身边有个亲人，所以我来了她很高兴。她告诉我：她曾经竭力设法挣钱维持她自己和汤尼两人的生活，然而钱总是不很够。

“而且我还要想办法给你母亲送点东西去，你们这几

个孩子也需要衣裳，”她这样说——好象这是她的无可推卸的责任。后来她病了，住在医院里，汤尼又爱上了一个没有病的女人，再也没有露面。

现在睡在她怀里的这个孩子，几乎可以说是她的一个早已绝灭了的愿望的实现。她愿意永远把他带在身边，她一想到他，就禁不住心花怒放。据说世界上象海伦这样的人都是硬心肠，不希望有儿女。我这个姨母海伦却不是这样。我很为她骄傲。在我看来，她的职业和任何已婚的妇女的职业一样高尚——她赖以谋生的手段和她们并没有两样，不过她生活得更好，有更多的权利来支配她自己的身体和灵魂罢了。哪一个男人也不敢虐待她，虽然说汤尼曾经象打老婆一样的打过她一次。倘若有个男人对她说“把我买给你的衣服还我！”她可以把他赶出门去——这是哪一个妻子都做不到的；倘若有个男人打她，她可以叫警察——这也是哪一个妻子都做不到的。她没有义务要服从哪一个男人。从这种种情况看来，我认为海伦是个端庄自重的人。这样的生活毋宁说要比结婚来得好。但是在我说来——我既不要过这种生活，也不想结婚。

我们一气谈了好几个钟头。她不懂我为什么和父亲只说了三句话，就那么干脆地抱起孩子出走。我自己也说不上为什么，于是只好勉强找些不成理由的理由来解释，她听着，没有说什么，可是也不怎么相信。我随口说道，我以后会回去的——说的时候感到言不由衷，十分不自然，我内心深知自己是决不会再回去的了。烦躁、不安、怨愤一齐涌上我的心头，使我的态度和言辞都显得很生硬。只有妇女和弱者才需要别人的爱，才需要别人来体贴她，来为她尽义务，这些我都不需要。

“那么碧儿崔丽斯和那两个男孩呢？”她问道。

我解释道，碧儿崔丽斯原已决定到新墨西哥州一个牧场人家去，这样一来她更可以早一点去了——她现在已经到了那里。至于乔治和丹，他们都给父亲带到俄克拉荷马州西部去了，将在那个平原上长大成人，象书本上所说的那样——进入“成人期”。谈到这里，我们两个人都静坐着不再作声，我们都想到了那儿的两个坟墓。她或许还想到了住在那所荒凉的小屋里的山姆。我接着说道，父亲也要到那里去，会和山姆住在一块儿——仿佛这样就能减轻谁的痛苦似的。

我们长久地凝望着窗户对面那幢房子的黯淡无光的屋面。生活真是奇怪。我不了解为什么有些事情偏偏这样，另外一些事情又偏偏不这样。例如，我们为什么老是这样穷？我讨厌一切，我最恨自己是个女人；我恨海伦，她的沉默使我感到自己有罪；我恨我的兄弟和妹妹，因为他们的生存给我加上了一种我不愿意担负的责任，我更恨我的父亲和母亲，我并不曾要求，他们却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呢！

这时，我开始有了一种日后保持了许多年的想法——我在意识的记忆之上拉上了一重幕帷，根本不去想我还有一个家。我辩解道，他们和我有什么关系？他们和任何别的人有什么不同？但是……乔治的眼睛正在望着我，眼光里充满了信赖……没有我，他怎么办呢……他那柔弱的小手一向是搁在我手中的呀！

“你打算怎么办呢？”海伦已经是第二次提出这个问题了。

“我想去学习。”

“学习！学什么呢？”

“我不知道……只是要学习。”

对于我们两人，“学习”是一种不可捉摸的奢侈品——一种我们不能理解的东西；“学习”仿佛是一种与不务正业终日读书紧相关连的事。只有富家的女孩，或是特别娇弱什么事也干不了的女孩，才能沉湎于这样一种逸乐之中；别人要是去“学习”，只会因为浪费了光阴而“挨耳光”。我以前曾见到一个受过教育的男子，可是他有肺病。罗柏德·韩溥栋也是受过教育的，他也许有钱也许有病，也许有其他什么缘故。

“你应该去学一种能够使你挣钱谋生的学问，”海伦发表她的意见。“我的钱足够帮助你一个时期——但是不能很久。”

我们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我应该去学速记。于是第二天我便到但维尔城南方一个小市镇去学习这一门技术。海伦不赞成我在城里学。

这几个月的学习生活是我所熬过的日子中最悲惨的了。当我在女同学面前走过的时候，她们总是彼此相视而笑，叽叽咕咕的议论我。我的举止粗野不大方。我说话不文雅——她们也许就是笑我这些。说不定她们是笑我的服装……海伦给我的整洁的外套，我穿着觉得很习惯，因此仍旧换上了我原来的舒适的衬衫，还挂了一条领带。

从学校里回到但维尔城海伦那里，就好象从黑暗的地方走进了光明的世界一样，但是海伦却闷闷不乐。原来山姆上星期到这儿来，把他的孩子带走了。她不愿意谈起山姆。我好容易才一点点地把这件凄惨的事弄清楚；她对山姆说她愿意抚养这个孩子，等他长大，就及时送他去上学读书。他拒绝了，并且对于

她的生活方式说了许多难堪的话——可是，正说到一半时，他猝然掉转头去，手臂靠在墙上，把脸埋在手掌里。他又向她求婚，她依旧没有答应。自从他把孩子抱走以后，她的怀里总觉得少了一样东西，有时候她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泪流满面。她又说不知道以后怎样来挨过这种凄凉寂寞，这时候，她的声音都喑哑了。

这些日子我虽然不和她住在一间房间里，我却常和她在一起。她跟别人打电话时，并不避我，间或也有一个男人来和我们一块儿吃午饭。她把其中一个介绍给我——一个灰白胡鬚、说起话来结结巴巴的老年人；他是一家杂志的编辑主任，愿意雇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做事。我于是开始工作了。我一面打字一面梦想——和往常一样的想入非非——我梦想能够积些钱，能够给我的兄弟和碧儿崔丽斯送些衣裳去。我梦想这位和善的老编辑主任会把我当女儿看待，帮助我上学。有一天，他叫我下班后多耽搁一下，稍加一会儿班，我感到非常得意，因为他居然挑中了我，而没有选择那些技术熟练的打字员。

我把工作做完，隔着写字台给他送了过去，他却指着一张靠墙的长沙发说：“请……请……请坐！”我微微感到有点不对，但是他是我的上司，又是个受过教育、上了年岁的人，大概不致有什么。接着，他不声不响地拿起一本照像册在我旁边坐下。我看了看那些照片；眼光有些缭乱了……也许是我自己多心……他是一个和善的老人，又受过教育。可是当他偷偷地伸过一只象蛇一样的手臂来抱住我的时候一切都混乱了——照片、手臂、打字机，一切都乱成一团。

我用力把手臂伸了一下……手臂依旧相当强壮，而且我动

起手来也还不太文明，不太象一个高贵的妇女。他虽然受过许多教育并且是个杂志编辑，可实在是个软弱无用的家伙！我又羞、又怕，惊惶失措地跑到门口，回转头来望了一眼。那老头儿扎手舞足地躺在长沙发上；颈子上雪白的硬领撕破了……对，他脖子上有一块青紫的瘢痕……我一定咬了他。真奇怪，一个人的尊严，竟会和硬领一块儿消失，人肉用牙齿咬起来，竟会给人一种橡皮的感觉……

这位棕色的主笔可就不同了。他不仅交东西给我打字，并且一天到晚都是兴致勃勃的，使我不禁想起大个子柏克来。有两次，他还叫我站在挂在办公室一角的一张印第安毯子前面，给我照像。

“表情要庄严些！”他命令道。“心里想着上帝！天呀——这算什么表情啊！要装作为我的杂志写一篇小说的神气。现在再来一次……把那几绺头发披在肩膀上……这样很好……望着我……做梦似的……做……做梦似的……就好比我是你的情人……好，一，二，三！”

他是一个生气勃勃的人，也是海伦的朋友。海伦听到另外那人的事以后，便去和这位棕色的主笔商量。这位先生两手插在衣袋里站在那儿，仔细地上下打量我。他的微笑显得很亲切很可靠。

“你让我试一试罢，”我请求道，“我不能快打，但是我可以学。”

“打不快，”他改正我的语法。

“打不快，”我跟着他重说一遍。

他的眼睛是棕色的，眼珠里常常含着一种即将爆发的嘲笑，尤其是当我极其正经的时候，或者当我对他说我这一生打算做些什么事的时候。假如他干脆笑出来，让我也笑一笑，那或许还更好一点。但是他不。他老穿棕色的衣裳，领带和鞋子也是棕色的，他的头发也是棕色的。

“我看见你的时候，禁不住常常想到鸡毛掸子，”有一天我对他说。

“那你就别看我，看打字机好了，”他回答。

几个星期以后，我们变成真正的朋友了。他带我出去吃午饭，我们驾着他的汽车，随意到各处去游览。有几次我请他去看电影，他一面看一面呵呵呵的笑。他是我那时唯一的朋友，因为晚上海伦往往不肯见我。连罗柏德·韩溥栋也不再送书来，他的父亲去世了，他已经离开学校去做事。我便没有什么可以阅读可以学习的了；晚上我一个人在家，坐在我那间小房间里，只好用眼睛去描那壁纸上的图案，直到我忍不住要大喊起来；于是我走出门去，走到灯光辉煌的大街上，看看商店的橱窗，望望熙熙攘攘流水一般的行人。

我和棕色主笔的友谊把这一切都改变了。他怂恿我替他的杂志写了一篇短文，他自己给我改，改到后来，连一行原文都不剩了，可是还用我的名义发表。他的女儿到他办公室来过一次，可是他并没有介绍我们认识，我知道她还没有做事，是个大学生。

“喂，怎么啦，”女儿走了之后，他问我。

“为什么你不把我介绍给你女儿？你为什么不带我到你家里去？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我还不好够吗？”

“我还不够好吗，”他改正我的话。

“我还不够好吗，”我重复了一遍。

他接着给我解释。他说他的女儿在别的城里上大学，是个势利眼。他跟他太太不和……他们甚至不交谈……他不能带我到他家里去。

“哦，既然这样，你当初为什么不说不说呢？”

他手下还有许多办事的人……征求订户和招登广告，他们把这叫做“外勤”。他们对我说，为了五块钱一星期，竟肯闷坐在办公室里，真是太傻了。做“外勤”不但一样赚钱，还可以长见识。

“跟我来，姑娘，”其中有一个人说，“我带你去见见世面。”

我提出要做“外勤”，这位棕色的主笔蹙了蹙眉头。他说我应该老老实实坐在写字台后面，不要去听那些人的废话。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我的机会要好得多。

“你所想的见识世面，和他们所谓的见识世面，不是一回事。”他补充说。

有一天黄昏，他带我驾着他的车子出城去。空气好象人的思想一般迅疾无声地拂过我们的双颊，天空出现了灿烂的星光。我们在一条山路上停下来了望城里远远的若隐若现的灯光。我猛一回头，发现他正把眼光牢牢地钉在我的脸上。

“喂。我又怎么啦？”我笑道。

他迫不及待地发动车子，溜下山坡，朝城里驶去。他把车子开到一家有名的豪华的大酒馆门口。当我们走上那铺着厚厚

的地毯的楼梯时，我感到自己十分渺小无足轻重……花砖地和大理石桌面的小酒店，对于我要更合适些。

我们走进一间只摆着一张饭桌的房间；屋角里有一张长沙发，我现在对任何一张长沙发都不放心，对于这一张也不例外。屋里后墙上有一扇半开的门……或许是通到饭厅里去的。我偷看了一眼——原来是个盥洗间。通向过道的门轻轻地动了一下，一个侍者走进来。他板着一副神秘的面孔记下棕色主笔点的菜。他背对着我，很快地把刀叉摆好，又背对着我走出门去，轻轻地把门关上。我心里感到一阵不安又有点羞又有点怕。是的，我对棕色的主笔承认我怕这地方……嗯，怕这周围的一切……是的，或许我是个小傻瓜，但是我想回家去。

他对于这事倒很坦白，当然，他是一位绅士；他不知道我不喜欢他——我对于各种事情都有一种错误的见解，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我应当知道，他愿意做一个真正的朋友，随便什么事他都同意，这就是说假如我愿意的话他可以帮助我去读书。就是进大学罢，是的，也可以，只要我想……说实话，他认为我将来还能够替他的杂志写文章哩。哦……他真是一片好心，是吗？那么我又为什么要怕恋爱……是的，怕恋爱？他的声音就象他的上衣一样轻软，痒酥酥的。那么……也许我是怕生小孩，我不用担心！他真是细致周到，他很爱我很爱我……也许他是个老傻瓜，为了我疯狂，但事实就是如此。他不是那样吗？那么我怕的是什么呢。哦……我怕……我怕……性……性本身？唔！唔……唔！他低声笑了笑。简直是胡闹——这种事就好比吞一粒药丸而已！难道我没有被爱的欲望吗？他用手掌托着我的下颌，温柔地送到他自己的面前。

“唉！为什么要哭呢——我没有想到你还这样孩子气！”他惊诧地住了口，伸过一只胳膊来抱住我，让我的脸紧贴在他的肩膀上。

“算了，算了！”他的声音有点不高兴了。“别哭了。我很抱歉。算了罢，我们仍旧是朋友，以后再说罢。”

我们默默无言地走下楼梯，我的脸上火辣辣的，连头都不敢抬。我不恨他，也不讨厌他。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他的声音现在变得这样没有感情。我不过是个女人罢了？我多么恨这件事……我用心里的全副力量恨它。我恨我自己……，我心里早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我还到这里来……天上的星星以及在山上他对我的长久的凝视，早已经对我做了警告。然而我还是来了！

我和风，和不可知的未来又结成了伴侣。棕色的主笔企图劝阻我，海伦也想来劝阻我。但是我所渴望的东西不在这儿。棕色的主笔表示反对说：“马路上的工作’对妇女是不适当的，‘外勤’不是妇女的工作——”这正是我为什么非离开这里不可的理由。他终于勉强答应了我，推广部主任给我拿来一捆杂志和一盒廉价的自来水笔——免费赠送每一定户一支。

“这是我特别帮你的忙，对任何别人，我都不干的。”最后，他对我说道，一边拿出一个信封塞在我手里，我把信封打开，里面装的是一张本州境内一切火车上通用的免票。这张车票不但去的时候有效，回程的时候也有效，他这是希望我会回心转意回到这里来哟！他轻轻地温柔地用手托着我的下巴，依依不舍地吻我，似乎希望在这最后的一刹那间唤醒我的感情

……他贴着我的耳朵柔声说：“这是一点给你作纪念，要你回来的意思！”我掉过身来拔腿跑到外面街上，狠命地摇头，竭力去思索别的事情。

我不停的往前走，一镇又一镇，到处去征求订户。起初，我踏上私人住宅的台阶，朝来开门的妇女装出笑脸。她们听了我的话，不是用力迎面把门关上，便是瞪着惊讶的眼睛，不着边际地和我扯上一阵。

当我望见一排整齐雅致的住宅或者当我朝着其中某一幢房子走去的时候，我的心里就不禁畏缩起来；逐渐地，我开始去访问那些只会遇见男人的办事处。许多男人都很友善地接待我，即使不订杂志，他们也不会对我个人表示敌意。许多人都说他们没有兴趣——可是瞧我的份上，可以稍微看一看。他们把笔拿在手心里反来复去的看，我要是为这笔说两句好话，他们便格格地笑起来。他们最后还是订了我的杂志，并且介绍我到别的朋友那里去；有时给我一张名片或一封介绍信，有时只告诉我一个地址，我便这样从一个办事处被介绍到另一个办事处。许多人订了杂志，却叫我自己把笔留下给他写一封美妙温柔的信。我一走到男人面前，就感到一种以前从来没有尝到过的信心和能力，象是有谁在对我说：“这里是你的世界！”我再也不到私人住宅去了，我一想到那些有钱人家的妇女就浑身打哆嗦。我没有把积蓄下来的钱存进银行，却装在一个信封里，用别针扣在衬衫里。晚上我穿着衬衫睡觉，枕头底下总压着一把手枪，或者我随身带的那一柄短剑。

纯粹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我在特里尼达下了车……我度过童年生活的地方。这是一个东方刚发白的清晨。我慢慢地朝商

务街上一家小旅馆走去；等一会儿我还要到铁道外边去，让我的老朋友看看一个事业上有成就的女子是怎么样的，街上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我快要走到那家酒店门前时，忽然从门里踉踉跄跄地跑出一个人来，蹒跚地走在我前面的街道上。我一面看着他，一面想起几年以前我父亲就经常在这家酒店里进进出出，谢天谢地，我父亲现在已经到了俄克拉荷马，和任何酒店都已经绝了交。街对面不远就是那所我曾进去过三次的红砖教堂……现在看来一点也不庄严……至少在我这样一个见闻广博的人看来算不了什么！甚至可以说渺小得可怜。

我前面的那人继续蹒跚地往前走。他那圆圆的伛偻的肩膀看起来非常眼熟。不过所有的工人都是这个模样。这人身上穿着一件黑背心、一件肮脏不堪的蓝衬衫，没穿上衣。满带灰尘的工裤上油迹斑斑。头上歪戴一顶灰色的捏得凹凹凸凸的大帽子，遮住了一只眼睛。我加快脚步赶上去，一面注视着他。我愈走愈近……我看见……他指手划脚地……象在和一个人说话！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我自己都能听见跳动的声音。我很不想去弄清楚这人是谁，但是我忍不住把步子更放快一点，直到我和他并肩走在一起。他的头低垂着，失神的醉眼紧紧盯着脚下的路面……嘴角上淌着烟草汁！

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刻。这人正是我的父亲。我们默默地并肩往前走，他仍旧低着头，没有看见我。他嘴里喃喃地诅咒着，手还在空中挥舞。我们面前是那条灰色的弯弯曲曲的街道，再往前去是那光秃秃的山岗。走到一个转角上，他抬起头来，这才看见我。他停下来，把身子在墙上靠了一会儿。

“你到哪里去？”

“丹和乔治在哪里？”我拉下来遮在记忆上那种厚厚的幕帷现在又被揭开了。他用衣袖抹了抹嘴唇，重新往前走。我走在他旁边。

“丹和乔治在哪里？”

“在这里！跟我在一起！”

我们拐了一个弯，走进一条陋巷，在一所破旧不堪的楼房里，爬上了一道摇摇欲堕的扶梯。他爬上一层楼，两层楼，再爬上第三层楼，最后，又爬上一条狭窄的梯子，来到一间单间阁楼。他推开门，走了进去。我四周望了一眼，这间屋子很小，也曾用一种说不出来的颜色粉刷过，但是现在早已脱落得斑斑驳驳，就象一只掉毛的癞皮狗一样。粗糙的地板上什么也没有铺，地板缝里塞满了经年累月积聚下来的灰尘。屋里有张椅子。乔治正站在那儿，脚踩在椅子上，想起一双我父亲穿破了的旧鞋子套在自己的小脚上。他穿着一条薄薄的褪色的蓝工裤和一件洗破了的衬衫，没有穿上衣。丹站在他旁边看，他的上身隐藏在我父亲的一件肮脏的有颜色的上衣里，……衣袖几乎拖到地板上。两个男孩都蓬头散发、肮脏不堪。他们抬起头来，看见了父亲背后的我，都呆呆地站在那儿瞪着我，看我究竟打算怎么办。

我的目光停在那双旧靴子和那件旧上衣上，我的心在抵抗着一种不能忍受的痛苦，坚强的意志和对于一切事情的憎恨帮助我战胜了这种痛苦，我转过身来朝着我父亲：

“我以为你已经带他们到俄克拉荷马去了！”

乔治的声音回答道：“我们下星期就去！”……他，他的瘦小的手一向都靠在我的心坎上……他竟然也站在父亲一边来

反对我。我变成一个外人了。

我们都站着，不说话……没有什么话可说……我们四个人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乔治用疑虑的眼光看着我；丹的嘴唇在哆嗦。我把眼光顺着地板上的裂痕瞧，我尽力克制我的感情。我只相信金钱，再也不相信所谓爱或柔情了。爱和柔情只会带来痛苦、愁闷和失败。我不能让感情把我象别人一样毁灭掉！我只愿意用金钱来说话，用冷冰冰的金钱。目前我就很有力量——因为我有八十多块钱缝在衬衫底下信封里……这是一注可惊的数目！

这一天还没有过去，我衬衫底下信封里的钱就只剩下不到十元了……其余的那些钱都用来替我的兄弟买了冬衣。就这样，我想用金钱来赎回我负罪的良心。我不能也不愿意用爱与关切来赎回自己的良心。我想在特立尼达征求一些订户把这笔钱照数补上。但是当我这样去做的时候，我却感觉缺乏一种力量——我怎么也达不到目的。男人们对我并不另眼看待。他们没有兴趣，而我也失去了那种可以说服人的力量。我打不起精神去劝说他们订我的杂志。我把乔治和丹留在门外，他们就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的等候。这时，乔治和丹的眼光中带着一种表情，仿佛他们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我了……他们爱我、信任我……我的理智与那想占上风的爱的感情搏斗着。我在那里的几天中，父亲没有再喝醉，而且还竭力把自己收拾得清洁一点；他的眼光里也有了信心……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复去不能入睡，我对自己说妇女都是弱者，都是傻子，女人都结婚，生养一大堆儿女，都要让男人随意指使她。我不能做女人……我不愿意。我要去挣钱，钱，钱，我要用金钱来说话。这并不需

要很久，因为前一阵我就挣得不少。由于某种原因，我在特立尼达是失败了——但是只要再往前……

我就这样尽力压制住内心叫我不要离开他们的感情，又一次离开了他们。我对自己说，我会回来的，心里明明知道我是永远不回来的了，但是却不敢正视这个不能变更的事实。我的理智象一条链子拉着一只狗一样，把我拉上了火车的阶梯。我回过头来，看了看他们两人的面孔……多么消瘦多么凄凉……他们的脸上是疑问、是信任、是盼望……乔治和丹手拉手地站着，嘴唇在发抖。

那时天刚亮，我心里感到在什么地方有一只雄鸡在喔喔地啼着……一声……两声……三声。

一块黑色的幕帷轻轻盖下来，从我记忆中抹去了那些心爱的面孔。我爱他们爱得这样深，甚至忘记了他们……除非是夜半梦醒，这些梦把我愈送愈远，我自己也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我也往往并不关心。但是幕帷是很厚的，我把自己这种铁石心肠称为有原则。我筑起堡垒来保卫自己，抵御那威胁妇女自由的爱与柔情；那时我还不知道人们所以要筑起堡垒来，原只是因为那地方有弱点。

我走在得克萨斯州的平原上，偶尔在我面前会升起一种幻象来……一片片宽宽的水塘，水塘边上长着一株株棕榈树。我走过许多垦殖区，挣的钱刚够给我买面包。我的免票现在已经失效了，坐车要花钱买票。以前剩下的钱连维持一日三餐都不够。我仍然只去找男人打交道，我怕去见那些狠心的女人。有一位黑眼睛的戴一顶灰色的大毡帽的高个子牧人邀请我到他的牧

场上去居住——他并不是向我求婚；他很有礼貌地提出这个邀请，也同样有礼貌地接受了我的拒绝。然后，他就愁眉不展地倚在自己的位子上，凝视着窗外，自言自语地说他过的是一种地狱般的生活。

有一次，在一个小镇上，我借宿在一家廉价的客栈里；晚上，客栈的老板闯进我的房间，说要和我一同过夜。我的拒绝伤了他的自尊心，他命令我立即离开他的客店。这市镇上仅有一家旅馆——而且是一家很贵的旅馆。我只得在候车室的板凳上睡了一夜，翻来复去，浑身酸痛。

又一次，我因为换车，不得不在一个偏僻的市镇上过夜，小旅馆里那个细皮白肉的账房对我微微一笑。我单身一个人，又饿又倦。早上三点钟的时候，我忽然被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惊醒了；门上的锁原来已经坏了，我只得拿一张椅子顶在把手下面。我赶紧把灯点上，看见那把椅子吱吱嘎嘎地向后移动，账房正从门里挤进来，他急急地把门在背后关上。我直觉地把手塞到枕头底下，握住我那柄短剑的凉冰冰的贝壳做的柄。

“我来请问你想不想喝点威士忌酒。”他假笑了一声，好象我和他是多年的老朋友似的望着我，我颤颤悚悚地退到床后开着的窗户前面，握着短剑的手放在背后。恐惧涌上我的心头，梗塞了我的咽喉。

这账房堆着满面讨厌的笑容，朝我慢慢走来。我浑身发抖，头昏身软。他离我只隔一臂远了，再不动手，过一会儿我就要昏倒了——我于是赶快用尽平生的力量，一头冲出去不顾一切地乱刺，象是没有刺中，但是我再定眼一望，却又不然；短剑把他的衬衫袖子撕了一个大口子，从肩膀直到手腕上……

我失神地望着手里的短剑，看见剑锋上有一丝淡淡的血迹。

这人脸上的笑容消失了，脸色象死人一般苍白。

“你这该死的婊子，”他的声音从远处传来。苍白的面孔在我眼睛里晃动，我听见他说话，又把冰冷的手指紧紧捏住短剑举起来。他大吃一惊，急忙退到门边，隐设在黑暗的过道里。

我踉踉跄跄地走到梳洗台前，往脸上和头发上浇了几捧水；水很冷，我已经在冻得发抖。我气急败坏地披上几件衣裳，根本顾不上扣纽扣结带子。然后我用皮带把枪紧紧绑在身上，盖在大衣底下，从黑暗的过道里摸索着走下那吱吱轧轧的楼梯。我的提包撞在墙角上，我急忙站住，一动不动的在黑暗中静待。没有引起别的声音。我蹑手蹑脚谨慎地摸索前进，一步一步慢慢地象小偷一样走下了楼梯。账房坐的那个角落里，暗淡的灯光照在写字桌上……那里没有人！

我冲进茫茫的黑夜里。黑暗朦胧中隐隐现出一列列货车的轮廓，后面衬托着车站里的灯光。我跨过一道道铁轨，蹒跚地朝着灯光的方向走去，我的声音惊动了一位老站长，他跑出来，用惊诧的眼光打量我：

“喂，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我……是不是有一班车快到了？”

“到新墨西哥去的车一个小时以后到达，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车，你是等这一次车吗？”

“是的……还有其他车子，到别的地方去的吗？”

“哎哎！你难道不知道你自己要到什么地方去吗？……开往大拉斯的第七次车明天上午八点钟到。”

我要到大拉斯去……那是一个大城……在那里我能赚到钱。但是要等到早上八点钟……假如那账房叫警察来抓我怎么办！这些人都是一群狼……如果我连自己是谁都说不清，我又怎样向他们解释我要到什么地方去，以及为什么要到那里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老站长满脸狐疑地站在那里望着我……他也是属于狼群里的一个。

“我……我……不知道开往新墨西哥去的车还有那么多时候才到站……我没有表也没有钟。”

他脸上的怀疑消失了。“是的，你是太早了一点……不妨进来坐在火炉旁边……我办公室里有一张摇椅。”

我倒在椅子上合上眼睛，尽力镇定心神。但是我的思潮不断奔腾起伏……我究竟要到哪里去呢？我的天呀，……在新墨西哥除了一片荒凉以外还能找到什么呢？

这是一个小镇，却有着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卡尔斯巴得。火车上的报贩说起这个小镇就眉飞色舞，因为这镇上有一家旅馆，房价贵得他做梦也想不到，住客都是到这里来治病的人们。这是新墨西哥平原上一个很有生气的小镇。我在火车站附近一家两层楼的旅馆里租了一个房间，开始到私人住家去征求订户。我简直鼓不起勇气再去登上这些整洁的小平房的台阶，当我走下这些台阶的时候，心里总是充满了屈辱。我在那家昂贵的旅馆门前转来转去，无论如何鼓不起勇气走进去向里面的客人推销杂志。我的钱已经用完了，镇上唯一的饭馆里的人对我说，他们既不需要临时工也不能容许我欠账。

我用最后的两分钱给海伦写了封信要钱——只要够到阿里

桑那一个煤矿上去的路费就行了，大个子柏克在那里做工，我一定能找到工作。因为我还在但维尔城的时候他就写过信来说，假如我愿意的话，可以到那里当个速记员。四天过去了，我一点东西没有吃，而且在这以前的几星期我都只吃得半饱。我买来的最后一个面包已经吃完，纸包里还剩下一些面包屑，我把手指在一杯水里蘸湿，把面包屑一点一点拈起来吃了下去，然后才无可奈何地把纸包扔掉。接着以后的四五天里我饿得似乎脑子里没有任何思想。……周围的一个字一句话都使我联想到食物。花园墙上垂着一支桃树，树枝结满了累累的绿色的果实。我刚要伸手去摘取果子，从转角那里过来了两个男人。他们在我面前经过，彼此膘了一眼。其中一个是个瘦瘦的尖脸孔的少年，小旅馆里都传说他是老板娘的相好，他是我每天到邮局去时必须走过的街角上一家酒店里的侍者。

自从那一次之后，他每天都站在酒店门口等我。

“你不寂寞吗，小姑娘？”有一天他问道，我连忙跑开了。

一队西班牙弦乐队，每晚都在广场上奏音乐，一天晚上，他在我身旁一张板凳上坐了下来。

“夜色很好，是吗？”这侍者问我。

“是的。”

“你不寂寞吗？”

他溜到我这儿，把一只手臂搭在我的肩膀上。我赶快从黑暗的街道上跑回去，让他一个人留在夜晚里。我很担心是不是顶撞了他……我怕他和其他的人会看出我没有吃东西……我怕他会告诉老板娘，她就会来向我收房租。

在这一星期的终了，老板娘果真跑来要房租了。我向她解释，我有一位姨母，我已经写信去向她要钱，我如今正在等这笔钱。她问我，我的职业是什么，我的年龄多大，哼，她不相信我只有十八岁……我那时看起来确实象有三十岁了；况且“白相女人”说的话根本不足以凭信。

九日九夜过去了，我一点东西都没有吃。我不再觉得饥饿的痛苦难熬……我只是愈来愈虚弱。每日早晨我醒来时都怀疑我是不是还能够站起来，是不是还能够到邮局去走一个来回。“死”仍然不过是一种概念……当我坐在窗前倾听着户外风吹树枝的声音的时候，我也曾想到死，但是死的思想并没有使我的精神沮丧。一种冥冥的命运常常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来援救我，我现在仍然有信心。

每日早晨我慢慢地在床上坐起来，攀着床柱子立起来，站在镜子前面注视着自己的形象。我好奇地观察着镜中的人影，心想“原来一个人饥饿的时候，就是这样苍白啊？”而且多么老啊！我为了节省洗衣费而穿的那件黑衣裳使我显得更加惨白苍老了。我心里想着那些住在整洁的房子里的悠闲的人们……他们有足够的东西吃。我怕他们——他们认为饥饿或贫穷的人都是可疑的人物，而他们对付这类人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叫警察。

镇上又来了一个女人，租下了我的房间对过楼梯边头的一间房间。我从门隙缝里看见一个娇小的人影。半夜里，我从睡梦中惊醒，听见一阵跑步声，接着是哭声和喊声。我半醒半睡的听着，过了几分钟，声音沉寂下去了，最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消失在楼梯上。第二天早晨镇上已经闹得满城风雨。给我

收拾房子的黑人茶房告诉我说，前一天半夜里，对面房间的女人听见有人轻轻地敲门。

“谁？”她应道。

“是茶房，”门外的声音回答道。“你要冰水吗？”

“好的。”

她把门打开，走进来三个男人，制服了她，把她强奸了。她认出其中一个就是那酒店的侍者，这侍者已经被捕，后来又交保候释，待下次法院开庭时，要以强奸罪受审。他的托词是：他喝醉了……醉得一塌糊涂；他和两个朋友到这旅馆去是为了找一个住在那里的“白相女人”！他们实在醉得太厉害了，所以爬到楼梯口上，就敲错了房门！他们以为那是我的房门！他们不知道我是谁……他们仅仅知道是一天晚上“报贩”把我带来的！当我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回想起火车上那个卖报的孩子，他告诉过我卡尔斯巴得是个大城，同时还表示愿意替我把提包送到旅馆里去。但是从那时以后我就再没有看见过他。

“你也有被捕的可能，姑娘，”黑人茶房肯定地对我说。

出事的第二天，我没有到邮局去，固然是因为我太弱了走不动，更主要的是怕到街上去。早晨的时候，老板娘凶狠狠地走进我的房间来，叫我“野鸡”，并且要我在明天清早以前把账付清，离开她的旅馆！我头里轻飘飘的，一站起来，就象要晕倒。她的声音好似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又象是在梦中。我对她说我病了，她说你没有病，你是个下流的“野鸡”。

她走了。我的心里腾云驾雾似的，几乎感到有点愉快……我的肉体里还感到饥饿。这或许就是死亡……死倒不象我一向所担心的那样痛苦……或许我会睡去然后就不再醒来。

那天晚上，我没有能走到门边把门锁上。我攀着床柱站起来……镜子里我自己的影子显得异常惨白异常模糊……摇摇晃晃，茫茫一片。窗外树林里的风吹得多么温和，我转过脸来对着窗口。接着我就跌倒了，躺在地板上失去了知觉。第二天早晨黑人茶房进来收拾房间的时候，才发现我。

黑人茶房从转角上那家酒店里弄来了一点威士忌酒——酒店的侍者跟他一块来了，他们把酒灌进我的喉咙里，于是眼前的一切又都化为一片漆黑，接着又变成许多跳动的影子，在我眼里忽隐忽现。我的脑子好象分裂为二，一个远远地坐在一旁，宁静地带着一种超然的意趣观察着——生命与死亡的激斗——似乎置身事外。另外一个却在作垂死的挣扎——黑人茶房和侍者挤在一块儿谈话，我的脑子和血管里都燃烧着烈火。远远地坐在旁边的意识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但是既没有作判断也没有下结论。记下了的是：酒店的侍者端来了一盘热汤，灌我喝了几口，我感到一阵剧烈的头晕目眩想要呕吐，便失去了知觉，后来又苏醒过来。每次当那侍者离开这间房子以后又回转来的时候，那一个拚命挣扎的头脑就这样想：“现在就要完了……没有关系，”而另一部分意识既不为此感到恐惧，也不为此感到欢乐。在它看来，事情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又过了许久，房间里的一切逐渐清楚起来，不再晃动了，酒店的侍者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第二日，我躺在床上，把脸朝着镜子，不用转身就看得见开门关门。侍者站在那里，我心里浮现着这种思想：“不要紧，……我反正就要死了。”一连许多天，他照常给我送汤来，后来又给我送来一片肉。他走以后，我把那块肉用纸包起来，偷偷地塞在枕头底下。我现在还

不能吃，明天，后天或者一星期以后就能够吃了！我压根没有想到肉是不能保存这样久的。每天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那酒店侍者总跑来站在床头望着我。有一天他在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一包东西搁在我的胸前。

“这是我一个月的工钱，”他的音声从我头上面飘过来，“我想这对你比对我有用。”

我考虑了很久——一个人在这种情形之下，应该怎么办呢。我的理智驱使我把手伸出去，收起这几张崭新的钞票，塞到枕头底下藏着那片肉的地方旁边。肉没有了！一定是那茶房，我想，他收拾床铺的时候……

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切事情都不过如此。

又过了几天，房东太太依旧带着满面怒容走进我的房来，我一言不发地把房钱付清，并且对她说，我只要能够走动，就会离开。

我坐在窗前一张大椅子上挨过那漫长的钟点，黑人茶房不断地出出进进。

“小姐，你需要什么东西尽管叫我好了……不要怕我。”我并不怕。他是我在卡尔斯巴得遇到的最和蔼的人，他的手和看护妇的一样灵巧。

柔和的南风拂着我的面庞，外面的树木给风吹得沙沙的响——风啊，你总是追随着我。一天夜里，有一只鸟在树林里唱歌，我悄悄爬到窗边聆听……我曾经在哪里读到过关于夜莺的诗——这难道就是那夜晚的甜蜜的歌者吗？从暗夜中泻出一首流泉般的乐曲——爱情一定就象这样——和风一样。

日子又长又寂寞。我一站起来两条腿就直打哆嗦，我的心

里七上八下，又是愿望，又是恐惧，又是要求。我感到迷乱，我又在盼望。黄昏的时候，那侍者有时也来坐在窗前和我聊天。这时候他显得多么的谦卑！我们谈论着我们所知道的各种事情……各自的家庭，日常的琐事，到他酒店来的那些客人，他们说些什么，他又怎样回答，我们还谈到我的计划：尽快离开卡尔斯巴得到阿里桑那去。我们没有谈起他的被捕。至于那些知识界的人所谈论的学术问题，以及那些象波浪一般起伏的思潮，对我们说来，都是陌生的，我们的无知使我们有如处在无边无底的黑暗之中。他和我，我们都知道工作与食物是怎么回事，我们也知道某些人是为着生活而工作，另外一些人又不是为着生活而工作。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爱情——也可说是恋情。如果我们把书本上学到的那一点知识拿来谈论，那不到几个钟头就会没有什么可谈了。我们总不能坐在那里背诵历史上的年月日，和学校的校规，也不能一味谈论怎样打字、怎样拼音。

“我曾经做过教员，”我告诉他。

“你现在为什么不做教员呢？”

“我只拿到了当两年教员的证书。我以后没有再去参加过考试。”

“到了克里富顿以后你想就能找到工作吗？”

“我想可能。”

“你以前也曾想过结婚吗？”

“没有。”

“那么你现在考虑一下怎么样？——我的意思是说我和你。”

“你瞧，”他接着说，好象为他自己的弱点辩护，“我原以为你是假正经……我见过那样的女人……我起先还以为你做过那样的事呢！”

我将他的话在脑子里仔细玩味。他向我求婚原来是因为我没有“做过那样的事！”这真是不讲道理，卑鄙可耻……竟然拿我的身体来衡量我的价值。我饿得几乎死掉，却只落得别人承认我是个有资格出嫁的女人，我心头感到一种隐隐的怨愤！这个男人和楼下的老板娘有关系，——强姦过住在我对面房间的女人——他有什么资格来向我求婚？他给过我钱……是的。我再细细一想——我明白了，男人和女人都是这样……女人非得是处女，男人非得要有钱。我对这种事感到一种无法捉摸的厌恶。总之，这等于一注交易，而我绝不肯这样出卖自己，我要把钱还给他……我立刻就到大个子柏克那里去，请他先替我还了这笔钱，等我挣了钱再还他。我要自己谋生，到那时我们再看，谁有资格来跟我结婚！

他在等待我的答复。不，我干脆地答道，我不愿意结婚。我永远不嫁人。

第二天黄昏，他又来坐在窗槛上。我猝然意识到我一直在等待他的来临。他伸出温柔的手来拾起那落在地板上的枕头，垫在我的脑后。能够被人这样照顾也不错，我心里动了一下……这样体贴……永远这样温柔多情。永远这样安宁。外面的风轻轻地吹过树梢。鸟儿唱出了第一声歌，我弯过身去看。正当我要倚到窗上的时候，他一把抱住我，我几乎忘记了一切……几乎。这不是恋爱，但确是一种对爱情的追求。他的手臂抱得很紧，他的嘴唇却是软软的，异常温柔。我的记忆恢复了，我把

他的手臂推开，他马上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他走了以后，我的脖子上还遗留着他的慰抚。我的身心都充满了寂寞的感觉。

等到晨光熹微，继之天色大明的時候，一切的事情我都记起了——哭哭啼啼、吵吵嚷嚷的妻子和恶声恶气的丈夫。妇女们为了衣服就不顾羞耻地哀求。“天啊，好人，你知道我是爱你呀！”食物……我要自己养活自己。贞操……我不能容许人用贞操来衡量我，好象我除了身体之外就不值一钱。我永远不嫁人……我永远不生孩子……我永远不会软弱到陷入情网！

我乘着天还没有太亮，先把行李收拾停当，然后躺在床上等待。到南方去的第一班车子大约还有一个钟头才到达此地。几分钟之后我又爬起来，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梯，敲了敲那黑人茶房的门。我告诉他我提不动箱子，他赶快把门关上，隔了片刻便来到我的房里。我们一道往车站走去，我挽着他的手臂，使自己不致于跌倒；这时东方的天空，已经现出黎明时的灰白色。

大个子柏克在我的记忆中是很亲切的。每经过一重门，他总要弯一弯腰。他身材魁梧、仪表高贵，象他这样的人，在表面的沉默底下隐伏着一种傲慢的神气。我不知道有谁比他更接近于西部的精神；他的一举一动都带有一种诙谐的腔调；对自己辛苦所得的一切物质财富，都十分慷慨大方，意气豪迈，目光远大；固执地认为墨西哥人、印第安人、多妻教门人和那些身体脆弱的人们都比他低一等。从我的孩提时期他就认识我，曾经教我射箭、抛绳索、玩折刀；曾经想出各种办法来消灭我身上的一切女性习气。他绝不因为我是女性而对我稍加原谅。

他不止一次使我知道，我和男人没有区别，应当对自己的每一件行为负责。要是我脾气发作，打了他一下或者拿什么东西扔了他的话，他便伸出那熊掌般的巨手把我推倒，滚在地上。

他的身材比我父亲要高一点，可是比我父亲年轻，他的胡须就如他自己很谦虚地承认的，长得能把耳朵给包上。天冷的时候，他也许会穿上一件上衣，但是我这次和他见面，是在阿里桑那的烈日下，他只在魁伟的身躯上套上了一身日常服装：一件蓝衬衫和一件漂亮的背心，棕色的袴腿塞在齐膝的马靴里；头上戴着一顶高高的灰帽子，帽沿折下来遮住了眼睛，以免强光的照射。他过去是个牧牛人，但是西部正在转变，牧牛人都在流向大小城市。他现在是克里富顿炼钢厂的机工——他说他已经很得心应手了，而且还在不断进步。

我们一见面，他便严肃地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时光增高了我的身材，在我身上打上了妇人的烙印。但是他只淡淡地说：

“喔，你现在有两个指头宽了！”

我把一切经过都告诉了他，他没有回答，也没有下任何评语；我讲得杂乱无章，但他多少能听出一个大概。他替我在他和他的朋友柏拉开住的那一家旅馆里租下了一间房间，并且把我介绍给房东“妈妈”，她是老板，一位圆圆的和气的妇人，顶多不过三十五岁，可是看起来却象有五十岁。她把我叫做“柏克女士”。

柏克后来对我说：“别奇怪为什么她叫你做柏克女士，这种地方不必十分拘泥。你写信告诉我你要来的时候，我就对她说，我的妹妹快要来了……除了柏拉开以外，谁都不知道，你

最好听其自然。”

我的房间在三层楼上，窗子底下是一条小胡同，从酒店和酒店隔壁一家弹子房里进进出出的人们，都要经过这条胡同。不断有人从外面一路扭打着走进这条胡同来，我常常倚在窗口观看他们。柏克告诉我，他已经在对面一家中国饭馆里给我包了伙食。他说房子、伙食等等这一切都算是他对我的款待，直到我的生活不受威胁，找到工作为止；但是按他的意思，我应该整整休息上一个月，恢复恢复身体。

这个市镇处在一个给一条水源不明的激流切成两截的峡谷里，峡谷的一边几乎全是坚硬的石壁，另一边是不毛的峻峭的山坡。白天，正午炽热的阳光把石壁烤得滚烫，半夜以后许久，空气里才透出一丝凉意。我住的旅馆门前有一段木板铺的便道，是本镇唯一的人行道，旅馆以外的地方都没有。在街道的另一头和沿河的地方有一排没有油漆的矮小的平房。远处，高耸在峡谷口的，是炼铜厂的阴郁的厂房，更远的地方就是矿山。山顶上有一条古道，当年亚巴济部落的首领鸠罗尼莫，曾经率领着他的战士在这里防御过入侵的白人。从这条古道往前，是一片无穷尽的峥嵘的山岭，杳无人烟，北面有一排森严可憎的山峰。这是一个为响尾蛇和大蜥蜴一类的毒虫所盘踞着的人迹罕到的世界。烈日炙烤着这些黑色的山石，炎热难熬。我想地狱也不过如此。有一天柏克和我骑着马走在这条古道上，日光异常强烈，竟然激起了他的兴致。他又讲起那个古老的故事来，据说有一个阿里桑那州人死后入了地狱，但是他不但没有烤死，反而得了重伤风，夜里还伸手向恶魔要毯子。我回答说，这故事同这荒原一样古老；我的帽带都给汗水浸湿了，现在不

是说笑话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骑着马从山上的古道走下来，折进通往峡谷底下的小路；他的皮肤给太阳晒成了皮革的颜色，他骑在马上活象一团融化了的黄油。马头低垂着，差一点碰到地面上。他有气无力地举起手来打了个招呼。

“他倒很象那位从地狱里回来拿毯子的人，”柏克随便地说，他的眼睛在帽沿下发笑。“可是他并不是；他只是那个看林子的罢了。”

“看林子的？你又在说笑话了。”

“不，这不是笑话。那边倒是有一两株树。还有一个牧场。这个多妻教门人每星期到克里富顿来取一趟信件。”

“你怎么知道他是多妻教门人呢？”

“你看他骑在马上样子！只要是一个多妻教门人，决逃不过我的眼睛……，……他们自己都觉得惭愧。”

“惭愧！他们为什么要惭愧呢？”

“我怎么会知道！……我又不信多妻教！”

这话使我生气。酷热使我生气。一切事情都使我生气。后来我在镇上遇见那多妻教门人，我还故意停下来和他谈话。

自从那次之后，我每星期都遇见他。他是一个少年，非常瘦弱，长脚，个子很高。我和他一同骑在马上沿着那条鸠罗尼莫走过的古道去寻找箭头，他把我带到峡谷深处树木重新开始生长、两旁峭壁上还残存着昔日住家的遗址的地方。柏克愈来愈表示不能忍受。他说，这人是一个多妻教徒呀！他开始称他作“弹子棒”。他又说他真象根弹子棒，不过“弹子棒”是有脊梁骨的，他却连脊梁骨都没有。在一个难忘的黄昏，我们骑着马走到峡谷里去参加一个跳舞会时，他乘机坦白地对我吐露

他的心意，他说：“你不是跟这个人就是跟那个人恋爱，”我正要表示决不能同意这说法，他固执地打断了我。“而且你挑上的都是些怪物！第一次是吉姆，你总还记得吧……你为了一支六响的手枪和一匹马，把自己卖给了他，可是过不了几分钟，你又反悔了。接着，是一个酒店的侍者；现在，又是一个多妻教门人，还有那个用鸠罗尼莫的箭头镶成一副手镯和戒指送给你的印第安人，我想你又把他看上了，那真是一个怪物！你为什么不能跟一个体面一些的人谈恋爱呢？……譬如说跟我……”

“跟你！你太老了！”

“我太老吗！我还不过四十二岁，那多妻教门人也总在三十以上了罢。”

我想不出什么话来回答他。他又继续说：“我看来老，是因为我留了胡子的缘故……我可以把胡子剃去，我一点也不比最漂亮的少年差到哪里去。”

有几秒钟功夫，他在黑暗中默默地不吭一声。后来。他的声音又传到我耳里，“我是比你老了一点，但是我待你好，比起多妻教门人或酒店侍者来，总要强多了。那个‘弹子棒’有两个母亲，他自己在寿终正寝之前，至少也会娶上十二个老婆。”

柏克知道“弹子棒”一定也会到我们骑马前往的那个跳舞会去，而这一带妇女是很稀少的。“弹子棒”会跳舞——他却不会。他的身材太大，跳起舞来不雅观，即使在这种有重大意义的场合，他也不肯跳舞。阿里桑那刚刚加入联邦成为美国的一州，这一天是垦区时期的最后一日，所以举行盛大的庆祝。这天放假，一清早，柏克就和我骑上马循着山上的小路，上上下下穿过了几个峡谷，一直到了摩隆西。镇上张灯结彩，热闹

非凡，街上悬挂着国旗、彩绸和中国灯笼，到处是葱郁的树枝。晚上要举行一个盛大的跳舞会，街市也会变成舞场。天黑以前，我们又骑着马从山上回来。我们所去的那个地方，对我们说来，也许并不怎么体面，但是人们正在从柏克曾经做过牧童的那高地上的大牧场赶来；多妻教门人从峡谷里的各个垦殖区赶来，工厂里的工人也都来了。我是寥寥几个妇女中的一个……当时在这垦区内，不是一个完全无足轻重的对象。

柏克突然提出的求婚打断了我们在黑暗中的谈话。他今天讲话分外冗长，我听了很觉惊异，但是毫不动心。双方都觉得没有话可说了，我们一路默默无言地到达了跳舞场，默默地把马系在木桩上。跳舞厅本来是一间弹子房，桌子都堆在一旁靠着墙壁。高高的横梁上吊着的许多中国灯笼映照着鲜艳的国旗和彩绸。屋角里和窗户上都扎着绿色的树枝。屋子的一头，孤零零地放着一张弹子台，上面铺着木板，作为音乐台——乐队是由两把提琴、一把五弦琴、一把吉打和一个手风琴组成的。柏克和我坐在靠墙的一张弹子台上，观看别人跳舞。

柏克问他的朋友：“娘儿们真不少，柏拉开，你说是吗？”

柏拉开会意地点了一点头，卷起一枝香烟，眼光从这个女人身上溜到那个女人身上。这些妇人大都很胖，面上抹着脂粉，到这里来的目的都是兜生意。除了这些女人以外，还有从市镇上以及远地牧场上来的女孩子。柏拉开和我跳了一次四方舞。我的左右两边都有抹粉的女人在跳舞，我对面是一位跟“弹子棒”同来的漂亮的姑娘，大多数男人都没有穿外衣，但是都戴着新帽子，穿着华丽的背心，束着鲜艳的腰带，脚上还穿着精美的靴子。

跳完了这个舞，我从人群中挤过去走到那位漂亮的姑娘身边。

“舞会挺热闹，是吗？”我寒暄地说。”

“是的，可是城里的还要好啊……然而我们不能去，我必须趁早班火车回学校。”

她说话的声调低缓柔和，无精打采，和那看林子的人说话的神情一样。我立刻接下去问她，她的学校在哪里。是费匿克斯城的一个师范学校。我尽力想把自己的傲气压下去，但是我仍禁不住回答道：

“我以前做过教员。后来又学会了速记。我早就完成了学业！”

她回答我的时候，也尽量掩饰语调中的优越感。她不相信，因为在她读书的那个学校里，需要上六年学……从中学校到师范学校！

六年！——这一下可减了我的威风。

我们回到柏克身旁的弹子台边。柏克默默地听着我们两人谈话。一对对舞伴在我面前绕过去，我却几乎一点没有听到那吱吱的提琴声或错错落落的六弦琴调子。我一心在幻想远方的一所学校，在那里可以学到这位漂亮姑娘所讲的东西……学习……我所不知道的东西……一股劲地学习。要好几年才能毕业，说不定我能够快一点……我不是比别人知道得多吗！倘若这个姑娘需要六年，我只需要两年便够了！我恢复了健康，并没有学会谦虚。

“你愿意跳个舞吗？”“弹子棒”对我鞠了一个躬，显得分外漂亮。

我们旋转着挤进那一群舞伴中间。这间屋子只是一间弹子房……难道就是这样……这难道不是大学校的辉煌的大厅，我的舞伴难道不是世界上最漂亮最文雅的人；我难道不是在长长的辉煌的大厅里纵情欢舞，手风琴迷人的节奏和五弦琴的低沉的饶有古风的敲击，在我的双脚上装上了神奇的翼，使我腾空飞起，乐声铺下了一条路，一条窄长闪烁的道路，柔和的音乐，清澈的空气，星光灿烂的良夜……

舞会结束时已经是清晨了，许多妇女早就和她们的侣伴在夜里不见了。柏克和另外三个人在墙角里玩了好几个钟头纸牌；柏克赢了不少钱，兴致很高，不想回家。最后柏克、“弹子棒”、那位漂亮的姑娘，和我四个人一路骑着马回家去。半路上，他们和我们告了别，转弯过桥去了。

“看来，你是很想到那个学校里去的了。”我们回到旅馆门前的时候柏克说。

“是的。”

他疲倦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骄傲，“好吧，我可以帮你六个月的忙，等你自己找到了事情做的时候再说。我的钱不多，不能长期接济你，但是我愿意帮助你，你要是想回来，我总在这里……至于我提出的结婚的话，你也不妨想一想。我并不比你更喜欢愚蠢的女人，……我才不会为这种女人浪费我自己的生命呢！”

他那乌黑庞大的影子横在我面前，我感到很窘。

“假如你这会儿愿意帮助我，或许将来我能够偿还你……等我毕了业……我想不会多久……也许顶多不过一年。”我不能设想要超过一年，就是一年也已经很长了。“我……我……”

不知道我到底要不要结婚。我会把这件事考虑考虑……”

又来了——心里明明知道不是这样，嘴里还要这样说。他没有回答，他或许也知道——他是深知我的呀！

我记得他直挺挺高高地坐在鞍子上，骑着马消失在灰蒙蒙的朝雾中，没有说话也没有回头看。好象梦一般地去了。

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正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我站在费匿克斯城外的一排红砖砌的校舍前面。这排房子以及旁边的小镇都傍着一条河流，有如人们骑马越过一片暑气氤氲的大平原时常常会遇到的海市蜃楼一样冒了出来。有一次在新墨西哥的高原上，我就远远看见过一个这样的市镇；当时我的坐骑仰起头来，拚命向前奔窜了一阵。但是等我们走下一条小河爬上对岸的时候，这个幻象却消逝了，大气澄澈一望无际，我们徒然搜寻，可是再也找不到那个市镇了。

这一个市镇却没有消逝，它娴静地立在那儿，象是在等待我的到来！市镇外四面八方都延漫着一片处处长着紫苏和仙人球的灰茫茫、不怀好意的沙漠。白天里，太阳无情地炙烤着大地，黄昏时又笼罩上一层乳白色的柔和的纱幕。严寒的黑夜来得非常突然，高高的天空中闪烁着数不清的冷峻而灿烂的星斗。满月当空的夜晚沙漠上便是银流泛滥，无数高耸的仙人球象凶恶的哨兵一样守望在天幕下，把一支支长着铁刺的手臂伸向天空。

远远地，在沙漠以东，平地里升起了一脉寸草不生人迹罕到的红灰色的峰峦。其中有一座山叫作“幽灵山”，据说昔日北方的那伐育族和南方的亚巴济族，曾经在这里有过一场激战，而那呜咽着从荒凉的山洞里穿进穿出的疾风便是归来凭吊的战

死的幽灵。我常常凝视着这些山峰，然后又看看我手指上的箭头镶的指环和手臂上的镶着箭头的手镯；这些箭头都是我在鸠罗尼莫的古道上拣来后又请克里富顿附近一个印第安匠人用银子镶成的。我深深地爱上了阿里桑那，我对于美国兵丝毫没有好感，他们追击亚巴济族的首领鸠罗尼莫，俘掳了他和他的战士，把他们送到佛罗里达州的沼泽里，让他们在那里等死。我很理解鸠罗尼莫为什么要固守这一块他心爱的土地。这块沙漠诚然是一片灰茫茫不讨人欢喜的荒原，似乎只有仙人球、艾草、响尾蛇和大蜥蜴才能够在这里生长；可是，这一片大沙漠横在你面前，召唤你一步一步向前走，……仿佛在前边不远的月光下还有更迷人的东西。你若是继续往前走，清澈的空气中有时会飘来一阵从墨西哥流浪到这儿来的印第安人唱的凄切缓慢的歌声。这歌声仿佛和沙漠结成了一体，也只有沙漠上才能产生这样的歌声。沉思，期望，凄惨。

阿里桑那沙漠比我所到过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接近我的精神。我渐渐讨厌起那条为山上的巨型的罗斯福水闸所灌注的河流；我也讨厌那沿着河流所灌溉的土地建立的市镇。——这些多妻教门人的垦殖地，逐渐把沉思的沙漠变成了蚁巢般的臃肿的人类聚居的场所。

我没有进过预备学校。学校的教职员不知道应该把我怎么处置。

他们问我：“你家里的人呢？”

“他们全都死了！”

“全都死了？”

“我还有一个姨母。”

“她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于是我照实说了。

“你的父母都死了吗？”

“都死了。”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他是医生。”

我没有让他们知道得比这更多。他们测验了我，又口试了一下，最后接受我做旁听生。这以后的三个月里，我什么事都不做，只是读书，我从来没有象这样用功过。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我明白自己不够文雅，不动人；我的言词粗野，态度卤莽，缺乏教养；而那些住在费匿克斯城里的服饰华丽的姑娘们所以不喜欢我，是因为我对女人、对婚姻和生儿育女都表示厌恶。

我在学校里也学到了一些别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在这种读书的气氛里，在教师们同情的关怀之下，我的脑子开始很清新而兴奋地开动起来。一位动物学教授让我在他的实验室里当助手，每月给我一点微薄的报酬。我工作——我工作得多么努力！眼看着那些观念和思想逐步在我头脑中形成，真是非常奇特的事情——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学习会是这样。不到五个月，我就被选为每周出版一次的校刊的编辑了。我更加起劲的埋头工作——我不是说过，我能比别人做得更多吗！

我还学到了一些别的事情，在我心中培植起了一种信念——这次是一种原始的基本的痛苦的信念。现在我是校刊的主编了，女同学们往来教室时常常彬彬有礼地拉着我在一道，我不知道怎样来应酬她们，因此感到很窘。礼节能够掩饰多么多的罪恶啊。青年男学生也有时到这间小小的编辑室来和我谈话。他们也很有礼貌，十分的有礼貌。我不喜欢这样。我开始

明白一个女子可以用容貌来博取别人的尊重，也可以用智力、威权和成就来博取别人对她的尊重。但是智力、威权和成就都是干燥乏味的东西。认识到这一点对我说来是个悲惨的教训。我渴望着美丽、文雅与爱情。

有时候我也感到把自己装成一个轻视浅薄言行的学者很有些困难。一天晚上，女同学们都穿戴整齐准备去参加学校里的跳舞会。她们穿着华丽的夜礼服，踏着急促的步子从宿舍的过道上跑到会客室里去会她们的男朋友。轻盈的脚步从我门前走过，消失在朦胧的夜色中，享受人生的美景去了。一个女同学在我房门上敲了一下，探进头来问：

“你不来跳舞吗？”

“哦，不，我还有一篇社论要写哩。”我冷冷地回答，好象不屑于参加跳舞会。

渴望与痛苦使我心里感到沉重，当宿舍里又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在桌前坐下来，竭力去设想智慧有多么美丽。但是，在夜里，声音透过阿里桑那州的稀薄而清澈的空气传播得很远，低沉迷人的音乐从操场上一阵阵吹过来。我写不下去了，我爬到窗外，穿过草地。宿舍里也有别的窗子亮着灯：上面是那个又胖又丑的多妻教女人的灯光；旁边是那个在饭馆里洗碟子的穷女孩的灯光。我不甘心和她们同属于一类——属于不美丽的女子一类。

我站在玫瑰花丛四周的阴影里，凝望着敞开的大窗户里舞会的情景。美，音乐，节奏。不时有一对对舞伴偷偷的跑到外面来乘凉，在玫瑰花丛中漫步。那个仙女一般美丽的多妻教姑娘也同男友出来了一次，她那一对紫蓝色的眼睛，在夜里变成

了两个阴郁的池塘。她身上穿着一件曲线毕露的黄色长袍。我更往阴影里躲了一躲，深怕他们发现我在场，这会使我羞得无地自容。

她回到客厅去以后，我便踏上引向沙漠去的大道。

我偶尔停住脚步，还能听见远处的音乐声。最后，大道和沙漠合而为一了。在沙漠里，一切都无所谓了。我和我的朋友——风以及一只寂寞地歌唱着的夜鸟——走进沙漠，在沙漠里漫游，愈走愈远。但求给我一小时的无忧无虑、无牵无挂的幸福罢，但求给我一小时的美丽和爱情罢！

荒漠是漫无止境的，在夜里，那些被遗忘了的年代的迹象便又显示出来了，这些年代吞噬了一切属于人的东西——热情、希望，和崇高的志向。面对着碧青的天空中千古永恒的星宿，灵魂摆脱了一切尘世的情欲，只留下满怀的惊奇和丢不开的烦恼。

她是一位斯堪的纳维亚的女神，一位身材异常魁梧的高贵的女神，一脑袋金黄色的头发，一双碧蓝的眼睛，说话时略微带点外国口音。她走到我的房里，我看出她有点跛……书本里常常有这样的女人……高大白皙，生来就那么雍容华贵，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她们常会有点跛，有时还很有钱。

这位女神名字叫做迦琳·拉逊，她到我们学校来，是为了听关于妇女参政权问题的全州辩论会。她四下里察看着我的房间。看看我的手套、风帽和那挂在壁上的墨西哥马鞭；看了看那挂在床上的皮带和皮袋里的手枪；看了看书桌上放着的那把我用来做裁纸刀的短剑。然后我们二人站在房间中央，上下左右从容不迫地细细地互相端详了一番。

最后，她开口了，“原来是这样……”好象她已经把我看透了。我心想：“原来是这样！……”也把她看透了，一面寻思怎样才能把话说得跟她一样的柔婉。

“我是从东部来的。”她说，“但是目前我在费匿克斯教书。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吗！……我想随便说我是从哪里来的都行。”

她继续说，她到西部来是为了想离她的兄弟近一点，同时见识一下世面。为什么要到这样的地方来见识世面？可是这种人常常是很难理解的。她是一个古怪的人——自己是位教员却不尊重教育，她说她是被人逼着才去教那些她自己一点也不懂得的东西的。一般说来，教育机关都是“腐朽、反动、缺乏创造性的——同时也是停滞的”；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她居然问我的意见怎样。我从来没有想到学校会有什么不好。她也谈到“社会”，但是我知道她并不是指那些时髦人的社会，而是指一切人，包括我自己在内。

她的弟弟后来也来了——他叫诺德·拉逊。年龄在二十出头，跟他姊姊长得很像，只是一双眼睛更深更蓝。他和我握手的时候，眼睛里笑咪咪的。他说话时也一样带点外国口音，他的举止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弄得我反而很拘束。他的目光常常朝我射来，使我禁不住要脸红，我意识到自己的粗鲁和不美……

一个月过去了，诺德、迦琳和我，三个人常常在一起。一天晚上，我们聚集在校园里一株木兰树下面，谈论着我们即将乘车前去参观的雅基族印第安人的复活节舞蹈。诺德和迦琳的话使我觉得自己十分无知，当我们到达荒漠上的雅基村时，他

们眼里所看到的似乎不仅是那些外表的形体，他们仿佛在凝望着某种我所不能理解的东西。雅基村不过是一片茅屋，其中许多只是几根柱子撑着一个屋顶而已。到处都是矮小黝黑的印第安人，在叫卖墨西哥玉蜀黍饼和热杂脍。我们走到一个屋顶下面。坐在一群穿着宽大的褪色的棉布罩衫的印第安妇女中间。中央有一片空地，空地边上坐着二位乐师。其中一位正在拍打着一张简陋的鼓，另外一位手里拿一只长长的空心的黄葫芦，葫芦里面盛着一些豆子和碎石子，打在地上的时候，发出一种柔和的擦擦的声音。男人们浑身上下赤条条的，只在腰间系着一块布，头上戴着各种野兽的头骨。

站在中央的舞者，是一个胖胖的印第安人，打扮得和那两个乐师一模一样。腹部的脂肪遮住了系腰布的绳子，他转着圈子跳，穿过来，回过去。妇女们有的拍着手、有的低声哼着一种单调的曲子；有时候她们又用赞美的笑声和叹息来表示她们对于某一些特别美妙的舞步的欣赏。

我们移步到另外一个长而矮的屋顶底下，这里有两排男人，面对面地舞着。身上都只系着一块腰布，这是一种持久的舞蹈，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已经一连跳了十二个钟点或十四个钟点。不时有跳乏了的舞者退出行列去。支撑着屋顶中央的柱子上悬着一幅小小的圣母玛丽像，像的上方还有一个十字架。男人们就在这像前面跳舞，或进或退，一时交叉，一时对调地位。这些印第安人都是天主教徒，他们是在庆祝复活节；我们看到的这一种舞蹈，一直要继续到最后位舞者自动退出或者力竭倒地的时候才结束。只有男人才参加跳舞——宗教难道不是男人的工具吗？外面站着的一排排印第安妇人和女孩，都随

着那古怪的音乐的节奏摇来摆去，嘴里还一面低低地哼着一种没有词句的调子。

“这正和我们自己的宗教一样合理，”迦琳对诺德说，“不过把圣母玛丽和十字架挂在中间总有点古怪。”

诺德露出他的金牙笑了一笑，“唉，我宁肯跳这样的舞，也不愿意去跪拜，……这要健康得多，有乐趣得多了。”

我站在他们背后，看他们记着笔记，谈论着一些对我完全是外行的事情。他们之间相互的爱、友情和理解是那么深切那么美……我想知道爱情能不能是美丽而且自由的……人究竟能不能一面温柔一面仍旧保持坚强？妇女究竟能不能一面享受爱情，一面又不致受到威胁，或向人屈服？

光明……观念……思想。可是我的道路上仍是障碍重重。我回到学校以后，久久地思索我这前后左右都没有出路的生活。我要打破一切障碍……工作、金钱、学习！

我已经做了六个月的学生，那些在校多年的学生，尽管他们如何羡慕我所获得的荣誉，也是枉然。接着，大个子柏克不再寄钱来了，他来信说，他答应接济我六个月，现在已经到期了，他希望我独立谋生；他从我去信上得知我不打算再回克里富顿去。所以他和柏拉开决定到墨西哥去为那里的革命做点事；假如他活着，他会写信来……如果没有信来，那就永别了！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我挣扎着一面读书，一面赚钱养活自己——打字、给宿舍里擦地板、做一切我所能找到的工作。我只在深夜里才有功夫做功课，可是那时我已经十分疲倦，什么也读不进去了。我尽管

努力工作，但总不够开支。

这一个学年还有一个月就要结束了，我的这一个愿望也和其他许多愿望一样落了空，我离开学校到费匿克斯去找工作。诺德和迦琳听了我的叙述，都笑我不应如此苦闷；他们认为学校并不一定使人能学会一切——反而常常还会引人误入歧途，毁灭人的聪明才智。但是他们的话对我毫无意义……他们自己立足在坚实的知识上面，他们站在很高的地方，自然能说风凉话。

我找到了工作，但是不满现状的痛苦日夜折磨着我。再也没有继续读书的可能了。诺德和迦琳正要动身到旧金山去，不再回来。仅有的一点朦胧的光明模糊了，我愈发感到寂寞了。

他们临走前的一个月明寂静的夜里，诺德和我两人骑着马走过小桥，穿过市郊，沿着通向沙漠的白色的坚硬的道路并辔而行。不知什么东西触怒了我的马，它不服我的调度，在凉爽的夜气里拚命奔跑。我感到座下的马身颠得特别厉害，我忆及我一向都对马匹怀着一种畏惧——即使骑在马上，也还是害怕，这一下更是害怕得忘了一切。我在绝望中回头去喊诺德，我的马意识到我的恐惧，更拚命地往前冲。诺德慌慌张张地回答了我的呼叫，他不顾死活夹着他的坐骑朝我的马头赶上来。我们两人的马并头跑着，风吹散了他的头发，露出高高的苍白的前额。他把身子从马脖子上伸过来，用手抓住我的缰绳，死劲一拉，把我的马制服了。我那匹野马疯狂地吐着白沫，直立起来打了几个旋，我连忙跳到地上。我的腿发抖，已经没有一点力气，只得倒在一团艾草的阴影里。诺德在一边把那两匹马稳下来，拴在矮树上，他的声音像在远方。不一会我听见他急

促的脚步朝我走来。他弯下腰来，我伸出手去抱他的胳膊……他浑身的肌肉都在颤动！他在我身边跪下来，把手臂抱着我，我靠在他柔软的白衬衫上，感到他的心房在砰砰地跳动。他对我说出于天性的事情，情不自禁的事情……悄悄地，好象怕寂寞的荒漠会来窃听。在他那极度温柔的接触之下，我的身体和心灵全都感到无限的宁静……他的嘴唇的温柔的抚慰，就象月光倾泻在平静的水面上一样。

六

爱情是什么？我想了又想，是我幼年读过的童话与后来读过的小说的一种五色缤纷的混合体，一件可爱的而又犯禁的事情。可是这种犯禁的事情又和另外一种犯禁的感情——性——丝毫没有关联。爱情中没有性的地位。性的含义是强奸，是结婚，是卖淫，而结婚的含义就是生孩子，女人哭诉，男人抱怨；性的含义就是不幸，也就是一切我所畏惧、厌恶、立意要逃避的那些事情。

自从我认识诺德以后，这个念头时常涌上我的心坎。我羞于承认在自己粗犷的外表下隐藏着对于爱、柔情和友谊的渴望。我还不到十九岁，身体和感情都还没有完全成熟。我想得少，做得多。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性的畏惧也更加厉害。我每逢听到人们谈起“处女”以及所谓妇女的“贞操”的时候，就有强烈的反感。男人用这种标准来衡量妇女，我一向认为是种侮辱。

我痛恨婚姻，我想，我宁肯去做娼妓，也不愿嫁给别人做妻子。这样还能保护自己，养活自己，尊重自己，保存一些人身上的权力。我寻思，娼妓是不会生孩子的，男人不敢打她们；她们也不必对谁屈服。已婚妇女之所以“体面”，似乎就在于她们承认自己的卑贱和接受丈夫的奴役。男人是不喜欢自由的有思想的妇女的。男人在结婚前和女人发生了关系，谁也不认为是过错——不过是“风流浪荡”而已。从来没有谁谈起“堕落的男人”，也没有人说哪个男人“走错了路”或“受了糟蹋”。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女人呢？我知道理由在哪里！妇女要依靠男人才能生活；一个能够永远自己谋生的女子，就能和男子一样独立自由。这就是人们不非难男人的道理。

我独自在费匿克斯城细细地想着这些事。诺德和迦琳都到旧金山去了。他们使我觉得渺小——他们都受过高深的教育，都是漂亮而又聪明的人！为生活发愁，挨饿的事，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过。诺德给我来信，要我到旧金山去和他们住在一道。他信上也写到了爱情，也说到结婚，但是他所写的与我脑子里所想的结婚完全不同。

他的信上说：“我没有钱，但是我爱你。假如你和我结婚，我们就得过苦日子。可是我们都年轻，我们可以做工，可以读书。”

我很清楚，我要是结婚就能得到一个亲密的伴侣，一面仍旧自己谋生。爱情……我不懂得什么叫爱情。是的，我很寂寞，我惧怕漂流不定的生活和无知。诺德谈到爱情，也谈到工作和学习。我所期望的事情他一身都兼备了。对于性和孩子的恐惧仍旧是我前途的障碍。我决定先到他和迦琳那里去了再说。即

使我不和他结婚，跟他和迦琳住在一块也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我可以通过他们认识另外一个世界。他们具有我所不知道的一种独立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不是从书本上得来的。在我看来，他们仿佛能够随时随地创造出各种思想，这当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记得在费匿克斯时，他们第一次带我去看思想剧的时候，我是多么惊讶。那天演的戏叫《十二镑钱》^①。我们坐在楼座里。诺德和迦琳都看得入了迷。我却感到乏味得要死，只是因为他们听得如此出神，我才相信台上的表演是很重要的。舞台上没有热闹的场面，没有木屐舞，没有响亮的音乐和笑声，没有粗鲁的打诨、鲜艳的服装和夸张的表情，因此我一点也看不懂，我看着台上的人们象平常一样的动作，谈论着抽象的思想，感到很不惯。这个剧本似乎是在演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她积蓄了一些钱，想买一架打字机，借此自己谋生。这样的蠢事有什么值得写成剧本！这种思想本身就无法使我不打瞌睡。我知道迦琳和诺德就是生活在这样抽象的世界里的，但是这种思想在我看来非常自然，我不懂得为什么要把它编成剧本。

我正收拾好行李准备到旧金山去找他们，忽然收到了我弟弟乔治的一封信，我读了这封信，心都碎了，费了许多心血才造成的遗忘的帷幔裂成了一片片。我们在特立尼达分手以后，乔治只给我写过一次信。我手里现在拿的这封信，等于是对我的一纸控诉状。我一遍两遍地读，我不肯相信信上所说的事。信上对我控诉：一年前父亲把这两个孩子送到俄克拉荷马州的

^① “十二镑钱”是苏格兰戏剧家詹姆斯·巴里（James Barrie, 1860—1937）写的一个剧本。

一个农场上去“长大成人”。信上对我控诉：他们落到了一个残暴的农场主手里，任凭他摆布。信上对我控诉：他们没有去上学，却象畜生一样从清早工作到晚上。信上对我控诉：那个农场主有一次把丹打得皮破血流。

这便是对我的控诉状，而我却打算到旧金山去过好日子！

我收到这封信已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但是时间无论如何医治不了这个痛苦的记忆。我若要祈求慰借和庇护，一向都到沙漠里而不到上帝面前去，我于是仍旧走向沙漠。我找到了那个月明星稀的晚上诺德向我吐露爱情时我们骑马走过的那条幽静的小路。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走过去，我也随着时间愈走愈远，向前走去。悲痛过分，反而宁静了。荒漠上没有一息生意，没有一头灰鸟在寂寞中啼叫，没有一丝微风摇曳着艾草；天空中没有一颗俯视大地的星星。但是我那被人打伤的弟弟却始终在我面前的沙漠里走动——衬衫撕破了，背脊上满是血迹斑斑的创痕。我向荒漠的右边望——他在我眼前移动；我把眼光转向一株张臂向天的巨大的仙人球——他也在那个方向走动。我走，他就走在我面前。他变成了暗夜里一个鲜血淋漓的创痕；他变成了我心上的一条创痕。多少年来，他始终是我记忆里的一条创痕。沙漠固然能掩埋一切感情、一切痛苦和一切欲念，但是沙漠掩埋不了这一条创痕。

夜渐渐深了，我转身循着原路回去。黎明的时候我回到了家里。我应该走哪一条路？——向东呢？还是向西？我怎么能够把我的一生消磨在平原上那所倾颓的木屋里，受我所憎恶的父亲的供养？这样做去，我有什么前途——我会老去，我会失望，会抛弃我求学的进取心；我不得不为我兄弟的饮食衣着操

心——用谁的钱呢？……我到那里挣不到钱；他们也挣不到钱。我徒然给他们增加一张吃饭的嘴而已。

我取出诺德的信放在乔治的来信旁边。生活是艰苦的，生活也给了我不少严厉的教训。我不愿意再回到我已经离开了的地方——我要不停的学习，学习到我能挣足够的钱，把我的兄弟接出来，送他们去读书为止。

我于是写了三封信：一封给我父亲，责备他做得不对，要他把我的兄弟接到身边，照顾他们，送他们去上学；一封给乔治，把我所有的现款寄给他，叫他带着丹到父亲那里去；最后一封是给那个农场主的——尽情地发泻了我的仇恨。我写道，他把我兄弟幼小的身体打得皮破血流，他把我的兄弟当牲口使用。我暂时不能去，因为我没有路费——但是我有时间，我总有一天会去。我永远不会忘记，即使我变成了一个老太婆，仍旧有我亲手弄死他的一天。

我走出去把这三封信发了，在那条又直又长的大路的东方，沙漠上正露出最初的微光。前面不知什么地方——小灰鸟在晨曦中啾啾。

我在旧金山见到诺德和迦琳的时候，山上的橡树叶正在变红。我们三人同住在一个公寓里，而且都找到了工作。诺德和我商量结婚的事。

“无论怎样，我不要生孩子，诺德。”

“我也不要——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不要孩子。”

“我是永远不要——世界上的孩子够多了。而且我还要照

顾我的弟妹们。”

“好——在这点上我们是一致的。”

“我也不要有家，不烧饭，不洗衣裳，不擦地板。我负担自己的生活，你负担你自己的。”

“这一点我们的意见也一致。我赚到足够的钱以后，就要另外换一种工作——我不喜欢现在的工作。”

我忖度我这一次结婚将和一般人的结婚不同，但是诺德并不知道我心里已经中了多么深的毒。我当真以为没有性的关系的婚姻是可能的——一种浪漫的友谊，两个人一块儿工作，保持着朋友的关系。我们仍旧迟疑不决。后来，诺德接到通知说，要派他出差到南边的沙漠地区去工作几个月。起程的那一天，他到我做事的办公室来看我，我们便决定一块儿去吃午饭，然后我再陪他到火车站去。我们路过市政府时，他回头对我说：

“我们这就进去领一张结婚证书好不好？”

这不过是两分钟和两块钱的事。我坚持要付一半。我们做了这样胆大妄为的事，自己也不禁失笑；迦琳不知道会多么惊讶呢！我们刚走到外面的街道上，诺德忽然又站住了：

“我说，我们为什么不再上去，干脆把结婚手续也给办了
呢？”

电梯司机上下打量了我们一番，一声不响地把电梯在第二层楼上停了下来，自作聪明地给我们指路道：“右边第三个门，”我们两人立时都觉得象是受了侮辱，他居然看穿了我们是来干什么的——难道我们的心事都摆在脸上了吗？我们怯生生地踏进靠右边的第三个门。一个穿着衬衫、满头大汗的矮胖子正坐在那里翻阅着几本簿子，忙个不休。

他抬起眼来望了一下，不待我们说明来意就先开口道：“请稍等一下。”转眼间他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哦，我想，我们还需要一个公证人哩！”于是他打开一扇通内室的门，提高嗓子对一个不知什么人喊了一声。不到几秒钟，出来了另外一个跟他一样矮矮胖胖，满头大汗的人，也没有穿上衣。

这人一看见这情况马上明白了，惊呼了一声：“喔唷，我想我得去把上衣穿上，”原先的那个小办事员觉得自己也应该穿上外衣，于是赶快把挂在写字桌旁的钉子上的一件旧的油光光的黑驼毛上衣拿来披在身上。

我们大家都站着——矮小的公证人拚命把腰杆挺直，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神气；那办事员的面上油光光的。他检查了一下我们的结婚证书。

“好罢，”他望着诺德随口问道，“你愿意娶这个女人做你的妻子吗？”

诺德和我惊讶地互相望了一眼——这未免来得太突然。我们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

“怎么啦？”办事员惊讶地问道。

“这未免有点突然，”诺德解释道。

“突然！你们难道连自己究竟要不要结婚都不知道吗？”

“哦！不，当然要结婚，不过，你这样一问显得有一点儿突然。”

“天啊，你呀！你要我怎么办呢？让我给你跳草裙舞吗？”

诺德纵声大笑起来：“你这想法倒也不错。”

等诺德重新恢复了肃严的态度以后，这小胖子又重新问

道：

“你愿意娶这个女人做你的妻子吗？”

“愿意！”诺德答道，喉咙里带有一种可笑的咕噜的声音。

这小伙子庄严地转过来对着我，“你愿意嫁给这个男人认他做你的丈夫吗？”

噫呀！为什么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呢？猝然间我自己也拿不定我究竟愿意不愿意！这情况多么尴尬呀！我以前也常常遇到这种尴尬的情况，可是我总知道只要转一个弯就能太平无事——我从来没有完全气馁过。可是这里却是一堵空墙，没有可以转弯的地方！我要结婚的决心消失了，我感到一切都完了，就象母亲临死时我体验到的那种一切都完了的感觉。

诺德在我耳边催促：“回答愿意，你只要说一声愿意，我们就可以离开这里。”

那个流汗的矮个儿依然庄严地瞅着我说：“别着慌，一天到晚都有人来办这个手续。好罢——你愿意嫁给这个男人认他做你的丈夫吗？”

“我想我是愿意的。”——这是我自己的声音吗？就这样使我成了别人的妻子。

法律所规定的手续已经办完了，可是这矮小的人似乎认为应当让我们更深刻的记住这神圣的场合。他不喜欢诺德脸上和声音里的那种忍不住要笑的神情，也许他爱空想，也许他罗罗唆唆，有意麻烦，总之，他转过去又对诺德问了一个问题——我现在知道这个问题是他编出来的；但当时却给我印象很深：

“不论晴天阴天，不论惊风骇浪，你都愿意和这个女子同甘

苦共患难吗？”

他认为这样就能束缚住我们了！

“我愿意。”诺德竭力控制住自己的声音应道。我不懂他为什么觉得可笑，这个问题听来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尤其是“同甘苦共患难”那几个我第一次听到的字，这几个字里仿佛回荡着一种非常可疑的声音——好象和性有关系的样子。

“那么——不论晴天阴天，不论惊风骇浪，你都愿意和这个男子同甘苦共患难吗？”

他也用这几个字来问我！横竖我和诺德已经获得了协议，决不生孩子，所以我在这里说的话并无足轻重。我便同意了。

“你们有戒指吗？”

“不，我们不相信戒指，”我见诺德当面把一个政府的办事员驳了回去，得意地把下巴颏儿抬得高高的。

“那就不用戒指罢，礼成了。请你付五块钱。”

诺德付一半，我付一半——我要从一开始就照章办事。我不能要他替我付结婚费，让他觉得我是属于他的。他看着他节省下来的两块半钱笑道：

“我可以用这钱在火车上饱餐一顿。”这小办事员在一旁看见我们二人之间把帐分得这样清，便露出满脸诧异不以为然的樣子。

我们留下了姓名和住址，矮小的公证人也签了名，办事员赶快脱下他的驼呢上衣，把它仍旧挂在写字台旁的钉子上，又回去弄他的那几本簿子，一面懒洋洋地抬起头来告诉我们按照规矩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到萨克拉蒙陀去领取证书。

他对诺德说：“下次到这里来的时候，要作好准备，结婚

是件严肃的事。”

诺德和我走到街上，站定下来，你瞅着我，我瞅着你，我大声说道：“他长得象个癞蛤蟆。”

“他挣钱真便当——一举手就是五块钱呢，”诺德回答，“一起头他使我狼狈极了。”

“我真想回去要回我们的钱，叫他把我们的名字勾掉。”

“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现在是合法的夫妻了。”

“我们这个婚结得真快，我觉得不免有点可笑，你说是吗？一点儿也不自然。”

“我们饱餐一顿之后，就会觉得自然的……来，找一个有音乐的地方，然后我就去赶火车。”

我们走到一家响着音乐的饭馆门前。我说音乐不好，象教堂里的音乐。诺德说，胡说，那是华格纳的“巡礼大合唱”。华格纳是谁，什么叫“巡礼大合唱，”对于我都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相信诺德，因为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于是我们便走进这家饭馆，象他所说的去饱餐一顿。

迦琳跟她的一位男朋友鲍勃带我去参观一次社会主义者的野餐。鲍勃是个律师，又是个社会主义者。黑眼睛黑头发，每逢谈到他的主义，总是慷慨激昂，一步不让人。

我们去到旧金山郊外的一个树林里。宽敞的空地上，竖起了一个旋转木马。另外有一个射击厅，几个廉价的杂货棚和一个不象样的跳舞场。我跟着他们走在这些男人女人大人小孩中间，心里泛起一阵厌恶。他们都是这么难看，一脸傻相，无精打采，打扮得又是这么俗气——这些都是我一向所熟悉而又厌恶的。旋转木马机还一面播送出一首流行的歌曲，不远的地方有

一位穿衬衫的演说家站在台上对一群男女哇啦哇啦地演讲，他们一面听，一面嚼着花生米和玉米花。有时候他的声音盖过了旋转木马机的声音，有时候旋转木马机的声音又盖过了他的声音。

“你干什么带我们到这里来？”我对鲍勃提出抗议。“看这些人！又丑又俗气！”

鲍勃转过来目光炯炯地看着我，“是的，他们是又丑又俗气！可是他们为什么会又丑又俗气呢？好好的想想罢——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反问道：“你说为什么？”

“制度！”

我没有回答。我不知道他所谓的制度究竟是指什么。但是他用极大的愤慨迸发出来的那句话——“为什么他们会变成这样？”却在我心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在后来的许多年里，我曾经无数次的忆及这句话。

在南方的沙漠里，以珂罗那朵河为起点，正在开凿一条泛美运河。诺德在出发去那里之前，又回到旧金山来了。我不愿意同他一道去——留在城里能够多挣些钱，离学校也近一点。迦琳已经要动身到纽约去了，临走前，她把心里的话都兜底对我说了。她说，我嫁给她的兄弟却又不和他同居作他的妻子，我自己当傻瓜不算，而且连累了她弟弟。我听了这话很气愤，我对她说，诺德和我在婚前就同意不生孩子。她对于我的无知表示非常惊讶。我说，假如诺德想享受别人那样的结婚生活，他可以提出离婚呀。她固执地说，你如果爱一个男人，就得跟着

他，那怕是到荒漠里去。我回答说，这种爱情是女人的敌人，更无疑是我的敌人。我的生活的目的是读书；不是跟在一个男人后面跑。她说我一点不懂爱情。我的回答是：“谢天谢地我不懂！”

诺德出去了八个月，他回来的时候，我冷冷地把我和他姊姊的争论全部讲给他听，我对他说，如果结了婚真得象迦琳说的那样，那我就不想结婚。他连忙高声说，自然，自然，我一点不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有权利照自己的想法生活。他既然为了袒护我连敬爱的姊姊也可以反对，我也就不再生他的气，我忽然间觉得我和他二人之间分外亲近了。

“诺德——你那里有没有机会能够弄到足够的钱，回学校去读书？”

他伸出手臂搂着我说，沙漠里有一个小镇，也许辛勤一年，我们两人就都能赚到足够的钱回学校去。比在旧金山赚得多。他又说，他到沙漠里去时，我还可以留在镇上做工。

我跟他去了，他是如此温柔多情，他做梦也没有想过男子除了平等地对待女子以外，还能怎么样地对待女子；他的心里只有善良的意念。然而这样一个好人却被命运注定要收获那乖戾畸形的社会在我身上播下的苦种。在我俩后来共同生活的几个月里，他常常地痛苦地站在我面前发楞。因为，在南方我们开始了我一向畏惧的性的关系！诺德很年轻，和我一样的无知。这种关系一点也不美——至少我不觉得有什么美——而且我还时时担心着会有孩子，会受穷，——更担心会失去读书的机会。还有碧儿崔丽斯和乔治——我要是有了孩子，他们怎样办呢！

有时候，我会毫没来由地恼恨起诺德来。人们都叫我“拉逊太太”，仿佛玛丽·罗泽士已经从大地上消失了，我至多不过是诺德的一个附属品而已。他们这样叫我就象是骂我。周围的一切更加强了我这种感觉。我们住的公寓房间隔壁住着一对年轻的新婚夫妇。那女的结了婚便不再做工，整天坐在家里等她丈夫回来。他们过的完全是性的生活。不到两三个月，她的嘴角上和面颊上都开始现出癍痕——同住在这公寓里的人都知道这是什么病。她怀孕了，但是结了婚的人害梅毒算不了什么不体面的事。我对诺德说道。

我对他预言道，——他是一心一意想为我扫除生活里的痛苦的——“你看吧，他就要打她了。她现在再也不能自己谋生了，她得了这种病，没有谁再会要她。她是他的妻子，他一定会打她的！”

诺德站在那里向窗外凝望，脸上痛苦地抽搐着。从此，每当隔壁房间里发出一点声息，他就紧张地竖起耳朵来听。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不在家。我听见隔壁房间里那个妇女尖声号叫，又听见两下拳头打在人身上的声音和一张椅子或桌子翻倒的声音。妻子的哭声——还有比这更沉痛的吗？

两天以后，他第二次打她，她跑到过道里嚶嚶地哭泣。诺德回家时，我把这事告诉了他。谁也不敢去劝阻，——她是这个男人的妻子呀。我对于男人、对于婚姻、对于诺德，以及对于我自己的婚姻，都感到强烈的不满，有时候竟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我一听见隔壁房里男人和女人的声息，就气得忘了一切，我压抑不住一阵阵猛烈的感情的爆发。

有一天，诺德终于喊道：“玛丽，假如你再说这样的话，

我早晚会自杀的！”

我还是照样说这些事情。有一次他气倒在地板上，头碰在椅子上。我惊惶失措地把他搀起来，扶他躺在床上。

“你真是一个冷酷的女人，我还是死了算了！”

“你为什么不跟我离婚呢？——我不会反对的！”

“可是……我爱你呀。”

“爱，这不是理由。这只是怯懦！”

“玛丽，看上帝份上——不要这样罢！”

他的天性是如此善良，如此高尚，我为什么要这样的伤害他呢？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心不知被什么东西深深地刺伤了，——这东西象钢铁一样坚硬，像刀锋一样锐利。我现在知道，我的斗争并不是针对诺德，我自身受到的痛苦远超过我使他所受到的痛苦。我自己的内心正在进行着一场无情的战斗，一方是我对于爱情的需要与追求，另一方是从我吸入第一口空气时就开始铭刻在我心中的对于爱情与性的不正确的观念。

后来诺德被派到沙漠地带去了，这一去要好几个月。我留在沙漠边缘上的爱尔圣特罗小镇上。这儿约有一百幢房屋，人们都蜂拥前来抢占运河沿线的土地。木板搭的膳宿所多得如雨后春笋，房租是惊人地昂贵。这里的土壤异常肥沃——这一片辽阔的沙漠原野在海平面以下，许多年代以前原是一个大潮或海洋的底。它以前所缺的只是水，而水现在正在来到。这里气候酷热——低于海平面，所以热得难耐，在荫凉的地方，有时候也达到一百二十度——而荫凉的地方差不多可说绝无仅有！沙漠里刮来一阵阵热风，西面的塞拉山挡住了海洋上的凉风和雨水。

我在镇上唯一的一家旅馆里替人代打书信，坐在接待室里为那些从洛杉矶蜂拥而来的地产商人誉写商业信件——他们都是些饿鹰似的大腹贾，他们投机倒把，收买大片的土地，再高价卖给那些需要土地的穷人，穷人就得把生命都抵押了才买到手。这些鹰一面对我口述信件，一面朝着许多旁观的人嚷道：打一封信要十分钱，未免太贵了。除了花十分钱打一封信，还有无数人愿意给我机会赚更多的钱。一天，一个褐眼睛的叼着一支雪茄烟的财迷跑来一屁股坐在我的办公桌旁边，把汗水淋漓的银元般的脸上的毡帽往后推了一推，双手插在袋里，和我谈起“买卖”来。

我的冷淡的答话激怒了他，他最后问道：“你到底讨多少价钱？你不要以为你是这里唯一的货色，就漫天要价。我出的价钱从来没有超过五块钱一夜。我住九号房间。假如你认为我给的价钱合适，我在那里等你。”

另外一个和洛杉矶一家报馆有关的地产商人，却装出一个乐善好施的面孔。他愿意雇我当他报纸的通讯员——只有一项附带条件。

他堆出一脸自以为乐善好施的笑容对我说：“你可不能不劳而获，”这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而且也合于我的愿望。我们于是开始讨价还价。

“不能考虑什么附带条件，”我说，“不过我允许你从我写文章得来的钱里抽取百分之几。”——我现在也学会用百分比来讲价钱。他还是坚持他的条件。

“你是个结了婚的女人，丈夫不在家；我是个结了婚的男人，妻子也不在这里。你并不象是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

你倘使从各方面仔细想一想，你在这件事上获得的好处比我还要多哩。”

过了几天，他又提起这个问题。我告诉他：“我的条件仍然不变，不考虑那件事，只考虑付给你百分之几。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我们就这样谈妥了——他可以从我全部收入里抽取百分之二十，他有权查我的帐；他警告我不要捣鬼，否则他有办法使我失掉这件工作。

这样，我便踏入了新闻界。他时常给我指点一些写消息的门路，可是总不忘记加上一句话，“这些指点自然都是不要我付钱的”。我不知道他对于这些白给我的指点是不是记了帐。

“工作，金钱，学校，——工作，金钱，学校！”就象一首管弦乐曲的主旋律一样，在我脑里转来转去。我只把一半的时间用在旅馆里，而且每封信的价钱也涨到了两角钱。

那些鹰说：“该死的敲诈。”

我对他们答道：“我并不恳求你们给我工作。”

诺德回家来了，他晒得象一张褐色的皮革。他住了一个星期，就又回去了。我已经攒了一些钱，我们的前途很光明。一年以后，我们就有足够的钱，离开这片沙漠到别的地方去上学了。

接着，我感到有些不对——这件事竟然盖过了“工作，金钱，学校”的音乐声。我对老板娘说，我每天早上都有点不舒服。她哈哈大笑。在她眼里，性的关系和生孩子都是极好的猥亵的笑料。

“你已经有孕了！”

她话还没有说完，我已经转身走开。恐惧、痛苦和悔恨已经有几星期不来干扰我，这一来又象狂风暴雨一般卷土重来。一切希望都风流云散了——我眼看自己又重新沉沦在我拚命想挣脱的地狱里面——这地狱里尽是一些哭哭啼啼、苦苦哀求的妇女，我只好倚赖丈夫生活，再也不要想去读书了。我想到孩子便满怀恼恨。

我高声对房东太太喊道：“我决不要孩子！”仿佛她对于我的怀孕应当负责，“我决不要。我情愿自杀……告诉我该怎么办！”

我发疯似的骑马在沙漠里狂奔，跳下马来乱跑，直跑到筋疲力竭。一路哭一路恨，一路恨一路哭。可是每天早上还是那么难受。我开始绝食，我无知地认为这样我腹内的冤家就不会继续生长。在弹子房楼上开设诊疗所的医生对我说，他无法给我任何帮助——这是不合法的；他又口头交代我，叫我到药店里去买一种什么药。他说，如果事情弄糟了，我可以去叫他，他就可以合法地完成这项手术。

“这要多少钱？”

“我为你特别减价，只要一百块钱。”

这是我的全部储蓄！然而到底比把孩子养下来要便宜。我把十块钱诊疗费付给了他，回来时在药房里停了一下。可怜我连自己身体的构造都不知道。我怀着一种莫名的恐惧想偷偷地把它弄清楚。我没有办法——我心乱如麻，六神无主。我对于自己的身体的作用、性质和对于一个生长中的生命的性质和妊娠的过程，一点儿都不懂。

“这是你的过错，”末了，我给诺德写了一封信。“请你

回来把我拯救出来，否则我要自杀了。”

过了好几天，总没有回信。一天晚上，我故意伏在浴盆里把脸埋在水中，可总是坚持不了很久。老板娘听见水的泼溅声和我咳咳呛呛的声音，赶忙跑进来把我从浴盆里拖了出来。

诺德终于来了——他在路上走了好几天。他跑去对医生说：“倘若你不给她动手术，我们就要到城里去动手术了。如果你不想什么办法，不出一个星期，我的妻子就要自杀。”

医生慎重其事地检查了我的肺部和心脏说道，——正如他所料到的——我有肺结核症，手术是必要的，生产对于我是最危险不过的了。

我苏醒过来的时候，诺德正笑眯眯地坐在我床边。我躺在那里注视着他，我恨他的笑脸——我恨，我恨，我恨！我的身体上还有一个没有复原的伤口，我曾经面临着死亡，他怎么还胆敢微笑……从我的身体里刚刚取出一个胎儿，他怎么胆敢微笑……我在这茫茫的空间感到寂寞无依，他怎么敢笑……他，怎么敢……他，是一个男人，他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懂！

我所有的钱都用光了，诺德也回到沙漠上去了。我不肯让他付这笔手术费用……这是我的身体，我说我不能让别人为我的身体化钱，他听了这话，面色变得异常苍白。

我听人说山背后有一个师范学校，我便写信去问他们能不能容许我半工半读。过了一个月，回信来了，信上说我可以半工半读，我有可能挣到一些钱，但不十分够。我给诺德去了一

封信，“我现在走了，我不会再回来，你若是还想见我，就得到我所在的地方来。”

我在这个学校里度过了三个年头，三个不快活的年头。他们问我叫什么，我回说，玛丽·罗泽士。父亲做过医生？是的。已经死了？是的。丈夫呢？叫诺德·拉逊。

“那你也应当姓拉逊了！”他们诧异地说。

“我的名字是玛丽·罗泽士！”

“你不说你已经结过婚了吗？”

“是的，但是我出生的时候，姓罗泽士，将来我死的时候也仍旧姓罗泽士。”

“对不起，拉逊太太，你还是得姓拉逊。”

在我读书的三年中，这件事始终萦回在我心中。

有一次，一个老年的女教员曾对我表示同情，她说：“你是已经结了婚的妇人，原该有家庭，有儿女，你却还要自己谋生，真是可怜！”

我连忙掉转身子，她和我是站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彼此隔着一条鸿沟相望。她那时一定认为我是个不规矩的女人！可是我知道自己是个不愿意受奴役的女子。

又有一个教员问我能不能够设法把自己的外貌弄得整洁一点。假如我愿意到她家里去取一件衣裳的话，她愿意给我五分钱车钱。我也连忙掉转身子，她和我也只好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相望。

教员们都不安而好奇地注视我，他们觉得我做得不对。认为我是个粗野不文、不识抬举、硬心肠的女孩。他们所以容忍

我，是因为我工作很努力。我是在战战兢兢的拚命工作，心理上负担着一种比饥饿或痛苦还要可怕的矛盾。我一连几小时地打字，只在跑去上课时才放下。在寄宿舍里，我服侍大家吃饭，来抵偿我自己的膳宿费。夜间，我埋头在书本里，一直读到头昏脑胀，才不得不停止，黑夜消耗了我的青春、我的健康，我的一切甜蜜和温情——一切少年时代的活跃的天性。我面前是一张即将到手的毕业文凭；然后我就能够去资助碧儿崔丽斯和乔治了。

正在这时，城里发生了一些骚动，有一位名叫艾玛·哥尔德曼的妇人预订要到这里来作一些关于社会问题剧的演讲，而城里的资本家却禁止举行这样的演讲。我问别人这妇人是什么人。有人对我说，她是一个可怕的家伙，一个寡廉鲜耻、胡说八道的长舌妇。一天，我看到一家书店里有人在讨论，便停下来听一听。参加讨论的人有书店的女主人、一位青年医生、一位曾经在我们学校里演奏过的音乐家和一位信仰社会主义的青年牧师。我从他们的话里知道艾玛·哥尔德曼是位著名的演说家和作家，一位保卫自由和正义的战士。他们正在为争取她演讲的权利而斗争。

她的演讲被禁止以后的好几天里，公众的情绪异常愤慨。资本家便带领着警察向那些要求言论自由的男女工人群众反扑。我对于任何一种理论都了解得很少，可是我都听着。言论自由的反对者很象我所知道的那些地产投机商人。工人们以及社会主义者说的话表达了我自己的感情和信仰。于是当资本家和警察向这些人进攻的时候，我也激动得行动起来，去帮助他们突破敌人的围击。监狱里关满了工人、社会主义者以及乘火

车从各地前来的世界产业工会^①会员，同时，还有不少知识分子。世界产业工会领导的、在加利福尼亚州持续了几个月之久的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坚信我们的行为是正当的，找寻一切机会参加进去。我听见我的朋友被人辱骂，看到他们被囚禁、被殴打，看见他们在街头集会时受到水龙的冲射。我没有被捕，但是这次斗争解放了我内心蕴藏着的火力。对于目前斗争的更深刻的意义，我理解得很少。我向来是一个先凭感情行事，然后再来思考的人。

在这次斗争中，我第一次遭到了警察的殴打。在我前面的一小群行人中，有两个警察在走路时故意去推一个双手插在口袋里很规矩地走着的工人。这一个警察一股劲儿的把他往另一个警察身上推，那一个警察便揪住他的领子，一面大嚷说他袭击维持治安的官吏，一面一拳把他打倒在人行道上。

“那是胡说，撒谎！”我惊惶地高声喊道，以为他们会听我的话。“是这个警察推他的……我亲眼看见他……他的两只手都插在口袋里。”

那两个警察已经扑在那人身上，在他仰着的面孔上一拳一拳地打，骇人的鲜血从他的眼眶里迸溅出来，一群群工人围上前去，我也夹在他们中间。我一个箭步蹦到那警察身上，狠命地扯他。忽然传来一阵叫喊声和跑步声，一队警察从街角那边跑步过来。一只蓝袖子的人猿似的胳膊从后面拦腰抱住我，把我举在空中，抛到足足十英尺以外的街心，我的手里紧紧捏着

^① 世界产业工会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是一九〇五年在芝加哥成立的一个美国工会组织，在美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曾对美国工人运动起过一定的作用，一九二四年自行解散。

一颗从警察制服上扯下来的钮扣。两个工人急忙把我搀起来跑开。我们躲在一家印刷所的过道里，看着那些警察握着警棍驱逐街道上的行人，把那些被打得睁不开眼睛鲜血淋漓的工人一把拉起来拖到警察局去——罪名是“袭击维持治安的官吏”。

我的妹妹碧儿崔丽斯来了，象我以前一样，离开了那荒僻的地方。这时我已经在学校里毕业，当了教员。我一领到第一个月的薪水，便写信叫碧儿崔丽斯来，我发现她身上的山野气息比我在任何时候都要浓厚——不是山野的壮丽，不是那种使人心旷神怡的雄伟，而是那种荒山野岭的生活对身体和心灵的断丧。她必须治眼疾、配眼镜，她修补牙齿花了好几个月的工夫，治疗她背脊上的旧伤。

我已经四年多没有看见她，现在她来了，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少女，沉默寡言、多疑善怒，她的皮肤和她所生长的土地一样褐黄。她是个颇长黝黑的女孩，乌黑的头发掠在脑后，露出美丽的前额，那两片嘴唇，本来是为欢笑而生的，然而却饱经了忧患，漆黑美丽的眼珠深处多么酷似那长眠在荒凉的坟穴里的母亲。

碧儿崔丽斯听不惯我那比较文雅的言谈，认为我想纠正自己的土语和方言是“附庸风雅”。她用一种轻蔑的沉默来表示她的不满。当她脱掉衣裳的时候，我看见她那棕色的胳膊粗大得象男人的胳膊，背脊上疤痕瘢瘕的皮肤下面也可以看出一条条的肌肉。我惊讶地瞪大眼睛瞧着她脱袜子。多少年以前，当她还是一个穿短裙的瘦高个儿细腿的小姑娘时，大个子柏克曾经装出一副慎重其事的面孔对她说：

“碧儿，你将来长大了，一定是个有名的歌唱家。”

“为什么呢？”她当时问道，以为他会继续恭维她。

他却回答道：“你的两条腿就跟夜莺的腿一样。”

但是这两条腿现在已经不再是夜莺的腿了。从脚踝直到大腿都是褐色的，布满了疮疤。其中一边完全没有肌肉，只剩下附在骨骼上的黑色的皮肤。她告诉我说，有一回她骑在一匹马身上，马把她抛在一片带刺的铅丝篱笆上，刮去了小腿上的一大块肉。伤口化了脓，他们那时在偏僻的牧场上——那里有许多壮丽威严的景色，可是没有医生——因此只好把腐肉割去，然后用热铁烙！她浑身上下都是一条条的疮疤，繁重的工作——洗衬衫、洗工作服——使她的双手变得又老又粗。她疲倦得要死，一心一意只想忘记牧场上的生活。

诺德丢下工作跑来看我们。他和碧儿崔丽斯两人互相上上下下的端详了一番。他走上来用手指轻轻地在碧儿崔丽斯的胳膊上捏了一下，问道：

“你难道真象你的外表那样有力吗？”

她用很敏捷的动作抓住他的手，他们两人认真地比了一下力气。不到几分钟，诺德已经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碧儿崔丽斯坐在他身上善意地劝告他：

“你要是不会吹喇叭，千万不要随便坐上乐队的车子。”

我对碧儿崔丽斯说，她最好去上学，她很不以为然的瞥了我一眼。她不想上学。我又建议，如果她感到寂寞，街对面有一家作坊，里面有一个男人带领着几个女学生在制造家具和乐器。她轻蔑地撇了撇嘴……乐器！……可是她忍不住偷偷地往街对面瞧。

她一天天地愈来愈烦躁。她问我，这里难道没有马吗？有的，可是要出钱才租得到。我很了解她的心情，于是说道：

“碧儿，我每月有一笔薪水。每个月底，我们两人把这一笔钱平分，每人负担一半生活费用，余下的可以随意花用。你就是把全城的马都骑死了，也没有关系，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用这钱买车票回到牧场上去。”

我们分了第一次钱以后，我便在一旁津津有味地观察。她既没有把她那份钱花在马身上，也没有去买车票离开这里。一天，她信步走到那家作坊里，东看看西望望。她仔细观察那些机件和工具，有时还拨弄一下。

“这是刨子。”教师解释道。

“哦！是刨子吗？”她轻蔑地反驳，“我是生长在平原上的。”^①

他再也不想对她作进一步的解释了。

她试了试那些学生们正在操作的墨西哥桃花心木材，看着他们刨木材、钉钉子，脸上露出不屑的神气。工具不是这样使用的！

于是，她开始做工了。她对我说：“我打算在那边试做几件东西。”她动手给我们租住的小屋子做家具。她做了几张桌子和几个书架，又做了几把椅子、几个衣架和几张矮凳。她挥动着棕色的长胳膊又锯又刨，把这些东西用砂皮磨光，刷上油漆。她使用铁鎚的神气，说明她认为一个不惧怕工具的人应该怎样使用铁鎚——不是扭扭捏捏的。她一面鎚着，自己感到很

^① 刨子 (plane) 和平原 (plain) 在英文中字音很相近，所以碧儿崔丽斯以为教师哄她。

痛快，根本不理睬这种声音对于别人的耳朵是不是太刺激。

一天，她报名去听英文课，接着她又说：“我想我应当学一点算术和几何，对我做木工有帮助。”隔了不久她又说：“我想我不妨试一下文学和历史，也不妨学学编篮子，作几个模型。”几个月以后，她又说：“瞧呀！我只要加把劲努力赶一赶，就可以把各种学科都学会了！”

她逐渐对学校 and 教师发生了感情。经过几个月，她变成了一个穿白运动衣的文雅的女学生。但是她仍旧保持着这样的观点：能力与价值，归根结蒂，是可以由体力来决定的。当别人向她挑衅的时候，她常常提议“把一只手绑在背后，在一块羚羊皮上”解决纠纷，较量高低。

可是她和我依旧是陌路人……这是由于我们天性不同和年龄的差别。她讨厌我这个人。在她看来，我的朋友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人”。说什么也无法拉动她去参加一个社会主义者的集会。后来，当大战震撼了全世界的时候，她却在这里面看到了一个奏着嘹亮的军乐、许多英俊的青年们“把一只手绑在背后，拿皮鞭抽挞这个世界”的庄严的行列，她遗憾的是妇女不能参加进去“解决一下”。

碧儿崔丽斯和我相处了一年之后，加利福尼亚大学向我打开了大门，接受我作一名学生。这个学期是十分宝贵的——暑期中短短的三个月。诺德来信说几天以后要到我们这里来。夏天里，我和碧儿走进两扇大铁门，站在校园里。这仿佛是揭开了童话的一页。经过了少年，吃了多少苦！我迷惘地感到这也许是一场梦。我居然成了大学生！

大学生的注册卡片竟捏在我手里了。碧儿崔丽斯也被接受为特别生。我们离开注册科急急忙忙地从一群男男女女中间挤出来，我的心里一软，几乎哭出来。我们穿过松林走到那荒凉肃穆的希腊剧场。头顶上，松树象是满怀愁绪地在叹息。可是松树不会比我有更多的愁怀。我难受是因为想起了乔治……明年我也许可能有足够的钱叫他来。我不知道碧儿崔丽斯在想什么——我猜到她的沉默底下总是隐藏着真挚的感情，但是这种感情的性质，我一点也不知道。

一星期一星期过去，我们两人以不竭的热情学习着，我常常瞥见她的黑油油的头急急忙忙地在校园里跑过。时间仿佛跟在我们的脚踵上追，可是新的力量涌出来推着我们继续前进。诺德来看我们，住在我们二人同住的公寓里。摆脱了我执教的学校里的那种压抑的空气，摆脱了繁重的工作，我的头脑变得和水晶一样的清澈坚强，我觉得好象插上了光明的羽翼向前飞去。

但是，即是在这个愉快的、友善的气氛当中，我也不能避免冲突。生育的恐惧依然象一头兀鹰一样在我头上威胁着我。叛逆的天性平静不下来。冲突的开端是因为有一天在人类学课堂上一个学生，不承认科学上并没有任何根据能证明黑人是低等民族。他说，有色人种生来是低等民族——你只消看他们一眼就可以知道了。在他背后，就有一个印度人的瘦削的黑面孔；离我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黑种女孩，在课堂的后排，还坐着一位印第安人。我于是站起来要求他对他的论点提出根据。

教授觉得这样的冲突十分有趣，他静静地听着，并不出来阻拦。

那学生诘问道：“你愿意嫁给黑人吗？”

我针锋相对地答道：“我情愿嫁给某些黑人而不愿意嫁给某些我所知道的白人！”

“喂！喂！”教授喊道，“让我们用科学的态度来讨论！”

走出课堂以后，诺德还和那个学生继续讨论了很久。诺德讲话很客气，那个学生却十分武断，他的头脑早已僵化了。我在校园里飞奔，恨不得把一株株树木连根拔起。回到家里，我便写了我的第一篇关于亚洲的论文——这篇论文叙述了当白种人还是野蛮人时，中国人对文明的贡献。

我的大学课程正在一帆风顺地前进……每天早晨我又开始呕吐起来。黑暗之翼的阴影愈来愈频繁地掠过我的心头。为什么单要女子来负起这个重担，而男子却自始至终都逍遥自在，这是多么不公平！

我环顾周围，想找寻一条出路。我向诺德提议，可不可以动一次手术使我永远不会怀孕？……他反对那么做……他说，会影响精神的。我觉得那样总比这样地挣扎恐惧要好些。没有医生肯帮忙——他们都说这是不合法的。我的体重日渐减轻，学习变成了累赘。我开始对诺德说起刻薄的话来——好象他的责任比我重似的。他是那么苍白，那么可怜！

我们打听到一位专门做这种秘密手术的医生。诺德有些担心，可是我们没有别的法子，还是去了。诊所在旧金山市内一条阔气的宽大的马路上，有许多靠干这一种行业发财的人都住在这条街上。我们在一间坐满了许多妇人的候诊室里等了两个小时——都是些中上人家的妇女，有年轻的也有中年的，有的

已做过母亲，有的还没有生过孩子。她们的衣饰都很讲究——唯有有钱的妇女才动得起这种手术。大约每隔十五分钟叫一个人进去，大门不断地启闭，总有人在出出进进。我觉得心里作呕，紧紧靠在诺德身上。

轮到我了，我们被引到里面的一间房间里。

诺德想把我抱到出租汽车上去。那看护却恶狠狠地命令说：“自己走！要不人们就会怀疑这所房子了！”可是我实在不能走。我们在码头旁边下了汽车，我使尽最后的一点力气走了一段路。对岸没有出租汽车，我们只好去乘电车。我勉强攀登上了车子，自己也不知道这种痛苦还能忍受多久。额角上冷汗如雨。我躺在一个座位上，伸出手去抓诺德的手。

“坐起来！人家都在看你了一——你愿意当众出丑吗？”他声色俱厉地说。

在他的呵责下，我坐了起来。我把头靠在窗户上，闭目养神。诺德生气了，他是个有教养的人，不能容忍我“当众出丑”。

“坐起来”这三个字和痛楚混合在一起，在我脑子里不断旋转。“坐起来……坐起来”，一阵阵的痛楚多么有节奏呀！我爬上我们公寓里那一截好象永远爬不完的扶梯，倒在床上，……“坐起来……坐起来”不断地在我滚烫的脑子里旋转，跟着血管里的血脉一齐跳动。

诺德又变得很温柔了。我却把脸扭过去朝着墙。我现在不需要他的体贴。他刚才是那样凶狠地命令我坐起来，我现在不要他对我体贴。

一切都完了。我以前对他那样残忍，可是他仅仅有一次对

我残忍，我却忘记不了。他用丈夫对待妻子的态度命令我——我不能让一个男人把我当作他的私有财产，随意命令。哪怕他当时是很激动的，我也不能原谅。

我回到了原来的学校，诺德仍旧留在大学里。我们交换了几封友好的信，决定离婚。我在信上写道，我们可以继续做朋友，但是我要离婚。我又说，他也许还打算再结婚，所以离婚的责任最好由我来负。既没有人会为我伤心，我也不想再结婚。

“责任由我来负好了，”我在信上接着写，“我本来应当负责。我不愿意过结婚的生活，结婚太可怕了，我原来就不应该结婚——过错在我，因为你是爱我的，而我却不懂得什么叫爱。此外，我还希望能恢复我自己的姓。”

他虽然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他爱我——到底向法院控诉我遗弃。我把他父母当初送给我们的银餐具还了给他。过了两星期，他寄来了一封最体贴的信，信上写道：

我们现在离婚了，你又成了玛丽·罗泽士。我坐在这里，金黄色的秋叶在我四周萧萧地落下，我感到非常忧愁。我曾经深深地爱过你。你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爱人，我想你也许就是我的最后一个爱人了。我们的婚姻失败了，无论如何是个无法挽回的失败。我们两人之间总有一些隔膜，而这种隔膜是我所不了解的。也许我太幼稚了。现在我们也许还能做朋友，我随时都准备帮助你，假如你需要，不妨让我知道，我一定帮助你。

我不敢细读这封信。我只是草草地看了一遍，唯恐这封信

会勾起我的心事，会使我重新渴望爱情。爱情是妇女的仇敌……我知道爱情是怎么一回事——假如我继续下去，一切就都完了，碧儿崔丽斯的教育、乔治的教育都完了。不！我不要听。

接着，理智又专横地操纵了我的感情，扯起了一幅压制和遗忘的幕帷，遮盖了我对于男女之间的爱情的渴望和柔情的需要。有时不免感到寂寞无依、愁绪万千。然而我总是把头一扬——这些都是弱者的行为。我又是一个自由的人了。玛丽·罗泽士是我的名字，天地是我的家，清风是我的伙伴。

有一位印度人要到我们学校来作关于他的祖国的演讲。董事会里有两个英国籍的人听见以后，便表示反对。我纳闷这是为什么，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印度是受英国统治的。如果这个印度人把他要讲的话先讲给董事会和教员们听，并且得到他们的同意的话，他就可以公开讲。

印度人来了——他是个高高的黑黑的老年人，面孔很瘦，目光炯炯。我当时正站在校门口的台阶上，他从我面前经过。不知为什么他使我觉得很悲哀。也许是因为他是个有色人种而又来到了一个以肤色衡量人的国家，否则就是因为他属于被统治的人们而且正受人侮辱。

一小时以后，会议室的大门重新打开了。一位青年教师和一位英国董事热烈地辩论着走出门来。

“这人是个煽动者！”董事脸红脖子粗地愤愤地喊道。

“他的演讲不过是为了争取祖国的自由，”青年教师答道，“我们也为争取我们祖国的自由讲过同样的话……事实上，

我们还为祖国战斗过，而我们却认为自己是爱国者！”

“他是一个叛徒！一个叛徒！”

“叛徒？”教师惊讶地问道，“是谁的叛徒呢！英国人的——可不是他的同胞的叛徒！”

这样说来！这位印度人的演讲是为了争取祖国的自由了！那他必定是正确的。门又开了，他独自一个人走出来，不象别的演讲者那样有人陪着，也没有人跟他握手——因为教师们都畏惧董事会。他的脸上有一种很奇怪的神情，于是我心里又感到一阵悲哀。他从我面前走过，踏下了台阶。我象一个影子一般跟上去……如果我开口讲话，他可能会误解……可是我们已经走到台阶底下，他马上就要离开了。我加快脚步跑到他身边。

“他们不让我进去听你的演讲，但是我听见一位教师说，你的演讲是为了争取祖国的自由。我很遗憾没有能听到你的讲话。”

他对我望了一望，我知道，在他眼里，我不过是我的同胞中的一个——一个古怪的说蠢话的美国女子。他十分拘谨地简短地答复了我两句，但是他的悲愁的腔调却深深打动了。我。

“你既然这样感兴趣，请把你的姓名和地址留给我，我可以寄点东西给你看。”

我刚把姓名地址写完，就听见有人从台阶上走下来，停在我身边。我回转身来看见那个英国董事。他瞥了我们两人一眼，又瞟了一下我正在上面写字的记事本，连头都没有点一下，径自走了过去。

校长斩钉截铁、正言厉色地对我说道：“你自然也知道，你不能再在这个学校里呆下去了。你的思想、你的态度、你的行为都于这里的青年男女不合宜。你必须另找工作——我们希望越快越好！”

女生部主任也站在一边，竭力使自己温柔的本性显得严厉，她也斩钉截铁地说：“请容许我说，为了你妹妹的缘故，你最好离开这里到别处去……请不要难受，但是……你对她有一种不良的影响。”

他们告诉我说，我有许多不对的地方。他们探听出我是个社会主义者；有人在城里看见我和一群男人在一起；我容许女学生阅读不正当的书籍，如爱伦·凯的《爱情与婚姻》^①，还有许多别的事。

“亲爱的，”女生部主任恳切地说，“你知道吗？若是你仔细研究一下社会主义运动，你就会发现他们是信奉……信奉……公妻制度的。”

“他们也许信奉公妻制度，可是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却是实行公妻制度的！”——我居然在下城区学会了反唇相讥。

“够了！”校长插嘴说，他是共和党。

我跑回去痛哭了一场。我不懂我有什么不对。对我心爱的妹妹有什么不良的影响！然而碧儿崔丽斯也在责备我，用沉默来责备我。也许这没有什么关系！也许到了别的地方……在那边……就会好起来的。

火车缓缓地开进但维尔的站台，我从车上下来。海伦穿着

^① 爱伦·凯 (Ellen Key, 1849—1926) 瑞典女权运动者，著有《恋爱与伦理》、《妇女道德观》等书。

一身黑皮衣裳戴着黑皮帽子嫋嫋地迎着我走来。我吻了吻她那抹着脂粉的面颊，听着她象鸟一样格格地笑着打趣我。在她背后，另外有一个女人站在那里眺望。我吃了一惊，因为那个女人简直长得跟我一模一样；我的脸、我的眼睛、我的嘴和皮肤，皮帽子底下的头发也和我一般无二……而且身材和我一般高！她走上前来……走路的姿态也和我一样！仿佛另外一个我从站台上钻了出来；只有一点不同——这个女人的衣着十分华丽，脸上和嘴唇上都抹着胭脂。

我已经有十五年没有看见那个和我同年的、又是姑母又是表姐的弥尔德理了，那时她是一个被宠坏了的野孩子。现在我们两人呆呆地彼此打量，似乎并不比当年更相投。她的声音很沙哑。我不知为什么感到有点歉然。她却旁若无人地把下巴微微一抬。

我们回到她们两人的家里。海伦已经在房间里为我另外放了一张沙发。屋里挂着许多庸俗的画片，有的是绰约多姿的男女肖像，有的是带翅膀的天使，墙上还挂着许多木刻的东西，梳妆台上也放着不少木雕的上漆的盒子……都是手工刻的，有的不很好，有的却十分精致。

海伦站在我背后说：“都是我做的。”她看见我抚弄这些木盒，略略感到有点羞涩。

“你做的吗？”

“是我做的。我跟一个木匠学做的。寂寞的时候可以借此消磨时间！这把椅子是我买来加工雕刻的……床架也是我刻的！”

我用手指抚摸着椅子上和床上雕刻的花纹图案，然后转过

身来瞅着她，她比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老得多了，额头上、眼圈上和嘴角上都露出了皱纹，脸上抹的脂粉显得异常触目。她好象一只羞怯的小鸟似的从窗台下拿出许多别的木雕的盒子来。

“你瞧，这些不怎么好罢！”她说。

“我可觉得妙透了！……喔，这简直跟碧儿做的东西一样好，不过你做的是精细的东西，她做的都是些大件的東西。”

这一下，她的脸很自然地红了，“是呀，我自己也觉得很不错，不过我没有想到你也会喜欢！”

“你还做了些什么别的东西？”

“这儿还有些……可是都不太好。”

“怎么不好！你干嘛要这样说呢！”

“今天你要来，所以我没有去上工。”她告诉我，声音里还可以听出多年以前当她在洗衣房里学会管理洗衬衫机器时的那种自豪感。她接着解释道：“我和一百来个姑娘，在一家工厂里做工，”——她仍旧把自己看作姑娘——“给大学里做旗子，弥尔德理和我都在那儿做工，这房子里住的一些姑娘也在那里做工。”

当天下午，她带我去看那家工厂。姑娘们一排排坐在缝衣机前制作那些给大学生用来装饰房间的绒旗。海伦的薪水最大——七块钱一星期。我们于是又回到“姑娘们”住的房子里。我逐渐明白了。海伦渐渐老了，而男人却喜欢年轻的姑娘。靠了工厂的薪水，她可以不动用银行里为数不多的存款，勉强维持生活。因为总有一天，她会连一个“主顾”也找不到的。

弥尔德理年纪比较轻，也比较顺利。她不会打算盘，把赚

来的钱全部花在衣着上。在她眼里，男人是金钱的来源——此外什么也不是。这房子里也有一些和海伦处境相似的姑娘——年龄较大的女人，前途茫茫。有的和弥尔德理一样，自暴自弃，认为生活不过是这么一回事，自己无非抓紧机会，捞上一把。

我和海伦一同待了好几天，这期间没有男人来找她，说不定她是为了招待我而把自己闲下来的。有一天晚上，她躺在房间一头的床上，我躺在这一头的沙发上，我们两人都一连几个小时不能入睡。这一夜和往常一样，大门开开关关响了好几个钟头；脚步声爬上楼梯，有时停在我们的过道里，有时往里走。这里那里响起男人的声音，有时还夹杂着女人的笑声……沉重的脚步声踏下楼梯，大门又是一开一闭……这时，城里那些规矩的男人都回去会他们的妻子、女儿、姊妹、母亲去了。

海伦和我躺在床上在黑暗中交谈。

“我受不了这种生活，海伦，”我说，“我也不知道你怎么会受得了。”

“乞丐是没有挑选的余地的。”接着她又补了一句：“你说我该怎么办罢？”

我也说不出来。

隔了一会，她又问道：“你到纽约去干什么？”

“我去找工作，设法维持碧儿和我的生活，同时我还想设法进大学去读书。我有一个朋友在纽约，她说我可以白天工作，晚上上学。”

“上……大学？……你还没有上完学吗？”

“没有呢。我还有许多东西要学——历史、文学、经济，而且我还想学习写作。”

“我以为你早已毕业了，什么都学会了。”

“不。可学的东西多着哩。你每读完一本书，就愈觉得自己懂得太少。”

她静默了片刻。“我看谁也没法把全世界的书都读尽，你说的是吗？不过我觉得象你这样能懂得很多东西总不错。”她又接着说：“我想你总会挣不少钱罢。”

“我也不知道——我想挣不多，我好象不懂得如何挣大钱。”

“那么，再多受些教育有什么用呢？”

“我想多懂些东西。”

两人之间又是一段沉默。我们都躺在那里瞅着眼前的黑暗。接着，她的声音又从屋子那头传过来。

“你……你结过婚……就是一次，是吗？”

“是的。”

“你为什么不嫁个有钱人呢？你是受过教育的。”

我想了一想。“我一个有钱人也不认识。就是我认识的话，我也不敢说我一定会嫁给他。结了一次婚我都懊悔不已了。我再也不愿意跟男人打什么交道了……阔也好，穷也好，对我都是一样。”

她听着我说完，然后象是怕伤了我的感情似地怯生生地说道：“玛丽，如果你很有教养的话，你就可能嫁一个有钱人。你留着你的青春干什么呢？你总有一天会老的。”

“我并不是留着青春，海伦！至少不是为了哪一个男人。如果我将来会有钱的话，那也是靠我自己挣来的钱。”

我马上感到懊悔……她睡在那一边，也许会以为我是在评

论她。她是如此的温柔仁慈，她出钱让我进了六个月的学校。房间里是沉重的黑暗，窗外是城市的喧哗。“我并不是有意这样说，海伦……我是说如果我能学到很多东西，我就能自己挣许多钱。”

“是，这样倒不错。”

我不安地翻来翻去。真可怕，漫漫的长夜里不停的发出开门关门声和脚步声。外面的城市已经静下来，万籁无声。面对着这种短促的可怕的生命，我不由得悲从中来。这是种无可奈何的悲哀……绝望……绝望。

海伦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沉思。她很自信地说：“你看，我也在学新的本领。工厂把我累坏了……我的身体不比从前了。所以我现在在学摇骰子……要学不少时候才学得好。然后我就可以到雪茄烟店里去找一个工作做……你知道男人多么喜欢进店来摇骰子赌雪茄烟？唉，如果我能在那儿得到一个适当的工作的话，就不致于这样累了，而且在那儿还能碰见一些可意的人。”

我把毯子蒙在头上，等到她微弱的语声完全消失以后，才又揭开，我躺在那里，瞪着两眼，凝视着窗外高高的天空中闪闪灼灼的星……天下事无所谓好坏……万事不过如此……一切都不过是不得不忍受的经验。我昏昏沉沉地睡着了。睡梦中还不断看见海伦——一个庞大的模糊不清的人影，四周围拥着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灿烂的光芒。我惊醒以后，梦中的情景还久久地萦回在我脑中，我只好躺在那里仰望千古永恒的星宿。

我离开但维尔这个清教徒的城市到纽约去的时候，海伦一直送我到火车站。她含泪亲了亲我的面颊，脸上露出恳求的神

色……好像有什么话不好出口。我感到很难受。离她而去仿佛是一种不义的行为。如果我留下来，又无法帮助她……简直有点象是离开我的母亲。我除了离开，没有别的办法……我想到碧儿，想到乔治，而我的时间又那么紧迫。海伦……我现在没有办法，只好等将来……可是那时她已经老了。

我忽然起了一个念头。我不准备直接到纽约去，打算绕道南方去见一个我一直没有见过的人——罗柏德·韩溥栋，好几年来他一直把自己在中学里读过的旧书寄给我，使我有机会进行自修，后来参加考试进了学校。他在信中鼓励我读书，多年来我一直把他的像片挂在书桌边的墙上，他的旧书至今为我所珍爱。

我与他已有两年不通音讯了。几年以前，他的来信就逐渐不经常，内容也没有什么趣味，甚至很枯燥。他父亲的去世使他不得不离开学校到南方的一个小镇去工作。我听他说，他的全部薪水都用来维持他的母亲和一个尚未出嫁的妹妹。但是我并不清楚他的工作是什么——想来是相当重要的。

在我心里，他仍然是远方的一个英雄——一定是个黑皮肤的高个子，即使偶尔一笑，也和所有的英雄一样，笑得非常严肃。——他是个学者，对于别人琐碎无聊的言谈，一定会漠然处之。我想象他看见我的时候，一定会微微低下他那高贵的头来盯着我看，一言不发，等我先开口。他聪明而又严厉，却肯降低身份来和我同坐，他了解我为什么说不出话，也能容忍我结结巴巴的谈话。

当初我和诺德结婚的时候，内心隐隐觉得有点辜负了这个

人。

我给那个南方的小镇发了个电报，暂时在芝加哥等回音。这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不过回电来时，我已经把行李收拾好准备动身了。火车在晚上九点钟的时候开进了一个小站的站台。有几个旅客站起来准备下车，我等他们一个个下了车以后，还迟疑了一忽儿，尽力使心情镇定。然后，我慢慢地踏下火车，前后左右望了一望。一个人也看不见……只在远远的地方有一个矮小的人，这人戴了一顶黑色的毡帽，穿着一件长袖的上衣，那上衣仿佛随时都可能从他那瘦削的肩膀上滑下来似的。这么说罗柏德·韩溥栋是没有来接我……难道他应当来接我吗？他许是个忙人。这一来我倒松了一口气。

站在远处的那个矮小的人现在正在用男人们观看半夜里在小站上下车的女客的眼光在观看着我。他咧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提起提包急急地从他面前走过，我看见他那黑色的旧上衣上有一粒扣子松开了，吊在一缕线上在风中摆动。上衣上还有两处灰扑扑的油迹，在煤气灯光下显得分外触目。我从他面前急急走过时，他抬了抬脚……也许想来接我的提包；我赶快走开，连看也没有看他一眼。突然我听见背后有人喊道：

“玛丽·罗泽士！”

我转过身来睁大眼睛……他走上前来，我低下头去看着他那被灯光照亮的面孔，他的头顶只及到我的肩膀。他十分殷勤地把那顶略嫌太大、一直遮到耳朵根上的毡帽摘了下来。

“喔，玛丽！你怎么不认识我？我随便在什么地方都能认出你来，你就跟相片上一模一样……稍微高一点……不过这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你难道认不出我吗？”他对我笑了一笑，似

乎因为能使我惊讶而感到自得。

“哦……哦……我想我能认出你！”

“那么来罢，我给你找一家好旅馆……你打算在这儿停留多久？”

“我不打算在这里停留……我得赶快到纽约去。我想就乘下一班车……这儿有存物处吗？”

卖票员告诉我们下一次车是十二点多一点离站，罗柏德·韩溥栋听了异常失望。他接着说我可以跟他到饭店里去坐一会儿。我们走在泥泞的路上，我为了就他的步子，故意把脚步放小。一路上，他兴高采烈噉噉说个不停，不时把毡帽碰着我的肩膀。他要带我到他每天用餐的讲究的饭馆去。我听了很高兴——想来桌上一定铺着雪白的台布、摆着亮闪闪的银刀叉和玻璃杯——我在哪儿看见过这样的桌子？哦，对了，就是多年以前在那本登载着他的姓名地址的小杂志里；那上面有些英俊的、下颌方方的穿着黑色夜礼服的男子和一些穿着袒胸露肩的晚服的女子。也许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方去谈谈心……说不定他毕竟是个学者。我有什么理由因为他的身材只及我的肩膀或者他说起话来噉噉而看不起他——不应当这样来判断一个男人。拿破仑就长得并不魁梧。

我们拐入一条小街。他领我走进一家食堂：这食堂四围靠墙放着一排排椅子，中央有一张又高又大的大理石台面的圆桌，人们就站在桌边用餐。我们穿过青白相间的花砖地走到陈放饭菜的长桌前。罗柏德自己拿了一个盘子，要我也照样拿一个。我们沿着桌边一路走一路挑选自己想吃的食品……我的心还没有定下来，什么也不想要，他因此感到必须代我挑选，他分辨

道：

“你尽管吃罢！我请了你来，我会付帐的！”

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很自豪。我们坐下来，把盘子放在椅子的扶手上。食堂里别的男人吃饭时都带着帽子，罗柏德为了表示对我尊敬，还特意把帽子摘了下来。我记不清他说了些什么话，只记得他噼噼喳喳、滔滔不绝地讲。有时候，他似乎怀疑我为什么不答理他，不仅怀疑而且仿佛有些难受，于是我便向他申辩说我确实很感兴趣，只是有点累了。

为了证明我的话不假，我要求道：“请把你的生活情况告诉我一点。”

他说，他住在青年会顶层靠里的一间屋里。那里相当整洁，又便宜，同住的都相处得好。自从他父亲去世后，他就住到这个镇上，在一家大杂货店里管帐，店东还说，要是没有他，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每逢别的店员把事情做坏了的时候，总会把他叫去，他便把事办好……就是这样！他弹了一下指头表示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没有，镇上没有戏院，即使有的话，他也不敢说他一定赞成；每隔两个星期，教徒们在长老会教堂的地下室里聚会一次。妇女们都很文雅，那些老妇人都很垂青他——她们是不会看不出一个正派人的！是的，他读了不少书——《星期六晚报》，这是一种精美而高尚的杂志，内容都是正当的现实故事，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难道连一篇这样的故事都没有念过吗？……你知道不知道在《星期六晚报》上登一幅广告要多少广告费？你难道不知道这种杂志发行几百万册？这些我都不知道！我看出他颇以作为一册销售量这样大、广告费这样昂贵的杂志的读者而洋洋得意。

他又问了我几个问题。听说我不是基督徒，他的声音变得有点悲哀。我问他我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呢？他吃了一惊，他这一辈子还没有听见人提过这样的问题。听说我不做祈祷，他简直伤心极了。

“祈祷！有什么用呢？”我问道，“祈祷救得了我的母亲兄弟吗？祈祷能叫我父亲不酗酒吗？祈祷能让我姨母不去当妓女吗？”

他把头扭开——我居然说到妓女——而且我的姨母就是妓女。

我接着说：“祈祷！我为什么要祈祷呢？求自己的安宁吗？我何必求安宁？这整个世界何必求安宁？你又何必求安宁？我现在对安宁还不感兴趣——除非等到世界变了个样。”

“祈祷罢，信仰上帝就能教世界变样。”

“人们一直就信仰上帝，一直在祈祷——现在到底怎么样呢？”

“你说话这样强硬，玛丽，你不是社会主义者罢？”

“我是社会主义者——至少以前是。现在我正打算参加世界产业工会。我在芝加哥遇见了一些世界产业工会会员，在这以前，我在加利福尼亚州还遇见过几个，他们告诉了我他们所信仰的是什么。”

“他们有没有告诉你他们都是流浪汉？他们就是这种人。世界产业工会就是‘我不做工’^①。我敢打赌这一点他们不敢

① “我不做工”原文是“I won't work”，这三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和世界产业工会原名的缩写（I. W. W.）相同，是敌视美国工人运动的人为了污蔑世界产业工会故意编造出来的一句话。

明白对你讲。”

“好罢！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那些阔人不去加入世界产业工会呢？他们都不做工呀！”

他把头扭开去说：“社会主义和世界产业工会会破坏家庭和女人的贞洁。”

“原来是这样。我的家庭和我姨母的贞洁都没有能够保全，可是他们并不是受到了社会主义或世界产业工会的破坏。告诉我，是谁破坏的呢？”

我朝着他的后脑继续说道：“我倒想听听到底什么叫做贞洁。是不是说你不跟男人同居就算是贞洁？那么说，一切已婚的妇女都是不贞洁的了？……告诉你，我不允许任何一个男人来评论我贞洁不贞洁。你所谓的贞洁丝毫没有意义。”

“难道说你希望你是不贞洁的吗？”他转过来苦丧着脸说。

“我是说我不允许哪一个男人以我的身体为标准来衡量我。”

我们两人沉默了片刻，停了一会，他接着说：“我原以为你不是这样的。有许多女子都不是这样的。”

他露出满面愁容，我觉得十分抱歉。

“我很抱歉，”我讷讷地说，“你也许愿意祈祷——可是我不愿意。祈祷对于我毫无帮助。”

他看见我有些转变，便说：“我可以给你解释清楚，要是你再在这里停留一两天，我可以给你解释得非常清楚。我们可以在离这里不远的河边树荫下一边散步一边谈；我早就完全想好了——手挽着手，边走边谈。我想得很多，可是在这里找不

到人谈。我也想过你可能是——嗯，另外一个样子……你知道，我说这话并不是反对你。……”

这时已经过了半夜，他一直没有住过嘴。他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基督教上面。可惜时间实在太短促了，不足以拯救一个灵魂，但是他仍旧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劝我。我们站在站台上候车的时候，他仍然还在絮絮叨叨地说。他替我把提包举起来送到车厢里，我转过身来向他道别。

“玛丽……你也许会到大学里去读书。你能把你读过的旧书寄给我吗？我读了这些书，就不致于落在时代后面……一个人在这种地方等于陷在泥淖里。你把那些不用的书寄给我，并不需要多花什么钱。”

火车开动了，我踉跄地爬上梯级。我的旧书！我转身向后望了一眼，他还站在煤气灯下，那件破旧的上衣仿佛随时会从他的肩膀上滑下来似的。那颗松开的钮扣吊在一缕线上，给风刮得直打转转。

纽约是一个新奇的世界。广阔、冷酷而无情。这种无情，我在那天晚上和迦琳在大中央车站见面以后坐着出租汽车沿花园路走的时候就感觉到了。星星点点的灯光映在镜子似的街道上，我凝视着车窗外面的街道以及街道两旁矗立着的、没有一丝绿色点缀的石头房屋。我暗自寻思在这样阴冷灰暗的房子里住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难道都是和他们所建造的房子一样吗？我觉得自己十分孤单、渺小而软弱。这种感觉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一直没有离开过我。在这以前，我总觉得自己是个有个性、有希望的人，能按照自己的心愿来安排生活。可是在纽约

这儿，我却是愚昧无知、毫无意义、无足轻重——我不过是千百万人中的一个，我的命运与别人无关。纽约既不知道我的存在，也不关心。

我需要立刻找一件工作，因为我的妹妹必须依靠我，我自己也得设法维持生活。我依照迦琳的建议，读遍各种报纸杂志的广告栏，最后发现了“绘图杂志社”的一则征求速记员两名的广告。第二天，我写信去应征，经过考试，被录用了。我每天上午给书评栏的编辑记录他口授的信稿，每天下午和其他许多女孩子坐在一间屋里把信打好。书评栏的编辑是位刚来美国不久的英国人。他具有民主思想，可又非常爱他的祖国，自信一定能够打破那“美国是座大熔炉”的传说。据说英国人是不会在任何时候被任何人熔化的。他是英国的一切事物的宣扬者，他时刻都在向人宣传美国应当参战。他敌视一切美国的事物，我在他面前常常感到处于被攻击的地位——仿佛我生而为美国人，便是一种过失。我心中逐渐对他产生了一种出于自卫的敌意，只是由于怕失去工作，我才保持着缄默。我希望能调我去跟别的编辑工作，他们大都是和蔼可亲、具有民主思想的人。我所以感到他们可亲，也许是因为我盼望着与人接近以消除我的寂寞。他们的和蔼的寒暄，我们偶尔在过道里相遇时交换的谈话、他们对于我的生活和思想的关怀——那怕是随便说说——使我觉得在那里工作还算顺利。

我在这个杂志社工作了几个星期以后，才鼓起勇气，要求书评栏的编辑容许我自己写一篇书评。我看见他把许多书交给别人。我要求评论的这本书是关于印第安人的——这是本薄薄的不大重要的书，因此编辑终于同意让我试一试。我把这本书读

了好几遍。我在报上读到过关于印第安人协会秘书长的的工作，便给他写了一封信。我告诉他我对于目前要评介的这本书的意见，并且问他我对这本书的驳斥正确不正确。他回信支持我，同时还供给我许多反对华盛顿印第安人事务局的材料，以及他的协会出版的刊物。我读了这些刊物以后，将他的意见和我自己的认识溶合起来，写成了一篇评论。我把这篇评论送给编辑，他一看马上表示反对，象他这样的民主主义者，对于一个既存的制度事物，虽然有时也会希望在这里那里补缀一下，可是本能上总是加以支持的。他否定了我的论断，直到我把那些信件及我所引用的杂志拿出来给他看了以后，他才同意将我写的东西发表——可是经过了大大的删改。

这件事更加深了我对他的敌意。过了不久，我吞吞吐吐地向他建议请人评论两本新书：一本是《印度民族运动史》，另一本是阐明过去两个世纪中英国在印度所榨取的财富的经济论著。他悍然拒绝了，说：

“从书名上就可以看出这两本书是毫无价值、不足一提的。”

“和我同住的一个朋友是个中学教员，她说这两本书很有价值。”我分辩道。

“从书名上就可以看出它们是不科学的。”他冷冷的答道。

“科学……什么叫科学？”我反驳道。“你连书都没有看过。你收到的书有各色各样古怪的书名呢。”

他把椅子转过去，背对着我说：“请在今天下午四点钟将我的信件打好。”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这里有几十个速记员在工作，她们既不发生疑问，也不自以为懂得一本杂志应当包括什么内容。我久久地坐在办公桌前，心中愤愤地感到受了侮辱，我恨我的工作、恨我不得不日复一日地把时间消磨在记录这样一个人的思想上而不能锻炼和发表我自己的思想。我望了望四周在打字机的嘈杂声中工作的女子——她们都很能干，和我一样每星期拿二十到二十五块的薪金，却心满意足，年复一年地记录下别人的思想，然后打在纸上。为什么我却不能愉快地满足于这样的生活？——我为什么要恨那些安于这种生活的女孩？——我又为什么希望书评栏编辑倒在办公室里死去？

我离开工作室，回到华盛顿广场迦琳的公寓里，躺在她那宽大得像画室的客厅里一张长榻上。客厅里有一架大钢琴，上面经常放着一盆黄花。多半是水仙——迦琳自己就象一株水仙花：高高的、金黄色、头微微垂着，娇嫩而飘逸。她的屋子非常象她——那架大钢琴、那盆黄花、没有花纹的深蓝色地毯以及那些窄框中的精致的水彩画。我可以感觉到她本人以及她的住宅所含有的美，但这种美却不能成为我的一部分。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懂得欣赏这种美。我不能欣赏那种看来毫无意义的画。如果一幅画上画着一个男人或女人在实实在在地做着什么事，那我是可以了解的。在文学及音乐方面也是这样，民歌总叙述一个故事，可是象迦琳常常在晚上弹的那种古典音乐，我却无法理解。我从她那里得知欧洲有过萧邦、贝多芬、莫扎特等等音乐家。她常常把他们的作品奏给我听，以显示他们之间的区别。可是我听起来都是一样。她不断的奏萧邦的一首作品，我渐渐听熟了，也开始喜爱起来。文学也和音乐一样，我

只读故事，对于风格、形式及作者却一无所知。对于诗我向来是外行，我不懂人们写作时为什么不能象说话时一般自然，不要用韵文。迦琳有许多诗集，有时，她站在放着几本诗集的钢琴旁边，高声朗诵。我干脆就不能欣赏。除非这些诗是叙述努力奋斗的故事，我才能理解它们的意义。

每天五点钟下班以后，我便回到这个风雅的、有着抽象的概念和美的世界里。然而这个世界所拥有的，还不仅是抽象的原理。迦琳不但是个对于现代教育有兴趣的教师，她也是个社会主义者。晚上，总有许多人登上那长长的扶梯来到她的住室。他们有的躺在大沙发上，有的散坐在地板上，有的坐在椅子上，随心所欲，一面抽着烟卷，一面谈论着纽约城的生活：剧院、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艺术、新作家、爱情、心理分析、哲学、死亡。他们似乎想从四周的生活里搜寻社会上的问题。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以美国人特有的轻松态度来谈论这些严重的问题，显然不容许自己受到过深的感触。他们只在表面上轻轻掠过——也许他们太聪明了，不愿意去作更深奥的探索，因为在纽约，人们是不难作深奥的探索的。

我说不上他们到底是浅薄呢？——还是聪明？无论如何，他们本人以及他们的言行在我看来，都非常古怪。他们的风趣幽默和随机应变使我哑口无言——我暗自思忖，他们怎么能这样敏捷地想出这些巧妙的言词。我有时开口说话，他们总是微笑甚至哄然大笑。一次，我说我遇见了一个当“统计员”的朋友，说的时候把“统计员”这个字音读错了，在座的人都大笑起来，又有一个人反对道：“不要讪笑——人生快意的事已经太少了。”他们走后，迦琳告诉我这字应当怎样读，但是这种

嘲笑已经刺伤了我的感情。我和这些人日久相处，才知道我在学校里学到的极端刻板枯燥的知识实在值不了什么，甚至显得不恰当。这些人从不重复书本上的话——他们自己设法表达周围的生活，他们总是用批判的眼光、怀疑的态度和比较的方法来引用书本。

有时，迦琳也带我到那拥有不少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区分部去，我睁大眼睛不知所措地坐在他们中间。当迦琳把我介绍给他们时，他们便机械地伸出一只手，眼睛却看着另外一个人，一边还和别人讲话。把我看成是他们走过时顺手扶一扶的一把椅子。我一再来参加他们的集会，原希望能学到点什么，但是我在他们的世界里，不过是投进一池湖水中的一块石子，并不能留下多少印象。他们使我感到迷乱、无能、自卑，甚至有些怨恨。我不知如何才能得到他们那样的知识，而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来指导我。他们自己读书很多，不知道一个知识浅陋的人应当怎样开始。我不知道要阅读哪些书才能获得初步的社会科学知识；即使走进公共图书馆里，我也不知道要借阅什么书。他们之中有许多是属于这样一类天真可爱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从远处把工人理想化，相信工人阶级中蕴藏着神奇的力量和才智，时机一到，便会以社会革命的形式显现出来，改变世界的面貌。那些肯诚恳地和我谈话的人却说人生的经验比书本更有价值，想以此来打消我进大学学习的心愿。有的人觉得我天真得可爱，不希望我改变。我确实很天真，没有什么变态的“心结”。有一次，迦琳的一些朋友提议：“来，让我们到麦迪逊广场花园去参加反对战争的群众集会，”众人也都表示同意，我马上站起来准备出发，不料他们只是坐在那里滑

稽地谈论着无法克服的妨碍他们行动的“心结”，足足磨蹭了一个钟点才真正站起来动身。我既然是他们中的一员，自然也就有变态心理的征象，人人都相信我早晚会有真正的变态心理的。不过，我暂时还很幼稚，无知而愚笨、思想模糊、脾气暴躁，连“统计员”这个字的音也读不准，可是当别人随便提出一个建议，我却又立刻行动起来。

就在这前后，我在一家书店里遇到一个世界产业工会会员，而且我记得我们还交谈了一阵。他是个水手，穿着工人的服装，红头发，蓝眼睛。我们一同去看电影，然后又到契尔斯饭店去吃饭，我们两人隔着一张白大理石的桌子面对面坐着，一直谈到深夜。他到过许多国家，经历很丰富。他嘴里的工人阶级并不象是一种渺茫的奇迹。他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谈话中对于我所往来的知识分子表示很鄙视。我叫他老红，他叫我玛丽，我们在一处感觉很自然很投机。次日晚上，他换上一条新领带，到迦琳的寓所来访问我们。那天晚上还到了不少人，他把其中一位妇人称作抽烟卷、喝鸡尾酒的、客厅里的粉红色社会主义者。这一切都很有趣。后来，他又上船走了，我再也没有见到他，这事使我很难受。

我把手里的一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这是乔治的来信。我不敢把信的内容对任何人讲，因为我担心和我住在一起的这些人没有一个会了解。他们把工人阶级理想化了，他们多半不会理解贫困和无知会把人逼上哪条路。他们会说，如果我的兄弟因为饥饿偷了一块面包，那是可以原谅的，他可不应当偷马。我虽然十分爱他，也是这样想。

信是从监狱里发出的。他向我求援。他没有解释为什么要偷马，也没有说是什么时候怎样偷的；他既不想找借口，也没有表示懊悔。他只说他偷了马，在监狱里候审，需要帮助。

他的信使我很痛苦。我回想起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子，牵着丹的手，泪汪汪地站在站台上送我。我又想起那个灰蒙蒙的早晨我在特列尼达一间小屋里看到父亲和他们兄弟两个人的情景——地板的罅缝里塞满了多年的尘土，我又回想起他来信求救，告诉我丹被打得满背流血，而这些都是多年以前的事了。这些年里，他的儿童的心灵是怎样成长的，他的少年生活是怎样发展的，我都不知道。那里的生活艰苦残酷，很难长出什么美丽的东西来。失去了母亲和姊姊的抚爱，没有得到任何教育和训练，他终于在贫困之中长大成人了，从能够运用幼弱的小手做工时开始，就用劳力挣自己的面包。我不知道他做过什么工作——但最初一定是小孩所能做的不熟练的工作，然后是少年能做的工作，最后是不熟练的工人所能做的各种工作。至于他心里有什么想法，他长大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这些，谁也不知道，谁也不关心。也许我父亲会关心——是的，但是他自己也是个牺牲者。我一想到弟弟，眼前就现出一片光秃秃的平原，没有一株树，只见稀稀朗朗一丛一丛的野草。

他偷了一匹马。我问自己，他为什么不应该去偷马呢？他需要一匹马来谋生。他或许和我一样——心中充满了太多的精力和憎恨，决不肯服服贴贴地忍受这种贫困无望的生活而不起来反抗。

以上这些，是我后来才认识到的，我现在也仍是这样认

识。可是当时我手里握着乔治的信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的信对我是一个打击。我还没有从这个打击下清醒过来，便提笔给他写了一封信。我写道：他难道不能等一等？等碧儿崔丽斯从学校毕业以后，我就有钱去帮助他；他难道不知道我愿意尽力帮助他，送他去读书或者去学一门手艺。他难道不知道我的生活也很苦，但是我并没有偷窃。除了那里的那种生活以外，他难道没有别的打算吗？他为什么不能努力工作？为什么不能象我一样再忍受一个时期的饥饿？我一页接一页地写着，心安理得地倾吐着我的伤心和失望。我为什么这样不走运？我一面写着，一面也隐约意识到这都是我的过错，是我丢下了乔治和丹不管。我肆意地倾吐着我的痛苦，忘记了他还是个孩子，犯了偷窃罪坐在监狱里候审，已经够他痛苦的了。

我把自己的现款以及迦琳借给我的钱全部附在信里寄了出去。但是我并没有向迦琳说明理由。

一星期又一星期，没有回信。我不知道他收到我的信和钱没有。我一天比一天更后悔我写了那封信——完全自以为是，不能设身处地替别人想一想。我决定等碧儿一毕业，就再给他写信，或者亲自去一趟。

几个星期以后，一天晚上，我下班回来，正准备把外衣挂在墙上，忽然看见门缝前的地板上有一份折得很整齐的黄色的电报。我一怔，举着两手，凝视着这封电报，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封电报和乔治有关。我揣测，他是不是已被判罪，送进了监狱。也许这是迦琳的电报罢！我让外套滑在地上，蹲下去捡起电报。电报是我的，我把它拆开，上面写着：

“乔治今天死了。函详。丹。”

我走到客厅里，把电报读了一遍。这不过是黄纸上写的黑字，字不过是字，我想，不可能是真的。接着，我又渐渐意识到这是真的。

那一夜，街上没有行人，我独自走在灯光闪烁的街道上……没有哭，也没有想。暗夜、树丛，哈得逊河静静地、阴沉沉地流……我俯卧在河滨公园”里，湿冷的泥地侵袭着我的身躯。山上——河滨马路两旁尽是豪门的宅第……这些人在平静与骄奢淫逸中生活和安睡……白天，他们从来不工作……他们的妻女都不知道什么叫工作。我的母亲温柔慈祥，我父亲喝酒并不如山上的男人那么厉害……他们的儿子却去上学……而我的弟弟却要挨饿、死亡。我的弟弟……多么年轻可怜。是我们养活了山上的那些人……是我们，象我和我弟弟这样的人。

几天以后，丹来了一封信。我读完后立刻把信烧了——我不忍再看见他的笔迹，不忍再读他信上写的事。他没有受过教育，不懂得修辞，可是他写得很清楚达意。乔治是在做散工挖沟时砸死的；他在俄克拉荷马州一个小镇里挖下水道，沟壁上的土塌下来压断了他的脖子。人们把他掘出来时，他的眼眶和嘴里都塞满了泥土。他已经被葬在母亲的坟旁，雇用他的公司给了我父亲五十块钱抚恤金。

信上接着说：乔治没有过堂就出了狱，因为他年纪太轻，失马的人听了别人的劝撤回了控诉。乔治于是又当上了散工——他入狱以前也是当散工的。我的信他收到了，他始终不能宽恕我给他写这样的信。当他还在狱中的时候，我实在不该给他写这种信，我根本不了解情况，而且我也不必象他那样做苦工；我舒舒服服地住在大城市里上学，乔治却没有这个机会。他们那

里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机会。

现在他死了。公司认为他的生命值五十块钱。

这一夜，我通夜没有入睡，竭力想忘记，想把头脑中的思想排挤出去。城市的嘈杂渐渐消散，只有疾驶的汽车和人行道上的脚步声偶尔突破这万籁无声的寂静。我哭了一阵，然后静静地躺着，竭力想忘记过去的年代，忘记我离开弟弟时的情景，忘记我写的那封信以及丹来信报告乔治的噩耗时所用的字眼——如同地道里的老鼠……拖出来的时候眼眶和嘴里都塞满了泥土……那墓地四周横七竖八的立着几根木桩……坟地一头插着一块写着死者姓名的小木牌……灰茫茫的平原……我的弟弟丹和父亲。不……不……我不想回忆这些事。我恨不得这些记忆都一下死去。

过了几个月，美国也参战了。别人派我去参加反对战争的宣传工作，我也就这样做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乔治的影子一直盘踞在我脑子里，因此我很高兴在下班后担负起一种能吸引我全部精力的活动。不过，即使我不象我的朋友那样具有社会科学的知识，我也一样是反对战争的。

战争已经进行了三年。人们一直都在纷纷议论。美国有参加战争的可能。威尔逊利用“他使我们避开战争”的口号连任了总统。我听过休斯发表反对他的演说。当时我至少在形式上还是个社会主义党员，我也象别的党员一样，只是因为威尔逊的反战口号，便抛弃了自己的主义而投了他的票。我那时阅历尚浅，对于社会的形态和结构都实在太无知，竟看不透威尔逊及其他任何人都不过是比他们自己更强大的势力和组织的工具

罢了。

当时我还在加利福尼亚州，我周围的许多社会主义小组都懂的不比我多。我们经常在一间暗洞洞的小屋子里聚会，讨论战争，研究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社会主义思想。这房间楼下是一间弹子房，前面是一间铺着小木块镶成的地板的方屋子，屋角里放着一架黯然无光的钢琴。在通到这间屋子的过道上放着一个报架，陈列着各种以很小的字体印在很粗糙的纸上的社会主义的和激进派的报纸、传单和小册子。这里面所谈论的题目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不时会有一个党员发起组织学习组，我便常常和十来个男女工人一同去参加。我记得有一个这样的学习组。组长是个无神论者，第一次开会，他整夜都在滔滔不绝地宣扬无神论，一忽儿说到宗教所依据的“信仰”的定义，一忽儿又说到科学所依据的“理性”的定义。我坐在那里，心想关于这种问题的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以后我再也没有到这个小组去。这样不去开会，可以说就是脱党的行为，可是那人说得实在太冗长，而且总是重复已经说过的话，因为他在群众集会上总是这一套，实在太腻人。

我又参加另外一个小组，组长给我们一本字体极小的小册子，要我们仔细阅读，下回来时准备提问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我一点不懂，也提不出问题。

另外还有一些干瘪瘦小的家伙常常插进来鼓吹单税制^①。在一次竞选运动中，他们拉我去参加工作，我用全部业余时间替他们打字，我盼望选举早日结束，以便有借口，可以冠冕堂

^① 单税制主张废除一切税，只抽土地税。

皇地摆脱这件工作。但是我在这次运动中也长进了不少学问，至少我学会了所谓“自然增价”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社会主义党区分部每月总要举行一两次舞会，吸引青年工人。二三十个人挤在那间有镶木地板的阴暗的小房间里，本城的律师也带着妻子和女儿来参加。他们都是聪明和蔼的人，担负着本城的社会主义党的一大部分工作。律师的太太特地烤了一个大蛋糕，她的女儿是个学生，会吹黄铜喇叭。钢琴叮叮咚咚的响起来，喇叭也嘟嘟嘟地吹响了，我们便围成一圈，尽量装出快活的神气。我和一个中年的机械师跳了第一个舞，跳舞的时候，一句话也没有谈。第二次舞的舞伴是个老年的单税主义者，他来此的目的，就是为他的主张争取信徒，我们跳舞时，他不住口地宣传单税制。

我参加过几次这样的学习组和跳舞会，既乏味，又缺少美感，不足以长期吸引我。学习组的组长都不懂得那种对于这样的题目说来是十分重要的教学方法。碧儿崔丽斯仅仅参加过一次学习会，以后再也没有去。在我记忆中，这些都是沉闷单调的集会。

人人都在关心欧洲战争，然而我对于应该知道的事都一无所知——为什么会有战争；必然产生战争的现存制度的本质是什么，我都一无所知。因此，当威尔逊喊着“反对战争”的口号出现时，我便糊里糊涂投了他的票。

那是在加利福尼亚州时的事。在纽约我也没有长多少见识。我以前就知道被送到前线去当炮灰的普通士兵总是工人；只有阔人才能当军官。迦琳对我说过，并且我自己也在报上看到：美国的财阀正将大笔贷款借给协约国；美国的军火制造商正在

获得巨大的利润，这些势力雄厚的大公司决不会让协约国打败。我在一次反对战争的集会上听见一个印度人说：英国所以和德国开战，是因为德国是英国在海上和商业上的劲敌，威胁着通往印度的航线以及英国的海上霸权。我在学校里读过的历史——美国革命战争、一八一二年的战争以及内战的历史——都在我心中培养了典型的美国人的反英偏见。我一点不了解德国，可是我知道英国从来就是个吸血鬼和征服者。

当鼓动美国参加欧洲大屠杀的宣传愈来愈疯狂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小组，出发作反对战争的旅行演讲。我向“绘图杂志社”告了几天假。我们这个团体包括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在许多城市向群众讲话。有人为我们召集了很大的群众集会，因为反战的情绪非常普遍。工人们站在工厂外面听我们演讲，在某一次集会中，小组里有人把我推出来，叫我给他们演讲。这是我第一次站在人群前讲话，工人们鸦雀无声、津津有味地听着。我常常听人说、也在小说里读到这样的事：一个男人或女人忽然接受了一件重大的任务，他们挺身而出，口若悬河，十分出色，博得了听众热烈的喝采，就此一举成名。可是我并不是小说里的人物，我站在汽车踏板上，望着工人们仰着的脸，心中十分惊惶。我没有什么话可以对他们讲。我忽然醒悟到自己是多么无知，多么慌乱。我随便讲了几句空空洞洞的话，便退了下来。散在群众中间的几个组员三三两两地鼓了几下掌来勉励我，可是毫无用处。另外一个人连忙站到汽车踏板上，想尽快地消除我在听众中留下的不好的印象。听众善意地看着我，但是对我并不感觉兴趣。后来，人们都分成一小堆一小堆地交谈，他们都表示反对战争，但是我很

知道他们所以有这种意见，并不是由于我的讲话。

当我们驶过有钱人的子弟读书的地方——普林斯登城的时候，一伙穿运动衣的学生想来拦击我们的汽车。到底要不要停车来应付他们呢？我们的意见很分歧。司机说，要是我们停车，我们就会因为聚众肇事扰乱治安而被逮捕拘禁。

司机不肯停车，有人不同意：“胡说，聚众肇事的是他们。”

“问题不在这里——他们是不会进监牢的——再说，你以为我们是在什么地方？”我对于我们没有停车这一点感到很耻辱。我反对战争，但是我绝不是和平主义者，我觉得很可以借这一伙衣冠楚楚的普林斯登大学生来好好的出一口气。

在华盛顿，迦琳和我只好在火车站的长凳上过夜，因为这个城里挤满了从全国各地前来反对美国参加世界大战的千千万万男女。成千上万的人在国会前游行示威，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一件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正当我们在游行的时候，一个高大魁伟的女人穿着一身讲究的紧身黑色骑装横冲直撞地穿过游行队伍朝我走来。横眉怒目，一脸凶相，把一支皮鞭当作警棍一样捏在手里。她走过我身边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知道她十分想把那只皮鞭在我头上重重的打一下。我认为她就是统治阶级的象征，这个统治阶级制定我们的法律，占有了我们的土地和工厂，逼使我们为了获得自己生存的权利便不得不替他们做工，现在强迫我们参加战争的，也是这个统治阶级。她既然满面怒容地走过，我对于她当然也没有丝毫好感。

在这以后，纽约第五号街上便出现了第一队穿卡叽布军装的士兵。我站在“绘图杂志社”办公室的窗口眺望。宣战以来，

书评栏编辑更是高兴得手舞足蹈。他兴高采烈地看着一队队穿卡叽布制服的士兵被送到欧洲去遭受屠杀。我却伤心得暗中掉泪。当天我和他大吵了一场，结果便被调到别的编辑部。事情是这样开始的：迦琳的一个朋友——一个有钱的妇人——的弟弟应征到军官营里受训，后来又以他需要担负妻子和两个孩子的生活为理由而免服兵役。我把这事讲给他听，并且说这只因为他是个有钱的人。

我对他说：“纽约城里有许许多多穿军官制服的人，鞋后跟上钉着马刺以免腿子跷在办公桌上时会滑下，可是在所有这些人当中，你找不出一个工人，他们都是有钱人。”这以后，我就被调开了。

这时，罗柏德·韩溥栋也给我写了一封爱国的信，报告他已经应征入伍了。这对于他没有什么关系——他自己可能也知道，他那样活着并不比死好多少。

“我希望前线上的士兵都是这种倒霉的办事员。”我有一次曾经这样说。

碧儿崔丽斯来信说她也在做战时工作。我回信表示反对，她却说，一个人总应该为祖国做点事。我问她，谁的祖国？这个国家饿死了我们的母亲，并且也会让她饿死，这个国家，逼得海伦当了妓女，并且也会逼她去当妓女，这个国家把乔治象老鼠一样弄死，并且也会把她弄死，这难道是我们的祖国吗？

丹又给我来了一封信，要是我再不接济他，他也想去入伍了。我帮了碧儿崔丽斯许多忙，却没有帮过他一点忙。

“你一直答应说要帮我和乔治的忙，”他写道，“可是你什么事也没有为我们做过。我想学当工程师。可是我不愿意继

续挨饿了。我如果找到工作，我就做工。要是你不帮我学到一点本领，我就要谎报年龄去当兵了。”

那天晚上，我在床上躺了几个钟头，一直无法入睡。我已经失去了乔治，难道还要失去这一个弟弟吗？不，不行。他还是个孩子，不到十八岁。钱……我到哪里去弄钱呢？我的薪水不够维持我和碧儿崔丽斯，我自己都只好借住在迦琳家里。虽然还有海伦……可是我怎么好去叫她动用银行里的存款，我不能象她一样去赚钱吗？我有什么权利这样做？我可以在饮食上再节省一点，上班时不坐车——但是这样仍旧不够。

第二天，我试去向人借钱。和我同一个办公室工作的两个女孩拒绝了我的请求，这使我很窘。这儿都是些丰衣足食的女孩，如果我对她们说实话，把我家里的情况说给她们听，那是谁也不会了解的。贫穷与饥饿都是可耻的事——你要是又穷又饿，谁也不会看得起你。一只狼如果被打败了，打瘸了腿或受了伤，别的狼就会来袭击它——我觉得人在许多地方和狼相似。不是说：“有的人应该再给他一些，没有的人应该再从他那里拿走一些。”

过了一天，我走到杂志的总编辑面前，正式提出请求。

“你有没有亲戚？不能向他们借钱吗？”

“亲戚是有的，可是都住得很远。我现在急需用钱。”

“你的父母在哪儿？”

“在俄克拉荷马州。我父亲在那里做医生，可是我来不及等他的回信，”我撒谎道，“我求你，这是我的印第安镯子和戒指。如果你还信不过我的话，我答应以后每星期扣我一部分薪水。”

我怔怔地望着他的眼睛，我的声调坦率而诚恳。我认为，既然我的父亲并不是当粗工的而是一个医生，他就很难拒绝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不过他端详了我一阵，说道：

“镯子和戒指你可以留着……拿这张支票到会计员那里去领五十块钱。”

当天晚上，我把这笔钱寄给了丹，并且附去一封信，叫他再勉强忍耐几个星期。我寄给他的钱是借来的，短期间他还需要自己找点工作做。

我知道丹需要两三年工夫才能学成一门技术。对我说来，这两三年就不能买书、不能看戏、不能听音乐、不能有所渴望的一切。也就是说我缴不出学费就只能慢一点上大学。但是这些都不要紧。

关于这一切，一个来拜访迦琳的爱尔兰女学生和我争论了许久。她说，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我并没有把弟弟妹妹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也不必对他们负责。如果我确实觉得自己对社会有责任，那我就应当继续读书，使自己能做更多的工作。犯不着为了某一个人而浪费一分钟光阴或一分钱。按照逻辑的推论，这不仅不能算是仁慈，这等于是费尽毕生精力向每一个乞丐施舍一文钱。只有新社会才能根绝贫困，我应当投身这样一个运动。

对于这种论点，我向来就不善于很快地答辩。我和我的弟弟是血肉相连的。我已经失去了乔治，决不能让丹再离我而去。他们还很小的时候，我就抛弃了他们。我把这些话向那爱尔兰女子解释。

“当时你也不过是个小孩，你并没有什么责任，”她答

道。

“我只能说在年龄上是个孩子，”我不同意地说，“我的行为是有意识的，既然有意识，就有责任。”

几个星期过去了。没有收到丹一个字。我写信给山姆，一个月后，他回信来说我寄去的钱丹已经收到了。他前前后后找到了好几次工作，但是都不是固定的。他不愿意在歇工期间经常挨饿，最后终究登记入伍了，现在正在营里受训。他上船到法国去时如果路过纽约，一定写信告诉我，来看我。

我收到这封信后，马上跑出门去，在大街上一连转了几个小时。丹只有十八岁。现在他却把生命交给这个不能抚养不能教育他的国家了。我痛恨我所在的这个大城市，痛恨这从工人身上剥削来的财富。我在四十二号街和五号街上停下来看着那流水般的汽车，许多汽车的价钱比我一生所能赚的钱还要多。懒洋洋地躺在这些汽车里的人，他们一生中连一天工都没有做过，将来也不会做工，也不必去打仗。

我并不是单纯地写下一些字句。我写下的是人类的血和肉。在我的经验和信念中，有着根深蒂固的仇恨和痛苦。这种仇恨和痛苦的经验决非笔墨所能增减的。

我等待着丹，盼望着丹。每逢一队队穿卡叽布制服的士兵走过时，我就挤到人行道旁去端详他们的面孔，希望能看见他。这种想法完全是发疯，可是我仍旧去看。一队队人走过去——可是没有他。也许是我眼花撩乱了没有看见他。有时候，一排排棕色面孔蓝眼睛的人都变成了一个模样，都象是他，我的弟弟——前进，前进，前进，脚底下踏着无穷无尽的死亡的步伐。伴奏着他们前进的音乐在我耳朵里成了死亡的鼓声。他们

手中高举的旗帜仿佛是降了半旗的黑幡。我的兄弟们的面孔不断前进——成千上万个面孔——都是饥饿的面孔，年轻但是被迫害的忧愁的面孔。

我还在希望。希望他不会在法国阵亡。战争也许打不太长了。等他受训完毕时战争也许已经结束了。他还那么年轻。去到那里的人并不一定都战死。我要把钱存起来，等他回来，然后他就可以和我住在一起，我们可以一块工作，一块学习。

时间过去了。碧儿崔丽斯从学校里毕了业，当了教员。我给山姆写信，问他有没有听到丹的消息。我每天一回家就先看看有没有信。可是什么信也没有。他是不是还在营中受训？他们是不是走另外一条路上船到法国去了？一星期又一星期，我心里总怀着希望——后来希望渐渐淡了。希望里掺进了失望。我感到我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